

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

清时期

曹树基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 清时期/曹树基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5
ISBN 7-309-02775-2

I. 中… I. 曹… III. 人口-研究-中国清代 IV. C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286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62.75 插页 2

字数 897 千

版次 2001 年 5 月第一版 200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人口史

葛剑雄 主编

第五卷提要

本卷依据《清实录》、《清史稿》、《清朝文献通考》、嘉庆《大清一统志》等官修史书和清人文集、笔记、地方志及档案资料，深入地讨论了清代的户口制度、各省分府人口数量、边疆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的分布与迁移、城市人口数量，以及战争、瘟疫、灾荒对人口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对清代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

本卷的研究，综合运用了历史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注重人口制度的定性分析，更注重人口数据的定量分析。通过对大量户口资料的考订，全面复原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咸丰元年（1851年）、光绪六年（1880年）、宣统二年（1910年）各省分府人口数据，并与1953年相同政区中的人口数量进行比较。本卷对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及光绪初年北方大旱灾所造成的各地人口损失，作出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对乾隆年间及光绪十九年（1893年）城市人口的数量，作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估计，有助于人们获得对清代人口历史的新认识。

第一卷

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

葛剑雄 著

第二卷

隋唐五代时期

冻国栋 著

第三卷

辽宋金元时期

吴松弟 著

第四卷

明时期

曹树基 著

第五卷

清时期

曹树基 著

第六卷

1910—1953年

侯杨方 著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	1
一、何炳棣的研究成果	1
二、其他学者的研究	4
第二节 方法和思路	8
一、研究方法	8
二、研究思路	9
1. 关于“丁”的实质	9
2. 重建清代中期各省府级人口	10
3. 清代后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	12
4. 重建清代末年的各省府级人口	13
5. 重建清代中期和清代末年的城市人口	14
6. 问题和讨论	16
第二章 清代人口的起点:人口与人丁	17
第一节 清兵南下对南方人口的影响	18
一、围城和屠城	18
1. “扬州十日”	18
2. “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	20
3. 从南昌到赣州	24
4. 从南雄至广州	27

5. 长沙和湘潭	30
6. 北方的屠杀	33
第二节 东南沿海的战争与迁海	35
一、福建战事与郑成功部抗清	35
二、迁海	36
1. 福建	37
2. 广东	39
3. 浙江	41
第三节 “三藩之乱”对人口的影响	42
一、“三藩之乱”对黔、湘人口的影响	42
二、“三藩之乱”对江西人口的影响	44
三、“三藩之乱”对浙江人口的影响	47
1. 对明末清初浙江人口变动的补充说明	47
2. “三藩之乱”对浙江人口的影响	49
第四节 应该结束的讨论:丁的实质	51
一、关于“丁”的争论	52
1. 萧一山的观点	52
2. 何炳棣的观点	52
3. 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	53
二、各省“户”、“口”、“丁”的统计	55
1. 作为货币和粮食单位的“丁”	56
2. “食盐课”与妇女统计问题	58
3. “原额人丁”与明代后期户口数的关系	61

第三章 清代中期南方分府人口

——江苏、安徽和浙江	69
------------------	----

第一节 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69
第二节 江苏	71
一、江宁布政司	72
1. 江宁府	72
2. 扬州府	77

3. 通州和海门	81
4. 海州	83
5. 徐州府和淮安府	84
二、江苏(苏州)布政司	85
1. 苏州府和松江府	85
2. 太仓州	86
3. 镇江府	86
4. 常州府	87
三、结语	87
第三节 安徽	90
一、皖南地区	90
1. 宁国府	90
2. 广德州	92
3. 太平府	93
4. 池州府	94
二、皖北地区	96
1. 安庆府	96
2. 和州、泗州和滁州	98
3. 庐州府	99
4. 颍州府	99
三、结语	100
第四节 浙江	102
一、嘉兴府和湖州府	102
1. 嘉兴府	102
2. 湖州府	103
二、严州府和杭州府	104
1. 严州府	104
2. 杭州府	105
三、绍兴、宁波、处州和衢州	107
1. 绍兴府	107
2. 宁波府	109

3. 处州府	110
4. 衢州府	111
5. 金华府	112
四、结语	112

第四章 清代中期南方分府人口

——江西、湖南和湖北	114
------------------	-----

第一节 江西

一、赣北地区	115
--------------	-----

1. 南昌府	115
2. 南康府	118
3. 九江府	119
4. 瑞州府	120
5. 饶州府	121
6. 广信府	122

二、赣中地区	124
--------------	-----

1. 袁州府	124
2. 临江府	126
3. 吉安府	127
4. 建昌府	128
5. 抚州府	129

三、赣南地区	130
--------------	-----

1. 南安府	130
2. 宁都州	130
3. 赣州府	132

四、结语	134
------------	-----

1. 分府人口比例的比较	134
--------------------	-----

2. 不同记载中的全省人口数的比较	135
-------------------------	-----

第二节 湖南

一、湘中地区	136
--------------	-----

1. 长沙府	136
--------------	-----

2. 衡州府	139
3. 宝庆府	141
二、湘北地区	142
1. 岳州府	142
2. 常德府	144
3. 澧州	144
三、湘南地区	146
1. 永州府	146
2. 郴州和桂阳州	147
四、湘西地区	148
1. 永顺府	148
2. 湘西四厅和靖州	150
3. 辰州府和沅州府	152
五、结语	153
第三节 湖北	155
一、鄂东地区	156
1. 黄州府	156
2. 汉阳府	158
3. 武昌府	159
二、鄂中地区	160
1. 德安府	160
2. 荆州府	162
3. 安陆府	162
4. 荆门州	163
三、鄂西南区	164
1. 宜昌府	164
2. 施南府	165
四、鄂西北区	167
1. 襄阳府	167
2. 郢阳府	169
五、结语	170

第五章 清代中期南方分府人口

——福建、广东和广西	172
第一节 福建	172
一、闽北沿海	174
1. 福宁府	174
2. 福州府	176
二、闽西山区	177
1. 建宁府	177
2. 邵武府	180
3. 汀州府	181
三、闽中地区	182
1. 延平府	182
2. 龙岩州	184
3. 永春州	185
四、闽南地区	185
1. 兴化府和泉州府	185
2. 漳州府	187
3. 台湾府	188
五、结语	188
第二节 广东	190
一、清代中期的“丁”	190
二、粤中区	193
1. 广州府	193
2. 肇庆府	195
3. 罗定州和佛冈厅	197
三、粤东区	197
1. 潮州府和惠州府	197
2. 嘉应州	199
四、粤北区	200
1. 韶州府	200

2. 南雄州、连州、连山厅	201
五、粤西区	203
1. 高州府	203
2. 雷州府	205
3. 廉州府	205
4. 琼州府	206
六、结语	208
第三节 广西	209
一、桂西地区	211
1. 泗城府和庆远府	211
2. 思恩府和镇安府	211
3. 太平府和南宁府	212
二、桂东地区	212
第六章 清代中期南方分府人口	
——云南和贵州	214
第一节 云南	214
一、滇中区	216
1. 云南府	216
2. 潯江府	218
3. 楚雄府	219
4. 武定州	221
5. 曲靖府	222
6. 广西州	225
二、滇西南区	225
1. 顺宁府	225
2. 永昌府	227
3. 腾越厅	229
4. 普洱府	231
5. 元江州和镇沅州	232
6. 景东厅	233

三、滇东南区	233
1. 开化府	233
2. 广南府	235
3. 临安府	237
四、滇东北区	238
1. 昭通府	238
2. 东川府	240
五、滇西区	240
1. 大理府	240
2. 蒙化厅	241
六、滇西北区	241
1. 丽江府	241
2. 永北厅	242
七、结语	243
第二节 贵州	245
一、黔中地区	245
1. 贵阳府	245
2. 都匀府	250
3. 平越州和松桃厅	251
4. 安顺府	251
二、黔北地区	252
1. 遵义府	252
2. 仁怀厅	255
3. 思南府	256
4. 铜仁府	257
5. 石阡府	257
三、黔东南区	258
1. 思州府	258
2. 镇远府	258
3. 黎平府	259
四、黔西地区	260

1. 大定府	260
2. 兴义府	261
3. 普安厅	263
五、结语	263
第七章 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	266
第一节 已有的研究成果	266
一、施坚雅的研究	266
1. 统计中的差错	267
2. 与 20 世纪人口数的比较	268
3. 县级户口数据的编造	269
4. 1812 年和 1822 年的数据	270
二、王笛和刘铮云的研究	271
三、本章分析的思路与方法	273
第二节 川中地区	274
一、川中南部	275
1. 重庆府	275
2. 泸州和叙永厅	279
二、川中北部	281
1. 顺庆府	281
2. 潼川府	283
3. 资州	284
4. 保宁府	285
第三节 川东地区	288
一、酉阳州	288
二、绥定府和太平厅	289
三、夔州府	292
四、忠州和石碛厅	293
第四节 川西地区	294
一、川西北部	294
1. 绵州	294

2. 成都府	296
3. 邛州	303
4. 龙安府	304
5. 眉州	306
二、川西南部	308
1. 嘉定府	308
2. 叙州府	311
第五节 川西边区	315
一、雅州府	315
二、宁远府	317
三、茂州、理番厅、懋功厅、松潘厅	322
第六节 结语	323

第八章 清代中期北方分府人口

——直隶、河南和山东	327
第一节 直隶	327
一、顺天府	327
1. 清代中期户口	327
2. 清代后期户口	331
二、永平府和遵化州	334
1. 永平府	334
2. 遵化州	335
三、宣化府和口北三厅	336
1. 宣化府	336
2. 口北三厅	338
四、承德府	340
五、保定府、天津府和河间府	342
1. 保定府	342
2. 天津府	344
3. 河间府	344
六、冀州、赵州和大名府	345

1. 冀州	345
2. 赵州	347
3. 大名府	347
七、其他府州	348
第二节 河南	351
一、豫北地区	351
1. 卫辉府	351
2. 彰德府	352
3. 怀庆府	353
二、豫中地区	354
1. 河南府	354
2. 开封府	356
三、豫南地区	357
1. 南阳府	357
2. 汝宁府	358
3. 光州	359
四、结语	360
第三节 山东	361
一、鲁西地区	361
1. 东昌府和临清州	361
2. 济宁州	364
二、胶东半岛	365
1. 莱州府	365
2. 登州府	366
三、鲁中地区	367
1. 沂州府	367
2. 青州府	368
3. 济南府	369
四、结语	371

第九章 清代中期北方分府人口

——山西和陕西·····	373
第一节 山西·····	373
一、晋西南区·····	374
1. 解州·····	374
2. 绛州·····	375
3. 蒲州府·····	376
4. 平阳府·····	379
5. 隰州·····	380
二、晋东南区·····	382
三、晋中区·····	383
1. 太原府·····	383
2. 汾州府·····	387
3. 平定州·····	389
4. 辽州·····	389
5. 代州·····	390
四、晋北区·····	391
五、结语·····	392
第二节 陕西·····	393
一、关中地区·····	394
1. 西安府·····	394
2. 同州府·····	399
3. 郿州直隶州·····	401
二、陕南地区·····	403
1. 兴安府·····	403
2. 商州·····	407
3. 汉中府·····	409
三、陕北地区·····	412
1. 绥德州·····	412
2. 榆林府·····	413

3. 延安府	415
四、关中西部地区	417
1. 凤翔府	417
2. 邠州和乾州	420
五、结语	421
第十章 清代中期北方边区人口	423
第一节 甘肃	423
一、西宁府	424
二、兰州府	427
三、宁夏府	429
四、甘州府	430
五、平凉府	431
六、泾州	431
七、其他	431
第二节 新疆	433
一、北疆地区	434
1. 乌鲁木齐	434
2. 吐鲁番和哈密	436
3. 伊犁	437
4. 塔尔巴噶台	439
二、南疆地区	440
1. 哈喇沙尔	440
2. 喀什噶尔、叶尔羌与和阗	440
3. 库车、阿克苏与乌什	444
三、结语	445
第三节 青海、西藏、蒙古和东北	447
一、青海	447
二、西藏	448
三、蒙古	449
1. 内蒙古	449

2. 外蒙古	450
四、东北地区	452
1. 辽宁	452
2. 吉林和黑龙江	454
第十一章 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上)	
——江苏、浙江、安徽和福建	455
第一节 江苏	455
一、战争过程	455
二、战争中的人口损失	458
1. 苏州府	459
2. 松江府	460
3. 太仓直隶州	460
4. 镇江府	461
5. 常州府	461
6. 江宁府	462
7. 扬州府	464
8. 通州和海门厅	465
9. 徐州、淮安和海州	466
10. 小结	467
第二节 浙江	468
一、战争过程	468
二、战争中的人口死亡	470
1. 嘉兴府	471
2. 杭州府	473
3. 湖州府	476
4. 严州府	479
5. 衢州府和金华府	480
6. 处州府	482
7. 绍兴府	484
8. 宁波府	486

9. 台州府	487
10. 温州府	488
11. 小结	489
第三节 安徽	490
一、战争过程	490
二、战争中的人口死亡	491
1. 广德州	492
2. 宁国府	494
3. 池州府	497
4. 太平府	498
5. 徽州府	499
6. 安庆府	501
7. 庐州府	501
8. 颍州府	502
9. 六安州	502
10. 凤阳府	503
11. 泗州、滁州与和州	503
12. 小结	504
第四节 福建	505
第十二章 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下)	
——江西、湖北和湖南	509
第一节 江西	509
一、战争过程	509
二、战争中的人口死亡	510
1. 南昌府	512
2. 九江府	515
3. 南康府	516
4. 瑞州府	518
5. 临江府	519
6. 建昌府	522

7. 袁州府	523
8. 饶州府	525
9. 广信府	526
10. 抚州府	528
11. 吉安府	530
12. 赣州府、南安府和宁都州	532
13. 小结	535
第二节 湖北	536
一、战争过程	536
二、战争中的人口死亡	537
1. 郟阳府	537
2. 襄阳府	537
3. 荆门州	537
4. 荆州府	537
5. 德安府	538
6. 黄州府及其他	538
第三节 湖南	541
一、战争过程	541
二、战争中的人口死亡	542
1. 衡州府	543
2. 郴州	544
3. 桂阳州	545
4. 永州府	546
5. 宝庆府	547
6. 靖州	548
7. 湘西四厅	549
8. 永顺府	549
9. 沅州府和辰州府	549
10. 长沙府	550
11. 常德府和澧州	551
12. 岳州府	551

13. 小结	552
第十三章 西部回民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上)	
——云南和陕西	554
第一节 回民战争对云南人口的影响	554
一、战争过程	554
二、战争和鼠疫对人口的影响	556
1. 滇中区	556
2. 滇西区	561
3. 滇西南区	563
4. 滇东南区	565
5. 滇东北区和滇西区	566
6. 小结	566
第二节 回民战争及大旱灾对陕西人口的影响	568
一、战争及早灾发生过程	568
二、战争和大旱灾对人口的影响	570
1. 西安府	570
2. 同州府	575
3. 邠州	580
4. 兴安府	581
5. 商州	583
6. 汉中府	584
7. 凤翔府	589
8. 邠州和乾州	592
9. 绥德州	594
10. 榆林府	595
11. 延安府	597
12. 小结	599

第十四章 西部回民战争对人口的影响(下)	
——甘肃和新疆·····	602
第一节 甘肃 ·····	602
一、战争过程·····	602
二、战争中的人口死亡·····	603
1. 泾州·····	603
2. 平凉府·····	607
3. 庆阳府·····	617
4. 宁夏府·····	618
5. 巩昌府·····	619
6. 秦州·····	622
7. 阶州·····	623
8. 兰州府·····	624
9. 西宁府·····	629
10. 凉州府·····	632
11. 甘州·····	633
12. 肃州·····	634
13. 安西州·····	634
14. 小结·····	635
第二节 新疆 ·····	636
一、战争过程·····	636
二、战争中的人口损失·····	637
1. 北疆地区·····	637
2. 南疆地区·····	642
3. 小结·····	645
第十五章 光绪大灾对北方人口的影响 ·····	647
第一节 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评述 ·····	648
第二节 山西 ·····	652
一、晋西南区·····	652

1. 解州	652
2. 絳州	654
3. 蒲州府	656
4. 平阳府	659
5. 隰州	662
6. 霍州	663
二、晋东南区	664
1. 泽州府	664
2. 潞安府	665
3. 沁州	666
三、晋中区	667
1. 辽州	667
2. 太原府	668
3. 汾州府	671
4. 平定州	671
5. 忻州	673
6. 保德州	673
7. 宁武府	674
8. 代州	674
四、晋北区	675
五、结语	676
第三节 北方其他地区	678
一、河南	678
1. 豫北地区	678
2. 豫中区	680
3. 豫南地区	685
4. 小结	686
二、直隶和山东	688
第十六章 人口增长、分布与迁移	690
第一节 清代中期至 1953 年的人口增长	690

第二节 人口分布·····	708
第三节 人口迁移·····	720
第十七章 清代中期城市人口·····	723
第一节 资料和方法·····	723
第二节 乾隆时期北方城市人口·····	726
一、华北地区·····	726
1. 山东·····	726
2. 直隶·····	733
3. 山西和河南·····	738
二、西北地区·····	741
1. 陕西·····	741
2. 甘肃·····	745
3. 新疆·····	748
第二节 乾隆时期的南方城市人口·····	748
一、江苏·····	748
1. 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	749
2. 府城和大市镇·····	752
3. 县城及中等市镇·····	754
4. 小市镇·····	755
5. 江苏城市人口推测·····	755
二、浙江·····	757
1. 资料的评价·····	758
2. 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	759
3. 府城·····	759
4. 县城·····	761
5. 市镇·····	761
三、江西·····	762
1. 以广信府为例的讨论·····	762
2. 其他城市·····	766
四、贵州和云南·····	769

第三节 对其他省区城市人口的推算·····	771
第十八章 清代末年城市人口·····	775
第一节 施坚雅研究评析·····	775
第二节 北方城市人口·····	781
一、直隶·····	781
1. 宣化府·····	781
2. 承德府·····	785
3. 永平府·····	786
4. 保定府、正定府和河间府·····	787
5. 其他地区：民国年间的资料·····	789
6. 北京和天津·····	790
7. 小结·····	790
二、山西·····	790
三、陕西、甘肃和新疆·····	793
四、山东与河南·····	797
第三节 东南地区城市人口·····	800
一、江苏·····	800
1. 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	800
2. 府治城市·····	803
3. 县治城市·····	805
二、浙江和安徽·····	808
1. 省会·····	808
2. 府城·····	809
3. 县城·····	810
三、福建和江西·····	812
第四节 湖广城市人口·····	815
一、湖南·····	815
二、湖北·····	820
1. 资料及方法·····	820
2. 府城·····	825

3. 县城	825
第五节 对其他地区城市人口的估测	827
第十九章 清代人口与中国人口体系	831
第一节 “人口爆炸”的讨论	831
一、清代人口数据评析	831
二、“人口爆炸”：内涵和定义	835
三、李中清、王丰的不同表述	837
第二节 “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的讨论	841
一、生存	842
二、死亡	848
三、婚姻	852
四、生育	855
五、体系：家庭与国家	857
第三节 中国人口体系的新构造	861
一、人口过剩：定义和内涵	861
二、区域人口过程	864
1. 清代前期的区域人口	864
2. 清代中期的区域人口	865
3. 清代后期的区域人口	867
4. 商业人口：不同的区域类型	870
三、时间与空间的缠绕与对立	873
1. 生育率与增长率	873
2. 家族人口与区域人口	877
3. 短时间和长时间	881
四、结论	882
主要参考文献	885
索引	904
卷后记	965

表目

表 2-1	明代万历六年“户”、“口”与清代初年“原额人丁”的比较	63
表 2-2	北直隶万历六年分府口数与顺治十八年分府丁数的比较	65
表 3-1	嘉庆十四年和 1953 年江宁府丁口	74
表 3-2	嘉庆十三年和 1953 年扬州府分县人口及其比例	78
表 3-3	乾隆四十年、1933 年和 1953 年通州分县丁口	81
表 3-4	乾隆四十年、嘉庆九年海州的“人丁”与“男丁”	83
表 3-5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江苏分府人口	87
表 3-6	乾隆四十四年、嘉庆十年宁国府分县户口	90
表 3-7	乾隆四十四年、嘉庆十年宁国府修正人口数	92
表 3-8	乾隆、嘉庆年间广德州本州户口	93
表 3-9	乾隆四十一年和 1953 年池州府分县户口	94
表 3-10	1934 年和 1953 年颍州府人口	100
表 3-11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安徽省分府人口	101
表 3-12	乾隆十九年和 1953 年严州府分县户口	104
表 3-13	乾隆四十九年和 1911 年杭州府分县户口	106
表 3-14	乾隆五十六年和 1953 年绍兴府分区户口	107
表 3-15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浙江省分府人口	113
表 4-1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南昌府分县民户口数	115
表 4-2	1782—1821 年南昌府属八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116
表 4-3	明清时期和 1953 年南昌府分县人口比较	116
表 4-4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南康府分县民户口数	119
表 4-5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九江府分县民户口数	120

表 4-6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瑞州府分县民户口数	121
表 4-7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饶州府分县民户口数	122
表 4-8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广信府分县民户口数	122
表 4-9	1391 年、1782 年和 1953 年广信府各县户口 比例	123
表 4-10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袁州府分县民 户口数	125
表 4-11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临江府分县民 户口数	126
表 4-12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吉安府分县民 户口数	127
表 4-13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建昌府分县民 户口数	128
表 4-14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抚州府分县民 户口数	129
表 4-15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南安府分县民 户口数	130
表 4-16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宁都州分县民 户口数	131
表 4-17	乾隆四十七年和 1953 年宁都三县户口比例	131
表 4-18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赣州府分县民 户口数	132
表 4-19	乾隆四十一年和 1953 年赣州各县户口比例	133
表 4-20	乾隆四十一年、道光元年江西分府人口	134
表 4-21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长沙府分县户口	136
表 4-22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衡州府分县户口	139
表 4-23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宝庆府分县户口	141
表 4-24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岳州府户口	143
表 4-25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常德府分县户口	144
表 4-26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澧州分县户口	145
表 4-27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永州府分县户口	146

表 4-28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郴州、桂阳州分县 户口	147
表 4-29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永顺府分县户口	148
表 4-30	乾隆二十五年永顺府属四县分类户口	149
表 4-31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湘西四厅与靖州 分县户口	151
表 4-32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辰州府、沅州府 分县户口	152
表 4-33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湖南 分府人口	153
表 4-34	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湖北分府户口	155
表 4-35	光绪七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黄州府 分县户口	156
表 4-36	光绪十三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德安 府分县户口	161
表 4-37	嘉庆二十五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荆门 州分县户口	163
表 4-38	清代后期和 1953 年宜昌府分县户口	164
表 4-39	光绪六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施南府 分县户口	166
表 4-40	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襄阳府分县户口	167
表 4-41	嘉庆元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郧阳府 分县户口	169
表 4-42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湖北 分府人口	170
表 5-1	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九年和 1953 年福建分府 户口	173
表 5-2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福宁府分县户口	175
表 5-3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福州府分县户口	176
表 5-4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建宁府分县户口	177
表 5-5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邵武府分县户口	180

表 5-6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汀州府分县户口	181
表 5-7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延平府分县户口	183
表 5-8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龙岩州分县户口	184
表 5-9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永春州分县户口	185
表 5-10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兴化府、泉州府分县户口	185
表 5-11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漳州府分县户口	187
表 5-12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福建 分府人口	188
表 5-13	嘉庆二十三年、道光年间和 1953 年广州府 分县户口	193
表 5-14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肇庆府分县丁与 人口	195
表 5-15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潮州府、惠州府的丁 与人口	198
表 5-16	嘉庆二十三年、嘉庆二十四年韶州府丁、口 和 1953 年人口	200
表 5-17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南雄三州、厅的丁 与人口	201
表 5-18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高州府、雷州府、廉州 府的丁与人口	203
表 5-19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琼州府各县丁与 人口	206
表 5-20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广东 分府人口	208
表 5-21	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广西分府人口	209
表 6-1	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云南分府户口	215
表 6-2	乾隆二十五年和道光二十年晋宁州分类户口	216
表 6-3	乾隆至道光年间徽州府的户口变动	218
表 6-4	清代陆良县分类户口的变动	222
表 6-5	清代罗雄州分类户口的变动	223
表 6-6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云南	

分府人口	244
表 6-7 清代中期贵阳府分县户口	246
表 6-8 清代中期贵阳府客民与苗民	249
表 6-9 乾隆至道光年间遵义府的户口变动	252
表 6-10 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遵义府分县人口	253
表 6-11 道光十年思南府分司、分县户口	256
表 6-12 清代中期大定府分县户口	260
表 6-13 嘉庆二十五年兴义府分县户口	262
表 6-14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贵州 分府人口	264
表 7-1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重庆府分县户口	275
表 7-2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泸州、叙永厅分县户口	279
表 7-3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顺庆府分县户口	281
表 7-4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潼川府分县户口	283
表 7-5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资州分县户口	284
表 7-6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保宁府分县户口	286
表 7-7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酉阳州分县户口	288
表 7-8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绥定府、太平厅分县户口	290
表 7-9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夔州府分县户口	292
表 7-10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忠州、石碛厅分县户口	293
表 7-11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绵州分县户口	294
表 7-12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成都府分县户口	296
表 7-13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邛州分县户口	303
表 7-14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龙安府分县户口	304
表 7-15 清代彰明县户口变动	306
表 7-16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眉州分县户口	307
表 7-17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嘉定府分县户口	309
表 7-18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叙州府分县户口	311
表 7-19 清代富顺县户口变动	314
表 7-20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雅州府分县户口	316
表 7-21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宁远府分县户口	317

表 7-22	嘉庆十九年宁远府夷地汉人户口及归流 夷人户口	319
表 7-23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茂州、理番、懋功、 松潘户口	322
表 7-24	乾隆四十一年至 1953 年四川分府人口	324
表 7-25	清代至 1953 年四川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326
表 8-1	乾隆四十六年和 1953 年顺天府分县人口	328
表 8-2	清代至 1953 年顺天府部分州县户口	332
表 8-3	清代至 1953 年顺天府部分州县户口年平均 增长率	333
表 8-4	乾隆三十八年和 1953 年永平府分县户口	334
表 8-5	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分县户口	337
表 8-6	乾隆二十三年张家口厅、独石口厅等地户数	339
表 8-7	乾隆四十七年和道光七年承德府分县户口	340
表 8-8	乾隆十年和 1953 年冀州分县户口	345
表 8-9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直隶 分府人口	349
表 8-10	乾隆五十三年和 1953 年卫辉府分县人口	351
表 8-11	乾隆五十二年 and 1953 年彰德府分县户口	352
表 8-12	乾隆五十二年 and 1953 年怀庆府分县户口	353
表 8-13	乾隆四十年和 1953 年河南府分县户口	355
表 8-14	乾隆六十年和 1953 年汝宁府分县户口	358
表 8-15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河南 省分府人口	360
表 8-16	乾隆五十七年、嘉庆十三年和 1953 年东昌府 分县户口	362
表 8-17	道光二十五年和 1953 年青州府分县户口	368
表 8-18	道光十七年和 1953 年济南府分县户口	369
表 8-19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山东 分府人口	372
表 9-1	洪武二十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和 1953 年解州	

	分县户口	374
表 9-2	洪武二十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和 1953 年解州 分县户口比例	374
表 9-3	洪武二十四年和 1953 年绛州分县户口	376
表 9-4	洪武二十四年和 1953 年蒲州府分县人口	377
表 9-5	明清时期和 1953 年平阳府乡宁等四县户口	379
表 9-6	明清时期和 1953 年平阳府分县户口比例	380
表 9-7	清代至 1953 年隰州本州户口	381
表 9-8	洪武二十四年、乾隆四十六年和 1953 年太原府 分县户口	385
表 9-9	洪武二十四年、乾隆四十六年和 1953 年太原府 分县户口比例	386
表 9-10	乾隆三十四年和 1953 年汾州府分县户口	387
表 9-11	洪武二十四年和 1953 年辽州分县户口	390
表 9-12	光绪六年和 1953 年代州分县户口	390
表 9-13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山西 分府人口	392
表 9-14	乾隆四十三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西安府 分县人口	394
表 9-15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同州府分县人口	399
表 9-16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鄜州分县人口	403
表 9-17	乾隆五十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兴安府 分县户口	404
表 9-18	清代至 1953 年兴安各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404
表 9-19	乾隆七年、道光三年和 1953 年商州分县人口	408
表 9-20	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汉中府分县人口	409
表 9-21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绥德州分县人口	412
表 9-22	清代至 1953 年榆林府分县户口	413
表 9-23	清代至 1953 年榆林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414
表 9-24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延安府分县人口	416
表 9-25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凤翔府分县人口	417

表 9-26	嘉庆二十二年扶风县分区户口	418
表 9-27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邠州、乾州人口	420
表 9-28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陕西 分府、州人口	421
表 10-1	咸丰三年西宁府分县户口	424
表 10-2	道光十年和 1953 年兰州府分县户口	428
表 10-3	清代皋兰县户口变动	429
表 10-4	乾隆四十一年宁夏府分县户口	430
表 10-5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甘肃 分府人口	432
表 10-6	乾隆四十二年、嘉庆十一年乌鲁木齐分县 (地方)人口	434
表 10-7	乾隆四十一年伊犁地区户口	438
表 10-8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新疆 分区人口	445
表 10-9	清代前期奉天、锦州两府人丁的增长	453
表 11-1	1910 年、1933 年和 1953 年江苏分府人口	459
表 11-2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江苏省分府人口的变动	467
表 11-3	1910 年、1932 年和 1953 年浙江分府人口	470
表 11-4	道光十八年、同治十二年 and 1953 年嘉兴府 分县户口	471
表 11-5	同治、光绪年间和 1953 年处州府分县户口	482
表 11-6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浙江分府人口的变动	489
表 11-7	1904 年、1910 年、1934 年和 1953 年安徽分府 户口	492
表 11-8	1850 年至 1953 年广德本州人口的变动	493
表 11-9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安徽分府、州人口的变动	504
表 11-10	1820 年、1910 年和 1937 年福建分府人口	506
表 11-11	1851 年、1865 年、1910 年和 1953 年福建 分府人口的变动	507
表 12-1	1910 年至 1953 年江西分府人口	511

表 12-2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南昌府分县人口	513
表 12-3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九江府分县人口	516
表 12-4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南康府分县人口	517
表 12-5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临江府分县人口	521
表 12-6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建昌府分县人口	522
表 12-7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袁州府分县人口	524
表 12-8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饶州府分县人口	526
表 12-9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广信府分县人口	527
表 12-10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抚州府分县人口	529
表 12-11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吉安府分县人口	531
表 12-12	清代后期至 1953 年赣南三府、州分县人口	533
表 12-13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至 1953 年江西分府 人口	535
表 12-14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湖北分府人口的变动	540
表 12-15	1910 年、1933 年和 1953 年湖南分府人口	542
表 12-16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湖南分府人口的变动	552
表 12-17	太平天国战争中江苏等七省的人口损失	553
表 13-1	回民战争前后云南分府人口	567
表 13-2	回民战争及光绪大灾前后陕西分府、州人口	599
表 14-1	回民战争前后甘肃分府人口的变动	635
表 14-2	同治战乱前后及 1953 年新疆各地人口	646
表 15-1	光绪初年北方大旱灾死亡人数的原始估计	649
表 15-2	光绪大灾前后山西分府人口	676
表 15-3	光绪大灾前后河南分府人口	686
表 16-1	清代中期至 1953 年各省分府人口	691
表 16-2	清代中期至 1953 年中国分省人口	703
表 16-3	1776 年至 1953 年分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707
表 16-4	1776 年至 1953 年中国十八省分府人口密度	708
表 17-1	乾隆后期山东城市的不同级别与人口的关系	732
表 17-2	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府、县治城市丁口	733
表 17-3	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山西、河南三省城市人口	

	估测	741
表 17-4	乾隆四十一年陕西、甘肃城市人口估测	748
表 17-5	乾隆年间江苏分府城市人口	757
表 17-6	乾隆年间浙江城市人口估测	762
表 17-7	乾隆年间广信府各城市户与乡村户	763
表 17-8	清代中期贵州、云南城市人口估测	771
表 18-1	清代直隶西宁县、保安州城乡人口的变化	782
表 18-2	宣统二年承德城市分籍户口	785
表 18-3	猗氏县光绪三年、光绪六年县城户口	791
表 18-4	光绪九年孝义厅城的人口构成	794
表 18-5	宣统元年南通城市的人口构成	804
表 18-6	汝城县嘉庆二十一年分乡户口与 1929 年 分区户口	817
表 18-7	清末和民国湖南城市等级与人口	819
表 18-8	1909 年至 1911 年湖北各县户口及县城户口	820
表 18-9	乾隆四十一年和光绪十九年分省城市人口	828
表 19-1	公元 2 年至 2000 年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动	831
表 19-2	1982 年十一省市 55 岁至 59 岁组妇女终身 活产及存活子女状况	874
表 19-3	1982 年十一省市 60 岁至 64 岁组妇女终身 活产及存活子女状况	874

图目

图 19-1	中国人口的数量增长	833
图 19-2	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	835
图 19-3	1700 年至 2050 年中国的人口膨胀(李中清、 王丰绘制)	837
图 19-4	清代湘赣地区若干家族人口增长率的变动	878
图 19-5	清代浙江各类地形区家族人口增长率的变动	880
图 19-6	1949 年至 1987 年中国人口的变动	88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

一、何炳棣的研究成果

20 世纪上半叶,虽然我国的人口学家王士达、陈长蘅等人以及历史学家罗尔纲等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但从总体上说,有关清代人口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仍属何炳棣 1959 年出版的《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①。

何炳棣的有关研究,构成本卷研究的基础。

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中,笔者详细讨论了何炳棣在这本著作中对于明代人口研究的贡献。笔者尤其推崇何炳棣对于“丁”的出色研究,他使我们从制度上把握了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册载“人口”数据的实质,也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讨论明代乃至清代的人口。

关于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如姜涛就曾引用王士达的著述,指出早在 18 世纪中叶,法国来华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 J. M. Amiot)就说过,所谓“人丁”的记载,实际上只是指“纳税人”。一个世纪后,苏格兰长老会教士罗约翰(J. Ross)则指出:中国的“丁”没有人口统计上的价值,只有财政上的功用。1899 年,英国外交官庄延龄(E. H. Parker)明确地把“人丁”解释为“纳税单

^① 何炳棣《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位”。罗尔纲也持相同的看法。可见何炳棣并不是揭示这一秘密的第一人^①。

实际上,罗尔纲并未提出或重申“纳税单位”的概念。18世纪至19世纪外国传教士虽然指出过“丁”的实质,但并未从制度发展的层面加以理解。类似的认识,在中国的史籍中也不乏记载。例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丰顺县志》卷3就这样说:

向例志户口者,即以编征丁口载入。查此项丁口,即归地亩均摊,事属田赋;且编征丁银,原非户口实数,应以烟册编之数为准。

但我们并不能将《丰顺县志》的作者葛曙作为揭示“丁”的实质的第一人。钱德明、罗约翰、庄延龄和葛曙等人都已是历史人物,他们对“丁”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人对当时制度的理解。这些理解无疑具有真知灼见,但并非系统的和科学的。我在本书第四卷《明时期》的第一章《绪论》和第六章《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中指出,何炳棣是从明初制度入手,全面系统地解决了这一影响明清两代人口史上关键问题的第一人。

何炳棣从明初制度入手,全面、系统地破解了“丁”的秘密。“丁”是一种纳税单位,与人口无关。

以这一认识为基础,何炳棣展开对清代人口的全面论述。具体地说,何炳棣在其代表作第二章《丁的实质》中,以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及乾隆四十四年的人口数为基数,并设定此年以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略高,从而推算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或稍后的人口数:大致在康熙三十九年或稍后,中国人口达到了1.5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达到了3.1亿,道光三十年达到了4.3亿。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但就全国而言,基本的人口土地关系依然故我,变化很小。由于19世纪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尽管平均增长率是相当的低,到1953年中国人口还是达到了5.8亿。

何著的第三章题为《1741—1775年的人口数据》。在这一章

^①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中,何炳棣指出,“摊丁入亩”完成以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丁口编审被废止了。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皇帝才认为有必要建立人口普查制度,并着户部办理。然而,大臣和一部分省级官员对人口普查却没有兴趣,而是将登记全部人口的任务完全交给保甲机构了。这样,新制度变成一种非直接的登记,完全建立在地方政府那些不支薪俸的保甲申报的基础上。乾隆六年至四十年期间保甲制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地方秩序,而在完成人口登记的作用方面,各省是很不一致的。由于存在大量的人口漏报,且这一事实被揭露后,皇帝才决定对全国的保甲户口登记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所以,乾隆六年至四十年期间的人口统计数字尽管在理论上代表了全部人口,但实际上全国人口申报肯定不足。

在接下来的第四章《1776—1850年的人口数据》中,何炳棣指出,在乾隆四十年冬天,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将户口登记列为保甲系统的一项重要职能。保甲户口登记的技术也在稳步改进。各省督抚被反复警告户口申报不实会带来的后果。从户口比、性别比和年龄结构等方面进行考察,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间的中国人口调查大体是准确的。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地区间千差万别,一些地区仍存在人口漏报或浮夸。

在第五章《1851—1953年的人口数据》中,何炳棣指出,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保甲户口登记的对象和范畴已经改变。省级人口数据更加混乱,如湖北在咸丰二年至七年未能上报户口数,咸丰八年以后的人口总数无疑是以粗略的估计为基础的,或者完全出于臆造。又如江西省,太平天国时期有几个府的人口严重下降,但在咸丰元年以后的40年间都上报一个相当稳定的人口数。再如江苏、浙江等省,太平天国战争后的人口漏报都是非常明显的。

何炳棣的上述论述是非常精辟和深刻的。如果不考虑户口数据,而仅仅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何炳棣的上述观点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上,何炳棣的出色研究,奠定了本卷论述的基础。也就是说,本卷所作研究的主要方面,大都是在何炳棣著作基础上进行的。

何炳棣的主要贡献在于制度史方面。

二、其他学者的研究

在何炳棣这一堪称经典的著作问世以后,有关讨论随之展开。只是关于“丁”的性质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没有疑义地接受了何的观点:“丁”是一种纳税单位而与人口无关。

何炳棣的著作传入中国大陆,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何炳棣的著作传入之前,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将“丁”当作“人口”或将“丁”折算成人口。直到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些专门的人口史著作中,也常出现类似的错误。由于迄今还没有学者对何炳棣有关“丁”的观点提出有效的质疑,所以,笔者将所有对“丁”的非何氏理解,都视作一种学术上的失误。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讲,所有这些作者,如果不是没有读懂何氏的论述,就是对前人成果过于掉以轻心。

西方学者对上述1776年至1850年人口资料的价值颇有争论。珀金斯(Perkins, Dwight H.)在他的书中讨论了几位美国学者对何炳棣观点的批评。艾琳·托伊伯(Tafuber, Irene B.)和王乃纪认为这一时期的人口资料不可靠,因为他们发现这一时期的省级资料中存在人为的规律性和难以置信的无规律性。但是,约翰·艾尔德(Aird, John S.)指出,托伊伯和王乃纪无法清楚地提出一个所出现的人为规律性的标准;在叙述所发现的规律性上不准确和不明白,所以他们对于何炳棣的批评并不能成立。只是,艾尔德本人也没有对这一时期资料的一般可能性或误差的界限作出明确的结论^①。珀金斯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将1850年以前时期(包括明朝)的国内人口迁徙和战争的情况同1776—1850年的人口数据相核对;第二,仔细考察1850—1953年的人口发展。其结论是,19世纪初期的人口总数确是大致反映了那个时期各省的真实人口总数。这个结论的主要例外是广东,可能还有四川。对这些有大量迁徙人口流入的省份,这些移民流入的时间在人

^① [美]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年》,伍丹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66页。

口资料上反映得很不清楚,在 1776—1850 年这个时期内也是如此。

在这部著作中,珀金斯并没有披露他的研究过程,读者无从就具体的问题与之展开讨论。从他分析的思路来看,已较何炳棣的分析有了进步。珀金斯采用逐省分析的方法,将自明代初年至 1953 年的人口数作全面分析,且将对人口影响较大的人口迁徙和战争情况与人口数字的变动进行对照。遗憾的是,珀金斯的著作不是一部专门的人口史著作,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他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

以四川人口为例,尽管何炳棣和珀金斯都意识到该省一系列人口数据中存在问题,但都没有对这一系列数据加以认真的分析。施坚雅(Skinner, G. William)《19 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中得出的教训》^①一文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分析方法。他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四川通省民数册》所载四川各县的历年人口数据共 1368 个数据进行认真的核对,发现了大量的差错。如在所有的 1368 个数据中,共有 112 个数据没有被汇总;许多数字被颠倒,或多添了一位数,或遗漏了一位数,有的甚至抄错了数字。尤其惊人的是 1887 年绵州的人口记录,由于不知在什么地方置换了一位数字,结果人口增加了 10 倍。是年该州户数为 68394,人口却高达 6629533,出现了至少 600 万人以上的误差。

除了统计上的误差以外,四川人口数据中还存在明显的人工编造的痕迹。将 1822 年四川的人口数据与 20 世纪的人口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1822 年的人口数据要比 1887 年合理得多,1808 年或 1812 年数据很可能是一系列数据的起点。施坚雅认定嘉庆《四川通志》中的人口数据可能就是 1812 年的人口数。他从人口密度、家庭规模、性别比等方面对 1812 年的人口数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结果表明,尽管这一年的数据中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一年的数据本身不是伪造的。一切都表明嘉庆中期四川省的人口统计是相当认真的。

珀金斯对清代中国人口数的讨论较何炳棣有进步,但仍嫌粗疏。

施坚雅对清代四川户口数据的考订堪称经典。

^① 载于〔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2~301 页。

施坚雅这一以县级数据为基础的分析显然比何炳棣的研究要细致得多、可靠得多。从方法论上讲,施氏的这一研究通过人口密度、人口增长、家庭规模、性别比等四方面对人口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并据此成功地鉴定了数据的真伪。这一研究为其他的类似研究提供了范例。

在此基础上,施坚雅对清朝的四川人口进行了推测,这一推测以1673年为起点,每隔20年得出一个人口数。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系列数据的提出是高度概括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相当专断的。另外,施坚雅将四川的例子推广到全国,认为有“理由相信在很多省也存在类似四川这种夸大统计数字的情况”。因此,他将19世纪的中国人口数从4.3亿修正到3.8亿。

很显然,施坚雅在取得一项成功的同时,却又忽略了另一种情况,即19世纪中期在一些省的人口统计中存在低估,甚至是严重的低估。笼统地断言大部分的省份存在着四川式的人口高估是缺乏依据的。施坚雅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清代各个时期人口数据的重建,应该建立在区域人口的研究基础上。遗憾的是,施坚雅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他将四川的经验作为普遍的真理进行推广,从而得出不正确的全国人口数。

1993年,姜涛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人口史》。这是近些年来中国学界有关清代人口历史最有分量的著作。这本著作以清代初年作为近代人口的研究起点,主要阐明了以下几点事实。

其一,乾隆四十一年的人口数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是各省认真清理人口的结果。虽然像1775年这样全国规模的人口清查,直到1851年没再举行过。但清朝政府通过完善和加强保甲制度来维持经常性的人口统计。因此,在这一期间,对人口的统计和管理还是相当严密的。

其二,太平天国以后的人口统计失实,并不在于何炳棣所称之保甲人口登记的短缺,而在于有关省份的数据,根本就没有建立在州县人口的清查和册报的基础上。如江苏(苏州)布政使所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就一直未将所属人口数上报。

姜涛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三,《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质量不高,除时点差异和统计口径的差异外,各省原载人口总额往往与按府州厅的合计数不符。有些地区的数据存在很大的错误。姜涛根据乾隆《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和有关府志,尽可能地有关数据作了校正处理。

其四,姜涛还对清代户部历年的《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他用很大的篇幅,列出历年各省民数,并将缺报的府、州、厅、县,在附注中说明。这一工作是如此重要,使得所有的清代人口史的研究者都有可能轻易地利用户部《清册》人口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反映实在的人口数。

姜涛的第一点贡献在于他对于各省数据的整理和讨论。这一工作加强了对何炳棣观点的进一步论证。姜涛的第二点贡献相当重要,它澄清了长久以来历史学界的错误,包括笔者在1993年一部著作中由于轻信战后江苏省的人口数而造成的错误^①。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么多。以此为基点,我们对清末及民国以来中国人口的认识就比以前要明晰得多。第三点的贡献给我们的启示是:省级人口的准确与否实有赖于府级数据是否准确。这为本卷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姜涛对户部历年民数《清册》的整理,也给后人带来了许多便利,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1995年,王育民在他的遗著《中国人口史》^②中,对清代的人口问题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在本书第四卷的《绪论》中,我曾详述了王育民对“丁”的研究。此外,王育民在其著作中还对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问题做过探讨。他尽力搜集苏、浙、皖三省有关县份的战前、战后人口数,以所得资料作为样本,归纳出各区人口死亡的百分比,求出各区战后人口的死亡数。这一做法,避免了使用战后户部清册中不实的人口数,使结论接近于真实。

在区域人口史的研究中,除了上述施坚雅的著作外,韩光辉所

韩光辉的著作
证明历史城市人
口可以作精确的
定量研究。

①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第八章《清后期、民国时期的移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著《北京历史人口地理》^①也是一部上乘的作品。他对于明清时期北京城市人口研究,堪称为城市人口史的典范之作。该著作体现的学术水平,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何炳棣研究成果及方法上的超越:区域性的户口调查制度有其特殊性,城市人口可以作精确的定量研究。

全汉昇、王业键认为,清代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还与当时的国际贸易有关。

我国台湾学者对明清人口历史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人口增长原因的解释方面,其中以全汉昇、王业键有关清代人口的研究最值得注意。众所周知,全汉昇、王业键长期以来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著作颇丰,成就斐然。1961年,在《清代人口的变动》^②一文中,他们认为乾隆时期可信的人口数据始于乾隆二十二年。然而提供的证据不足,不足以推翻何炳棣的观点。对于清代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以为除了与农业的发展、新作物的传播和种植有关外,还与中国当时的国际贸易密切相关。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清代人口的变化,无疑是有益的。

第二节 方法和思路

一、研究方法

在本书第四卷《明时期》第一章《绪论》中,我曾经花费相当大的篇幅对第四卷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界定,本书第四卷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完全适用于本卷。概括地说,何炳棣自认为自己的著作基本上还是一篇制度史和经济史的论文,费正清则对何著采用的方法深表赞赏,他认为何炳棣毫不含糊地回避了定量分析,是因为中国的明清时代并不具备为这一目的需要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政府统计报告这类现代或接近现代的统计数。在何炳棣和费正清看来,何著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人口历史学(population history)的,

①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全汉昇、王业键《清代人口的变动》,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本。

而不是历史人口学(historical demography)的。尽管明清时期缺乏人口普查数据和政府统计报告这类现代或接近现代的人口统计数据,但是近几十年来,历史人口学家仍未放弃对明清时期的人口进行统计分析的努力。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①(二册)就是这样一部气势恢宏的著作。它利用了50种族谱中近20万个人口数据对明清时期中国人口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人口学研究,构成明清历史人口学研究的里程碑。李中清等人对清代皇族人口及某些特定地区的历史人口所作的研究也体现了历史人口学家在利用谱牒、档案资料等方面进行的成功尝试^②。本卷的研究基本回避了历史人口学的研究,而是将清代人口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定在把握历代人口调查及统计制度的基础上,重建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人口,并将人口数量的变动、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行相互比较,在寻找人口数量及人口生活状况变化的原因的同时,也寻找关于社会变化的新解释。在我看来,人口史既不是制度史,也不是经济史,而是具有独立的理论意义的人口史。人口调查制度和统计制度仅仅是人口数量重建的第一步。人口数量变动的时空结构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而这一点,恰恰是前人的著作中所欠缺的。

本卷回避了历史人口学的研究。

人口史既不是制度史,也不是经济史,而是具有独立的理论意义的人口史。

二、研究思路

1. 关于“丁”的实质

有相当多的国内学者在未对何炳棣的研究进行质疑的情况下,或将“丁”视作男性人口,或将“丁”视作可以依据一定比例折算的人口单位。对于数量相当多的此类著作,本卷不再一一述评。这些研究者的方法虽然是错误的,但却让我思考另一个问题,何炳棣的观点不易为他们所接受,是否说明何的工作本身还存在缺陷?仔细研读何著,发现何所依据的资料大都是略嫌零碎的县级数据,对于有关“食盐课”之类与户口统计有关的问题,讨论也不够深入。

^①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

^② 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因此,本卷在第二章,利用省级资料对清朝前期的“丁”进行再讨论。其结果是从一个更大的角度,证明了何炳棣的观点。笔者也希望“丁”——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不再困扰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者。

第二章也对清代初年的战争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讨论,重点则在估计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清代的人口发展,是在清代前期清兵南下以及“三藩之乱”结束后才开始的。

2. 重建清代中期各省府级人口

除了施坚雅有关四川省户口数据的研究外,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未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省级以下户口数据的讨论上。我们在重建省级人口数据的时候,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省级数据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省级户口数据是由府级户口数据构成的,那么,府级户口数据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施坚雅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给人们以启示,只有逐县逐府地重建户口数据,才有可能重建省级的户口数,只有科学地重建省级的户口数,才有可能重建全国的户口数。

因此,笔者的工作首先是:以县为基础,以府为单位,重建各省的分府人口数。在分府数据的基础上,重建各省省级人口,进而重建全国人口。由于资料的缺乏,笔者不可能重建所有年份或所有年号的人口数。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确定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个年份,重建清代中期的各省分府人口。

诚如何炳棣所言,虽然说乾隆四十一年数据从理论上讲已经包括了全部的人口,但在大多数地区却都是低估的。由于官修史书并没有乾隆年间县级和府级户口数据的记载,因此,搜集零星的此类数据就成为一件相当吃力的工作。我和我指导的研究生们在大约3000种地方志(每县至少2种)或其他资料中搜集清代各个年份的县级或府级户口数,所获不菲。在县级和府级数据资料的相互比勘中,逐渐建立起乾隆四十一年各省府级人口数。在此基础上,重建全国的人口数。

嘉庆《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嘉庆一统志》)记载了嘉庆二十五年各省的分府户口。在本项研究开始时,我欲以这一年份的数

《嘉庆一统志》
中的错误由三方
面构成。

据为基点,讨论其前或其后年份的人口数据。然而,这一系列为学者广泛使用的户口数据,错讹甚多。不经精心整理而贸然使用,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大致说来,《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错误大致由三个方面构成。

——内容缺失所造成的错误。将构成一个府的各县户口进行比较后经常会发现,府级数据有时并不是属县户口数据的加总,而存在某个或某几个县级数据的缺失;或者大部分县的数据是合理的,个别县的数据存在明显错误,致使府级数据出现错误。对县级户口数据的修正实际上也就是对府级数据的修正。还有,忽视女性人口的现象并不少见。一般说来,《嘉庆一统志》所载口数是包括男女大小的。但是在有些府,其口数往往只有实际口数的半数左右。据此推测,这些区域的人口并不是全体人口,而只是全体人口的一部分。

——胥吏编造户口而形成的错误。此类错误虽以四川最为典型,但不仅仅限于四川。在有些地区,胥吏们编造户口数据时任意夸大;在有些地区,则任意缩小。事实上,编造户口的胥吏并没有明确的夸大或缩小数据的意愿。他们编造户口数据的手法,是每一次都在原有的户口数据上加上一个很大的或很小的几乎不变的值。在加上一个大数值的地区,形成人口的夸大;而在加上一个小数值的地区,则形成人口的低估。

——毫无道理且毫无规律可循的错误。在将这一类数据与前后数据,尤其是与1953年数据进行比较以后,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如果一个地区的口数多于1953年人口,且这一区域在嘉庆二十五年以后并未经过大的自然灾害、瘟疫或战争,就可以判断这一数据是错误的。相反,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当一个区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时,我们也就怀疑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是不真实的,存在低估。

对这些错误的修正构成本卷重要的内容。这一修正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其一,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地区如果没有遭受大的自然灾害、瘟疫、战争或其他特殊的生态变动,这个区域的人口应是增长的,哪怕是缓慢的增长;其二,在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中,相邻区域的人口增长水平是大体一致的,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里,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其三,一般说来,除非区域间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差异太大,否则各区域人口的性别结构、家庭规模是相似的。这里所指的区域主要以府、县为单位。

依据这三个原则,我们很容易地检验出一个户口数据的真或伪。在确定一个数据为可靠数据的前提下,根据已获部分县级数据,求得乾隆至嘉庆年间或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并将此增长率应用于府级单位,就可以求得乾隆四十一年及嘉庆二十五年以后的府级人口。本卷的第三章至第十章,进行的的就是此类分府人口的重建工作。

3. 清代后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

从1851年开始至1864年结束的太平天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时最长、涉及区域最广、表现最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既包括人民起义,也包括清军镇压。为了行文的方便,将其统称之为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因此,讨论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意味着对清代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数进行细致的讨论。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笔者对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太平天国战争后又发生过规模性移民的地区,进行过人口死亡数的估测,讨论范围涉及江苏、安徽和浙江的一部分。本卷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将纳入原有的这部分研究成果,并展开对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及浙江其他地区的人口损失的讨论。

太平天国战争发生后不久,云南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领导的回民起义。这场战争虽然局限于云南一省,却历时长久,从咸丰六年(1856年)开始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结束,时间长达16年。战争过程中,屠杀与鼠疫同时发生,造成云南人口的重大损失。同治年间,陕西回民与汉人相互屠杀,引起清兵对回民的镇压和回民的反镇压,由此而形成西北地区近代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并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本卷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讨论西部回民战争对于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四地人口的影响。

同治年间西南和西北的战争刚刚结束,光绪三年及以后数年,连续几年的干旱不雨,使北中国陷入一场超大规模的灾荒与饥馑

当中。这场灾害波及山西、河南、直隶和陕西。大批得不到赈济的人群死于饥饿。和明代末年的大灾所不同的是,清政府仍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局势,大灾并未导致大的社会动乱。估计这场大灾对中国北方人口的影响,是本卷第十五章的内容。

根据战争及灾荒发生的进程,对于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及光绪大灾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各章设定不同的标准时点进行讨论,如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治五年(1866年)以及光绪六年(1880年)等年份即是。在第十六章,则统一于咸丰元年、光绪六年这两个标准年份。因为,从咸丰元年开始至光绪六年结束,遍及全国的社会动乱长达30年。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再至咸丰元年,中国人口的增长虽然是缓慢的,但因和平时间长达75年,人口的累积也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即使以4‰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期末人口也是期初人口的1.4倍。咸丰、同治以及光绪初年的社会动乱、瘟疫与饥谨,使中国人口的增长趋势得到了悲剧性的“马尔萨斯式的遏制”。本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描述的就是这一过程。

4. 重建清代末年的各省府级人口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宣统二年(1910年)的户数,绝大多数是以府为单位的。从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府级政区的变化甚小,不多的新县设置,大多数是在原有的府级政区中进行的。另外,本卷还将1953年县级数据按照清代的府级政区进行组合,以达到政区比较的前后一致。然而,1911年至1953年新县设置较多,其中不少新县跨越府级政区。本卷解决的办法是,如果A县析自B县和C县,B县和C县又分属于B府和C府,则将1953年A县人口各50%分别计入B府和C府。余此类推。这一处理结果尽管与实际之间还存在误差,却已是可以接受的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根据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分府人口数所反映的各地不同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推出以后一定时期内不同年份的人口数。在经历了大的战争、饥荒和瘟疫破坏的地区,这一方法则是不适用的。因此,本书在讨论太平天国战争、西南及西北地区的回民战争及光绪大旱灾对各地区人口影响的同

时,分别讨论各地区宣统二年(1910年)的分府人口。在这一分析中,我将专门讨论宣统二年民政部户口调查数,并将其与1953年的分府人口进行对照,以期建立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咸丰元年、光绪六年、宣统二年及1953年全国分府人口的完整系列。

我希望本卷对于每一时期的户口数据的讨论,都有扎实的分县数据作为基础。然而,这只是一个愿望,现有的资料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就宣统年间的户口数据而言,目前仅见宣统二年的分府户数,除四川、云南、新疆三省外,分府口数已经不存。根据户数推测口数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难,但是,将宣统二年分府人口与此前此后的数据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宣统二年数据存在太多的问题,难以让人不加修正地加以利用。在不少省区,所谓的宣统人口调查,仅仅是衙门中的胥吏在前代的户口数据上,增加或减少了一个他们认为适当的数字而已。内容详细、口气严厉的人口普查条例,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所以,在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中,在讨论战争、瘟疫及饥荒对各地人口影响的同时,我还对宣统二年的数据进行全面整理。第十六章列出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咸丰元年、光绪六年、宣统二年及1953年分府、分地区人口,还计算各府、各地区人口密度。至此,完成清代人口数据的全面整理。这一系列的分府、分地区数据,可以和本书第四卷《明时期》中有关洪武二十四年的分府人口进行对比,在许多地区,从明代至清代,府的范围是相对稳定的,少有变动。

按照本书总的设计,每一卷的内容中,都应叙述人口的分布和迁移。本卷第十六章讨论的人口分布,本应将各个时点的分府人口密度标识在地图上,再将相同或相近的人口密度联成一个更为广阔的区域。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这一结果尚不能用地图的形式展示。人口迁移是人口史的重要内容。只是依本书的体例,有关移民史的内容,因有专门的著作出版,不再成为本卷的重点。第十六章仅仅对清代移民的大势,作一简要的概述。

5. 重建清代中期和清代末年的城市人口

施坚雅对中国市场网络和城市人口的研究成果,构成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以四川地方市场网络形成的中国市场网络模

型,超出本卷的论述范围,不予置评。施氏关于19世纪中国城市人口的理论模式,与本卷内容有关,特辟出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加以专门的讨论。

施坚雅的这一研究在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施氏构建其理论的城市人口资料从未予以披露,使得他的工作无法复原,也无法检验。施氏所用城市人口资料的真实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其二,施氏所采用的城市人口数量等级,源于西方城市地理学家对西方城市的数量归纳。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人口的分析,存在一个适用与否的问题。规范的做法是,研究者必须应用中国的资料对西方学者所用模型进行证实、证伪和修正,而施坚雅却从未进行这一必要的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施氏的工作只有假设的意义。

一定的城市等级,包括行政等级和商业等级,总是与一定数量的人口规模相对应。在本卷的研究中,根据搜集到的各种城市人口数据,找出城市等级与城市人口之间的对应关系,建立一个区域的城市人口模型。再将这类模型推广至其他地区,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或多个(区域性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根据这个或这类模型,可以推算出没有文献记载的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从而推得全国城市人口的总数据。严格地说,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建立,是为了有效地进行城市人口的估算,而不是其他。

施坚雅研究的另一个缺陷是,在进行19世纪或18世纪的城市人口比重的分析时,他所依据的区域人口数是存有严重问题的。如上所述,本卷第三章至第十五章中的所有论述,都是为重建18世纪至19世纪区域人口而作。从这一点上说,本卷有关城市人口的研究基础,要比施氏扎实得多。所得结论,理应比施氏更为翔实和可信。

按照全书的体例,除了人口的城乡结构以外,本卷还应讨论清代人口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和职业结构。囿于资料和学力,本卷未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读者可以阅读有关的著作^①。

^①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 问题和讨论

第十九章《清代人口与中国人口体系》是本卷的结论。这一章中,笔者以清代人口数据为重点,讨论公元2年至1953年中国人口变动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人口过剩”和“人口爆炸”的概念、清代人口在中国人口史中的地位、中国人口增长的制约因素等等。李中清、王丰最近发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一书^①,对马尔萨斯理论进行了颠覆性的批评。本章围绕有关基本问题的讨论,表达了与李中清、王丰不同的看法。我希望这一讨论对于理解中国人口及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有所裨益。

在本书第四卷《明时期》中,我把明代人口变动的解释置于“动物人”与“社会人”的概念之下。在本卷中,我根据清代的人口资料,对这一组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建立内容更为丰富的概念体系,并借此建构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这是一个工作量很大的工作,本章仅仅是提出一个试验性的假说。

我还想说明的是,本卷的叙述与第四卷《明时期》的论述相同,对于文献记载的“口”,我仍用“口”来称呼,其内容可能与现代的“人口”相同,也可能不同。而对自己的判断,则用“人口”一词称之,其内容即为现代的“人口”。

在本书第四卷对洪武时期各府人口进行估算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人口低估,并且,性别比例的失衡往往与户均口数的不合理相联系。在本卷中,同样的问题虽然存在,但处理的难度却要大得多。因为,清代中期的户口数的浮夸与低估都同样存在,性别比的失衡,有可能因男性数据的浮夸而造成。如果因性别比失调而增加女性口数,将导致更大的误差出现。另外,本卷虽然对《嘉庆一统志》中的分府数据进行修正,但对调整幅度不大的府级口数尽量不予修正,保持原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府级数据中,本卷不对因性别比失衡造成的错误进行修正,这也是理由之一。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陈卫、姚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

第二章 清代人口的起点：人口与人丁

17世纪的人口锐减并未因明代末年的战争、旱灾和鼠疫流行的结束而终止。清兵入关以后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三藩之乱”，中国境内的战争少有停息，某些区域的人口持续地减少。本章对清代初年的战争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讨论，重点则在估计战争对人口的影响。

何炳棣对清代前期“丁”的研究，所用资料大都为零星的县级数据。本章以省级数据为基础加以进一步的研究，证明除了个别地区外，清代前期的“丁”是纳税单位，与人口无关。40多年前何炳棣所作研究是正确的。

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中，我对明代末年人口的锐减作了详尽的分析和估算。明代末年，在战争、灾荒和瘟疫的三重打击下，中国人口大约减少了4000万，中国人口大约尚存15250万，清代的人口变迁，便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

明代末年的战争、灾荒和瘟疫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南直隶的安徽、苏南、浙北、湖广北部和四川，即包括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清兵入关，并不意味着社会动乱的结束，却标志着新一轮社会动乱的展开。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自北京退出后即丧失与清军作战的能力，攻占北京前那支英勇剽悍的农民军似乎变得不堪一击。大顺军与清军的对抗，实际已变成大顺军的逃亡和清军的追击。北方地区虽受干扰，却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北中国已经残破不堪了。清兵南下过程

中遇到的对手也不是南明的军队,南明军人派系林立,相互掣肘,也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因此,就全国抗清形势而言,清兵入关与南下过程中遭遇到的抵抗,很难与明代末年的战争相比,最有力量的抵抗发生在若干城市当中。清兵入关以后的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是据点式的,而不是全局性的。

第一节 清兵南下对南方人口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已经足够清晰地描绘出清兵南下的整个过程。兹据萧一山、司徒琳(Lynn A. Struve)及顾诚三位的大作^①,叙述如下。

一、围城和屠城

1. “扬州十日”

从北方南下直至扬州,清兵一路未遇上真正有力的抵抗,于是扬州成为南明弘光政府组织抵抗的第一个据点。围城之役进行得十分顺利,清军用大炮轰击扬州城墙,次日城破,清兵涌入。扬州是江南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市,清兵欲杀一儆百,下令屠城,屠杀持续了十天以上。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撰成《扬州十日记》,书中称:

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余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雷电,辟卜声轰耳不绝。又隐隐闻击楚声,哀顾断续,惨不可状。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注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碧水赭,化为五色,塘为

“扬州十日”,
被屠者达 80 余
万。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影印。
〔美〕司徒琳《南明史》,李荣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之乎。

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枪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

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扬州屠城？萧一山分析道：“人民之遭兵者，兵民莫辨，凡十日间，查《焚尸簿》所载，已有八十余万之多。其被掳与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①如此算来，可能有百万之众。顾诚则认为这一数目有可能夸大，当时扬州城内未必有这么居民^②。可是，萧一山引扬州守将史可法城陷后被俘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为佐证：

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即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

扬州人口可能多达百万。《明季南略》卷3称：“扬州烟燹四十八万，至是遂空。”指的是城市常住人口，不应包括守城的军人及其家属，以及逃难入城的人口。看来，根据《焚尸簿》记载得出的80万死亡人口的结论是大体可信的。

在许多地方，老百姓有避难入城的习惯。

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中，扬州城曾因其城墙高大而得以保全。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乡村居民总想凭藉城墙获得庇护。有记载称：“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渚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③然而，以往的经验这次却行不通了，清兵凭借红衣大炮很快攻破城墙。入城的乡民多死于屠城。在本书第四卷中笔者曾经指出，在明代末年的战争中，河南地区的百姓也总是迁入城中避难，结果酿成了开封城数十万人口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0页。

② 顾诚《南明史》，第186页。

③ 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2页。

死亡的大惨剧,也酿成华北,尤其是河南地区许多类似的屠城惨案。

2. “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

嘉定、苏州、昆山、江阴、嘉兴、金华、泾县均有屠城记载。

清兵攻克扬州城后,很快下南京,克杭州,望风披靡。在长江中游地区,清兵的进攻也相当顺利,湖北等地大都降服。但也有不少地方的民众,在明朝官吏和地方士绅的领导下,固城自守,反抗清兵。不久,清廷下剃发易服之令,并以武力相威胁,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即是。清政府的这一措施,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感情,各地人民的反抗遂在反对剃发的名义下展开,而明朝的各级官吏和地方士绅,在各地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

各地领导反清起义的领袖人物,松江有给事中陈子龙、总督沈犹龙、吏部主事夏允彝、水师总兵黄蜚、吴志葵等;吴江有兵部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等;苏州有副总兵鲁之屿等;嘉定有通政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等;江阴有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等;崇明有主事荆本徹、员外郎沈廷扬等;昆山有副总兵王佐才和顾炎武等;嘉兴有吏部尚书徐石麒、总兵陈梧等;在宜兴、长兴、新城(治今浙江余杭市)、余姚、会稽、常熟、太仓、宁国、徽州等地,还有一批类似的明朝官吏领导各地的抗清斗争。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嘉定、苏州、昆山、江阴、嘉兴和宁国的泾县等地反清与屠城。南京亡后,吴淞总兵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黄蜚也拥千艘战船自无锡至,与松江、嘉定两地守城军民,互为联络。吴志葵与黄蜚军在攻苏州城时被清兵所伏,兵败。清军下昆山、宜兴、常熟、崇明,围嘉定,侯峒曾坚守,吴志葵驰援兵败。七月四日,清军破嘉定城,三次下令屠城。“兵丁遂得肆其杀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弥望皆是,亦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①,农村人口遭杀戮者更是不计其数。这就是

^① 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第264~268页。

史载的“嘉定三屠”。

昆山县绅民杀清委知县，起兵反清。顾炎武、归庄等积极参与。七月六日，清军破城，继而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①。

顺治二年清兵抵达苏州时，苏州城不战而降。剃发令下，“时有福山副总鲁之屿者，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义军攻入苏州城内，“六门坚闭，城中人死无算。未几，都督李公至，土国宝必欲屠城。李知西北民居稠密，与土国宝分阍，二阍俱写东南，土国宝拈得东南，遂由盘门屠至饮马桥”^②。以苏州人口之稠密，虽然所屠仅有半城，但人口死亡当以数万计。

清兵南下之际，江阴百姓推举前朝典史阎应元入城，主守城事。江阴人民在阎的领导下，坚守孤城长达两个多月，城破被屠。关于江阴县城的人口数量，有阎应元的绝命诗为据，只是这一绝命诗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云：“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以此诗为“时为之语曰”云云。韩葵《江阴城守纪》则说此诗为阎氏在城破后亲笔所提，后一联云：“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③。清军于八月二十一日破城，屠城至八月二十三日午后才“出榜安民”，城内外死亡者 17.2 万以上，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④。

破城以后，江阴城外的百姓继续受到蹂躏，赵曦明《江上孤忠录》记曰：

八月二十三日，清军于江阴城外一带地方，每村落铁骑飞来，逼各家献宝，推跌老者，掷死少者，掳掠壮者，水行扯船，陆行挑行李，稍不如意，兵棍交加。其十岁上下男女，掠买甚多。其二十内外略有姿色妇女，掳去者尤多。略不如意，杀弃河干。跟随不上，枪刺路旁……将领恨江阴打仗三月，杀伤无

① 顾诚据顾炎武《归庄年谱》云昆山城破，“死者四万人”。《南疆逸史》卷36《王佐才等传》作“士民男女死者数十万”，顾诚认为有夸大。见顾诚《南明史》，第239页。

② 南园啸客《平吴事略》，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第112页。

③ 顾诚《南明史》，第236页。

④ 韩葵《江阴城守纪》卷下，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第78页。

数,故不禁约。师行带至山东、山西、口外辽东、盛京去者甚多,至河南、陕西者甚少。所掠之人,或不服水土而亡,或不得其所而死,或脱逃而归者,间亦有之。

有号翁洲老民者,著《海东逸事》,记明末清初浙江史事。该书卷2称:“北兵相谓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而三耳。”虽然“北兵”所言,仅指清兵攻城战争的难易程度,但守城者如坚守不降,破城后被屠则是不可避免的。据此可知除扬州、嘉定和江阴三城外,至少还有泾县和舟山两县县城遭到屠戮。

1645年宁国府属各县士绅起兵,八月十六日,清兵破泾县,清军将参与守城的三千余名民兵全部处斩^①。除民兵外,是否还有普通百姓大批被屠,史载不详。石埭、青阳等城为清兵占后,义兵仍然四处活动,准备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直到十月中旬,义军为清军剿灭。这一长时期的纠缠,可能造成山区人口较大规模的死亡。

顺治八年,清兵进攻舟山,舟山“城中兵六千,居民万余,坚守十余日,城破”^②。此指城中居民,不包括乡村人口。郑成功部收复舟山,清守军降。顺治十三年,清兵反攻,“北师复取舟山,英义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并赴海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民过海,溺死者无算,遂空其地”^③。清兵第一次破舟山后,不知是否屠城。第二次克舟山后,因惧怕海上作战,故放弃之,并将舟山岛上的百姓全部内迁。名为内迁,却驱海溺死。实际上,这也可看作一次大屠杀。

浙江境内诸府、县城对清兵的抵抗,值得一提的还有嘉兴府城。南园啸客在《平吴事略》中指出,顺治二年六月清兵抵嘉兴,嘉兴城降。至闰六月初五日,下令剃发,总兵陈梧与乡绅屠象美率民反清。“象美袖出伪诏开府,道署示谕城内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

① 顾诚《南明史》,第244页。

②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10,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③ 同上书卷2,第18页。

出兵一人……数日间，聚众三万余，无将领……”，于是有围城之役。“二十六日……黎明，传大兵逾城已入，郝千户开东门，百姓喧挤而出，践踏而死，嚎啕震天，接踵而行，首尾数十里不绝……时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间有削发为僧避于佛寺者，有自系狱中诡称署囚者，仅三百余人，其余尽行杀戮。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涨天，结成赤云，障蔽日月，数日不散。”仅以乡兵人数推测，此次屠城之役中的死亡人口不会少于10万。

朱大典领导的金华守城之役可歌可泣。“阁部金华朱大典，号未孩。乙酉，北兵至杭，退守金华。方国安溃师欲入，先生不许，相持久，国安精锐大半耗于城下，金城得全。以是国安陈师江上，朱师不出金城一步，只自料守备之具。至是国安降，欲首先效力，导北兵以大炮攒打。七月十六，城破屠城，朱合家焚死。”^①另一记载也说：“至是，以巨炮攻是门，即陷，恣屠戮，以报檄逐之恨，大典自焚死。”^②由此可知，屠戮金华城的清兵是与朱大典结怨的方国安部。朱大典守城三月后，城破。清军进入金华，借口“民不顺命，因屠之”^③。

徽州府城可以作为上述各例的反证。萧一山称：“是时，清军骠骑及降将武夫，乘机煽虐，所至地毛为洗。惟张天禄故史可法部将，尚有承平节制，营徽州山上，严戒军士入城。比至次春，淫雨浹旬，父老固请，天禄恐骚扰，坚不下山；与三军暴露，徽人感泣……故徽州既未遭屠戮之惨，复未罹扰虐之暴，亦云幸矣。”^④城池不守，清兵占城后也就没有屠城之举。看来，明末清初南直隶及浙江两省罹屠的城市仅有扬州、嘉定、昆山、江阴、泾县、舟山和金华七城。如果嘉定的死亡人口接近江阴，其数目可能多达10万之众。泾县、舟山、金华三县人口以每县死亡5万人计，九城(县)死亡人口可能达到140余万人。如果加上半屠的苏州城，死亡人口可能

① 徐芳烈《浙东纪略》，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第129页。

② 张道《临安旬制记》卷3，同上，第177页。

③ 康熙二十二年《金华府志》卷25《祥异》附《历朝变乱》。在引用这一资料的同时，顾诚指出道光《金华县志》卷12《兵燹》在记载清军攻破金华之时，删去“屠城”一句。

④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99~300页。

达到 150 万。

3. 从南昌到赣州

顺治二年,左良玉部降于安徽东流。左部总兵金声桓降清后率兵攻江西。金部到达九江后,派人持牌前往南昌,声称满洲大兵马步二十余万将至,只有迅速归降才可免遭屠城,南昌不攻而下。江西北部其他各府州几无像样的抵抗,清兵一路望风披靡。次年八月,金部在攻下吉安后,进抵赣州。

赣州屠城死亡
人口众多。

集结在赣州城周围的明军不下 4 万,然军无斗志,一触即溃。清军占领南康、上犹等县后,包围赣州城,赣州守城军队大约 6000 人,止一日,城破。易学实记赣州屠城事曰:“十月初四夜,清兵袭陷赣城,赣士民巷战,清兵屠之。”^①萧一山描述清兵入城后的屠城情况,“屠戮数十万,士女被俘者数万。焚室庐殆尽”^②。然依本书第四卷的论述,赣州城中的常住居民仅数万人,城外避难迁入的人口似乎不可能达到“数十万”人。康熙《赣州府志》卷 34 称:“赣当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户。”如果以为此处所指“赣”为赣州城的话,就意味着赣州城市人口可能多达 50 余万,这绝无可能。因此,此处“赣”应指赣州府,而所谓“户籍”,指的也只是在册居民而已,并非实际人口。赣州城破之后,清兵除了屠城外,还包括对赣州府人口的屠杀。如赣县的章水乡,“兵燹以来,十不存一”^③,即可为证。然而,这并不仅仅指顺治三年的屠杀,也包括自顺治三年至以后几年围绕赣州城发生的围城与屠杀。清代前期,大量客家移民迁入以赣州为中心的章水、贡水流域,即是对大屠杀后死亡人口的补充。

顺治五年(1648 年)正月,金声桓反正归明,江西境内战火又起。在金声桓的江西之役中,赣州重新成为战争的焦点。三月,金部 20 余万集结于赣州城下,赣州城中的清兵不足万人。金部围城,重挖深濠,重筑营城,层层围困,意在不克不休。城内米价高达

① 易学实《犀屋文集》卷 20《刘伯仲孝廉传》。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311 页。

③ 康熙二十三年《赣县志》卷 3《风俗》。

四十五两银子一石^①，清兵杀战马充饥。如果赣州城中还有老百姓的话，在这场围城之役中，恐怕难以存活了。所以，赣州城及赣州地区的人口死亡，不仅由清兵屠赣所引起，也包括金声桓部对赣州的围城。总之，明清之际的战争是导致赣州人口死亡的根本原因。

闰四月底，清援兵迫近南昌，金声桓部回师省城，赣州解围。七月初十日，清兵包围南昌，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省会同其他州县的联系，驱迫数以十万计的附近乡民挖掘濠沟，顾诚引徐世溥《江变纪略》称当时正值炎暑，“上暴旁蒸，死者无虑十余万”，八月初九日左右，挖濠工程完毕，“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南昌“附郭东西周回数十里间，田禾、山木、庐舍、邱墓一望殆尽矣”。城中米价先涨到一石要六十两银子，以后更高达六百两，最后断粟。守城者向外投放百姓，皆为清兵所杀。至顺治六年正月十八日，清兵破城。虽见屠城记载^②，但推测除了军人之外，城中恐怕已无太多人口可屠了。

南昌、赣州之间的人口损失也很多。如吉安，顺治二年清兵下吉安，明将邓武泰战死，当年明将杨廷麟、刘同升督师收复吉安。顺治三年清兵再取吉安。两年后金声桓以吉安等府归明，顺治六年，清兵再次攻占吉安。在经历了反复多次的攻战之后，地方社会秩序紊乱，群盗并起，奸宄猖獗。顺治六年山寇刘京陷泰和，张士举扰永新，张和尚掠永宁。七年刘金等掠永新、泰和，又陷安福、龙泉、永宁三县。八年明将刘文煌复永新、安福，为清吉安守将击溃。时人评价：“案自金、王乱后，逃兵溃将互相啸聚，豪民悍仆，与主为难。官军连年攻剿，戎马络绎，加以水旱洊臻，民嗟流离，盖吉安之罹锋镝者，近十年矣。”^③此所谓十年，指的是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军队攻打吉安以来未曾停息过的战争和社会动乱。据此估计在顺治初年及以后的战乱中，南昌、赣州两地及其沿途的死亡人口至少

南昌围城、屠城之役，人口大量死亡。

① 顺治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南赣总兵胡有升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52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② 彭孙贻《茗斋集》卷4。转见顾诚《南明史》，第495页。

③ 光绪《吉安府志》卷20《军政志》。

可达百万余众。

抚州府的情况尤值得一提。因为，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抚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是一个相当低的增长速度。仔细考察清代初年的战争史，可知抚州府人口的低增长实由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所造成。清兵进入江西后，明建昌益王曾募兵数千，试图以抚州城为据点进行抵抗。清兵至，明兵溃散。顺治二年秋天，“永宁王自闽率峒寇万余人入据抚州，大兵围之，三月始克。近城民居悉被焚毁，数十里外皆被掠，自是受兵无虚日矣”。顺治五年，金声桓叛清，“其帅张自盛等驻抚州，招募亡命，众至十万，深山穷谷无不搜掠者”^①。人口损失也相当严重。

在赣东北地区的饶州府，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民变造成的地方残破仍是相当严重的。如崇祯四年“乐平奸民吴士玉、何长庚等率众倡乱，四乡多应之者，焚毁郭内衙署及居民室庐几尽，已复抄掠四乡，旋遇官军讨平之，余党皆诛”；五年“（潘）永禧胁掠余干，盗四起，民无所逃，村落为墟”^②。广信府一带残破更甚，广信府与浙、闽毗邻，军队往来，是为通途。司徒琳引顺治十一年（1654年）一位商人路经此地留下的记载：

予自江右入浙，过鄱阳湖，进舟上饶江，所历安仁、贵溪、弋阳、广信、玉山诸郡县。入其城，大都不过数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见。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镇将者，河南人，日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遍。广信一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余以业盐，持引穿横卒而过，无敢呵者。入贵家大族，皆闭户团坐以待死，得吾升粟撮盐，则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较。予闻此言也，掩耳急去。^③

大战之后，赣东北信江沿岸地区人口损失严重。以后，这一区

① 康熙《抚州府志》卷13《兵氛》。

② 同治《饶州府志》卷8《武备志》。

③ 李介《天香阁随笔》卷1。

域又成为“三藩之乱”的主要战场，人口继续大量死亡。在清代前期的移民运动中，从福建沿海迁入广信府的移民，大都集中于中部的河谷地带，其中尤以分布在广信府城四周为密集。清代前期的移民，是对清代初年战争造成破坏之弥补。

限于篇幅，对于江西境内各地的战争和叛乱，兹不一一列举。总的说来，相对于其他省份，顺治年间的江西境内战事要多得多。其主要原因，除了明朝军队在此组织的抵抗外，还与金声桓的叛清降明有关。金声桓本为明军将领，降清后率清军进攻江西。江西刚平，金声桓本人又叛。金声桓叛清，许多降清的江西地方官员随之而叛，清军的镇压随之而至。一批军政官僚在明与清之间反复摇摆，带来的是江西的残破和江西人口的大量死亡。

可以根据丁额的缺失来推测人口的损失。万历六年江西省的田土额是 401151 顷，丁额是 5153005，顺治十三年，“杀戮逃亡人丁七十余万口，抛荒田土一十七万余顷”^①，损失的田土额为 43% 左右，损失的丁额为 15% 左右。虽然此中的“人丁”不是实际的人口数，而是纳税的“丁额”，地方官在奏减丁税时，仍可能根据当地人口的损失比例要求减免，即有 15% 的应收的“丁额”无法征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丁”死亡绝对数没有意义，但相对比例仍是可用的。也就是说，经过顺治年间的大屠杀，江西全省人口大约有 15% 损失了。

据本书第四卷，崇祯三年江西人口约为 1940 万。若以损失 15% 计，损失人口达到 290 万。

4. 从南雄至广州

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清军在李成栋的统率下，由福建经潮州、惠州向广州前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闯入广州。明朝的军队正在肇庆方面内战，来不及回调，广州失陷。李成栋率兵西进肇庆、广西，追逐明永历帝。永历朝廷在广西境内东奔西藏，李成栋部紧紧追随。从兵力上看，李成栋率领的清军只有

^① 王新命《请除荒疏》，雍正《江西通志》卷118《艺文》。

4100名,加上从福建带来的原郑芝龙旧部,也不过数千人^①。少量清兵的快速突袭和明军的不抵抗构成这一连串军事行动的特征,对于普通百姓的影响应该不大。

李成栋部收复广东其他府州的战役,也进行得十分顺利。顺治四年正月,广东十府之地全部落入清兵之手。其后虽有广东义兵揭竿反清,但规模太小,并未对清兵构成大的威胁。

顺治五年,清两广提督李成栋反清复明,广东境内战事又起。为解金声桓南昌之围,李成栋驰兵援赣,却兵败赣州。以后再次入赣,又兵败信丰。李成栋死于是役,“大军屠信丰”^②。赣州继续残破。

顺治六年十二月底,清军尚可喜、耿继茂率军从赣州越岭抵达广东南雄,并于除夕之夜破城,“城内居民,屠戮殆尽”^③。南雄并非军事或商业重镇,且此次破城带有突袭的性质,故人口死亡最多不会超过城中常住人口数,即不会超过2万人。破南雄后,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韶州,直逼广州。

顺治七年正月初六日清兵进抵广州郊外,围城。清军一方面扫清外围,一方面铸造大炮,另一方面等待援兵。清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十一月一日开始攻城。城破,清兵大肆屠杀。

司徒琳引外国传教士的观察:

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兵士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哭声震天;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最后,在冬月的六日,总督及清军统帅下令,即日起不得再从事如此惨酷的杀戮。我得到确切的消息,在(八十)十八天之内,被鞑靼人残忍地屠杀的,在八万

广州屠城,死亡者可能达到8万人。

① 顾诚《南明史》,第410~411页。

② 康熙《西江志》卷33。

③ 乾隆《南雄府志》卷16《杂志》。

(千)人以上。

顾诚引文献记载，“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烂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瘞焉，表曰共冢”。番禺人王鸣雷写了一段祭文，描述屠城后的惨状：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骷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便房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羸老就戮，少者为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轳……^①

《清史稿》卷234《耿精忠传》称：

初(耿)继茂、(尚)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

《清史稿》卷234《尚可喜传》称：

(清兵)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余级，逐余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

司徒琳大概不敢肯定屠城的数量会达到“八万”人之众，故改作“八千”。但这八千只是守城军人数。从上引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广州城大屠杀的死难者不可能只有八千人。明代末年的广州城可能在20万人以上，屠城中死亡8万余人，占总人口的40%以上，是为丁壮男子。

顺治十年，明军李定国部从广西攻广东肇庆，清潮州总兵郝尚久举兵反清。李定国部在肇庆失手后退回广西，郑成功部在筹得粮草后退回福建。孤立无援的郝尚久部与清军在潮州城下相持一个多月，清军“屠城，斩杀无算”^②。潮州作为府城，城内外至少有2万居民被杀。

① 九龙真逸《胜朝粤东遗民录》卷1《王鸣雷传》。

② 乾隆《揭阳县志》卷7《事纪·附兵燹》。

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出兵广东新会,围城时间从六月直到十二月,长达半年。新会围困日久,粮食告罄,城中清军杀居民为食。地方志记载:“盖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又云:“诸将虽有全城之功,亦有肝人之罪。”^①围困经久的城市,类似屠城。

合而计之,南雄、广州、潮州及新会四地屠城及围城中死亡的人口约为13万,加上其他地区的人口死亡,合计广东死亡人口大约20万~30万。对于明代末年800余万广东人口来说,人口损失大约只占全省人口的3%~4%,与南直隶的情况相同,可能与崇祯三年以后人口的增长相抵消。

5. 长沙和湘潭

湘北人口死亡甚多。

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团练之手。大顺军之一部约21万兵力驻扎于平江、浏阳一带。康熙十九年《平江县志·灾沴》称:“乙酉年,闯寇数十万寇县,往来屯驻四阅月,凡上下乡方围三百余里比屋盘踞,深山穷谷焚林竭泽,男妇老幼杀死无算。”湘北人口的损失是大量的。

就在大顺军进入湖南之前一个月左右,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从武昌来到长沙,设置行辕。大顺军与明军联合抗清,军队总数多达数十万。军队的给养于是成为一个大问题,司徒琳指出:“因此,何腾蛟虽向这些军帅各授官职,但对于他们为求生存而恣意掳掠、流动,也只有默许,另无他术。”^②于是乎“湖南民展转蔓延,死亡过半”^③。这一说法对湖南全境来说,可能有过分之处,但对湘北地区而言,却又可能是真实的。司徒琳曾引清湖南巡按一份揭帖以说明之:

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骸骨盈道,蓬蒿满城。取自岳(阳)至长(沙)……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长沙为群逆盘踞数年,剥民已尽脂

① 乾隆《新会县志》卷2《编年》。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801~802页。

② 司徒琳《南明史》,第56页。

③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7。

膏。临遁，复行焚杀。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然山岩河谷，犹自有民，可以徐为招徕……衡州除连年兵寇杀掳之外，上岁颗粒无收，春夏米价腾涌，百姓饿死大半。^①

所谓“壬午”，指的是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这一年有张献忠部屠长沙的记载。乾隆《长沙府志》卷37《灾祥·兵难》称：

（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左良玉自武昌至长沙，初击献贼，既而肆虐，较贼倍惨，民甚苦之。时大饥，士兵互相仇杀……自是湖南日屯重兵，长（沙）宝（庆）间蹂躏尤甚。

光绪《湖南通志》卷88《武备十一·兵事三》引旧志称：

明长沙兵溃，搜山杀人，刀火之声彻于野者二旬，宁（乡）、益（阳）最惨。镇将马进忠、王进才、王允成等及向登位、吴学清等溃兵自湘乡走邵阳、新化，下至桃源、龙阳，俘掠数百里，进才所至尤酷。

明溃将马进忠、牛万材、刘体纯、袁宗弟、张光翠、杨国栋等贼十四家合众数十万，自武陵、桃源来堵。允锡率高必正、李赤心尾之，喋血五百里，连营宁（乡）、益（阳）、湘潭三县，间攻长沙，坚壁守退，据湘潭，分割四十六里，焚掠三月，杀男妇数十万口，死雪中，冻饿者无算。

清兵入湘，何腾蛟弃长沙而南逃。城中房舍焚毁一空，但并未屠杀，百姓大都逃于山谷间。然而溃兵南下，一路抢掠屠杀。其中尤以长沙附近之宁乡、益阳和湘潭受害最深，人口死亡多达数十万人。衡州粮荒，饥死人众。顺治十一年，洪承畴率兵进抵长沙，长沙府城“残坏之地，安顿满洲官兵已属不支”，宝庆府“城内城外无民无房，并蔬菜买卖俱无”^②。这一叙述可以得到移民史的印证：战乱结束后的“湖广填四川”，迁入四川等西部地区的湖广人主要来自湖南永州的零陵等地，而几乎不见有来自湖南中部和北部的

① 《明清史料》丙篇，第七本，第608页。

② 同上书，第二本，第146~148页。

移民。

顺治五年，就在金声桓于江西竖起反清复明的大旗时，南明永历政府在湖广南部策划了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何腾蛟、陈友龙部从广西出发，向湖南进军。四月、五月间，湖南南部大都为明军收复，清军主动放弃衡州，撤至湘乡、长沙扼守。

湘潭屠城。

明军的进展相当顺利，长沙府城险被明军攻克。然而，由于内讧，明军主力放弃对长沙的进攻。顺治六年正月二十日，清军援兵入湘，迅速包围湘潭县城，何腾蛟被俘。时人汪辉称，清军“以余贼未靖，遂下令屠城。以二十六日开刀，二十九日方止……是时城中居民无脱者，尸骸堆积如山，臭不可近。瘟疫大行，四乡传染，甚至一门瘟绝。药肆中大黄、羌活、黄芩俱卖尽，乌梅二三分一两，葱姜药引二三分一剂。噫，此何等时也，屠戮之骸不及埋，而疫疠之尸又遍积于河干矣”^①，顾诚所引也是汪辉进城所见：“近前则足软，欲退又不能。魂飞魄散，心胆俱寒矣。时血迹尚鲜，腥臭逼人，立身无地，有食亦不能下咽。但见尸骨纵横，惨不可言……市上人民不止二三十，城中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②据本书第四卷，明代初年湘潭一带的县城人口大约只有3000人左右，明末清初，湘潭人口不会超过万人。如没有大量乡民避兵入城，死于屠城的人口大抵为县城居民。萧一山称：“湘潭空城也，腾蛟乃人居之。”^③此语并不确切。战后，“及复业，城中土著无几，豫章之商十室而九”^④。总之，湘潭城中的土著大都死于屠城了。不仅如此，时人称：“逆猷攻破武昌，屠毒万丈，湖湘以上，潭城十万户与左右邑皆烬……偶咨略沅抚□雪，入衡湘七百里，如行绝漠。”^⑤此潭城十万户当指湘潭县总人口，因为无论如何，湘潭县城的人口都不可能达到十万户之多。于是，战后湘潭地区迁入大量的移民，史载：“康熙初土旷人稀，多占田号标产。标产者，折竹木枝标识其处，认

① 汪辉《湘潭脱难录》，见光绪《湖南通志》卷88《武备十一·兵事》。

② 汪辉《湘上痴脱离实录》，见《希青亭集》。

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24页。

④ 光绪《湘潭县志》卷11《货殖二》。

⑤ 陶汝鼎《哀湖南赋》，康熙《宁乡县志》卷10。

纳粮，遂为永业。”^①再如宁乡，“宁邑自明季以迄于兹，数罹兵燹，山寇剽掠，猘贼鸱张，老弱童稚，几无孑遗”^②。如醴陵，“自崇祯十六年至清顺治十一年，人民备历刀兵、饥荒、疠疫诸劫，死亡过半。业荒无主，新来占籍者，唯其自由管领，插标为界”^③。情况与湘潭一样，人口大量死亡，以至于战后需从外地移民填补。

嘉庆二十年(1815年)夏天，江西客民在湘潭城中万寿宫演戏，因方言土音为土著嘲笑，引起冲突。双方械斗的结果，土著死数十人，“江西客民滥死者亦无数”。从此案中看出，江西移民大都是以非农业人口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在湘潭县并未占据多数。由此亦可知，康熙初年的移民迁入，主要是本省邻县人口的迁移。据此可以判断，清代初年对湘潭一带的破坏，局限于长沙、湘潭及附近区域，对于其他地区的破坏，仍是有限的。

洪武二十四年长沙府人口约为56.7万。在本书第四卷中我指出，作出移民输入区的长沙府，明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接近湖北的水平。以6‰计，崇祯三年可能达到236万。明清之际的人口损失以全府总人口的30%计，死亡人口可能达到70万，剩余人口约为166万左右。

6. 北方的屠杀

在以往有关南明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大都不注意北方军民的抗清史实。顾诚在他的《南明史》一书中，对顺治年间北方抗清史实稽隐钩沉，今据以叙述如下。

顺治五年十一月，清山西大同总兵姜瓖易帜反清，大同周围十一城皆叛。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太原及少数城池外，差不多全被义师占领。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波及到陕西及西北地区。

顺治六年元月，清军包围大同。长期的围城也使大同守军难以支撑。八月，大同城内“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④。在

顺治五年、六年山西军民反清，大批城市被清军所屠。

① 光绪《湘潭县志》卷11《货殖二》。

② 康熙《宁乡县志·序》。

③ 民国《醴陵县志·政治志·户籍》。

④ 《清世祖实录》卷46，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65页。

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一总兵变节,并带领 600 余名官兵叛变,杀死姜瓖与其兄弟,持首级出城投降。清兵入城后,下令除投降的官兵家属外,其余“官吏兵民尽行诛之”。这一命令执行得相当彻底,如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有重犯 5 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以后,清军大举进攻,九月,陕西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官兵 1 万余人战死,“尸满街衢”。清军破汾州后将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十月,清军用红衣大炮攻破太谷县,虽未言及是否屠城,但从抵抗必屠这一原则出发,太谷县似乎难以幸免。类似的城池可能还有沁州、潞安(今长治市)、泽州(今晋城)等。如顺治七年十二月的一份报告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雍正《朔州志》卷 8 称:“城破,悉遭屠戮。”如乾隆《汾州府志》卷 26《李节妇传》说:“己丑,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清代中期行“文字狱”,地方志的作者对于记载清初屠城事有所顾忌,正式的记载难见于志书。汾州府城被屠一事从李节妇的遭遇中透露出来,使我们相信顺治六年山西大批城市的抵抗,可能导致大批屠城事件。

同年清兵在陕西围剿义师。如清军攻蒲城,城中居民固守数日,城破,“遂屠之,杀戮万余人,匕筋无遗”^①。一个县城中的居民及四乡逃难入城者为万余人,这大概是山西、陕西县城人口的规模,据此计算,山西一省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县城进行过抵抗,死于屠城的人口当不会少于 40 万人。

康熙《五台县志》卷 8 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 年),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量也。”清代初年的屠杀不仅包括对抵抗城市的屠杀,还应包括对乡村人口的屠戮。所以,战争结束后三十余年,五台县人口和耕地都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陕西的抗清斗争也有一定的规模,其中以甘肃回民的抗清

^① 康熙五年《蒲城县志》卷 2《祥异·屠城》。光绪《蒲城县志》卷 13《杂志·兵燹》却引《屈复诗序》:“三桂怒,挥众力攻,初五日城陷屠之,死者十余万人。”一个县城屠杀十余万人,似太多,此不据光绪志。

斗争尤富特色。此外,各种“土寇”蜂起,也造成很大的人口损失。如白河县,“顺治三年丙戌,刘二虎诸寇屠城,居民十不存一,城为之墟”^①。所以,迟至顺治五年、六年,陕西人口仍处于减少当中。北直隶地区因地近京畿,清兵入关后大肆圈地,造成大批百姓流离失所,人口的恢复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在清代初年的北方五省中,河南、山东等地已进入了和平的发展期,人口应该有所恢复和增长,两相抵消,大约在顺治中期,北方人口应该进入增长期。

第二节 东南沿海的战争与迁海

一、福建战事与郑成功部抗清

顺治三年,由于郑芝龙的投降,清兵轻松地越过仙霞岭,进入福建。八月,南明隆武帝在汀州遇难。九月,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占领福州。

福州、福宁等地的围城和屠城,造成大量人口死亡。

顺治四年,福州府滨海的海口、镇东等城,遭到清兵的屠杀。有名海外散人者,著《榕城纪闻》,记载了这一时期福州城及福建其他地方的情况。先是清兵屠海滨,“以海滨不可测,屠海口、镇东等城,虏妇女无算”^②。顺治四年,福建各地义师起,反清复明,一时闽境骚然。义军包围省城,城中缺粮,人口大量死亡,“有四五十家之街巷无一人行者,见有门庭整丽、器具精好,入门,而十余堆白骨委地者,比屋皆然。死尸弃地,片时割尽,窃抱小儿,瞬息就烹,甚至自食其子,亲割其夫者。凡死亡十之八九。米虽小斗,价六钱”。五年春天,福州城中“疫大起。城外虽未乏食,死大过半,与城中等”。福州虽未经屠城,但顺治四年、五年的围城之役与瘟疫,使城中人口大部死亡,周围郊区也损失半数

① 光绪《白河县志》卷13《杂记》。

②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页。

以上的人口。

在其他地区,战争也使人口大量死亡。顺治四年,义军攻福宁州城围城时间长达七个月,城中粮尽,饿者无数^①。明军一度收复平海卫,后为清军复夺,平海卫百姓惨遭屠戮。又如在兴化府城莆田,义师攻打莆田,相持数月,城中原有百姓 27 万,因长期受困,大批死于饥饿和杀掠,只剩下三分之一^②。莆田城中的 27 万百姓,也应当包括四乡避难迁入者。

顺治五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逐渐拥有了一支强大到足以与清军对抗的军队。七月,清兵攻同安,郑氏军队援助不及,八月十六日城破,清兵屠城,“血满沟渠”。

顺治九年正月,郑成功率军直抵海澄港口,清守城将降。郑氏进而围攻漳州城,时间长达十余月,“城中人尽饿死”^③。顾诚引福建巡按王应元的一份题本详细描述了城中的惨状:

八九两月,每石米价贵至五百五十两,草根木叶鼠雀牛马搜索食尽,继之人肉。父子相食,囊不烟火者月余,病死、饿死、投水投环而死,兵丁威取强夺箠楚而死,日以千百计。尸骨山积,秽闻数里。嗟此残民靡有孑遗矣。

清军援兵赶到,遂解漳州之围。

总之,以兴化府城的情况推论,截止顺治九年,福建人口至少死亡 100 万左右。

二、迁海

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部退守台湾,欲以台湾为根据地,反清复明。满兵不习海战,为了阻隔郑成功部与大陆人民的联系,颁布沿海迁界令。涉及范围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和北直六省。由于郑成功的主要据点是在福建,因而,对清政府威

迁海造成的人口死亡相当严重。

① 乾隆《福宁府志》卷 43《祥异》。

② 林佳矾《闽记》,见抄本《明季稗史》第三种。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 382~383 页。

③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 8 页。

胁最大且迁海令执行得最彻底的也就是福建、广东两省。时人称清政府的迁海，“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顺治十八年八月，清廷派出官员前往各省视察，各地迁海相继展开。

一般规定，迁海以三十里为限，但也有说四十里、五十里甚至更多的。究竟迁海多少里，这要依当地的地形与办事官员而定。迁海之事，在地方文献中，留下了许多记载。

1. 福建

海外散人在《榕城纪闻》中称：

福建、浙江、广东、南京四省近海处各移内地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如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长乐二十四都，只剩四都。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

所述主要为福州府沿海之情形。陈鸿在《清初莆变小乘》中提及莆田一带的情况：

（顺治十八年）十月，部文下，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

莆田一带的迁界并不以距海岸多少里为界，而是将海滨之民迁入离城 20 里范围之内。兴化府城距海最近处仅 20 里，最远处可达 70~80 里，如将全部海滨之民迁入距城 20 里范围居住的话，迁界范围可达 50~60 里。如上所述，在顺治年间的战争中，兴化府城及周围人口被屠者多达 27 万，迁界之民填入，似乎可以弥补了这一区域的人口。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兴化府的迁民可以在府城周围地区获得耕地而安居乐业。同一资料继续说：

（康熙四年）各上宪捐俸赈济迁民，令每人给米五斤，五日一放。道、府、厅、县亦行捐俸，并会绅衿士庶，劝殷实者量力

乐输。五月初一日，在万寿宫分给。男女数千人纷纷道路，形容枯槁，衣衫蓝缕。少妇含羞，手遮面而捉襟见肘。老人喘息，欲定神而前拥后推……共放米四次乃止。迁民冷落，已经五载。有尽室寻亲浙省，有望空奔窜四方。重廉耻者，父抱子投于水，夫同妻缢于堂；重性命者，或听妻儿跟他人远去，或将一己充权门厮养。夫视妻死，而无力收埋；母任儿啼，而忽然径去。我生不辰，逢此鞠凶，其是之谓乎！

迁民人口的死亡者多。余颺在《莆变纪事》中也有详细的描写：

瀚海波飞，以为滨海接济之路，生其心也。时有满大人苏达海巡历形势，定为清野之议，将边海居人尽移内地，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刻其十月内不迁，差兵荡剿……方其时，蹴居城乡，填门塞巷，有亲戚者兴采葛依居之叹，无亲戚者尽离鸿中泽之哀。糗粮薯麦，富者足支一年，贫者日月可计。于是流离转徙，死亡荡析，郑侠所上之图绘之不尽矣。

余颺在同书中继续议及明代中期至清代初年莆田人口的变化：

自倭寇扰乱十年，生齿损耗。嘉靖壬戌至崇禎甲申，一百余年休养生息，他不可知，即如霞林，是吾母外家，吾常游其处，一年报新生儿多至数十人，一姓如是，他姓可知，一乡如是，他乡可知。故吾乡生聚之盛，未有过于崇禎时也。国变以后，丁亥、戊子之乱，山海纠合，乡树一帜，家兴一旅，乡与城仇，南与北敌，山与海哄，杀戮如草，白骨盈郊……至于官兵一出，或对阵，或洗寨，乡村鸡犬为之一空，计此时人民之死者已一半矣。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不可收拾。加之庚[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力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而招安贼伙又复横加欺凌，土著残黎又无一聊生矣。吾乡人民至是真九死一生矣。

福建一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

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①。按照上引记载，假定福清、长乐二县的迁界水平代表这 19 个州县的平均水平，即此 19 个县中有 70%~80% 的人口列于迁界之列，即大约有 14 个完整的县被全迁了，占福建县总数的约 24%。如果迁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福建全省人口的 8% 死于迁界。按照我在第四卷第七章中的论述，明代末年福建约有人口 2360 万，扣除顺治年间沿海县份死亡的人口，迁界中死亡的人口至少可达 180 万。如果按照莆田的情况进行推论，死亡人口可能更多。据本书第四卷第七章，明代初年，兴化府的人口密度最高，清初的情况也应如是，该府人口死亡众多也在情理之中了。

估计福建因迁海死亡的人口可达 180 万。

2. 广东

康熙元年，清廷派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次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②。康熙三年春天，“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③。

顾诚引香山县例说明迁海过程中清军对人民的屠杀：

初，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平南王尚可喜）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地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④

然而，光绪《新宁县志》卷 14《事纪略》则有不同的说法：

香山横石砬口子宜撤也。当年迁立边界之时，以香山必不可迁，议设官兵防守此土。香山之外，原有澳彝，以其言语不能，不事耕种，内无驻足之处，况居香山数百年，迁之更难，时已奉命免迁矣。是县与澳皆为内地也。所宜防者，防其通

①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 1073 页。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7 页。

③ 钮琇《觚剩》卷 7《徙民》。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 1067 页。

④ 道光《香山县志》卷 8《事略》。

外海耳,当时奉行者反于横石矾立一口子,日食米粮计口而受,每几日放一关……计县与澳共户口数万,断绝往来,生业坐养致困,悉愁苦难言,论其地未迁,则为界内之人,其横石口子似宜免设,使其人得以贸易于内,以通有无。

香山县因澳门
而免迁。

香山县因辖有澳门之缘故而予免迁,只设卡严查人民往来。其理由是,澳门为夷人居住数百年,一旦香山迁海,势必造成澳门地方的孤屈,导致澳门人口的生活困难。澳门的存在使香山免去了迁界之苦。上引《香山县志》所说可能发生于迁界之始,不久因澳门故,香山免于迁界,香山的形势也就安定下来。在移民史的研究中,我也发现,复界以后,香山邻县皆有客家移民迁入,独香山无规模性移民迁入。这也说明香山并未迁界。

东莞县的迁界强度特别大,康熙元年(1662年)的迁界就达50里之多,次年内迁加30里,合计迁界达80里。不仅民众皆往内迁,连驻守在虎门附近的护卫兵丁也一律内迁^①。一县迁界80里,很难想象还能剩有多少地方了。

新安县的迁界较之东莞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元年二月“行边立界,邑地迁三之二”,次年“续立界,邑地将尽边焉。总督卢以邑地初迁已多,会疏免续迁,止迁东西二路共二十四乡”^②。新安县被迁去三分之二后,还被强行迁去24村。由于土地大部分被迁入界内,故被撤县并入东莞。因迁海而被撤县,这在康熙迁海史上也是罕见的。直到康熙八年才随复界而复县,才有客家移民的大量迁入。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指出广东迁界的死亡人口:

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为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

① 民国《东莞县志》卷32《前事志》。

② 康熙二十七年《新安县志》卷3《地理志》。

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据时人称,广东迁界范围包括“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等七府所属二十七州县、二十卫所沿边迁界并海岛港洲田地共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二顷”^①,所涉范围及州县卫所数大大超过了福建,纳税田亩也大大超过了福建。然而,由于广东沿海人口稀少,据本书第四卷第七章,洪武年间广东的人口密度仅及福建的一半,其中惠州、高州、廉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4~10人。加之香山因澳门而免迁,因此,迁海对于广东人口的损害可能轻于福建。据屈大均语,迁海造成广东数十万人口的死亡,其数量远远少于福建。鉴于东莞、新安两县的高强度迁界,迁界之后大规模招人移民,因此,我估计仅此两县因迁界而死亡的人口不会太少,可能多达数十万人。屈大均称“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若以福建迁民死亡的半数计,可达90万人。

广东迁界死亡
人口可达90万。

3. 浙江

顾诚引康熙年《温州府志》卷9《贡赋》的记载,温州府属原额田、园、地24613顷,康熙八年展界复业之后,实存田地数也只有16499顷,其中平阳县的7751顷田地园在迁界时全部“弃置”,康熙九年以后部分展界,招民复业,直到康熙二十年编审时各则田地园还只有3263顷。据康熙《台州府志》卷4《屯赋》,台州府属临海县顺治十八年奉文迁界,弃田199293亩,宁海县也弃去民田1150顷,另有221顷涂田也全部放弃^②。如此大规模的迁海不可能不造成人口的死亡,即使浙江死亡人口少于广东,但死亡人口在10万左右总是可能的。

如此,在清代初年即从顺治元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的21年间,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六省死于战争、屠城和迁界中的人口可能达到700万人。

^①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② 顾诚《南明史》,第1074页。

第三节 “三藩之乱”对人口的影响

康熙元年(1662年),明永历帝在昆明为吴三桂所杀。明宗室偏安割据者,至此已荡灭无存。各地的南明武装,在康熙初年也大都失败。规模性的抗清力量只剩台湾的郑氏政权。

清兵入关后除了依靠八旗军队外,还借助明朝故臣所统军队,南征北战。孔有德封定南王,平定广西,尚可喜封平南王、耿仲明封靖南王平定广东,吴三桂封平西王平定四川、云南和贵州。顺治六年,耿仲明战死于江西吉安,子继茂袭爵。顺治九年孔有德战死,无子,爵除。战事平息,八旗军返京师,诸王率各部留镇一方,于是吴三桂王云南,尚可喜、耿继茂王广东,不久迁耿继茂王福建。耿继茂死,其子耿精忠袭。是为三藩。

在三藩之中,吴三桂兵力最强,权势最大。藩府不仅拥有事实上的选官权,而且因兵员众多,耗费巨大,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萧一山认为,“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①。不仅如此,关于三藩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报告也不断传入京师,引起清廷的忧虑。康熙十二年尚可喜请求回迁辽东,清廷虑其子尚之信骄横,且握有重兵,欲将全藩兵丁家属并迁。此实为撤藩。吴三桂、耿精忠亦分别上疏,以请求撤藩安插为名,探清廷之底细。此时康熙亲政已有数年,正欲清除边疆大患,于是有撤藩令下。是年十一月下旬,吴三桂首先在云南蓄发易冠,揭竿反清。次年耿精忠、尚之信亦反。史称“三藩之乱”,或因乱发年份称为“甲寅之乱”。

一、“三藩之乱”对黔、湘人口的影响

《清史稿》卷6《圣祖纪》所记载的“三藩之乱”相当简略。如事涉吴三桂起事之初,仅有“云南巡抚张国治、贵州提督李本深、巡抚曹申吉俱降贼,总督甘文焜死”之句。关于吴三桂进军湖南,也只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09页。

有记载如“吴三桂陷辰州”，“吴三桂陷沅州”，“吴三桂陷长沙”以及“陷衡州”、“岳州失”等。关于战争造成的破坏，官修正史中找不到明确的记载。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吴三桂陷贵阳后^①，贵州境内的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康熙二十年二月辛亥，贵州巡抚杨雍建疏言：“贵阳省会尚有未毁民居，宜令流散人民，复其本业。量减徭役，俾得补葺室庐。至贵阳南北大路，居民皆新经招集，亦应量减差徭，其供应夫役私派，并请禁止。得旨，该抚速行设策，招集流民还业。”^②可见战争影响最大的地区还是贵阳和它周围的主要交通干道。战后经政府招集，流民还业。据此推测在“三藩之乱”中，贵州的人口损失并不很多。

“三藩之乱”引发地方反政府武装力量崛起，并导致地方残破。

从正史中的记载看，吴三桂在湖南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只是为征敛军需，地方骚然。“伪将张国柱陷长沙……开征伪饷，羽檄飞催，取铜、铁、硝、磺、苧、絮、鞋、袜、猪、羊等物凡五十余项，索费千金，民穷逼逃徙，城市一空。”^③可知是“逃空”，而非屠杀。

赣西的“蓬民”乘机而起，影响湘东。上引资料记载，同年六月萍乡“蓬寇”降附三桂，号召乱民，未几为袁镇赵某擒戮。其余党朱永盛等“聚党数万屯浏阳邻界滂田冲，九月伪兵备道冯憬踞浏阳东乡石马峒，亦聚众劫掠”。次年，清兵清剿蓬民，并与吴三桂的军队冲突。康熙十八年上任的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

国朝除荒蠲早，元气稍培。自甲寅吴逆倡乱，横征暴敛，元气铲削已尽，加遭蓬寇数万，盘踞四年，掳掠子女，牛尽种绝，深山穷谷，搜括无遗，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孺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④

人口死亡甚多。在酃县，关于清代前期的人口死亡，有记载说：

① 乾隆《贵州通志》卷24《师旅》。

② 《清圣祖实录》卷95，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194页。

③ 光绪《湖南通志》卷88《武备十一·兵事》。

④ 同治《浏阳县志·食货》。

(顺治)六年贼(按:指金声桓)踞五镇,屠戮过半。八年复被粤寇十三营,烹杀几尽……十一年大师恢剿,知县傅继说招集哀鸿,历年仅得老幼一千二百人,逐名搜括入册,遂无留余,以待缺额。十四年天灾荐臻,疾疫流行,病死凡三百八十四丁……继以西山军兴(按:甲寅之乱),驮夫之役,捐委道涂,扶疮归葬者二十余名,目今又遭虎患,死者不啻数十人,至于逃亡又无论已。^①

大量的人口死亡发生于金声桓反清复明期间。所谓粤寇十三营,实为活跃于赣南、湘东地区的来自广东的客家移民。在清代初年的社会变革中,他们屡屡参加抗清活动,并参与对当地土著的屠杀,但是,他们的人数不多,活动区域有限,引起的人口死亡总数是不多的。

二、“三藩之乱”对江西人口的影响

吴三桂分兵自长沙出江西,与耿精忠部合,陷江西三十余城。就这场战争对江西人口的影响来看,赣中、赣西和赣东北地区最值得一提。

吴三桂部韩大任部攻下江西中部重镇吉安后,以此为据点,向四周出击。康熙十五年,清兵围吉安,十六年春,吉安粮将尽,退走赣南。以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大凡围城之役,城市周围人口难免被屠。但在吉安地方文献中,却未看到类似的记载。《清史稿》卷6《圣祖纪》称:“(康熙十五年)二月丁巳,诏军中克城禁杀掠。”也许正是康熙帝的这条诏令,使得吉安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免遭一次大的屠戮。

吉安地区的残破仍不可避免。康熙十三年庐陵、泰和、万安、龙泉等县均被寇,永宁防兵复叛。这里的“寇”,指的是来自广东、福建的流民和当地的土寇。“福建、广东流寓屯党乘湖南寇,纠众数万,陷万安城。守备邓雄乞师赣州城,乃复。泰和土寇蜂起云亭各乡,逼近岩谷,出入肆掠”;十七年守备陈五美大掠龙泉。广东、

赣北、赣南客家人在战争中起而抗清。

^① 同治《鄱县志》卷11《事纪》。

福建来的客家移民也趁势起义，“掠龙泉七都，驱男女入水死者无算，守备陈五美贼去后乃遣兵压境，大掠而还”^①。赣中地区因此而残破。

明代末年，来自福建等地的大批棚民，活动于萍乡、宜春、分宜三县的北部及万载县的西部，垦山种麻。吴三桂军占领长沙后，他们群起响应，“绵亘数百里，焚杀淫掳，所过为墟。萍（乡）、万（载）二邑再陷，袁城危如累卵”^②。起义的棚民攻克萍乡、万载两县县城，并危及府城，可见他们的人数之多和力量之大。棚民武装与吴三桂军联手，三陷万载、三陷新昌（今江西宜丰县），又破上高等地，直到康熙十六年吴三桂军主力困于湖南衡山，无力援手义军，棚民义军在万载县楮树潭投诚。据战后土著称，战争中的棚民义军并不是以反清作为目的，而是大肆杀掠土著人民。政治斗争的幌子下，上演的却是土客互相杀戮的惨剧。“迨康熙十三年楚变，遂蚁聚蜂屯，遍肆杀掠，宜境四境，几无宁宇”^③。战后，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土著驱逐起义的棚民。

顺治年间抚州的残破已相当严重，“康熙十三年四月逆藩耿精忠踞闽叛，遣伪将易明，攻抚州城……而地方蹂躏，较鼎革尤甚”^④。这暗示着“三藩之乱”对抚州府的人口影响可能超过顺治年间的战争。

耿精忠部宣布反清后，遂三路出击，一路东出，据浙江之温州和台州；一路西出，据江西之广信、建昌和饶州；一路中出，由仙霞岭据浙江之金华和衢州。关于战争对建昌府的影响，地方志中有许多记载，如康熙十四年九月，耿精忠部“寇南丰，初七日百总赵某开门迎贼，乐灿自北关入，刘、饶自南关入，杀知县王应奎、县丞伍承恩、水师营游击杨光祖、广昌知县陈贞（时驻南丰），焚杀三日，积尸满衢”^⑤。围绕南丰展开的争夺战反复进行。在南城县，“南

① 光绪《吉安府志》卷20《军政志》。

② 《驱逐棚寇功德碑》，康熙二十二年《宜春县志》卷12《风俗》。

③ 康熙二十二年《宜春县志》卷12《风俗》。

④ 康熙《抚州府志》卷13《兵氛》。

⑤ 同治《建昌府志》卷5《武备》。

楼述甲寅、乙卯之变，南城遭擄戮甚惨，复继以疫，十数年疮痍未复”^①。战争加上瘟疫，地方更加残破不堪。

关于战争对广信府的影响，时人指出：“康熙十三年甲寅广信府城守副将柯升……于四月二十四日挟标下兵目反叛，夺城而出……信郡七邑俱为贼踞，百里之内，杀戮无数，断绝人踪，鸡犬无闻，遭祸独惨。”^②又云：“甲寅之变，上饶罹祸最惨，庐舍民人，十亡八九，田业鞠为茂草。”^③对于这一说法，过去我深信不疑。然而，据上引顺治十一年一位商人在广信府的观察，可知早在“三藩之乱”发生之前，这一区域就已残破不堪了。“三藩之乱”只是加重了这一地区的残破和人口的死亡。

依据人口增长速度，推测战争中的死亡人口。

估算“三藩之乱”对江西人口的影响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我们缺乏基本的估算数据。加上顺治年间的战争使这一区域人口大量死亡，因此，进行更为细致的人口死亡估计更不容易。据我所知，除了朱宸濠变乱引起的战争外，明代江西中部地区大致是在平稳的环境中度过的。按照本书第四卷的分析，以3.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明代末年，吉安、袁州、临江、抚州、建昌、广信六府人口可达1100万。依本卷第四章，乾隆四十一年六府人口合计为814.8万，嘉庆二十五年为94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3.3‰。依3.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康熙十七年，仅有人口584.2万，较之明代末年减少人口约516万，人口减少47%。崇祯末年江西人口为1930万，依同样的方法估算，康熙十七年江西人口约为1346万，较之明代末年减少人口约580万。事实上，在本卷第四章的计算中，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江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如果认为从康熙十七年至乾隆四十一年也是如此，则明清之际和“三藩之乱”中江西人口的死亡可能超过600万。这一估计，只是一个最低值。上文估计顺治年间江西人口损失290万，据此，“三藩之乱”导致的人口死亡约为310万。

① 同治《南城县志》卷13《摭闻》。

② 康熙二十二年《上饶县志》卷1《灾祥》。

③ 康熙二十二年《上饶县志·序》。

三、“三藩之乱”对浙江人口的影响

1. 对明末清初浙江人口变动的补充说明

本章第一节已论述了清兵南下的屠城对浙江人口的影响。除了嘉兴府城、金华及舟山外，尚未发现别的屠杀记载。就屠城死亡人口而言，清代初年浙江的死亡人口是相当少的。

从清代初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浙江境内大的战争只有“三藩之乱”。然而，“三藩之乱”并未影响浙江北部的杭、嘉、湖三府，这是否意味着浙江北部三府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乾隆四十一年的人口发展是平稳的？根据本书第四卷《明时期》第七章和本卷第三章提供的数据，从洪武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一年，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8‰、0.9‰和1.5‰。嘉兴人口增速最低，与清兵屠城有关。但如此仍不能解释浙北地区的人口低增长。

我们将视野投注于整个苏南及太湖平原。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常州、镇江两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为3.4‰左右，苏州府为2.5‰，嘉兴府仅为1.4‰。明末清初，常州、苏州、嘉定三府都遭受清兵的屠城，何以苏州、嘉定两府的人口增长率更低？

以年平均增长率为3.4‰计，从洪武二十一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苏州府人口可达541万，松江府人口可达278万。据本卷第三章，乾隆四十一年两府人口分别为483万和215万。由此可见，屠城造成两府各自1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不足以对人口的增长速度造成很大的影响。以乾隆四十一年数据为基点，以3.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顺治三年(1646年)，苏州、松江两府人口分别为310万和138万，死亡人口多达250万。扣除屠城死亡的20万左右的人口，估计还有230万人口死于其他原因了。

乾隆《震泽县志》卷27《禎祥》称：“崇祯十四年大旱。府志云，四月至八月不雨。飞蝗蔽天，米价石四两。流丐满道，多枕藉而死。民间以糟糠腐渣为珍味，或屑榆树皮食之。”这是大旱造成的大饥荒。同书及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40《禎祥》又称：“崇

从人口增长率的异常变动中，发现了一段被湮没的史实：明代末年，江南地区遭到鼠疫的袭击，苏、松、杭、嘉、湖五府人口死亡达600万。

祯十五年春大饥，民多自投于河，哭声震道。”灾情延续到崇祯十五年，至崇祯十七年春“大疫，民呕血缕即死。叶志曰，是年春疫病大作，有无病而口中喷血即死者，或全家，或一巷民枕藉死，相率哀鬼神，设香案，燃天灯，演剧赛会，穷极瑰奇，举国若狂，费以万计”。从这一资料所描写的症状来看，此为肺型鼠疫无疑。吴又可在他的《瘟疫论》中称此为本地从未见过的外来瘟疫，结合本书第四卷的论述来看，此疫从北方传来，当无疑问。且因发生在崇祯十七年春天，与清兵南下没有关系。从北方至苏州，沿途鼠疫流行情况至今不明。

与北方情况类比，鼠疫流行导致的人口死亡数量多得惊人。苏州地区人口稠密，城市庞大。苏州城内发生肺鼠疫流行，死亡人口肯定不在少数。鼠疫也向南方传播。道光《震泽镇志》卷3《灾祥》称：“崇祯十七年春大疫，民呕血缕即死。”说明整个苏州地区都可能受到这一疫病的袭击。基于这一分析，对于苏州地区的人口损失，于此可得解释。

细查文献，我们发现崇祯十七年的鼠疫流行也传入了浙江北部。同治《南浔镇志》卷19《灾祥》称：“（崇祯）十七年春大疫，民呕血缕即死。”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光绪《乌程县志》。由此可见，鼠疫传入浙江湖州。目前虽然尚无证据证明鼠疫是否传入杭州和嘉兴，但从三府增长的相同速度这一点看，我相信浙北三府均可能遭受鼠疫的袭击。嘉兴府的鼠疫可能从松江府传入。基于这一分析，我认为明代浙江北部的人口增长速度与苏南相似。依苏州、松江例作同样分析，明清之际浙北三府人口死亡数量可达370万左右。合计苏、松、杭、嘉、湖五府人口死亡数超过600万，其中大部分死于鼠疫。

王士雄《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治法篇第二》指出：“按谈往云：‘崇祯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二月，死者数百万。十月间闽人晓解病由，看面有筋突起，紫者无救，红色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见繁，事始见杀。’”需要指出的是，上引地方志所载鼠疫为肺鼠疫，而吴又可、王士雄所载则明显为腺鼠疫，“疙瘩瘟”一名所指即是。上引地方志所载时间为崇祯十七

年春天，吴又可所载亦为崇祯十七年，王士雄所载则要早一年。具体过程，尚待进一步研究。王士雄为清代后期人，四代中医，祖籍嘉兴府海宁县，后移居钱塘，即今杭州，对于明末清初的瘟疫流行，他根据民间口碑所做记载应该是正确的。

作为反证，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同一时期严州府、绍兴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3‰和3‰。严州府未受战争与瘟疫的影响，其人口增长是平稳的。绍兴府在“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因地部山区“土寇”作乱，人口有所损失^①，故人口增长率略低。另外，同期宁波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台州府为2‰，其他各府不足2‰。浙江东部和南部地区人口增速偏低，对于其中大部分地区而言，与清兵屠杀及“三藩之乱”战争有关。

总之，排除大疫、大荒与大的战争的影响，明代浙江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可以定为3.4‰左右。大疫、大荒与大的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可以从长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的比较中看出来。

2. “三藩之乱”对浙江人口的影响

浙江金衢一带发生的战争远比广信为激烈。《清史稿》卷6《圣祖纪》的记载是：“赖塔击马九玉于衢州，复江山，九玉弃军遁。九月庚辰朔，赖塔进击，马九玉破之，复常山，进攻仙霞关。”地方志中的记载更为详细：

浙江衢州是“三藩之乱”的主战场之一。

照得浙东各府属自耿藩变乱，土寇蜂起，乡城百姓惨罹荼毒。然失陷各邑有旋失旋复，受惠较浅，独衢之江(山)、常(山)、开(化)三县，温之永(嘉)、瑞(安)等五县，处之云(和)、龙(泉)等七县，被陷三载，仇离困苦，备极颠连。又如西安县城(今衢州市区)郭虽存，而郊原或为贼据，或筑濠塹，以作战场。男妇流离，较与受害各邑相等。前蒙温州道详请自闽回处，惟见百里无人，十里无烟。^②

所以，在康熙中期的常山县城郊，“离城未十里，三五来迎者已为闽徽江右之垦户，无复土著之氓矣”。原有的土著大都在战争中死亡

^① 乾隆《绍兴府志》卷24《武备志》。

^② 康熙《衢州府志》卷5。

了。在浙江,类似的例子还可见于处州府云和、青田一带的河谷地带。云和县图书馆藏《木垟刘氏族谱》说:“我云蕞尔区,深山僻处。明清之际,兵匪蹂躏,继以彭、耿递变,起伏于我云(和)、龙(泉)、庆(云)、景(宁)之间,以致沿溪一带,尽成荆棘。”于是,这一区域也就成为战后移民的主要分布区。

台州地区所受战争影响甚大。在仙居县,有记载描述战后情况:“大兵恢复,已成空野空城,见经招回难民,合坊里烟户共计不及原数十分之二三,又皆妻离子析,其前赴寻赎,饿死道途者,又不知凡几,今见在惨伤难民男妇大小丁口,虽经安插在籍,其如糊口无资,啼饥之声不绝”^①,同书又称:“民死于贼者已十去六七”,“路绝行踪,村断烟火。从来被贼之惨,未有如此之久……本年(按:指康熙十四年)班师恢复,玉石俱焚,仙民之死于锋镝者无数。”^②

关于绍兴府和宁波府,除了上引记载外,另有资料称甲寅年间,“群贼出没不常,此剿彼掠,东堵西流。绍之余姚、上虞、新昌、嵊县,宁之鄞县、慈溪、奉化七邑之民,遍遭荼毒”^③。

金华府也深受战祸,东阳、义乌、永康、浦江四县县城被破。浦江县城五破五复。地方士绅联络社兵抗击“闽寇”,战事渐趋激烈,“闽寇”开始“入城”抢掠,并“愈肆焚掠”^④。地方随之残破。

更加详细地罗列各地战争的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如何估计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循着上文提出的思路,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浙江省2198.7万人口为基数,以3.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约有人口1576.5万。如本书第四卷所述,崇祯末年,浙江人口大约为2360万。这是明代浙江人口的最高峰值。在接下来的鼠疫、灾荒和屠城中,浙江人口大约死亡了400万人,顺治三年约有人口1960万。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3.4‰的人口增长率计,浙

① 光绪《仙居集》卷14,中国地方志丛刊本,附于光绪《仙居志》书末。

② 同上书卷15。

③ 宋汤建《荡寇记》,光绪《奉化县志》卷11《大事记·附录》。

④ 光绪《浦江县志稿》卷5《兵防》。

江人口约有 2150 万。与康熙十七年浙江人口比较，“三藩之乱”中的人口损失达到 570 万。据本卷第三章，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浙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如按此增长速度回溯，死亡人口数将更多。所以，本节估计可以视作一个死亡人口的最低值。

“三藩之乱”对福建、广东、四川乃至陕西等地的人口产生一定的影响，兹不详述。总起来说，至康熙十七年（1678 年），南方地区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人口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据本书第四卷第十一章，明代末年，北方（含四川）人口大约 4700 万，此一状况可能保持到顺治中期。从顺治中期至康熙十七年，以 7‰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北方人口可达 5600 万。如上文所述，从顺治初年至康熙十七年，南方人口大约损失 2000 万。明末南方人口约 10500 万，按 5‰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康熙十三年约有人口 12250 万。人口的增长与人口损失大抵相当。由于人口死亡与增长同时发生，所以这一估计还是相当粗略的。大致地说，康熙十七年南方、北方人口合计约为 1.6 亿。康熙十七年以后，中国人口走出明末以来的低谷，开始了新的发展。

康熙十七年中
国人口可能为
1.6 亿。

第四节 应该结束的讨论：丁的实质

在结束本章上述三节的讨论以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篇幅讨论清代初年的战争与人口的下降？在官修史籍中，是否存在可资利用的统计数据，以免除上文叙述和推算的烦琐？

这就涉及对清代文献中所载清代前期各种户口人丁数据的理解，也引出本节以下的话题。这是因为，直到乾隆后期，我们并无可靠的户口统计资料可供分析。清代前期册籍中所载“户”、“口”、“丁”，本质上都是一种纳税单位。有相当多的学者在不对何炳棣的研究进行质疑的情况下，或将“丁”视作男性人口，或将“丁”视作可以依据一定比例折算的人口单位。这一做法虽然是错误的，但却让我思考另一个问题，何炳棣的观点不易为许多学者所接受，是

否说明何的工作本身还存在缺陷? 仔细研读何著, 发现何所依据的资料大都是略嫌零碎的县级数据, 对于有关“食盐课”之类与户口统计有关的问题, 讨论也不够深入。因此, 本章利用省级资料对清朝前期的“丁”进行再讨论。其结果是从一个更大的角度, 证明了何炳棣的观点。笔者也希望“丁”——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不再困扰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者, 也为本卷以后各章的讨论, 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一、关于“丁”的争论

历史学界关于清代前期“丁”的争论由来已久, 兹将代表性的观点分述如下。

1. 萧一山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萧一山出版了他的名著《清代通史》, 在该书卷中第二编第八章中, 萧一山专门辟出专节讨论清代前期的人口问题。萧一山的观点可作如下概括。

其一, 清初赋役之制, 全部沿袭明万历一条鞭法, 而户籍制度, 亦仿明代里厢坊之制。初定为三年一编审, 顺治十三年改为五年一举行。编审方法: 由州县官吏, 照旧例缮造清册, 每110户为一甲, 丁多者十人为长, 甲系以户, 户系以口。城中曰坊, 近城曰厢, 在乡曰里。每县一册, 逐级上报。坊长、厢长、里长负编审之责任, 颇类于近世之户籍吏也。

其二, 编审的目的是为征丁赋而已。丁赋征法, 因其旧而各有不同。科则轻自每丁一分, 重至每丁四五两至八九两。以贫富为差, 别为等则。因丁银之重, 无怪乎逃户避差, 数丁纳一, 人口之无实, 因此而产生。

概言之, 萧一山认为清代前期的户口编审类似于明代的里甲编审, 而编审的目的在于征收丁赋, 故逃户避差, 人口无实。

2. 何炳棣的观点

何炳棣在其著作^①中, 专辟一章《丁的实质》讨论清代前期作

^① 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

为户口登记主要内容的“丁”的含义。“丁”的形成要追溯到明代后期，在进入16世纪之前，丁税已完全转入土地。官方的丁数与成年男性人口已经毫不相干。清代的“原”丁税额也是根据明末的统计数确定的。只要有可能，省和地方的官员都沿用明末的定额。因此，此后五年一度的丁口编审总数自然也并不能反映清初人口增长的实际。在清初的80年间，以摊丁入亩为主要内容的赋役改革将丁税和地税合二为一，就使得丁与成年男子人口在名义上也脱离了。所以，在不少地方，丁的计算中出现了小数点，或丁的统计单位为“升”、“合”、“勺”、“撮”等粮食单位。

何炳棣指出，以前的研究者一般都未作深入研究就全盘接受了“丁”的官方定义，即丁是16岁至60岁的纳丁税的成年男子。这一过于简单的定义的魅力是如此不可抵挡，以至他们就用清朝官方的丁数来复原中国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中国总人口。复原的方法“就是将某一年的丁数乘以4、5、6或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数字”。

很明显，何炳棣与萧一山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萧一山认为“丁”是承担赋役的成年男子，只是为逃避赋役的缘故，丁与真实的人口之间出现很大的差距。何炳棣则否定“丁”的人口含义，认为“丁”是一个自明代后期开始形成的赋税单位，与人口毫无关系，根据“丁”的数量去推测人口是没有意义的。

3. 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

成书于1959年的何炳棣的上引著作迟迟不为国内学者所知。20世纪80年代，马小鹤、周源和、郭松义、吴慧等人从事此项研究，也表示了对清代前期文献中“丁”的质疑，他们都认为“丁”仅仅是承担赋役的人口，并不是实际的人口数。然而，这些研究者几乎都认为可以通过一定的丁口比例求得清代前期的人口数^①。比较而言，这类研究与萧一山研究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只是在萧一山

国内许多学者将“丁”当作承担赋役的人口，企图据此求得真实的人口数。这一想法为何炳棣所否定。

^① 马小鹤《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郭松义《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吴慧《清代人口的计量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看来,由于逃避编审者太多,丁与真实的人口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比例。所以,萧氏从来没有打算通过丁口比的折算来推测人口数。而马小鹤等人则认为可以通过“丁”的数量来推算人口。

马小鹤等的研究思路虽然存在错误,但在没有机会读到何炳棣著作的时代,却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工作为破解清代人口之谜,同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一时代赵文林、谢淑君及何清涟等人的工作,大致处于同样的水平^①。与此同时,还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将“丁”当作真实的人口数,不加任何辨别地加以运用^②。

1987年,潘喆、陈桦主要通过大量县级资料证明何炳棣有关清代前期“丁”的观点的正确性^③。1989年,陈锋在未评述何炳棣著作的前提下,撰文认为清初的丁额“并不代表十六至六十岁的实际男丁人数,而是承纳丁银的人丁定额”^④。尽管如此,与何炳棣相比,潘喆、陈桦和陈锋等人对同一问题的证明,所用材料要丰富得多。1989年,何炳棣的著作在大陆翻译出版,葛剑雄、姜涛在各自的人口史著作中重申了何炳棣的观点^⑤。国内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何炳棣的观点,至今未有人对其提出有力的质疑与挑战。

然而,没有哪一个历史问题像“丁”的问题一样引起如此多的反复。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一直有人漠视何氏的工作,不断重复前何炳棣时代的观点,甚至一些专门的人口史著作也是如此^⑥。这些研究者轻信了清代所有的官方人口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其结果可想而知。也正是由于这

至今为止,仍有许多研究者在重复何炳棣批评过的错误,却未见有人对何炳棣的工作进行质疑和挑战。

-
- ①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②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 ③ 潘喆、陈桦《论清代的人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只是三年以后,陈桦在另一篇论文《清代户口统计制度的演变》中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清代“编审统计的对象不是全部人口,而仅局限于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即纳税应役的男子成丁”(《清史研究集》第七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 ④ 陈锋《也谈清初的人丁统计问题》,《平准学刊》第五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页。此研究可能是在未见何炳棣著作情况下的重复性研究。
- ⑤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
- ⑥ 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姚远《人口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类研究,使得有关清代中国“人口爆炸”的观点深入人心。

在近年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一书中,我们发现在该书的《明代编》和《清代编》中,作者对何炳棣的研究竟然不置一词。该书《明代编》将明代中后期的册载户口当作了真实的户口数,而《清代编》则认为:清代人口统计口径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顺治八年(165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人丁统计法,即只统计当时全国16岁至60岁的男性;二是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清末,统计对象为全国所有人口,时称“大小男妇”。为此,我与葛剑雄对这一研究提出批评^①,认为这一结论并无学术价值可言。

在以“编委会”署名的一篇反批评文章^②中,该书作者再次表明了对清代“丁”的观点。他们有关“顺治八年至雍正十二年的人丁统计法,即只统计当时全国16岁至60岁的男性”的说法,只是重复萧一山的观点。我和葛剑雄并非要对清政府制定的成丁标准作出什么别的解释,而是说,将人丁统计解释为对全国16岁至60岁的男性进行统计是前何炳棣时代的观点。如果认为何炳棣的观点有何不妥,可以进行分析批评,却不可以置之不理。至于“编委会”所称“清初部分年份《实录》丁数与《会典》丁口数的一致”,意义不明,根本就不能证明清政府的人丁编审既是清政府来了解人丁数量变化的方式,也是对纳税单位的反映。

笔者只想以此为契机,再一次就何炳棣40多年前已经证明的观点,作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实事求是地说,虽然何炳棣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他所依据的多为零星星的县级资料,其论证颇类似于举例子。如果采用同一方法,批评者也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来。因此,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探讨。笔者也希望能够结束这一本该结束的讨论。

二、各省“户”、“口”、“丁”的统计

清代前期各省的“户”、“口”、“丁”的统计既有共同点,又有不

① 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学术讨论应当是科学、积极和健康的》,《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同点。对大多数地区而言,一省之内的统计口径大体是相同的,故本节以省为单位展开讨论。又因清代前期的“户”、“口”、“丁”统计系统与明代的制度有很强的继承性,所以,对明代后期以来的制度进行分析也构成本节内容的一部分。

1. 作为货币和粮食单位的“丁”

何炳棣在《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中指出:

早在16世纪或者更早时,丁已超过户、口而成为登记数字中的核心部分……清政府承认户口编审早已陈旧失效,因此不得不以编审丁口来代替。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首次丁口的编审,以整数计达10600000。随着政权的稳定和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平的恢复,顺治十七年的全国总丁数达到19000000。由于平定南方三藩和忠于明朝的台湾的军事行动,17世纪70年代的丁数急剧下降。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南方叛乱平定、台湾被征服以后,丁数才突破2000万。以后丁数缓慢增长,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达到26400000。正如前面已经解释过的,这一时期的丁统计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只不过是赋税单位。唯其如此,有的地方的口统计数为“15232.6894664丁”^①就毫不奇怪。还会读到本年增丁“七升八合一勺九撮”^②这样的记载。更有甚者,丁数会出现15位小数点^③。

有些省以货币作为“丁”的计算单位。

从省级的数据看,有相当一部分的省是以货币来作为“丁”的计算单位的。各省情形分述如下。

乾隆《浙江通志》卷71《户口》引《赋役全书》:“原额户口人丁二百玖拾贰万捌千贰百贰拾肆丁口玖分贰厘陆毫……”然而,据上引潘喆、陈桦的研究,在浙江77个县级单位中,按田、食编丁的有48个,按人户编丁的有29个。潘喆指出,那些“以户作丁”的州

① 道光《保宁府志》卷22。

② 嘉庆《邳州志》卷17。

③ 道光《肇庆府志》卷3。

县，“不仅其丁不与实际户口相关，其户也并不与实际户口相关，因而不论丁还是户，都是不足为凭的”。对于我们来说，人户、田地、田粮是如何折算成银两的，尚不清楚。

乾隆《江南通志》卷74《食货志》：“顺治初年原额人丁四百一十五万一千六百六丁八分五厘，内除逃故无征人丁六十万三千四百六十二丁七分四厘……康熙元年审增七万七千二百二十丁八分六厘五丝。”

民国《湖北通志》卷43《经政·户口》：“清湖北户口原额并额外增益清出丁口共五十三万七千二百九十六丁五斗七升四合二勺。”

雍正《四川通志》卷5《户口》：“成都府属三十一州县全书开载：明季原额人丁一十三万九百五十三丁八斗……国朝以来陆续奉行清查至康熙六十一年征输止，查出土著自首开垦报部户名一十二万七十六户，人丁三万五千四百一十六丁四分三厘五毫八丝六微六尘九纤八沙九渺八末。”该志分府记载各地丁额，此不一一列举。

雍正《广西通志》卷30《户口》：“国朝原额人丁二十一万五千零四丁八分二厘零……康熙二十年至五十年审增人丁一万二千八百零一丁八分一厘。”

乾隆《福建通志》卷13《户役》称：“福建布政司旧管原额人户丁口共一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三丁口五分。”

雍正《山东通志》卷12《田赋志》称：“雍正十三年见在人丁，各州县科则不同，有分等则，人丁自伍分叁厘玖毫起至柒钱八分零不等，有不分等则人丁，每丁叁钱。其卫所人丁，每丁自贰钱起至叁钱伍分不等。”人丁有分等则的，也有不分等则的。虽然“雍正四年将人丁摊入地亩，统归地亩条编”，但据光绪《畿辅通志》卷96《经政三·户口》，“雍正二年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援照江浙等省之例将丁匠银两摊入地亩征。奉旨谕允，直属四十二万余两丁银均摊二百五万有奇，地粮之内每两计摊丁匠银二钱七厘零”。是将丁银平均摊入地粮之内，摊丁入亩与丁的等则毫无关系。由此可知，山东“丁”的等则划分证明其是一个以货币

也有些省以粮食作为“丁”的单位。粮食单位与货币单位之间可以进行折算。

计量的纳税单位。

总之,清代浙江、江南、湖北、四川、广西、福建和山东的人丁都是以折钞或粮食的形式出现的纳税单位。在这七个省份中,人丁不是人口,而是一个货币化的税额或应交纳的粮食额。这不仅是“原额”,而且包括康熙年间新增的“丁额”。如下文所述,广东、河南二省的情况也与此同。

四川的情况与其他六省稍有差异,明代末年成都府的原额人丁,是以粮食“斗”的单位出现的。至清代,“斗”变成了“钞”。在四川地区,粮斗与钱钞之间存在某种折换的比率,或许干脆就存在两种不同口径的税额。

“国初至康熙六十一年”查出的成都府的属户 12 万,与明末成都府的“原额人丁”数相近。但是,清代前期成都府的“人丁”仅有 3 万余,原因何在? 我的理解是,“国初以来”“查出土著自首开垦报部户名十二万七十六”是为了弥补明季原额人丁所作的努力,成都府的人口在明末大动乱中消耗殆尽,清代前期的“查出土著”即回归的流民,但是,尽管“户”的编审已接近明季的丁数,但要这些新编审“户”承担明季的“丁”额,显然是不现实的。直到康熙年间,四川的地方官仍在为招徕移民而努力。此时的四川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这一背景下,成都府的“丁”大大少于“户”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2. “食盐课”与妇女统计问题

洪武年间,政府按口配给食盐,征收盐课。以后,民户放弃支盐,而政府坚持收钞。食盐课因此而变成一项与盐无关的税。起初,这一名义上与盐有关的税是计“男子成丁妇女大口”的数量而征收的,为了征收食盐课,政府有必要对成年妇女也进行统计。有人甚至认为,为征盐课而进行的女口统计能够反映女性人口的真实情况。

以江西为例,康熙《西江志》卷23《附考》中记载全省各朝户口数。关于明代的则有:

明太祖洪武初江西布政司总计官民田地山塘……男子成丁壹百伍拾捌万叁千玖拾柒丁,妇女柒百玖拾贰万伍千壹百

捌拾伍口。（《林志》）

查阅林庭棊主编的嘉靖《江西通志》卷1《藩省·户口》，知此条记载中的“男子成丁”数即为洪武二十四年江西省的总户数，而所谓“妇女”数则为这一年的全省总人口数。同书同卷还记载神宗万历年间的男子成丁数和妇女数，也与上同。《西江志》的这一错误不知是如何造成的？万历《江西省大志》卷2《均书》称：

丁口：如男子成丁、妇女大口各若干是也。下款匹差银于□丁内起派，□项盐银于丁口内带征，半解南京，半存司库支放官军折钞等项之用。

男子成丁壹百肆拾捌万肆千肆百壹丁，妇女大口壹百叁拾壹万肆千陆百零陆口半。

万历年间江西的男子成丁数有所减少，但可以看出这一数据也是从明代初年的158万“户”变化而来的。妇女数是合理和正常的。男子成丁和妇女大口数的比例类似于真实的人口性别比。这似乎告诉我们，在江西，明初政府是按照每户一丁的标准确定成年男子的数量的。而在确定了成年男子的数量之后，再按照每户一个成年妇女的比例确定妇女大口。据此可以说，明初江西的男丁和女口与江西的户口呈某种结构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江志》将明初江西的户数作为男丁数并不能算是一个错误。

万历年间江西男子成丁数是从明代初年的“户”数变化而来的。

民国《庐陵县志》卷6《政要·盐钞》对此作了以下解释：

明初计口食盐，岁纳米八升，官支与食盐三斤。盐法既通，民复攸利。后乃盐数不支，纳米如故，而旧制废矣。天顺七年，奉户部江字号勘合，始改折钞，每里报名纳钞。无闰年有闰年纳钞有差。载王奎刊册。（万历《盐法志》）

旧案户口盐钞，其初为计口授盐之课，其后遂为里甲坐派之额，故王宗沐《大志》七书编入里甲均书之内，今并录上二条可以考见户口盐钞之原委也。此项今编入地粮实征。

明代中期,食盐钞成为一种与盐无关的赋税,即名义上对女口征收的赋税。

明代初年计口食盐,每口岁纳米八升,官支与食盐三斤。以后官盐不支,但纳米如故,后改折钞。这样,到明代中期,食盐钞成为一种与盐无关的赋税,即名义上对女口征收的赋税。入清此税仍然保持,康熙《西江志》卷23《田赋》称:

原额人丁壹佰伍拾叁万陆千贰百肆拾玖丁伍分外……自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伍拾年续增人丁壹拾柒万壹百壹拾贰丁伍分。

原额食盐课玖拾捌万捌千捌百贰拾口伍分,自顺治拾四年至康熙伍拾年续增陆万肆拾捌口。

实在人丁壹百叁拾万捌千柒百贰拾伍丁伍分,食盐课捌拾陆万叁千伍百陆拾口伍分外,原招棚民人丁壹百捌拾柒丁,食盐课壹百壹拾肆口。

康熙伍拾伍年编审滋生增益人丁伍千柒百捌拾柒丁,食盐课叁千叁百捌拾肆口。

清代江西人丁数接受了明代的原额。其本质仍是洪武年间的户数,与实际人口毫无关系。在经历了明代末年的社会动乱之后,无论是人丁还是食盐课都有所减少,其中食盐课的减少幅度较大。这一切,只能说明战乱之后,政府控制的赋税单位减少了。

对于清代新招的棚民,江西地方政府仍然按照与明代相同的口径来进行男丁和女口的编审。令人不解的是,江西土著人丁是土著食盐课的1.5倍,而棚民人丁居然也是棚民食盐课的1.6倍。地方政府对于食盐课的编审,可能也是按照某种比例和规定来进行的。只是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与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真实的户口数没有关系。按照我对移民史的研究,此处棚民,也仅仅是入籍的棚民,而非棚民之全部或大部。

总之,上引资料说明,在江西,只有明初的食盐课具有统计妇女大口的意义。以后,这一编审也转变成为与人口(或妇女)无关的赋役征收。

再看福建。乾隆《福建通志》卷13《户役》称:

福建布政司旧管原额人户丁口共一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

五十三丁口五分，内民户男子成丁六十八万八千三百九十六丁，盐户男子成丁四千六十三丁五分，灶户男子成丁七千七百六十六丁，民户幼丁六千二十丁，食盐课并不成丁七十四万一千三百九十六丁口，小口三百一十二口……

上引资料中不仅记载了民户的男子成丁数，而且记载了盐户、灶户之男丁。此外，“民户幼丁”及小口都不包括在“食盐课并不成丁”之内。这种人口分类的方法，从逻辑上讲是说不通的。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丁”已转化为纳税的货币。在这里，“丁”的人口意义已经褪去了，但由于不影响丁税的征收，也就不为人们所注意。

同治《广东通志》卷90《户口》称：

原额人丁一百三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九……实编一百一十二万四千八十八。康熙元年至十一年实在人丁共五十四万七千一百六十五丁四分四厘四毫二忽九纤，食盐课银四十九万一千三百一十口零七分三厘八毫五丝七忽二微三纤。

在这里，“人丁”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全体纳税单位，一是食盐课以外的纳税单位。广东的食盐课甚至不与女口发生联系，仅写作“银”，是一个税种。万历六年广东户数为五十三万余，令人联想到康熙元年的“实在人丁”就是万历六年的户数。一户即为一丁。

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的例子说明，清代初年的“丁”的含义是相当复杂的。在有些地区，丁是包括食盐课的，在有些地区，则不包括食盐课。同样，明代后期的“户”变成了清代初年的“丁”，其中不包括食盐课。而在另一些地区，明代后期的“户”变成了清代初年“丁”，其中却包括食盐课。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清代的“原额人丁”与明代后期“户”、“口”的关系。

3. “原额人丁”与明代后期户口数的关系

何炳棣指出：

像清初的地税额一样，清代的“原”丁税额也是根据明末的统计数确定的。只要有可能，省和地方的官员都沿用

从许多省级数据看，清代的“原额人丁”就是明代后期的定额。

明末的定额。在战争和迁徙后果严重的地区,则酌情削减。^①

为了证明这一点,何炳棣举湖广长沙府、麻城县、当阳县、陕西洛川县、江南上海县等地的例子作为证明。其实,在省一级的数据中,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例子。

如上引清代广西“原额人丁”为二十一万五千有余,而万历六年的广西“户”数为二十一万八千有余。毫无疑问,清代广西的“原额”沿用的是明代的定额。此外,上引资料表明,清代江西的“原额”沿用的也是明代“户”的定额。

万历六年云南的户数为十三万五千余,而据乾隆《云南通志》卷9《户口》,顺治十八年“人丁”数为十一万七千余,顺治年间的人丁与明代后期的户数大体是匹配的。

在万历《大明会典》中,万历六年的福建“口”数为174万,这是自明代初年在册的392万人口逐渐减少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至崇祯年间,福建的“口”数肯定要少于174万,乾隆《福建通志》卷13《户役》称:“福建布政司旧管原额人户丁口共一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三丁口五分”很可能从万历六年的174万“口”数中演变而来。这说明,清代的“旧管原额人户”即明代末年的在册“口”数。

府级的资料还可作资证明。乾隆《延平府志》卷14称:“隆庆六年七县户六万四千二百有五,口二十四万三百五十有五……国朝顺治七年七县户六万三千二十有三,口二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有四。”顺治年间的户数和口数与明隆庆年间的户数和口数大体相同。

然而,何炳棣面临的挑战是,除了山西、四川、湖广三省情况不详外,至少还有江南、浙江、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和贵州等七个省份清代初年的丁额与明代后期的“户”数或“口”数无法匹配。兹将这些省份的各项数据列如表2-1。

^① 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第31页。

表 2-1 明代万历六年“户”、“口”与清代初年“原额人丁”的比较

省名	户	口	原额人丁	备注
江南	2069067	10502651	4151606.85	
浙江	1542408	5153005	2928224.93	
直隶	425463	4264898		
山东	1372206	5664099	2306053.00	康熙五十年丁额
河南	633067	5193602	993017.00	
陕西	394423	4502067	2675047.00	折下下丁
贵州	43405	290972	158290.00	

资料来源：乾隆《江南通志》卷74；乾隆《浙江通志》卷71；雍正《山东通志》卷12；雍正《河南通志》卷23；雍正《陕西通志》卷24；乾隆《贵州通志》卷11。

浙江的“原额户口人丁”、江南的“原额人丁”以及山东的丁额，均大约是万历六年户数的2倍左右。这当然不能仅仅视作一个巧合。按照上引同治《广东通志》有关“丁”的定义进行思考，可以肯定，清代初年浙江、江南和山东的“原额人丁”，有可能类似于广东，包括了食盐课的纳税银。即此三省的“丁”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为男丁税额，一为食盐课额。

《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考》曰：“顺治十三年户部议定赋役全书内惟江西、福建、广东有妇女盐钞银，按口征派不等。他省无妇女名色，其盐钞银均派地丁内，仍照旧行。康熙十一年议赋役全书内直隶有流寓人丁，山西有久流、近流人丁，改为实在人丁，幼丁改为新编人丁。浙江等省妇女小口徭银改为食盐钞银。”又曰：“康熙十一年令浙江所属食盐钞银均摊入地丁征收。”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以外的省份，其赋役税额中，虽然没有妇女名色，但“其盐钞银均派地丁内”，盐钞银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未单列也未和妇女联系在一起而已。只有浙江出现过短暂的例外：一度将妇女小口徭银改为食盐钞银，旋又将其摊入地丁征收。看来，影响上述各省清初“原额人丁”与明代后期的“户”数不相配的因素，是“妇女小口”即“食盐课”的数量。

再看河南。雍正《河南通志》卷22《户口》称：

顺治十六年分见在活丁九十九万三千一十七丁。康熙九

年见在人丁一百一十五万九千四百九十六丁,内有康熙元、六两年编审自首人丁除顶补节年开除老故外,实增人丁一十六万六千四百七十九丁,内除优免外,实在行差共人丁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九百五丁。康熙三十年编审旧管活丁一百四十九万六千八百丁八分六厘三毫三丝……

“活丁”并不代表活着的成年男性,也是货币化的纳税单位。

顺治十六年的“见在活丁”易使人们产生错觉,似乎“活丁”代表的是活着的成年男性。读康熙三十年“编审旧管活丁”数,才知河南的“活丁”也是货币化的纳税单位。顺治年间的“活丁”可能是尚存在赋役载体的“丁额”,若加上赋役载体脱离的部分,其总额可能与明代后期的“户”数的2倍相差不远。如康熙初年经过两次编审,“实在行差共人丁”就达到了“一百一十”有奇,接近万历六年河南在册户数2倍。

陕西的情况较为特殊。从丁额本身看,它几乎是万历六年户数的6倍有余。然而,雍正《陕西通志》卷24《贡赋》称:“原额民丁共折下下丁贰百陆拾柒万伍千肆拾柒丁。”清代初年的“原额民丁”是折丁后的结果。丁分三等九则,以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为例,该县康熙五十年人丁编审时,“上上则十六丁,每丁一两二钱;中上则二十一丁,每丁一两……下下则二万二千九百零五丁,每丁五分”^①。上上丁的税额是下下丁的24倍。16个上上丁相当于384个下下丁。因此,经过折算后的清初陕西丁额是无法与万历六年的户数进行比较的。

贵州属于西南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其“丁”的确定与内地有很大的不同。乾隆《贵州通志》卷11《户口》称:“原额人丁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丁,内除九万六千六百九十八丁,原不编差,并随田带派,亦不征差外,实额编差人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二丁,内除节年清编抵补外,尚逃亡人丁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丁七分一厘一毫六丝。”贵州居然存在不编差的人丁,扣除之后,其纳税丁额与万历六年的户数也就相差不远了。

直隶的情况最为复杂。《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考》记载

^① 乾隆《怀庆府志》卷8《田赋》。

顺治十八年直隶人丁数为贰百捌拾伍万柒千陆百玖拾贰丁。光绪《畿辅通志》卷96《经政三·户口》引雍正《志》：

康熙十九年总计直隶人丁三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丁，内除优免人丁二万二千六十六丁免征外，实在人丁三百二十万一千八百一十四丁。内分供丁吏承丁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一丁，新更人丁九千七百四十九丁，灶丁七千一十丁，门头门丁三百九丁，行差人丁三百一十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四丁。

雍正二年总计直隶各府州人丁三百二十四万八千七百一十丁。

雍正十二年总计直隶人丁三百三十万五千八百八十八丁……

令人惊奇的是，在《四库全书》本雍正《畿辅通志》中，我们找不到这段记载。可能是光绪《志》的作者根据雍正《志》的分府数据累加而成。就上引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各类人丁的记载与其他地区颇有些不同。

畿辅的“丁”分为供丁吏承丁、新更人丁、灶丁、门头门丁和行差人丁五种。对于各种人丁所提供的力役种类，我们尚不知晓。但是，这一系列的“丁”与货币纳税体系的“丁”是明显不同的。畿辅的“丁”是功能性的，各类“丁”有着不同的用途，承担不同的力役，而货币化的“丁”仅仅是一个纳税的单位。是否可以认为，顺治元年，清政府对畿辅地区的人丁调查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问题在于，清初的“丁”究竟具有何种含义？为了说明这一点，兹将雍正《畿辅通志》卷31《户口》记载的顺治十八年分府人丁与万历《大明会典》记载的万历六年口数作一对比，详见表2-2。

表 2-2 北直隶万历六年分府口数与顺治十八年分府丁数的比较

府 州	万历六年 (1578年)口数	顺治十八年 (1661年)丁数	变化幅度(%)
顺天府	706861	104392	-85.2
永平府	255646	93591	-63.4
保定府	525083	417802	-20.4
河间府	419152	219705	-47.6

续表

府 州	万历六年 (1578年)口数	顺治十八年 (1661年)丁数	变化幅度(%)
真定府	1093531	1086299	-0.7
顺德府	281957	179437	-36.4
广平府	264898	276010	+4.2
大名府	692058	467242	-32.5
延庆州	19267	7709	-60.0
保安州	6455	5505	-14.7
合 计	4264908	2857692	-33.0

资料来源：万历《大明会典》卷19《户部》；雍正《畿辅通志》卷30《户口》。

顺天、永平两府的人丁数可能是成年男子。京畿地区的特殊性不具有推广的意义。

仔细比较,就会发现清代初年畿辅地区的“丁”是这样编纂的:保定、真定、广平、大名、保安等府、州的“丁额”大体与明代末年的“口”数相同或相近。由于表2-2所据已经不是“原额人丁”而是顺治十八年的“丁”数,因此,出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如此,直隶各府中,真定府的“丁”额几乎与明代万历六年的“口”数完全相同,表明在直隶,清代的“丁”额与万历六年的“口”有着某种联系。

尽管表2-2中的数据不是清初的“原额”,但对于顺天府和永平府来说,其“丁”额的下降幅度也实在是太大了。这两府深受明代末年战争和瘟疫的影响,人口死亡甚多,加之邻近京畿,顺治元年开始的丁口编审正是从这一区域开始的。因此,顺天、永平两府的人丁数可能正是16岁至60岁的成年男子数。这只是特定区域的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推广的意义。

正因为这样,何炳棣曾引北直隶陆陇其对省级官员的一份请求来说明当时的审丁:

审丁不宜求溢额也……窃观直隶各州县现在之丁已不为不庶,但求无缺亦足矣,不必更求溢额也……总之,宽一份在州县,即宽一份在穷民。^①

^①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3。

审丁的目的,竟然是不使实在之丁突破原额。为此,何炳棣无可奈何地评论道:“这类政治伦理尽管会使现代的人口统计学者头疼,却正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受益的因素之一。”^①

福建莆田人陈鸿、陈邦贤在《清初莆变小乘》中议及审丁的过程:

(康熙九年)十月,审丁。王公着照丁自填图冬,年貌、流寓、土籍俱不许遗漏。溢额甚多。未审,每丁三钱可以赂脱;既审,每丁五钱方能摘出。官吏分肥。

一旦出现了溢额,未审人的“丁”可以交三钱“赂脱”,而已编审成“丁”者则要交五钱方能除名。这些钱落入了官吏的腰包。陆陇其所说北直隶的审丁和福建莆田的审丁如出一辙,可以反映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丁”之编审。这也正是何炳棣强调“丁”只是一个纳税单位的理由。于是,在有些地区,溢出来的“丁”可能作为“私丁”记录在案,他们和“注籍”的官丁不同,不是国家掌握的纳税单位。

嘉庆《泾县志》卷5《食货·户口》称:

先是泾有官丁,有私丁。私丁无额,官丁注籍。不易计甲坐丁,征银无定式。有田连阡陌者,丁无一二者;有消乏之户,仍先人故册,粮去而丁尚存者。浮减隐匿,苦乐不均。绅民公吁知县,傅泽洪申请定制,丁派于田,以田之多寡限丁之数目,每田二十九亩零科征实在官丁一名。田如别卖,丁随田转。凡值编审之年,按册投送,制甚善也。雍正元年,通行丁随田办,而泾已久行之。

“丁”与田亩挂钩,与田赋互折。与实际人口毫无关系。在陕西,我们也见到类似的情形。“丁名”成为科举的资格,成为土著的一种权力,光绪《凤县志》卷3《赋役·户口》称:

境内土著甚少,其先年丁名虽产业变卖殆尽,仍留丁名,不肯除籍,为子孙应考计。丁名亦不常分,有同户分居多年共

^① 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第32页。

一丁名者,亦有偷卖丁名于邻邑,为隔县冒籍之渐。

是否存在与莆田审丁时相反的情况,即地方官员既不要人民“豁免”,也并不需要“分肥”,而是按照政府的要求认真进行16岁至60岁的成年男子数的清理和登记?光绪《邵武府志》卷7《户口》又引“旧志”,“顺治间原额及新增男丁合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五,原额及新增食盐课妇女口合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六,康熙二十年五十年七经编审,续增民丁一万五千六十九”。如果“续增民丁”指的就是“男丁”的话,那么男丁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7‰,这可能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看来,康熙年间邵武府的男丁编审具备了人口普查的意义。

在清代中期的地方志中,有时将成年男子或所有男性人口记作“丁”。使用资料时应特别注意。

这样的例子或许还能举出一些,但却不能推翻何炳棣关于清代前期中国的“丁”与人口无关,而是“纳税单位”的论断。本书关于清代人口的讨论,即在这一基础上进行。

最后,我还想指出的是,在清代中期的地方志中,尽管仍有不少“丁”或“人丁”的记载,却不再是清代前期的“丁”或“人丁”的含义了。一般说来,清代中期的“丁”或“人丁”都是指“人口”,有时指成年男性,有时指所有男性人口。具体分析,详见本卷各章的讨论。

第三章 清代中期南方分府人口

——江苏、安徽和浙江

第一节 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何炳棣指出：“总结过去五个世纪的中国官方人口数，可以说明太祖时期（1368—1398年）、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1776—1850年）间和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有用。乾隆六年至四十年（1741—1775年）间的数字尽管有很大的缺点，但还有些用处。”^①如果官方记载中的这一系列数字真的可用的话，那么，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及从乾隆五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在8.3‰左右，而从嘉庆十七年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却突然降到4.7‰；此后，从道光十四年到三十年（1850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4.4‰左右。从嘉庆十七年开始的年平均增长率突然下降，何氏将之归为“未经解释的缺漏，而不是人口的剧烈的变动”^②。很显然，何认为这种未经解释的缺漏，并不是真实的。在全国没有大的战争、灾难等影响人口发展的情况下，有理由认为这种年平均增长率的突然下降仅仅是统计数字的变动所致。为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人口数据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

何炳棣从制度史的角度确定了乾隆四十一年作为清朝人口数据第一个标准年份的合理性。

^① 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62页。

《嘉庆一统志》中有一些数据存在较大的错误。

鉴别历史文献所载户口数据真伪的五个基本原则。

有人曾试图利用调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方法对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全国人口数进行修正。这一做法遇到的麻烦是,到底采用什么样的增长率来取代现有的数值,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另外,所有的估测大都以《嘉庆一统志》的数据作为衡准,并不妥当。因为,虽然《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绝大多数是准确的,但其中仍有一些数字存在较大的错误。所以,在以下的几章中,我们将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即以省为单位,以分府的人口作为基础,讨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人口数。如上一章所述,乾隆四十一年,中国的人口统计已经完成了从“人丁”向“人口”的转变,这一时点附近的户口数,较之以前已可靠得多。《嘉庆一统志》所载户口不仅因为其可靠而被广泛引用,而且因为其有一套以府为单位的完整数据。和以前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正因为这两个年份的数据大致可靠,才将其作为户口数修正的前提。

本卷用来考察人口数据的方法,在《中国移民史》的研究中已得到过实验。大体说来,对于文献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可以依据以下几个原则鉴别其真伪。其一,正常和合理的户均口数应该为5,偏离的幅度不应超过20%,偏离太大说明这一数据可能有误。这一方法可称为户均人口分析法。其二,正常的人口性别比应在110左右,即110个男性,对应100个女性,偏离太大说明人口数据有误。这一方法可以称为性别比分析法。其三,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瘟疫、战争及特殊的生态变动的条件下,各区域人口应是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的变化是一个比较接近并且可以相互比较的值,差异太大,往往说明数据有伪。这一方法可以称为人口增长速度分析法。其四,在摒弃了伪数字之后,可以利用一些相对可靠地区的数据对其他地区的人口数进行推测。地区的单位可以是府,也可以是县。以府级数据进行类比,可以称为区域类比法;以个别或部分县级数据对府级人口数据进行推测,可以称为样本分析法。其五,我们已经证明洪武时期的人口调查是大体准确的,而1953年户口数字的准确性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已经重建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分府人口,而1953年的户口调查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一般说来,一个县或府

的人口在它所在的府或省中所占的比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值。这一原理也可用来鉴别户口数据的真伪并用于人口数据的重建,但由于影响区域人口变动的因素太多,对这一方法的使用应当是审慎的。只有当我们无法确定所研究对象的户数或口数哪一个更接近实际的情况下,才使用这一方法。这一方法可以称为不同时代区域人口比例分析法。

另外,上述各种判别方法不可以做绝对化的处理。举例说,在研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户均口数相当合理的地区,其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却并不合理,或者其人口性别比也存在问题。这一切,就需要我们对数据加以认真地分析,发现问题的症结并加以解决。

太平天国战争和其他战争或灾荒对人口的影响程度不一,有时候一府之中,人口死亡的程度也有差别,甚至有很大的差别,而这一切,都需要研究者在对人口变动背景有充分把握的前提下,对所有的人口数据加以审慎的思考。

为了达到重建府级人口数据的目的,我和我的研究助手遍查现存的各种地方志,从中收集一切有关户口的资料。理想的方法是:在以县为单位的基础上,完成分府人口数据的重建,在以府为单位的基础上,完成省级人口数据的重建。然而,乾隆时期的户口数据相当少,以致在许多地区,不得不通过举例子方法,即通过个别县的数据,对全府数据进行推测。而在有些地区,甚至没有一个乾隆年间的户口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邻近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来进行推测,就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所以区域类比法或样本推测法是最常用的方法。本卷对乾隆四十一年及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据的拟测仅仅是一种尝试,我期待出现更好的方法和更多的新资料。

第二节 江 苏

本节根据各种府志甚至县志中的零星资料,复原江苏省分府人口数据;并试图通过这一种复原,探讨出可靠的分析方法,以便

在同类缺乏资料的地区加以应用。

姜涛正确地指出,清代江苏省分为江宁布政司和江苏布政司。两个布政司有着不同的户口登记系统。这一观点,为笔者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的研究中加以应用。本节仍循此思路,对江苏户口数据展开进一步的细致的讨论。江苏人口重建的难点在于嘉庆二十五年江宁布政司的册载口数,是“丁”而不是口。而“丁”又不是上一章讨论过的纳税单位,却是人口中的一部分:男性或成年男性。将丁换算成口,则是本节的重点。本节不仅重建乾隆四十一年江苏分府人口,也对嘉庆二十五年分府数据作了较大的调整。

一、江宁布政司

1. 江宁府

《嘉庆一统志》及地方志所载江宁布政司所属各府州的“丁”不是纳税单位,也不是全体人口。

嘉庆《江宁府志》卷14《赋役》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年)“民丁男”为1889286丁,“军丁”^①为“十七万五千八十九丁一分”,嘉庆十四年(1809年)各州县“民丁男”2411290丁,“军丁男”204775丁。乾隆四十年“军丁”的记载中涉及到“一分”,似乎是一个纳税单位。但是,我们不能想象,至嘉庆时期,“军丁”的性质仍是纳税单位,而不是人口。再从数量上说,从乾隆至嘉庆,江宁府的“军丁男”的年平均增长率达4.6%,江宁一府的“军丁男”数多达20万,很难认为这一数据仍是清代前期那种固定不变的纳税单位。然而,嘉庆《江宁府志》所载绝不像是笔误。在完成了嘉庆十四年的各县军丁数的记载以后,《江宁府志》作者接着指出:“节年滋生民卫人丁贰百伍万贰千叁百玖拾贰丁玖分伍厘,而随田纳赋者犹止拾万柒千贰百柒拾叁丁之旧额也。”很显然,“节年滋生民卫人丁”数多达2052392,且不是“随田纳赋”的“旧额”。在“民卫人丁”之后,何以要多出一个“玖分伍厘”?减去“军丁男”的一分后,另外的“八分伍厘”来自何处?这一切,都不很清楚。

^① 明代的实土军卫大都在清代前期改为县,而非实土军卫则纳入府县系统。在清代中期非实土军卫地区的统计项目中,军卫屯丁仍保持其人口统计的独立性。

然而,无论“民丁男”还是“军丁男”,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口概念,而仅仅是一个包括部分人口——主要是男性(或成年男性)——的人口单位。关于江宁府人口与人丁的关系问题,我曾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十章中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但当时在研究中,并未发现嘉庆《江宁府志》有更为详细的资料。我当时所引资料为光绪《溧水县志》和光绪《高淳县志》中所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男丁”数,据此两县的“男丁”,推测嘉庆年间全府的“男丁”数约为207.3万,并认为这一数据“与《嘉庆一统志》记载的江宁府丁口187.4万相差不多,可见,《嘉庆一统志》中江宁府的‘丁口’实为‘男丁’而不是人口”^①。根据溧水、高淳两县“男丁”推得的全府207.3万“男丁”虽与《嘉庆一统志》所载不合,但是,却与嘉庆《江宁府志》所载全府民卫“男丁”数205.2万是相近的。事实上,《嘉庆一统志》“江宁府”条下,是没有记载屯(军)丁男的。

然而,按照嘉庆《江宁府志》卷14的记载,乾隆四十年的“民丁男”和“军丁男”合计达206.4万,嘉庆十四年更高达261.6万。嘉庆《江宁府志》所载205.2万“男丁”从总数上看来不是嘉庆十四年数,而更像是乾隆四十年数。嘉庆《江宁府志》记载有嘉庆十四年的分县丁数,兹列于表3-1并与1953年分县人口数对照,1933年的人口也可用作比较^②,但限于篇幅,不在表中列出。

嘉庆《江宁府志》所载嘉庆十四年江宁府的“军丁男”与分县累计数完全吻合,而“民丁男”数则相差339998,即34万。可见,上引嘉庆《江宁府志》所称205.2万“男丁”数与嘉庆年间分县丁数无涉。将1933年各县人口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与1953年比较,可以认为两个年份是大体一致的。在此暂不讨论民国年间的户口调查是否准确,只就各县人口比例的一致性看,也可以认为在这20年间,江宁府各县人口变动的幅度是大体一致的。

①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422页;并见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1933年数据引自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表 3-1 嘉庆十四年和 1953 年江宁府丁口

县名	嘉庆十四年(1809年)				1953年	
	民丁男	军丁男	合计	比例(%)	人口	比例(%)
上元	592486	16289	608775	26.7	1091575	35.8
江宁	707849	62611	770460	33.9	535717	17.6
句容	336968	821	337789	14.8	335547	11.0
溧水	159186	0	159186	7.0	222478	7.3
高淳	156535	0	156535	6.9	276994	9.1
江浦	48601	18346	66947	2.9	146626	4.8
六合	69667	106708	176375	7.7	436383	14.3
合计	2071292	204775	2276067	100.0	3045320	100.0

资料来源：嘉庆十四年数据引自嘉庆《江宁府志》卷14《赋役》。1953年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本卷中1953年数据皆来自此书，不另注明。

说明：

[1] 为了比较的方便，1953年的人口数按照清代“府”进行计算，行文中亦以府为叙述单位，本卷各章均同此，不另说明。

[2] 清代中期以后的各县疆域据张在普《中国近现代政区沿革表》，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本卷涉及政区者，如不注明，皆依此书。

[3] 因1933年和1953年皆有江宁县而无上元县，故将南京市人口计入上元，实际上与民国年间及1953年的南京市辖区与清代上元县境并不一致。而将上元、江宁两县看作一个单位，则是合适的。

在与1953年数据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清代数据的问题所在。

以此观点考察嘉庆十四年的各县“民丁男”比例，显然，江浦、六合两县“民丁男”的比例太低，仅占全府“民丁男”的10.6%，而在1933年和1953年，则占19%~20%。如果将江浦、六合两县丁数中加上此34万，两县民丁、军丁共占全府人口的22.2%，与1933年及1953年的比例接近。看来，江浦、六合两县的“民丁男”数确实存在漏记。

当嘉庆十四年江宁全府的丁数调整为261.6万时，上元、江宁两县丁在全府丁数中的比例就降为52.7%，与1933年和1953年的比例近似。句容丁的比例也降为12.9%，与1933年及1953年相差不多。而溧水、高淳两县丁的比例降低以后，与1933年及1953年的比例差距拉大。这令我猜想在分县数据少记的34万

“民丁男”中,也包括溧水、高淳两县少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正确的分县丁数恢复以后,各县丁数在全府丁数中的比例可能与1933年及1953年是接近的。这或许可以证明,嘉庆十四年江宁府的总丁数是正确的。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的研究中,我将溧水县、高淳县的“男丁”当作人口的一部分,并按照3.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嘉庆二十五年,两县合计“男丁”34万左右。1933年和1953年,溧水、高淳两县人口占全府人口14.3%和16.4%。我当时认为,溧水、高淳两县人口在江宁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大约为15%左右。然而,在进行估测时,我“假定嘉庆末年溧水、高淳两县男丁占江宁府男丁的16.4%,则当时江宁府的人丁数则约有207.3万”。现在看来,这一估测并不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做法应当是对这一比例的上下限进行估计,即也可以假设溧水、高淳两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14.3%,如此,嘉庆二十五年江宁府“男丁”总数为237.8万。这一估计已经接近嘉庆《江宁府志》中的“男丁”数了。

如果将溧水、高淳两县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七年“男丁”的年平均增长率设定为5‰,嘉庆二十五年两县“男丁”数为32.7万。此占江宁府全府“男丁”总数的14.3%,是年全府男丁数为228.5万。如果假定此数占江宁府“男丁”总数的13%,全府人口总数则为251万,与册载相近。由此可见,年平均增长率及溧水、高淳两县“男丁”在全府“男丁”比例的一些细微的变动,都足以影响对江宁府“男丁”总数的估测,只是影响的幅度并不很大。根据部分推及全体,推测的准确度取决于样本的大小。要做到精确的估计,当然是很困难的。

根据部分可推测全体,推测的精确度取决于样本的大小。

既然江宁府的“男丁”不是纳税单位,而是人口的一部分,那么,其数量就可以用来推测全体人口。推测过程如下:清代江苏存在两个布政司,一是江苏(苏州)布政司,一是江宁布政司,前者辖除江宁府以外的苏南各府,以苏州为布政司驻地;后者辖江宁府及苏北各府、州。将《嘉庆一统志》与嘉庆《大清会典》及《户部清册》所载数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江宁布政司事实上存在另外一个统计口径——“人口”。在《嘉庆一统志》中,江苏人口总数为

2645.8万,其中江苏布政司辖区人口为1603万。在有关移民史的研究中,我已经证明,江宁府以外的苏南各府,其“人丁”就是“人口”。因此,用江苏省的人口总数减去江苏布政司辖区人口,所得1042.8万人口即江宁布政司“丁男”。嘉庆《大清会典》中的嘉庆十七年江苏省口数为3784.4万,扣除《嘉庆一统志》中所载江苏布政司辖区口数,余2181.4万为江宁布政司辖区口数,是为《嘉庆一统志》中江宁布政司辖区口数的2.09倍。同样,在《户部清册》中,嘉庆二十五年的江苏口数为3951万^①,扣除上述江苏布政司辖区口数,余2348万为江宁布政司辖区口数,是为《嘉庆一统志》中江宁布政司“男丁”数的2.25倍。

在江宁布政司辖区中,每一个“男丁”对应着2.09~2.25个人口,但这只是针对整个江宁布政司辖区而言,并非专指江宁府。实际上,在苏北海门、通州一带,每一个“男丁”对应2.8~3.0个人口。下文将证明,扣除海门、通州不计,其他地区每一个“男丁”则对应2.13个人口。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我曾据此对1851年的江宁以及苏北各府人口进行推测。

《嘉庆一统志》中江宁布政司辖区的“男丁”何以会是全体人口的2.13倍。在《中国移民史》中,我指出:“由于至今为止还没有从地方志或其他文献中找到江宁、扬州等地每户男丁与人口比值为1:2.13的证明,所以上述有关计算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即咸丰元年江苏各地的口数总和与《户部清册》中江苏总口数4430.3万应当吻合。从人口学角度看,这一比例意味着每1个男丁同时对应0.8个妇女和0.33个幼童。假设一个家庭有2个成年男子,则意味着这个家庭有1.6个妇女和0.66个幼童,共4.26名人口。妇女、幼童的人口可能被低估,实际的家庭人口接近5人,符合我们关于中国家庭规模的基本知识。”据此,我估计嘉庆二十五年江宁府人口总数为399.2万^②。从这个角度讲,《嘉庆

① 《户部清册》数据引自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附录《1749—1898年分省人口统计》。本卷中的《户部清册》数据皆引自此书,不一一说明。

②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427~428页。

一统志》所载江宁布政司的“丁”是成年男性而非全体男性。

如果不采用《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作为推测的依据,那么,1:2.13这一男丁与人口的比值也就没有了意义。因为,这一比值是根据《户部清册》及《嘉庆会典》中数据与《嘉庆一统志》中数据的比值确定的。如果以嘉庆《江宁府志》所载为准,则必须采用其他推测人口的途径。嘉庆《江宁府志》中的“男丁”与《嘉庆一统志》中的“男丁”相差近74万之巨,除了漏记了“军丁男”之外,还很像是由于统计中口径不同造成的错误。府志记载的“男丁”有可能是全体男子,而非成年男子。所以,只能采用根据人口性别比的方法估计人口。

按110的人口性别比推测,嘉庆十四年江宁府有499.4万口。以同样的方法测算,乾隆四十年江宁府的口数约为394.1万。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十四年,江宁府民丁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2‰,军丁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我以为全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要达到7.2‰的速度是相当困难的。若为4.6‰,庶几适当。依此速度,嘉庆二十五年,江宁府人口约为525.2万,与根据《嘉庆一统志》数据所作推测相差整整126万口。《嘉庆一统志》漏载的20万“军丁男”,至嘉庆二十五年,将增至21.5万,折成人口,大约41万;而其他85万口,则可能是漏记的南京城市人口。正如上文所述,嘉庆《江宁府志》所载261.6万“丁男”的分县比例,与1933年和1953年的一致,其中也包括了南京城市人口的比例在内。这可以作为此推测的证明。

2. 扬州府

嘉庆十五年《扬州府志》卷20《赋役志》记载,乾隆四十年“核实人丁”2421015丁,嘉庆十三年“州县详报”共3473633丁。然而,《嘉庆一统志》所载扬州府的“丁”数只有3267522,比嘉庆《扬州府志》所载少20万。嘉庆《扬州府志》所载在前,《嘉庆一统志》所载为后,时代后者所载之“丁”竟然少于时代前者,误差也就很大了。

按照上文所述,将《嘉庆一统志》中的“丁”数按照2.13的比例折算成人口,则有人口696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估测,乾隆四十

年扬州府的实际人口为 515.7 万人,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十三年,扬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9.1‰。

这一过于迅速的人口增长速度令人怀疑,嘉庆年间的数据是否真实,就成为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兹将嘉庆十三年分县“人丁”列如表 3-2,并将其与 1953 年人口进行比较,或许可以获得对此疑难的进一步解释。

表 3-2 嘉庆十三年和 1953 年扬州府分县人口及其比例

县名	嘉庆十三年(1808 年)				1953 年	
	人丁	比例(%)	修正人丁(万)	比例(%)	人口	比例(%)
江都	523839	15.1	52.4	17.8	1383050	23.4
甘泉	469817	13.5	47.0	16.0		
仪征	366132	10.6	36.6	12.4	324887	5.5
高邮	277702	8.0	27.8	9.4	629834	10.7
兴化	312486	9.0	31.2	10.6	894890	15.2
宝应	304103	8.8	30.4	10.3	698092	11.8
东台	690305	19.9	44.6	15.1	913318	15.5
大丰					325808	5.5
泰州	524749	15.1	24.6	8.4	734617	12.4
合计	3469133	100.0	294.6	100.0	5904496	100.0

资料来源:嘉庆数据引自嘉庆《扬州府志》卷 20,其他同本卷表 3-1。

说明:

[1] 1940 年析东台、泰县、如皋三县置海安县,故将 1953 年海安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分别计入此三县。

[2] 1943 年析东台及兴化县置大丰县,故 1953 年大丰县人口的各一半划归此两县。类似疆域人口的处理,若与讨论无关,则不一一注明。

在未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的地区,人口不可能大幅减少。

在嘉庆十三年各县人口中,泰州和东台县的数据最令人怀疑。如果按照 1:2.13 的丁口比例推算,从嘉庆十三年至 1953 年,两地人口不增反减。两县并未受到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百余年间人口大幅减少是不可想象的。

光绪《泰州志》卷 9《赋役志·人丁》记载乾隆三十三年泰州户 120858,丁口 428347,并注明这是划归东台县之后的数据;嘉庆元

年户数为 128386, 丁口 794788; 道光元年, 户数为 137965, 丁口 1139251。又称, 乾隆四十年核实人丁共 626290 丁, 编户 137965。乾隆四十年的户数与道光元年完全相同, 虽然多于乾隆三十三年, 却少于嘉庆元年。从这一系列数据中可以发现, 乾隆三十三年以后, 泰州的户数虽有变化, 但变动不大, 而丁口却在猛增。从乾隆三十三年至嘉庆元年再至道光元年, 丁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分别为 23.1‰ 和 14.5‰, 增速之高, 令人无法相信。从这个意义上说, 乾隆四十年的丁数也是无法相信的。

过高的增长率
也表明数据有误。

正因为光绪《泰州志》所载有户又有丁口, 所以, 该志所载丁口实为人口而不是男丁。嘉庆《扬州府志》所载嘉庆十三年泰州丁数为 524749, 远较光绪《泰州志》所载为少, 可能是府志作者对县志夸大记载的一种修正。但无论如何, 这一数据所代表的是“丁口”即人口, 而不是“男丁”。如果按照 1:2.13 的比例折算为“男丁”, 嘉庆十三年泰州的“丁”数只有 24.6 万。

嘉庆《东台县志》卷 16《赋役·丁口》记载乾隆四十年丁男为 372786, 嘉庆二十一年户数为 215219, 丁男 485151, 未成丁者 358912, 妇女大小 471911, 合计人口为 1315974, 户均口数为 6.1, 性别比高达 178.9。户口数据的不合理, 于此可见。又因为上述嘉庆《扬州府志》所载东台县志丁数过高, 所以, 以乾隆四十年东台县丁男数为基数推测, 设其年增长率为 5‰~6‰, 嘉庆十三年东台县的丁男数约为 44.6 万。

其他县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嘉庆《高邮州志》卷 3《民赋志·户口》记载“乾隆三十七年逐年清查男妇数目, 据实造具, 是年实在人丁”187143, 自此以后有历年人丁之记载, 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数在乾隆三十七年数上稍有增加, 至乾隆四十年则升为 245318, 自此以后, 又是每年在前一年的数字上略有增加。关于这类记载, 何炳棣先生已有分析。大致说来, 乾隆四十年的人丁数突然上升, 完全可能因统计口径变化所致。只是因高邮州人丁的升幅不大, 我更愿意将其视作就在这一年朝廷有关户口调查的新的命令下达之后, 地方官员认真清查所致。此后, 这一工作又成为虚应故事。将乾隆四十年数据与表 3-2 中所载相比, 高邮州的人丁

乾隆四十年人
丁数突然上升,
可能因统计口径
变化所致。

记载是合理的。只是要指出的是,乾隆四十年的高邮州人丁并非全体人口。

江都县的情况如同高邮。嘉庆《续江都县志》卷2记载乾隆八年至六十年,实在人丁491015,嘉庆元年至十五年,实在人丁846005,其中男532907丁,女313908丁,男丁数与表3-2相比稍多,是因其时间晚两年所致。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如果说从某年至某年,实在人丁或滋生人口有多少,一般是指期末人丁或人口。在这里,乾隆六十年的数据为男性,而嘉庆十五年则为全体人口。只是嘉庆十五年人口性别比高达169.8,女性人口严重低估。

在对泰州和东台县的丁数调整之后,嘉庆十三年扬州府之“丁”数只有294.6万。与《嘉庆一统志》相比,嘉庆《扬州府志》的记载变得合理了。从嘉庆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扬州府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7%。但是,鉴于这一年均增长速度太高,我怀疑《嘉庆一统志》所载仍有误差,即存在与嘉庆《扬州府志》性质相同的某些误差,只是程度稍轻一些罢了。

以高邮州为例,从乾隆四十年24.5万增加至嘉庆十三年27.8万,丁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8%。再以江都县为例,从嘉庆六十年至嘉庆十三年,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若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五年,则为5.5%。从两县丁的增长速度看,《嘉庆一统志》所载丁数已有所高估。这种高估可能是因某些县的记载“口”而非记载“丁”所导致。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嘉庆二十五年扬州府的实际丁数应为312.8万。

根据修正后所得嘉庆十三年扬州府294.6万总丁数,再来讨论其他县的丁数。清代江都、甘泉两县是扬州府的附郭,甘泉县于1912年撤,并入江都。为了统计的便利,在进行1933年人口分析时,将扬州城市人口计入江都。也就是说,1808年的江都、甘泉两县即1933年和1953年的江都和扬州市,亦即表3-2中的江都。按照调整过的扬州府总丁数,1808年这一区域的丁占全府人口的33.8%,至1933年及1953年降低至23%左右。江都一带人口比例的降低,实与扬州城市的衰落有关。据本卷第二章的研究,清代中期扬州城市人口可达40万人以上,而至1953年,扬州市人口只

有 18 万余人,远不及清代中期之规模。同样,嘉庆十三年仪征丁的比例从 12.4% 降至 1933 年和 1953 年 4% 和 5.5%, 下降幅度也是惊人的,除与太平天国战争有关外,也与盐业经济的衰退及仪征城市的衰败有关。

以扬州、仪征两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衰退,使得 1933 年及 1953 年扬州府西部地区的人口比例明显降低,导致扬州府东部地区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只是在 1933 年的人口统计中,东部地区的东台和泰县人口有夸大的可能。将大丰县人口分别计入两县后,两县人口仍分别超过 1953 年,似不可能。

按照每丁对应 2.13 口的比例,测得扬州府乾隆四十年人口约为 515.7 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 666.3 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8‰。

3. 通州和海门

光绪《通州志》卷 4 记载了乾隆四十年通州、泰兴、如皋三县的“滋生丁口”。见表 3-3。泰兴县的丁口太少,令人怀疑其中有误。将乾隆四十年(1775 年)、1933 年和 1953 年的通州各县丁口数及其各自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并在一起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表 3-3 乾隆四十年、1933 年和 1953 年通州分县丁口

县名	乾隆四十年(1775 年)		1933 年		1953 年	
	丁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泰兴	89251	15.1	952713	25.5	1051742	24.2
南通	262451	44.4	1358461	36.3	1238605	28.5
如皋	239175	40.5	1428304	38.2	1170739	47.3
如东					892240	
合计	590877	100.0	3739478	100.0	4353326	100.0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年数据来自光绪《通州志》卷 4《民赋志》。1933 年数据引自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第 69 页。

说明:1904 年划丹徒、丹阳和泰兴县立扬中县,故将扬中县 1933 年及 1953 年人口的三分之一划入泰兴。1953 年海安人口的三分之一划入如皋。民国分如皋为如东、如西。

1933年泰兴县占通州人口的25.5%，1953年占24.2%，乾隆四十年泰兴县“丁口”数被严重低估。如果乾隆年间泰兴在通州三县中所占比例与1933年及1953年相似，至少应有“丁口”16万。我怀疑泰兴“丁口”数在“八万九千二百五十一”之前漏掉了一个“十”^①。如是，通州三县“丁口”可能达到69.1万。

同治《如皋县续志》卷2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年)如皋县有113.7万口。民国《如皋县志》卷4记载道光九年如皋县“丁口”21.4万。前者是人口，当无疑问，后者应为“成年男子”，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只是道光九年如皋县的丁数竟少于乾隆四十年，所以无法根据其推测人口。

同治《如皋县续志》卷2还记载了同治四年如皋县人口增至117.2万，道光三十年至此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又据民国《如皋县志》卷4，宣统二年(1910年)“实在男丁”771500，又称“邑民大率三男二女，女口未载”，据此全县男女人口约为128万，按照正常的性别比则有人口140万。由于同治四年的人口性别比也未必是正常的，以128万人计之，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与上阶段基本相同。

据此增长率可以推测嘉庆二十五年如皋县口数约为107万。《嘉庆一统志》记载的通州“丁口”只有98.3万。1933年如皋县人口占通州人口38.2%，推测嘉庆末年通州人口应为280.1万^②。据此，可知嘉庆二十五年通州“丁口”与人口之比，约为1:2.8^③。以此标准折算，乾隆四十年通州人口总数约为193.4万。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通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3‰。这一估算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问题在于乾隆、嘉庆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太高，而嘉庆以后的人口增长速度过低。

① 同一记载还称“嘉庆十四年滋生丁口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不明其意。

② 笔者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的计算中未考虑泰兴县划给扬中县的人口，如皋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为39%，与此稍有出入。

③ 这一测算过程之所以不采用1953年的人口比例，是因为1945年如东县的设立，改变了清代的政区。1953年如东、如皋两县人口占清代南通地区人口总数的45%。而上引泰兴县例子来看，通州各县人口的比例可能并未变化，变化了的可能仅仅是政区。

光绪《海门厅图志》卷11《赋役志》记载了从乾隆三十五年至光绪十七年共14个年份的“男女丁口”数。这一系列的数据存在问题,乾隆六十年以前数极低,不予考虑,乾隆六十年至道光十二年5个年份共4个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3.2‰、13.9‰、14.3‰和21.9‰,增长率太高,令人怀疑其数据的真实性。此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逐步降低,从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八年,“男女丁口”从78.3万增加至84.7万,年平均增长率为3.4‰。以此数回溯于嘉庆二十五年,海门厅的“男女丁口”应为72万左右。然而,《嘉庆一统志》所载海门厅的“丁口”只有24万。因此,可以判定这24万“丁口”实际只是“男丁”,即人口的一部分。此“男丁”与该县实际人口之间的差距约为3倍,故此“男丁”很可能为“成年男子”数,不包括男性幼童。以4‰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海门厅的实际人口约为57万。

4. 海州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15记载的所属三州县“人丁”或“男丁”数,列如表3-4。

表3-4 乾隆四十年、嘉庆九年海州的“人丁”与“男丁”

州 县	乾隆四十年(1775年)	嘉庆九年(1804年)	
	男 丁	人 丁	男 丁
本 州		504881	257420
赣 榆	93680	213677	111953
沐 阳	215965	433873	227437
合 计		1152431	596810

资料来源: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15。

《嘉庆一统志》记载的海州“丁口”数为585480,实际只是表3-4中的“人丁”数的一半。嘉庆九年海州的“男丁”占“人丁”总数的51.8%,表明“人丁”的其他部分应是女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作者将统一上报的“男丁”作为“人丁”的一部分,妇女不在“人丁”之列。江宁布政司只上报“男丁”数,就使得这一区域的人

口统计缺乏“男女”、“人口”的基本概念。如果将“男丁”之外的“人丁”当作女性,则人口的性别比为 107,接近标准的男女性别比例关系。

据表 3-4,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九年,赣榆、沐阳两县男性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9‰。乾隆四十一年海州总口数大约为 103.3 万。依此速度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海州人口约为 122.6 万,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7‰。

5. 徐州府和淮安府

淮安府及属县的户口数据至今未有查获,徐州府却见有二。民国《宿迁县志》卷6《民赋志》载:乾隆四十年有 258061 丁,乾隆六十年有 320767 丁,咸丰十年通共丁口 1268071,其中男丁 760810,咸丰十二年有 1098884 丁,其中男丁 659330。宣统二年的“丁口”数是分乡统计的,共计 589233。这一系列的数据变化太大,令人目不暇接。至 1933 年,宿迁人口为 670941,1953 年降至 585827。1953 年宿迁县人口的减少,与新沂县设立时划出一部分人口有关。根据 1953 年的人口数,可以判断咸丰十年的所谓“丁口”数是错误的。

从乾隆四十年至乾隆六十年,宿迁“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1.5‰。从乾隆六十年至宣统二年,宿迁“丁”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3‰。我以为乾隆四十年“丁”数偏少,乾隆六十年“丁”非丁,而是人口。徐州府的上报数据与江宁等府、州并不是同一个口径。

民国《邳志补》卷7《田赋》记载乾隆四十年“民数男丁”141093,“卫丁”16242;嘉庆十四年(1809年)民丁增至 472685,卫丁增至 68855。嘉庆年间的“民丁”和“卫丁”可能已是人口。1953 年邳县人口为 683113。从嘉庆十四年至此,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6‰。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偏低,可能与同治年间捻军对邳县地区的多次骚扰有关。

将时间统一至嘉庆二十五年,宿迁、邳州两州、县人口可能达到 91 万左右。然而,《嘉庆一统志》载徐州府有“丁”184 万,宿迁、邳州两州县人口占有全府人口的半数,显然是不可信的。按照

1953年各县在全府人口总数的比例,宿迁、邳州和半个新沂县合计占全府人口总数的27%,据此比例推测,嘉庆二十五年徐州府应有人口337万。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以3‰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295.4万。

事实上,嘉庆二十五年徐州府的实际人口只是册载人口的1.83倍,而非南部诸府、州的2.13倍。根据本卷第十一章的论述,淮安府的人口类型与徐州府相近,因此,以同一比例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淮安府人口为300万人,乾隆四十一年为263万。

二、江苏(苏州)布政司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除靖江、崇明及上海等县外,江苏布政司所属各县人口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在这一区域,战后的任何一个户口数据,都无助于我们对战前人口的分析。本节只能根据战前资料本身进行人口及人口增长率的讨论。

1. 苏州府和松江府

同治《苏州府志》卷13记载嘉庆十五年、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的“人丁”数分别为319.8万、338.8万和341.3万,同时又记载嘉庆二十五年苏州全府男丁、女口总数为590.8万,并附有分县男丁、女口数。将《嘉庆一统志》中苏州府“丁口”原额43.9万与“滋生”部分的547.6万相加,即为591.5万,与府志记载的人口数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嘉庆一统志》中记载的苏州府人口不是“丁”,而是真正的人口。何以《嘉庆一统志》中苏州原额“丁口”与“滋生丁口”相加竟然与地方志中的人口数相等,尚不清楚。一般说来,“原额丁口”在人口统计中是没有意义的。

《嘉庆一统志》所载苏州府人口不是“丁”,而是真正的人口。

嘉庆二十五年苏州府每“丁”对应1.74口。据同理,嘉庆十五年苏州府口数为557.7万。从嘉庆十五年(1810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苏州府男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3‰。以此数回溯,乾隆四十年苏州府人口为511.1万。

在没有任何县级资料的松江府,只能根据苏州府的情况进行类推。《嘉庆一统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松江府的口数为263.2万,乾隆四十一年则为227.7万。

2. 太仓州

迄今查获的仅有镇洋县的户口数。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卷7《赋役·户口》的记载相当混乱。如乾隆六十年与嘉庆二年的户数完全相同,仅口数略有变化。如同治八年户数为22172,口数为131542;光绪七年,户数增加至31323,口数增加为164495;以后,光绪二十年、光绪三十三年和宣统二年,户口数均不及光绪七年。1912年,镇洋县撤县,并入太仓,故无法用民国年间的数据进行对比校正。

民国《镇洋县志》卷4《赋役·户口》记载的数据属于另一系列。乾隆二十年,户数43046,口数146894;乾隆三十六年,户数50192,口数165175。户均口数太低,均无法使人相信。

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载乾隆六十年45528户、199312口,户均口数为4.4,比较合理。将两部县志所载口数综合起来考虑,从乾隆二十年至三十六年,再至六十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4‰和7.9‰。

鉴于镇洋县的这一系列数据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一口的增长速度并不能得到确认。姑且按照镇江府和常州府的情况,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嘉庆二十五年太仓直隶州人口数为177.2万,乾隆四十一年,太仓州人口数约为142.3万。

3. 镇江府

嘉庆《溧阳县志》卷6《食货志》记载乾隆六十年溧阳“实在男丁”317564,嘉庆十六年“户”50845,“丁”624581,其中“男丁”363405,“妇女”280976。溧阳的例子证明,镇江府也存在两套统计口径,一为男丁,一为全体人口。包括全体人口的“丁”,竟然也是“妇女”的代名词。与江宁布政司不同的是,嘉庆年间的数据中,不再有单纯的“男丁”。

据《嘉庆一统志》,嘉庆二十五年镇江府人口为219.5万。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六年,溧阳县“男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9‰。以此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镇江府总人口数为177万。

4. 常州府

常州府属靖江县僻处长江之北,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独得保全。该县丁数也较其他各县为完整。光绪《靖江县志》卷4《田赋·户口》记载了乾隆三十年以后若干年份的“人丁”数,除去乾隆三十年和三十五年两个年份不计,乾隆四十年、四十五年、五十五年、道光十八年和同治四年的“实在人丁”分别是 136691 丁、139857 丁、150604 丁、216346 丁和 244310 丁,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5‰,乾隆五十六年至道光十八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 7.6‰,道光十九年至同治八年降为 4.5‰。以乾隆四十年至道光十八年为一时段,“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1‰。

《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嘉庆二十五年常州府人口为 389.6 万。以 5.1‰年平均增长率为标准进行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常州府人口总数为 311.5 万。

三、结语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江苏省分府人口,列如表 3-5。

表 3-5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江苏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江宁府	394.1	12.2	525.2	13.3	304.5	7.4
扬州府	515.7	15.9	666.3	16.9	631.6	15.3
通 州	245.5	7.6	280.1	7.1	436.5	10.6
海门厅	57.0	1.8	72.0	1.8	136.7	3.3
海 州	103.3	3.2	122.6	3.1	260.6	6.3
徐州府	295.4	9.1	337.0	8.5	554.3	13.4
淮安府	263.0	8.1	300.0	7.6	539.6	13.1
小 计	1874.0	57.8	2303.2	58.4	2863.8	69.4
苏州府	511.1	15.8	590.8	15.0	313.2	7.6

续表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松江府	227.7	7.0	263.2	6.7	202.7	4.8
镇江府	177.0	5.5	219.5	5.6	187.9	4.6
常州府	311.5	9.6	389.6	9.9	442.3	10.7
太仓州	142.3	4.4	177.2	4.5	119.4	2.9
小 计	1369.6	42.2	1640.3	41.6	1265.5	30.6
合 计	3243.6	100.0	3943.5	100	4129.3	100

说明:

[1] 本表标准时点定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文献中的数据年份在此标准年份左右($\pm 1\sim 3$ 年)的,皆不予调整或修正,因为两个年份的数据本身就是估计数,年份相差不大,并不影响准确性。超过这一范围的,则根据年平均增长率予以调整。本卷各表皆依此,不另说明。

[2] 1953年的松江府人口中,不包括上海市人口,而包括1953年5月划给浙江省的嵊泗县人口。

[3] 民国以来新沂、扬中、海安等县的设置是跨府的。在1953年的人口,根据母县数量,将新设县划分为相应的份额,以此复原清代政区内的人口。以后各表均如此,不一一说明。

就江宁布政司辖区而言,1776年及1820年江宁府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较1953年为高,是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果。虽经战后几十年的恢复,但人口仍未达到战前的水平。从1776年至1820年再至1953年,扬州府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大体不变,人口数量也几无变动。百余年来的人口增长为太平天国战争及漕、盐衰落的人口损失相抵消,大致代表了江苏省人口变动的平均水平。

1953年徐州、淮安两府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是因为两府没有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其人口的增长虽然不快,但相对其他地区的人口减少来说,其人口比例的增加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海州、通州和海门三地人口比例的增加,均与此同。相反,1953年苏南各地人口比例的下降,则是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果。

在江苏布政司辖区,除常州府外,其他各府1953年人口均不及嘉庆二十五年。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区域人口损失,将在本卷

第十一、第十二章加以专门论述。

根据表 3-5, 可以引出以下结论。

其一,《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所载乾隆四十一年江苏人口为 2880.8 万,与表 3-5 中估计人口相差 362.8 万,差额高达存在 11.2%。究其原因,除了因“军丁”漏载产生的差额外,还包括对南京城市“丁男”的漏记。《嘉庆一统志》的漏载人口也主要由这两类人口构成。《嘉庆一统志》的“江苏统部”只记载了“苏太等卫屯丁男妇”共 62739 人,包括苏州卫屯丁、镇海卫并金山帮屯丁及镇江卫屯丁。江宁布政司所驻军卫屯丁一概漏载。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除了嘉庆《江宁府志》所载“军丁男”外,还有民国《邳志补》所载卫丁。具体丁数见上文所述。就此而论,遗漏的卫丁数量将是可观的。

嘉庆《大清会典》中的嘉庆十七年江苏省口数为 3784.4 万,扣除《嘉庆一统志》中所载江苏布政司辖区口数,余 2181.4 万为江宁布政司辖区口数,本节推得江宁布政司人口为 2303.2 万,将时间统一到 1820 年,两套数据基本一致。同样,《户部清册》所载嘉庆二十五年江苏人口为 3950.9 万,与本节推算所得实际人口 3943.3 万基本相同。

其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江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5‰。分区而论,江宁布政司人口增长速度稍快,为 4.7‰,江苏(苏州)布政司稍慢,为 4.1‰。分府而论,扬州、江宁、镇江、常州及太仓诸府、州的人口增长速度较高,而其他地区则较低。其中原由,并不知详。

何炳棣指出:“乾隆四十年和四十一年统计数差别也几乎达到 20%。这是因为一个人口统计的新时代刚开始时必有不可避免的混乱和少量遗漏。乾隆四十一年全国人口总数即同样多少低于实际,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乾隆六年至四十年间的实际人口至少要比官方统计数高 20%。但我们不能因此即认为在这三十四年间这一差异都是一致的,也不能将这大致的百分比当作复原人口的坚实基础。”^①就全国情况而言,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户口

文献中的乾隆四十一年口数可能漏载了军卫及南京城市人口。

^① 何炳棣《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第 45 页。

数据错误要比乾隆四十一年以后大得多。然就本节的分析来看,《清朝文献通考》中乾隆四十一年江苏省的乾隆年间的户口数据与实际人口的误差相当大,主要由军卫及城市人口的漏载所造成。

第三节 安 徽

一、皖南地区

1. 宁国府

宁国府属六县,大部分处于皖南丘陵山地,小部分处于长江下游平原。嘉庆《宁国府志》载有各县自乾隆三十二年至嘉庆十年若干年份的户口数,乾隆三十二年的数据无户数记载,无法与以后的记载进行对比。从年平均增长率指标判断,这一年的户口数过低,不予讨论。择其中乾隆四十四年及嘉庆十年两个年份的数据,列如表3-6。

表3-6 乾隆四十四年、嘉庆十年宁国府分县户口

县 名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嘉庆十年(1805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宣 城	173760	733966	4.2	241835	1016975	4.2
南 陵	88496	411904	4.7	92112	503040	5.5
泾 县	80785	417309	5.2	99749	525356	5.3
宁 国	34492	290754	8.4	34938	301412	8.6
旌 德	45731	243459	5.3	49059	373618	7.6
太 平	41357	250219	6.1	42910	272677	6.4
宣州卫	504	4548	9.0	918	6090	6.6
合 计	465125	2352159	5.1	561521	2999168	5.3

资料来源:嘉庆《宁国府志》卷18《食货志·户口》。

说明:各县乾隆时期户口登记的具体年份有些差异,但大体围绕乾隆四十四年。

太平天国战争对皖南地区的影响甚大。就宁国府而言,各县所受兵燹及瘟疫危害的程度几乎是相同的。因此,宁国府

用区域类比法
来甄别数据真伪。

1953年各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应该与战前相同。如嘉庆十年，宣城县的户数在全府户数中所占比例为43.1%，与1953年相似，即是此理。然而，是年宣城县人口所占比例却只有33.9%，户数准确而口数偏低。乾隆四十四年，宣城县户数比例为37.4%，与1953年已有差距，但差距不算太大，口数比例仅有31.2%，较1953年相距甚远。很显然，宣城县这两个年份的户均口数均被低估。调整的方法是将宣城县以外各县的户均口数当作宣城县的户均口数，以此对两个年份的宣城县人口数进行修正。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陵。1779年南陵县户的比例为19%，与1953年相近，而口的比例却因为户均口数的偏低而只有17.5%，低于1953年。在1809年的数据中，南陵的户均口数上升到5.5，可能是对原有错误的纠正。依此户均口数对1779年的口数进行修正。

与1953年的人口比例相比，1779年宁国县的户口数都显得太低。直到1809年，宁国府的人口比例才有所上升，但与1953年的比例仍有差距。所以，宁国县户均口数的过高反映的是整个数据系统的错误。据民国《宁国县志》卷4《政治志·户口》，在乾隆、嘉庆年间有户口记载的15个年份中，其户数始终是3.4万余户，人口始终是29万~30余万，每年出现一些微小的增加。至道光元年，其户数降为33733，口数降为294908。宁国县的户口数有人为编造的痕迹。宁国县户数和口数均存在很大的问题，无法修正。

与宁国县相反，1779年太平县的户口比例显得太高，直到1809年才有所降低，似乎反映了该县人口数据趋于真实的迹象。仔细分析，在嘉庆《宁国府志》中，乾隆四十三年、五十年和五十五年，太平县户数一直为4.1万余户，“男妇大小丁口”则在25万至27万之间波动。从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十年，户数年年略有增加，但一直为4.2万余户，“男妇大小丁口”也年年增加，最高达26.2万余人。户数的微小增加跟不上口数的增加，乾隆四十三年户均口数为6.1，嘉庆十年为6.4。该县数据

人工编造的痕迹也相当明显。户口比例的降低,竟是人为编造数据所致。

乾隆四十四年以后,旌德县的户口数发生经常性的上下波动。如乾隆四十四年,该县有4.6万户,29.3万口;乾隆五十年户数增为4.8万,口数增为33.3万;乾隆五十三年,户数降为4.6万,人口降为29.5万,乾隆五十七年,户口数增加,嘉庆元年复减少。这不像是正常的人口变动,倒像是顽皮小孩的任意涂鸦。嘉庆元年以后,旌德县户口开始了持续的增长,但是1809年旌德县的户均口数突然上升,很不正常,兹将1779年的户均口数作为是年口数调整的根据。修正后的宁国府分县人口可见表3-7。

表3-7 乾隆四十四年、嘉庆十年宁国府修正人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		嘉庆十年(1805年)		1953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宣城	960000	36.1	1300000	41.0	587877	41.4
南陵	490000	18.4	503040	15.9	290127	20.4
泾县	417309	15.7	525356	16.6	213010	15.0
宁国	290754	10.9	301412	9.5	203935	14.4
旌德	243459	9.2	260000	8.2	62939	4.4
太平	250219	9.4	272677	8.6	61890	4.4
宣州卫	4548	0.2	6090	0.2		
合计	2656289	100.0	3168575	100.0	1419778	100.0

《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宁国府的口数为343.3万。未经修正前,从乾隆四十四年至嘉庆十年,宁国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4‰,从嘉庆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速度不变。修正后两个时段的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8‰和5.4‰。

2. 广德州

广德州领广德本州和建平县。清代中期建平县的户口数阙,仅见光绪年间数。兹将广德本州户口数列如表3-8。

表 3-8 乾隆、嘉庆年间广德州本州户口

年 代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乾隆元年 (1736年)	7376	44263	6.0	
四十年 (1775年)	41950	210635	5.0	39.8
五十五年 (1790年)	55189	284499	5.1	20.2
六十年 (1795年)	55222	286716	5.1	1.6
嘉庆五年 (1800年)	55367	288856	5.2	1.5
十五年 (1810年)	56551	298319	5.2	3.2
二十五年 (1820年)	57813	305028	5.2	2.2

资料来源：乾隆《广德州志》卷15《田赋志·户口》，光绪《广德州志》卷16《田赋志·户口》。

从乾隆元年至五十五年，广德州的在籍人口迅速增长。乾隆五十五年以后，高增长的势头戛然而止，转为低增长。乾隆元年的户口数属于“人丁”系统，此不予考虑。乾隆五十五年的人口增长率的异常变动，意味着户口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其一，对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制度化的户口调查始于乾隆四十四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始于乾隆三十年左右或乾隆末年。乾隆五十五年有可能是广德州规范化户口调查的起点。其二，嘉庆年间的统计口径与乾隆时期不同。光绪《广德州志》卷16载有光绪五年的州县户口数，其中州户5298，口19410，客户16339，口79970，建平县土客户16720，口61743。建平县人口占广德州总人口的38.3%。1953年这一比例为39.9%。以39%的比例推测，乾隆五十五年广德州总人口为46.6万，嘉庆二十五年为50万。然而，《嘉庆一统志》所载为55.1万，说明光绪《广德州志》所载户口数偏低。以《嘉庆一统志》所载为准，从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广德州的人口总数约为43.1万。

3. 太平府

在太平府三县中，仅有繁昌县的户口数据可供利用。道光《繁昌县志》卷5《食货志·户口》称乾隆六十年有户53162，有丁302541，户均丁数为5.6，此“丁”为人口。嘉庆十八年，户数增为

54331,丁数 308834;道光五年户数 60232,丁数 315513。从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五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4‰。这一增长率偏低,说明数据存在问题。

在 1953 年人口中,繁昌县占三县及芜湖市人口的 20.3%。近代以来,作为长江下游最大粮食交易市场的芜湖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民国四年(1915 年)城区人口多达 9.3 万^①,1953 年多达 24.2 万。1953 年太平府的繁昌、芜湖和当涂三县共有人口 91.7 万,考虑到芜湖城市人口的本土色彩,即保持民国四年的城区人口数,合计全府人口为 101 万,繁昌县占太平府总人口的 23.3%。如果认为乾隆六十年繁昌县人口为真,且在太平府三县总人口中的比例与 1953 年相同,则乾隆六十年太平府人口总数为 130.1 万。《嘉庆一统志》中太平府人口数为 147.9 万。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太平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1‰。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太平府人口约为 118.1 万。

4. 池州府

乾隆四十一年池州府户口数见表 3-9。

表 3-9 乾隆四十一年和 1953 年池州府分县户口

县名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1953 年	
	户	比例(%)	丁	比例(%)	户均丁数	人口	比例(%)
贵池	181173	52.9	547252	24.8	3.0	329601	33.9
青阳	40871	11.9	432049	19.6	10.5	143736	14.8
铜陵	40656	11.9	315083	14.3	7.7	205185	21.1
石埭	18971	5.5	332190	15.1	17.5	39829	4.1
建德	29796	8.7	274886	12.5	9.2	120840	12.4
东流	30817	9.0	303793	13.8	9.8	132707	13.7
合计	342284	100.0	2205253	100.0	6.4	971898	100.0

资料来源:乾隆《池州府志》卷23《赋役志》。

^① 民国《芜湖县志》卷26《政事志·户口》。

乾隆《池州府志》所载的“丁数”，应是代表全部人口的一种称法，“今核乾隆四十二年六县报部实数，户总三十四万二千三百有奇，口总二百五十万五千二百三十有奇，较前增多不啻倍蓰，至现在当差摊行征丁数合府只二万九千九百四十有奇，则仅居丁户实数什之一也”。可见乾隆四十三年府志所载丁数应为实在人口数。

池州府的“丁”
仅仅是对于全体
人口的代称。

然而，上引文中池州府的户口总数与分县累加数均有差距，特别是口数相差特别大。仔细琢磨，所称“户总共”342354户，“人丁总共”2505233丁，是加总过程中出现了误差。即在十万位和十位数上分别出现了误差。加总的误差可以通过正确的加总来消除，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事实上，构成池州府数据的最大问题在于各县的户均口数差别太大，最多的县份每户可达17口，最少的仅为3口，以致使人怀疑这一系列数据的准确性。

到底是户数偏小还是口数过高，通过与1953年人口比例的比较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贵池县，如以1776年户数为真，其在全府总户数中的比例高达52.9%，远远超过1953年的33.9%，将户均人口调整到4，则与1953年相近，该县在册口数增加17.7万。如石埭县，1776年其户数在全府总户数中的比例仅占5.5%，而口数则占15.1%。根据1953年的人口比例进行检验，户数正确而口数夸大。按照每户5口的规模调整，该县在册口数减少13万余。

虽然其他四县的户均口数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青阳县的口数可能高估，而铜陵县的口数则可能低估，两县与1953年相比，高低相差的比例正好一致。建德、东流比例则与1953年相近。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这四县人口数进行修正。对贵池、石埭两县人口修正的结果是，贵池县的人口低估与石埭县的人口高估相互抵消，乾隆四十一年池州府修正前的册载人口较修正后多出约6万人。事实上，如在对贵池县户均口数的修正中，户均4口仍偏低，如采用稍微高一点的值，此一差距就可能不存在。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池州府人口总数为275.5万，从乾隆四十一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1‰。

二、皖北地区

1. 安庆府

《嘉庆一统志》中安庆府数据的错误是统计汇总过程中的技术性错误所致。

道光《桐城县续志》卷2《田赋志·户口》载有康熙五十六年、乾隆三十年、五十五年、嘉庆二年、十四年及道光元年和五年的户口数。从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五年间,各阶段口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大致保持在15%~18%,其人口总数在嘉庆十四年已达181.9万,道光元年则达223.6万。《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安庆府“原额丁口”3817063,“滋生丁口”1760094,若以“滋生人口”计,安庆一府不敌桐城一县,错讹甚大。

不仅如此,《嘉庆一统志》载“原额丁口”也是出奇的大。梁方仲先生曾指出:“安庆府原额人丁数作3817063,较原书所载该省全部原额人丁数1438023还大一倍多……安庆府的原额人丁数……当有错误,惟未能校勘……俟考。”^①梁先生已经发现《嘉庆一统志》中的错误,尽管不是“滋生丁口”的错误。

1953年,安庆专区辖清代安庆、池州两府,两府人口分别为321.8万和97.2万,各自分别占全区人口的76.8%和23.2%。太平天国战争中,安庆、池州两府均受到影响,池州府因流行瘟疫,人口死亡的比例可能高于安庆,安庆陷入战火长达十余年,安庆周围地区人口损失最为严重。近代安庆开辟商埠,作为安徽省治的安庆城及其附近地区人口恢复较快,所以,与太平天国战前比较,1953年池州府的人口比例可能偏低。再据《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十六年安庆府人口数为42.3万,池州府为19.9万,分别占两府人口总数的68%和32%。如果考虑卫所人口,则各自的比例分别为67%和33%^②,假定这就是嘉庆二十五年两府人口的比例,以嘉庆二十五年池州府人口数275.5万为基准进行测算,是年安庆府人口总数为555.2万。如将《嘉庆一统志》中所载“原额丁口”与“滋生丁口”相

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2页。

② 参见笔者《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七章《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中表7-1《洪武二十六年分府(区)人口密度》。

加,恰得557.7万,与根据洪武二十六年人口比例所作估计基本吻合^①。据此推测嘉庆二十五年的安庆府的数据错误,就像是将这一年的正确口数一分为二所造成。假若真的如此,这一错误的荒唐,则相当罕见。

道光《桐城县志》所载乾隆五十五年以后的户口资料也是不正确的。即使采用修正过的嘉庆二十五年安庆府人口数作为基数,嘉庆十四年桐城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32.6%,道光元年占40%;1953年,桐城县与1949年析置的湖东县合计人口占全府人口的32.7%,与嘉庆十四年的比例相同。由此可以判断,道光《桐城县志》所载嘉庆十四年的桐城人口数是正确的。

安庆府其他两县的数据难以利用。民国《宿松县志》卷7《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宿松县人口39.2万,直至嘉庆十八年,宿松县人口一直徘徊在39.2万至40.3万之间,嘉庆十九年和嘉庆二十五年则降为30.1万。对于册载人口数的这一变化,县志作者称:“据县册,本年清查,实存此数。”据此看来,宿松县乾隆年间的人口数似乎是不可靠的。然而,如果民国县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宿松县人口为真,该县人口只占同时全府人口的5.5%,而1953年该县人口要占全府人口的14.1%。如果嘉庆二十五年宿松县人口要达到同一比例,则应有人口77万。从乾隆四十一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5%。增长速度太高,不可信。

嘉庆《怀宁志》卷2《赋役·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一年,民户、屯户合计为74778户,500946口;而在道光《怀宁县志》卷8《赋役·户口》中,道光四年怀宁县有76186户,1413803口,户口数极端混乱,毫无道理。

从桐城县和宿松县的例子看,安庆府乾隆年间的数据是大大低估的。按照乾隆、嘉庆年间安徽其他府5%左右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乾隆四十一年安庆府人口约为445.8万。

^①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将1820年的安庆府人口数定为546.3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测算得出的。只是我在行文中,未交待推测的根据和过程。这一数据与557.7万人口之间的差额,可以看作真实的“原额丁口”或者推测中的误差。

2. 和州、泗州和滁州

和州、泗州和滁州是清代安徽的三个直隶州,地处皖北东部,在地理上连成一片,故并在一起论述。

光绪《直隶和州志》卷7《食货志·户口》记载乾隆二十年和州户数为7万,口数为27.5万,户均口数为3.9;嘉庆十六年户数降为6.5万,口数降为26.8万,户均口数升为4.1;道光五年户数升为6.9万,口数上升为33.4万,户均口数升为4.8。和州户口的升降无序,说明这一系列数据不可靠。

《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嘉庆二十五年和州人口数为42.8万,远远高出《直隶和州志》的记载。从乾隆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和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3%。鉴于乾隆二十年的户均口数偏低,如果作稍高一点的估计,即达到下文中所述泗州户均4.3口的水平,和州人口可以达到30.1万人。从乾隆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和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4%。据此,乾隆四十一年,和州人口数为33.7万。

乾隆《泗州志》卷5《食货志·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泗州户数为13.6万,男妇大小为58.8万,户均口数为4.3。在《嘉庆一统志》中,泗州人口达到了156.9万,乾隆四十二年与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3.1%。这到底是乾隆四十二年的数据错误,还是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错误?

在1953年和州、滁州和泗州三地的人口总数中,泗州占61.4%;而在嘉庆二十五年,泗州人口仍占60.4%。据此可以断定,上引乾隆四十二年泗州的户口数并不是泗州直隶州的户口数,而是泗州直隶州中泗州本州的户口数。同年泗州直隶州还辖有五河、盱眙和天长三县。在1953年的人口中,泗县、泗洪县(即原泗州本州地)人口占泗州直隶州的45%,如果乾隆四十二年的比例也是如此,则是年泗州直隶州的人口总数应为130.7万。从乾隆四十二年与嘉庆二十五年,泗州直隶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3%。人口增长率的大致合理可以证明乾隆四十二年泗州人口数据的合理性。

《嘉庆一统志》中记载的嘉庆二十五年滁州人口为60万,依和

州、泗州例,如果以 5‰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则有人口 48.1 万。

3. 庐州府

光绪《庐州府志》卷14《田赋志》有嘉庆元年分县“人丁”的记载,合计全府“实在人丁”3516304,较《嘉庆一统志》所载 3547579 略有差距。由此可见,嘉庆二十五年庐州府的人口数是有分县资料作为基础的。假设以 5‰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庐州府人口约为 284.9 万。

4. 颍州府

《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嘉庆二十五年颍州府人口数为 397.8 万,1953 年为 739.6 万,133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6‰。颍州府地区基本未受到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人口按照自身的规律增长着。与其毗邻的河南归德府和陈州府,同一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6‰ 和 3.7‰。

在未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的地区,人口按其自身的规律增长着。

民国《太和县志》卷4《食货·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太和县的户数为 61727,口数为 335759,户均 5.4 口,可惜未有其他户口数据与之配合,无法从这单一的数据中把握其人口增长的平均速度。光绪《颍上县志》卷 3 记载道光五年颍上县人口数为 27.2 万。据表 3-10,1933 年颍上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7.4%,1953 年占 8.9%。依此数据推测,道光五年的颍上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一定低于 1934 年,若为 7%,道光五年颍州府人口总数约为 388.6 万,与嘉庆二十五年全府人口总数相近。颍上县的口数证明《嘉庆一统志》所载颍州府人口数有分县户口作为依据。

太和县位于颍州府西部。1934 年,太和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12.4%,1953 年太和、界首两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14.9%。1948 年从太和县分立界首市,1953 年裁市,以其区域与太和、临泉两县部分区域合置界首县。1953 年太和县(含界首)人口比例的增加,当与临泉县的部分区域划入界首有关。如果乾隆六十年太和县人口比例占全府人口的 12%,则全府人口约有 279.8 万。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颍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4.2‰。乾隆六十年数据可能是偏低的。1934 年及 1953 年颍州府人口数据

见表 3-10。

表 3-10 1934 年和 1953 年颍州府人口

县 名	1934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阜 阳	1804640	38.2	2635783	35.8
颍 上	347843	7.4	653664	8.9
涡 阳	574234	12.2	870186	11.8
亳 县	538202	11.4	730713	9.9
太 和	587689	12.4	776848	10.5
界 首			326089	4.4
蒙 城	436447	9.2	615306	8.3
霍 邱	433915	9.2	760436	10.3
合 计	4722970	100.0	7369025	100.0

资料来源：1934 年数据，据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第 71 页。

说明：1953 年阜阳县人口中含阜南和临泉两县人口。

1934 年安徽民政厅调查，颍州府七县人口总数为 472.3 万。从 1934 年至 1953 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3.7‰。如果认为这一增长率是真实的，就无法解释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34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1.2‰。然而，表 3-10 有一点令人信服的是，尽管 1934 年数据偏低，但各县人口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却与 1953 年大体相同。这可能证明颍州府 1934 年各县户口调查的口径是大体相同的，漏载人口的比例也是相近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本卷的分析中，只将民国年间的户口数作为一个相对的比例来使用。在一般情况下，不再罗列民国年间的户口数。

以 5‰ 的速度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颍州府人口约为 319.4 万。

三、结语

由于缺乏资料，无法对徽州府、凤阳府和六安州等地的人口进行细致的辨析。姑且认为徽州等三府在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数都

是真实的,以此为基础,设徽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其余两府为 5‰,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各府人口可见表 3-11。

表 3-11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安徽省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广德州	43.1	1.7	55.1	1.7	40.5	1.3
宁国府	265.6	10.3	343.3	10.7	142.0	4.6
池州府	214.5	8.3	275.5	8.6	97.2	3.2
太平州	118.1	4.6	147.9	4.6	115.9	3.8
徽州府	216.9	8.4	247.5	7.7	94.9	3.1
安庆府	445.8	17.3	546.3	17.0	311.8	10.2
庐州府	284.9	11.0	354.8	11.1	439.3	14.4
颍州府	319.4	12.3	397.8	12.4	736.9	24.1
凤阳府	349.8	13.5	435.6	13.6	579.7	19.0
泗 州	130.7	5.0	156.9	4.9	210.9	6.9
滁 州	48.1	1.9	60.0	1.9	62.8	2.1
和 州	33.7	1.3	42.8	1.3	69.6	2.3
六安州	115.1	4.4	143.3	4.5	157.3	5.1
合 计	2585.7	100.0	3206.8	100.0	3058.8	100.0

说明:

[1] 1953 年六安州人口中包括 1932 年划隶湖北的英山县和金寨县人口的一半。1932 年析六安、霍山、霍邱、固始、商城五县设立煌县,后改名为金寨县,从版图上看,金寨县的一半自河南划入。

[2] 1953 年徽州府人口中包括 1949 年划隶江西的婺源县。

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安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9‰。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安徽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其中皖南各府及皖北安庆府的人口大幅减少,而其他各府略有增加。

颍州作为基本未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的地区,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该地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6‰,略低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安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人口的增速受其惯有

速度的影响,它是社会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除非有大的战争、自然灾害或瘟疫,否则人口增长的模式不会轻易被改变。

《嘉庆一统志》中安徽分府户口数据未包括军卫屯户。

《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安徽省口数为2756.7万,较表3-11中的估算多出171万。《户部清册》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安徽省口数为3506.6万,较表3-11中的修正数也要多出299.8万。依据上一节的思路,我怀疑上述错误的大部分,仍是由军卫屯丁人口的漏载所造成。因为,在《嘉庆一统志》中本身就存在两个数据,该志所载全省总口数为34100980,根据分府口数累加的全省口数为28354122。本节所测数据介于此两个数据之间,仍可能漏掉了部分军卫屯丁人口。由于资料缺乏,不作进一步研究。

在地方志中,关于屯户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嘉庆《怀宁志》卷2记载嘉庆二十一年,怀宁民户为55799,口数为370096,屯户有18979,口数为130850;嘉庆《凤台县志》卷2记载嘉庆十五年民户为97107,口数为356452,屯户为1564,口数为6758。再如上引嘉庆《宁国府志》卷18所载,宣州卫的户口是作为与县并列的行政单位登记入册的,不仅有嘉庆年间的数字,而且有乾隆年间的数字。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兹不一一列举。我要强调的是,在《嘉庆一统志》中,竟无任何关于安徽军卫屯丁的记载,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而《清朝文献通考》及《户部清册》所载安徽的人口总数可能是正确的。

第四节 浙 江

一、嘉兴府和湖州府

1. 嘉兴府

清代嘉兴府分县人口见光绪《嘉兴府志》卷20《户口》,其中除石门县户均7口外,各县户均口数大抵为5,因此也不用加以修正或调整。乾隆三十四年嘉兴府口数为231.4万,乾隆五十四年为241.6万,嘉庆四年为254万,道光十八年为293.4万。在四个年份的三个

时段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2‰、5‰和 3.7‰,乾隆三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 69 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3.4‰。

在《嘉庆一统志》中,嘉庆二十五年嘉兴府的人口总数为 2805120,从乾隆三十四年至此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8‰,从乾隆五十四年至此则为 4.8‰。清代中期嘉兴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左右,与同时期苏州府的情况相似。按照表 3-5 中的修正,册载“男丁”反映的苏州府人口增长率 3.3‰可能偏低,真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6‰左右,我们有同样的理由认为嘉兴府的册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有可能偏低。以 4‰的年平均增长率为准,乾隆四十一年嘉兴府的人口为 235.3 万。

2. 湖州府

李国祁在《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一书中根据同治《湖州府志》卷 39 的记载,对湖州府的人口数有如下分析:“湖州府的附郭县乌程,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时人口有 174270 人,至同治十一年(1872 年)增至 360736 人,即 116 年间,人口增加 107%,年增长率为 6.29%。由此增长的情形虽然无法看出其因移垦的关系人口增加的概况,但如将之与嘉兴府的情形相比,仍隐约可看出移垦是其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①湖州府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遭受战火与瘟疫的双重打击,人口死亡甚多。然而,湖州府城始终未被太平军攻破,这是乌程县人口得以保全的原因。根据乌程县的人口数,无法说明移垦与人口增加的关系。

湖州府的另一附郭县为归安县,战争中的人口损失也不多。1912 年两县合并后,称吴兴县。在 1933 年的调查中,吴兴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49.5%,1953 年吴兴县与湖州市人口合计占全府人口的 49.6%。两个年份的人口比例基本不变。由于乌程、归安两县所受战争影响较小,因此,太平天国战前两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百分比,肯定低于 1933 年及 1953 年。

假定乾隆二十一年乌程县的人口占全府七县人口的七分之

^①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第 433 页。

一,即 14.3%,是年湖州府总人口约为 122 万,按照 4‰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湖州全府人口约为 132 万,如按照 9‰计,则有人口 147.2 万。如果这一数据为真,而《嘉庆一统志》中所载湖州府人口为 256.8 万,从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一年再至嘉庆二十五年,湖州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9‰和 12.7‰。事实上,作为附郭县的乌程人口理应多于其他县,如是,乾隆二十一年湖州府的总人口还要少一些,而乾隆、嘉庆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还要高一些。显然,清代中期湖州府人口不可能出现如此高的增长率。乾隆二十一年的人口数是不准确的。

按照嘉兴府的人口增长速度,以 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湖州府的人口总数约为 215.3 万。

二、严州府和杭州府

1. 严州府

乾隆十九年(1754 年)严州府属六县分县户口数,见表 3-12。

表 3-12 乾隆十九年和 1953 年严州府分县户口

县名	乾隆十九年(1754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淳安	51407	336970	6.6	274851
遂安	27011	133688	4.9	136627
寿昌	7849	25098	3.2	106922
分水	13245	47085	3.6	67032
桐庐	30876	110178	3.6	130238
建德	18400	85528	4.6	157278
合计	148788	738547	5.0	872948

资料来源:光绪《严州府志》卷9《食货·户口》。

淳安县的户均口数最多,寿昌县的户均口数最少,合计全府户均口数为 5 人,符合家庭人口的标准形态。然而,《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严州府人口总数为 146.1 万,如果两个数字都为

真,则从乾隆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4‰。在长达66年的时间里,严州府正常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决不可能有如此之高。问题出在哪里?

太平天国战争对严州府的人口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根据1953年各县人口的比例,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幸运的是,光绪《严州府志》卷9在记载分县户口数据时,在淳安县条下记载了“男丁”119501、“妇口”118665,“小口”98804。很明显,淳安的分类人口漏记了“男小丁”,如果补上这类人口,淳安县人口可能达到43万。

从表3-15中可以看出,如果淳安县的人口总数中不包括“小口”,其户均口数为4.6,与遂安、建德两县的户均口数相当,比其他三县仍高。这实际上意味着,除淳安县外,其他五县的口数,很可能只是成年男女的数量,男小丁和女小口完全为其忽略。所以,上引书中关于总数的记载是“乾隆十九年,实在人丁三十七万五千四百七十二,男妇大小丁口七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七丁口”。“男妇大小丁口”是所谓“实在人丁”的一倍,按照淳安县的数据,此时的“男丁”仅为成年男性,就说明严州府的人口也是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成年男性,一为成年女性。

在严州府,“男小丁”、“女小口”为府志漏载。

修正的方法是,将淳安县的实际户均口数当作全府的户均口数。以户均8口计,乾隆十九年,严州府的总人口应为119万。据《嘉庆一统志》,嘉庆二十五年严州府口数为146.1万,从乾隆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严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乾隆四十一年,严州府人口数约为127.4万。

2. 杭州府

民国《杭州府志》卷57《户口》记载的各县户口数甚详,其中乾隆四十九年仁和县“男妇大小丁口”仅记为55297,九县总人口数仅有2025213,较同书所载九县人口总数2075211相差49999人。很明显,仁和县的人口误记了50000,即555297中的千位数上,漏记了一个“五”。校正后的结果,列如表3-13。

表 3-13 乾隆四十九年和 1911 年杭州府分县户口

州 县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			1911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钱 塘	102705	309081	3.0	377559
仁 和	103209	555297	5.4	302728
海 宁	85680	571934	6.7	360205
富 阳	34360	137119	4.0	167880
余 杭	33535	132474	4.0	104655
临 安	20808	75071	3.6	55430
新 城	20180	108956	5.4	46638
昌 化	24985	98853	4.0	64500
于 潜	20481	86427	4.2	41333
合 计	445943	2075212	4.7	1520928

资料来源：民国《杭州府志》卷57《户口》。

从户均口数观察，乾隆四十九年钱塘县的户均人口过低。查 1911 年的户口调查，知钱塘、仁和两县人口大体相当，钱塘县人口甚至稍多于仁和^①。据此，可以断定 1784 年钱塘县的人口数有所低估，如果按照仁和县每户 5.4 口的规模修正，钱塘县人口总数约为 55.5 万。

临安县的户均人口也偏低，从 1911 年临安、新城、于潜、昌化四个山区县的关系看，临安县的人口都不应是最少的。按照每户 5 口的比例进行推算，临安县人口数为 10.4 万。

富阳县的人口数可能严重低估。光绪《富阳县志》卷6《绅民殉难表》中记载：“匪前户口四十余万。”如以 40 万人口计，从乾隆四十九年至 1858 年，富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4.6‰。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以 4‰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九年富阳县人口至少有 29.8 万。

由于缺乏更多的资料，我们不能对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府属各

^① 钱塘、仁和为杭州附郭县，1953 年数据并入杭州市，无法用作分析，故采用宣统三年数据。太平天国战争对杭州府的影响太大，导致人口的剧烈变动，故不采用人口比例分析法。

县的人口数据一一进行验证,但可以肯定,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府的数据中的漏载是相当严重的。《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杭州府的人口总数为 319.7 万。与乾隆四十九年的数据比较,我更愿意相信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是正确的。民国《杭州府志》卷 57《户口》记载了嘉庆、道光、咸丰各时期杭属各县人口数。这批户口数所在的时点并不一致,令我们不能进行统一的时点分析。从各县数据的分析中看,从乾隆四十九年到嘉庆、道光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或高或低,但都没有超过 5.8‰。假如以地方志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清代中期杭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然只有 4‰左右。以嘉庆二十五年数据为基准并依此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杭州府人口约为 268.2 万。

三、绍兴、宁波、处州和衢州

1. 绍兴府

乾隆五十六年(1786 年)绍兴府的分县户口数,见表 3-14。

表 3-14 乾隆五十六年和 1953 年绍兴府分区户口

县名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					1953 年	
	户	比例(%)	口	比例(%)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山阴	122119	32.6	1002582	34.4	8.2	927769	44.1
会稽	61949	16.6	266526	9.2	4.3		
萧山	71672	19.2	686520	23.6	9.6		
诸暨	118358	31.6	956556	32.8	8.1		
合计	374098	100.0	2912184	100.0	7.8		
余姚	101384	43.1	472916	42.5	4.7	725660	41.7
上虞	57035	24.2	176577	15.9	3.1	334553	19.2
嵊县	55324	23.5	334787	30.1	6.1	420143	24.2
新昌	21731	9.2	127506	11.5	5.9	258703	14.9
合计	235474	100.0	1111786	100.0	4.7	1739059	100.0

资料来源:乾隆《绍兴府志》卷 13《户口》。

说明:1953 年统计中的庵东盐区,1954 年重划慈溪县界之前属于余姚。

乾隆五十六年绍兴府属各县的户均口数相差很大,最高达 9.6 口,最低者为 3.1 口。户均口数差异太大说明该府户口数据质量较差。在不分区的情况下,乾隆五十六年山阴、会稽两县的户数占全府总户数的 30.2%,两县口数占全府人口总数的 31.5%,然而,山阴县户均 8.2 口,而会稽县户均仅有 4.3 口。根据原始的记载,我们不能肯定,到底是“户”对? 还是“男女大小丁口”对? 抑或两者皆错?

通过对表 3-14 的仔细阅读,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绍兴府八县中,其西部四县即山阴、会稽、萧山、诸暨的户均口数要高一些,而东部四县即余姚、上虞、嵊县和新昌的户均口数要低一些。根据我对这一区域社会历史的了解,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西部四县所受战争影响较大,而东部四县所受影响较小,因此,有必要将绍兴府八县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区域来讨论。

山阴、会稽两县是绍兴府附郭县,1912 年合并设绍兴县,1953 年分为绍兴县与绍兴市。1791 年山阴、会稽两县户占四县户数的 49.2%,口占 43.8%,1953 年“两县”人口所占比例为 44.1%。如果 1791 年的口数为真,则 1953 年人口比例与 1791 年相近。对于一般的地区而言,这一比例无疑是合理的。然而,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绍兴府城及其近郊成为战场,大批人口死亡,相对而言,诸暨和萧山所受影响可能要小一些。1953 年的绍兴人口比例理应比 1791 年为小,因此,有必要对 1791 年会稽县人口数进行调整。

绍兴西部四县中有三县的户均口数在 8 人以上,只有会稽县奇低,不足 5 人。按照山阴、萧山、诸暨三县户均 8.47 口的比例进行测算,会稽县实有人口约 52 万。这一人口约是原有册载人口的近 2 倍。我推测原有的册载人口可能仅仅是男性人口,而补入的人口可能为女性,男女人口的性别比为 103。绍兴府户均人口值过高,是统计口径的不同所造成,此处不予深究。

在西部四县当中,只有 1953 年的萧山县人口比例超过了 1791 年。相对而言,太平天国战争对萧山的影响最小,导致的人口损失也最少。依同理,1791 年上虞县的户均人口比例过低,其

错误完全可能在于口,而不在于户。如果口数为真,1953年上虞县人口在四县人口中的百分比超过1791年。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对绍兴府境内战争过程的了解,地处平原的余姚、上虞受战争影响相对较深,而地处丘陵山区的嵊县、新昌所受影响相对较小。新昌地处偏僻,战争影响几可忽略。在这一背景下,1953年上虞县的人口比例不可能超过1791年。同理也适用于对余姚县人口的分析。

为此,设1791年上虞县户均人口与嵊县、新昌相同,即户均人口为6人,1791年上虞人口约为34万。如此,该县1953年的人口比例也就低于1791年。上虞县缺载的人口也可能为女性,这一情况与会稽县相同。

在绍兴府东部四县中,余姚县所受战争影响最大,人口死亡众多。对上虞县人口进行修正后,1791年余姚县人口的比例仅占四县人口的37%,1953年余姚县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791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对1791年的余姚县人口也必须进行修正:以户均6口计,余姚人口约为60万。

这一研究方法可以归结为,通过对1791年与1953年绍兴府东西两区分县人口比例的对比,我们发现在1791年的户口数据中,“户”的比例远较“口”的比例为好。以东西两区不同的户均口数为标准进行调整,各县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结构上呈现出合理性。会稽、上虞两县“口”登记过少,可能是漏登女口的结果,余姚的情况不明。对会稽、上虞和余姚三县人口调整后,乾隆五十四年绍兴府人口为456.8万,《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绍兴府人口为539.2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3%。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绍兴府人口总数约为426.5万。

2. 宁波府

《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宁波府人口为235.6万。1953年,宁波府境内人口尚不及嘉庆二十五年数,仅为226.4万。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影响由此可见。

民国《鄞县通志》第三册《輿地志·户口》记载乾隆五十一年鄞县户数为125019,口数为607749,户均4.9口,正合标准家庭规

模。1953年鄞县及宁波市人口总数约为70.1万,占全府人口总数的31%。近代以来,宁波城市化水平提高很快,其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应有所增加。然而,以宁波一府计,太平天国战争中府城及其周围地区受害最深。就人口比例而言,因通商口岸的开辟而引起的人口增长,实不足以抵消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以此比例计算,乾隆五十一年宁波府的人口总数约为196.3万。从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4‰。乾隆四十一年,宁波府人口约为186.1万。

3. 处州府

据光绪《处州府志》卷11《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丽水县有22690户,174216口,户均7.7口;云和县有13911户,50547“丁口”,户均3.6口,口数偏低,按照嘉庆二十五年云和县户均口数4.5的规模调整,人口数实为62600。乾隆四十一年,青田县有14893户,89667口,户均6口;景宁县8590户,39287口,户均4.6口。从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景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9‰。由于景宁县基本未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所以,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按照5‰的年平均增长率,将青田、景宁两县人口回溯至乾隆六十年,有人口14.2万人,四县合计共有人口37.9万。1953年丽水、青田、云和、景宁四县人口占全府人口总数的40%,若以此比例测算,乾隆六十年处州府人口为94.8万。

依景宁县的人口增速,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以此速度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处州府人口共有86.2万。以同样速度推至嘉庆二十五年,则有人口107.4万。《嘉庆一统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处州府人口为115.1万,与分县估计数接近,故不作修正。

光绪《处州府志》卷11在景宁县条下还记载有嘉庆十四年、道光二十年和同治十三年的人口数,分别为5.6万、7.6万和8.9万。从乾隆四十一年以来各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1.3‰、9.3‰和5‰。嘉庆以来的户口数据是夸大的,以至于从同治十三年至1953年,景宁县人口几无增长。

光绪《处州府志》还记载嘉庆二十五年丽水县户数为 29206, 口数为 240175; 道光二十五年户数为 35172, 口数为 349127。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2.9‰ 和 15‰。增长速度的过高令人怀疑数字的准确性。嘉庆二十五年丽水县人口若为真, 则占当时处州府全府人口的 20.9%, 而 1953 年仅占 10.2%。作为对比, 同治《云和县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云和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5.8%, 而 1953 年则占 5%。显然, 云和县的数据要比丽水县合理一些。

4. 衢州府

《嘉庆一统志》中记载的衢州府户数为 166847, 口数为 152224, 口数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浙江省衢州府以外各府的户均口数为 5.6, 设衢州府的户均口数与此相同, 是年人口数为 93.4 万。如果户均口数为 5, 则有人口 83.4 万。

《嘉庆一统志》
载衢州户口是统
计汇总中出现错
误所致。

另一种计算方法是,《嘉庆一统志》记载的浙江省人口总数与分府累加数相差 988930, 如将此作为衢州府丢失的人口, 还需加上同书记载的衢州府口数 152224, 合计有人口 1141154, 如以户均 5 口计, 则有 22.8 万户。

乾隆《开化县志》卷4《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完赋实在户”共有 25412, 口 36084, 这里的“口”不是人口。光绪《开化县志》卷5《食货》记载光绪十一年全县 29745 户, 133519 口, 户均 4.5 口, 才是真正的“户”和“口”。与光绪户口的比较后可知, 乾隆六十年的“户”数是可信的。

1953 年衢州府属五县人口合计 115.8 万, 其中开化县有 13.8 万人, 占全府总数的 11.9%。以此比例推测, 乾隆六十年全府户数可达 21.4 万。以第二种计算方法所得结果为准, 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 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5‰。以户均 5 口计, 乾隆四十一年衢州府人口数为 102 万。

同治《江山县志》卷3《食货·户口》记载乾隆四十年“烟户”27323 户, “共男妇大小”99771 丁口。又记咸丰九年 25546 户, 254895 丁口。乾隆四十年的户均口数仅为 3.7 人, 其中有误。又知从咸丰九年至乾隆四十年, 户减少,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4.8‰。至同治三年,江山县人口减少30%,是为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所致,以后逐年增长,构成合理的人口系列。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口数明显低估。同书记载洪武年间江山户数已达24846户,人口为113678口,户数与乾隆四十年接近,口数竟超过乾隆四十年,亦可证明乾隆年间数据不合理,故弃而不用。

5. 金华府

嘉庆《义乌县志》卷1《户口》记载了乾隆五十年义乌有58090户,大小男278578丁,大小妇235300口,男妇合计513878丁口。1953年义乌只剩人口数359893,远不及乾隆之时。1953年义乌占金华府人口的12.2%,据此比例测算,乾隆五十年金华府人口可能达到421.2万。事实上,嘉庆二十五年金华府人口只有255万。这种估算无疑是错误的。

乾隆五十年义乌的户均口数达到8.8人,这一比例太高,有误。嘉庆二十五年金华府的总户数为567657。按照5‰的年平均增长率,嘉庆二十五年,义乌户数可能达到69169户,占是年全府户数的12.2%,正与1953年义乌人口在全府人口中比例相同。据此可下结论,嘉庆《义乌县志》中的户数是正确的,而口数是错误的。据5‰年平均增长率推测,乾隆四十一年金华府人口数为204.8万。

四、结语

由于缺乏资料,无法对温州、台州二府的人口进行细致的辨析,姑且认为《嘉庆一统志》所载此两府户口数都是真实的,且据5‰的年平均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各府人口可见表3-15。

《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所载乾隆四十一年浙江省人口总数为1936.5万,比表3-15的估计少300万。《户部清册》载嘉庆二十五年浙江省口数为2741.1万,较表3-15的估算还多7.6万,差额不大,几可不计。也就是说,在对衢州的人口进行修正以后,《户部清册》中的浙江口数与《嘉庆一统志》中所载浙江总口数是相同的。

表 3-15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浙江省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名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杭州府	268.2	12.0	319.7	11.7	212.8	9.3
嘉兴府	235.3	10.5	280.5	10.3	155.0	6.8
湖州府	215.3	9.6	256.8	9.4	139.2	6.1
严州府	127.4	5.7	146.1	5.3	87.3	3.8
绍兴府	426.5	19.1	539.2	19.7	326.0	14.3
宁波府	186.1	8.3	235.6	8.6	226.4	9.9
处州府	86.2	3.9	107.4	3.9	133.9	5.9
衢州府	102.0	4.6	114.1	4.2	115.8	5.1
金华府	204.8	9.2	255.0	9.3	295.0	12.9
温州府	162.0	7.2	201.7	7.4	327.3	14.3
台州府	222.7	10.0	277.4	10.1	263.8	11.6
合 计	2236.5	100.0	2733.5	100.0	2282.5	100.0

据表 3-15,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浙江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5‰。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总体上与江苏和安徽相似。

将各府人口比例与 1953 年进行比较,清代中期浙江北部的杭、嘉、湖、严、绍五府的人口比例均高于 1953 年,而南部诸府则低于 1953 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北部的影响要大于南部。在南部诸府中,我对衢州府的人口数据仍有疑虑,按照我对战争过程的理解,衢州府死于战争和瘟疫的人口比例,绝不会少于北部诸府。换言之,本文对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的复原,仍可能存在低估。

《嘉庆一统志》载浙江省的屯军只有 9079 户,59296 口。与其他省相比,浙江的军屯人口的确很少,故不致因军屯人口的缺载而有人口估算上大的误差。

第四章 清代中期南方分府人口

——江西、湖南和湖北

第一节 江西

光绪《江西通志》卷47《輿地略·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嘉庆七年(1802年)、道光元年(1821年)、咸丰元年(1851年)和同治八年(1869年)分县户“丁”数。第五个年份即同治八年各县的户口数与咸丰元年大体相同,略而不议。因为,在经历了残酷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江西战后的人口大大少于战前。册载同治八年的户口数据是错误的。除个别地区外,咸丰元年户口数的绝大多数荒诞无稽,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作讨论。如将前三个年份的户口数列出,表格太宽,影响版面的安排,也影响阅读。因此,本章的分析主要依据乾隆四十七年及道光元年户口数。这两个年份均接近本卷确定的两个标准时点,即乾隆四十一年和嘉庆二十五年。在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嘉庆七年数。从每户平均“丁”数看,“丁”即是“口”,与清代前期作为纳税单位的“丁”无涉。

在《嘉庆一统志》中,民户口和屯户口虽然是分别登记的,但屯户仍属府州,而无卫所政区。光绪《江西通志》在5个年份的数据之后,列有各府的屯户口。该书明确指出,同治以前的军屯人口是漏载的,所谓“自乾隆迄咸丰屯丁编册阙失大半”。该书所载“仅据同治八年档册”,无法用于分析。由于乾隆四十七年屯户口不详,故在讨论分府人口的增长速度时,多以民户人口为例。然后,将《嘉庆一统志》

文献所载江西户口数据,质量较差,需认真鉴别,仔细修正。

所载屯户人口加入求得嘉庆二十五年或道光元年总人口,并按所求得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求得乾隆四十一年分府人口总数。

一、赣北地区

1. 南昌府

南昌府城是省会所在地,是江西政治、经济的中心。清代中期南昌府各县民户口数的变动,见表4-1。

表4-1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南昌府各县民户口数

州 县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南 昌	129939	518019	4.0	221065	1370657	6.2
新 建	82088	515652	6.3	120789	1716337	14.2
丰 城	109643	437102	4.0	159643	558945	3.5
进 贤	59908	204400	3.4	60921	219396	3.6
奉 新	39331	194286	4.9	40528	219485	5.4
靖 安	16690	59836	3.6	21544	86575	4.0
武 宁	33538	187030	5.6	36668	197560	5.4
义 宁	46727	234239	5.0	50683	262161	5.2
合 计	517864	2350564	4.5	711841	4631116	6.5

资料来源:光绪《江西通志》卷47《輿地略·户口》。

《嘉庆一统志》载南昌府有718271户,4676156口,户均6.5口^①。此与表4-1所载稍有差异,但从户均口数的一致性上看,两套数据出自一个系统是没有疑问的。嘉庆二十五年,南昌府屯丁有5.3万,表4-1中道光元年的丁数加上此屯丁数,就与《嘉庆一统志》相当接近了。

南昌府户均口数的过高暗示其中存在问题。其一,新建县的数据令人不可思议。道光元年的户均口数达到14口,在同府八县中绝无仅有,而进贤县户均口数之低,也同样令人惊讶,每户平均不足4口。其二,从1782年至1821年,南昌府八县口的年平均增

^① 各府屯丁数详见表4-21,以下不一一说明。

长率极不平衡,详见表4-2。

表4-2 1782—1821年南昌府属八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南昌	新建	丰城	进贤	奉新	靖安	武宁	义宁	合计
25.3	31.3	6.3	1.8	3.1	9.5	1.4	2.9	17.5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4-1统计。

南昌、新建两县口的自然增长率太高,导致全府口的自然增长率过高。道光元年至咸丰元年,出现了不明原由的停滞。然而,按照一般的人口发展规律,在没有战争、瘟疫与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人口应呈增长状。1851年处于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此时人口理应较1821年为多。相反情况的发生,只能将原因归结为户口统计的不实。鉴于此,对于1851年的户口,我们不再加以讨论。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与1953年的数据联系起来比较,即利用区域人口比例分析法,可以加深对清代人口数据的认识。详见表4-3。

表4-3 明清时期和1953年南昌府分县人口比较

州 县	1391年		1782年口 占比例(%)	1821年口 占比例(%)	1953年	
	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南 昌	338738	22.0	38.3	30.1	748621	28.2
新 建	134325	21.9	18.6	35.9	403575	15.2
丰 城	249079	18.6	15.6	11.8	514342	19.4
进 贤	142300	8.7	6.1	4.6	244857	9.2
奉 新	118315	8.3	6.1	4.9	124214	4.7
靖 安	17268	2.5	2.4	2.3	60293	2.3
武 宁	33515	8.0	5.5	4.4	123726	4.7
义 宁	80753	10.0	7.4	6.0	432141	16.3
合 计	1114293	100.0	100.0	100.0	2651769	100.0

资料来源:明代数据引自嘉靖《江西通志》卷1《藩省·户口》;清代数据据本卷表4-1计算。

说明:

[1] 为了将1953年分县人口与洪武间人口相比,本表按照两县人口的比例,将同年南昌市人口分别计入两县人口总数中。

[2] 1953年义宁人口包括修水县和铜鼓县两县人口。

据表 4-3,我们有以下几点可作讨论。

其一,若以 1391 年及 1953 的人口数进行比较,至少对南昌、新建和丰城、进贤、靖安和武宁六县而言,在经历了漫长的五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变化之后,各县在全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动。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新建县与南昌县同为南昌府的附郭县,但新建县辖境之大部位于赣江西岸,与南昌城隔江而望。因此,在南昌城中,属于南昌县辖的人口肯定多于新建县辖。这样,在 1953 年的人口比例中,南昌县人口的比例还应高一些,而新建县则要低一些。也就是说,1953 年南昌、新建两县的人口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更接近于洪武时期。从 1391 年至 1953 年,南昌等六县人民的生活遵循大体相同的模式并保持同步的变迁。虽然明清之际的南昌围城之役给南昌城周围的人口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但在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以后,区域性的人口变动仍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在南昌府属八县当中,1391 年奉新县口数与 1953 年大致相同。由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南昌府境深受战争破坏,人口死亡众多。如果 1391 年的人口数没有高估的话,奉新县人口的停滞可以归结为近代以来历次战争的破坏。清代中期义宁州人口比例偏低,是义宁州人口数低估所致。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义宁州破城后,城中 10.7 万人口中,只有 1 万余人逃出。虽然这 10.7 万人口包括了不少乡民,但很难认为全州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都集中到了州城之中。很显然,清代中期有关义宁州的人口记载是严重低估的。

其二,与 1391 年和 1953 年的数据相比,1782 年数据中变化最大的当属新建县。是年新建县人口占全府人口总数的 22%,而至 1802 年,进一步上升为 34%,至 1821 年,则高达 36%。新建县人口在全府总人口中比例的急剧上升,说明该县在册人口存在着作伪的可能。

其三,清代奉新县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越来越接近 1953 年的值,这是一个人口数值回归正确值的过程。

总之,在南昌府,除武宁县外,乾隆年间各县口的比例要比以

后诸年份更接近于 1953 年。如果说乾隆年间的人口数据还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新建县人口数量过高,而南昌县人口数量偏低。两县各自调整之后,两县人口总量没有大的变化。

可以对南昌府清代中期的人口数据作以下调整:将嘉庆七年新建县户均口数调整为 5.5,是年南昌府的民户人口总数降为 3051824。依同样原理对道光元年的新建县口数进行修正,是年全府民户人口降为 3579118。数据修正以后,两个年份的全府人口大大减少,而南昌、新建、丰城等大县人口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更接近于 1953 年。但总的说来,南昌、新建两县人口比例仍然偏高。相对而言,1802 年此三县口的比例与 1953 年的接近值超过 1821 年。于是,我以为乾隆以后,人口调查的质量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

义宁州的数据严重低估可能意味着:清代前期迁入义宁州的客家人、湖北人及南丰人的大部分并未入籍^①。如我在研究时所作估计,义宁州移民数量约占总人口的 20%,如是,乾隆四十七年义宁州人口约为 30 万。将南昌、新建两县排除在外,其余六县人口从 1782 年至 1802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6‰,1802 年至 1821 年为 2.5‰。1782 年至 1821 年为 4.1‰。加上义宁州的漏载人口后,1820 年南昌府的民户人口总数约为 370.2 万^②,加上《嘉庆一统志》所载 5.3 万屯丁,合计 375.5 万,依 4.1‰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约有人口 313.6 万。

2. 南康府

清代中期南康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 4-4。

《嘉庆一统志》所载户口数与表 4-4 相当接近,表明两套数据属于同一系统,但道光元年户均口数的过高令人怀疑。

①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明时期》第六章中,我将乾隆四十一年义宁州人口定为 22 万左右,没有发现移民人口并未全部入籍这一事实,由是造成对移民人口数的低估。

② 本节推算的数据仍以嘉庆二十五年为准。不作修改的光绪《江西通志》所载道光元年数据,与嘉庆二十五年只相差一年,依本卷《绪论》中设定的体例,不再修改。

义宁州数据的
低估可能因大批
外来移民未入籍
所致。

表 4-4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南康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 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			道光元年(1821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星 子	16967	99544	5.9	19641	127435	6.5
都 昌	61652	301919	4.9	78455	505728	6.4
建 昌	65202	264885	4.1	87583	546347	6.2
安 义	17114	81308	4.8	21062	104314	5.0
合 计	160935	747656	4.6	206741	1283824	6.2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1。

乾隆四十七年，南康府的户均口数与标准的家庭规模相当接近，随着时间推移，户均口数增加，与之相应的则是户口数的快速增加。仔细观察，建昌县（今永修县）数据的错误最为明显，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七年，建昌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4%，至道光元年，仍维持 14%，再至咸丰元年，口数减少一半多。这令人怀疑该县乾隆以后的一系列数据都可能是不正确的。在前三个年份中，建昌县户均口数从 4.1 口增至 5.5 口再增至 6.2 口，如果认为道光元年的户均口数与乾隆四十七年相同，则有人口 95.1 万。从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2%。加上屯户人口后，道光元年南康府人口约为 96.7 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73.2 万。

3. 九江府

清代中期九江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 4-5。

《嘉庆一统志》载九江府 224275 户，1234935 口，户均 5.5 口。较之表 4-5，户口数多，且户均口数亦多。表 4-5 中户口数加上屯丁户口数以后，则与《嘉庆一统志》所载接近。但是，即便如此，《嘉庆一统志》所载口数仍然偏多。这是因为，屯户的户均口数存在较大问题，《嘉庆一统志》所载屯户数仅为 12246，屯口数为 170770。屯户户数的大量漏载导致《嘉庆一统志》户均口数偏高。

九江府屯户人口众多。

表 4-5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九江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 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			道光元年(1821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德 化	39522	205999	5.2	58601	311242	5.3
德 安	30035	149076	5.0	31642	160770	5.1
瑞 昌	28846	146428	5.1	29580	156959	5.3
湖 口	40268	232888	5.8	60730	244190	4.0
彭 泽	30174	164141	5.4	31282	183449	5.9
合 计	168845	898532	5.3	211835	1056610	5.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1。

光绪《江西通志》还载嘉庆七年九江府有 190780 户, 1029228 口。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七年再至道光元年, 九江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6.7‰ 和 1.6‰。口数的增长速度由高至低, 其原因在于道光元年湖口县户数增长较快, 口数增幅甚微。嘉庆七年湖口县户均 5.2 口, 据此值进行调整, 道光元年有 315712 口, 全府民户人口约有 112.8 万, 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8‰。这一修正使九江府两个时段的人口增长构成合理的序列。与屯户人口合计, 道光元年九江府人口为 129.9 万, 乾隆四十一年人口约为 99.9 万。

4. 瑞州府

清代中期瑞州府分县民户口数, 见表 4-6。

就分县数据而论, 上高县最成问题。乾隆四十七年, 上高县户口之少, 不成比例。因为, 在 1953 年的人口中, 上高县人口较新昌县略多, 而在表 4-6 中只有新昌县的三分之一强。嘉庆七年, 上高县户数为 48574, 口数为 243773, 户均 5 口; 新昌县户数 57977, 口数为 264048。上高县的户数与口数均与新昌县接近。这说明乾隆年间的错误在嘉庆七年得到了更正。然而, 道光元年和咸丰元年, 上高县口数不超过 10 万, 乾隆年间的错误又重现了。

表 4-6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瑞州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 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			道光元年(1821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高 安	90650	448459	4.9	99118	648475	6.5
上 高	19592	79984	4.1	26168	87631	3.3
新 昌	47374	226799	4.8	63668	281162	4.4
合 计	157616	755242	4.8	188954	1017268	5.4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1。

按嘉庆七年上高县与新昌县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乾隆四十七年上高县应有 20.9 万口,道光元年应有 25.9 万口。又查同治《高安县志》卷5《户口》,乾隆四十八年高安县烟户为 96435,男大小 380550,女大小 180745,合计 561295 口,性别比很不合理,户均口数也偏多。两县口数的高估和低估抵消,道光元年的瑞州府口数与表 4-6 所载相差不多。

同治《新昌县志》卷7《户口》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土著棚民烟户 48610 口,男妇大小 241425 名口。如回溯至乾隆四十七年,则与表 4-6 所载基本相同。如此,乾隆四十七年瑞州府民户人口合计约 88.4 万口。从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民户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6‰。

嘉庆二十五年瑞州府屯户为 1.3 万,加上民户人口后的总人口为 103 万,与《嘉庆一统志》记载的瑞州府 103.1 万人口基本相同。以此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瑞州府口数为 87.9 万。

5. 饶州府

清代中期饶州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 4-7。

在饶州府,德兴县户均口数高达 6.9,很不正常。洪武二十四年德兴县人口即达 10 万余口,清代中期约为 18 万~19 万口,1953 年降至 7 万余人,500 多年间人口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从德兴县人口在饶州府总人口中的比重看,洪武二十四年占 10.9%,乾隆四十七年占 12.8%,1953 年只占 4.5%。近代德兴县人口大

幅度减少可能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瘟疫流行有关,具体资料尚需进一步确实。

表 4-7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饶州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鄱阳	75832	322130	4.2	81844	431881	5.3
余干	45375	249790	5.5	62337	355168	5.7
乐平	39949	168199	4.2	46340	237481	5.1
浮梁	55896	250290	4.5	59606	288220	4.8
德兴	26664	185016	6.9	27436	190272	6.9
安仁	19580	114734	5.9	17458	110375	6.3
万年	26356	150335	5.7	28030	163880	5.8
合计	289652	1440494	5.0	323051	1777277	5.5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1。

道光元年民户口数与《嘉庆一统志》所载相同,另据《嘉庆一统志》,饶州府屯户人口 5.4 万。从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饶州府民户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5%。依此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饶州府人口约为 143.1 万。

6. 广信府

清代中期广信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 4-8。

表 4-8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广信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上饶	103908	181633	1.7	101740	188341	1.9
玉山	35899	178962	5.0	49603	208910	4.2
弋阳	23731	135052	5.7	32705	250052	7.6
贵溪	38248	217610	5.7	44377	263147	5.9
铅山	19910	125415	6.3	36108	201047	5.6
广丰	29129	173444	6.0	29997	234787	7.8

续表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兴安	10002	54387	5.4	80466	104483	1.3
合计	260827	1066503	4.1	374996	1450767	3.9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4-1。

乾隆四十八年《广信府志》卷2《乡都》记载了府属七县的户数，与表4-8中的数据比较，有些微差异，但不影响分析。

上饶县户均不足2口，是一个偏离正常状态的极低的值，其他六县的户均口数则是合理的。到底是上饶县的户数出了问题，还是口数出了问题，进一步的分析可见表4-9。

表4-9 1391年、1782年和1953年广信府各县户口比例

县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1782年户口比例(%)		1953年	
	人口	比例(%)	户	口	人口	比例(%)
上饶	118860	24.4	39.9	17.0	388699	25.3
玉山	76912	15.8	13.8	16.8	239614	15.6
永丰	88455	18.2	11.1	16.3	314892	20.5
铅山	62514	12.9	7.6	11.7	163757	10.7
贵溪	87835	18.1	14.7	20.4	238890	15.5
弋阳	51653	10.6	9.1	12.7	121713	7.9
兴安			3.8	5.1	69467	4.5
合计	486229	100.0	100.0	100.0	1537032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4-3。

兴安县(今横峰县)自明代中期于弋阳县析出。与弋阳合计，此两县1953年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与弋阳县1391年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接近。如此，1391年广信府各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1953年基本吻合。这一事实说明，在传统社会，农业区域人口的发展与分布有其趋同性，同一区域人口的发展速度与分布的相对

在传统社会，农业区域人口的发展与分布有趋同性。

密度总是大体相同的。以这一标准来检验,乾隆四十七年广信府除上饶县以外的各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洪武二十四年和 1953 年相差不多,只有上饶县相差甚大。乾隆四十七年户数占 39.9%,口数占 17%。相对说来,乾隆四十七年上饶县口数的准确性要超过户数。如按照上饶县人口占全府人口 25% 的比例计算,乾隆四十七年上饶县人口应为 29.5 万,全府总人口 118 万。

嘉庆、道光年间,上饶县的户数减少,且户均口数保持不变。显然,这一系列数据是无法利用的。另外,广丰县的户均口数开始增加,而兴安、弋阳两县则忽高忽低,均不正常。再如弋阳,1821 年的户口数出现异常增加,以致使人无法把握其数据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所分析对象无论在“户”数还是“口”数都出现问题的时候,上文所用的修正数据的方法就行不通了。

在进行时间序列的讨论时,笔者试用另一种方法,即将户口变动异常的县份排除,只计算户口非异常变动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这一方法,本质上仍是区域类比法,只是进行类比的单位为县级。插入嘉庆七年的数据后,玉山、贵溪、铅山三县合计,“户”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8.6‰ 和 8.5‰,“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9.4‰ 和 3.7‰。从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户”和“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5.9‰ 和 6.7‰。大致判断,这一时期广信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6‰。

以乾隆四十七年 118 万口数为基础,以 6‰ 年平均增长率计,嘉庆二十五年广信府民户口数约为 147.2 万,与屯户合计则为 148.5 万。乾隆四十一年广信府人口约为 114.1 万。

《嘉庆一统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广信府的总口数约为 145.8 万,与上述估计相当接近。究其原因,在于广丰、兴安、弋阳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偏高偏低相抵消,便与正确的增长率接近了。然而,这一巧合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县级户口数据分析的理由。

二、赣中地区

1. 袁州府

清代中期袁州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 4-10。

高估与漏载的错误相抵消后,往往接近正确的数据,但这不能成为放弃县级数据分析的理由。

表 4-10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袁州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 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宜 春	46144	212899	4.6	55772	235830	4.2
分 宜	24192	87032	3.6	28921	111400	3.9
萍 乡	37472	137916	3.7	47723	200560	4.2
万 载	24154	176823	7.3	31357	220760	7.0
合 计	131962	614670	4.7	163773	768550	4.7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1。

袁州府属四县户口数据最大的问题表现在乾隆四十七年分宜、萍乡两县户均口数太低，而万载县则太高。道光元年，分宜、萍乡两县户均口数增加，万载的户均口数降低，似乎以府为单位的户口调查，一直在进行纠正偏差的努力。

所以，从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宜春、分宜、萍乡、万载四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6‰、6.3‰、9.6‰和 5.7‰，四县合计为 5.7‰。如将乾隆四十七年萍乡县的户均口数调整至 4.2，该县人口即为 15.7 万，至道光元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降为 6.3‰。分宜县也作同样的调整，即乾隆四十七年户均口数也为 3.9 的话，则该年分宜县的人口为 9.4 万，至道光元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降为 4.4‰。

万载县的户均口数明显太高。1953 年万载县占四县总人口的比例为 16.5%，乾隆四十七年其户数占四县总户数的 18.3%，口数却占四县总户数的 28.7%。很显然，1782 年万载县的户数是准确的，而口数是不对的。所以，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咸丰元年，万载县的户数一直在增加，而户均口数也一直在下降。这一切，只能理解为胥吏们为纠正册籍中的明显错误所作出的努力。同样，如果将万载县的户均口数调整为 5，乾隆四十七年该县人口数只有 12 万人。总之，以上三县口数调整后的结果，乾隆四十七年袁州府民户总口数约为 58.5 万，较原数有所减少。对道光元年万载县

过高的户均口数进行修正,设其户均5口,是年袁州府民户总口数约为70.5万。从乾隆四十七年至此,袁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8‰。加上屯户人口后,道光元年袁州府人口总数为72.2万,以此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人口为58.2万。

2. 临江府

清代中期临江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4-11。

表4-11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临江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清江	66108	291864	4.4	74772	406072	5.4
新淦	56015	338335	6.0	58778	361414	6.1
新喻	63696	293052	4.6	65792	306391	4.7
峡江	32623	189995	5.8	53501	197031	3.7
合计	218442	1113246	5.1	252843	1270908	5.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4-1。

从乾隆至道光,临江府四县口数统计的质量要比袁州府好得多。但若分县而论,清江县的数据大成问题。从口的增长速度看,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清江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5‰,而新淦(今新干县)、新喻和峡江三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有1.7‰、1.1‰和0.9‰。咸丰元年(1851年),在新淦等三县户口数略有增长的同时,清江县户数减为近7万,丁数减为34.9万,户均5丁,似乎是对道光元年过高户口数的修正。按户均4.4口计,道光元年清江县人口约为32.9万,全府民户人口合计为119.4万,乾隆四十七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加上民屯人口后临江府总人口为120.2万,以此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全府总人口约为110.8万。

临江府的人口增长呈现前近代商业社会的特征。

临江府位于江西中部地区,是清代前期人口外出的中心之一。在这一区域,清代中期几乎没有了农业拓展的空间。相反,中药材的收购、加工和出售则成为当地的主导性产业。清代中期临江府

的产业结构的转换,使之与江南地区苏松地区颇有些类似。其人口的增长,也呈现某种前近代商业社会的特征。

3. 吉安府

清代中期吉安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4-12。

表4-12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吉安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庐陵	131205	520155	4.0	143783	613216	4.3
泰和	91473	419321	4.6	104201	531045	5.1
吉水	51743	131904	2.5	52286	234344	4.5
永丰	44999	211241	4.7	47830	227616	4.8
安福	80072	414267	5.2	89110	422050	4.7
龙泉	44950	244422	5.4	47414	258638	5.5
万安	62274	188560	3.0	64772	107205	1.7
永新	40438	249324	6.2	42665	340897	8.0
永宁	10039	49408	4.9	10590	52953	5.0
莲花	19589	79752	4.1	19703	89062	4.5
合计	576782	2508354	4.3	622354	2877026	4.6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4-1。

在乾隆四十七年吉安府属10县中,有8县的户均口数围绕5波动。吉水县的户均口数最低,仅为2.5口,次则万安县,户均3口。按照与上文同样的方法,知洪武二十四年,吉水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18%,而万安县仅占3.4%。在1953年,吉水县仅占全府人口的11.4%,万安县则占6.5%。这一变化的趋势是,平原地区人口的比重降低,而山区人口比重增加。当将吉水县人口按照户均5口的规模进行调整以后,其人口数为26万,占调整后全府人口的约10%。此一数值与1953年的相近。正因为如此,在嘉庆及以后的数据中,吉水县的户均口数恢复到了正常。如果对万安县人口也进行同样的调整,其人口比例占调整后全府人口的11%左右。此数据明显太高。如果认为万安县的错误在于“户”数过

高,口数无误,口数占调整后口数的7%,此与1953年万安人口在全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吻合。据此可以认为,乾隆四十七年吉安府的民户人口约为266万。道光元年,万安县口数只有10万,比1802年的20.5万减少了几近一半,而真实的口数应当超过20.5万,若以23万口计,则是年全府民户人口应为300.7万,从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吉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加上屯户人口后,道光元年吉安府人口总数为310.4万,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则有人口约268.4万。

4. 建昌府

清代中期建昌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4-13。

表4-13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建昌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南城	48576	302008	6.2	55168	373906	6.8
南丰	112798	385512	3.4	117340	421578	3.6
新城	55395	255284	4.6	56299	262830	4.7
广昌	19774	135010	6.8	32738	322190	9.8
泸溪	19739	86373	4.4	19919	88452	4.4
合计	256282	1164187	4.5	281464	1468956	5.2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4-1。

乾隆以后,广昌县的口数已是胡编乱造。

广昌县的口数变化最为特殊。嘉庆七年,广昌县户数23161,口数为239038,户均10.3口。从1782年至1802年,广昌县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9‰,而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竟高达29‰。1802年以后,其口数基本不变。很明显,乾隆以后,广昌县的口数就已经是胡编乱造了。

嘉庆七年建昌府户数为266828,口数为1355110。排除广昌不计,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七年,建昌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1‰,从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为2.9‰。与上下文所揭之邻府——吉安府、抚州府和宁都州比较,这是一个合理的人口增长

率。以此计算,嘉庆二十五年建昌府民户人口约为 129.56 万,加上屯户人口则为 131.4 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约有人口 115.7 万。

5. 抚州府

清代中期抚州府的分县民户口数,见表 4-14。

表 4-14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抚州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 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			道光元年(1821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临 川	101994	393797	3.9	105110	416424	4.0
崇 仁	53020	212540	4.0	53593	215954	4.0
金 溪	56639	204732	3.6	57246	218157	3.8
宜 黄	59967	286524	4.8	61040	295308	4.8
乐 安	55749	228623	4.1	56733	236044	4.2
东 乡	34274	132356	3.9	35228	139543	4.0
合 计	361643	1458572	4.0	368950	1521430	4.1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1。

需要说明的是,乾隆四十七年抚州府各县民户口数在总户口数的比例均无法与 1953 年对应,笔者不知问题何在。1391 年该府若干县的户口数缺,无法作对比分析。

抚州府的人口增长情况与临江府同。

嘉庆七年,抚州府有 366982 户,1502406 口,户均 4.1 口。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七年,抚州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5%。嘉庆七年以后,抚州府的户口数几无变动,令人无法相信。以 1.5%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依据,嘉庆二十五年抚州府的民户人口约为 155.4 万,加上屯户人口后的全府人口总数为 157.7 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为 147.6 万。

从明代中期开始,抚州府就是一个人口密集且人口大量外流的地区,该区人口主要流向云南和贵州,从事各种各样的非农职业。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该区僻居一隅,人口甚少损失。清代中期该区人口的低增长,或许可以从此获得解释。

三、赣南地区

1. 南安府

清代中期南安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4-15。

表4-15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南安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大庾	59206	143581	2.4	59764	153186	2.6
南康	40925	123621	3.0	41493	136657	3.3
上犹	12199	118157	9.7	14231	146409	10.3
崇义	23983	166573	6.9	29993	182790	6.1
合计	136313	551932	4.0	145481	619042	4.3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4-1。

户均口数偏离正常值过多,数据的可靠性就成问题。

南安府的数据很成问题,大庾县户均不足3口,南康县的户均只有3~4口,崇义则为6~7口,上犹约为9~11口。一般说来,户均口数偏离正常值过多,数据的可靠性就大成问题。如大庾县、南康县,清代历年的户数与口数几乎不变,就证明了这一点。与1953年的户口数对照,1782年户数和口数都显得无规律可循。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本节姑且相信乾隆四十七年的数据是大体可信的。

相对而言,只有上犹、崇义两县户数可用作人口增长之分析。从乾隆四十七年至道光元年,两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嘉庆二十五年南安府民户人口约为67.1万,加上屯丁为67.3万。以此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南安府约有人口56.9万。

2. 宁都州

清代中期宁都州的分县民户口数,见表4-16。

宁都州属三县户均口数分别为4、9和12,差异很大,以至于仅凭三县本身的户口数,无法鉴别数据的真伪。将乾隆四十七年三县户口数与1953年对比,可以发现1782年三县的户数距事实

太远,而口数则与真实情况接近。详见表 4-17。

表 4-16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宁都州分县民户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宁都	86897	355985	4.1	86084	342180	4.0
瑞金	22310	288030	12.9	23588	298167	12.6
石城	19053	175598	9.2	20423	184959	9.1
合计	128260	819613	6.4	130095	825306	6.3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1。

表 4-17 乾隆四十七年和 1953 年宁都三县户口比例(%)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1953年 人口
	口	户	
宁都	43.4	67.8	45.9
瑞金	35.2	17.4	35.9
石城	21.4	14.8	18.2
合计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 4-16 计算。

乾隆四十七年宁都州的分县口数比例与 1953 年是如此吻合,使人难以对乾隆时期口的调查质量产生怀疑。嘉庆七年,宁都州户数为 131731,口数为 832172,增长甚微。然而细察之,嘉庆七年,宁都州本州户数为 88145,口数为 353207,户增而口减,与情理不符。扣除宁都本州不计,瑞金、石城人口合计 478965,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七年,此两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6‰,与抚州府的情况类似。

在本书第四卷《明时期》中,我曾指出,在明代初年的赣南,宁都县的人口数量最多。洪武二十四年宁都一县人口占赣州府人口总数的 40%以上。在明清之际的混乱中,宁都州远离战火,独得

宁都州一直是赣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区。

保全。所以,清代前期的移民,少有迁入这一区域者。其人口的增长,主要表现为自然增殖。所以,该地的人口类型,与抚州相似而与其他地区不同,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以此增长速度计,嘉庆二十五年宁都州约有民户人口 86.8 万,加上屯户人口则为 87.8 万,乾隆四十一年约有人口 81.8 万。

3. 赣州府

清代中期赣州府分县民户口数,见表 4-18。

表 4-18 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元年赣州府分县民户口数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元年(1821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赣县	68310	334526	4.9	79516	391344	4.9
雩都	40590	244849	6.0	41722	258821	6.2
信丰	62839	395205	6.3	69066	604740	8.8
兴国	28117	126473	4.5	30071	134463	4.5
会昌	41696	352477	8.5	43028	394674	9.2
安远	39165	180714	4.6	40944	190108	4.6
龙南	28598	121942	4.3	34021	148717	4.4
长宁	32024	162322	5.1	33549	164218	4.9
定南	19511	123411	6.3	20185	127866	6.3
合计	360850	2041919	5.7	392102	2414951	6.2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1。

在乾隆四十七年赣州府的户口数据中,除了会昌县的户均 8.5 口偏离正常值太多外,雩都、信丰及定南三县的户均口数也嫌偏高,其他各县的户均口数均是正常的。赣州府户口数据的问题,还可以从与 1953 年各县人口的比例的比较中看出来。

乾隆四十七年会昌县口的比例占全府的 17.3%,户的比例占 11.6%,而在 1953 年,会昌县人口占全府人口总数的 9.7%,乾隆四十七年会昌户的比例接近 1953 年,户数较口数为准确。信丰的情况也是如此。会昌和信丰都是户均口数过高的县份。与会昌、信丰相反,1953 年赣县、雩都、兴国三县的人口在赣州府总人口中

的比例,远远超过了 1782 年。据《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此三县正是赣州府接纳福建、广东移民最多的县,外来的移民由于户籍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未在迁入地入籍,加上嘉庆、道光年间仍有移民不断的迁入,都可能造成移民县人口的低估。正是由于这批移民人口的漏记,使得 1782 年信丰、会昌两县户的比例偏高。

表 4 19 乾隆四十七年和 1953 年赣州各县户口比例(%)

县名	1782 年户	1782 年口	1953 年人口
赣县	18.9	16.3	21.9
雩都	11.2	12.0	16.9
兴国	7.8	6.2	12.6
信丰	17.4	19.4	12.9
会昌	11.6	17.3	9.7
安远	10.9	8.9	6.4
龙南	7.9	6.0	6.2
长宁	8.9	7.9	5.3
定南	5.4	6.0	4.3
全南			3.8
合计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 4-18 计算。

将会昌、信丰两县的户均口数按照标准形态加以修正,1782 年赣州府在籍人口要减少 22.5 万,1802 年减少 37.6 万,1821 年减少 43.9 万。两个时段中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1‰ 和 2.3‰。然而,由于赣县、雩都和兴国三县中有大量移民人口漏记,使得 1782 年此三县在全府人口总数中的比例比 1953 年减少了 15%,估计大约漏记了 30 万移民及其后裔人口^①。1782 年以后移民仍在不断迁入,因此,乾隆四十七年和道光元年赣州府的人口数可以不作调整,这一时期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3‰。加上屯

^① 笔者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得此三县的客家移民为 23 万人。这一研究存在的问题是,我将乾隆年间的户口数当作包括移民的全体人口对待,故存在对移民人口的低估。

户人口后道光元年赣州府人口总数为 251.3 万,依此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赣州府有人口约 207.1 万。

四、结语

1. 分府人口比例的比较

综上所述,可将乾隆四十一年、道光元年及 1953 年江西分府人口,列如表 4-20。

表 4-20 乾隆四十一年、道光元年江西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道光元年(1821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南昌府	313.6	16.7	375.5	16.8	268.3	16.1
南康府	73.2	3.9	96.7	4.3	62.1	3.7
九江府	99.9	5.3	129.9	5.8	71.2	4.3
瑞州府	87.9	4.7	103.0	4.6	57.8	3.5
饶州府	143.1	7.6	183.1	8.2	177.5	10.7
广信府	114.1	6.1	148.5	6.6	153.7	9.3
袁州府	58.2	3.1	72.2	3.2	132.7	8.0
临江府	110.8	5.9	120.2	5.4	65.9	4.0
吉安府	268.4	14.3	310.4	13.9	186.0	11.2
建昌府	115.7	6.2	131.4	5.9	45.3	2.7
抚州府	147.6	7.9	157.3	7.0	107.7	6.5
南安府	56.9	3.0	67.3	3.0	70.0	4.2
宁都州	81.8	4.4	87.8	3.9	61.6	3.7
赣州府	207.1	11.0	251.3	11.2	201.6	12.1
合 计	1878.3	100.0	2234.6	100.0	1661.4	100.0

说明:1953 年的饶州府不包括婺源县。

在赣北各府中,从乾隆四十一年至 1953 年,南昌府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的比例基本未变,南康、九江及瑞州等府有所下降,饶州及广信两府人口比例则稳定上升。个中缘由,尚不可得知。

赣中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清代中期袁州府人口占全省人口

总数的比例很低,只有 3.1%和 3.7%。1953 年上升为 8%。分县而论,袁州府人口比例的提高,实与萍乡的发展有关。1953 年萍乡人口为 61.2 万,占全府人口的 46.1%。而在民国年间,萍乡人口仅占 31.8%,依上文所述,在乾隆四十七年修正后的数值中,萍乡只占 23.6%,如果追溯到洪武年间,也只不过占 26.3%。由此可见,1953 年袁州府人口比例的增加,实与萍乡人口的增加有关。而萍乡人口的增加又是近代工业发展的结果。除此之外,太平天国战争对袁州府影响相对较小,也是该地人口比例增加的原因。与袁州府相反,临江、吉安、建昌、抚州四府人口比例均表现为稳定地下降。此四府历史时期人口稠密,素为人口外移之乡,加之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损失较大,人口比例的降低可能与此有关。四府之中,建昌镇人口比例的减少幅度最大,实为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瘟疫流行所致。清代后期江西全境陷入太平天国战争,战争对江西各府的人口影响程度,可从表 4-20 中见其端倪,然具体的论述则见本卷第十二章第一节。

2. 不同记载中的全省人口数的比较

光绪《江西通志》所载乾隆四十七年江西省人口为 1763.3 万,道光元年为 2298.4 万。这两个年份的人口中未包括一批军屯人口。表 4-20 中所列乾隆四十七年及道光元年的分府人口数中均已包括军屯人口。从乾隆四十一年到道光元年,江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

《清朝文献通考》卷 19《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82 年)江西省人口总数为 1684.9 万。较表 4-20 要少 193.4 万。《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江西省人口总数为 2365.2 万,较表 4-20 中的估计值多出 130.6 万。《户部清册》所载道光元年(1821 年)江西省的人口数为 2372.9 万,与《嘉庆一统志》所载基本相同。分府而论,仅南昌府一地,即存在 104 万人口的浮夸。就口数错误较大的南康府、袁州府、临江府和建昌镇分别论之,则分别由各自所辖之建昌县、万载县、清江县和广昌县的数据错误所导致。由此可见,江西人口统计中的错误,主要是由个别地区的人口误差所引起的。排除掉这类异常因素,《嘉庆一统志》的府级数据虽然存在许

《嘉庆一统志》
中江西人口数据
的错误主要由个
别地区的人口误
差所引起。

多的错误,但仍然是大致可靠的。若干府中存在县级数据的错讹,府级数据往往因县级数据的高估与低估的相互抵消而变得正确。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县级户口数据的订正是多余的,只有经过校订的府级户口数据才是可靠的。

按照各府不同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三藩之乱”结束后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江西人口约有1346万。这一人口数量是明代末年江西1930万人口的69.7%。也就是说,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中,江西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乱。

第二节 湖 南

光绪《湖南通志》卷48至卷49《赋役志·户口》列出嘉庆二十一年湖南分县户口数。这一数据与《嘉庆一统志》所载湖南分府人口并不完全一致,其原因可归结为嘉庆二十一年与二十五年的时间差距。光绪《湖南通志》所载户口数据引自《司册》,与嘉庆《湖南通志》所载完全相同。

一、湘中地区

1. 长沙府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和1953年长沙府分县户口数,见表4-21。

表4-21 嘉庆二十一年和1953年长沙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长沙市				650619	6.5
长 沙	103160	661370	6.4	1109655	11.2
善 化	61472	450647	7.3		
湘 阴	49730	637170	12.8	865395	8.7
浏 阳	59219	257096	4.3	785723	7.9
醴 陵	43430	246680	5.7	661873	6.7

续表

市 县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湘潭	70720	399300	5.6	1378053	13.9
宁乡	52080	362420	7.0	830058	8.3
益阳	58910	256040	4.3	1055685	10.6
攸县	47026	218130	4.6	389550	3.9
茶陵	47420	201458	4.2	257316	2.6
湘乡	77750	489555	6.3	1131340	11.4
安化	20825	64016	3.1	507322	5.1
涟源 1/2				323655	3.3
合计	691742	4243882	6.1	9946244	100.0

资料来源：光绪《湖南通志》卷48至卷49《赋役志·户口》。

说明：1912年善化县裁入长沙县。1953年长沙县人口包括望城县人口；湘潭县人口中包括湘潭市、株洲市人口；益阳县人口中包括益阳市、桃江市人口；湘乡县人口中包括双峰县人口。1951年析湘乡、安化、新化、邵阳四县设涟源县，新化、邵阳属宝庆府。

光绪《湖南通志》所载嘉庆二十一年长沙府总口数为4348883，分县合计口数为4243882，相差105001口。仔细分析，安化县的口数令人怀疑，此10万人口的错误可能因该县人口的部分漏载而产生。也就是说，安化县人口可能为164016，而非64016。

即便如此，1816年安化县的户口数仍是偏低的。1953年的安化县政区与1816年有所不同，1952年，由安化、新化、湘乡和邵阳四县划出部分地域设置涟源县，若以涟源县地的四分之一为原安化县地计，1953年安化县人口实有66.9万人，占全府总人口数的6.7%，高出1816年安化县户口比例的1倍有余。从绝对数字上分析，从1816年的6.4万口增加至1953年的66.9万人，人口增加了9倍有余，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3‰；如以1816年的16.4万人计，人口增加了3倍有余，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10.3‰，均远远超出全省人口的平均增幅。在长达137年的时间里，一县

从户均口数的异常可以发现统计汇总中的明显错误。

从人口增长速度的异常也可以发现数据的错误。

人口要达到如此高速度的增长,是绝无可能的。

1953年的湘乡县(含涟源县)人口加上四分之一的涟源县人口,共得人口129.3万,占同年长沙府人口总数的13%。1816年湘乡户口分别占全府人口总数的11.2%和11.5%,如扣除因湘阴县人口误差造成的差错,湘乡户口比例可以上升1个百分点,即与1953年比例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可设1816年安化县人口占全府人口总数的6%,则有人口25.3万。册载人口少记了近19万。

1816年湘阴县每户平均口数高达12.8,其口比例占全府口总数的15%,较1953年的8.7%高出近1倍,而户数比例为7.2%,与1953年相近,可认为是合理的。如若将人口比例调整为与户相同的比例,1816年湘阴县口数约为35万,册籍多记了约28.7万。

1816年浏阳、益阳两县也存在人口的漏记。是年两县的户均口数均为4.3,明显较其他县为少,故两县口数比例均低于1953年,比较而言,益阳相差更多。按照全府户均6口的比例推测,两县在籍口数较实际口数要少近20万。

湘潭县的户口数需要加以特别的说明。1950年及1951年划湘潭县地设湘潭市和株洲市。1953年三地人口合计占全府人口的13.9%,较1816年的9.4%有较大增加。扣除株洲市的人口,湘潭人口比例变化不大。然而,从嘉庆二十一年至1953年,扣除株洲市以后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2‰,包括株洲市在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达8‰。对于137年的长时期来说,这一人口增长速度显然过高。

光绪《湘潭县志》卷6《赋役》记载,光绪十三年湘潭人口合计817607人,从嘉庆二十一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1‰,从光绪十三年至1953年为5.8‰。前一阶段的增长速度太高,当有特别原因。虽然嘉庆年间湘潭号称“湖南一大码头”^①,但直到光绪年间,我们才见到湘潭城市大扩展的记载。光绪《湘潭县志》卷11称:“街分十总,人肩摩,夫担争,行者不遑践,居者不暇餐……言贸易者,码头、口岸、装口,举无舆比。”城市扩大,出西门,

^① 嘉庆《湘潭县志》卷39。

沿湘江 20 里皆为市场。虽然清末民初,因交通条件变化,湘潭衰落,株洲兴起。至抗日战争时期,湘潭县城人口曾恢复至 18 万之多^①。据此判断,清代后期湘潭县城人口可能达到 15 万~16 万人。扣除因湘潭城市扩展而引起的人口增长,湘潭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有 6.5‰。

总之,对长沙府各县人口进行修正后,可以发现,漏记的人口与多记的人口相互抵消后,1816 年长沙府的实际人口比在籍人口约多 10 万,正合光绪及嘉庆《湖南通志》所载 434.8 万。从嘉庆二十一年到 1953 年,长沙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1‰,若用未加修正的 1816 年人口数,则为 6.2‰。嘉庆二十一年以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明。嘉庆二十五年长沙府人口约为 445.3 万。

文献漏记与多记的人口相抵消后,与正确的数据相合,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分县数据的考订。

2. 衡州府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衡州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4-22。

表 4-22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衡州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衡阳市				235045	7.3
衡 阳	71372	406447	17.4	1222614	37.8
衡 南				543240	16.8
清 泉	65025	436422	18.7		
衡 山	58280	490280	21.0	565189	17.4
安 仁	34128	196713	8.4	171526	5.3
耒 阳	67050	370966	15.9	532223	16.4
常 宁	40225	323418	13.9	421041	13.0
酃 县	31950	109538	4.7	93148	2.9
合 计	368030	2333784	100.0	3240786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① 胡兆量《湖南省经济地理》,第 123 页。转引自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年,第 389 页。

1816年衡阳有两个附郭县,一是衡阳,一是清泉。1912年清泉县并入衡阳县,1953年复从衡阳县划出衡南县。因此,可以大致将1953年的衡南县看作清代的清泉县。比较而言,1953年衡阳人口比例较清代中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主要原因在于衡阳市人口的增加。1953年,衡阳市人口多达23.5万,已具一中等城市的规模。

同治《酃县志》卷7《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编查底册总计土著及寄籍烟民共大小男妇”97834名口。据表4-22,嘉庆二十一年酃县人口为109538,21年中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4‰。“嘉庆、道光以来,地方官均于冬季造报丁册,案存兵房。咸丰五年邑遭兵燹,卷宗遗失,以前户口数目不能具详。现在遵办保甲门牌,但据同治十年造报”,土著烟民6995户,大小男妇26481名口,寄籍烟民10059户,大小男妇90662口,合计为17054户,117143口。从嘉庆二十一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2‰。1953年,酃县人口不足10万,人口减少的原因可能与太平天国战争及战后湘东山区长期的动乱有关。这一解释适用于安仁以及长沙府的攸县和茶陵。

湘东山区的人口减少与近代战乱有关。

同治《衡阳县志》卷3《赋役》记载了乾隆二十一年衡阳县户数为97589,口数为563790^①。这一年,析衡阳县东南乡立清泉县,此数据为析县前的衡阳县户口数。从乾隆二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一年,衡阳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7‰。据表4-22,以衡阳、清泉两县合计,从嘉庆二十一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3‰。

只是需要说明的是,衡州府中心区清泉、衡阳两县完全不能作为全府人口增长速度的代表,非中心地区的人口增速要低得多。从嘉庆二十一年至1953年,衡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有2.4‰,是其东部若干县遭到战争破坏所致。若排除战争因素,则

^① 同治《清泉县志》卷4《贡赋·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户数为41834,口数为254139;同治《衡阳县志》卷3记载分县以后的户数为42784,口数为261075。两县户数口数分别相加,均少于分县前的总数,故不采纳。

可以嘉庆二十一年以后长沙府的人口增长率为例,也是 6.5‰。可见,从清代中期至 1953 年,湖南中部和北部地区正常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 6‰左右。据此推测,乾隆四十一年,衡州府人口约为 183.7 万,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为 228.8。依同样速度推测,长沙府人口约为 341.9 万。

3. 宝庆府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宝庆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4-23。

表 4-23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宝庆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武 冈	86770	383240	4.4	731349	16.6
邵阳市				117743	2.7
邵 阳	114718	646575	5.6	1585800	36.0
隆 回				499743	11.3
新 化	46840	430400	9.2	792716	18.0
漣源 1/2				323655	7.3
新 宁	35378	122600	3.5	253459	5.8
城 步	15550	89390	5.7	100747	2.3
合 计	299256	1672205	5.6	4405212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说明:1953 年武冈县人口中包括洞口县人口,邵阳县人口中包括邵东县、新邵县人口。1947 年析邵阳、武冈、新化三县设隆回县。

如设自多县析出者,每县析出的人口都是均等的,则 1953 年原邵阳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46.1%,原武冈占 20.4%,原新化占 25.4%,其余两县合计占 8.1%。

嘉庆二十一年邵阳县人口比例占全府人口的 38.3%,1953 年邵阳县的人口比例较 1816 年高出 8 个百分点,是邵阳城市人口增加所致;将 1953 年隆回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划归武冈县后,1953 年武冈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可达 20.4%,嘉庆二十一年武冈县户占全府的比例为 29%,口占 22.9%,显然,口的比例更接近于

1953年。据此可知1816年武冈县的口数准确而户数是不准确的。

将划给涟源县及隆回县的人口回归新化,1953年新化县人口可达112.1万,占全府人口的25.4%。嘉庆二十一年,新化县口占全府口的25.7%,户占15.7%,可见口数是正确的,户数则偏低。新宁、城步两县人口虽有增加,但增幅较小,所以,1953年此两县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下降。

再以邵阳县为例,据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卷2,1907年该县人口为1188008人。从嘉庆二十一年至此,邵阳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5‰。

同治《新化县志》卷9《食货》记载乾隆二十四年新化县户数为53417,口数为395443。嘉庆二十一年户口数同表4-23。道光二十九年户数为51112,口数为453188,同治十年户数为56280,口数为486488。如此,从乾隆二十四年至1953年,新化县的人口增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5‰、1.6‰、3.2‰和10.6‰。从乾隆二十四年至1953年,新化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5‰。处于开发过程中的宝庆府地区,长期维持这样一个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只是,从乾隆二十四年至嘉庆二十一年,册载人口的增长速度偏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嘉庆二十一年新化县的户口偏低。调整后,嘉庆二十一年宝庆府人口为178.2万。

总之,除新化县外,1816年宝庆府各县人口大体是准确的。从1816年至1953年,宝庆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1‰。若对新化县人口加以修正,人口增长速度略有下调,为6.6‰,较衡阳府略高。如此,以6‰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对宝庆府人口进行回测,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140.3万,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182.5万。

二、湘北地区

1. 岳州府

嘉庆二十一年和1953年岳州府户口数,见表4-24。

表 4-24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岳州府户口

县 名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巴 陵	93740	712390	7.6	507801
平 江	33658	216179	6.4	559671
临 湘	48324	369797	7.7	263515
华 容	118490	416270	3.5	400230
岳州卫	8838	68282	7.7	
南县 1/2				182083
合 计	303050	1782918	5.9	19133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说明：1891 年析华容县置南州直隶厅，1897 年改南县。

南县是在长江泥沙淤出的土地上设置的。虽然从本质上南县并非从老县中划出一块土地而形成，但当地的移民人口却大多是从周边县份迁入的。其中，来自华容县和安乡的人口一定多于来自其他县份者。所以，从表 4-24 中的数据来看，从 1816 年至 1953 年，在岳州府辖四县中，只有平江县的口呈增长状，其他三县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全府人口仍是增长的。

然而，平江的人口增长相当快。从嘉庆二十一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7.0‰。华容的人口增长却是太慢了一点，将南县人口的半数划入华容，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 1.2‰。然而，光绪《华容县志》卷 3《户口》有不同的记载，“嘉庆二十二年编查门牌烟户”23989 户，190873 丁口，与光绪《湖南通志》所载相距太大，如为真实，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 7‰。由于南县设县可能导致人口高速增长，所以，可以将清代中期岳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 6‰，大致是长沙府和衡阳府的水平。

据表 4-24，1816 年的巴陵、临湘两县人口大大多于 1953 年。按照本卷第十二章的研究，这是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所致。

修正后的嘉庆二十一年岳州府人口约有 155.8 万，以 6‰的

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岳州府人口约 122.6 万,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约 159.6 万。

2. 常德府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常德府户口数,见表 4-25。

表 4-25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常德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常德市				94801
武 陵	108302	681791	6.3	633176
桃 源	42380	301850	7.1	640560
龙 阳	34770	186495	5.4	466733
沅 江	17110	79806	4.7	392935
合 计	202562	1249942	6.2	2228205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在常德府,光绪《桃源县志》卷3《赋役志·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一年桃源县有 127235 户,453725 口,户均只有 3.6 口。与表 4-25 中桃源县户口数相比,相差甚大。另外,1816 年武陵县的人口数接近 1953 年(含常德市),也是不正常的。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不详。在常德府四县中,武陵、桃源两县近代以来,并未像沅江、龙阳(汉寿)一样因湖田开垦而引发人口大量增长,因此,桃源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可能适用于武陵。从 1816 年至 1953 年,采用光绪《桃源县志》中的数据,桃源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5‰,用此速度估测,1816 年的武陵县人口仅为 51.6 万,册载人口较实际人口多出 16.5 万。与桃源县漏记的人口相互抵消后,实际人口大抵与在籍人口相符。

从 1816 年至 1953 年,常德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5‰,设嘉庆二十一年以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乾隆四十一年常德府人口为 106.6 万,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约 127 万。

3. 澧州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澧州分县户口数,见表 4-26。

表 4-26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澧州分县户口

县 名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本 州	60950	300310	4.9	730433
安 乡	34660	158730	4.6	278592
石 门	36109	176465	4.9	400210
慈 利	35270	139560	4.0	453414
安 福	30450	138360	4.5	262781
永 定	19860	128370	6.5	211797
南县 1/2				182083
合 计	217299	1041795	4.8	251931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说明：1953 年澧州本州人口中包括津市市人口。

在澧州，同治《慈利县志》卷 4《户口》记载乾隆十一年有 23698 户，109677 口，户均 4.6 口；嘉庆二十年有 35410 户，140236 口，户均 4 口。其中嘉庆二十年的户数与口数比表 4-26 中户口数稍多，因不影响分析，不作修正。从乾隆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年，慈利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8‰，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6‰。如果将嘉庆二十年慈利县的户均口数调整到 4.6，是年慈利县人口约为 16.3 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 5.8‰。以此数为起点，从嘉庆二十年至 1953 年，慈利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7.4‰。

如是，嘉庆二十一年澧州人口可达 106.5 万，从这一年至 1953 年，澧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5‰。澧州人口的较高增长，与移民的迁入有关。在安乡，民国《安乡县志初稿》卷 13《户籍》称：“邑五方杂处，列县人民视此为平皋沃野，竭力经营，较列强以吾国以殖民更恶。故现时人民客籍已达四之三。”外来移民是澧州人口增长较快的原因。设澧州嘉庆二十一年以前的年平均增长率与慈利县同，乾隆四十一年澧州人口约为 84.5 万，嘉庆二十五年人口约为 109 万。

澧州人口的较快增长，与移民的迁入有关。

三、湘南地区

1. 永州府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永州府的分县户口数,见表 4-27。

表 4-27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永州府分县户口

县 名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零 陵	89240	396075	4.4	518295
祁 阳	56605	329700	5.8	1045856
东 安	44108	229748	5.2	272715
道 州	37570	168130	4.5	360851
宁 远	23366	131601	5.6	417076
永 明	22570	142610	6.3	112224
江 华	15498	83758	5.4	214584
新 田	14980	198430	13.2	170658
合 计	303937	1680052	5.5	3112259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说明:1953 年祁阳县人口中包括祁东县人口。

各县数据中,最不可思议的是祁阳县人口的高速增长。1953 年祁阳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33.6%,而在 1816 年,祁阳县人口仅占全府人口的 19.6%。从 1816 年至 1953 年,祁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8.5‰,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以 6.5‰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1816 年的祁阳县人口至少有 43 万,册载人口较实际人口至少漏记了 10 万人。

与祁阳相反,嘉庆二十一年新田县的人口超过 1953 年,明显高估。其户均口数高达 13.2,是错误的。按照新田县户的比例进行估测,1816 年该县人口不会超过 10 万。也就是说,1816 年的新田册载人口较实际人口多估了 10 万左右。

高估人口与低估人口相互抵消后,1816 年永州府的册载人口与实际人口大体相等。从嘉庆二十一年至 1953 年,永州府的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为 4.5‰。永州府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及祁阳县,是因为有些县的人口增速甚低。如东安县,光绪《东安县志》卷3《田赋》记载同治十三年计户 47482,计口 264359,嘉庆十六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2.4‰;再至 1953 年,人口增长甚少,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0.4‰。与长沙府和衡州府相比,永州府的人口增长速度显然要慢得多。这仅仅指永州人口增长的平均速度,事实上,永州北部的祁阳人口增长速度并不低于衡州。以 4.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推测,乾隆四十一年永州府人口约为 140.4 万,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约为 171 万。

2. 郴州和桂阳州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郴州及桂阳州分县户口数的变动,见表 4-28。

表 4-28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郴州、桂阳州分县户口

县 名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彬 州				
本 州	38890	259040	27.8	224192
永 兴	43300	169370	18.2	294352
宜 章	32000	110520	11.9	232468
兴 宁	28530	152236	16.3	156446
桂 阳	33850	141770	15.2	175929
桂 东	12405	98394	10.6	83218
合 计	188975	931330	100.0	1166605
桂 阳				
本 州	88860	395810	50.2	347956
临 武	24300	119740	15.2	140432
蓝 山	24920	134570	17.1	154900
嘉 禾	27331	138048	17.5	151939
合 计	165411	788168	100.0	795227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同治《桂东县志》卷4《赋役·户口》记乾隆六十年该县大小男妇共90337丁口,嘉庆二十年为98121丁口,对照表4-28,可知与《湖南通志》为同一系列。道光三十年为99765丁口,咸丰十年为100241丁口,同治五年,“通查土著寄籍民僧”共12419户,100644丁口;此外还有瑶人36户。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十年,桂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至同治年间,桂东人口呈微弱增长,到1953年,人口减少,甚至少于乾隆六十年的水平。其原因也可能与靖州等山区相似,兵燹、瘟疫等导致山区人口的下降。太平天国战争及国共两党战争是这一区域所经历的最大灾难。

以4‰的速度进行推测,乾隆四十一年郴州人口约为78.1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94.6万。本卷第十二章证明太平天国战后桂阳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8‰,假设清代中期为2‰,乾隆四十一年桂阳州约有人口72.2万。

四、湘西地区

1. 永顺府

嘉庆二十一年和1953年永顺府分县户口数,见表4-29。

表4-29 嘉庆二十一年和1953年永顺府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			1953年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永顺	54310	302690	5.6	237142
古丈				70548
保靖	20476	96840	4.7	152089
龙山	24750	143630	5.8	247972
桑植	31670	99306	3.1	182476
合计	131206	642466	4.9	890227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4-21。

说明:1825年于永顺府南境古丈坪地方置厅,1913年改县。

从表4-29中数据看,永顺县的户口数最令人怀疑。与古丈县合计,1953年永顺、古丈两县合计只占全府人口的34.5%,而

1816年永顺县户数占全府户数的41.4%，口数占47.1%。口数的错误是明显的。

民国《永顺县志》卷12《食货志》记载乾隆七年(1742年)永顺县有19693户,103683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34187户,185022口;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有54003户,306401口;嘉庆二十一年户口数同表4-29。同治十年有27888户,141962口,内古丈厅7353户,36219口;民国三年有68795户,245311口,民国十二年有79806户,331324口。这一系列数据问题很多,不可全信。

乾隆七年属于户口调查制度草创时期,数据可能偏低,但永顺县的情况有些特殊,有土户、客户和苗户的分类记载,说明这次调查并非关注“人丁”。乾隆二十五年也有同样的分类数据。然而,从乾隆七年至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2.7%,尤其是土户人口从5.5万增加至11.4万,说明乾隆七年的土著可能低估。从乾隆二十五年至五十八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到15.4%。嘉庆二十一年户口数据仅与乾隆五十八年稍有不同,问题何在?

乾隆七年的数据未包括全体人口。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永顺府属四县户口,列如表4-30。

表4-30 乾隆二十五年永顺府属四县分类户口

户口	永顺	保靖	龙山	桑植	合计
土著 户	20346	7952	9982	8031	46311
口	113765	34497	50555	21219	220036
苗民 户	4686	3227	1364	163	9440
口	25133	12386	7155	536	45210
客民 户	9155	1418	7071	12547	30191
口	46123	5552	37407	30837	119919
合计 户	34187	12597	18417	20741	85942
口	185021	52435	95117	52592	385165
户均口数	5.4	4.2	5.2	2.5	4.5

资料来源:同治《永顺府志》卷4《户口》。

桑植县户均口数太低。查同治《桑植县志》卷2《户口》，户数与府志记载相同，口数却为96641，户均4.7口。如果对保靖县人口也进行类似的修正，结果全府人口达到43.6万。根据户均4.7口的规模，对嘉庆二十一年桑植县口数也进行修正，结果得14.9万，册籍少记了5万口。另外，排除永顺县不计，保靖等三县乾隆二十五年实际人口约25.1万，嘉庆二十一年约39万，年平均增长率为7.9‰。同期永顺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8‰，较其他三县人口增长速度稍快。全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3‰。比较而言，上引民国《永顺县志》所载乾隆五十八年的数据反而不正确。或者说，因“改土归流”引发的移民潮，至乾隆末年达到高峰，嘉庆年间，永顺府的人口增长陷于停滞。

外来移民导致永顺府人口高速增长。

乾隆二十五年永顺府人口为43.6万，以8.3‰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乾隆四十一年为49.8万，嘉庆二十五年为71.6万。

2. 湘西四厅和靖州

为了便利，我将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和晃州厅简称为湘西四厅。嘉庆二十一年和1953年湘西四厅与靖州的分县户口数，见表4-31。

迁入湘西四厅的汉族移民较少，当地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低。

查宣统《永绥直隶厅志》卷15《食货门》，乾隆十六年(1751年)苗民、客民合计为8179户，37457口；嘉庆二十二年为16372户，75028口。嘉庆二十二年户口是表4-31所载的2倍有余。道光《晃州厅志》卷32《户口》亦称，嘉庆二十二年土著民人共5018户，客籍民人949户，大小男丁妇女共56716名口，口数亦较表4-31中的增加1倍有余。用这两个数据对表4-31进行修正，1816年湘西四厅总人口为241503。分厅分析，1816年乾州、凤凰、永绥、晃州四厅各自的人口比例分别为14.5%、30.9%、31.1%和23.5%，与各厅1953年各自的比例接近。这说明来自两部《厅志》的数据要比光绪《湖南通志》更可靠。

从嘉庆二十一年至1953年，湘西四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1‰。这一人口增长速度较永顺府为低，是因汉移民迁入的数量以永顺府为多，而湘西四厅略少。以6‰的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四厅人口约为19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24.7万。

表 4-31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湘西四厅与靖州分县户口

厅 县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湘西四厅				
乾 州	7190	35090	4.9	103806
凤 凰	14942	74669	5.0	179155
永 绥	4383	25284	5.8	139316
晃 州	5967	27034	4.5	134104
合 计	32482	162077	5.0	556381
靖 州				
本 州	35020	266150	7.6	93280
绥 宁	40770	196880	4.8	150086
会 同	12394	88981	7.2	214206
通 道	16290	67170	4.1	83029
合 计	104474	619181	5.9	540601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说明：1953 年会同县人口包括洪江市人口。

光绪《靖州乡土志》卷 2《户口》记载乾隆七年(1742 年)户 23955,口 119328;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户 32455,口 153341;道光十六年(1836 年)户 28378,口 128567;同治十二年(1873 年)户 16382,口 74192。表 4-31 中嘉庆二十一年靖州本州的口数显然是太高了。这一年的户数尚不太离谱,仅比乾隆二十二年数稍多,但口数则增加 11 万余人,我估计这里为转抄时错将“一十六万”写成了“二十六万”。

然而,从道光至同治,靖州本州的册载人口持续地下降,乡土志的作者解释说:“自咸丰以来迭遭兵燹,户损过半”,“今查州境汉户”20822 户,男 44126,女 35780,合计 79906。“按户数增于同治而丁数不增,询诸州人,称光绪九年牛瘟,民户大困,二十五六年水旱频仍,二十七年夏大疫,户口渐减。”即使这一描述没有错,但也只解释了咸丰以后的人口减少。实际上,道光十六年的户口较之以前,就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道光以后,靖州人口减少。

光绪《会同县志》卷3《食货·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三年烟册民数实在 14693 户,通共大小男妇 104008 口,户口数均较表 4-31 为多。依据这一资料,从嘉庆二十三年至 1953 年,会同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4‰。

然而,由于靖州册载人口的大量减少,同一时期靖州人口的增长并未达到同样的速度。依据光绪《靖州乡土志》对靖州本州人口进行修正后,嘉庆二十一年靖州人口约为 53.4 万。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一年,靖州本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1.4‰。若此增长速度可以推至全州,则乾隆四十一年,靖州人口总数约为 50.5 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 53.7 万。

3. 辰州府和沅州府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辰州府和沅州府的分县户口变动,见表 4-32。

表 4-32 嘉庆二十一年和 1953 年辰州府、沅州府分县户口

县 名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辰州府				
沅 陵	49530	374560	7.6	369400
泸 溪	18760	93560	5.0	132688
溆 浦	43358	247850	5.7	410462
辰 溪	21445	192932	9.0	276519
合 计	133093	908902	6.8	1189069
沅州府				
芷 江	40880	239170	5.9	190103
黔 阳	29760	192535	6.5	225253
麻 阳	21740	163630	7.5	169624
怀化 3/4				138548
合 计	92380	595335	6.4	723528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4-21。

说明:1942 年析辰溪、芷江、黔阳、麻阳四县置怀化县,1953 年辰溪县人口含怀化县人口的四分之一。

沅陵县是辰州府附郭县,从嘉庆二十一年至 1953 年,其人口不增反减,其因不明。排除沅陵县不计,从 1816 年至 1953 年,辰州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1‰。辰州府的人口增长与靖州属同一类型,而与其他地区有别。以 3‰的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辰州府人口总数约为 80.6 万。考虑到沅陵县人口减少的因素,设嘉庆二十五年辰州府人口与嘉庆二十一年相同。

由于不清楚 1942 年析置怀化县时究竟从芷江划出多少人口,所以并不能说芷江县人口从嘉庆二十一年至 1953 年是减少的。从总体上看,沅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4‰。若以 2‰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沅州府人口总数约为 55 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 60 万。

湘西地区的永顺府和乾州等四厅人口因移民迁入而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辰州府、沅州府及靖州则因没有规模性的移民介入,人口呈低速增长态势。从北向南,从辰州府、沅州府至靖州,乾隆、嘉庆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依次降低。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

湘西北部人口增长速度快,南部人口增长速度慢。

五、结语

兹将清代中期湖南各府人口列如表 4-33,并与 1953 年人口进行比较。

表 4-33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湖南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长沙府	341.9	22.4	445.3	23.5	994.6	29.9
衡州府	183.7	12.0	228.8	12.1	324.1	9.8
宝庆府	140.3	9.2	182.5	9.6	440.5	13.3
岳州府	122.6	8.0	159.6	8.4	191.3	5.8
常德府	106.6	7.0	127.0	6.7	222.8	6.7
澧 州	84.5	5.5	109.0	5.7	251.9	7.6

续表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永州府	140.4	9.2	171.0	9.0	311.2	9.4
郴 州	78.1	5.1	94.6	5.0	116.7	3.5
桂阳州	72.2	4.7	79.4	4.2	79.5	2.4
永顺府	49.8	3.3	71.6	3.8	89.0	2.7
湘西四厅	19.0	1.2	24.7	1.3	55.6	1.7
靖 州	50.5	3.3	53.7	2.8	54.1	1.6
辰州府	80.6	5.3	90.9	4.8	118.9	3.6
沅州府	55.0	3.6	60.0	3.2	72.4	2.2
合 计	1525.2	100.0	1898.1	100.0	3322.6	100.0

从清代中期至 1953 年,湖南各府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的比例,是不均衡的。细察之,长沙、宝庆、澧州、湘西四厅及永州五地的人口比例增加,其他则减少。岳州府人口的比例的下降,与太平天国战争有关。靖州人口比例的下降,则与清代中期以后长期的战乱、灾荒和瘟疫有关。

本节采用衡州府的人口增长速度对长沙府乾隆四十一年的人口数进行推测,所得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与洪武时期相近,可见这一推测并不大谬。事实上,在清代中期,衡州、长沙、宝庆、岳州、澧州等地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均为 6%左右,反映出湖南发达农业区域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大体一致的。

1953 年,长沙府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反映在县的设置上,从清代末年至 1953 年,长沙府属诸县中析置出株洲、望城、双峰、涟源、桃江五县,人口迅速增加,才有新县设立。清代是宝庆府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从清代中期至 1953 年,宝庆府的人口比例逐渐提高,这与该区的区域开发及新县增加的趋势是一致的。在 1951 年至 1952 年,宝庆府属五县中竟析置出邵东、新邵、隆回、洞口四县。新县设置的比列高于长沙府。显

而易见,清代中期以后,宝庆府的人口增加应当是迅速的。澧州人口比例的增加,既与其西部山区的开发有关,也与南县设县后的人口增长有关。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的乾隆四十一年湖南人口总数为 1499 万,较表 4-33 中估计要少 26.2 万。《户部清册》所载嘉庆二十五年湖南人口总数为 1892.9 万,《嘉庆一统志》所载为 1854.9 万,光绪《湖南通志》所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湖南全省人口总数为 1865.6 万,表 4-33 所得修正值为 1898.1 万,与《户部清册》接近,而稍多于《嘉庆一统志》所载。根据表 4-33,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一年,湖南省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

第三节 湖 北

《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湖北分府人口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缺少其他可靠的资料来源,使得本节对湖北户口数据的修正变得相当困难。鉴于此,我更愿意将本节的所有修正当作尚待证实的假设。将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口数与 1953 年数据进行对比,有表 4-34。

《嘉庆一统志》有关湖北分府户口的记载,大都是不可信的。

表 4-34 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湖北分府户口

府 州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武昌府	790667	6872955	8.7	23.6	3350243	12.2
汉阳府	591445	3682518	6.2	12.7	4545064	16.6
黄州府	490887	3621415	7.4	12.5	4227111	15.4
德安府	435953	2242062	5.1	7.7	1886727	6.9
安陆府	506277	3325215	6.6	11.4	1868115	6.8
荆门州	170639	808208	4.7	2.8	820555	3.0
荆州府	640212	4156203	6.5	14.3	3114452	11.3
宜昌府	106402	733625	6.9	2.5	1610994	5.9
施南府	174362	919981	5.3	3.2	1532310	5.6
襄阳府	332968	2122923	6.4	7.3	2700122	9.8

续表

府 州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鄖阳府	74925	587141	7.8	2.0	1798039	6.5
合 计	4314737	29072246	6.7	100.0	27453732	100.0

资料来源:《嘉庆一统志》。

说明:在1953年武汉市的142.7万人口当中,估计有42.7万人属于武昌。依此将1953年武汉市分为武昌府和汉阳府两部分。

从表4-34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大部分府的户均口数偏多,各府口数在全省口数中的比例与1953年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兹分府叙述如下。

一、鄂东地区

1. 黄州府

光绪《黄州府志》卷8《赋役志·户口》所载乾隆十四年户数为71145,口数为740775,距嘉庆二十五年户数相差太多,若以此为确数计算乾隆十四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2.6‰,没有可能。乾隆十四年的黄州府户口数尚属于“丁”的范畴。为了进一步展开分析,将清代后期黄州府及1953年的分县户口数据列如表4-35。

表4-35 光绪七年、光绪三十四年和1953年黄州府分县户口

县 名	光绪七年(1881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1953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黄 冈				192046	960096	5.0	929345
红 安				84914	435789	5.1	354647
大悟 1/4							78735
麻 城				131359	717890	5.5	571914
胜 利							172253

用清代后期的数据推测清代前期的户口,实在不是一个好方法。

续表

县名	光绪七年(1881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1953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罗田	21850	187332	8.6	41822	214436	5.1	221789
浠水	74942	293785	3.9	93874	526248	5.6	577876
蕲春	27343	211518	7.7	96369	534843	5.5	512262
黄梅	71017	271725	3.8	63738	301168	4.7	459696
广济	33794	207509	6.1	64410	319371	5.0	348594
合计	441016	2541116	5.8	768532	4009841	5.2	4227111

资料来源：光绪七年数据来自光绪《黄州府志》卷8《赋役志·户口》，光绪三十四年数据来自民国《湖北通志》卷43。

说明：1953年黄冈县人口中包括新洲县人口。1952年析罗田、麻城、黄冈三县设胜利县。1933年析孝感、黄陂、黄安(红安)及河南罗山设礼山县，1952年改大悟县。

在表4-35的分县数据中，有黄安(红安)、麻城和蕲春三县1908年的人口多于1953年。或有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这一区域经历过战火的考验，著名的黄麻暴动，就发生在这一区域，红安县作为将军县亦远近闻名。1908年至1953年，黄、麻地区人口不增反减，似乎可从此得到解释。

麻城的人口数据对这一假设提出了否证。民国《麻城县志》卷3《食货·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为283888，光绪二年(1876年)人口为368312；民国《湖北通志》卷43记载1908年人口为717890；1953年为571914，若加上胜利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则为62.9万。从乾隆六十年至光绪二年，麻城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从光绪二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此数据即使有所低估，也不会太多。也就是说，这一数据可能是真实的。在表4-35中，光绪七年的麻城人口仅有21.3万，比光绪二年的数字还要低。麻城的例子可以证明光绪《黄州府志》卷8所载光绪七年的分县户口是大大低估了的。1908年的麻城人口多于1953年，更是不可接受的。

假定麻城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代表黄州府的平均水平,则乾隆六十年(1795年)和1953年麻城县人口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应是相同或相近的。加上三分之一的胜利县人口,麻城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15.2%,以此比例,测得乾隆六十年黄州府有人口约187.1万。若以此数为真,至嘉庆二十五年,黄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8‰,显然是荒诞的。以《嘉庆一统志》中数据为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黄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与其他所有数据相比,这一数值显然要合理得多。

在明清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黄州府长期扮演一个人口输出地的角色,即移民外出的中心。因此,这一区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可能太高。按照长江下游地区水平,设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黄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则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303.8万。

自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黄州府1‰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并不是真实的人口增长速度。本卷第十二章证明太平天国战后至1953年黄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为6‰,以1953年人口为基础,以此增长速度回溯到战后,可得战后黄州府剩余人口。以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为基础,按照4‰的年平均增长率可推得战前人口,战前、战后的人口差可视作战争中的死亡人口。

2. 汉阳府

1820年汉阳府人口为368.3万,1953年为454.5万。1953年汉阳府人口数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口人口之增加。即便如此,133年间汉阳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6‰。1953年武汉市人口多达142.7万(包括武昌),如果扣除武汉市近代增加的人口,汉阳府的人口增长速度还要低得多,大约只有1‰左右,与黄州府的情形相同。

在一个城市化获得高度发展的地区,汉阳府人口的低增长,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究其原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一地区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战争破坏。战争破坏造成的人口损失与城市化引起的人口增长相互抵消,人口增长保持着较低的速度。

据光绪《汉阳县志》卷1《地理略·户口》,嘉庆二十二年有户

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清代中期至1953年黄州府人口增长速度极低。

汉阳府与黄州府的情况相同。

103179,口 428526。而在民国《湖北通志》中,1908年汉阳县户数为 87537 户,481917 口。1953 年汉阳县亦仅 442853 人。从 1820 年到 1953 年,汉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0.2‰,几乎没有增加。这一增长速度与扣除武汉市人口增长后的汉阳府人口增长速度相近。

与黄州府相同,按照 4‰ 的年平均增长率进行推测,1776 年汉阳府人口为 309 万。

3. 武昌府

在表 4-34 揭示的一系列数据中,1820 年武昌府的人口大大超过 1953 年。一般说来,在 133 年间人口不增反减的地区,一定经历过大的战争破坏、自然灾害或瘟疫流行。而这一时期,对这一区域人口影响最大的只能是太平天国战争。1852 年,太平军从湖南入湖北境,攻克武昌后,顺水东进,当时武昌城中“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人口大量东下。然此时的武昌城人口并不很多,故对人口的影响也不很大。1853 年 5 月太平军溯长江西征,再次攻克武昌,1854 年底,石达开部率军西进,第三次攻克武昌。将武昌、黄州二府的情况与安庆府作一类比,著名的安庆保卫战相持时间长达 11 年,战火一次次洗劫安庆平原,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都甚于武昌府和黄州府。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十章中,我曾指出太平天国战争使安庆府人口损失了 56%。这是一个不低的人口死亡率。武昌府的人口损失可能为战前人口的 40%。

在本卷第十二章,我证明太平天国战后的 1865 年至 1953 年,黄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汉阳府为 5.8‰。汉阳府因汉口市的成长使其人口得以快速增长,武昌府城的人口增长也相当迅速。在 1953 年的人口中,我将当时武汉市 142.7 万人口中的 42.7 万人口划入武昌城。如是,从战后 1865 年至 1953 年,武昌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可能达到 5.5‰。1953 年武昌府人口为 335 万,依此增长速度,1865 年人口为 206.7 万。战争中的人口损失以 40% 计,1851 年有人口 344.5 万。

从嘉庆二十五年至太平天国战前的 1851 年,设人口年平均增

长率为4%。以《嘉庆一统志》所记人口为准,1851年武昌府有人口777.8万。如果说1820年的武昌府人口数正确,就意味着武昌府的人口损失了571.1万,人口损失率高达73.4%。这一人口死亡比例得不到其他资料的证实。《嘉庆一统志》所载武昌府人口数据存在浮夸。

民国《湖北通志》卷43记载的1908年武昌府分县数据中,阳新县人口多达59万,而1953年只有34.3万。另外,崇阳、蒲圻、嘉鱼三县人口也比1953年多。在找不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这一年的数据是准确的。据此进一步推测,嘉庆二十五年县级数据的胡编乱造同样是造成全府数据错误的根本原因。

以1851年人口数为基础,以4%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武昌府人口约为304.4万。《嘉庆一统志》所载较实际人口多出382.9万,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尚不清楚。依同样的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武昌府人口约为255.4万。

二、鄂中地区

1. 德安府

在表4-34中,1820年的德安府人口均多于1953年。在这一时期中,德安府并未受到大的战争、灾荒或瘟疫的袭击。唯一的解释是1820年的数据存在问题。分县户口数见表4-36。

1908年的随县人口高达110.1万,较1953年随县人口多出50余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迄今为止尚找不到资料证明,清代末年及民国年间,随县遭受过近半数人口死亡的大灾难。另外,在安陆县和应山县,1908年人口均高于1953年,也不正常。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光绪十二年安陆县户数和口数均大大低于1908年。光绪十二年安陆县的户均口数高达7.6,且与1953年人口相差太大,也不正确。从1908年及1953年分县人口在全府人口比例的比较中可见,除了随县以外,1908年其他各县人口数的夸大是大致等幅的。

在未受到过大的战争、瘟疫和灾荒袭击的地区,1820年的人口不可能少于1953年。

表 4-36 光绪十三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德安府分县户口

县 名	光绪十三年(1887 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随 县				167217	1100670	6.6	634602
应 山				74441	449710	6.0	391305
云 梦	41949	207887	5.0	41759	212225	5.1	269561
应 城	48697	289925	6.0	70146	302686	4.3	311735
安 陆	20817	158421	7.6	60679	316821	5.2	279524
合 计				414242	2382112	5.8	1886727

资料来源：1887 年数据据光绪《德安府志》卷 6《田赋志·户口》，其中安陆县户口为光绪十二年(1886 年)册案。其余户口数同本卷表 4-35。

然而，从表 4-36 历年人口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光绪二十三年间云梦、应城和安陆三县人口皆低于 1953 年，说明这一系列的数据仍有其可靠的一面。也就是说，县志中的数据和省志中的数据可能并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分县计之，从 1887 年至 1953 年，云梦、应城、安陆三县各自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低互见，并不一致，然以三县合计，1887 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以 1953 年人口为基础，以此增长速度回溯，1865 年德安府人口约为 131.6 万。《嘉庆一统志》载德安府人口为 224.2 万，战后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4.1‰，如果战前人口增长还可能要低一些，以 3.4‰的速度推测，1851 年有人口 249.1 万，战争中人口损失 117.5 万，损失比例为 47%。然而，在本卷第十二章中，我证明太平天国战争对德安府的影响不大，战争中的人口死亡仅 20 万左右，即战前 1851 年德安府人口约 151.6 万。以 4‰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回溯，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约 134 万，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 112.4 万。

《嘉庆一统志》载德安府人口为 224.2 万，较实际人口多出 90.2 万。民国《湖北通志》卷 43 所载 1908 年德安府若干县的人口数明显夸大，可能与《嘉庆一统志》所据出自同一个系统。

2. 荆州府

1820年荆州府人口数据存在严重的浮夸。

据表4-34,1820年荆州府人口高达415.6万,即使将沙市当作一县,以七县计,平均每县人口多达近60万,每县人口太多,令人不敢相信。1953年,荆州府人口减至311.4万。在这100余年间,太平天国战争对荆州府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以后虽经多次大的洪涝灾害,但人口大幅减少的理由似乎并不存在。

迄今为止,我未找到荆州府任何县级户口数,因此,对这一错误进行纠正是相当困难的。采用区域类比的方法,太平天国战后至1953年武昌、汉阳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左右,岳州府未经战争破坏的地区,如华容等县从清中期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7‰,1933年荆州七县(包括从宜都县分立的枝江县)共有人口261.9万,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7‰。这一数据明显偏高,是监利县人口错误所致。1933年监利县人口为46.9万,1953年(包括四分之一的洪湖县)达73.5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7‰。另外,枝江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6‰,宜都为-0.6‰,因枝江从宜都县分立,所以疆界的划分存在一些我们尚不明白的地方,合计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9‰,尚属合理。总之,排除监利县以后的荆州府人口1933年至195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1‰。

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1865年荆州府人口数约为200.8万。战争中的人口损失最多以20万人计,1851年约有人口220万。战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4.5‰,1820年有人口约191.4万。《嘉庆一统志》较此多出224.2万,误差相当惊人。以同一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荆州府有人口约为157.1万。

3. 安陆府

安陆府1820年数据的浮夸相当严重。

据表4-34,从1820年至1908年再至1953年,安陆府人口从332.5万降至240.9万再降至186.8万。从1820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竟然为-4.3‰。1820年和1908年的数据都是不可信的。

在1908年的数据中,钟祥、京山、天门三县的人口均多于1953年,只有潜江例外。从1908年至1953年,潜江县人口年平

均增长率为 4.3‰,合乎我们对这一时期人口变动规律的认识。如果潜江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代表安陆府,1908 年安陆府人口只有 154.7 万,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按照再低一点的 4‰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嘉庆二十五年,安陆府人口约为 108.9 万。《嘉庆一统志》所载较实际人口多出 223.6 万,也是一个大错误。以此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仅有人口 91.4 万。

4. 荆门州

《嘉庆一统志》载荆门州人口为 80.8 万,1953 年为 82.1 万。133 年间,人口数几无变动。

表 4-37 嘉庆二十五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荆门州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1953年	
	口	户	口	口比例(%)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荆门		121918	543116	56.5	4.5	474973	57.9
远安	57056	23539	105980	11.0	4.5	101891	12.4
当阳	202684	64642	312405	32.5	4.8	243691	29.7
合计		210099	961501	100.0	4.6	820555	100.0

资料来源:同治《远安县志》卷6《户口》、同治《当阳县志》卷4《政典·户役》,其余同本卷表4-35。

说明:远安县为道光元年数。

如果说荆门州的人口停滞是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话,那么,我们无法解释 1908 年的人口高于 1820 年。如果否认 1908 年人口数据的真实性的话,我们很难解释 1908 年和 1953 年荆门州各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竟是如此接近。幸好在同治《当阳县志》卷 4 中,查获该县嘉庆二十五年以后若干年份的人口记载:道光三十年 26.9 万,咸丰十一年 29.2 万,同治三年 31.4 万;看不出任何战争破坏的痕迹。光绪十五年《当阳县补续志》卷 1《政典·户口》记载的光绪元年至光绪十五年的人口数,多为 32 万至 33 万。直到 1933 年的调查中,当阳县人口仍有 30.5 万。在当阳县的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夸大的人口数。同治《当阳县志》卷 4

嘉庆二十五年
口数抄自前代。

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与乾隆五十八年口数完全相同,并在乾隆五十八年口数下注明“以上续旧志”,说明嘉庆二十五年数据是抄自乾隆五十八年的。嘉庆二十五年数据的不真实,于此可见一斑。这就是说,民国年间及清代荆门州的人口数都是不准确的。

另外,表4-37中远安、当阳两县合计人口为25.9万,如果《嘉庆一统志》中所载当年人口总数成立的话,荆门人口需达到55万,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以远安县为例,从1820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4‰。我以为远安的数据是真实的。以此增长率从1953年回溯,1820年的荆门州人口仅为45.8万,1776年仅为37.8万。

三、鄂西南区

1. 宜昌府

清代后期和1953年宜昌府分县户口数见表4-38。

表4-38 清代后期和1953年宜昌府分县户口

市 县	1865年 口	1908年			1953年 人口	1908—1953年 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
		户	口	户均 口数		
宜昌市				88433		
宜 昌	227339	91090	444791	4.9	376701	1.0
兴 山	80393	21772	97727	4.5	120924	4.9
巴 东	116194	44354	206284	4.7	273333	6.4
秭 归	108343	40358	189461	4.7	258620	7.1
长 阳		45393	195180	4.3	286197	8.7
五 峰	47752	16246	64466	4.0	100387	10.1
鹤 峰		14040	66010	4.7	106399	10.9
合 计		273253	1263919	4.6	1610994	5.5

资料来源:1820年及1865年人口分别见同治《宜昌府志》卷5《赋役·户口》、光绪《兴山县志》卷10《赋役志·户口》、光绪《归州志》卷3《田赋志·户口》,其余与本卷表4-35同。

说明:1863年口数,各县时间上有偏差,但大体围绕1863年。秭归口数为1880年。

从 1863 年至 1953 年,兴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6‰,五峰县为 6.5‰,宜昌县(含宜昌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8.2‰,秭归为 9.9‰,巴东为 9.8‰。此五县中,至少有三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太快,表明同治年间宜昌府属县的人口调查大多不可靠。

从 1908 年至 1953 年,各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1‰到 10.9‰不等,然从各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差异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宜昌县人口增长率的奇低与邻近之长阳、秭归人口增长率的偏高有某种关系。为消除这一误差,将宜昌、秭归和长阳这三个相邻的区域合在一起计算,1908 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5‰。在秭归以北和以西的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5‰~6‰。在宜昌府南部的五峰(长乐)和鹤峰,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 10‰。这一增长率并不是真实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存在或山区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 1908 年的人口调查存在大量的漏记。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口调查存在大量的漏记。

就表 4-38 中的数据而论,1908 年至 1953 年宜昌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5‰。如果考虑五峰、鹤峰两县人口的漏记部分,这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 5‰。再以长阳为例,据同治《宜昌府志》卷 5,嘉庆二十五年长阳县口数为 124652,从 1820 年至 1908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1‰。而据表 4-34,从 1820 年至 1953 年,宜昌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9‰。这可能意含着 1820 年长阳以外的诸县,尤其是五峰、鹤峰两县的人口可能有所低估。

如以 5‰的年平均增长率进行估计,1820 年宜昌府人口约为 83 万,1776 年约为 66.6 万。

2. 施南府

光绪六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施南府户口数见表 4-39。

在表 4-39 中所列 1908 年各县户口数据中,唯有咸丰县户均口数过高,导致其 1908 年人口数过高,以致接近于 1953 年的值。按照户均 5 口的标准调整其人口后,1908 年至 1953 年施南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4‰。

表 4-39 光绪六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施南府分县户口

县 名	光绪六年(1880 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恩 施	39154	269984	6.9	57925	267546	4.6	384186
建 始	31764	182121	5.7	43416	204606	4.7	282505
宣 恩	34851	181182	5.2	19734	99789	5.1	172239
来 凤	14365	108391	7.5	18358	93615	5.1	143598
咸 丰	18384	101761	5.5	28217	172275	6.1	179377
利 川	40536	173766	4.3	39026	217295	5.6	370405
合 计	179054	1017205	5.7	206676	1055126	5.1	1532310

资料来源：1880 年户口数据光绪《施南府志续编》卷 3《续经政志·户口》，其余同本卷表 4-35。

1880 年的分县户口数加总以后与总数不合。光绪《施南府志续编》卷 3 在分县数据之前称：“施南府六县户口共十八万零七百八十五户，男妇大小共一百零二万八百三十八丁口。”然相差不大，不予深究。问题在于，排除咸丰县 1908 年数据的错误后，是年施南府人口与 1880 年基本相同，究竟哪一个数据存在错误？

同治《恩施县志》卷 6《食货志·户口》记载，全县 50840 户，“土著流寓男妇大小”337000 丁口。而光绪《施南府志续编》在恩施县条下则声明“除流寓户口外，所有一切土著民数”。显然，包括了流寓的恩施县人口要多于土著。只是这一人口数已接近于 1953 年，令人费解。

同治《建始县志》卷 4《食货志·户口》记载乾隆二十年至咸丰元年共九个年份的户口数，自乾隆四十八年以后，该县户数多记为 3 万余，大小人丁多记为 18 万余，道光及咸丰元年间的若干年份的户口数与 1880 年的户口数非常接近。同治《咸丰县志》卷 8《食货·户口》记“阖邑新收民数”18384 户，共计男妇大小 101761 丁口，与 1880 年的户口数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光绪及光绪以前施南府属县的户口数可能都是不可靠的。

光绪《利川县志》卷7《户役志》称,“道光十二年奉文编查保甲”,利川户为 38795,丁口 192123;“同治四年经粤逆之乱,复加编查”,凡为户 33038,丁口 193443,光绪十八年复加编查,凡为户 53053,丁口 291708。从前后数据的比较来看,同治四年的复查徒有虚名,仅将道光十二年数据稍作变化而已。从道光十二年到光绪十八年,利川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7‰,这一阶段的增长率过高,可见光绪以前的数据确不可信。造成错误的原因当是道光十二年人口数的低估,而其中主要是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低估。从光绪十九年至 1953 年,利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9‰。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应是正确的。

据表 4-34,1820 年至 1953 年施南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8‰。这一速度可能反映了施南府真实的人口增长水平。以此速度回溯,1776 年施南府人口约为 77.9 万。

四、鄂西北区

1. 襄阳府

光绪《襄阳府志》卷10《食货志·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编审一州六县民户共 106334,口 431382,加上万余军卫户,合计口数为 44.9 万。若此口数为真,从乾隆二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襄阳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4.5‰。这一过高的增长率说明两个年份的数据中,必有一假。在进行这一判别之前,先将光绪三十四年及 1953 年府属各县户口数列如表 4-40。

人口增长率过高说明数据有误。

表 4-40 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襄阳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襄樊市				73298
襄 阳	141755	625747	4.4	658128
枣 阳	79260	382884	4.8	471062
洪 山				141654
宜 城	37134	193114	5.2	221873

续表

市 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1953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南 漳	87576	408906	4.7	335173
均 县	46250	221811	4.8	267994
谷 城	72668	340333	4.7	305588
光 化	40282	190230	4.7	225352
合 计	504925	2363025	4.7	2700122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4-34。

说明：洪山县后划归随县、枣阳、宜城和钟祥四县。

在1908年的户口数中，只有南漳和谷城两县人口多于1953年，且与政区变动无涉。如果扣除此两县人口数，1908年至1953年襄阳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6‰，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宜昌府略高。

同治五年《宜城县志》卷3《食货志·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九年阖县民数”户39256，口213894。“现在户”47998户，“现在男女大小丁口”293750。前一组数据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户口数，后一组数据可视作同治五年的数据(1866年)。同治五年的户口多于嘉庆十九年，似乎其间不存在太平天国战争对人口的影响。然而，用这一数据与表4-40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嘉庆十九年及同治五年的宜城户口都已超过1908年。同治五年战争已经结束，从同治五年至光绪末年，宜城地区的户口减少是毫无道理的。另外，嘉庆十九年的宜城户口已经接近1953年，而同治五年则大大超过1953年，更使人不敢相信。

民国《光化县志》卷3《户口》称：“光绪九年册报阖县民户三万一千七百六十，民口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八。”从光绪九年(1883年)至三十四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6‰，而从光绪九年(1883年)至1953年，光化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6‰。此证明除了南漳、谷城外，光绪九年及光绪三十四年襄阳府有许多县的人口数据大致是合理的。

按照表 4-34 中的数据计算,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襄阳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有 1.8‰。嘉庆二十五年襄阳府户口数的高估是显而易见的。如按 5.6‰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光绪六年(1880 年),襄阳府人口约为 165.2 万。按照我在本卷第十二章对太平天国战争过程的分析,战争中襄阳府人口损失可能只有数十万人,以 30 万人计,1851 年有人口 195.2 万,以 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到嘉庆二十五年和乾隆四十一年,襄阳府人口分别为 167.2 万和 134.3 万。

2. 郧阳府

嘉庆元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郧阳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4-41。

表 4-41 嘉庆元年、光绪三十四年和 1953 年郧阳府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元年(1796 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保康	11341	66693	5.9	18243	81425	4.5	185997
房县	27827	138369	5.0	59416	299420	5.0	318241
竹山	16255	162952	10.0	44721	266237	6.0	322872
竹溪	16848	97330	5.8	37696	191004	5.1	229445
郧西	20782	137116	6.6	42704	229181	5.4	297795
郧县	29889	196158	6.6	83042	411328	5.0	443689
合计	122942	798618	6.5	285822	1478595	5.2	1798039

资料来源:嘉庆元年户口见同治九年《郧阳府志》卷4《赋役》。

说明:同治《郧阳府志》卷4在各县条下均记载有“旧志”户口数。查所谓“旧志”应为嘉庆二年《郧阳志》,此前康熙二十四年《湖广郧阳府志》不可能记载如此多的户口。

除了表 4-41 中所载数据外,同治《郧阳府志》卷4《赋役》也记载了各县同治八年(1869 年)的户口数。同治八年的户口数很成问题。如保康县口数低于户数,竹山县和竹溪县户均口数分别达到 17 人和 22 人。同治八年的数据无法加以利用。

就嘉庆元年的户口数而言,竹山的数据问题最大。同治四年

《竹山县志》卷12《赋役》称,“乾隆三十七年并编审停焉”,“当时报部,土著流寓”共 11773 户,“大小男女”171783 丁口;“嘉庆九年范志报部,土著流寓”共 18685 户,“大小男女”共 184218 丁口;“咸丰九年陈志据八年报部,土著流寓”共 23499 户,大小男女共 334262 丁口;“现在修志报部”,“土著”24194 户,共计“大小男妇女”302173 丁口,“流寓共计大小男妇女”121206 丁口。这一系列数据没有道理,尤其是同治年间的数据更令人莫名其妙。只是从 1796 年至 1908 年再至 1953 年,两个阶段竹山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 4.4‰,说明表 4-41 中竹山县的各项人口数都是合理的。此两阶段郧阳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5.5‰和 4.5‰,说明 1796 年及 1908 年郧阳府的户口数大致可信。据此速度测算,嘉庆二十五年郧阳府人口约为 91.1 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为 71.6 万。

五、结语

根据上文中的讨论,将乾隆四十一年及嘉庆二十五年湖北分府人口列于表 4-42。

表 4-42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湖北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汉阳府	309.0	19.1	368.3	18.9	454.5	16.6
黄州府	303.8	18.8	362.1	18.6	422.7	15.4
武昌府	255.4	15.8	304.4	15.6	335.0	12.2
德安府	112.4	6.9	134.0	6.9	188.7	6.9
荆州府	157.1	9.7	191.4	9.8	311.4	11.3
安陆府	91.4	5.7	108.9	5.6	186.8	6.8
荆门州	37.8	2.3	45.8	2.4	82.1	3.0
宜昌府	66.6	4.1	83.0	4.3	161.1	5.9
施南府	77.9	4.8	92.0	4.7	153.2	5.6
襄阳府	134.3	8.3	167.2	8.6	270.0	9.8

续表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鄖阳府	71.6	4.4	91.1	4.7	179.8	6.5
合 计	1617.3	100.0	1948.2	100.0	2745.3	100.0

表4-34中不同时期不同府的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显得杂乱无章,而在表4-42中,则井然有序。将1953年与1820年相比,汉阳府、黄州府和武昌府人口总数虽较1820年有所增加,但在全省人口中比例降低。这一变化,可归结为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众所周知,湖北境内的太平天国战争,是以此三府,尤其是以武昌府和黄州府为中心展开的。

将表4-42与表4-34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嘉庆一统志》所载人口较真实的人口多出958.9万。《户部清册》所载与《嘉庆一统志》相同,同样也是错误的。《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所载乾隆四十一年湖北人口总数为1481.5万,较表4-42中的少135.8万。

据表4-42,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湖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2‰,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则为2.6‰。如果按照不加修正的数据计算,此两阶段湖北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5.4‰和-0.1‰。未经修正的数据表达出来的人口增长是无法让人相信的。

第五章 清代中期南方分府人口

——福建、广东和广西

福建、广东、广西三省数据错误的原因各不相同。

本章讨论清代中期福建、广东和广西三省分府人口。对于清代中期福建人口数据的怪异,不进行细致的分析,无从发现其奥妙所在。将道光九年福建分县数据与《嘉庆一统志》的分府数据进行比较,竟然发现建阳县口数较实际口数整整多出 200 万,户数也有相应的夸大。据此未经整理过的户口数据进行研究,不知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广东文献中记载的“丁”相当复杂,其中有些是清代前期的“纳税单位”的遗存,有些是男性人口,有些又是全体人口。认真地对广东“丁”的含义加以区分,是本研究的关键。

广西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的缺载是导致广西在籍人口远远少于实际人口的根本原因。本章尝试通过少数民族人口的估算来复原广西的总人口。

第一节 福 建

道光《福建通志》记载了道光九年(1829 年)全省分县户口数,其行文格式如:“道光九年分查照保甲门牌核实土著流寓民户屯户”和“男妇大小户口”。前面讲的是户,后面讲的是口。梁方仲先生在收录这批数据时,漏记了光泽县的户口,表 5-1 补齐。各府户口数详见表 5-1。

表 5-1 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九年和 1953 年福建分府户口

府 州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道光九年(1829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福宁府	162091	763481	4.7	164330	793378	4.8	1111400
福州府	454442	2589611	5.7	462951	2706645	5.8	2768097
建宁府	518222	3227905	6.2	521897	3250301	6.2	772351
邵武府	119558	638479	5.3	121161	646017	5.3	271996
汀州府	252011	1494835	5.9	256110	1546984	6.0	1210952
延平府	201453	853067	4.2	202946	868869	4.3	653850
龙岩府	44512	331834	7.5	44512	342886	7.7	264977
永春府	111818	482547	4.3	118980	506258	4.3	440705
兴化府	105331	530990	5.0	109089	562172	5.2	1159119
泉州府	477084	2448512	5.1	458493	2521684	5.5	2752073
漳州府	726357	3397762	4.7	729962	3604171	4.9	1739201
合 计	3172879	16759023	5.3	3190431	17349365	5.4	13144721

资料来源：《嘉庆一统志》、道光《福建通志》卷48《户口》。

说明：梁方仲先生指出，道光《福建通志》所载漳浦、诏安、德化、龙岩四县州之人口总数，与各该县州各类人口（土著民户、流寓民户、土著灶户、土著屯户）之总数不符，并在他的统计表中加以改正。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表 37。本表与梁表同。在台湾有关数据中，台湾县户口数为嘉庆十六年数字，其中包括澎湖厅户口。

就全省情况论，从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九年，福建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9‰。从道光九年至 1953 年，人口不增反减。就分府而言，这一系列数据存在许多问题，在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再至 1953 年的两个时段中，府级人口数的变动毫无规律可言，有的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很高，有的府人口不增反减。

从道光九年至 1953 年，导致人口减少的原因只有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邵武府、建宁府和汀州府三府深受战争屠杀之苦。1857 年至 1858 年两年间，太平军数次从江西建昌等地进入闽，先后攻占光泽、邵武、泰宁、崇安、建阳、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武平，并与清军展开拉锯战。战争期间人口的最大损失，并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瘟疫。按照曾国藩的说

从清代中期至 1953 年，造成福建人口锐减的原因只有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

法,建昌府及邵武、汀州各府,疾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①。1864年,太平军李世贤部从赣南进入福建,占领永定、上杭、武平、南靖、平和、龙岩和漳州,纵横数百里皆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作战之战场。战争相持的时间不长,太平军败走广东,福建境内的战事结束。这场战争对于汀州府、龙岩州及漳州府的人口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于未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争且人口减少的府而言,我们有理由怀疑其清代中期的户口数据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有些可以从分县户口的分析看出来,有些则不明其因。兹分别叙述如下。

一、闽北沿海

1. 福宁府

据表5-1,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福宁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3‰,从道光九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与1953年的数据相比较,清代中期福宁府的户口数据大致是合理的。

嘉庆《福鼎县志》卷3《户口》记载有乾隆十一年以后每隔五年的户口数。从乾隆十一年至乾隆二十六年,所谓的“实在土著男妇大小丁口”数量只有数千至万余,乾隆三十一年,则称“实在民屯土著流寓男妇大小丁口”统共74231。乾隆三十六年,人口总数增加至144324。乾隆四十一年略有增加,乾隆四十六年及以后不再变动。嘉庆十年,“实在民屯土著流寓烟户”总共22267户,“男妇大小”总共156451。乾隆三十一年数据开始包括流寓,但似未统计全部人口。乾隆三十六年和嘉庆十年的数据才是可靠的。据道光《福建通志》,道光九年福鼎县户数为28399,口数为183147。乾隆三十六年至道光九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道光九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福鼎县的人口变动趋势与福宁府相似。

光绪《福安县志》卷6《田赋》记载乾隆四十八年“清查牌甲人丁男妇大小”共217577丁,“道光十年至光绪八年清查牌甲人丁男妇

福宁府乾隆三十六年以后的数据才是可靠的。

^① 《曾文正公书札》卷6《致胡宫保》。

大小”共 328564 丁。查道光《福建通志》，道光九年人口为 250279，可见“道光十年至光绪八年”的“丁”数实为光绪八年的人口数。据此可知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和 5.1‰。从乾隆四十八年至光绪八年的百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2‰。然而，1953 年福安县人口只有 26 万余，大大少于光绪八年口数，仅比道光九年口数稍多。光绪八年至 1953 年期间，福安及福安一带并未发生较大规模的天灾或人祸，因此，福安人口的这一变动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光绪八年福安县口数是错误的。

再来讨论福宁府其他几县的户口数。福宁府分县户口数列如表 5-2。

表 5-2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福宁府分县户口

县名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霞浦	28817	112313	3.9	15.9	260868	23.4
福鼎	28399	183147	6.4	26.3	235869	21.2
福安	53839	250279	4.6	18.9	260533	23.4
宁德	30397	116201	3.8	15.6	238325	21.4
寿宁	22878	131438	5.7	23.4	115805	10.4
合计	164330	793378	4.8	100.0	1111400	100.0

资料来源：道光数据引自道光《福建通志》卷48《户口》。
说明：1953年霞浦县包括柘荣县，宁德县包括周宁县。

道光九年霞浦县的户均口数太低，其口数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仅占 15.9%，而在 1953 年，该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23.4%。这一误差可能由道光九年霞浦县的户均口数过低所引起。宁德县的情况与霞浦县类似。

道光九年人口高估的情况出现在寿宁县。是年该县人口多达 13 万余，超过 1953 年。道光九年福鼎县户均口数为 6.4，福安县为 4.6，高于或低于户均 5 口的标准值。反映在两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则分别高于或低于 1953 年。合而计之，两县人口总数在全府人口的比例，道光九年与 1953 年是相近的。

霞浦、宁德两县人口的低估与寿宁县人口的高估抵消后,所得结果也就离正确的数值相差不远了。所以,道光九年福宁府的口数可能是合理的。依 4.3‰ 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福宁府口数为 63.2 万。

2. 福州府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福州府的分县户口数,见表 5-3。

表 5-3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福州府分县户口

县名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闽侯	113131	937350	8.3	34.6	1047344	37.9
长乐	32312	132855	4.1	4.9	269015	9.7
福清	129864	764333	5.9	28.2	542976	19.6
连江	33425	174406	5.2	6.4	259587	9.4
罗源	23134	129865	5.6	4.8	111891	4.0
古田	38430	143127	3.7	5.3	184647	6.7
屏南	11087	56602	5.1	2.1	73926	2.7
闽清	27185	105826	3.9	3.9	126592	4.6
永泰	54383	262281	4.8	9.7	152119	5.5
合计	462951	2706645	5.8	100.0	2768097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5-3。

说明:1953 年闽侯县人口包括福州市,福清县包括平潭县。

1829 年福清县户数为 13 万,口数为 76.4 万,户均口数不足 6 人,但其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却高达 28.2%,而在 1953 年,该县(含平潭县)人口只占全府人口的 19.6%。福清人口的高估是显然的。

仔细分析,在福清县的 76.4 万口中,竟有 30.5 万口属于“流寓民户”,占全县总人口的 39.9%。福清县既不是茶叶产地,也不是工业基地或商业港口,何以聚集如此众多的流寓?在一般的县份,流寓人口只有数千人或万余人,闽侯县因省会所在,流寓也只有 8 万。如果减去福清这批过多的“流寓民户”不计,正常的口数

福清县多达 30 万之众的“流寓”,不知从何而来。

当在 47 万左右。

道光九年福清县的口数调低以后,除罗源县和永泰县外,同年其他各县人口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势必增加,并与 1953 年的比例接近。道光九年罗源县和永泰县的人口比例将大大高于 1953 年。从口数上看,道光九年此两县口的绝对数值已超过或大大超过 1953 年,也是不正常的。

在排除掉福清、罗源及永泰三县口数后,从道光十九年至 1953 年,福州府其他各县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9‰。清代中期以后,福州府的人口增长呈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嘉庆一统志》记载的福州府口数为 2589611。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福州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9‰。如果排除福清、罗源和永泰三县的错误,这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将是很低的。据此,以 2‰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福州府人口数约为 237.2 万。

二、闽西山区

1. 建宁府

表 5-1 中显示的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建宁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0.8‰。与其他府相比,这一增长速度是相当低的。其实,建宁府户口数据的最大问题还不在于此,在于建阳县的户口数存在很大的错误。建宁府各县户口数见表 5-4。

表 5-4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建宁府分县户口

县名	道光九年(1829 年)					1953 年	
	户	比例(%)	口	比例(%)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建安	44138	8.5	227134	7.0	5.1		
瓯宁	52698	10.1	306940	9.4	5.8	222384	28.8
水吉						59255	7.7
建阳	314799	60.3	2163829	66.6	6.9	86050	11.1
崇安	27279	5.2	109264	3.4	4.0	77657	10.1
浦城	30734	5.9	239476	7.4	7.8	193429	25.0

续表

县名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比例(%)	口	比例(%)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松溪	26525	5.1	90148	2.8	3.4	56026	7.3
政和	25724	4.9	113510	3.5	4.4	77550	10.0
合计	521897	100.0	3250301	100.0	6.2	772351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5-1。

说明:1913年建安县和瓯宁县合并成建瓯县。1940年从建瓯县析置水吉县。

建阳县口数多出200万,是一个惊人的错误。

在道光《福建通志》中,建阳县户数和口数分别占全府户口总数的60%以上,一县户口超过了其他各县户口的总和,且其户口的绝对值分别达到31万余户和216万余口,是不可能的。户口数据的错误可以从民国及1953年的人口比例中反映出来。1925年的调查属邮政调查,虽不准确,但是年建阳县人口占全府人口总数的11.7%,1937年占12.5%,与1953年的调查极相似。1925年建阳县人口只有11万余,1937年为9万余^①。

或许有论者称清代中期闽西地区茶叶经济的繁荣可能导致人口的增加。如蒋蘅在《禁开茶山议》中说:“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②这一估计不对,如以每厂30人计,合计应有3万茶工。加上客贩担夫,人数更多。又如崇安县,“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金陵道梗,商贾不行,佣工失业”^③。然而,在道光《福建通志》的记载中,建瓯县(含建宁与瓯宁两县)的流寓人口共有11411人,崇安县流寓人口为20927,可见季节性的茶工商贩并不在“流寓”

① 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第82页。《福建省统计年鉴》(1937年),转引自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第140页。

② 蒋蘅《云寥山人文钞》卷2。

③ 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记咸丰三年事。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之列。按照我对明清户籍制度的理解,列入当地户籍的“流寓”,一般是外地迁来且居住达到一定年限的有产者,并非不定居的季节工人和商人。

建阳县的情况与瓯宁、崇安相同,有记载称该县“多租于江西人开垦种茶”,“春二月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衢市集饭店渡口有毂击肩摩之势,而米价亦昂”^①。道光《福建通志》记载道光九年建阳县的流寓人口竟多达 276283,也是无法让人相信的。外地集聚于建阳一县的茶工不可能多达数十万人,即使可能聚集,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建阳的户籍。

按照 1925 年的人口比例,设 1829 年建阳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11.7%,是年建阳县人口仅有 14.4 万。这令人猜想建阳县的口数衍出“二百”万,如是,实际在籍人口只有 16 万余。只是这一解释也不完满,如果“口”数衍出“二百”万,何以“户”数也会随之而变?《嘉庆一统志》中记载的建宁府户口与道光《福建通志》所载属于同一系列,虽没有嘉庆二十五年的分县数据,但我认为,建阳的户口数存在同样的高估。

无论如何,即使对建阳县人口进行了这样大的修正,1829 年的建阳县人口仍多于 1953 年。正如上文所言,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建阳县数度为太平军所占,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进行得相当激烈,人口大规模的死亡在所难免。需要指出的是,1829 年的建安、瓯宁两县人口多达 53 万余人,1925 年仍有 42.3 万,1940 年从建瓯县析置水吉县,故 1953 年尚存 28 万余人。与 1829 年相比,1953 年的两县人口减少了近 50%。而在其他几县,人口减少的幅度要小得多。建安、瓯宁两县为建宁府附郭,战争中人口的损失应大于其他非附郭县。另外,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为何在 1925 年的人口数中,除浦城县外,其余各县皆高于 1953 年。依我的经验,民国年间的人口统计,最常见的是对人口的低估而不是高估。

在排除了建阳县的高估人口后,道光九年建宁府口数只有

^① 陈盛韶《问俗录》卷1《建阳县》。

125万,嘉庆二十五年口数只有122.8万。九年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以此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建宁府口数为112.5万。

2. 邵武府

邵武府深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

据表5-1,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邵武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太平天国时期,邵武府因地处江西入闽之孔道,所受战争影响极深。曾国藩称:“岭内如(江西)建昌各属,岭外如邵、汀各属,井邑萧条,百物荡尽。今岁疾疫流行,居民鲜少,闽中田荒米贵,油盐无从购买,且无现钱可换。”^①又称:“闽境山多水寒,米贵异常,贼之死于无食,死于地气者,动以千计,沿途狼藉,无人掩瘞。”^②这一期间发生于赣东及闽西地区的大疫,可能为伤寒或细菌性痢疾,甚至夹有鼠疫流行。与此同时,饥荒肆虐,死亡人口更多。

道光九年和1953年邵武府分县户口数,见表5-5。

表5-5 道光九年和1953年邵武府分县户口

县名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邵武	49182	280629	5.7	43.4	102152	37.6
建宁	20904	108021	5.2	16.7	57367	21.1
泰宁	21544	88041	4.1	13.6	49626	18.2
光泽	29531	169326	5.7	26.2	62851	23.1
合计	121161	646017	5.3	100.0	271996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5-1。

道光九年邵武府属各县户均口数大抵围绕户均5口波动。泰宁县户均口数偏低,导致该县口数在全府总口数的比例偏低;如果户均5口,则1829年该县口数在全府总口数中的比例可以上升至

① 《曾国藩奏稿》卷2《调派官军分道入浙闽》。

② 《曾文正公书札》卷6《致胡宫保》。

16%，与1953年接近。至于邵武县口数在全府口数中的比例呈大幅下降，可能在于作为邵武府的附郭县，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大于其他各县。此与建宁府的情况相同。按照1.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邵武府有人口约60.3万。

3. 汀州府

根据表5-1，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汀州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8‰。与建宁、邵武两府相比，汀州府口的这一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了。从清代中期至1953年，汀州府人口不增反减，其原因已如上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汀州府全境沦为战场达数年之久，同时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

分县而论，道光九年户均口数悬殊甚大，不成比例。其中最为突出者为连城县，户均口数多达60，仔细分析，户数可能遗漏了“二万”。其余各县户均口数多偏离正常值，却不知究竟是户数的错误还是口数的错误。在排除掉连城县的明显错误以后，汀州府其余七县的户均口数为5.7，仍然偏高。

从道光九年至1953年，各县人口的减少并不是成比例的。这是因为，战争和瘟疫对于汀州府各县的打击，并不是均等的。1857年，太平天国军队从邵武府入汀州府，就是从宁化县进入的。同时代的大疫，也是以邵武府为中心的。推测汀州府的疫情，是以北部各县为中心的。因此，作为府治的长汀县和汀州府北部的宁化、清流、明溪四县，道光九年的人口比例均高于1953年，这说明太平天国战争改变了汀州人口分布的格局，北部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要大大超过南部各县。

表5-6 道光九年和1953年汀州府分县户口

县名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长汀	60541	494157	8.2	31.9	238304	19.7
宁化	67111	379240	5.7	24.5	147802	12.2
清流	19551	93032	4.8	6.0	64327	5.3
明溪	29482	115664	3.9	7.5	76950	6.4

续表

县名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连城	1736	104394	60.1	6.7	131184	10.8
上杭	37925	153319	4.0	9.9	207596	17.1
武平	15577	121679	7.8	7.9	162056	13.4
永定	24187	85499	3.5	5.5	182733	15.1
合计	256110	1546984	6.0	100.0	1210952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5-1。

这也就是说,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及瘟疫的影响,道光九年至1953年的汀州府人口的变化,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只是道光九年的分县户口数据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偏差不算太大,故不作修正。按照3.8‰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汀州府人口数约为126.5万。

三、闽中地区

1. 延平府

延平府虽有南平县和尤溪县的分县户口数,但不堪使用。民国《南平县志》卷4《户口志》载乾隆五十年至嘉庆十三年南平县的户数始终为21508,数十年不变,口数则年年有所增加,人为编造的痕迹明显。民国《尤溪县志》卷2《户口》称:“嘉庆十八年起,奉文编查保甲门牌,历年查报,今实在土著民五万四千五十六户,男妇大小口共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二丁口。”加上流寓,合57418户,男妇大小口169522丁口,户均3口。文中所称“今”不知为何年。道光《福建通志》记载的尤溪县户数仅为44507,口数为194263。户数少于县志,口数多于县志。如果认为县志记载的户数正确,其年代当在道光九年之后,若认为口数正确,则在道光之前。此存疑。

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延平府口数从853067增加至

868869,年平均增长率为2‰。根据上文分析,与建宁府、邵武府相比,这一增长率是合理的。只是1953年延平府的人口数只有653850,百余年的时间里,人口不增反减,似不合情理。道光九年和1953年延平府分县户口数,见表5-7。

表5-7 道光九年和1953年延平府分县户口

县名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南平	18888	123004	6.5	14.2	169845	26.0
顺昌	24940	88752	3.6	10.2	62293	9.5
将乐	44709	196502	4.4	22.6	68107	10.4
沙县	25033	77423	3.1	8.9	100756	15.4
尤溪	44507	194263	4.4	22.4	161826	24.7
永安	44869	188925	4.2	21.7	91023	13.9
合计	202946	868869	4.3	100.0	653850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5-1。

在延平府六县中,将乐、永安两县的数据最为可疑。将乐、永安两县道光九年口的比例大大超过两县在1953年全府人口中的比例。也就是说,在延平府的人口减少中,将乐、永安两县人口减少的幅度最大。

永安县的人口减少可能与县境的调整有关。1938年划沙县三元镇置特种区;1940年明溪、永安两县的部分区域并入,改置县。然无论如何,永安县划出去的区域都不可能有一半,人口的减少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只是减少的幅度稍小而已。

将乐县的北部和西部为邵武府,南部则为汀州府;将乐县就像一个打入邵武府的楔子,实际上构成闽西山地的一部分。尽管太平天国战争似乎与将乐县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瘟疫则可能对其人口产生重大的影响。顺昌县、尤溪县的人口虽有减少,但幅度远不如将乐。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瘟疫流行中,愈往东部,瘟疫造成的影响愈小。

从清代中期至1953年延平府的人口不增反减,也与太平天国战争有关。

太平天国战争中,愈往东部,瘟疫造成的影响愈小。

沙县、南平的人口增长则须作别样的解释。1938年划沙县三元镇设特种区,是基于这一区域经济的成长和人口增加,以后的三明市即在此基础上建立。南平市是闽中地区的经济中心,并且是鹰潭至福州及鹰潭至厦门铁路的分叉点,其人口的发展可能与这一因素有关。

在清代中期以后的人口变动情况得到合理的解释以后,就可以根据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延平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人口了。以2‰的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延平府有人口78.1万。

2. 龙岩州

道光九年和1953年龙岩州分县户口数,见表5-8。

表5-8 道光九年和1953年龙岩州分县户口

县名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龙岩	19917	167324	8.4	48.8	156292	59.0
漳平	11818	132315	11.2	38.6	84693	32.0
宁洋	12777	43247	3.4	12.6	23992	9.1
合计	44512	342886	7.7	100.0	264977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5-1。

据表5-8,从道光九年至1953年,龙岩州的人口呈减少状。仔细分析,龙岩州所属三县人口皆有减少,只是漳平县人口减少的幅度最大。漳平县人口减幅最大的原因是否完全由太平天国战争所引起,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从户均口数看,道光九年漳平县户均口数多达11.2,是不正常的。如果这一分析成立,也就意味着,即使太平天国战争导致了龙岩州的人口减少,然减少的幅度并不如表5-8中数据显示得那么大。

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龙岩州户数不变,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6‰。依此推测,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28.3万。

3. 永春州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永春州分县户口数,见表 5-9。

表 5-9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永春州分县户口

县 名	道光九年(1829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永 春	73764	297341	4.0	58.7	209747	47.6
德 化	12761	109130	8.6	21.6	106343	24.1
大 田	32455	99787	3.1	19.7	124615	28.3
合 计	118980	506258	4.3	100.0	440705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5-1。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永春州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3‰。道光九年以后人口减少。永春州并非太平天国战争的重点区域。其人口的减少得不到解释,我怀疑道光九年的口数可能是高估的。以 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 40.5 万。

四、闽南地区

1. 兴化府和泉州府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兴化府、泉州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5-10。

表 5-10 道光九年和 1953 年兴化府、泉州府分县户口

市 县	道光九年(1829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兴化府						
莆 田	84263	394997	4.7	70.3	796158	68.7
仙 游	24826	167175	6.7	29.7	362961	31.3
合 计	109089	562172	5.2	100.0	1159119	100.0
泉州府						
厦门市					224307	8.2

续表

市 县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同安	169600	659009	3.9	26.1	311551	11.3
泉州市					107727	3.9
晋江	168135	791026	4.7	31.4	672633	24.4
南安	49501	334087	6.7	13.2	598987	21.8
惠安	17015	482797	28.4	19.1	494167	18.0
安溪	54242	254765	4.7	10.1	342701	12.5
合计	458493	2521684	5.5	100.0	2752073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5-1。

说明:1953年同安县人口中包括金门县人口。

未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的兴化府人口呈增长状。

未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的兴化府人口呈增长状。从道光九年至1953年,兴化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9‰。与上述各府比较,兴化府的这一人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兴化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4‰。兴化府这一时期口的增长速度太快,同期户的增速只有3.9‰,以4‰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则有人口44.5万。

将1953年的厦门市视作清代同安县(含金门县)的一部分,将1953年的泉州市也视作清代晋江县的一部分,就会发现,从道光九年至1953年,同安及厦门的人口减少幅度最大,次则晋江和泉州。然而,与泉州市毗邻的南安县人口在这124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7‰,则令人猜想晋江及泉州人口的减少,可能也有政区调整的因素。同样,在同安及厦门人口大幅减少的同时,不仅与之毗邻的南安县人口快速增长,且安溪县的人口增长也相当快,不排斥政区调整导致人口变动忽增忽减的可能性。在泉州府各县中,惠安县户均口数为28.4,户数的低估是显然的。就人口而言,从道光九年至1953年,惠安县年平均增长0.2‰,几无变动。就全府情形看,道光九年至1953年的124年间,泉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7‰。尽管增幅较小,但毕竟是增长的。

在20世纪中叶的政权更迭过程中,厦门地处两个政权对垒的

前沿。这一时期该地人口的变动是否与这一因素有关,笔者尚不清楚。一个多世纪中泉州府人口的停滞,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泉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以此速度推算,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211.8万。

2. 漳州府

道光九年和1953年漳州府分县户口数,见表5-11。

表5-11 道光九年和1953年漳州府分县户口

市 县	道光九年(1829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漳州市					81218	4.7
龙溪	222000	1496138	6.7	41.5	328852	18.9
南靖	176499	662422	3.8	18.4	145326	8.4
海澄	105222	460291	4.4	12.8	149306	8.6
长泰	30977	156803	5.1	4.4	68115	3.9
漳浦	72051	303661	4.2	8.4	271505	15.6
诏安	85250	368499	4.3	10.2	224985	12.9
东山					93931	5.4
平和	37963	156357	4.1	4.3	231347	13.3
云霄					144616	8.3
合计	729962	3604171	4.9	100.0	1739201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5-1。

说明:1928年析龙溪县设华安县,1953年龙溪县人口中包括华安县人口;1916年析漳浦县和诏安县设东山县。

龙溪县是漳州府的附郭县。加上漳州市人口后,1953年的龙溪县人口达40万余。然而,道光九年龙溪县口数多达149.6万,接近1953年人口的3.8倍,也就是说,1953年龙溪县的人口只有124年前的27.4%。

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是以漳州为中心的。这一战争带来了漳州府北部各县的人口死亡,所以,1953年南靖、海澄、长泰三县人口均少于道光九年,三县合计人口仅及道光九年的28%。与龙溪县相比,人口减少的比例相似。

道光九年漳浦、诏安、平和三县口数合计为 828517, 云霄厅口数缺载^①。1916 年析漳浦县和诏安县设东山县, 1953 年漳浦、诏安、平和、云霄及东山五县人口合计为 966384。如果道光九年的口数加上云霄厅口数, 则 124 年间漳州府南部的人口几乎没有变动。

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漳州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6‰, 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0.6‰, 户几乎不变, 而口大增, 让人不敢肯定这一增长速度是真实的。仍以 4‰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 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 285 万。

3. 台湾府

乾隆四十七年福建巡抚雅德奏报:“台湾府属实在土著、流寓民户男妇大小共九十一万二千九百二十名口。”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 我证明这一数据大致可靠, 即是说, 乾隆四十一年, 台湾人口大约为 90 万。《嘉庆一统志》载台湾府口数为 1786883, 从乾隆四十七年至此, 台湾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8.8‰。乾隆、嘉庆年间的台湾府是一个移民大量迁入的时期, 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 实属人口迁移引起的机械增长而非人口的自然增殖。

五、结语

兹将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福建分府人口数, 列如表 5-12。

表 5-12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福建分府人口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福宁府	63.2	4.9	76.3	5.2	111.1	8.5
福州府	237.2	18.4	258.9	17.5	276.8	21.1
建宁府	112.5	8.7	122.8	8.3	77.2	5.9

^① 据《清史稿》卷 71《地理志》, 嘉庆元年(1796 年)析诏安、平和二县设云霄厅, 后改县。

续表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邵武府	60.3	4.7	63.8	4.3	27.2	2.1
汀州府	126.5	9.8	149.4	10.1	121.1	9.2
延平府	78.1	6.1	85.3	5.8	65.4	5.0
龙岩州	28.3	2.2	33.2	2.2	26.5	2.0
永春州	40.5	3.1	48.3	3.3	44.1	3.4
兴化府	44.5	3.5	53.1	3.6	115.9	8.8
泉州府	211.8	16.4	244.9	16.6	275.2	20.9
漳州府	285.0	22.1	339.8	23.0	173.9	13.2
合 计	1287.9	100.0	1475.8	100.0	1314.4	100.0
台湾府	90.0		178.7		759.1	

据表 5-12,与清代中期相比,1953 年福宁府、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的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有了明显的增加。这一过程可能与近代以福州、厦门为中心的城市化和商业化过程有关。闽西山区的建宁、邵武、汀州三府及漳州府人口比例则大大减少,与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的死亡密切相关。夹于闽西山区及沿海地区之间的延平等府的人口比例少有变动。

本节分析所得乾隆四十一年福建人口总数为 1377.9 万。《清朝文献通考》卷 19 所载是年福建口数为 1122 万,《清朝文献通考》所载明显低估。

本节考订所得嘉庆二十五年福建人口合计为 1654.7 万,与《嘉庆一统志》所载 1854.6 相比,人口相差达 200 万。这 200 万人口即建宁府人口的浮夸部分。《户部清册》所载嘉庆二十五年福建口的总数为 16066553,与笔者的考订接近。这一结果令我猜想在编撰《嘉庆一统志》的过程中,建宁府的口数被编者误抄了。当编者发现建宁府的户数不能与口数对应时,编造一个虚假的户数就是很自然的了。

然而,《户部清册》中的口数较本节的订正数仍要少 56 万。这

《嘉庆一统志》中福建口数的浮夸由建阳县数据错误引起。

可能意味着嘉庆二十五年永春、龙岩和延平三地人口有可能高估。本节对上述三地清代中叶至 1953 年的人口减少做了一些解释,太平天国战争被视作最根本的原因。然而,在战争未曾涉及或涉及较少的区域,这一解释是行不通的。对于永春州,我就曾陷入这样的窘境。另外,潮州府北部诸县从道光九年至 1953 年人口减少的幅度似乎太大,令人怀疑这些县的道光九年及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有所夸大。由于缺乏证据,姑不作修正。

第二节 广 东

一、清代中期的“丁”

周宏伟对广东“丁”的分析颇见功力。

周宏伟对清代广东省级户口数据研究后认为,在清代广东省的诸多户口数据中,问题最多的是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九个户口数据。这九个户口数据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顺治十八年、康熙二十四年和雍正二年这三个数据,它们既不是实际人口数,也不是实际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是顺、康、雍三朝政府在广东省征收赋税的单位。第二类是乾隆十八年的数据,其统计对象可能只是成丁人口,即 16 岁至 60 岁年龄段男子。第三类为乾隆十四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二年和三十六年这五个数据,统计对象是不包括妇女在内的人口^①。第一类数据不证自明。有关第二类数据性质的判断还属于一种推测。关于第三类数据的性质,周宏伟有详细的证明,简述如下。

乾隆五年十一月乙酉清高宗的一条清查户口的谕旨人所熟知。这条谕旨要求“将各府、州、县人丁按户清查,及户内大小各口一并造报,毋漏毋隐”^②。然而,并非全国都在实施这一条例。例如江西省仍是照旧例编审。乾隆十一年四月乙酉一条谕旨称:“朕思从前照盐纳价,编审尚属有名,今盐钞既已摊入地粮之内,则是

^① 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第三章《人口状况》,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31。

妇女已无可征之项,何必存此编审虚名,徒滋扰累。嗣后编审妇女之处,著行停止。”^①周宏伟认为,这条谕旨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认真注意,仅仅以为是清朝政府逐步废止人丁编审制度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之一。这条谕旨又略见于《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中,但编者不该把最后一句的“之处”两字略去。因为就是这“之处”两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命令“停止(旧例)编审妇女”的省份,绝不止是江西一省。例如,广东省就是遵照了江西省的编审之例的。周宏伟引道光《新会县志》卷5《经政·户口》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

乾隆十一年奉旨,嗣后编审,俱照江西省之例,册内只载丁数。其已经摊入地粮之男妇,并官吏随住人口、食盐课钞口,以及男丁应征之徭役、民壮、均平、驿传等项银数,概免造入册内。其缺额未复丁口,亦候垦复土亩之日,随税编征;亦不必查造妇女口数。统以乾隆十一年编审为始,照例永远遵行。至三十七年停止编审。滋生丁口数目,赋役全书不载,只递年另册造报。

这条记载与清高宗的谕旨原文,在意思上差别明显。清高宗只是命令停止“旧例”编审妇女,而广东某些地区不仅停止旧例编审作为“食盐课钞口”的妇女等,而且在推行新法编审时,显然也没有“查造妇女口数”,编审册内“只载丁数”。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七年间广东省的妇女口数未能造册上报,以至于乾隆四十一年册内数字包括了妇女以后,在册人口出现了猛增。然而,并不自乾隆四十一年以后,广东的户口数据就登载妇女了,直到几十年后的嘉庆末年的广东地方“司册”中,从省到府到县仍然只见“丁”数而不见全部人口数^②。

道光《广东通志》所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全省丁数为12323616,《户部清册》所载嘉庆二十四年全省人口数为21392000,《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全省人口数为21558239。从这一系列数据看,道光《广东通志》所载很像是男性

广东“丁”的含
义极为复杂,与
江苏类似。

^① 《清高宗实录》卷265。

^② 参见道光《广东通志》卷90《经政·户口》。

人口,而《户部清册》与《嘉庆一统志》的口径同一,所记为全体人口。

周宏伟的分析很有道理,但也有例外。试举数例:光绪《丰顺县志》卷3《赋役志·户口》记载,乾隆六年编户 10123 户,72054 口。户与口有清楚的区别。只不过这里的户口,并不是现代“人口”的意义,还可能以“户口”为名的纳税单位。民国《揭阳县正续志》卷3《赋役书·户口》称:“乾隆二十七年全书开载男丁七千三百七十六丁,妇女一万七千六百七十六口,实在共二万五千五十二丁口。编征银一千三百八十九两四钱八分。”男丁与妇女的区别也非常清楚,并未只记男丁而不记妇女,究其实质,仍与赋税的征收有关。简单地认为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一年在在册人口中未包括以妇女为名的赋役单位,过于武断。

道光《广东通志》卷40《舆地略·户口》记嘉庆二十三年“丁”数为 12323616,是有分县“丁”数作为基础的。从分县记载来看,嘉庆二十三年许多县的“丁”是不包括女口的。如潮州府潮阳县,嘉庆二十三年丁数为 150352;光绪《潮阳县志》9《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统计男丁 154493 丁,妇女 99726 口。很明显,在道光《广东通志》所载的男丁之外,还存在近 10 万妇女。如肇庆府广宁县,嘉庆二十三年“丁”数为 60441;然民国《广宁县志》卷6《赋役·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一年,实在男妇丁口 100377,《广东通志》所记“丁”数之外,还存在近 4 万女性人口。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一枚举。

嘉庆二十三年广东省的全体人口比《户部清册》及《嘉庆一统志》所载理应少些,可以定为 212 万,道光《广东通志》所载同年“丁”数都是男性人口,则广东男性人口为 123.2 万,女性人口只有 88.8 万,是年广东省的人口性别比高达 138,女性人口被严重低估。

证明“丁”中包括女口的方法。

另一些县志的资料表明道光《广东通志》所载嘉庆二十三年的“丁”数即是人口之总数。以肇庆府、罗定州和嘉应州三地为例,至少有德庆州、恩平县、阳江县、东安县和镇平的“丁”数不仅仅是男性人口。证明的方法是,如将这些“丁”仅视作男子,以 110 的人口

性别比推测女口,所得总人口将超过 1953 年的各县人口。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说明部分地区的“丁”已经包括了女口。

如果按照 110 的人口性别比进行推算,是年广东省的总人口应为 235.2 万。以《嘉庆一统志》中数据为准,从嘉庆二十五年至宣统二年,广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3‰。这一增长速度可能是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嘉庆一统志》所载广东分府户口是可靠的。

当我们试图恢复分府户口数据时,所遇到问题远不止此。试分府分析如下。

二、粤中区

1. 广州府

嘉庆二十三年、道光年间和 1953 年广州府分县丁及户、口数,见表 5-13。

表 5-13 嘉庆二十三年、道光年间和 1953 年广州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年)丁	道光年间(1821—1850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男	女	丁	
广州市						1598882
南海	830666	21325	659604	459740	1119344	694583
番禺	399826					583042
顺德	488965		577820	455653	1033473	462159
东莞	321285					758677
从化	39635					163431
龙门	141867	43981			247468	152556
增城	124946					301414
新会	332876	127958	402345	286067	688412	643822
香山	176289					870059
珠海						126146
三水	68456					179302
新宁	127323		128863	68109	196972	695567
清远	137046					583789

续表

市 县	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丁	道光年间(1821--1850年)				1953年 人口
		户	男	女	丁	
新 安	146922					190012
花 县	67564					239281
合 计	3403666					8242722

资料来源：道光《广东通志》卷90《舆地略·户口》；民国《顺德县志》卷5《经政略·丁口》，道光《新会县志》卷5《经政·户役》，民国《龙门县志》卷5《县民志·户口》。

说明：

[1] 1953年南海县人口中包括佛山市，香山县人口中包括石岐镇，新会县人口中包括江门市。1914年改新宁县为台山县，改新安县为宝安县。

[2] 道光年间的户口数据在时间上并不统一，南海县为道光十年，顺德县、东莞县均为道光二十九年，龙门县为道光十五年，新会县为道光十九年，新宁县为道光十八年。

光绪《广州府志》卷70《经政略·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三年的丁数为3403966，与表5-13略有差异。又记“现编征丁三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五丁六分五厘五毫”。优免不尽丁4556，“归并屯丁二千二百二十一丁四分九厘四毫。所谓“征丁”、“优免不尽丁”和“屯丁”都是纳税单位，是广州府原有的册载赋税额。这一内容本与人口统计无关，只是地方官员仍在册籍中保留了这一类数据。

南海县及番禺县的部分以后并入广州市，所以清代中期两县人口与1953年人口无法相比。广州城市人口的发展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变动，暂不讨论。

嘉庆二十三年顺德县的“丁”数已经超过1953年的人口，“丁”数的荒诞可想而知。道光年间的顺德县人口数不仅记有男性，而且记有女口，男女合计人口超过100万。在政区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其记载是夸大的。龙门县的情况与顺德差不多，嘉庆二十三年的“丁”数为14.2万，接近1953年人口。道光年间的记载更加荒唐，全县人口多达24.7万，远远超过1953年的15.3万人口。

检查表5-13，至少还有新会、新安、东莞三县嘉庆年间“丁”数是夸大的。排除此五县不计，嘉庆二十三年广州府的“丁”数为1971751，按110的性别比折算人口，共有人口376.4万，1953年

人口为 524.7 万,135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56‰。《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广州府人口数为 587.9 万,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是 2.45‰。由此可见,排除了明显错误以后,两个系统中所载广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一致的高度。道光《广东通志》中嘉庆二十三年广州府“丁”数存在许多错误,道光年间的“丁口”或“男妇”的错误也很多。《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广州口数是正确的。以 2.4‰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广州府人口数为 529.3 万。

道光《广东通志》中有关广州府“丁”的记载错误很多。

然而,我们却不可说,《嘉庆一统志》所载各府口数都是正确的。从下文表 5-20 中可以看出,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广东各府人口的增长速度极不均衡,且无法得到解释。故有必要对各府数据进行认真的整理和辨析。

2. 肇庆府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肇庆府分县丁、人口数,见表 5-14。

表 5-14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肇庆府分县丁与人口

县名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丁	1953年人口
鹤山	108881	202202
高明		125761
高要	201515	491454
新兴	90661	231970
四会	58504	160183
阳春	102497	397036
恩平	126656	248703
开平	68991	395932
阳江	290341	595907
广宁	60441	295605
德庆	150023	181634
封川	49629	123884
开建	22588	83717
合计	1330707	3533988

资料来源:道光《广东通志》卷90《舆地略·户口》。

嘉庆二十三年肇庆府“丁”数为 1330727,如按 110 的性别比进行推算,是年该府的人口总数应为 2540479。《嘉庆一统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为 2549948,与根据“丁”数推测到的人口数极为接近。然而,从分县“丁”数看,还不能说嘉庆二十三年的“丁”真的就是男性人口的真实记载。

至少有德庆、恩平、阳江三县的数据值得怀疑。光绪《德庆州志》卷6《食货志·户口》所载与表 5-14 相同,然又记道光元年丁口 330163,其中民丁、屯丁和民妇、屯妇大约各占半数。如果此数为真,就无法理解 135 年以后的德庆县只有 18.2 万人口。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德庆州并未经历版图的调整,人口呈此大幅度的下降,实不可信。道光年间的德庆州丁妇数是不可靠的。相反,嘉庆二十三年的“丁”却可能是全体人口。

道光《恩平县志》卷6《户口》所载乾隆三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三年各届共滋生 221662 丁口,大约是“丁”数的一倍,这一数据接近 1953 年人口,很不合理。同书又有记载:“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五年共滋生二万三百三十五丁口,共无征男女二十四万九千一百六十八丁口七分九厘六毫,总编男女二十五万四千二百三十五丁口,内男一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六,女一十一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嘉庆年间的男女口数居然以银两单位计算,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道光《恩平县志》的作者以乾隆时代的“丁”作为蓝本,随意编造男女口数,才出现如此荒唐的结果。同样,我也有理由认为嘉庆二十三年的“丁”即全体人口。

道光《恩平县志》的作者随意编造男女口数。

如果将阳江县的“丁”视作男性人口的话,按照 110 的性别比,人口总数将达 554287,接近 1953 年人口数。这也是不可能的。作为证明,查民国《阳江县志》卷13《食货志·户口》,宣统年间全县分九区进行户口调查,共得 110745 户,男丁 237238,女口 230714,总共男女 467950 丁口。以此数据为准,至 1953 年,阳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6‰。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偏高,可能是因为宣统年间该县第八区“调查未遍,或有遗漏”所致。真实的人口增长速度还应低一些。正因为此,民国《阳江县志》的作者认为宣统年间较嘉庆年间“又增十七万有奇矣”,也是将嘉庆十七年的

“丁”数当作全体人口来看待的。

扣除上述三县不计,嘉庆二十三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如果将上述三县嘉庆二十三年的丁数视作全体人口数,是年肇庆府的人口总数为 2025006,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两种计算方法所得结果是吻合的,证明对德庆、恩平、阳江三县“丁”的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以 4.1‰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169.1 万。

肇庆府只有德庆、恩平、阳江三县的“丁”是全体人口。

3. 罗定州和佛冈厅

罗定州辖罗定本州、东安县(今云浮县)和西宁县(今郁南县)。将嘉庆二十三年罗定州的 374554“丁”当作真实的男性人口,折算出的全体人口为 71.5 万,与《嘉庆一统志》所载人口为 68.2 万十分接近。然而,分县而论,这一可以吻合的数据仍是不可靠的。嘉庆二十三年东安县有 158785 丁,如果这些“丁”真的只是男性人口的话,总人口将达 303135,超过 1953 年。依上例,我将此数当作全体人口数而非男性人口,而将罗定及郁南两地的 215769“丁”当作男性。依上例折算后,罗定、郁南共有人口 411923,加上云浮县口数,合计有 570708 口。从此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6‰。以此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49.1 万。

嘉庆二十三年佛冈厅的“丁”数为 34273,折算成口数共有 65430,较《嘉庆一统志》所载为多。1953 年佛冈县有人口 110406,135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9‰。以此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 5.5 万。

三、粤东区

1. 潮州府和惠州府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潮州府和惠州府的“丁”与人口数,见表 5-15。

潮州府只有南澳厅值得略加讨论。南澳厅局促于一海岛中,其疆域政区的变动不可能超出海岛并与其他县发生辖区的交换。嘉庆二十三年该县的 23693 丁,较 1953 年的 28505 口相差甚少。嘉庆年间的“丁”可以看作实际人口。如是,至 1953 年,南澳岛上

表 5-15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潮州府、惠州府的丁与人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丁	1953 年人口
潮州府		
潮州市		101353
海 阳	220679	556164
饶 平	134654	403393
南 澳	23693	28505
澄 海	90511	440154
汕头市		280414
揭 阳	338459	1005723
潮 阳	150352	946900
普 宁	161690	597364
惠 来	155810	345579
大 埔	68252	244906
丰 顺	61080	245436
合 计	1405180	5195891
惠州府		
和 平	101088	199382
连 平	71033	145294
长 宁	59388	126672
博 罗	194453	298250
陆 丰	163409	537546
海 丰	125327	433915
归 善	175019	734688
永 安	142987	282815
河 源	148018	295542
龙 川	119308	361371
合 计	1300030	3415475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5-14。

说明：

[1] 1912 年归善县改名惠阳县，1914 年永安县改名紫金县，长宁县改名新丰县，海阳县改名潮安县，1953 年划潮安县潮城镇置市，1931 年划澄海县汕头地方置市。

[2] 在原书中，和平县“丁”数与归善县相同，也是 175016。在和平县和归善县的数据中，必有一错。各县“丁”数合计为 1373961，而原书惠州府的“丁”则为 1300030。从 1953 年的数据比较中可知和平县“丁”数必定少于归善县，故和平县的丁数即为 $175019 - (1373961 - 1300030) = 101088$ 。

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4‰。在一个四面临水的海岛上,135 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当缓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将南澳厅以外的潮州府各县“丁”数视作男性人口,并依上例推算其总人口,再加上南澳厅人口,合计人口总数为 2661007,比《嘉庆一统志》记载的潮州府人口多出 45 万余人。从嘉庆二十三年至 1953 年,潮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0‰。以此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 215.8 万。

与附近各府相比,潮州府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偏高的。究其原因,汕头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1953 年汕头市人口达到 28 万,扣除汕头的城市人口,135 年中潮州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 4.5‰。

惠州府可以分为山区和沿海平原两个部分。从表 5-15 中可以看出,如与各自 1953 年的人口数相比,除了龙川县外,其他山区县如和平、连平、新丰、永安、河源等县嘉庆十三年“丁”数都较多。分别计之,陆丰、海丰、归善、龙川四县的“丁”可视为男性人口,折算成全体人口后,135 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6‰。其余六县的“丁”实为全体人口,同一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7‰。嘉庆二十三年惠州府人口总数应为 183 万,以 4.7‰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为 150.3 万。

2. 嘉应州

在道光《广东通志》的记载中,平远县的“丁”数存在很大的问题。1818 年平远县册载“丁”数达到了 182384,远远超过 1953 年的 110344。平远县的“丁”数是错误的。同样,镇平县(今蕉岭县)的“丁”数为 70821,如果以此作为男性人口数,所测出的总人口将达 135204 人,也远远超过 1953 年的 106280 人。镇平县的“丁”数实为全体人口。排除平远县不计,嘉庆二十三年长乐(今五华县)、兴宁、嘉庆州本州(今梅州市)和镇平四县人口可达 1134404,1953 年四县人口为 1499133,135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1‰。

在清代历史上,嘉应州一直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移民外出之区。大量的客家人一方面南迁进入潮州、惠州、广州和肇庆等地,一方面大量北上,迁入赣南、赣西北及四川等地。嘉庆以后,大规模的

惠州府有些县的“丁”是男性人口。

嘉应州是客家人外迁的大本营。

人口外迁已经停止,人口发展的空间变得狭小,区域内的资源紧缺必定会制约区域内人口的发展。

如以这一年平均增长率进行推测,嘉庆二十三年嘉应州人口总数约为 121.3 万,较《嘉庆一统志》所载 133.3 万口略少。在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对《嘉庆一统志》所载口数不用修正。以 2.1‰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121.5 万。

四、粤北区

1. 韶州府

嘉庆年间韶州府丁、口及 1953 年人口数,见表 5-16。

表 5-16 嘉庆二十三年、嘉庆二十四年韶州府丁、口和 1953 年人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年)丁	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		1818 年 修正人口	1953 年 人口	1818--1953 年 年平均增长率 (‰)
		户	口			
韶关市					81746	
曲 江	122779	18950	181624	234396	200243	1.4
乐 昌	53368	8354	32742	101884	168571	3.7
仁 化	65822	9148	36794	36794	54083	2.9
翁 源	96951	30232	126182	126182	164282	2.0
英 德	206274	11585	149637	393796	432705	0.7
乳 源	57601	7715	31347	57601	63117	0.7
合 计	602795	85984	558326	950653	1164747	1.5

资料来源:同治《韶州府志》卷 11,其余同本卷表 5-14。

说明:1949 年划曲江县城区置韶关市。

以嘉庆二十三年的“丁”数而论,仁化县的数据因其超过 1953 年而显得极不可靠。乳源县的“丁”则很像是全体人口而不仅是男性人口。翁源县的“丁”数若真的为男性人口,全体人口必超过 1953 年。

同治《韶州府志》卷 11 记载的是户与口,而不是“丁”。仁化县口数大大少于“丁”数,也少于 1953 年,是有道理的。但民国《仁化

县志》卷3《户口》引“旧志”记载,嘉庆二十四年民户为 13664,丁口为 77194。丁口数较嘉庆二十三年“丁”数为多。在三组不同的数据中作一选择,似乎《韶州府志》的记载更为合理。

嘉庆二十三年翁源县“丁”数为 96951,同治《韶州府志》和嘉庆二十五年《翁源县志》所载嘉庆二十四年有 30232 户,126182 口。“口”只较“丁”多出 3 万,约为总数的 23%。如果说翁源县的女性人口不足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如果《广东通志》所载仅为男性,总人口可能达到 18 万人以上。而 1953 年翁源县人口只有 16.4 万。同治《韶州府志》记载的翁源县口数有 12.6 万,似乎暗示嘉庆二十三年的“丁”数已经含有部分女口。

然而,并非《韶州府志》的记载都比《广东通志》可靠。乐昌、英德两县口数显然偏低。将曲江、乐昌、英德三县的“丁”数折算成人口,乳源县的“丁”数视作人口,翁源、仁化两县的口数采《韶州府志》所载,形成表 5-16 中的“1818 年修正人口”。嘉庆二十三年韶州府共有人口 950653。这一结果接近《嘉庆一统志》所载 1028202,故不作修正。从 1818 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5%,以此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96.3 万。

2. 南雄州、连州、连山厅

兹将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南雄、连州、连山厅的丁和人口数,列如表 5-17。

表 5-17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南雄三州、厅的丁与人口

州 县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丁	1953 年人口
南雄州	148022	231778
始兴县	57371	101941
合 计	205393	333719
阳山县	102869	249839
连 县	76399	226763
合 计	179268	476602
连山厅	33440	99301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5-14。

说明:1953 年连山县人口中包括连南县。

在南雄州,道光《广东通志》所载“丁”数合计为 205393;《嘉庆一统志》所载口数为 340668,这一数据因超过 1953 年人口而显得荒谬。民国《始兴县志》卷4《輿地略·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五年编查 20911 户,51308 丁,女 42491 口,男女共 93799 丁口,与 1953 年人口数相差无几,也是不能相信的。道光《广东通志》所载南雄州之“丁”实为人口。从嘉庆二十三年至 1953 年,南雄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6‰。

在连州,民国《阳山县志》卷5《经政志·户口》引嘉庆二十三年纂修《赋役全书》,编征男妇共 6841 丁口,内男子成丁 3839 丁,不成丁 1852 丁,妇女 1296 口。由此可见,嘉庆二十三年阳山县的“丁口”中已含有妇女。《广东通志》所载丁数已达 10 万余,尽管与《赋役全书》之“丁”不同,不属一个系列,却不敢将其作为纯粹的男性人口来看待。比较而言,《嘉庆一统志》所载 301696 口应当是正确的。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连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5‰。

道光《连山厅志·户口》称今民户凡 5263,丁口凡 33235。嘉庆二十三年《广东通志》所载之“丁”与道光年间该厅的“丁口”数同,即知“丁”中含有“口”。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人口,道光《连山厅志·食货·户口》还载有瑶户 5138,丁口 25814,瑶户人口占总人口的 44%左右,与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接近^①,证明《广东通志》所载“丁”和瑶户丁口构成该厅的总人口,共 59254 人,超过《嘉庆一统志》所载人口。1953 年连山县人口数为 43592,1942 年从连山县析出连南县,1953 年连南县人口 55709 人。从嘉庆二十三年至 1953 年,连山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9‰。

依三地各自的人口增长速度,乾隆四十一年分别有人口 17.6 万、27.2 万和 5 万。

清代中期连山厅瑶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今天相近。

^① 《广东省地图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7 页。

五、粤西区

嘉庆二十三年及 1953 年高州府、雷州府和廉州府的丁和人口数,见表 5-18。

表 5-18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的丁与人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丁	1953 年人口
高州府		
吴 川	161469	402376
石 城	73746	562020
化 州	239164	464374
茂 名	389376	842088
信 宜	185241	551951
电 白	158415	536568
雷 东		107349
合 计	1207411	3466726
雷州府		
遂 溪	132507	418693
海 康	172037	427952
徐 闻	64296	201976
湛江市		165950
合 计	368840	1214571
廉州府		
合 浦	132945	864352
钦 州	55154	683909
灵 山	81861	458327
合 计	269960	2006588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5-14。

说明:1914 年石城县改名廉江县,1945 年改回原被法国租占的原遂溪、吴川两县属之广州湾地方置湛江市,1952 年划吴川县部分区域及湛江市东海等二岛置雷东县,1953 年钦州人口中包括防城县,防城县 1887 年析置;合浦县人口中包括浦北县和北海市。

1. 高州府

民国《石城县志》卷 4《经政志·户口》记载嘉庆二十四年通县

将两种资料互勘可知,道光《广东通志》所载“丁”,在有的地方即指男子。

民户 17731 户,丁口 138911,其中男丁 74776,女口 64135。与表 5-18 中数据对照,嘉庆二十三年石城县的“丁”即指男子。按照 110 的性比例进行推测,全县人口约为 14.1 万。同书又记载光绪末年全县民数户 54504,男丁 249090,女口 178796,男女合计 427886。按照 110 的性别比进行调整,实际人口应为 475535 人。从光绪末年至 1953 年,石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7‰,符合广东人口的发展趋势。然而,从嘉庆二十三年至光绪末年,石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3.6‰,嘉庆二十三年的人口数偏低。化县的情况相反,修正后的嘉庆二十三年化县人口约为 45.7 万,接近了 1953 年化县人口。135 年间人口几为零增长。如果两县合而计之,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

光绪《茂名县志》卷 3《经政·赋役》称嘉庆二十三年有 63593 户,734756 口。按照 110 的性比例对嘉庆二十三年的“丁”数进行修正,是年有 743354 口。如果按 113 的性别比修正的话,道光《广东通志》中的茂名县人口与《茂名县志》所载相同。然而,以此数为基数,至 1953 年,茂名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低得令人不敢相信。将电白县的“丁”数化为人口后,可以发现同一时期电白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5.6‰。茂名、电白二县合并计之,135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6‰。

之所以将此四个县进行两两分组,是因为我不能解释何以在邻县之间,人口的增长速度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邻县之间的界域调整对以县为单位的人口增长速度产生的账面上的影响。只是这一假设至今未得到资料上的证明。

信宜县因僻居山区,县境相对稳定,人口的变动可能不受政区变动因素影响。用修正后的人口数为基数,从嘉庆二十三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3‰。尽管同治年间有大量移民迁入信宜,仅能填补此前发生的凌十八起义而造成的人口损失。

同一口径下吴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2‰,是因为其疆域的一部分被划给湛江市所致。如果湛江市人口的二分之一来自吴川(又设二分之一来自遂溪),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 3.4‰。

修正后的嘉庆二十三年高州府人口约为 230.5 万,与《嘉庆一

统志》所载 235.1 万接近。1953 年,高州府人口为 3549701,其中包括湛江市人口的二分之一。从嘉庆二十三年至 1953 年,高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2‰。以此速度计算,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204.3 万。

2. 雷州府

道光《遂溪县志》卷5《赋役·户口》记嘉庆十五年册报民屯户 41283,男 123849 丁,女 85602 口,合计 209451 口。嘉庆二十三年遂溪县的“丁”数为 132507,可以看作男性人口。只是由于人口的性别比太高,导致太多的女性人口失载。修正后嘉庆二十三年遂溪县人口约为 252968。设 1953 年湛江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来自遂溪,是年遂溪人口应为 474009,135 年间遂溪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6‰。

宣统《徐闻县志》卷4《赋役·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县民屯户 30179,男 62796 丁,妇女 45708 口。这一记载证明嘉庆二十三年的“丁”是男性。调整后是年徐闻县口数为 122747,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7‰。同样口径测算海康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嘉庆二十三年雷州府人口总数为 70.4 万,与《嘉庆一统志》所载 68.2 万也极接近。135 年间全府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5‰。以此速度,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58.5 万。

3. 廉州府

廉州府地处广东极西,1953 年已划入广西,至今仍然。依上述各府之例,嘉庆二十三年廉州府的“丁”应为男性人口,但道光《廉州府志》卷10《经政·户口》却记载道光八年(1828 年)钦州、合浦、灵山三地的“丁口”分别为 85520、205285、136889,分别为嘉庆二十三年“丁”数的 1.6 倍左右。合而计之,道光八年廉州府的“丁口”总数为 427694,接近《嘉庆一统志》中所载 444870 口。

就分县数据来看,嘉庆二十三年钦州的“丁”数明显偏低。实际册载“丁口”仅 8.6 万,而按 110 性别比折算则为 10.5 万。1953 年,钦县人口与防城县合计共有人口 68 万余。135 年间人口增加了近 6 倍,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其间有广州府、肇州府的客家人在

与土著的械斗中失败并被西迁进入廉州,但外迁的客家人总数不过 20 万~30 万人,且分布广泛。至今未有证据表明有大批的客家人迁入廉州府,尤其是迁入廉州府的西部地区。所以,可以推断嘉庆二十三年廉州府的“丁”数存在严重的漏报。当然,《嘉庆一统志》所载廉州府的口数也就严重低估。

假定钦州府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广东其他府,以 1953 年人口数为基础,以 5‰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廉州府有人口 103.4 万,是为《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的 1 倍有余。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83 万。

4. 琼州府

嘉庆二十三年琼州府各县“丁”的总数为 728889,1953 年人口数为 2671922。分县丁口数见表 5-19。

表 5-19 嘉庆二十三年和 1953 年琼州府各县丁与人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丁	1953 年人口
海口市		135337
琼 山	103286	310221
文 昌	96312	346264
定 安	51132	159868
琼 东		99842
乐 会	31566	99213
万 宁	64039	153844
感 恩	21854	
昌 化	33044	119916
儋 州	64351	206248
临 高	57651	180364
澄 迈	105181	203166
屯 昌		89719
乐 东		73059
东 方		55065
白 沙		46732
琼 中		35265
保 宁		72238

续表

市 县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丁	1953年人口
陵 水	30586	106218
崖 县	27532	179343
会 同	42355	
合 计	728889	2671922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5-14。

说明：

[1] 原书在“感恩县”条下记为“丁六百六十二丁五分，归并屯丁一十七丁三分三厘”，将清代前期的纳税单位当作“丁”计入了。在感恩县数据缺漏的情况下，各县“丁”的累加数为707035，而原数为728889。显然，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即感恩县的“丁”数。

[2] 20世纪中叶海南岛设置了一批新县，因不涉及与其他府境的邻接，故不一一说明。

民国《感恩县志》卷7《经政志·户口》记载道光十五年册报滋生丁口43247，是表5-19中感恩县21854“丁”的1倍有余，说明后一数字中包括了女口，“丁”数仅指男性。

道光《琼州府志》卷13《经政·户口》记载了各县道光十五年的“丁”数和“口”数或“丁口”数。如在“琼山县”条下记为106952丁，99806口。“丁”为男性，“口”为女性。民国《儋县志》卷5《经政·户口》称道光十五年报滋生63314丁，47866口。道光《广东通志》记载儋州“丁”数为64351，可见“丁”仅为男性人口。在大多数的县，则不记“口”，而是计“丁口”，如会同县，“丁”数为42355，“丁口”为81697。其“丁数”与嘉庆二十三年完全相同，可见道光年间的“丁”实为照抄册籍而已。

鉴于道光《琼州府志》中数据过于混乱，所以仍采用常用的方法进行总人口的估测。将表5-19中的“丁”数折算成全体人口，共得139.2万。《嘉庆一统志》所载口数为138.3万，两个数据相差无几。从嘉庆二十三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8‰。

周宏伟认为海南岛中部地区为嘉庆二十五年人口统计的空白区^①，

^① 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第71页。

即嘉庆二十五年琼州府的人口未包括一批 20 世纪新设的县份, 它们大多是黎族人口的聚居区。只是对于这一点, 周氏未提出有力的证据。因为, 没有设县的地区, 未必是中央政府未能管辖的地区。如这一观点为真, 则琼州府 133 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4‰。以 4.8‰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 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112 万。

六、结语

将上文整理的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分府人口数和 1953 年分府人口数, 列于表 5-20。

表 5-20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广东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 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广州府	529.3	28.7	587.9	27.5	824.3	23.9
肇庆府	169.1	9.2	202.2	9.4	353.4	10.3
罗定州	49.1	2.7	57.1	2.7	92.7	2.7
佛冈厅	5.5	0.3	6.5	0.3	11.0	0.3
惠州府	150.3	8.1	183.0	8.5	341.5	9.9
潮州府	215.8	11.7	266.1	12.4	519.6	15.1
嘉应州	121.5	6.6	133.3	6.2	160.9	4.7
韶州府	96.3	5.2	102.8	4.8	116.5	3.4
南雄州	17.6	1.0	20.5	1.0	33.4	1.0
连 州	27.2	1.5	30.2	1.4	47.7	1.4
连山厅	5.0	0.3	5.9	0.3	9.9	0.3
高州府	204.3	11.1	235.1	11.0	346.7	10.1
雷州府	58.5	3.2	68.2	3.2	121.5	3.5
廉州府	83.0	4.5	103.4	4.8	200.7	5.8
琼州府	112.0	6.1	138.3	6.5	267.2	7.8
合 计	1844.5	100.0	2140.5	100.0	3447.0	100.0

表 5-20 中所载乾隆四十一年广东省人口总数为 1844.5 万,《清朝文献通考》卷 19 所载数为 1482.1 万,较笔者推测数要少 362.4 万。正如在其他省份所见,《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乾隆四十一年的人口数据,大都存在低估。

表 5-20 中显示的嘉庆二十五年广东省人口总数为 2140.5 万,而《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广东省口数为 2155.8 万,修正数较《嘉庆一统志》少载 15.3 万,相差不大。《户部清册》数据与《嘉庆一统志》相同。

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广东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4‰,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为 3.6‰。

第三节 广 西

迄今为止,除《嘉庆一统志》外,我们尚未找到有关清代中期广西府一级户口的其他记载。县级资料的记载也是支离破碎的,尚不足以依之对《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进行检验或修正。兹将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广西分府人口数据,列如表 5-21。

表 5-21 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广西分府人口

府 名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口	1953 年口	人口估测		1820—1953 年 年平均增长率(‰)	
			1820 年	1776 年	未修正数	修正数
桂林府	104.1	178.5	104.1	85.4	4.1	4.1
柳州府	93.9	206.2	93.9	72.4	5.9	5.9
庆远府	48.1	132.0	77.4	64.9	7.6	4.0
思恩府	49.7	197.7	109.8	90.5	10.4	4.4
泗城府	32.7	42.5	32.7	29.9	2.0	2.0
平乐府	85.8	163.3	85.8	68.9	4.8	4.8
梧州府	68.7	182.3	87.9	69.1	7.4	5.5
浔州府	64.1	173.7	83.8	65.8	7.5	5.5
南宁府	79.5	183.0	97.4	78.9	6.3	4.8

续表

府名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口	1953年口	人口估测		1820—1953年 年平均增长率(‰)	
			1820年	1776年	未修正数	修正数
太平府	30.2	82.4	50.5	42.9	7.6	3.7
镇安府	28.7	63.2	34.4	28.1	5.9	4.6
郁林州	56.1	183.4	88.4	69.4	8.9	5.5
合计	741.6	1788.4	946.1	766.2	6.6	4.8

说明:

[1] 1953年的鹿寨县系从桂林、柳州两府析地而设,故其人口分属两府,各占50%。

[2] 由于印刷模糊,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关于嘉庆二十五年平乐府的口数误作358238。笔者粗疏不识,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404页中,不得不对此数进行修正。笔者当时采用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修正所得嘉庆二十五年平乐府人口近85万,与真实的人口数几无差距,但书中却误写成75万。

虽然表5-21所显示出来的133年间广西省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并不很高,但其中部分府的人口高速增长仍引起我们的怀疑。以思恩府为例,一个以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偏僻山区,在133年的时间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要维持10.4‰的高速度,谈何容易。有意思的是,在思恩府西邻的泗城府,同一时期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2‰,原因何在?

周宏伟指出这一现象与少数民族人口的编籍有关。他引乾隆三十一年广西布政使淑宝言:

永宁、养利、永康、宁明、东兰、天保、归顺、奉议、凌云、西隆、西林等十一州县苗疆,现俱设保分甲,应考纳赋与内地无异,请将该州县土著、客籍、烟民共男女大小六十一万三千余口,汇入民册数造报^①。

周氏认为,这十一州县基本上都是在雍正年间改流的地方。

^① 《清高宗实录》卷775,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

“清代一直没有改流的土司(土州、土县等)还有四十多个,是改流数目的4倍有余。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形态的限制,这些土司的平均人口规模可能要大大低于已改流的地方。”于是,周氏将这些土司人口“较保守地以改流州县人口规模的50%计算”,认定乾隆三十一年以前载籍人口的缺失率约在40%左右,而以后迄至于清末的载籍人口缺失率约在25%左右^①。这一估算方法虽说比较粗疏,却给我们以方法上的启示。试以府为单位分析如下。

一、桂西地区

1. 泗城府和庆远府

从表5-21中可见,135年间泗城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并不存在少数民族人口的隐漏。而在上引乾隆三十一年淑宝的报告中,泗城府所属三县:西隆、西林、凌云皆改土归流,其居民成为中原王朝的子民。正因为此,可以认为嘉庆二十五年泗城府的人口即该府全体人口。

对于不在政府册籍中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可以根据1953年其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进行推测。

庆远府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淑宝的报告中,以1953年的政区计,庆远府至少有凤山、天峨、南丹、忻城四县属于化外之地。1953年四县人口合计为501305,占全府人口总数的37.9%。据此比例估测,嘉庆二十五年庆远府的总人口约为77.4万。至1953年,庆远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

2. 思恩府和镇安府

经过对涉宝报告的仔细核对,可知以1953年政区为例,嘉庆二十五年思恩府至少有百色、田阳、都安、马山和田东五厅、县辖境尚未改土归流,其居民属化外之民。1953年,五县人口总数为1082376,占全府人口总数54.7%。也就是说,在嘉庆二十五年的思恩府人口中,至少有54.7%的人口漏载了。依此比例估算,嘉庆二十五年思恩府人口总数为109.8万人,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4‰。

在镇安府,未改土归流的小镇安厅(即睦边县)1953年人口为

^① 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第66页。

104640,占全府总人口的 16.6%。据此测算,嘉庆二十五年镇安府总人口约为 34.4 万,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6‰。

3. 太平府和南宁府

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辨读,在淑宝的报告中,太平府至少有龙津(即龙州)、镇都(即天等县)等地未被改土归流。1953 年龙津和天等两县合计有人口 331682 人,占全府总人口的 40.2%。以此比例计算,嘉庆二十五年太平府的人口总数约为 50.5 万,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7‰。

在嘉庆二十五年的南宁府,忠州、上思州、归德州和果化州均属土州,其人口并未计入南宁府的人口总数。1953 年此四州分别为上思、平果两县地,合计有人口 336140,占全府人口总数的 18.4%。由此推测嘉庆二十五年南宁府总人口约为 97.4 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南宁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8‰。

二、桂东地区

同治四年(1865 年)粤东地区的客家奉命西迁,除了部分迁入粤西地区外,迁入广西的客家人分布在贺县、贵县、容县、武宣、平南、马平、雒容、柳城、荔浦、修仁等县^①,其中计梧州府一县,平乐府二县、柳州府三县,潯州府三县。由此可见,柳州府人口的较高增长既可能与近代柳州城市的崛起有关,也可能与规模性的客家人迁入有关。扣除这些因素,柳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可达 5.5‰左右。

相对而言,梧州、潯州和郁林州三地 133 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都超过 7.4‰,最高为郁林州,竟高达 8.9‰,可能过高。县级资料不支持这一结论。在梧州府藤县,光绪《藤县志》卷 9《田赋志·户口》称该县嘉庆年间有 29608 户,186352 口。1953 年该县有 399608 口。嘉庆年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8‰,低于全府的 7.4‰。

由于缺乏更多的县级资料,所以不能一一就各府的人口数进

^① 民国《赤溪县志》卷 8《赤溪开县事纪》。

行修正。以 5.5‰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此三府嘉庆二十五年的
人口数分别是 87.9 万、83.8 万和 88.4 万。由于大量的广东移民大
多数是在乾隆年间迁入广西的,因此,设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
十五年广西东部各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较嘉庆二十五年到
1953 年稍高,则得出乾隆四十一年各府的人口数。同治年间有客
家人迁入的平乐、潯州、梧州、柳州四府人口增长率则不再作调整。
结果详见表 5-21。

总之,《清朝文献通考》卷 19 所载乾隆四十一年广西口的总数
为 538.2 万,较本节估计数相差甚远。究其原因,在于册籍中有关
广西户口的记载,是不包括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嘉庆一统志》
及《户部清册》所载广西口数皆少于本节所作推测,原因相同。

第六章 清代中期南方分府人口

——云南和贵州

云南、贵州两省的在籍人口中漏载了许多少数民族人口。

与广西户口数据的性质相同,清代中期云南户口数据也存在少数民族人口漏载和汉族人口入籍等复杂的问题。对各府户口的登记对象进行认真辨析,是进行分府人口复原的重要步骤。

《嘉庆一统志》所载贵州分府户口,有些包括了少数民族户口,有些则非。除此之外,在许多府,大量的汉族移民未被录入政府册籍中。区别对待每一府的户口资料,确证其户口登载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节 云 南

地处边陲的云南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聚居区。大批汉人的迁入,自明代初年始。清代前中期,来自东部各省及四川等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迁入云南,云南中心区的汉人也向边缘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迁移。清代前期的户口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对汉族人口而非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和统计。直到清代中期的嘉庆二十五年,仍有许多地区的人口呈空白状。《嘉庆一统志》的解释是:“向因蛮民杂处,未经编丁。”大批少数民族人口此时仍是中原王朝的化外之民。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食货志》记载了道光十年的分府户口,兹将其与《嘉庆一统志》所载分府户口,列如表 6-1。

表 6-1 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云南分府户口

户口单位：万

府 州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道光十年(1830 年)			口的年平均 增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云南府	26.1	133.4	5.1	26.6	144.8	5.4	8.2
潞江府	7.3	56.5	7.7	7.6	60.2	7.9	6.2
楚雄府	7.5	51.4	6.9	10.5	57.5	5.5	11.3
武定州	2.4	11.9	5	3.9	20.6	5.3	56.2
曲靖府	11.5	58.2	5.1	12.0	66.3	5.5	13.1
广西州	2.2	9.8	4.5	2.3	13.4	5.9	31.6
顺宁府	3.3	11.4	3.5	3.3	12.2	3.7	6.7
永昌府	4.2	25.2	6	7.3	53.9	7.4	79.2
腾越厅	2.9	26.8	9.3	4.9	37.4	7.7	33.8
普洱府	0	0		0	0		
元江州	0	0		0	0		
镇沅州	0	0		0	0		
景东厅	1.3	6.3	4.7	1.4	7.4	5.1	16.3
开化府	5.6	25.9	4.6	4.1	20.6	5.0	-23.4
临安府	13.5	53.2	3.9	14.0	56.5	4.0	6.0
广南府	0	0	0	0	0		
大理府	12.3	74.8	6.1	12.9	80.2	6.2	7.0
蒙化厅	4.3	15.5	3.6	4.4	16.2	3.7	4.4
丽江府	6.1	35.1	5.7	6.2	36.3	5.8	3.4
永北厅	1.3	8.3	6.3	1.4	9.2	6.5	10.8
东川府	0	0		0	0		
昭通府	0	0		0	0		
合 计	111.8	603.9	5.4	123.0	692.7	5.6	13.8

资料来源：《嘉庆一统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食货志》。

说明：

[1]《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广西州户数为 21990，“滋生丁口”为 984633，户均口数近 45 人，实在荒诞。与道光十年户口数的比较后可以推测，《嘉庆一统志》中的错误在于口数定位错误，正确的口数当为 98463。

[2]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缺道光十年腾越厅户口，此据光绪《腾越厅志稿》卷 3《地理志·户口》补，是为道光三年户口。

在纠正了广西州口数的明显错误后,可以看出,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云南各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低不同,相差太大。其中如开化府的在籍人口呈现大幅度的负增长,而永昌府、武定州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却高得惊人。参照今天农业地理学家的分区方法^①,并照顾府一级政区的完整性,将云南划分为六大区域,分别讨论如下。

一、滇中区

1. 云南府

据表 6-1,嘉庆、道光年间云南府人口分别为 133.4 万和 144.8 万,十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2‰。就户均口数来看,云南府户口数据的质量是无可挑剔的。

分县数据可以晋宁州为例。道光《晋宁州志》卷 5《赋役志·户口》详细记载了乾隆二十五年及道光二十年分类户口数,见表 6-2。

表 6-2 乾隆二十五年和道光二十年晋宁州分类户口

丁 口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道光二十年(1840 年)	
	户	口	户	口
总 数	8141	44216	5831	90164
大 丁		13841		23549
小 丁		8991		23195
大 口		12874		26695
小 口		8510		16725

资料来源:道光《晋宁州志》卷 5《赋役志·户口》。

从乾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的 80 年中,晋宁州的户数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口数则大大增加。乾隆二十五年户均口数为 5.4,符合正常值。道光二十年的户均口数高达 15.5,大大偏离正常值。

^① 张怀渝主编《云南省经济地理》第十章《农业分区》,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

从分类项目看,乾隆二十五年的大丁与大口之比,小丁与小口之比,分别为 1.07 和 1.06,折算成性别比则为 107 和 106,是正常的人口性别结构。道光二十年,成年人的性别比和幼年人的性别比分别为 88.2 和 139,前者偏低,后者偏高,合计则为 108,与乾隆年间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据此可知,除了“大口”的年龄有所降低外,道光二十年的户口调查与 80 年前没有什么不同。这样,我们怀疑道光二十年的晋宁州的户数不是调查或统计中的错误,而是抄写中的错误。如果将“五千八百三十一”户看作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一”户漏抄“一万”,则是年的户均口数为 5.7,接近正常值。

一些地区的统计数据错误可能是抄写中的错误。

然而,这一修正后的户数仍存在问题。同书记载,道光二十年在调查户口的同时,也在进行编查保甲的工作。“州属人户共编土著民屯二千八十五牌,每牌设牌长一人,共设二千八十五名。外寺观八十一所,僧道九十一人”。如以全州户数 15831 户计,每牌仅有 7.5 户。如以每牌十户计,全州应有 20850 户,每户平均为 4.3 口。由此可知,户口册中的“户”与保甲“牌”中的“户”并不是同一个单位。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

云南府的人口增长速度有分县资料的支持。

因此,我们仅讨论“口”的增长。从乾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晋宁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9‰,略高于云南府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由此可知,表 6-1 中显示的云南府人口增长速度,有分县资料的支持。以 8.2‰ 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乾隆四十一年,云南府的在籍人口约为 101.1 万。

在 1982 年云南府的人口中,回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只占总人口的 5% 左右^①。清代中期,这批少数民族人口即便未被统计入户籍,对云南府的人口变动影响不大,兹不讨论。1953 年云南府人口为 151.9 万,道光十年至此云南府人口几呈零增长。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及鼠疫对云南府人口造成的影响,由此可见。

^① 云南省测绘局《云南省地图集》,1982 年(内部本)。云南分县民族人口资料均据此,不一一说明。

2. 濠江府

表6-1载嘉庆二十五年濠江府人口为56.5万,道光十年为60.2万,户均人口分别为7.7和7.9,像是出自同一调查系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濠江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据此推测乾隆四十一年濠江府人口约为43万。

道光《濠江府志稿》卷7《户口》称乾隆三十六年实在土著人民16819户,男妇大小人丁163793丁。乾隆四十年实在土著人民35513户,男妇大小人丁294906丁(内有新增人民328户,男妇大小人丁1340丁;又清出人民17246户,男妇大小人丁127880丁)。从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年濠江府在籍人口的增长,不是人口的真实增长,而是清理户口的结果。据此,乾隆四十年濠江府口数为42.3万,与上文推测的乾隆四十一年43万人口正好相合。

乾隆四十二年,“旨分别民屯,各列一册”。实在土著民户21919户,男妇大小民丁166413丁;实在土著屯户14585户,男妇大小屯丁139620丁^①。历年民户、民丁及屯户、屯丁的分别记载,详见表6-3。

表6-3 乾隆至道光年间濠江府的户口变动

年 代	土著户	屯户	总户数	土著口	屯民口	总口数	户均口数
乾隆四十二年	16819	14585	31404	163797	139620	303417	9.7
四十五年	22691	15375	38066	167935	132144	300079	7.9
五十年	24071	16780	40851	174102	138049	312151	7.6
六十年	29675	22539	52214	201865	171647	373512	7.2
嘉庆元年	30534	23361	53895	206514	176671	383185	7.1
十年	35317	28665	63982	256622	223007	479629	7.5
十五年	37530	30919	68449	280420	243184	523604	7.6
二十年	38783	32139	70922	292775	253741	546516	7.7
二十五年	40004	33151	73155	303445	261904	565349	7.7
道光元年	42878	34036	76914	236432	206844	443276	5.8
五年	44278	35271	79549	234069	200881	434950	5.5

^① 原书为13962,与乾隆四十五年数据比较,可知漏记一位数。

续表

年代	土著户	屯户	总户数	土著口	屯民口	总口数	户均口数
十年	45522	36283	81805	231369	203817	435186	5.3
十五年	48716	39263	87979	234916	206989	441905	5.0
二十年	50831	41172	92003	241777	215437	457214	5.0
二十五年	43329	36126	79455	236975	211090	448065	5.6

资料来源:道光《澂江府志稿》卷7《户口》。

从表6-3中可以看出,乾隆年间的户口变动很不正常。相对于乾隆五十年而言,乾隆六十年的人口和户数有了一个突然的增长,同样的现象还见于嘉庆十年。这可能暗示这两个年份都进行过清理户口的工作。乾隆五十年及以前的在籍户口中未包括“新增人民”,而乾隆六十年的人口清理则可能将部分“新增人民”列入其中,嘉庆十五年以后则可能将所有“新增人民”全部纳入其中,所以才有户口数据的巨大变化。

户口数据的突然增加,往往意味着发生过一次户口清理。

然而,道光元年之后,澂江府人口突然减少,且户均口数接近正常。对此的合理解释应该是,不知什么原因,“新增人民”又从政府户籍中被排除了。表6-1中,道光十年澂江府的人口数多达60万,比表6-3中多出17万余人,较乾隆四十年的“新增人民”多出4万~5万人。此可证明上述推测的正确。我认为表6-1中数据是正确的。

1982年澂江府境少数民族人口很少,不予讨论。1953年澂江府辖境人口总共只有50.2万人,少于道光十年的人口数。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动乱和鼠疫流行,竟使这一区域的人口在几十年后都没有得到恢复。关于这场战争和鼠疫对云南人口的影响,详见本卷第十三章的论述。

3. 楚雄府

在表6-1中,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楚雄府人口数分别51.4万和57.5万。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均口数达6.9,偏高,而道光十年降为5.5,比较合适。从嘉庆末年至道光十年,楚雄府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4.9‰,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3‰。户的增长速度

不合情理,口的增长速度比云南府略高。

宣统《楚雄县志》卷4《户口》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年)，“楚县清查门户，合城厢界哨本籍、客籍”为23765户，135320丁口，户均5.7口。咸丰四年(1854年)又进行一次同一口径的清查，本籍、客籍为28893户，149890丁口，户均5.2口。14年中，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3‰。道光二十年楚雄县的户均5.7口显然较咸丰四年的户均5.2口离实际情况更远。道光二十年的户数有可能低估。

与楚雄府嘉庆、道光年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相比，楚雄县口的增长速度要低得多。这说明表6-1中楚雄府的人口增长速度未得到分县数据的支持。与云南、大理、临安等县相比，我更相信楚雄县的人口增长速度是真实的。

光绪《镇南州志略》卷4《食货略·户口》记载咸丰三年州属户口调查中包括民户、屯户、军舍、江西客户、寺观丁等诸项目，同治四年时的清查项目包括汉民、夷民、回民、客民及段土司所辖免户。看来，直至咸丰三年，楚雄府的人口调查中，还没有包括“夷民”。由此也可推知，楚雄县在籍人口的增长，主要是汉族人口的增长。尽管增长速度较快，却与少数民族人口编入户籍无关。

1953年楚雄县人口为178314人，从道光二十年至1953年，楚雄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4‰，从咸丰四年至195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1953年原楚雄府境人口总数为974039人，道光十年至1953年楚雄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3‰。楚雄府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楚雄县，似可证明同治以后少数民族人口的人籍导致了楚雄府在籍人口的增加。

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楚雄府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4.9%，如在道光十年的楚雄府人口中加上同一比例的这批人口，道光十年楚雄府人口约为71.9万。道光十年至195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5‰。由此可见，扣除少数民族人口后，道光十年至1953年楚雄府真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3‰。这一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道光、咸丰年间楚雄县的人口增长，其原因可归结为咸丰四年以后发生的回民起义和鼠疫流行。

直到咸丰三年，楚雄府的户口调查，尚未包括“夷民”。

西南边疆的大多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在百余年或数百年间变动不大。

按照楚雄县 7.3‰ 的年平均增长率并以道光十年楚雄府人口为基数进行推算,嘉庆二十五年楚雄府人口应为 66.9 万,乾隆四十一年为 48.5 万。

4. 武定州

据表 6-1,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武定州的口数分别为 11.9 万和 20.6 万。在道光第一个十年中,武定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6.2‰。作为正常的人口增长来说,这一增长速度实在是太高了。

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 2《户口》在“元谋县”条下记载:“系摆彝,原不编丁。”在“禄劝县”条下称:“彝人例不编丁。”又说:“武属多为僂彝诸蛮所居,明初徙江南北富户,武定、永昌汉人稍来,编户然亦不过十之一二。”在 1982 年的数据中,武定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47.6%,禄劝占 29.3%,元谋占 26.1%,合而计之,武定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33.8%。一般说来,来自《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中的户口资料仅记汉族,只有地方志中的保甲资料才包括部分少数民族户口。因此,如果道光十年武定州的人口即本州的人口,此时人口多达 20.6 万,已超过 1953 年的 15.5 万人。虽然其间因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及鼠疫流行造成人口的锐减,但我仍怀疑元谋、禄劝两县的汉人列入了户籍。因为,今天的元谋和禄劝主要是汉人的居聚区。汉人早就迁入此两县,并不像光绪《武定直隶州志》所载,直到光绪年间,两县境内还只居住着“例不编丁”的“摆夷”。如这一观点成立,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武定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56.2‰,可能是元谋、禄劝两县汉人列入户籍所致。

根据 1982 年武定州三县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可以认为道光十年武定州的总人口为 31.1 万。1953 年武定三县的人口总数为 40.5 万,从道光十年至 1953 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1‰。

从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十年,设武定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云南府相同,也为 8‰,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 28.7 万,乾隆四十一年武定州有人口 20.2 万。

5. 曲靖府

表6-1中显示的嘉庆、道光年间曲靖府的口数分别为58.2万和66.3万,户均口数分别为5.1和5.5,符合标准家庭形态。然而,道光第一个十年间,曲靖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13.1‰,比周边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因此,有必要检查该府的分县户口资料。

民国《陆良县志》卷1《地輿志五·户口》记载了清代若干年份全县分类户口,详见表6-4。

表6-4 清代陆良县分类户口的变动

民与屯	乾隆年间			嘉庆年间			道光年间		
	户	丁	户均丁数	户	丁	户均丁数	户	丁	户均丁数
土著人民	1631	8164	5.0	22409	72996	3.3	31346	153214	4.9
土著屯民	9963	39030	3.9	6309	17648	2.8	8340	42808	5.1
合计	11594	47194	4.1	28718	90644	3.2	39686	196022	4.9

资料来源:民国《陆良县志》卷1《地輿志五·户口》。

乾隆年间陆良县土著人民户只占总户数的14.1%,丁只占总丁数的17.3%。嘉庆年间,土著人民户占总户数的78%,土著人民丁占总丁数的80.5%。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暂不清楚。从乾隆至嘉庆,在土著人民户丁增长的同时,土著屯民的户丁却在大幅减少,直到道光年间又有增加。土著屯户数量的变化是很难理解的。

从户均丁数这一指标进行考察,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个年份的统计中,道光年间的统计最好,嘉庆年间的统计最差。由于民国《陆良县志》的记载中只记乾隆、嘉庆和道光,不记具体年份,根据下引道光《宣威州志》的记载,可将乾隆年间定为乾隆四十四年,道光年间定为道光二十三年。嘉庆年间无据,暂定为嘉庆二十五年。据此,从乾隆年间至嘉庆年间,户数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3‰。在不对嘉庆年间的丁数进行修正的情况下,其“丁”的年平均增长

此时口数增长过快,是数据不真实所致。

率高达 16‰。如按户均 4.5 丁的水平进行调整,“丁”的年平均增长率则达 24.9‰。从嘉庆到道光年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14.2‰,修正后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18.3‰。如此高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很难令人相信这是真实的。

再以罗雄州(今罗平县)的分类户口数为例,详见表 6-5。

表 6-5 清代罗雄州分类户口的变动

分类户口	乾隆中			道光中			光绪中		
	户	丁	户均丁数	户	丁	户均丁数	户	丁	户均丁数
土户人民	2263	8576	3.8	1579	4954	3.1	1686	5479	3.2
移屯人民	11644	43538	3.7	13314	82673	6.2	34956	132826	3.8
合计	13907	52114	3.7	14893	87627	5.9	36642	138305	3.8

资料来源:民国《罗平县志》卷1《户口》。

在表 6-5 三个年份的数据中,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道光年间的移屯户数最不合情理。在罗雄州的整个数据系统中,除了道光中的移屯人丁外,其他户均丁数均未超过 4 丁。我相信这里的“丁”是指男性人口,或者另有他意,但绝不是全体人口。与乾隆年间数据比较,“道光中”“移屯人民”的“一万三千三百一十四户”应为“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四户”之误。如是,则户均 3.5 丁。

其二,“道光中”及“光绪中”的“土户人民”较“乾隆中”呈大幅减少状,原因不明。但是从“移屯人民”的数量迅速增长这一角度看,可能有一大批“土户人民”报入了“移屯人民”中。即使在乾隆年间,移屯者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土户。在生存竞争中,移屯者的力量远胜于土户,或许是因为赋税方面的优惠,导致大量“土户”转入“移屯”。

如将“乾隆中”和“道光中”依上例分别定为乾隆四十四年和道光二十三年,则可依下引光绪《霑益州志》的记载,将“光绪中”定为光绪四年。从“乾隆中”至“道光中”,按照修正后的移屯户计算,户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0.9‰,丁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2‰。从“道光中”至“光绪中”,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1.6‰,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3.1‰。事实上,从“道光中”至“光绪中”,土著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9‰,丁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9‰,移民丁的年平均增长率却达到 13.6‰。

从罗平县的例子中,可以认为移民的大量迁入带来了云南在籍人口的迅速增加。然而,从陆良县情况来看,结论似乎相反。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还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解答。总之,这两县的人口增长速度与表 6-1 中全府的人口增长速度大致持平。

咸丰《南宁县志》卷4《赋役·户口》称咸丰元年知县毛玉成编查保甲,计编 2096 牌,每牌设牌长一名,共设牌长 2096 名。计编 209 甲,每甲设甲长一名,共甲长 209 名。计编 20 保,每保设保长一名,共保长 20 名。计编江西、湖广、陕西三省客籍,每省设客长 6 名,共客长 18 名。庵观寺庙 51 所,大小僧人 98 名。间有畸零户口附于牌甲之末。毛玉成按照每牌十户,每甲十牌的编制将全县各类户口纳入保甲系统中,所得资料应是可靠的。然而结果却是:实编民屯 21232 户,共计男妇大小 63479 丁口;每户平均只有 3 口。该志又称,“视道光元年户增六千一百九十三,丁口增七千九百四十五”。所增户数和丁口不成比例。相对而言,所增户数的可靠性超过丁口,因为保甲编制本身就是以户以单位的。以户计,从道光元年至咸丰二年,南宁县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0.8‰,增长速度仍是较高的。

道光《宣威州志》卷3《户口》记载乾隆四十四年七里共 4845 户,道光二十三年,共 22356 户,89356 丁口;客籍 216 户,僧道 112 名。乾隆四十四年的户数并不是完整的户口调查数,又因无前后数据可供比较,故略而不论。

1953 年曲靖府人口为 179.7 万。从道光十年至 1953 年,曲靖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1‰。如果加上大约 5% 的未入籍的回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口,道光十年及嘉庆二十五年曲靖府的人口总数分别为 69.3 万和 60.8 万。道光十年至 1953 年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8‰。表 6-1 中所列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

年间曲靖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3.1‰,并得到了分县资料的支持。以此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曲靖府人口约为 39 万。

1982 年曲靖府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人口不足 10%,扣除其中的回族人口,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更低。也就是说,在清代中期的人口中,因少数民族而漏记的人口不多,本研究不予考虑。

如果曲靖府的人口增长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及鼠疫的流行都未对这一区域造成太大的影响。曲靖府人口的增长大体是人口自然增长所致。

6. 广西州

表 6-1 载嘉庆二十五年广西州的户数为 21990,口数为 98463,户均 4.5 口;又载道光十年户数为 22665,口数为 134452,户均 5.9 口。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1.6‰。口的增长速度实在是太离谱了。只是无法确定,到底是户数有误,还是口数错了。

在 1982 年的人口数据中,广西州辖境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35%。而在《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这两本书中,“夷民”是不登入户籍的。假定嘉庆、道光年间广西州汉“夷”比例不变,则道光十年广西州有人口 20.7 万。1953 年广西州人口为 60.8 万。从道光十年至此,广西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8‰。将这一数值作为广西州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可能太高了一些。然而,广西州反映出来的人口增长规律与曲靖府近似,或许说明同样的地理及社会背景下人口增长的模式相同或相似。

以 8‰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广西州有人口 19.1 万,乾隆四十一年有 13.5 万。

相同的地理或社会背景下,人口增长的模式是相同或相似的。

二、滇西南区

1. 顺宁府

据表 6-1,嘉庆二十五年,实在土著民户 32563 户,男妇大小民丁 114165 丁,户均只有 3.5 丁。道光十年,顺宁府户数为 33419,口数为 121990,户均只有 3.7 口。由此可见,顺宁府的人口统计是不全面的,所谓的“男妇大小人丁”并未包括全体人口。

由于嘉庆二十五年及道光十年的统计口径是相同的,所以,这一期间的人口增长速度仍是可信的。据表 6-1,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顺宁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7‰。

光绪《顺宁府志》卷11《食货志》记载,乾隆三十九年实在土著人民 11963 户,男妇大小人丁 40760 丁。乾隆四十年新增人民 83 户,男妇大小人丁 712 丁。又清出人民 13179 户,男妇大小人丁 27782 丁,共实在土著人民 25163 户,男妇大小人丁 68730 丁。乾隆三十九年的户口登记是很不完全的。乾隆四十年清出的户口大约是实在户口的三分之一。

乾隆四十年顺宁府户均只有 2.7 口,明显低于嘉庆二十五年的同一值。按照嘉庆二十五年户均 3.5 口的水平进行调整,乾隆四十年顺宁府的在籍人口应为 88071 口。据此值,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男妇大小人丁”的年平均增长率就为 5.8‰,这与嘉庆、道光年间顺宁府人口 6.7‰的年平均增长率大体相合。嘉庆、道光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稍高,实际上也只是道光十年户均口数偏高所致。

光绪《顺宁府志》卷11《食货志》记载,“光绪十年久经兵燹之后,已逾十年。清查实在居民”19278 户,男妇大小 70845 丁。且不论此数据是否正确,但就户均丁数而论,口径与以前相同。“光绪三十年奉上宪明文查烟户”,共 31578 户,男共 97842 丁,女共 96774 口。有意思的是,在民国《顺宁县志初稿》卷4《民政》中,光绪三十年户数为 31578,丁口数为 96774。该志说明此数据“系府、州、厅共计”。很显然,《顺宁县志》误将女口当做全体人口。总之,至光绪末年,“丁口”的含意与以前有了不同。从这一观点出发,按户均 5 口计算,乾隆四十年顺宁府的在籍人口约为 12.6 万人,嘉庆二十五年为 16.3 万人,道光十年为 16.7 万人。

1953 年顺宁府人口总数为 120.4 万人。较道光十年增加了 7.2 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16.2‰。这说明道光十年的在籍人口并不是全体人口,少数民族人口可能未被统计入册。1982 年顺宁府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体人口的 38.4%,如是,道光十年顺宁府的全体人口应为 27.1 万,嘉庆二十五年应为 26.5 万。道光十年至

1953年顺宁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2%。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偏高。

另一种测算方法是：顺宁府南部的耿马、沧源、西盟、澜沧和孟连等县都是民族自治县，其少数民族成分主要为拉祜族、佤族和傣族。清代中期，这一区域尚属于不入政府户籍的“夷民”居地和土司辖区，他们的人口不包括在户籍人口中。顺宁府的北部三县再加上民国年间划顺宁府与永昌府设立的昌宁县中的半数人口，约有57万人口。排除其中22%的少数民族人口，汉族人口为44.5万，由道光十年至1953年，顺宁府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以1953年顺宁府全体人口数为基础，以此速度回溯，嘉庆二十五年顺宁府人口为41.7万，乾隆四十一年为29.4万。

少数民族人口的众多和汉族移民的入迁，构成顺宁府人口估算中的复杂性。

如果不是道光年间的户口数存在错误的话，这一较高的增长率对于顺宁府而言，意味着咸丰、同治年间长达十几年的战乱和瘟疫对区域人口的破坏是有限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在道光十年至1953年长达123年的时间里，咸丰、同治年间的动乱仅仅是短暂的一瞬，战后的恢复很快重建了区域内的人口。

进入20世纪以后，顺宁府设置了不少新县，如1913年设置的镇边县，后改为澜沧县（即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1929年设置的双江县、1937年设置的沧源县、1952年设置的耿马、1954年设置的孟连和1965年设置的西盟等县。1953年新设县的人口总数超过了北部诸县，占全府人口52.5%，其中汉族人口占31.4%。很显然，清代中期以后，顺宁府的南部存在一个可供汉族人口迁移的广阔空间，顺宁府的北部人民也就不会感到生存空间的狭仄。外地移民持续不断的迁入和区域内的人口迁徙当是导致这一区域人口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2. 永昌府

依上引光绪《武定直隶州志》的观点，永昌府的情况与武定州类似。据表6-1，嘉庆二十五年永昌府人口为25.2万，道光十年高达53.9万。在道光第一个十年中，永昌府的在籍人口也有了迅速的增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9.2%。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确有大量外来移民迁入。道光《永昌府志》卷24称，嘉庆

二十二年大灾荒,外地流民进入永昌者“以万计”^①。以永昌府南部的镇康县为例,1925年修《镇康县志初稿》第六《民政》有以下记载:

本县户口在昔土司治理之初年,不过土著夷户一千三百五十六户,寄住汉人七百零三户,合计二千余户,男女总共一万余人。土司中叶,颇有增加。民十以后,调查所得,全县共有万余户,总计七万余丁口,较之土司初叶,已增七倍,而且汉族反多于夷人,其户略为一与五之比,口为一与七之比。据本县调查结果为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七户,男为六万二千八百五十丁,女为六万二千二百八十五口,总计一十二万五千一百三十五人。

早在清代中前期,镇康的“夷人”已列入户籍,但这仍是保甲户籍,不具备人口普查的意义,故无法确信此为当时的人口数。另外,其中“据本县调查结果”一句,可能指1925年前的调查所得,亦即“民十以后,调查所得”。1953年该县人口为17.8万,从“民十以后”至此,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12‰。

该志又称:“在土司时代仅指镇康一司,改流而将孟定土司划归镇康统治,列为县属第六区户口调查统计,始有此数。全县汉人约占六分之四,夷人仅六分之二,此镇康户口之情形也。”土司时期镇康州的全体人口仅有万余人,如加上以后划入的孟定府(即孟定土司),镇康在五区之外,再增加一区。因此,土司时期的镇康和孟定最多有人口1.5万左右。如果将“土司治理之初年”定为乾隆初年,则200余年间,镇康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1.5‰。如果定在雍正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就要低一些。

这一数据与其他地区相比,虽然是太高了一些,但这一区域接受的汉族移民确是比较多的。土司初期汉人仅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民国年间汉人占三分之二,就是汉人不断迁入所致。实际上,根据1982年的数据,镇康县汉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4%,永

^① 转引自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昌府汉人占总人口的90%，远远超过了三分之二的比例。汉人对永昌府南部地区的渗透和迁移是持续不断和大规模的。正是因为这种迁移，才使土司地区的少数民族变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了。

永昌府人口的汉族化过程其实在清代中叶即已完成了。也就是说，道光十年永昌府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可能与1982年相同，即占总人口的10%。如是，道光十年永昌府的总人口应为59.9万人。1953年永昌府属县人口合计为118.8万，从道光十年至此，永昌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采用8‰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从道光十年往前回溯，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府人口为55.3万，乾隆四十一年为39万。

3. 腾越厅

嘉庆二十五年腾越厅仅26.8万人，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中无道光十年腾越厅的户口数，表6-1中的数据依光绪十三年《腾越厅志》卷3中所载道光三年数据加入，是年腾越厅的在籍人口为37.4万。同书又载，“嘉庆、道光间户科册籍无稽，因咸丰十年回逆陷城，户册残毁，无从稽考。惟《通志》载嘉庆二年腾越土著民”20136户，200813丁口。在光绪二十三年重刊乾隆《腾越州志》卷5《户口》中，乾隆二十五年民数12087户，男妇大小丁口共177173口。该志又称：“嗣后每年造报户额如旧，丁口滋生，年增数十名，至三十九年大略相同。”乾隆四十二年，“奉文分民屯户口人丁按照编排保甲分造”，计土著民户11394户，男妇大小丁口158675，屯民2935户，男妇大小丁口39357。户均口数太多，已无讨论的意义。男妇大小丁合计198032。从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二年，腾越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6‰。

如果认为上引嘉庆二年腾越人口数是真实的，那么，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年，腾越州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采纳《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腾越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1‰，与前一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相近。

表6-1所列光绪《腾越厅志稿》所载道光三年的户口数无法与嘉庆二十五年数据衔接，是不是统计口径发生了改变？光绪《腾越厅志稿》卷5在记载了乾隆四十四年土著、民屯的户口后接着说：

凡户口据保甲编审开造,其间客民、僧户皆所不入。凡土司地方亦有汉人移民,不能概载。观腾之越户口庶矣。计田所入不敷口粮,合赖各土司地方搬运接济。民间男妇每于收割后赴干崖、南甸、罗小、丝庄趁食,移民移粟,振(自)古如此……又土司地方曾奉文照内地编造户口,军兴以后,关禁最严,屡令土司编造,每多不实。缘土境夷民种类不一,迁徙无常。土法甫到立寨,寨旁荒地即令开种,三年后始当差派。门户有奸夷,转辗各土司地方,阖寨数百人成旅而行,习以为俗。故力田并无顷亩可稽,止有寨名,不能照内地清查之法行也。

道光三年的人口骤增,与政府对土司地区人口的编审有关。

客民、僧户因不在保甲体系之中,不入户口。土司地方的汉族移民,由于政府力所不逮,“不能概载”,只登载了一部分。土司地方曾奉文照内地编造户口,咸丰年间,因杜文秀起义,编造户口之令屡申,却终因“夷人”游耕,无顷亩可稽,人口无着,编审效果很差。由此看来,道光三年腾越厅人口的骤增,与政府对土司地方汉人及少数民族人口编审大有关系,尽管这一编审不是完全的。

据 1982 年的数据,腾越厅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 27.5%,其中约 90% 的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在腾冲以南的各县中。再确切一点说,腾冲以南的土司境内少数民族人口也不占多数,他们仅占总人口的 48.8%,汉人占总人口的 51.2%。如上述,汉人入迁的过程从清代中期即已开始。因此,如果我们在道光三年的在籍人口中加上一批漏载的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就可以复原是年腾越厅真实的人口数了。

换言之,表 6-1 所载道光三年和嘉庆二十五年两个年份之间的差额为 10.6 万人口,是土司地区入籍的汉人与少数民族,他们占道光三年总人口的 28.3%。另外,在 1953 年的人口中,腾冲以南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 47.4%。如果道光三年以后,还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入迁腾冲以南地区,即腾冲以南地区的人口还在不断提高当中,则道光三年腾冲以南地区人口的比例还要低一些。假定这一比例为 40%,就可知道光三年腾冲以南地区有占全厅总人口 12% 左右的人口漏记了。据此测得漏记的人口约为 4.3 万,道光三年腾越厅的总人口约为 41.7 万。

1953年腾越厅人口总数合计为644726人,从道光三年至此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6‰。光绪《腾越厅志稿》卷3《户口》称:“咸丰同治光绪初,兵事蔓延,人民离散,户口无定。”说的是道光以后因战争而导致的人口死亡。道光以后的人口低增长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虽然乾隆《腾越州志》所记乾隆年间的人口不包括腾越地区的所有人口,但人口变动的幅度大体是合理的。我们以道光三年的41.7万人口为基点,再以6.6‰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计,道光十年腾越厅人口为43.7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40.9万,乾隆四十一年约为30.6万。

腾越厅的例子可能证明,在汉族聚居的地区,册载人口的变动有其连续性。变动的幅度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少数民族地区,册载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较大的差距,研究者务必给予充分的注意。

少数民族聚居区,册载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较大的差距。

4. 普洱府

表6-1中缺载普洱府的户口数,并不意味着这一区域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普洱府设于雍正七年(1729年),下辖四厅一司。道光《普洱府志》卷9说:“国初改流,由临元分拨营兵驻守,并江左、黔、楚、川、陕各省贸易之客民,家于斯焉。于是人烟稠密,田土渐开,户习诗书,士教礼让,日蒸月化,浸浸乎具有华风。”道光十六年稽查户口的结果是:四厅总户数为88458,其中土著户占45%,屯民户占46%,客家户占9%。所谓“四厅”,并不包括今为西双版纳辖境的车里宣慰司。屯民户为驻军及退役驻军户,客家户就是所谓“内地人民远走谋生者”。“屯民户”为来自省内的汉族移民,“客家户”为外省移民。

1982年,清普洱府地人口中汉族人口占45%,少数民族人口占55%。普洱府的汉人主要集中于府治及其附近地区。在南部,汉人少有介入。以民国镇越县(今勐腊县)为例,民国《镇越县志》第三章《户口》在列举了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及风俗后称:“汉人占百分之十。”这已是民国年间的情况。1982年汉人已占该县全体人口的44%,而在整个被称为西双版纳的区域人口中,少数民族人

口只占 63.6%。上溯至清中期,这一区域汉人的比例应当更低。

将车里司(即今西双版纳地区景洪和勐海)的人口排除不计,1953年普洱府人口只有 41.2 万人。以每户 4.5 口计,道光十六年普洱府有 39.8 万人,而以每户 5 口计,则有 54.1 万人,从道光十六年至 1953 年,普洱府中北部的人口可能为零增长,或者减少。这可能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与鼠疫^①流行有关。

道光以后普洱府的人口低增长,并不能说明此前的人口增长也是缓慢的。设府以后,大批汉族人口迁入,故普洱府人口的较快增长。从时间上分析,实在乾隆中叶以前。道光年间北部各县人口为 54.1 万,再设道光十年至 1953 年车里司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5%,道光十年有 15.6 万,合计为 69.7 万。比照邻府,设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十六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嘉庆二十五年则为 63.3 万,乾隆四十一年为 48.7 万。

5. 元江州和镇沅州

元江和镇沅两州的户口数不见《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的记载。道光《元江州志》卷 3 记载道光四年施南道查造保甲册,内有土著 13182 户,土著屯民 11289 户,客籍 283 户,合计 24754 户,128210 口^②,户均 5.2 口。

仍可用 1953 年的人口数对此数进行检验。1953 年,元江州属三县及划入红河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共有人口 28.4 万,从道光四年至此,元江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2%。

今天的沅江三县都是以自治县的形式存在的,包括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和江城哈尼族自治县。在 1982 年的三县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71.5%。如果认为道光四年的“土著”为少数民族人口,这一年他们的户数仅占全体户数的 53.3%。很显然,道光四年的人口调查,仍存在少数民族人口的遗漏。根据 1982 年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进行推测,道光四年元江州的少数民族人口应为 2.9 万户,总户数约为 4 万户,以每

《嘉庆一统志》
缺载元江和镇沅
两州的户口数。

① 光绪《普洱府志稿》卷 3《天文志三》。

②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表 4-7 中,我将此数误为 24.8 万。

户5口计,有人口20万。从道光四年至1953年,元江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7‰。

以道光四年为基点,以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元江州人口约为15万。

镇沅州的情况应和元江州类似。在没有资料记载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元江州的人口进行类比。1953年镇沅县人口为85395人,为元江州人口的30.1%,据此比例推测,乾隆四十一年镇沅州的人口约4.5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6万。

6. 景东厅

在表6-1中,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景东厅的口数分别为6.3万和7.4万,户均口数分别为4.7和5.1。户均口数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对只有十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年中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6‰,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3‰。然而,这一口数还不是完全的。嘉庆二十五年《景东直隶厅志》卷10记载的口数为126209,是《嘉庆一统志》所载人口的1倍。1953年景东县人口为229100人,若以为《嘉庆一统志》所载人口数为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景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7‰,如以嘉庆《景东直隶厅志》的记载为真,则从嘉庆后期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5‰。嘉庆《景东直隶厅志》的记载是真实的。

乾隆、嘉庆年间发生的滇西鼠疫大流行,自丽江至大理再至景东,经历了一个由滇西北部向南再向东传播的过程。嘉庆年间,景东厅形成新的鼠疫流行中心。比照下文所述大理府的情形,乾隆四十一年以来的人口增长,为此次鼠疫所消灭。因此,乾隆四十一年人口仍可能在12万左右。景东厅的绝大部分是汉族人口,少量少数民族人口造成的漏记不予讨论。

三、滇东南区

1. 开化府

在表6-1中,嘉庆二十五年开化府人口为25.9万,道光十年仅为20.6万,人口不增反减,很不正常。开化府知府施道生说:

已经编入保甲
的客户与流民被
编载。

“开化所辖安平、文山，广南所辖宝宁等属，因多旷地，川、楚、黔、粤男妇流民，迁居垦种，以资生计，其来已久。自道光三年清查，除客户艺业生理，挟资主人，由客长约束，其余耕种流民，多有家室，即归各里乡约，附入保甲……开化所属安平、文山等处，现计客户、流民二万四千余户，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二万二千余户。”^①同书记载道光十年开化府“实在土著民户”41143户，比表6-1所引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的记载多了1户，是为转抄中的错误，忽略不计。将“客户、流民”视作“土著民户”肯定是不妥当的，道光十年的户口中，漏记了已编入保甲的“客户”和“流民”。如是，道光十年开化府应有63143户，以每户5口计，有31.6万人。

道光《开化府志》卷1称，“嘉庆二十五年实在土著人民”40186户，共计大小人丁182685丁，户均4.6口。《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户数为55923，口数为259216，户均口数4.6。从户均口数相同这一点上看，两书所载应当出自同一个系统。道光《开化府志》所载要比《嘉庆一统志》为少，可能是漏载了15737户已经入籍的“客户”和“流民”。

如此，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开化府的土著人口从40186户增加至41142户，年平均增长率为2.4%，增加的速度很慢。“客户”和“流民”的增加只牵涉到入籍的数量，不做增长速度的分析。

道光《开化府志》卷1中还有一个道光六年的户口数，即道光六年新增4498户、19739口。总户数达44684，总人口达202424。如果计算这六年中的年平均增长率的话，户年平均增17.8%，口年平均增17.2%。此数据与表6-1中所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中数据无法吻合，暂不分析。

扣除砚山县人口的半数后^②，1953年开化府属各县人口合计

① 云南督抚《稽查流民折》，道光《威远厅志》卷3。转引自《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4页。

② 1933年析原开化府文山县和广南府广南县，设砚山县。

为 78.2 万人；如以《嘉庆一统志》所载为基数，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3‰。如以道光《开化府志》所载为基数，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0.9‰。在 13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个地区要保持 10‰以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很难想象的。以调整过的道光十年 31.6 万人口作为基数，至 1953 年，开化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3‰，与顺宁府、永北厅的情况相似。

根据这一分析，在道光十年的人口中，以“客户”和“流民”构成的汉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 37%。1982 年，开化府境的汉族人口占到了全体人口的 55%，说明道光十年的汉族入籍可能是不完全的，此正如下引道光《广南府志》卷 2 的记载，“流民忽去忽来”，难以稽查。另外，也不排除清代中期以后大量移民迁入的可能性。所以，20 世纪中叶，这一区域在原有 2 县（厅）的基础上，相继设立了麻栗坡、西畴、砚山、屏边和河口 4.5 个县。人口的超常增加构成设县的动力。类似情形在同时代的永北厅及顺宁府皆有所见。

事实上，嘉庆、道光年间，要做到对全体少数民族人口进行清查是不可能的。如对屏边县这类偏僻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清查，就是相当困难的。1982 年，屏边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开化府少数民族人口的 10%。如果道光年间的在籍人口不包括他们，是年实际人口将多于 31.6 万。由于笔者无法把握漏记的少数民族人口数，因此，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以道光十年 31.6 万人口为基点，如以 6‰的年平均增长率上溯至嘉庆二十五年和乾隆四十一年，开化府人口分别为 29.8 万和 22.9 万。

2. 广南府

表 6-1 中广南府的户口数缺载。事实上，早在乾隆年间，广南府就进行过大规模的户口调查，只不过这次户口调查是与编造保甲合在一起进行的。关于这次户口调查的对象、起因与结果，道光《广南府志》卷 2《民户》有以下记载：

广南向止夷户，不过蛮獠、沙侬耳。今国家承平日久，直省生齿尤繁，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

云南边区人口
多被漏载。

乡如乐土,故稽烟户不止较当年倍蓰。教训而约束之,德威并用,宽猛兼施,惟在贤守,今驶之有道而已。

乾隆九年奉行设保甲稽察匪类,着五门四乡各兵目将村寨烟户编为十家保甲。乾隆四十年编造保甲烟户清册,计三千五百五十五甲,三万四千九百九十七户。道光元年编造保甲四千五百余甲。然遗漏甚多,且流民忽去忽来,迄无定数,万山之中,假于胥吏,编查更难深信。

从乾隆四十年至道光元年,广南府以甲为单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3%。然而,广南府的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可能并不全是真实的。《广南府志》的作者指出,由于遗漏太多,人口统计不全,实际的人口增长速度可能还要高一些。

上引文献称:“广南所属宝宁、土富州等处,现计客户、流民二万二千余户。”从乾隆四十年广南府保甲与民户的严格对应上看,道光元年的广南府户数应为45000户左右,如此,客户、流民户约占总户数的48.9%^①。

在乾隆四十年移民登记以前,广南府对当地的“夷民”未进行任何形式的人口调查。乾隆四十四年的保甲调查,不仅包括汉人,也包括“夷民”,否则不可能“将村寨烟户编为十家保甲”。这类调查,在云南的其他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也进行过,但在《嘉庆一统志》中未能反映出来。1982年广南府境人口总数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3.6%,少数民族人口占66.4%。按此比例计算,道光元年广南府的户口中,可能还有一批少数民族人口未被统计进去。即使我们假定道光年间的二万二千余户客户、流民就是广南府汉族人口的全部,广南府的户数可达65476户,人口可达32.7万。1953年,清代广南府属地的富宁、宝宁(广南)两县人口与划归砚山县的人口合计为51.3万,从道光元年至1953年,广南府人口

^①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的研究中,我假定道光年间广南府客户与流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开化府相似,推算得出广南府有37714户,人口总数约为18.9万。当时忽略了道光元年“四千五百余甲”这一事实。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3‰。

由此可知,乾隆年间的保甲调查是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的,但却不完全。以道光元年为基点,以 5.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测算,乾隆四十一年有 25.8 万人。

乾隆年间开化府的保甲包括了部分少数民族人口。

与开化府不同的是,直到 20 世纪,广南府境一直只设有两个县,一个多世纪以来该地从未设置过新县,仅与开化府合设过砚山县。因此,道光年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致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一自然增长率与嘉庆、道光年间开化府“土著人民”的自然增长率相近。同一自然环境及社会背景下的人口增长速度应是大致相同的。

3. 临安府

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临安府的口数分别为 53.2 万和 56.5 万,户均口数分别为 3.9 和 4.0。十年间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如将户均口数调整到 5,则两个年份的人口数分别为 67.6 万和 69.9 万。

临安府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府人口的 40%。在该地少数民族人口中,哈尼族和彝族占绝大多数。就具体分布而言,临安府南部的个旧、元阳、红河、绿春和金平五县均设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及 50 年代,1982 年这一区域居民的 85%左右为哈尼族和彝族。《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所载人口不可能包括这一区域。1953 年,排除掉这一区域之后,临安府只有 113.7 万人口。

临安中北部诸县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如峨山彝族自治县就位于临安县北端。1982 年该区少数民族人口至少占人口的 20%。排除掉这批人口后,临安府人口只有 91 万。从道光十年至 1953 年,临安府(北部)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1‰。清代后期,临安府形成云南鼠疫流行新的中心,人口的低增长与此有关。

如果认为这百余年间临安府南部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与北部相同,则道光十年临安府的总人口应为 119.9 万。以年平均增长 6‰计,嘉庆二十五年临安府人口为 112.9 万,乾隆四十一年为 86.8 万。

四、滇东北区

1. 昭通府

昭通府的情况可以永善县为例。嘉庆八年《永善县志》卷2《户口》称：

本县地方系新开夷疆，例不编审人丁，惟编查保甲清出人丁户数。原编兵民一千四百二十四户，雍正十年以金沙江为界，新增四川屏山县，割归永善县，副官村兵民一千一百六十二户，二共二千五百八十六户。乾隆四十一年奉文编查清出兵民七千四百二十七户，男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四丁，女一万一千五百十口。今人烟辐辏，生齿蕃甚。

永善原为“夷疆”，改土归流后“夷民”大多被屠，迁入者多为来自曲靖府和云南府的汉族移民。1982年整个昭通地区的汉族人口已经超过90%，相信在清代中期移民运动结束以后，昭通府的汉人比例即已如是。所以，对新开“夷疆”的不编丁，实际是对汉族移民的不编丁。然而，丁虽不编，但保甲户口却早就存在。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八年的27年间，当地人口有相当大的增长。否则全县人口不足3万，县志作者决不会说“今人烟辐辏，生齿蕃甚”。

民国《昭通县志稿》卷2《户口》称：“惟昭居滇边开辟未久，查道光中阮志则言以夷户尚未编丁，岂丁口之数略而不详欤。”所谓“阮志”，指的是道光十五年阮元主编的《云南通志》。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此时的“夷民”未编入户籍。《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两书中缺昭通户口，即因为此。实际上，大量的汉人已迁入了这一区域。该志同卷继续称：“自清雍正五年始设官治民，一时户口尚未清理，复遭八年之乱，人民逃避殆尽。及再平定，经历年抚绥，逐渐生聚，逮乾隆中，休养已久。据昭旧志载，乾隆四十年汉夷共九千零七户，男二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丁，女一万九千一十八口，较三十年前附籍之户增四百三十，男增二千二十一，女增九百。考道光十二年《云南通志》则言昭通府俱系夷户，并未编丁，岂在当时仅联乡甲而人丁数未报耶？惟嘉道以来，时际承平，户口当极蕃

衍,况昭属通衢,四方杂聚,庶哉之叹不让卫。”保甲编丁与户口调查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其结果未计入省级户籍册中。

清兵对昭通地区的征服是通过屠杀来完成的。“改土归流”战争结束以后,移民活动随即展开。雍正十年(1732年),云贵总督高其倬招募汉人前往垦荒,由官府借给路费和耕牛、籽种,至其地,每户给田20亩,永远为业。有记载说:“但稽现时所有大族,又皆雍正间平定后,迁徙云南、曲靖二府之民,至昭填籍。”^①移民来自邻府,而非外省。由官府组织的邻近地区的移民完全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填补因战争中的屠杀造成的人口空白。基于这一背景,我以为昭通县的人口记载大体是真实的。只是这一年昭通县人口的性别比高达139,存在对女性人口的漏记。若以为真实的性别比为115,乾隆四十年昭通人口约为5万人。

移民区的户口调查质量较高,因为移民本身就是政府控制的。

唯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夷民”问题。上引资料虽然“汉夷”并称,但我仍以为对深山中的“夷民”进行编审是不可能的。当时编入户籍的“夷民”应是“熟夷”,今天仍以少数民族身份自称者的祖先,在乾隆年间可能未编入户籍。1982年昭通县人口的13%为少数民族,乾隆年间的少数民族比例应当稍高于此,因为假定以30%计,昭通县人口应为7.1万。1953年昭通县人口为255669人,从乾隆四十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7.2‰。

在1953年的昭通府人口中,昭通县人口占全府人口总数的15.4%,如果这一比例是一个大体恒定的值,即乾隆四十年昭通县人口保持同样的比例,是年昭通府人口总数约为46万。以此人口增长速度进行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昭通府人口为63.1万。

从乾隆四十年至1953年,昭通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2‰。作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一增长速度无疑过高。然而,昭通县是一个移民区,人口的过高增长实际上意味着乾隆四十年以后,仍然有大量人口迁入。上引民国《昭通县志》认为,“惟嘉、道以来,时际承平,户口当极蕃衍”,道理即在于此。

进入20世纪以后,昭通府境新设三县:绥宁、盐津和威信。三

^① 民国《昭通县志稿》卷6《氏族》。

县分布于昭通府北部边境与四川交界的山区里,其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汉族而非少数民族。

2. 东川府

至今未获任何有关东川府历史人口的资料。将东川府人口与曲靖府人口进行类比或许是唯一的办法。1953年东川府人口是曲靖府人口的47.6%,道光十年、嘉庆二十五年和乾隆四十一年东川府人口分别为33万、28.8万和18.6万。

五、滇西区

1. 大理府

据表6-1,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大理府的人口分别为74.8万和80.2万,户均口数分别为6.1和6.2。十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

大理府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白族,1982年以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府人口的41.6%,他们主要居住在大理、洱源和云龙三县,即大理府的西部地区。白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彝族、傣族等不同,他们较早接受汉文化,较早成为中原王朝的臣民。所以,清政府对这一区域的管理,与汉族地区没有很大的区别。唯有不同的倒是在大理府的东北部地区,明政府设十二关长官司,清因之。土官李姓,世袭。因其人少,不予讨论。

1953年大理府境人口总数为937251。从道光十年至此,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3‰。大理府人口的停滞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和鼠疫流行有关。在一般的情况下,嘉庆、道光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作为清代中期的人口增长速度来看待,但是在大理府,情况则有所不同。如在邓川县,“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自此年延及嘉庆,大疫,死者以万计,野无人烟。”^①又如在宾川县,“宾川以频年灾疫,各村砦罹灾,死者过半,户多鳏寡,田旷无人耕。”^②在一篇论文中,我和我的合作者估计乾隆末年大理府人口死亡大约

清代中期以后大理府的人口低增长与战争和鼠疫有关。

①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4引《邓川州志》。

② 袁文揆《纪宾川州事始末》,道光《云南通志稿》卷206《艺文志》。

为 15 万人,就可见此次疫情的严重了^①。以 7‰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嘉庆五年,即鼠疫结束后的时间,应有人口 65.1 万。乾隆五十一年应有人口 80 万。再以 7‰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大理府有人口 74.6 万。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大理府人口几无增长。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7‰,增速较低。究其原因,在于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是以此为中心的,战争再一次摧毁了大理府的人口。

2. 蒙化厅

表 6-1 中嘉庆二十五年和道光十年的蒙化厅口数分别为 15.5 万和 16.2 万,户均口数分别为 3.6 和 3.7。从户均口数的角度看,嘉庆、道光年间的两个数据属于同一统计口径。十年间户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 4.4‰。

如前述,《嘉庆一统志》和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所载户口并不包括少数民族人口。1982 年蒙化厅(巍山和南涧两县)的彝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30%。假定嘉庆、道光年间的比例与此同,则两个年份的实际人口分别为 22.2 万和 23.2 万。

1953 年蒙化厅人口总数为 234627,道光十年至此,人口几无增长。此情形有类于在云南等府所见,也与大理府所见略同。

按照年平均增长 4.4‰ 的水平计,乾隆四十一年蒙化厅人口有 18.3 万。

六、滇西北区

1. 丽江府

据表 6-1,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十年丽江府的人口分别为 35.1 万和 36.3 万,户均口数分别为 5.7 和 5.8,十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4‰。

1982 年,除了鹤庆州汉人比例达到 37% 外,中甸、维西两县汉

^① 李玉尚、曹树基《18—19 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人比例不足 25%，其余各县汉人比例都在 20% 以下，剑川县的汉人仅占 5%，合计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体人口的 81%。这里的少数民族以纳西、傣傣、独龙为主要。

嘉庆、道光年间丽江府约有人口 35 万~36 万。如果说如此多的人口没有包括少数民族人口，是说不通的。20 世纪上半叶，这一区域设置了德钦、兰坪、碧江、福贡、贡山等五县。1953 年此五县人口合计为 188063 人，占当时全府人口总数的 26.2%，其居民的 90% 以上为少数民族。五县当中，有碧江、福贡、贡山三县划入怒江傣傣族自治州的辖境，并构成该区的主体。由此看来，清代中期丽江府户籍，不可能包括此五县人口。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嘉庆、道光年间的丽江府人口应有 47.5 万和 49.1 万。以年平均增长 3.4‰ 的速度计，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 40.9 万。

1953 年丽江府人口总数为 71.8 万，道光十年至此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1‰。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大理府，说明丽江府所受咸丰、同治年间战争及鼠疫的危害要比大理府小。然而，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永北厅，说明战争和鼠疫对该区造成的危害仍是不可低估的。

2. 永北厅

表 6-1 中嘉庆二十五年永北厅户均 6.3 口，与道光十年的户均 6.5 口相似。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永北厅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8‰，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0.8‰。

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 2《户口》引“永北府旧志”，“乾隆二十三年知府马琪珣奉谕编查保甲。三十年知府陈奇典再行确查汇册存案，四城及远近屯伍、土司、汉夷烟户”计 8562 户，共男妇老幼 35210 丁口，户均只有 4.1 口，偏低。从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年户的增长速度相近。

然而，1953 年永北厅三县人口总数达 359945 人，道光十年至此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 11.1‰。这不像是真实的人口增长情况，却像是道光以后有大批少数民族人口登记入册所致。上引资料中“四城及远近屯伍、土司、汉夷烟户”应是厅治附近的人口，

“熟夷”与“生夷”。

其中包括少数民族人口。我相信乾隆年间入籍的“夷人”在当时就是“熟夷”，早已汉化。1982年，永北厅三县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7%，道光十年的人口中没有包括这批“夷人”的祖先。加上这批人口，道光十年永北厅的人口总数可能达14.6万人。从道光十年至1953年，永北厅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4‰。永北厅经历了咸丰、同治年间的“回乱”，其人口保持如此高的自然增长速度令人有点怀疑。

经历了咸同回民战争的地区人口的损失都相当大。如云南、澂江、大理等府，从道光十年至1953年，人口增长甚少或几无增长。永北厅的情况也是如此，光绪《永北直隶厅志》卷2《户口》说：“我朝教养二百余年，人物辐辏群萃，州处烟火万家，遂为文人之数。自逆回倡乱，历兵燹十有八年，厅城久陷，死丧疏离之苦，不忍详述。克复后户口凋零，迄今元气未复，城郭如故，人民全非。”在经历了这么严重的损失以后，在清代末年和1936年，永北厅境竟然分设出华坪和宁浪两县，永北厅改为永胜县。这说明战争对永北地区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清代后期永北地区人口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口增多，必须通过设置新县来治理。当然，清代后期也可能有外来移民迁入此一区域。

以7‰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永北厅人口约为13.6万，乾隆四十一年约为10万。

七、结语

根据上文内容，将各府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及1953年的人口，列如表6-6。

如果没有经历大的战争、灾荒与瘟疫，清代中期各府州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与1953年应是大致相同的。事实上，在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的133年间，云南府、澂江府、楚雄府、武定州、普洱府、元江州、临安府、大理府、蒙化厅、丽江府的人口比例都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云南府、澂江府、普洱府、蒙化厅、大理府、临安府的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相当大，表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对这些地区人口的影响较深。那些人口比例上升的地区，则受战争

表 6-6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云南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 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云南府	101.1	12.8	133.4	13.0	151.9	8.6
潞江府	43.0	5.5	56.5	5.5	50.2	2.8
楚雄府	48.5	6.2	66.9	6.5	97.4	5.5
武定州	20.2	2.6	28.7	2.8	40.5	2.3
曲靖府	39.0	4.9	60.8	5.9	179.7	10.2
广西州	13.5	1.7	19.1	1.9	60.8	3.4
顺宁府	29.4	3.7	41.7	4.0	120.4	6.8
永昌府	39.0	4.9	55.3	5.4	118.8	6.7
腾越厅	30.6	3.9	40.9	4.0	64.5	3.7
普洱府	48.7	6.2	63.3	6.1	62.4	3.5
元江州	15.0	1.9	19.3	1.9	28.4	1.6
镇沅州	4.5	0.6	6.0	0.6	8.5	0.5
景东厅	12.0	1.5	12.6	1.2	22.9	1.3
开化府	22.9	2.9	29.8	2.9	78.2	4.4
广南府	25.8	3.3	32.7	3.2	51.3	2.9
临安府	86.8	11.0	112.9	11.0	150.9	8.6
昭通府	46.0	5.8	63.1	6.1	165.5	9.4
东川府	18.6	2.4	28.8	2.8	85.6	4.9
大理府	74.6	9.5	74.8	7.3	93.7	5.3
蒙化厅	18.3	2.3	22.2	2.2	23.4	1.3
丽江府	40.9	5.2	47.5	4.6	71.8	4.1
永北厅	10.0	1.3	13.6	1.3	36.0	2.0
合 计	788.4	100.0	1029.9	100.0	1762.8	100.0

说明: 1953 年元江州人口中包括三分之一的红河县人口, 广南府人口中包括二分之一的砚山县人口, 永昌府人口中包括二分之一的昌宁县人口, 东川府包括 1952 年划归四川的二分之一的会东县人口。

影响较小, 人口的发展较为顺利。从人口的增长速度来看, 从 1820 年至 1953 年, 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超过 2.5‰ 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府大都是这些人口比例下降的府州。从区域的角度看, 这

一区域包括以省会为中心的滇中区,包括滇西南的东部和滇东南的西部这一相连成片的广阔区域,还包括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区。如上文所述,滇西南的东部和滇东南的西部主要指普洱府和临安府。在讨论 1820 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增长时,两府南部今属西双版纳和红河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均不在讨论之列。由此可知,这一人口的低增长区域包括的是云南中部和西部自然条件最好的农业区。这一结果,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及鼠疫的流行有关,读者可参见本卷第十三章的论述。

从 1820 年至 1953 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多且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 7‰~9‰ 之间的府为昭通府、东川府、曲靖府、广西州、开化府、顺宁府和永北厅。从滇东北区的昭通府往南,依次是东川府、曲靖府、广西州和开化府,构成一条由北至南的人口高速增长带。在这一地带的西侧和东侧,则是人口的低增长区。此外,在滇西地区,永北厅与顺宁府所处的经度相近,只是两府之间隔有大理府和蒙化厅,否则可能形成与滇东地区相似的贯穿南北的人口高速增长地带。

滇东为人口高速增长地带。

1820 年以来,云南以府为单位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表现得这样有规律,笔者对这一研究有充分的信心。第十三章有关清代后期云南人口损失的研究,就是在这—基础上进行的。

《清朝文献通考》卷 19 记载的乾隆四十一年云南人口总数为 310.3 万,仅及表 6-6 估测数的 40%。《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云南人口总数为 6925610,扣除广西州口数的明显错误后,只有 6039440,与《户部清册》所载 6067171 基本相同,仅及表 6-6 估测人口的 58%~59%。

第二节 贵 州

一、黔中地区

1. 贵阳府

道光《贵阳府志》卷 44《食货略》所载康熙、乾隆年间的分县户口,大多数属于纳税单位的“丁”的系列。如在贵筑县条下,记原额

6168户,“丁八千五百一十四奇七分”,与人口无关,此不详加讨论。该书又引《赋役全书》的记载,分记各县原额户数、新增户数和现在户数,此后再引《贵阳府志稿》,分列各县汉、苗户口。各县各类户口数详见表6-7。

表6-7 清代中期贵阳府分县户口

州 县	《赋役全书》		《贵阳府志稿》			
	原 额	现 户	汉族户	汉族口	苗族户	苗族口
亲辖地	12657	12998	15534	105595		
贵筑县	47004	47152	52051	291684		
长寨厅	3375	3465	3578	18513		
定番州	11198	11738	2081	15846	2638	19256
广顺州	12125	12365	7275	35618	7259	43850
开 州	23061	23268	23504	104568		
贵定县	12810	13213	20037	72691		
龙里县	9258	9334	4770	26406		
修文县	17523	18042	29380	141112		
大塘州判			1873	10608		
罗斛州			500	2769	2433	15974
合 计	149011	151575	160583	825410	12330	79080

资料来源:道光《贵阳府志》卷44《食货略》。

说明:“亲辖地”指知府所辖地,类似内地的附郭县。

《嘉庆一统志》载贵阳府有151251户,741009口,户均4.9口。《赋役全书》所载与《嘉庆一统志》相近,说明《赋役全书》的性质与《嘉庆一统志》相同。《贵阳府志稿》即为道光《贵阳府志》的稿本。道光《贵阳府志》刊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贵阳府志稿》成书时间更早。因此,我们不妨将所载户口的时间定为道光十八年。也就是说,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表6-8所载贵阳府的户口变动经历了18年的时间。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详加讨论。

其一,关于苗户。从分县户数的比较中可见,《赋役全书》所载是包括了苗户的。嘉庆二十五年广顺州(今长顺县一部分)共

12365户,道光十五年广顺州共14534户,其中苗户为7259户。由此可以推测,嘉庆二十五年广顺州的总户数中约有半数是苗户。道光《广顺州志》卷2《食货·户口》称:“嘉庆十七年奉文查造汉户五千三百九十六户,男妇大小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九名口;苗种八千二百五十八户,男妇大小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五名口。”合计汉、苗户数为13654户,96034口,户均7口。户数多于《赋役全书》所载且户均口数过高,原因不明。依此分析,《赋役全书》所载定番州的户中,也包括了少数民族。

然而,《赋役全书》没有包括所有的苗户。如道光《贵阳府志》卷44《食货略》在“长寨厅”条下称:“苗民无户口”,又曰:“新附克孟、古羊山外生苗一百七十九寨,定番州拨归生苗一百八寨,无户口。”苗民的数量很大,却无户口。按照1985年公布的数据,长顺县(1942年由广顺、长寨两县合并而成)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8%^①,除了其中所含广顺州的人口,长寨厅缺载的少数民族人口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正是因此比例,对于嘉庆年间的长顺州户数的不同数据,我采纳道光《贵阳府志》而拒绝道光《广顺州志》。

其二,关于汉户。根据现代统计数据中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可以复原那些缺载少数民族人口。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首先确定道光年间的汉族人口统计是可靠的。然而,道光《贵阳府志》漏载了一批规模不小的汉族人口。

这批汉族人口是道光初年调查入册的客民。罗绕典在《黔南识略》卷1《总叙》中有如下记载:

道光六年,巡抚嵩溥钦奉谕旨,飭禁汉奸私入苗寨,勾引滋扰。当经委员逐细编查,各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佃种苗人田土客民共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贸易、手艺、佣工客民共二万四百四十四户。住居城市乡场及隔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一千九百七十三户,并住居城市乡场买当苗民全庄田土客民及佃户共四千四百五十五户。奏请自

《赋役全书》只记载了部分少数民族人口。

《贵阳府志》未记汉族客民。

^① 贵州省地图集办公室编《贵州省地图集》(1985年内部本)。1985年贵州省各县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均来自此书,不一一说明。

此次编查之后,如再有勾引流民,擅入苗寨,续增户口,买当田土者,将流民递籍,并将勾引之客民立时驱逐出境,田产给还苗人,追价入官,仍照违制律治罪。

这批客民是当作一类特殊的人口记载的。道光二十四年,罗绕典出任贵州布政使,二十七年夏间,他得《黔南识略》抄本于士人家,随即刊刻。不久,罗绕典又发现另外一批材料,经整理后于是年十二月编成刊刻,书名为《黔南职方纪略》。在该书的《序言》中,罗氏称:“我皇上统驭之初,中丞长白嵩曼士先生奏请编察通省客户,备有成籍。余承宣于斯,盖三年矣。一日出故府所藏,得而读之,见其考据往古,钩稽现在,具有本末,因芟削为是书。惟遵义、思州、仁怀为未备,盖吏失其册也。又求府、厅诸志,为补遗佚。未付之以土司、苗蛮。”在该书中,遵义、思州、仁怀三地的客民果不见记载,只有一般有关山川地理的记叙,而山川地理等是可以“求府、厅诸志”而得的。由此可见,《黔南职方纪略》中有关各府客户的记载,是地方志中所未备的。上引道光《贵阳府志》成书于道光二十年,罗绕典的发现也不可能为府志所收录了。各县客户数及推算口数见表6-8。

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苗汉人口比例变动不大。

其三,关于缺载苗户的复原。表6-8中列有定番(今惠水县)、广顺(今长顺县一部分)、罗斛(今罗甸县)三地的汉、苗户口,三地苗族人口在各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46.2%、49%和74.5%,1985年三地苗族人口在各自总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为56%、48%和62.8%。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后,广顺的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没有变化,定番有所增长,罗斛有所下降,因变动并不很大,就意味着,依据1985年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可以推测道光年间的少数民族人口。

在1985年的贵阳市,少数民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12.3%。作为省会的贵阳市人口发展很快,百余年来外来人口较多,回溯到清代中期,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当高于此。在开州、贵定、龙里和修文县,1985年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0.6%、46%、33.3%和7.3%。

《黔南职方纪略》卷1称贵阳亲辖地六里中,“惟养龙地方在府治之北,远越修文,界联遵义,距府三程,极为穹远,其民皆汉多苗

表 6-8 清代中期贵阳府客民与苗民

州 县	客 户	客口(估计)	汉族口	苗族口(估计)
亲辖地	1343	6715	112310	15751
贵筑县	1128	5640	297324	41700
长寨厅	340	1700	20213	18658
定番州	1318	6590	22436	19256
广顺州	2000	10000	45618	43850
开 州	578	2890	107458	12742
贵定县	1137	5685	78376	66765
龙里县		0	26406	13207
修文县		0	141112	0
大塘州判	865	4325	14933	15000
罗斛州	542	2710	5479	15974
合 计	9251	46255	871665	183823

资料来源：客户据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1《贵阳府》，客口据户均5口推得。汉族口为客口加表6-7中汉族口数，苗族口数的推算见本节正文。

少”；在开州，“且其地归流既久，汉多于苗”；在龙里，“汉多于苗”；关于修文，“地居大定、遵义之间，本敷勇卫四所之地，今改为至孝、仁和、信顺、崇义四里。每里分为八甲，甲内悉为汉寨。昔日尚有底寨正副两长官司，所辖之零星散处苗民，今日皆为汉民佃户，久已编入汉民户口”。这些记载与1985年的苗族人口在各县人口中的比例皆能对应。唯有修文一县，《黔南职方纪略》称已入汉民户口，表6-8中不单作苗民人口推算。

《黔南职方纪略》卷1称贵筑县所管之里计十有七，由贵州、贵前两卫改者，其里九，由新贵裁归者，其里八。“新贵八里，悉系土著汉民，并无苗户。由卫所改为九里，本系明代屯田，汉多苗少，情形与府属等”。即将贵筑县的苗民比例视与亲辖地等。大塘州判辖地从定番州中析出，位于贵阳府的中部偏东地方。按照贵定、长顺、定番等地的苗民比例，将其苗民人口定为50%左右。其他各县根据1985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进行推算，其结果列于表6-8的“苗口估测”栏中。

道光《贵阳府志》所载仅包括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赋役全书》中记载的少数民族人口也是不完全的。另外,由于《嘉庆一统志》中数据与《赋役全书》相近,后者是前者的资料来源。所以,《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未包括贵阳府全部的少数民族户口。排除罗斛州的数据不计,《嘉庆一统志》中所载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府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 25.8%。

据表 6-7 和表 6-8,修正前的苗民人口约占全体人口的 7%,修正后占 23.2%。1985 年贵阳府辖境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体人口总数的 25.1%,修正后的苗民比例与此相近。这一结果证明贵阳府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百余年来没有发生大的变动,不多的误差可能是修文县少数民族人口未单列所引起。如果将修文县总人口中占 7.3%的苗民析出,则道光年间贵阳府苗民在全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达 24.1%,与 1985 年的比例相当接近。

《黔南职方纪略》卷 1 在“广顺州”条下称:“(康熙)五十五年长寨枝苗滋事,移同知设厅于长寨,遂拨纪堵等七枝归厅管辖,复拨板当枝隶归化厅辖,今尚存来格、从仁……十里,松冈、改雅……十枝。梭把以下六枝,向系苗民,并无汉户。嘉庆间始有遵义及各省客民,住种其地。”最偏僻的苗寨,嘉庆年间都有汉族客民迁入,可见客民的迁入多在乾隆、嘉庆年间。因此,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应当包括这批人口。

道光年间客户占已入籍人口的 4.7%,据此,嘉庆二十五年贵阳府在籍人口应为 777223。然而,这一数据只包括了 25%的少数民族人口,如果将所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考虑进去的话,嘉庆二十五年贵阳府的人口可能达到 92 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贵阳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而在未加修正的数据中,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贵阳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5‰。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除了大塘州判辖地和罗斛州不计,也除去客户人口不计,同一口径下贵阳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8‰。据此可以推测乾隆四十一年贵阳府人口总数约为 71.3 万。

2. 都匀府

依照上述分析的思路,可以认为,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

贵州人口增长速度过高的地区，都有可能漏载少数民族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过高地区的在籍人口，都有可能未包括少数民族人口。如都匀府，《嘉庆一统志》载口数为 24.3 万，1953 年为 104.4 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都匀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1%。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令人怀疑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口数据中有相当数量人口的漏载。

嘉庆二十五年都匀府户口中也未包括客民。据《黔南职方纪略》，道光初年，都匀府的客民达到 11032 户，合计约 5.5 万人。如是，嘉庆二十五年都匀府的人口可增至 30 万人。

在都匀府南部诸州、厅、县，如荔波、独山、都江（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八寨（今丹寨县）和都匀，1985 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各县人口的大多数，全府合计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1% 左右。该地除了 20 世纪新设的平塘县外，其他各县均设立于清代中期以前。例如，在嘉庆年间都匀府南部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荔波、八寨、都江等地，不可能对辖地少数民族人口完全不加记载，否则这一地区就有可能出现人口的空白。

设少数民族人口中的三分之一已入户籍的话，嘉庆二十五年都匀府的总人口约 50 万，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5%。以 6% 年平均增长率从嘉庆二十五年回溯，乾隆四十一年都匀府人口总数约为 38.4 万。

3. 平越州和松桃厅

《嘉庆一统志》载平越州和松桃厅口数分别为 367608 和 115453，至 1953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1% 和 6.4%，道光初年平越州和松桃县分别有 994 户和 857 户客民。如果加上这批人口，两地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都要低一些。此不详论。用 6%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可得各自乾隆四十一年人口，详见表 6-14。

4. 安顺府

《嘉庆一统志》载安顺府近 77 万口，从此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道光初年，安顺府的客民为 3684 户，合计约 1.8 万人。加上客民后，同一时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

1985年安顺府地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6%左右。这一比例与大定府相似,回溯至清代中期,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可能更高。如果也像大定府一样,少数民族人口可能占总人口的40%。如果嘉庆二十五年在籍人口不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的话,1820年安顺府人口总数将接近1953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嘉庆二十五年的安顺府人口中已经包括了少数民族人口。

以6‰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安顺府人口总数约为60.6万。

二、黔北地区

1. 遵义府

乾隆至道光年间遵义府的户口数,见表6-9。

表6-9 乾隆至道光年间遵义府的户口变动

年 代	户	口	户均口数
乾隆二十三年	44727	218176	4.9
嘉庆二十五年	107013	512597	4.8
道光元年	107889	514813	4.8
五年	107974	516663	4.8
十年	108980	554479	5.1
十一年	108100	539061	5.0
十五年	108506	560625	5.2
十八年	110217	584235	5.3
十九年	111450	561323	5.0

资料来源:道光《遵义府志》卷12《户口》。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户数为115769,口数为591598,与道光《遵义府志》的记载有些出入,地方志的记载少于《嘉庆一统志》。如果道光《遵义府志》中的资料为真,则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遵义府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7‰。若以《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为准,同一时期遵义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2‰。遵义府的户口增长太快,我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户口增速太快,令人怀疑其真实性。

道光年间的数字像是人工编造而不是调查所得。参照道光《遵义府志》所载分县户口数据,人工编造的痕迹更易察觉。如遵义县,道光元年、道光五年与嘉庆二十五年户数相同,口数略有变动。道光十年及以后各年份的户数不变,口数增加数百而已。又如同书记载的正安州,道光元年较前一年分别增加 2 户和 2 口,道光十一年较前一年也是增加 2 户,人口数则忽高忽低。桐梓县户数大致是一年多,一年少,口数的变动也大体如此。这似乎是为了控制户口增加,官吏们有意做的数字游戏。

户口数据的变动似乎是一场游戏。

道光《遵义府志》卷 12 评价道:“按遵义户口,因田起丁,大概未经实算。《桐梓志》云:‘近来城厢内外,何止万家烟火。’又云:‘滋生人丁不可胜记。’《绥阳志》并户口不载,是其证也。今以遵义一县粗计之,府城内外居民户约万余,口几十万。加以十三里,较附郭必十倍。而历年所报户口册,户仅八万余。遵义为贵州最庶之县,其户口尚不及绥阳、仁怀僻县之多,岂非报册止据承粮,户数未暇编算哉。正安草志载乾隆间二条及近岁绥阳、仁怀报册,尚为得实。”

兹将道光《遵义府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分县数据,列如表 6-10。如将各县在全府总人口中的比例与 1953 年的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个年代之间,根本不存在可比性。也就是说,遵义府各县人口的变动完全没有规律可言。嘉庆二十五年的遵义府人口数是不可靠的。

表 6-10 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遵义府分县人口

市 县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的百分比 (%)	人口	百分比 (%)
遵义市					97522	4.3
遵 义	23645	87276	3.7	17.0	664522	29.0
仁 怀	30367	159795	5.3	31.2	307411	13.4
习 水					222535	9.7
桐 梓	11256	56280	5.0	11.0	333562	14.5
绥 阳	21032	66007	3.1	12.9	220455	9.6

续表

市 县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的百分比 (%)	人口	百分比 (%)
正安	21313	143239	6.7	27.9	277380	12.1
道真					169593	7.4
合 计	107613	512597	4.8	100.0	2292980	100.0

资料来源：道光《遵义府志》卷12《户口》。

分县而论,最大的问题出在遵义县和桐梓县。上引资料所称,“桐梓志”所载“城厢内外”已是“万家烟火”,指的是遵义城而非桐梓县城,然道光《遵义府志》估计并不正确,如果城厢内外为万家的话,因城市人口的户均口数少,估计府城人口约为四万,而非十万。若加上10倍于此的全县人口,则可达40万人。由此看来,户口册上的遵义县人口确实是少报了。按此数据,从道光二十年至1953年,遵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7‰,是大致合理的。

上引资料称遵义县的人口不及仁怀是真,不及绥阳则是假。在道光《遵义府志》中,嘉庆二十五年绥阳县人口只有6.6万,不及遵义。然此记载中绥阳县户均口数太少,按照户均5口的比例推测,绥阳县至少应有10.5万余人。道光《遵义府志》的作者所见绥阳县户口数当另有他本。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绥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5‰。

道光《遵义府志》卷12又记乾隆三十二年正安州汉户3928户,34253口;苗户526户,男女大小口4245。乾隆四十六年汉户增1528,男妇大小增63590;苗户增3225,男妇大小增15357。新增苗户是原来苗户的6.1倍,新增苗民是原来苗民的3.6倍;新增汉户是原有汉户的38%,新增汉民是原有汉民的1.9倍。在籍苗户、苗民的增长大大超过汉户、汉民的增长。很显然,苗户、苗民的超速增长是对苗民清理的结果。如果将乾隆后期对苗民的清理看作一种趋势,一种社会现象,就可以理解乾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遵义府在籍人口的超常增长。

苗民户口的超速增长是对苗民清理的结果。

光绪《正安州志》卷5《户口》记载嘉庆十九年，“共计户口生人数城乡四里汉民”20463户，男大口41570名，男小口31035，妇女大口38021口，女小口36432。在道光《遵义府志》的记载中，乾隆四十六年汉户共18134户，苗户共3751户，合计21885户；嘉庆十九年汉民20463户，苗户无载。嘉庆二十五年及以后，正安州的“户”在嘉庆十九年的“汉户”基础上变动，却不记“汉户”，仅记为“户”。由此可见，正安州嘉庆二十五年及以后的“户”仅为汉族，不包括苗民。在道光《遵义府志》中，正安州苗户占总户数的17.1%，苗民占总人口的16.7%^①。如是，嘉庆二十五年，正安州的实际人口应为17.3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正安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2‰。所以，1932年从正安州东北角析出道真县，正是人口较快增长所致。由于1915年在桐梓县西北角析出习水县，我们同样可以将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该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7.2‰左右。

将上述各县年平均增长率用于回溯，嘉庆二十五年遵义府人口合计为101.1万。按照贵阳府的例子，设遵义府也有大约占总人口5%的客民没有登记入册，所以，实际人口应为106.4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遵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8‰。

依贵阳府例，设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遵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则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81.8万。

2. 仁怀厅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仁怀厅仅有3.4万人口，1953年增至19.7万，年平均增长率为13.2‰。《黔南职方纪略》缺仁怀厅的客民数。另外，在1985年的人口中，赤水（即清代仁怀厅地）的少数民族人口不足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因此，如果不是存在户口隐漏的话，在1953年以前的百余年间，一定有大量的人口迁入仁怀，并在数量上可能超过嘉庆年间已经定居的土著。依遵义府的人口增长速度推测，嘉庆二十五年仁怀厅有9.1万人口，乾

^① 据1985年贵州省地图集办公室编《贵州省地图集》，正安县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0.5%。于此可见这一区域少数民族汉化的程度。

隆四十一年有 7 万人口。

3. 思南府

《嘉庆一统志》载思南府有 335882 口,至 1953 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0.5%。道光《思南府志》卷3《食货门·户口》列出了道光十年(1830年)所辖三司、三县户口数,如表 6-11。

表 6-11 道光十年思南府分司、分县户口

司 县	户	口	户均口数
三 司	31373	101230	3.2
安化县	16655	83090	5.0
印江县	12203	61717	5.1
婺川县	31611	130040	4.1
合 计	91842	376077	4.1

资料来源:道光《思南府志》卷3《食货门·户口》。

三司地区的户均口数太少,说明该地调查质量不及安化、印江、婺川三县。然该府户口调查的最大疑点在于,在籍人口中不知是否包括少数民族人口。《黔南职方纪略》卷6称:“黔省郡县,惟思南属归流最早,是以境内悉系土著汉民,既无客民,亦无苗种,惟安化县所辖村、江、堡、瓮四图,每图十里,有东越印江县,插花于松、铜之间为半河地方,有苗民十余寨。自县至彼,计程四日,距镇远四十八溪主簿分驻之地,不满十里。其地设有苗弁三名,有典买苗产客民十户,附寨居住并无苗产各有生理之户又八户。”然而,在 1985 年的数据中,思南府地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体人口的 45%~46%。很显然,《黔南职方纪略》所称思南“无苗种”的观点是错误的。

按照 1985 年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推测,道光十年思南府的全体人口应为 67.8 万。从道光十年至 1953 年,思南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6%。从这个增长速度看,道光十年思南府的在籍户口确实是不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的。同样《嘉庆一统志》也未记载思南府的少数民族人口。

思南并非“无苗种”,苗民人口被漏载了。

道光《思南府志》卷3称：“按郡户口备载赋役全书……国朝案册具在，顾山巅水涯，居处零星，地里赭沙，编查不易。科吏虎为民挠，应以虚文，在所不免，准是以论，户口实数，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思南府志》的作者已经意识到户口调查的不实，不是相差一点点，而是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一差距，实际上就是一大批居住于山区偏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被漏载。由于思南府改土归流的时间较早，该地的少数民族人口大多以熟苗的形式存在，他们的汉化程度很深，即使在道光年间，也不易为人所注意。按照贵阳府的人口增长速度，设思南府道光以前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嘉庆二十五年思南府人口约为63.9万，乾隆四十一年思南府人口约为49.1万。

4. 铜仁府

《嘉庆一统志》载铜仁府有37378户，131261口，户均3.5口，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道光《同仁府志》卷4《食货·户口》称铜仁府亲辖地“原额户口民、苗、侗、蛮二万九千一百二十四户，自嘉庆十九年至道光三年新增户口一百六十六户，共二万九千二百九十户”。又记铜仁县“原额民、苗、侗、蛮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四户，自嘉庆十九年至道光三年新增户口一百一十户，共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五户”。合而计之，道光三年铜仁府的总户数为44524户，较嘉庆十九年仅增加267户，九年中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为零。如与《嘉庆一统志》所载户数比较，三年中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0‰。两个增长速度都是不可相信的。

无论如何，道光《同仁府志》的记载表明嘉庆、道光年间的户口是包括少数民族的。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铜仁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介于贵阳府和思南府之间，大体可信。由此可知，《嘉庆一统志》中所载铜仁府户口包括了所有的汉族与少数民族。

如果按照6‰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以嘉庆二十五年之数为基点回溯，乾隆四十一年铜仁府人口约为10.1万。

5. 石阡府

《嘉庆一统志》载石阡府口数为9.5万，1953年达38.5万，口

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0.6‰。石阡府北与思南府毗邻,同期思南府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0.5‰。相邻区域的石阡府和思南府,在籍人口变动的速度竟是相同的。

如上所述,1985 年思南府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45%~46%。同年石阡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为 40.5%,凤冈县的情况不明。由此我推测石阡府的少数民族人口可占全府人口总数的 40%左右。如与思南府情况相同,则石阡府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中也是不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的^①。若加上少数民族人口,是年石阡府实际人口应为 15.9 万。至 1953 年,石阡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7‰。

石阡府的客民不见记载,因该府人口较少,客民的数量不会很多,此不考虑。类似的情况不再一一说明。以 6‰年平均增长率计,以嘉庆二十五年之数为基点回溯,乾隆四十一年石阡府人口总数约为 12.2 万。

二、黔东南区

1. 思州府

《嘉庆一统志》载思州府口数为 12.6 万,至 1953 年,增至近 17 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2.2‰。思州府辖两县,岑巩县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仅占全县人口的 9.5%,玉屏县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占全县人口的 57%,合计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28%。如果认为嘉庆二十五年思州府人口不包括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实际人口将达 19.5 万,超过 1953 年人口。这是不可能的。与毗邻的铜仁府相同,嘉庆二十五年的思州府在籍人口是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的。

以 4‰年平均增长率计,以嘉庆二十五年之数为基点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思州府人口总数约为 10.6 万。

2. 镇远府

《嘉庆一统志》载镇远府口数为 57.3 万,1953 年为 83.9 万,

^① 光绪《石阡府志》卷7《里甲》称乾隆四年造报民户时,汉民 3443 户,苗民 95 户;又称汉民流寓、客居、苗民及佣工无土者俱未编入。

百余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2.9%。道光初年镇远府的客民数为 2533 户,约合 1 万余人。加上这批人口,百余年间镇远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更低。

嘉庆二十五年镇远府人口中肯定包括了少数民族人口。按照 1985 年的数据,镇远府境各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府总人口的 63%,与都匀府比例相近。如果说嘉庆二十五年的在籍人口漏记了少数民族人口,那是不可想象的。

以 4% 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镇远人口总数约为 48.9 万。

3. 黎平府

《嘉庆一统志》载黎平府口数为 28.6 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黎平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从这一数据可以判断,嘉庆二十五年的黎平府在籍人口是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的。乾隆十七年《开泰县志·户口志》称,“开县各所屯驿汉民”共 7410 户,男妇大小共 26780 口,苗民共 1999 户,男妇大小共 7560 名口。在开泰县乾隆年间的的历史数据中,苗民人口占全县在籍人口的 22%。1985 年黎平县(即清代的开泰县)苗民占全县人口的 76%。乾隆十四年的数据中是没有包括所有的苗民的。漏载的苗民可能居住在“各所屯驿”之外的地方。

光绪《黎平府志》卷 3《食货志·户口》指出上引《开泰县志》中的数据是雍正五年改卫设县后奉文清查所得,不是实际的人口数。又指出雍正清查以后至道光年间,居民达到 31369 户,只是乾隆十四年对苗民户口的漏记并不意味着嘉庆二十五年也漏记了苗民户口。

道光初年的黎平府有 9915 户客民,约合 5 万人口。如加上这批人口,嘉庆二十五年实有人口 33.6 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黎平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3%。这是一个相当低的人口增长率,与镇远府、思州府的情况相似。黔东南的这一人口低增长地带,构成贵州人口史上的一个特殊景观。

以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为基础,以 4% 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黎平府人口总数约为 28.2 万。

四、黔西地区

1. 大定府

道光《大定府志》引《赋役全书》及道光年间的各县户口数,如表 6-12。

表 6-12 清代中期大定府分县户口

县 名	《赋役全书》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原额户	现 户	(汉)户	(汉)口	(夷)户	(夷)口
亲辖地	27471	27961	27193	133270	17831	86980
水 城	7651	8201	7121	29806	夷民无籍	
平 远	23995	24084	11145	44350	(汉、夷民)	
黔 西	28777	28931	28907	125305	夷民无籍	
威 宁	14634	14818	15294	87569	夷民无籍	
毕 节	13593	13887	15862	84339	夷民无籍	
合 计	116121	117882	105522	504639		

资料来源:道光《大定府志》卷40《经政志·户口丁银》。

在引用了《赋役全书》的资料后,道光《大定府志》的作者说:“此乾隆间数也。”《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嘉庆二十五年大定府户数为 117741,与《赋役全书》的记载相近。由此可知,《赋役全书》所载并非乾隆数,而是嘉庆年间的数字。《赋役全书》构成《嘉庆一统志》数据的基础,此与贵阳府的情况相同。

道光《大定府志》卷40《经政志·户口丁银》记载了清代中期以前大定府若干年份的户口数。乾隆十四年以前的数据不予讨论。乾隆十四年,大定府亲辖地“汉户一万一千六百二十八,男妇一万五千五百八十八;苗户九千七百八十,男妇三万八百四十五”。合计 21408 户,46433 口。由于户均口数过低,故口数不予考虑。

亲辖地从乾隆十四年的 21408 户,到嘉庆二十五年有 27961 户,再到道光二十七年的 45024 户,两个时段户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7‰和 17.8‰。前一时段的增长率过低,后一时段的增长

亲辖地类似附郭县。

率过高,都不可相信。

专以夷户计,道光二十七年亲辖地夷户为 17831,从乾隆十四年至此,夷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1‰,要比上述两个增长速度合理得多。夷户的记载是否可信呢?乾隆十四年,夷户占 45.7%,道光二十七年,夷户占 39.6%。夷户比例的下降和汉族人口比例上升是同时发生的。道光以后,这一过程仍在继续,1985 年的大方县(即大定县,清代大定府亲辖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只占 25%。这说明道光二十七年大定府亲辖地的夷户与乾隆十四年是同一系统的。其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变化。

专以汉户计,乾隆十四年大定府汉人为 11628 户,道光二十七年为 27193 户,其间年平均增长率为 8.6‰。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七年,亲辖地的汉户不增反减,殊不可信,亦不加讨论。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大定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2.6‰。嘉庆二十五年大定府的户口数是不真实的,既缺载了客民,又缺载了夷户。

据《黔南职方纪略》卷 3 的记载,道光初年大定府的客民为 10048 户,合 5 万余人。又据表 6-11,道光二十七年大定府亲辖地中夷口占总人口的 39.5%。如加上 2885 户客民,1.4 万余人口,夷民的比例约占 37%。1985 年,大方县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只占 26.7%。夷民比例的减少是夷民汉化的结果。所以,尽管 1985 年大定府境少数民族人口只占 25%左右,而回溯至嘉庆、道光年间,却要占到 40%左右。据此测算,嘉庆二十五年大定府的总人口(包括客民)约为 107.1 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7.6‰。

在贵州各府中,大定府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原有六个县级单位的基础上,20 世纪增设了金沙、赫雍、纳章三县。新设县之多,只有兴义府可与之相比。以 9‰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大定府人口约为 72.2 万。

2. 兴义府

兴义府僻居黔西南一隅,清代中期辖四州县,20 世纪增设三县,是贵州设县最多的区域之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与大定

府进行类比,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兴义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与大定府接近。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兴义府有 6.1 万户,30.9 万人口,而道光初年兴义府的客民就有 25633 户,约合 12.8 万人口,合计约为 43.7 万口。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兴义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7‰。

贞丰州的设立意味着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入籍,否则州令将无民可牧。

兴义府治为明代安龙所地。雍正五年(1727 年)设府后,并未在安龙设县,以至于府治所在地,仅为明代的一个千户所驻地。清政府设兴义府实用心良苦,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控制,在设置兴义府的同时,清政府将一大块原属广西管辖的土地划归兴义府辖,此即贞丰州于雍正五年划属兴义的由来。兴义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这一目标而设的。虽然 1913 年和 1940 年析贞丰地设册亨、望谟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但我估计,此两县人口的大部分在清代中期就已经置于清政府管辖之下了。户籍之外的少数民族人口不会太多。

咸丰《兴义府志》卷 25《赋役志·户口》“总论”称“通志所载原额仅户一万七千五百有奇,今考之户口册,户则七万九千五百有奇,口则二十八万一千九百有奇。二十倍于昔,生齿可谓日蕃矣。”然查分县户口,则知各县户数合计为 79149 户,302204 口,可知此分县数据应为嘉庆年间的数字,各县户口见表 6-13。

表 6-13 嘉庆二十五年兴义府分县户口

县名	户	口	族属	客民户
亲辖地	14215	46009	汉民	
兴义县	8949	40562	汉苗	7346
普安县	15590	65880	汉民	
安南县	17151	62949	汉苗	155
贞丰州	14347	63412		5432
册亨县	8897	23392	汉苗	526
合计	79149	302204		

资料来源:咸丰《兴义府志》卷 25《赋役志·户口》。

亲辖地中的户口数，“皆系汉民，苗民尚不在此数”。苗民的数量有多少呢？同书说：“近城二三十里，为安仁里，悉系屯民”，“四乡则苗民多于汉民”。在 1985 年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即兴义府亲辖地）的 31 万人口中，有 22.7 万系少数民族，占 73.2%。按此比例推测，亲辖地有人口 17.2 万，超过了安龙县 1953 年的 16 万人口。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另外，既然亲辖地之外的属县都已编查苗民，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亲辖地岂有不记苗民的？另一不记苗民的为普安县，1985 年普安县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县人口的 13.3%，比例很低，苗民漏记或已混于汉民之中。基于此，我以为《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兴义府的人口数是包括苗民的，只是漏记屯民而已。

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兴义府人口较高速的增长，并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致，而是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兴义府的这一情形与大定府相似。以 9‰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兴义府的人口总数约为 29.5 万。

兴义府是一个汉族移民大量迁入的地区。

3. 普安厅

《嘉庆一统志》载普安厅有 7.5 万口，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2‰。道光初年普安厅的客户仅有 824 户，合计约 4000 人。1985 年盘县（即清代的普安厅）少数民族人口仅占 10.9%。加上漏记了客民和少数民族人口，普安厅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10.7‰。如果不是存在户口隐漏的话，那么就是在从嘉庆末年至 1953 年的 133 年间，有大批的外来人口迁入的普安厅，构成以人口机械迁移为特征的人口高速增长。

如将普安厅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再至 1953 年的人口增长速度视作与大定府、兴义府相同，则嘉庆二十五年普安厅人口应为 14 万左右，乾隆四十一年约为 9.4 万。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将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贵州分府人口，列如表 6-14。

表 6-14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贵州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 万

府 厅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贵阳府	71.3	12.6	92.0	12.3	154.7	10.2
安顺府	60.6	10.7	78.8	10.5	133.4	8.8
平越州	28.7	5.1	37.3	5.0	63.4	4.2
都匀府	38.4	6.8	50.0	6.7	104.4	6.9
遵义府	81.8	14.4	106.4	14.2	229.3	15.0
仁怀厅	7.0	1.2	9.1	1.2	19.7	1.3
思南府	49.1	8.7	63.9	8.6	135.1	8.9
石阡府	12.2	2.2	15.9	2.1	38.4	2.5
松桃厅	9.2	1.6	12.0	1.6	27.0	1.8
铜仁府	10.1	1.8	13.1	1.8	25.4	1.7
思州府	10.6	1.9	12.6	1.7	17.0	1.1
镇远府	48.9	8.6	58.3	7.8	83.9	5.5
黎平府	28.2	5.0	33.6	4.5	50.1	3.3
大定府	72.2	12.7	107.1	14.3	293.8	19.3
兴义府	29.5	5.2	43.7	5.9	111.8	7.3
普安厅	9.4	1.7	14.0	1.9	36.3	2.4
合 计	567.2	100.0	747.8	100.1	1523.7	100.0

就表 6-14 中的数据看,清代贵州人口的变动趋势存在某种区域性特征。以贵阳府为中心的中部各府包括贵阳府、平越州、安顺府和都匀府。除都匀府外,其他三府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的人口比例均呈下降状,年平均增长率均为 4‰左右。由于对嘉庆二十五年都匀府入册的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把握不准,可能使得是年都匀府人口可能低估。也就是说,在嘉庆二十五年都匀府的在籍人口中,如果少数民族人口不足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话,都匀府的实际人口总数将更多。如此,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都匀府的人口比例将是下降的,年平均增长率还要低一些,也就更接近于以贵阳为中心的中部各府。

以遵义府为中心的北部各府包括思南府、石阡府、铜仁府、松桃厅和仁怀厅,其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呈上升状。嘉庆二十五年的仁怀厅是根据遵义府的人口变动情况拟定的,排除不计,其他五府、厅的人口变动趋势大体是相同的。以年平均增长率计,则在5‰~7‰的区间里,取其均值为6‰。与中部各府相比,嘉庆中期以后,北部各府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快一些。究其原因,可能是清代后期的战乱对中部地区稍有影响,而对北部则无影响。

黎平府、镇远府和思州府是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增长速度最低的地区,其人口比例在全省呈下降状。究其原因,在于人口的迁入较少,区域开发程度不高。相反,大定府和兴义府及普安厅人口比例上升最快,清代中期以后成为贵州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此与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有关。汉族移民大量入迁黔西地区,是这一区域矿业兴盛的结果。这一内容,可参见笔者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的有关研究,此不展开。

《清朝文献通考》卷19记载乾隆四十一年贵州总口数为500.3万,较本节推测要少66.9万。《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贵州口数为534.9万,《户部清册》载为535.2万,较本节估测要少200余万。漏载的人口主要为少数民族人口和外地迁入的移民。

第七章 清代中期四川分府人口

施坚雅对四川人口的研究堪称经典,但仍存在错误。

施坚雅《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中得出的教训》^①是目前关于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研究的力作。这部长篇论文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一个认真的整理和辨伪。本章的研究主要在施坚雅此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虽然没有可能阅读施氏所讨论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中的户口数据,但通过对地方志中所载若干年份的四川分县户口数据的比较分析,证明施氏在档案资料中发现的错误在地方志中同样存在。施氏认为,嘉庆时期四川的户口数据是合理的,户口调查是认真的。然而,本节的研究却证明嘉庆《四川通志》既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浮夸,也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低估,不加分析地使用嘉庆十七年户口数据仍是不妥当的。

第一节 已有的研究成果

一、施坚雅的研究

按照施坚雅的介绍,《四川通省民数册》记载了19世纪四川若干年份的人口统计数,“每年的人口报告包括每个行政单位的成套

^① 载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301页。

数据,以传统的等级顺序排列,首先是整个省,其次是大都市府(成都府),之后是两个大都市县,再之后是大都市府的其他县等等。在这些州之后又有直隶州、每个直隶州又有它管辖的县级单位,最后为直隶厅”^①。施坚雅介绍:“在人口注册登记簿中,没有包括懋功厅和四川省远西部非汉族地区的大部分。”当然,四川人口数据的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这套统计数据的差错是多方面的。

1. 统计中的差错

施坚雅所见《四川通省民数册》辗转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②,因为是以缩微胶卷的方式流传的,故不存在转抄中出错的可能。这套数据包括 1822 年、1828 年、1829 年、1845 年、1847 年、1848 年、1850 年、1852 年、1887 年共 9 个年份的年度数据,其中完整的有 6 个年份。1822 年和 1828 年分别有 2 个县级单位的数据遗失,1845 年有 4 个县级单位的数据遗失。每个行政单位每年的人口记录都有 14 个数字,包括在年初、年增加额、年减少额和年末 4 个项目下的户数、男性、女性和人口总数。施坚雅指出:“详细的资料表明这些数字意味着包括整个汉族人口,其中有成人,也有小孩,有本地人,也有移民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说明年度人口增加额,即新出生的加上移入居民,和年度人口减少额,即死亡的加上移出的。似乎是即使在县级单位,如果没有完全忽略少数民族的人口统计,起码也有严重的统计不足现象。”

施坚雅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了检核。当用计算机进行的加总工作和原数据不一致时,就意味着原数据出现了问题。从理论上讲,这套人口统计数据包括 1368 个县级单位的年度人口记录(152 个单位×9 个年份),但结果是有 9 个县的年度人口记录不是已经丢失就是残缺不全。总的说来,这些由县级衙门提供的报告中,有 8.2%未计入总数之中(在 1359 份报告中,有 112 份),尽管这些差错部分是比较小的,但还有许多把整个数字都搞颠倒了,如有的多

统计汇总中的
数据丢失现象非
常严重。

① 所谓“大都市府”指的是省会城市的附郭府,即省城所在的府。“大都市县”指的是省城所在府的附郭县。

② 在该档案馆公布的目录中,找不到这份资料,故无法对施氏的工作进行核对,只能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转述。

添一位数,例如 8702 被抄成 87020,还有的遗漏第一位数,例如 167337 被抄成 67337;甚至抄错了数字,如 764223 抄为 964223。尤其惊人的是 1852 年到 1887 年绵州的人口记录:1852 年年末的户口数为 46739,人口数为 288230,1887 年年初的户数为 68394,这是 35 年合理的增长,但是人口数却高达 6629533。在这个数字系列中,人口数和人口增加数(不是减少数),不知在什么地方置换了一位数字,结果增加了 10 倍。施坚雅评价道:“这里的差错不仅仅是因为粗心,也是由于没有头脑。”

施坚雅继续评论:“1822 年 17% 的差错率和 1887 年 20% 的差错率要比介于这两年间的任何一年的差错率都要高,但是,这里没有什么时间规律性。在本文考察的 9 个年份中,152 个县级单位中只有 45 个有准确的人口记录。另一方面,对同一县份往往有相当多的毫无差错的报告……府一级人口统计差错的分布说明某些府里衙门为了求得上下数据一致,并没有核对县级人口报告就令其呈报了。以 1887 年为例,雅州府和潼州府里县级报告的差错率是 50%,而 14 个呈交给大都市府的县级人口报告却没有一点差错。

另外,在 198 个府级人口记录中(22 个单位 \times 9 个年份),有 119 个是根据准确的县级人口记录编制的,而 79 个是依照有差错的人口数据统计的。府级人口数据出现的差错包括原来的县级报告中的差错未被发现而出现差错,无差错的县级人口在府级汇总中出现差错,加总过程中虽然改正了一些差错,但还有一些永久存在的差错或由此产生的新差错。施坚雅认为:“要求府级官吏所做的最复杂的工作是弄清 16 个 6 位数的准确加总,这几乎不是一件难倒人的工作。为什么有些官吏做工作那么粗心,而且在呈报人口报告以前又不认真地进行核对呢?人们可以猜测到,那时工作认真与否对他们或上司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核对得准确没有奖金报酬,出现差错也没有制裁。”此即是说,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弊端是造成这种差错的根源。

2. 与 20 世纪人口数的比较

施坚雅认为,分析清朝一系列人口数据合理性程度的第一步,

可以把 1887 年年末户数和人口总数同较为可靠的 20 世纪的数据进行比较。为此,施氏收集了 1940 年和 1982 年县级人口数据资料,形成一个跨世纪的资料集。1940 年的数据取之于被广泛引用的由官尉蓝(Guan Weilan)编写的数表,1982 年的数据取之于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实例。分析的结果表明,1887 年县级人口数据是不可靠的。如在 144 个县级单位中,从 1887 年至 1940 年人口减少的有 92 个县,人口过缓增长的有 9 个县。在 135 个县级单位中,从 1887 年至 1982 年,户数减少的有 50 个县,户数过缓增长的有 68 个县。施坚雅称:“官尉蓝的有关 1940 年的数据略有偏低,但无关紧要,我们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得知 1887 年大多数县级人口记录总数被不适当地夸大了,这是不合理的。”

施坚雅举例说,1887 年安县户数为 494898,口数为 971158,至 1982 年,户数减为 119190,口数减为 504230。户数减少了 76%,口数减少了 48%。相同的年份进行比较,芦山县的户数减少了 74%,口数减少了 72%,丹棱县户数减少了 72%,口数减少了 61%。

对于这一分析,我表示的唯一不解是,施坚雅为什么不采用 1953 年的人口数据代替 1940 年的人口数据?为什么不采用 1964 年的“户”的数据而要采用时间要晚得多的 1982 年的数据?1953 年人口数据的可靠性是举世公认的,只是这一年的“户”不是现代家庭户的意义,无法用于比较,而 1964 年“户”的数据已经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了。

3. 县级户口数据的编造

施坚雅指出,从 1822 年至 1887 年的年末,大多数县级单位的人口增长率高得惊人。在这 66 年中,有四分之三的县份人口都翻了一番。在同一时期,有 10 个县的人口数增加了 3 倍,有 6 个县增加了 4 倍。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内,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又呈稳步下降趋势。在人口性别比和户均人口两个指标上,也反映出某种人工编造数据的痕迹。

人口报告是怎样编制成的呢?施坚雅说:“人们首先会猜到官员仅仅是用上一年得出的人口比率和比例作为新的年份的起始

施坚雅用 1982 年的而不用 1953 年的数据与清代数据进行比较,是不妥当的。

数据,但是事实上,官员们从不干这种把戏。为了得出我们根据比率和比例所得出的模式,当时的官员们将不得不计算那些不同于前一年的那些数据的比例。这并非是通常官员的计算技术所能办到的。”在我看来,有关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计算不容易为一般官吏所掌握。技术高超的作假要满足人口学的规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后,施坚雅指出:“他们的作法非常简单,即往每一个年度增加额和年度减少额上添上一小笔数即可。在整个66年间,人口增加数在很小的范围里变化,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人口呈规律性上升的现象就这样产生了。这样每年都在人口增加额和减少额上加上一笔数字,结果出现了令人惊异的规律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数字不是1,就是2。”施坚雅的结论是:“1852年后,每个县级年度数据都是作为省级衙门编制工作的一部分而产生出来……19世纪中叶所有的数据汇编看来似乎都是集中在成都。”

4. 1812年和1822年的数据

施坚雅将1822年的数据与1882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结果发现,1822年的数据要比1887年的数合理得多。但是,在1822年的数据中,仍然有25个单位的人口数是不可置信的偏大。施氏于是对每年的数据进行了推算,发现很可能1808—1812年是一系列数据的起点。1822年25个单位的人口过高,问题出在其家庭规模过大。回溯至1812年,这些县份的家庭规模可以降低至合理标准。

施坚雅认为,有关1812年年初的人口推算总数和嘉庆《四川通志》中所载人口总数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此即意含着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数据是比较可靠的。虽然也存在政府官员对1812年数字的故意篡改,但有意篡改的目的是为了校正人口统计的异常现象,提高其合理性,与1822年以后对数据的篡改是完全不同的。

为此,施坚雅作出如下结论:“即使这套从1812年到20世纪的全部数据形成时并未参照不断发展着的人口统计进程,但

施坚雅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推论却是错误的。

这套数据的起点,不管是在 1812 年还是其前或其后,它本身都不是伪造的。一切都表明了嘉庆中期四川省的人口统计是相当认真的。”

二、王笛与刘铮云的研究

1822 年以后官员们对户口数据的任意编纂,是在成都的官衙门中完成的,并不涉及地方志中收集的县级户口数。严格地说,《四川通省民数册》与四川地方志不是一个系统。按照施坚雅的以上分析,嘉庆《四川通志》中的人口数据似乎是可靠的。王笛接受了施坚雅的这一观点,从而将嘉庆十七年的口数与清代末年的口数进行比较,得出从嘉庆十七年至宣统二年(1910 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7.75‰ 的结论^①。

对于嘉庆十七年的四川户口数,王笛的统计中漏记了 21.1 万户少数民族,合计口数约为 94 万。加上这批人口,这一时期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7.3‰。然而,本章的研究表明,嘉庆《四川通志》既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浮夸,也存在对一大批县级户口的低估,不加分析地使用嘉庆十七年户口数据仍是不妥当的。对于这一期间的四川人口增长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王笛认为宣统年间进行的户口调查是清代历史上最切实的一次户口调查,从而结束了相沿已久的保甲制度的登记方法。这次调查,户数与口数分年查报,但在四川,却是户与口同查。调查结果包括成都等 125 州县人口总数、各属船户口数,还有衙署、局所、学堂、庙宇、医院、报馆、善堂、会馆、教堂及外国旅居营业等项人数。王笛及本书第六卷作者侯杨方经过对数据的辨正后认为,实业部修正内务部统计的四川人口数最为合理。宣统二年,四川全省的人口总数为 4414 万,然性别比仍高达 131,若将性别比调整为 110,则全省人口总数应为 4550 万左右。从嘉庆十七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7.6‰;从这一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

宣统二年四川
人口数据是合
理的。

^①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年)》,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80 页。

刘铮云对乾隆数据既肯定又怀疑。

长率为 8.6‰^①。

台湾学者刘铮云最近对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以下简称《乾隆民数册》)进行了细致的研究^②。这份民数册与施坚雅所分析的九本民数册属于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本光绪二年的民数册藏于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尚未加利用。刘铮云的分析证实了以下几点。

其一,乾隆六十年分民数册中仅发现七个错误,与道光以后的民数册相较,这本民数册的错误是少多了。这说明乾隆六十年分民数册的造报过程是相当严谨的。

其二,从户均口数和人口性别比两项指标看,乾隆六十年的人口数据要比道光以后好得多。

其三,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及乾隆六十年至道光二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得与我们对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成长率的认识有相当的距离……人口(年平均)成长率超过百分之二的州县几乎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而且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州县,它的人口(年平均)成长率是在百分之三至三点九之间。而一般人相信,传统农业社会即使在最佳的环境下,自然人口的成长率每年不会超过百分之零点五,而在像十八世纪大量接受移民的四川,每年人口的增长率应该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其四,根据制度史的分析与讨论,可以认为在乾隆四十一年清高宗重申整顿保甲的决心以后,四川的官方人口数应与实际的人口数出入不大,而四十九年保甲门牌改为户口数登录后,官方对于地方人口数的掌握应更为精确。施坚雅虽然注意到仁宗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促使嘉庆年间保甲登录的情况得以改善,但是他显然忽

① 1953年的四川人口包括西康省人口。宣统年间四川人口统计是有分县数据作为支撑的。这套分县数据见于施居父主编《四川人口数字研究之新资料》,但笔者至今未查获此书。王笛在他的著作中虽未披露分县数据,但他却以府、州为单位作了归纳。只是20世纪存在若干个跨府设置的新县,王笛似乎未对1953年府级数据作过相应的调整。

② 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8年。

略了高宗对全国人口数的掌握更是积极,以致驰其想象建构一个模型,推翻何炳棣对乾隆朝人口数的看法。

关于施坚雅“驰其想象”建构人口数量模型以及城市人口模型的方法,笔者将详作讨论。刘铮云认为乾隆六十年的四川分县数据总的来说是可靠的,只是从增长率的角度看,尚有令人怀疑之处。

三、本章分析的思路与方法

施坚雅对于道光以后九本四川民数册的分析是成立的,只是他基于这一分析上的一些推论则是不成立的。比如说,他认为四川户口数据的编造是自嘉庆以后开始的,即嘉庆十七年《四川通志》所载户口数据是准确的,然而,他并没有对这一个系统的数据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分析。因此,对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数据进行分析构成本章的重点。

施坚雅对嘉庆《四川通志》的数据未作分析,本章研究以此为重点。

地方志系统的户口数据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完整的四川分县户口数见于嘉庆《四川通志》卷56《食货·户口》。该书列出分县户数和男、女性人口数及人口总数。笔者用计算机对男、女性人口进行加总,所得结果与原书中的分县总人口完全一致。这就是说,原书在加总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错误。然而,数据加总过程中的正确无误并不能说明数据的来源也是正确的。

按照施坚雅的分析,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可能是1812年,即嘉庆十七年的户口数。嘉庆《四川通志》刻于嘉庆二十一年,该书户口数早于嘉庆二十一年当是没有问题的。在叙述宁远府建昌镇的户口时,该志作者提及嘉庆十九年四川总督常明奏委建昌道曹六兴“编查夷地,清出汉民户口”并照例编入汉甲一事,知四川全省的户口数是嘉庆十九年前编定的。在四川地方志中,除了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数外,大量标有年号的户口数均为嘉庆十七年。我同意施坚雅的看法,将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户口的年份定在嘉庆十七年,即1812年前后。

然而,两个地方志系统的数据却是不一致的:绝大多数府志、县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前后的户口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为少,有的

数据相差不多,有的数据相差很多。这一现象蕴含着两种可能:一是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有误,一是府志、县志的记载有误。嘉庆《四川通志》出现误差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当所载嘉庆十七年的口数超过1953年的人口数时,我们可以断定嘉庆年间的数字是夸大的了。在未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嘉庆时期的人口总是要少于1953年的。府志、县志记载出现错误的明显标志是,与1953年人口数相比,嘉庆时期的口数过少,以至于从嘉庆年间至1953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太高。

“花户”、“粮户”
是理解四川户口
数据的关键。

关于四川文献中夸大户口数据一事在其他省并不多见,而在四川,却是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吏,尤其是川西地区部分地方官吏的痼疾。至于嘉庆年间川中及川东的部分地区户口数被严重低估,则涉及到对于“花户”和“粮户”的理解。具体分析详见下文。

刘铮云所讨论的《乾隆民数册》即姜涛所整理的清代户部《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如上文所述,根据分县数据,刘铮云已经怀疑乾隆六十年四川户口数可能低估。笔者下文将四川省分成川西区、川西边区、川中区和川东区,一一对各系统的户口数据加以讨论。另外,笔者还将从制度的层面,解释乾隆六十年数据的意义及寻求判读的方法,并对乾隆四十一年及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作出推测。

这一研究思路显然与笔者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中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笔者以前的研究是建立在施坚雅所称“嘉庆十七年四川户口数据是可靠的”这一结论之上的,而本章则要对这一结论本身进行再研究。

第二节 川中地区

川中地区包括重庆府、保宁府、顺庆府、潼川府、资州、泸州及叙永厅。嘉庆《四川通志》中有关川中地区各府及各县的户口记载,既比《嘉庆一统志》所载为低,又比各县志所载为高。兹分府分析如下。

一、川中南部

1. 重庆府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重庆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7-1。

表 7-1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重庆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重庆市					1772486	
巴 县	75743	218779	2.9	121	879378	17.9
江 津	47551	199115	4.2	105	971838	11.3
长 寿	38708	154023	4.0	108	543095	9.0
永 川	30148	107702	3.6	114	501044	11.0
荣 昌	33381	93598	2.8	109	431029	10.9
綦 江	35259	108215	3.1	110	570617	11.9
南 川	33538	149562	4.5	118	390196	6.8
铜 梁	61919	297264	4.8	118	512491	3.9
合 州	83154	187357	2.3	124	959326	11.7
涪 州	56821	260746	4.6	108	798710	8.0
大 足	33793	117561	3.5	107	504523	10.4
璧 山	38470	151022	3.9	109	387979	6.7
定 远	53688	168823	3.1	108	436946	6.8
江 北	37990	152039	4.0	105	719134	11.1
合 计	690163	2365806	3.4	112	10605941	10.7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 65《食货·户口》。

说明:1953 年合川县人口中包括合川市人口。嘉庆十七年铜梁县户口数中包括安居县,涪州包括武隆县。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户数为 95.8 万,口数为 301.8 万,远远超过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乾隆民数册》载重庆府户数为 34 万,丁口数为 133.3 万;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比较,户数为 49.2%,口数为 56.4%。县志系统的数据如果不是照抄嘉庆《四川通志》中数据的话,就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中记载的低许

四川户口数据
存在四个不同的
系统。

多。《嘉庆一统志》、《乾隆民数册》及县志与嘉庆《四川通志》不属于一个系统。

在表 7-1 中,嘉庆十七年綦江县户数为 35259,口数为 108215。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綦江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1.9‰。这一较高的增长速度表明嘉庆十七年的綦江口数不可能高估。然而,另外两个系统的数据较其更低。道光《綦江县志》卷 2《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三十一年至六十年只有 7880 户,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全县仅有 10004 户。《乾隆民数册》载 17347 户,63379 丁口。《綦江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数据更无法令人相信。

在表 7-1 中,嘉庆十七年江北厅有 37990 户,152039 口。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江北厅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1.1‰,这一增长速度也是相当高的,故嘉庆十七年口数不可能高估。其他两个系统的口数更低。道光《江北厅志》卷 3《食货·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仅有 20626 户,男妇 91714 口;还记乾隆六十年 17105 户,75744 口;《乾隆民数册》载 19486 户,84832 丁口,均无法令人相信。

据表 7-1,嘉庆十七年定远县有 53688 户,168823 口。至 1953 年,定远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8‰。民国《武胜志》(即清代定远县)卷 4《田赋·户口》记载嘉庆十六年只有 20156 户,31223 丁,乾隆六十年 11924 户,27897 丁;此处的“丁”已不是人口。《乾隆民数册》载 19836 户,83466 丁口,只及表 7-1 所列的半数左右。

同治《璧山县志》卷 2《食货·户口》载嘉庆十七年“实在承粮花户”共 24372 户,人丁 61492。《乾隆民数册》载 21781 户,71852 丁口,与县志属于同一系统。县志所载“人丁”非人口。以户数计,17 年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6‰。此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璧山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相近。

民国《涪州志》卷 6《田赋志》称“清花民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九户。康熙六年归并武隆花民四千五百一十五户,总计财二万零六百八十四户。因欲轻赋役而隐蔽,上下相欺,非其实也。自免丁税并入田赋,乾隆五十年户”至 58436,“丁”至 129786,户均 2.2 丁。

《乾隆民数册》载 52549 户, 154687 丁口, 户均 2.9 丁口。虽然数据有所不同, 但与《涪州志》所载属于一个系统。据表 7-1, 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涪州(含武隆县)户数为 56821, 口数为 260746, 户均 4.6 口, 性别比 108, 均符合标准。对比可知, 民国《涪州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丁”或“丁口”不是人口。按照同样户均口数, 若以《涪州志》所载为准, 乾隆五十年有 26.9 万口, 以《乾隆民数册》为准, 乾隆六十年则有 24.2 万口。两个年份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5‰ 和 7.6‰, 将清代中期至 1953 年涪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 7‰ 应该是合适的。据表 7-1, 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 涪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在涪州, 三个系统的数据大体是吻合的。

民国《涪州志》记载嘉庆十年户数为 45616, 丁为 166007, “户小于前者一万二千有奇, 丁多于前者三万有奇。盖不征丁则当经手曹吏随意增减之, 视为具文, 亦非其实也”。这一批评不能成立, 因为, 此处的涪州指的是不包括武隆县在内的涪州, 而以上分析的涪州户口数包括武隆县在内。乾隆年间武隆并于涪州, 并未单列。

如果将《乾隆民数册》的错误全部理解为是因户均口数过少而引起的错误, 也是不对的。事实上, 《乾隆民数册》所载重庆府户均丁口数已达 3.9 口, 而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重庆府户均口数只有 3.4 口。我怀疑在许多县, 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户口数都是不完全的, 即只记载了部分人口, 而未包括全体人口。

光绪二十年《永川县志》卷 4《赋役·户口》称:

勘乱初, 流亡甫集, 烟火尚稀, 其后休养生息, 日益繁滋。除编审复业外, 他省来附之家亦趾踵相接。康熙十年定各省客民携带妻子入川开垦者, 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 凡他省民人在川开荒居住者, 准其入籍考试, 是以永之民籍有老户、新户, 而乐普、太平、来苏各乡, 皆分为二焉。老户所隶之乡则老乐、老太、老来是也, 新户所隶之乡则新乐、新太、新来是也。惟安贤里编户加多, 仍合为一。各乡新与老错处, 一体耕输, 故通谓之“粮户”。其无粮者人同土著类, 不一

而足,故通谓之“花户”。花户未登县籍,粮户之册,又往往数家而一名,乃遵行保甲(雍正八年外省入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挨次编联,每团数十百家不等,则通谓之烟户。就烟户计之,斯丁口之多寡于是乎可核矣。

“老户”、“新户”、“土著”、“烟户”、“花户”和“粮户”。

在这一记载中,有“老户”、“新户”、“土著”和“烟户”的不同称呼。新户是清代迁入的移民,老户即是土著。不知老户与土著为何竟是并列的?粮户是承担赋役的民户,包括新户和老户,但不知为何不包括土著?不承担赋役者被称为“无粮者”,称为“花户”。大量的花户应属佃农阶层,他们是不登载于县籍的。粮户之册“往往数家而一名”,是一种与土地相关的业主名单。我相信最初的粮户是一家一名的,随着土地的分割细化,同一块土地上的业主越来越多,“数家而一名”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此类似于明代户口册的演变。只有保甲册中的烟户,才具备全部人口的意义。

同书记载,自嘉庆元年至二十一年,“旧额新添报部全数”,永川县 30148 户,男 57490 丁,妇 50212 口,共男妇 107702(并见省志),即与表 7-1 所列相同。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县志,“仅云户五千二百有奇,丁口十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前后多寡,户固悬殊,丁口亦复稍减,若止计粮户耶,则无从核其丁口,况户之奇零,尚不能知,丁口又何以独详。如是,是所载皆非实数也”。县志作者的判断相当有道理:户之不知,焉知丁口。“今由户房粮册查核粮户,又由兵房团册查核烟户,于是丁口之在烟户内者,亦遂朗若列眉云。”所列结果为:粮户 11860 户(花户从略),烟户 76888 户(粮户在内),其中男 191169 丁,妇 110548 口,共 301717 丁口。即 11860 户“粮户”包括在 76888 户“烟户”之中。《乾隆民数册》载 16117 户,68465 口,所载大都为“粮户”,或许全部为“粮户”。另外,从光绪十九年至 1953 年,永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8.5%。由于永川县户均口数太少,故此增长率显然过高。

依涪州例,以 7% 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人口数为 364.9 万;以 8%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 274.4 万。如果将嘉庆《四川通志》重庆府的户均口数调整为 5,嘉庆十七年有 345.1 万口。以此数为基点至嘉庆二

十五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也是7‰。由此看来,《乾隆民数册》所载户口确是实际户口数的半数左右,实际人口的另外一半,即非“粮户”为其忽略。

《乾隆民数册》未包括“粮户”,所载户口只有实际户口的一半。

2. 泸州和叙永厅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泸州和叙永厅分县户口数,见表7-2。

表7-2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泸州、叙永厅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泸州市					289043	
泸 州	46036	140616	3.1	105	859638	15.0
纳 溪	13501	60624	4.5	121	285841	11.1
合 江	36292	113232	3.1	111	503740	10.6
江 安	34403	88364	2.6	112	271085	8.0
九姓司	18238	43219	2.4	112	155511	9.1
合 计	148470	446055	3.0	111	2364858	11.9
叙 永	31568	96960	3.1	107	271252	7.3
永 宁	20608	66877	3.2	112	445070	13.5
合 计	52176	163837	3.1	109	716322	10.5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说明:1908年划泸州九姓乡置古宋县。

据表7-2,嘉庆十七年泸州和叙永的人口性别比是正常的,但户均口数偏低。若调整至户均5口,嘉庆十七年泸州约有74.2万口,叙永厅约26.1万口。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两地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3‰和7.2‰。

《嘉庆一统志》所载泸州户口数与表7-2相同,又载叙永厅有70156户,203088口,较表7-2所载要多得多。《乾隆民数册》载泸州有86024户,306625口,又载叙永厅有31699户,117212口,均较表7-2中记载的要少许多。

光绪《泸州九姓乡志》卷2《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三年造报新旧花户”864户,男妇3469丁口;嘉庆十五年“造报新旧承

“新旧承粮花户”和“未承粮花户”。

粮花户”共计 715 户，“未承粮花户”7390 户，共计男妇 25591。嘉庆十五年的“承粮花户”较乾隆二十三年数略有减少，但仍可视为同一系统。“未承粮花户”远远超过“承粮花户”也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之际兵燹之后，泸州人口大减，清代前期土著甚少，纳税户也少，固定下来的纳税单位更少。“承粮花户”历数十年时间只有些许变动，反映的是人丁税额的变动，与人口变动无关。“未承粮花户”如果是实际户数的话，是绝不可以与“承粮花户”相加的。这一相加，令人猜测该地的户口，都只具有某种“纳税”的意义，而不是实际的人口。

《乾隆民数册》载九姓司户数为 7596，丁口数为 17759，较《四川通志》所载要少得多。光绪《泸州九姓乡志》所载“承粮花户”和“未承粮花户”的户口总数分别只有表 7-2 中的 44.4% 和 59.2%。很明显，九姓司的“未承粮花户”也未包括全体户口。

仍据《泸州九姓乡志》，光绪四年，该地承粮花户 1021 户，未承粮 12268 户，男女共计 62609 丁口。夷民 1476 户，男妇 5941 丁口。似乎该地在按照人口的比例增加自己的纳税额。从嘉庆十五年至此，“承粮花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3%，“未承粮花户”为 7.5%。尽管“未承粮花户”未包括全体人口，但它自身的增长却可能反映全县人口的增长速度。

“统计承粮花户”。

嘉庆《纳溪县志》卷 4《田赋志·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三年花户 1271 户，男 2372，妇 2058，共 4430 丁口；乾隆二十四年至嘉庆十六年止“新增承粮花户”9247 户，男 24328，妇 23270，共 47598。“统计承粮花户”10518，男 26300，妇 25328，共 52028 丁口。“统计承粮花户”是乾隆二十三年花户和嘉庆十六年“新增承粮花户”之和。《乾隆民数册》载 8962 户，36489 丁口；嘉庆《四川通志》载 13501 户，60624 口。《乾隆民数册》中的户数与《纳溪县志》所载是吻合的，丁口数则偏低；《四川通志》所载户口数较《纳溪县志》所载明显为多。但无论如何，各系统所载纳溪县的户口都不像是真实的户口数，而是代表部分人口的“承粮花户”。因为人们有理由追问，纳溪县的“未承粮花户”到哪里去了？

光绪《泸州志》卷 5《赋役·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三年“造报新

旧承粮花户”共 9400 户,男 20360,女 20257。嘉庆十六年户 48780,男 75531,女 70911,共 146442 口,与《四川通志》所载基本相同,且记为“户”,而非“承粮花户”。光绪八年(1882 年)户数为 108345,口数为 520044,户均口数为 4.7。从嘉庆十六年至此,泸州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1.5‰,从光绪八年至 1953 年,泸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0.9‰。从这一系列数据的比较来看,嘉庆十六年泸州本州户的数据应是可靠的。按照户均 4.7 口的规模修正,嘉庆十七年有 22.9 万。

泸州人口的高增长与近代泸州城市的发展有关。1953 年,泸州城市人口多达 29 万。同一时期较大的府城人口不过 5 万~6 万。若排除泸州城市的发展不计,嘉庆十六年至 1953 年泸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9.8‰。

泸州人口的高增长与近代泸州城市的发展有关。

将嘉庆二十五年泸州本州的人口定为 25.4 万,而将其他地区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 7‰。嘉庆二十五年泸州和叙永厅人口分别为 73.5 万和 28.3 万,仍设乾隆四十一年泸州本州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地区,以年均增长 11‰计,乾隆四十一年泸州本州有人口 15.7 万;以 8‰计,泸州其他县有人口 33.9 万,合计人口为 49.6 万。乾隆四十一年叙永厅有人口 19.9 万。

二、川中北部

1. 顺庆府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顺庆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7-3。

表 7-3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顺庆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南充市					164744	
南 充	37553	217784	5.8	130	847180	10.9
西 充	22547	177410	7.9	114	427625	6.3
蓬 州	25212	194744	7.7	122	403141	5.2

续表

县名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营山	32400	177923	5.5	122	550916	8.0
仪陇	27906	163292	5.9	109	503712	8.0
广安	38653	222712	5.8	141	792518	9.0
岳池	34624	209145	6.0	120	677339	8.4
邻水	24983	175697	7.0	115	485881	7.2
合计	243878	1538707	6.3	122	4853056	8.2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嘉庆一统志》载顺庆府有312906户,2055493口,户均6.6口,均较表7-3所载多得多。在《乾隆民数册》中,顺庆府只有150948户,807266口^①,户口分别只有表7-3中的61.9%和52.5%。嘉庆十七年顺庆府在籍人口性别比失衡,若以110计,则有161.5万。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顺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8‰。

不变动的户口
数只能说明数据
有伪。

县志系统的户口数比表7-3中的数据要少得多。如岳池县,光绪《岳池县志》卷4《田赋志·户口》载嘉庆十七年户数为29302,口数为151820;又载同治十三年户数为72604,口数为365832。民国《南充县志》卷6《掌故志·户口》引“旧志”,记乾隆六十年查报15490户,人丁109025;嘉庆十七年花户25616,人丁154066丁,户数和口数均不及表7-3所载。光绪《西充县志》卷3《食货·户口》记嘉庆十七年报部17255户,127124丁,户数与口数均少于表7-3所载。另外,同治《营山县志》卷12《食货·户口》记“自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实在民数”26436户,共147742丁口。此户数与口数不仅少于表7-3所载,且是一个历四朝而不变的值。此类似下文将提及的酉阳州,已将户口数当作纳税单位来处

^① 在《乾隆民数册》中,渠县和大竹两县属顺庆府。按《清史稿·地理志》,应属绥定府。本文作绥定府处理,特此说明。

理了。道光《邻水县志》卷2《食货·户口》载嘉庆十六年户数为27741,口数为60930。与表7-3中数据相比,户数超过,口数则要少得多。兹不作讨论。

以7.8‰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嘉庆二十五年顺庆府有人口约为171.8万。以8‰的年均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121万。

2. 潼川府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潼川府分县户口数,见表7-4。

表7-4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潼川府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三台	40603	187888	4.6	117	1083831	12.5
射洪	30055	151766	5.0	114	643902	10.3
盐亭	28849	141996	4.9	107	452095	8.2
中江	33345	150178	4.5	110	946205	13.1
遂宁	39597	178357	4.5	109	821589	10.9
蓬溪	60373	187928	3.1	105	815750	10.5
安岳	40664	198175	4.9	117	881244	10.6
潼南					478927	
乐至	37884	153382	4.0	119	645238	10.2
合计	311370	1349670	4.3	112	6768781	11.5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潼川府有409100户,1801863口,远多于表7-4中的记载。《乾隆民数册》仅载170532户,705115口,户口数分别为表7-4所载54.8%和52.2%。在表7-4中,除蓬溪县的户均口数偏低外,其他各县都较正常。各县人口性别比也大体合理。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除盐亭县外,各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超过10‰。141年间全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11.5‰。如果将户均口数调整到5口,潼川府的人口年平均率降至10.5‰,也是相当快的。比较而言,《乾隆民数册》所载

显然是不合理的。

分县而论,三台县的人口增长超过了平均值。民国《三台县志》卷12《食货·户口》记嘉庆元年至十年,有49563户,184679口,也按户均4.6口计算,则有22.8万人口,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1.1‰。其他县的情况不明,我相信过高的增长率一定有其数据上的问题,而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对于这一区域来说,应该是合适的。

宣统二年潼川府有88.1万户,452.6万口,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4‰,与潼川府自1812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体吻合。

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嘉庆二十五年及乾隆四十一年潼川府的人口分别为180.2万和116.3万。嘉庆二十五年数正好与《嘉庆一统志》所载相符。也就是说,潼川府嘉庆二十五年数不用修正。

3. 资州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资州分县户口数,见表7-5。

表7-5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资州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资 州	28665	140232	4.9	110	829554	12.7
资 阳	24371	134996	5.5	111	682020	11.6
内 江	28119	133807	4.8	110	544204	12.1
内江市					190222	
仁 寿	38659	170684	4.4	110	1081543	13.2
井 研	21443	114510	5.3	110	275842	6.3
合 计	141257	694229	4.9	110	3603385	11.7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从户均口数和人口性别比两个指标考察,表7-5中的数据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尤其是性别比,几乎达到了完全相同的程度。

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考察,除了井研县外,其他各县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在 11‰~13‰。

《嘉庆一统志》载 186555 户,953783 口,远较表 7-5 中户口为多。《乾隆民数册》载 88936 户,374925 口,户口数分别为表 7-5 中的 63% 和 54%。州县志中的数据也远较表 7-5 中的为低。如光绪《资州直隶州志》卷 7《食货志·户口》所载嘉庆十七年左右的户口大多较《四川通志》所载为低。资州嘉庆十六年户数为 22611,口数为 96291;资阳县嘉庆十五年“承粮花户”19917 户,106039 丁;仁寿县嘉庆十七年 34954 户,154817 口;井研县嘉庆十六年 12767 户,61941 丁口。只有内江县例外,嘉庆十七年该县 35174 户,大大超出《四川通志》所载,其男妇共 177777 丁。

光绪《资州直隶州志》中资州等三县的在籍人口可能仅仅为“粮户”人口。有相当数量的“花户”并不为册籍所载。光绪《资州直隶州志》所载五县人口合计为 59.7 万,较嘉庆《四川通志》要少近 10 万人口。如果扣除内江县多出的人口,同一口径下的差额可能达到 14.3 万。

以光绪《资州直隶州志》中的内江县数据为准,至 1953 年,内江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0.1‰。这一数据可能意含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有低估的可能。否则,清代中期以来这一区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实在是太高了一点。

宣统二年,资州户数为 53.1 万,口数为 266.7 万。至 1953 年资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以 1953 年数据为基础,按照 10‰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进行回溯,嘉庆二十五年资州人口约为 95.9 万,竟与《嘉庆一统志》中数据几乎相同;乾隆四十一年人口约为 61.9 万。

资州的例子说明,就四川情况而言,《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并非完全错误,施坚雅认为比较准确的嘉庆《四川通志》数据也存在较严重的低估。

4. 保宁府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保宁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7-6。

《嘉庆一统志》
所载数据并非完
全错误。

表 7-6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保宁府分县户口

州 县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阆 中	28354	98473	3.5	99	532753	12.0
苍 溪	25619	70836	2.8	112	414670	12.6
南 部	29644	120331	4.1	105	789905	13.4
昭 化	20732	64221	3.1	110	156164	6.3
广 元	25681	92288	3.6	107	276450	10.6
南 江	19573	84688	4.3	108	292645	
旺 苍					208508	14.3
巴 州	18822	112320	6.0	121	666876	
通 江	21916	86296	3.9	118	382449	11.0
平 昌					424813	
剑 州	21696	74745	3.4	115	350734	
合 计	212037	804198	3.8	110	4495967	12.3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保宁府各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很高。由于新设了旺苍和平昌两县，嘉庆十七年的县级政区与 1953 年不能完全吻合。1942 年析广元、南江设旺苍，1946 年析通江和巴州设平昌，广元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就达到 10.6‰，通江等县高达 14.3‰。合而计之，141 年间保宁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2.3‰。这一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与户均口数偏低有关，如果将户均口数调整到 5，嘉庆十七年保宁府人口为 106 万，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0.3‰。

《嘉庆一统志》载 287552 户，962702 口，如以户均 5 口计，则有 143.8 万。户数和口数均较修正后的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数为多。《乾隆民数册》载 125816 户，534392 口，户均 4.2 口。户数和口数分别为表 7-6 中的 59.3% 和 66.5%，显然太低。

再来看看县志中的记载。民国《阆中县志》卷 10《户口志》记载的“嘉庆元年后”的户数及男女口数均与《四川通志》相同。又记

光绪末年户 78500,男 167800 丁,女 167000 口,合计 334800 口,户均 4.3 口。从嘉庆十七年至光绪末年,阆中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2.7‰,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相似。光绪末年的阆中县口数与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口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

民国《广元县志稿》卷9《食货志·户口》所载道光元年的户数和口数均与表 7-6 所记同。又记清末统计调查总数户 75562,丁口 326451,无户籍总数 3345 丁口,丁口合计 329796。然而,这一口数超过了 1953 年的广元县人口。假定旺苍县的二分之一人口来自广元的话,广元县原有人口不过 38 万左右。清末至 1953 年,广元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3‰。与周边地区相比,此增长率似乎太低。

道光《昭化县志》卷21《食货·户口》记道光二十五年有 12568 户,男 27021,女 18224,合计 45245 丁口。由于女性人口漏记较多,修正后的丁口总数约为 5 万。表 7-6 中嘉庆十七年昭化县口数已达 6.4 万,道光年间的记载实在是过低了。

民国《苍溪县志》卷9《户口》所载嘉庆元年的户口数与表 7-6 中的相同。又载光绪二十二年户口数,仅比嘉庆年间的户口数略多。此不可靠,弃而不用。光绪二十四年,苍溪县有 34789 户,男 69590 丁,女 57930 口,合计 127520 口。从嘉庆十七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9‰,再从光绪二十四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9.8‰,令人无法接受。

民国《巴中县志》第二编《人民志上·民籍》记载,嘉庆十一年“册户”18227,“承粮”12790,男妇 92557 丁口。“册户”比“承粮”要多,“承粮”不知是包括于“册户”之中还是单列?册户的数量接近嘉庆《四川通志》中的巴州户数。《巴中县志》又载道光元年编查 18822 户,承粮 13671,男妇 102320。此户数即表 7-6 中所载《四川通志》之数,男妇数则少了整整 1 万口,疑为转抄中的错误。

宣统二年保宁府户数为 69.6 万,人口为 390.4 万。从宣统二年至 1953 年,保宁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3.3‰。从上述

整数位上的数据错误,往往是转抄中的错误。

广元县的数据看,清代末年保宁府的户口数据可能存在浮夸。故此数据弃而不用。依照与之接壤的顺庆等府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将清代中期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10‰,嘉庆二十五年,则有人口119.7万。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77.3万。

如果将表7-6中保宁府的户均口数定为5,嘉庆十七年有106万。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3‰。

第三节 川东地区

川东地区包括酉阳州、绥定府、夔州府、太平厅、忠州和石碛厅。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酉阳州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酉阳州分县户口数,见表7-7。

表7-7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酉阳州分县户口

州 县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酉 阳	34218	121381	3.5	112	460324	9.5
秀 山	41018	93404	2.3	106	372688	9.9
黔 江	18013	70590	3.9	106	267789	9.5
彭 水	24295	82797	3.4	111	359380	10.5
合 计	117544	368172	3.1	109	1460181	9.8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嘉庆十七年酉阳州各县人口的性别比是大体合适的,户均口数却明显偏低,如果调整为户均5口,嘉庆十七年有58.8万,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5‰。宣统二年酉阳州户数为22.5万,口数为102.8万,至1953年为8.2‰。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酉阳州有159490户,461579

口,户均仅 2.9 口。按户均 5 口调整,口数近 80 万。《乾隆民数册》载 68688 户,257015 口。与表 7-7 比较,《嘉庆一统志》所载太多,《乾隆民数册》所载太少。

州、县文献的记载是怎样的呢?同治《酉阳州志》卷6《户口志》指出:“嘉庆十七年报部新旧承粮花户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二户,五万四千四百七十九丁”,户数与表 7-7 中的接近,口数相差甚多。在记载咸丰八年的“承粮花户”只有 11830 户,119510 丁口以后,县志作者指出:“案以上皆就承粮花户而言,昔之一户,今不无分作数户者。自咸丰十一年饬办团练,清厘户口,于是七里半中,户口皆可核算。今总计其数如左。”结果是,咸丰十一年全州合计 70666 户,327722 口。其中男 192856,女 134866,性别比高达 143。如果按表 7-7 中所揭 109 的性别比修正的话,口数略超过嘉庆十七年数。由此可见,咸丰十一年兴办团练时,主持者只是以恢复清代中期的户口为其目的。

咸丰十一年酉阳州兴办团练,主持者以恢复清代中期的户口为目的。

同治《酉阳州志》记载秀山县乾隆二十九年报部新旧承粮花户为 6138 户,7708 丁。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为 7715 户,9285 丁,嘉庆元年起至十六年续增花户 1037 户,1415 丁,嘉庆十七年“新旧实在承粮花户”共 8752 户,10700 丁。这一记载中的“户”和“丁”与乾隆二十九年的“户”、“丁”属于同一系统,是一个纳税单位,而非人口。此数较《四川通志》所载相差甚远,反过来可以说,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应为户口。黔江的情况也是如此。

按照 7‰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嘉庆二十五年有 62.2 万;以 7.5‰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酉阳州人口数约为 44.8 万。

二、绥定府和太平厅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绥定府和太平厅分县户口数,见表 7-8。

绥定府和太平厅的人口性别比是合理的,但户均口数过少。如果皆调整至户均 5 口,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两地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9‰ 和 8.2‰。

表 7-8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绥定府、太平厅分县户口

县 名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达 县	41565	143360	3.4	110	827281	12.5
东 乡	32365	105865	3.3	117	685656	13.3
新 宁	32557	87143	2.7	109	316134	9.2
渠 县	43772	236473	5.4	112	841628	9.0
大 竹	35145	190924	5.4	112	623487	8.4
合 计	185404	763765	4.1	112	3294186	10.4
太 平	26364	82196	3.1	112	278726	
城 口					137275	
合 计					416001	11.6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嘉庆一统志》载太平厅户口数与表 7-8 所记同，《乾隆民数册》载 13242 户，53183 口，户口分别只有表 7-8 中的 50.2% 和 64.7%。《嘉庆一统志》载绥定府有 287031 户，1124850 口，大大超出表 7-8 中的记载。《乾隆民数册》所载达州、渠县及大竹县合计即为嘉庆年间绥定府范围，共有 126650 户，524924 口，远较表 7-8 中的为少。

同治《新宁县志》卷 3《田赋·户口》称“雍正十一年，土著流寓”共 9965 户，“内有载粮户”3349，男妇大小共计 54684 口。“乾隆十八年”户 3937，“具载粮”，“口”19149，“具承粮男妇，流寓不在内”。《乾隆民数册》载新宁县户数为 18687 户，62372 口。与以前户口比较，似乎不是“承粮男妇”，而是全体人口。只是户均 3.3 口，太低。按户均 5 口调整，应有 93435 口。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7‰。

民国《达县志》卷 11《食货门·户口》载乾隆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承粮花户”分别为 11345 户和 11347 户，嘉庆十七年“承粮花户”37997 户，“花民”64910 户。此处的“户”当为“口”之误，如是，户均不足 2 口。又称“俗谓承粮者曰粮户，客佃者曰花户”，“承粮

某一年份某类人口的突然增加,表明这一年的这类人口与此前大不相同。

花户”包括“承粮”和“花户”,即全体人口的意思。嘉庆十七年“承粮花户”的突然增加,表明这一年的“承粮花户”已和乾隆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大不相同。《乾隆民数册》载 27992 户,115902 口,户均 4.1 口,和乾隆五十九年的“承粮花户”已经完全不同。只是户均口数差异太大,无法比较。仅就户数而言,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年平均增长 5.3‰,应属合理。

民国《渠县志》卷2《食货志·户口》中所载乾隆三十年报部花粮户 9325,人丁 9325 丁;乾隆四十年报部人丁 10069 丁;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年,报部人丁 19463;乾隆五十一年到至嘉庆二年,报人丁 23714;嘉庆三年至十二年,人丁 27625;嘉庆十七年承粮花户 16093,人丁 30396。仔细分析这一系列数据,乾隆三十年报部花粮户数即丁数,以后多报人丁数,大致在乾隆三十年基础上增加。《乾隆民数册》载 25009 户,113980 丁口,似乎是将《渠县志》中的“丁”转换成了“户”。

民国《大竹县志》卷 3 记载,乾隆六十年报部花户 5741,丁 18317。嘉庆十六年报部花户为 22795 户,102741 丁。《乾隆民数册》所载为 22820 户,101067 口,与县志中所载嘉庆十七年户丁数相当,分别只及表 7-8 中数据的 64.9%和 52.9%。县志中所载嘉庆十六年户丁即《乾隆民数册》中数,可能只是部分人口。《大竹县志》称光绪中“户口清册”记载“烟户”101685 户,男 192285 丁,女 132182 口,合计 324476 口。此处的“户”数与《乾隆民数册》及《大竹县志》所载口数或丁数相当,令人怀疑,故不采纳户数。如果光绪年间人口性别比调整为 110,则有人口 36.7 万。设“光绪中”为光绪十六年,采用表 7-8 中的数据,从嘉庆十七年至此,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4‰,再至 1953 年,仍为 8.4‰。由此可见,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数据是合理的,修正后的光绪中期口数也是合理的。

以年平均增长 8.4‰的速度推测,嘉庆二十五年绥定府人口为 108.3 万;若以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十七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0‰,则乾隆四十一年绥定府人口数为 69.9 万。

以年平均增长 8‰的速度推测,嘉庆二十五年太平厅有人口

约 14 万;以 9‰ 的增长速度计,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9.6 万。

三、夔州府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夔州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7-9。

表 7-9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夔州府分县户口

市 县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奉 节	24674	118854	4.8	105	515094	10.5
巫 山	23972	84563	3.5	119	337529 } 283004 }	7.6
大 宁	21712	68223	3.1	124		
大 昌	16952	60058	3.5	110		
云 阳	33951	102637	3.0	125	724860	14.0
万县市					99122 } 881020 }	14.0
万 县	34365	137878	4.0	104		
开 县	30678	89966	2.9	113	893419	16.4
合 计	186304	662179	3.6	113	3734048	12.3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嘉庆十七年夔州府的户均口数偏低,若调整至户均 5 口,则有 人口 93.2 万。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9.9‰。

《嘉庆一统志》载夔州 260651 户,861059 口,户均 4.6 口。户数与口数均大大超过表 7-9。《乾隆民数册》载 102806 户,429033 口,户均 4.2 口。《乾隆民数册》所载口数是嘉庆《四川通志》所载 64.8%,是《嘉庆一统志》所载 49.8%。相对而言,似乎《嘉庆一统志》的数据更为可靠。以户均 5 口计,嘉庆二十五年夔州府有 130.3 万口,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9‰。

道光《夔州府志》卷 8《户口》载嘉庆元年后的户口数与嘉庆《四川通志》相同。光绪《大宁志》卷 3《食货·户口》载光绪间全县共 23455 户,男妇 82617,较嘉庆年间大宁县户口相差不多,这一记载是错误的。以 8‰ 的年平均增长率从嘉庆二十五年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夔州有人口约 91.8 万。

光绪数据抄袭
嘉庆数据。

四、忠州和石碛厅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忠州、石碛厅分县户口数,见表 7-10。

表 7-10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忠州、石碛厅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忠州	34035	107600	3.2	109	591622	12.2
丰都	28898	96025	3.3	123	522805	12.1
垫江	31547	90180	2.9	106	507278	12.3
梁山	36131	115694	3.2	113	515892	10.7
合计	130611	409499	3.1	113	2137597	11.8
石碛	23016	93569	4.1	117	322101	8.8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嘉庆十七年忠州各县人口的性别比大体是正常的,然户均口数太低,按照户均 5 口进行调整,嘉庆十七年忠州人口约为 65.3 万,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8.4‰。

《嘉庆一统志》载忠州 172728 户,496648 口,户均 2.9 口。《乾隆民数册》载 81320 户,309320 口,户均 3.8 口。《乾隆民数册》数据太低,不可取,《嘉庆一统志》与嘉庆《四川通志》相比,不知孰是孰非。此依嘉庆《四川通志》数据进行估算。

光绪《垫江县志》卷 3、道光《石碛厅新志》卷 2 对于嘉庆十六年各自的户口记载,都要比嘉庆《四川通志》为低。只有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卷 7《财赋志·户口》所记嘉庆十六年忠州户口数与嘉庆《四川通志》的相比,户数略低而口数略高。

将嘉庆十七年石碛厅的户均口数也调整到 5,则有人口 10.2 万,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8.2‰,与忠州的情况相似。

以 8.4‰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从 1953 年回溯,嘉庆二十五年忠州人口约为 69.8 万;以 9‰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乾隆四十一年忠州人口为 47.3 万。同样,以 8.2‰ 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嘉庆二

十五年石砭厅有人口 10.8 万;以 8.5‰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计,乾隆四十一年石砭厅有人口 7.5 万。

第四节 川西地区

一、川西北部

1. 绵州

嘉庆十七年绵州分县户口数见表 7-11。

表 7-11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绵州分县户口

县 名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绵 州	36790	199675	5.4	108	449858	5.8
德 阳	25066	115561	4.6	109	242711	5.3
安 县	26846	127311	4.7	113	253656	4.9
绵 竹	31085	148031	4.8	138	322091	5.5
梓 潼	18518	81006	4.4	144	225877	7.3
罗 江	18402	100227	5.4	113	178686	4.1
合 计	156707	771811	4.9	118	1672879	5.5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嘉庆十七年绵州各县的户均口数围绕 5 波动,符合正常的家庭人口标准;性别比除梓潼县外,其余多在 110 左右,基本正常。从 1812 年至 1953 年,绵州多数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都在 5‰ 左右,梓潼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7.3‰,是因为嘉庆十七年的性别比高达 144 所致,该县存在女口漏载。按照 110 的性别比进行修正,嘉庆十七年梓潼县有 91315 口,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4‰。罗江县于 1959 年并于绵阳、德阳、安岳三县。并县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人口较少,或许是因为经济发展迟滞。所以,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罗江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4.1‰,居全府各县之末。

《嘉庆一统志》载绵州户数为 209608,口数为 1103625。如此记载为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绵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3.1‰。与其他府、州相比,增长速度太低,令人不敢相信。《乾隆民数册》载 96239 户,347108 口。因未包括罗江县,户口数不完整。同治《绵州志》卷 8 记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曾移绵州州治并罗江县,乾隆三十六年绵州本州总计 27916 户,129700 丁口。嘉庆七年(1802 年)“奉准州复旧治,仍设罗江县。内除拨归罗江县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七户,五万四千三百九十三丁口由罗江县造报外,本州实在存留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九户,七万五千三百七丁口”。嘉庆七年所拨分的户口数实际上是乾隆三十六年的。据此记载,乾隆三十六年绵州本州的户数应该为 16249 户,75307 丁口,户均丁口数与罗江县相同,均为 4.7。从乾隆三十六年至 1953 年,罗江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6‰。以此速度推测,乾隆六十年罗江县丁口数应为 63695。是年绵州全州口数应为 41.1 万。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绵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9‰。

据同治《绵州志》卷 8,嘉庆十年,绵州本州有 16309 户,77078 丁口;嘉庆十六年计 20200 户,108184 丁口;道光元年户 20720 户,123044 丁口;道光十年户数为 21160,丁口数不变;道光二十年,户数为 22996,丁口数高达 166532,已经接近 1953 年的人口数。很明显,嘉庆十年的绵州本州户口数还只是在乾隆三十六年数据的基础上略做加法,嘉庆十六年数可能是真实的,道光年间数则为明显的编造。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嘉庆十六年,户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5.5‰和 9.1‰。口数增长速度超过户数,是因嘉庆十六年户均口数大大超过乾隆三十六年所致。

罗江县数据的编造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的。同治《绵州志》在“罗江县”条下记载“嘉庆七年报部编审承粮花户人丁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八丁”,这里的“承粮花户人丁”仅仅是“丁口”中的一部分。到同治四年,人丁变成了“户”,即是年户数“增至”13744 户,男 60198,女 46239,合计 106437 口,户数与口数完全不成比例。

嘉庆《安县志》卷 6《户口》记载,雍正六年有 3274 户,雍正七

与 1953 年的数据作比较,容易发现文献中记载的问题。

罗江县数据的编造方式。

陈文举是某种赋税的代表或象征。

年至乾隆十七年增 146 户。嘉庆十七年户 20353,“以上连前报部承粮花户陈文举”共 23773 户,共男妇人丁 90057 丁口。“前报部承粮花户陈文举”代表的是雍正六年至乾隆十七年的“承粮花户”数,即本卷第二章讨论的“丁”数,代表的是纳税单位,而非实际人口。以陈文举作为此类“户”的代表,至嘉庆十七年仍保持不变,颇类似明代黄册所载数百年不变的户主。嘉庆十七年编定的户数怎么可以和以前的纳税单位相加?从这点看,绵州县志系统中的数据不是人口统计。

正因为如此,同治《绵州志》所载数据均偏低,故弃而不用。《乾隆民数册》所载数据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比较而言,《乾隆民数册》中数据与同治《绵州志》大体属同一体系,故不采纳。依嘉庆《四川通志》的户口数,以 5.5‰ 年平均增长率推测,嘉庆二十五年,绵州有人口 80.6 万。乾隆四十一年有 63.3 万。

嘉庆十七年数据与乾隆六十年数据之间存在某种不可解释的倍数关系。

修正后的绵州乾隆六十年口数为嘉庆十七年口数的 52.3%,即嘉庆十七年数为乾隆六十年数的一倍稍少,这一规律为许多地方的数据所证实,其中蕴含的道理,尚不清楚。

2. 成都府

成都府是四川省的首府,其各县户口数详见表 7-12。

表 7-12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成都府分县户口

州 县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成 都	69597	386397	5.6	126	856713	5.7
华 阳	85974	389656	4.5	128	415511	0.5
双 流	66989	181797	2.7	127	175272	-0.3
温 江	74872	270998	3.6	132	194193	-2.4
新 繁	76572	222658	2.9	123	129986	-3.8
金 堂	60919	222808	3.7	132	636808	7.5
新 都	46236	177458	3.8	131	131284	-2.1
郫 县	94236	236659	2.5	107	225506	-0.3
崇 宁	62486	183570	2.9	119	100020	-4.3

续表

州 县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灌 县	108571	251266	2.3	115	341529	2.2
彭 县	70657	230418	3.3	120	401234	3.9
简 州	73921	256536	3.5	116	1123799	10.5
崇 庆	81435	228565	2.8	117	429454	4.5
新 津	73010	193581	2.7	122	172792	-0.8
汉 州	49659	229485	4.6	109	323656	2.4
什 邛	72209	174652	2.4	142	244262	2.4
合 计	1167343	3836504	3.3	122	5902019	3.1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说明：成都县于1952年撤销，并入成都市及温江、新都、郫县、新繁等县。1953年“成都县”条下实为成都市人口。1962年华阳县裁入双流县。

仔细考察表7-12中的各项数据，有几个问题可供讨论。

其一，除了成都、华阳和汉州（今广汉县）三地外，其他各县的户均口数只有2.3~3.8，大大低于正常的家庭规模。

其二，如果将清代正常人口性别比定为110的话，只有郫县和汉州是合格的。其他各县都存在规模不等的对女口的漏记。因全府人口性别比为122，所以，女口漏记的幅度不算大。

其三，在《嘉庆一统志》中，嘉庆二十五年成都府有1706958户，5484272口，户均3.2口，与表7-12中户均3.3口接近。这或许表明嘉庆《四川通志》和《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出自同一个系统。然而，《嘉庆一统志》中成都府的口数大大多于嘉庆《四川通志》，所以此说又不能成立。依据《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成都府的人口几无增长，这是不可能的。

其四，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的141年间，成都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1‰。这一增长速度是相当低的，细究各县数据，其中温江、新繁、新都、郫县、双流、崇宁、新津六县人口不增反减，有悖于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前四县因成都县撤消引起了政区调

与1953年比较，嘉庆十七年成都府属县数据明显高估。

整,人口已有额外的增加,人口不增反减,更无道理。另外,清代中叶至 1953 年,四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自然灾害或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人口如此变动是不可能的。

有一批县志记载了清代若干年份的户口数。通过对这批户口数的分析,可以对嘉庆中期前后成都府的人口变动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同治《成都县志》卷2《食货志·户口》称:“康熙六年由湖北拨防来川时,满洲蒙古共二千余户,口五千六百余名,同治十年报部册档,有四千五百余户,一万三千七百余名。”康熙六年的户均口数为 2.8,同治十年为 3,远远低于嘉庆年间成都县的户均口数,但与成都府的户均口数大体相当。如果说康熙六年来川的满蒙八旗中以青壮年士兵为多,家庭人口少,同治十年,八旗户均口数之低,与对八旗子弟的职业限制有关。从康熙六年(1667 年)至同治十年(1871 年),这批满蒙八旗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4‰。

民国《双流县志》卷2《赋税·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户数为 30518,口数为 94385,户均 3.1 口。嘉庆十七年户数为 31730,口数为 97254,户均 3.1 口。对照表 7-12,县志记载的嘉庆十七年数据仅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的 53%。

这一数值的多次出现使我产生联想,嘉庆《四川通志》好像是在《乾隆民数册》或县志系统资料记载的基础上编造的。如前所述,县志系统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大批“承粮花户”之外的人口可能为其忽略。“承粮花户”与“非承粮花户”的比例可能大体相当,嘉庆《四川通志》的编者据此而编造嘉庆十七年的口数。然而,嘉庆《四川通志》的编者却不曾料想,在成都府的一些县份,县志系统乃至《乾隆民数册》系统所载是完整的人口数。在成都府,我们就不曾见到川中、川东地区的“承粮花户”之记载。当《四川通志》的编者将正确的口数增加一倍左右的数额之后,口数就大得太离谱了,以至于超过 1953 年人口数。依《双流县志》数,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2‰,大致合理。然而,《乾隆民数册》载双流县户数为 23103,丁口为 75725,户均 3.3 丁口。此数据

嘉庆《四川通志》是在县志或《乾隆民数册》所载数据基础上编造的。

较民国《双流县志》所载要少许多。依此数,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3‰,也不算离谱。唯有嘉庆《四川通志》所载超过 1953 年人口,则是明显不合理的。

民国《新都县志》第二编《政纪·户籍》称嘉庆十七年有户 21378,有人丁 83685,户均 3.9 口,仅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数 47%。依嘉庆《四川通志》,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新都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若以民国《新都县志》所载为基准,这一时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2‰。这一增长速度虽然偏低,但比嘉庆《四川通志》却要可靠得多。民国《新都县志》还记载乾隆六十年有户 4571,有人丁 54251,户数与人丁数已无法匹配。在《乾隆民数册》中,新都县户数为 19038,口数为 76047;户均 4 口,性别比为 107。两相比较,《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更为合理: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新都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6‰。扣除政区调整的因素,人口增长速度还应低一些。民国《新都县志》的记载远不如《乾隆民数册》可靠和准确。在新都县的县志系统中,对于户口数的夸大也是从嘉庆年间开始的。

民国《什邡县志》卷 3《食货·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花户 49259 户,148362 口,户均 3 口。在嘉庆《四川通志》中,嘉庆十七年什邡县口数为 174652,户均仅 2.4 口,更难令人相信。在《乾隆民数册》中,什邡县户数为 26777,口数只有 80553,户均 3 口。口数仅占《四川通志》口数的 46.1%。按照我们对嘉庆《四川通志》编造数据规律的认识,《四川通志》编者所编嘉庆十七年口数是根据《乾隆民数册》数据编制的。依《乾隆民数册》中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这一数据是合理的,可以接受。

民国《新繁县志》卷 3《赋役·户口》记载嘉庆十七年有 11751 户,33413 口,仅及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口数的 15%。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依《四川通志》所载,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8‰,而依《新繁县志》,则达 9.7‰。1953 年的新繁县人口中,已包括部分成都县人口,政区的调整导致其人口增长率偏高。《乾隆民数册》载新繁户数为 26271,口数为 91237,户均 3.5 口。从乾隆六十

《四川通志》所
载新繁县户口不
合情理。

年至1953年,新繁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新繁县志》的数据偏低,《乾隆民数册》的数据偏高。

民国《彭县志》卷3《户口数》中记载嘉庆十七年有41034户,147633口,户均3.6口,口数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230418口的64%。如果《四川通志》所载户均口数也是3.6的话,民国《彭县志》所载将是其口数的58%。《乾隆民数册》记载彭县户数为28305,丁口数为107708,户均3.8口,与民国《彭县志》所载属一个系列,但户口数更低,似有低估。依《彭县志》的记载,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彭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1‰;而依《乾隆民数册》,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则为8.4‰。

嘉庆《汉州志》卷6《户口》记载嘉庆元年至嘉庆十六年,共有23706户,109592口。户均4.6口,户数和口数分别为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数的47.7%和47.8%。这一记载格式不是用一个时点而是用一个时段的方式表达的,我将此视作嘉庆十六年数据。查《乾隆民数册》载汉州户数为20237,丁口数为91210,与嘉庆《汉州志》的数据属于同一系统。根据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汉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而据嘉庆《汉州志》所载,则为7.7‰。嘉庆《汉州志》及《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显然要比《四川通志》所载为合理。

民国《崇宁县志》卷3《户口》记载的方式与嘉庆《汉州志》相同,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六年,崇宁户数有26916,人丁有93349,户均3.5丁,其丁数仅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崇宁县男性人口数相当。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崇宁县口数多达18.4万,远远超过1953年该县的10万人口,殊不合理。如果民国《崇宁县志》所记为真,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人口几无增长。虽然如此,却比《四川通志》系统中的人口负增长要合理一些。《乾隆民数册》载崇宁县23509户,81354丁口,户均3.5口,与民国《崇宁县志》所载同属一个系统。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崇宁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1‰,而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1958年崇宁县裁入郫县、彭县和灌县,或许与其人口较少,人口增长不快有关。

《四川通志》中的崇宁县口数大大超过1953年人口。

道光《新津县志》卷16《户口》记载“自乾隆元年至嘉庆十六年”，“添户”若干，“实载”男妇共 165734 丁口。以后从嘉庆十七年至二十年，从道光元年至七年，从道光八年到十七年，“实载”的男女口数每个年段只有微小的增加，最后一个年段中达 171155，接近 1953 年口数。可见，县志系统中的浮夸在嘉庆十六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嘉庆《四川通志》的浮夸更为严重，嘉庆十七年即达 19 万余人，超过 1953 年人口。只有《乾隆民数册》的数据是合理的，乾隆六十年新津县 25509 户，89129 丁口，户均 3.5 丁口；至 1953 年，新津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2‰。

《新津县志》中的浮夸从嘉庆十六年以前就开始了。

《四川通志》记载嘉庆十七年温江县人口已达 27 万余，而 1953 年仅 19 万余，尽管这还是加有部分成都县在内的人口数量。民国《温江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户 3 万余，口 14 万余。《四川通志》或许就是根据这一数据进行编造的。《乾隆民数册》载 29009 户，107613 丁口，户均 3.7 丁口。依此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温江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7‰。《乾隆民数册》的数据显然要比其他各种数据好得多。

嘉庆《四川通志》所载金堂县户口数可能是唯一正确的一组数据。嘉庆十七年金堂县户数为 60919，口数为 222808，户均 3.7 口，性别比 132，偏高。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5‰。嘉庆《金堂县志》卷8《民赋·户口》所载嘉庆十五年户口比嘉庆《四川通志》要少得多：户仅 56232 户，男女共 147539 口，户均只有 2.6 口。此记载显然属于另外一个数据体系。《乾隆民数册》记载金堂县户数为 26626，丁口数为 90372，远较前两套数据为低，更不可信。

从 1953 年至 1962 年再至 1982 年，金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7.3‰和 5.4‰，合计则为 6‰。同时期，由于各种社会或自然的因素，同一地区其他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忽高忽低，成都府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9‰和 20‰，合计则为 15.9‰，唯有金堂一县保持稳定的匀速增长。从这一数据看，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应当是正确的。

在上述十县中，除金堂以外，其余九县户口数据皆以《乾隆民

数册》为相对准确。县志系统中有双流、彭县、汉州、崇宁四县的数据大体正确。而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只有金堂一县的数据是正确的。

在《乾隆民数册》系统中,双流等九县乾隆六十年口数合计为80.1万,1953年为187.3万,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4‰。然而,《乾隆民数册》载成都府总丁口数为162.4万,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4‰。仔细对照表7-12中的数据,在成都府16个州县中,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双流等九县在籍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最低的一批。也就是说,在籍人口高增长的简州、金堂、崇庆等县并未包括其中。以简州为例,当嘉庆《四川通志》在《乾隆民数册》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口数以后,至1953年其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10.5‰,《乾隆民数册》的丁口低估是相当惊人的。金堂、崇庆两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成都市与华阳县在籍人口的增长速度一高一低,正好相互抵消。

从这一分析看,双流等九县丁口的增长速度可以代表成都府的一般水平。作为佐证,在县志系统中,双流等四县嘉庆十七年口数为44.8万,1953年为100万,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7‰。

简州地处成都府之东南部,地域广阔,与成都城附近区域相比,简州人口发展的空间可能要大一些,人口增长的速度可能要高一些。崇庆州的情况亦大致如是。以5.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成都府简州、崇庆及金堂三州县以外的人口数为179万;按8‰的年平均增长率对简州、崇庆两州人口回溯,嘉庆二十五年两州人口约为53.8万;以7.5‰的年平均速度对金堂县人口进行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有23.7万,是年成都府合计人口约256.5万。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外地人口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已经结束,人口的增长速度已接近于人口自然增殖的速度。在移民迁入后不久,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仍会是较快的。参照周边几个府的情况,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设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以此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成都府有人口180.6万。

嘉庆《四川通志》载嘉庆十七年成都府人口总数为 383.7 万,若统一到嘉庆二十五年,则较上述修正数多出约 150 万。《乾隆民数册》载乾隆六十年口数为 162.4 万,如以同样的增长率回溯到乾隆四十一年,约为 139.6 万,与上述修正数相差约 40 万。这是由于《乾隆民数册》对成都府若干县丁口数的低估所引起的。

3. 邛州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邛州分县户口数,见表 7-13。

表 7-13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邛州分县户口

州 县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邛 州	34796	154502	4.4	111	416060	7.1
大 邑	28097	174583	6.2	128	311707	4.1
蒲 江	25316	140751	5.6	108	133752	-0.4
合 计	88209	469836	5.3	116	861519	4.3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尽管嘉庆十七年邛州各县的户均口数和性别比大体是正常的,但也不能说明这一组数据一定是合理的。至少对于蒲江县而言,其嘉庆十七年的口数超过了 1953 年,肯定是错误的。

根据嘉庆《四川通志》,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邛州本州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1‰。嘉庆《邛州志》卷 17《户口》有分县户口的记载。在邛州本州,乾隆六十年有 135788 口,嘉庆十年有 144363 口,10 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1‰。嘉庆《四川通志》所载邛州户口与嘉庆《邛州志》所载大体属同一系列。《乾隆民数册》载邛州本州户数为 26898,口数为 100745,户均仅 3.7 口,较嘉庆《四川通志》及嘉庆《邛州志》所载要少得多,要不合理得多。

据嘉庆《邛州志》卷 17,嘉庆十七年大邑县的户数为 65901,男性为 58359,女性为 109216,合计口数为 167575。无论是户均口数,还是性别比,都不正常,虽然口数与嘉庆《四川通志》相近,但仍无法用于分析。《乾隆民数册》载大邑县有 19811 户,102787 口。

户均口数及性别比正常,也不能证明数据的真实性。人口增长速度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

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大邑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依此速度,嘉庆十七年大邑县有 115728 口。

在嘉庆《四川通志》中,嘉庆十七年蒲江县的人口多于 1953 年,而在嘉庆《邛州志》中,嘉庆十七年蒲江县户数为 19271,人丁 93705 丁口。依此为根据,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蒲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5‰。如依《乾隆民数册》,乾隆六十年蒲江县有 16119 户,75090 口,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7‰,似乎较《邛州志》所载更为合理。

总之,在《乾隆民数册》中,大邑及蒲江两县的数据是相对合理的,邛州本州的口数偏低,用《邛州志》中所载邛州本州的口数代替之,乾隆六十年邛州有 313665 口,嘉庆十七年三县合计有 363935 口,17 年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8‰。以此速度测算,乾隆四十一年邛州人口为 26.6 万,嘉庆二十五年为 39 万。

4. 龙安府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龙安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7-14。

表 7-14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龙安府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平武	22077	167662	7.6	123	224735	2.1
江油	27984	182091	6.5	181	300079	3.5
石泉	21312	113120	5.3	114	78170	-2.6
彰明	20384	116341	5.7	111	126212	0.6
合计	91757	579214	6.3	133	651016	0.8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说明:1953 年平武县人口中包括青川县人口。

据表 7-14,嘉庆十七年龙安府在籍人口性别比高达 133,扣除江油县,则与正常值差不多。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龙安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0.8‰,其中石泉县人口呈负增长。

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平武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1‰。

嘉庆十七年平武县性别比为 123, 似乎过高, 女口有所低估, 调整后的增长速度还要低一些。然而,《乾隆民数册》载平武县户数为 13228, 口数为 86223, 口数仅为嘉庆十七年的 51.4%。

同期江油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5%, 但该县性别比高达 181, 如果将该县女性人口加以调整, 全县人口至少达 22 万, 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将降至 2.2%, 与平武县接近。《乾隆民数册》载 12983 户, 78089 口, 口数仅为嘉庆十七年的 42.9%。

道光《龙安府志》卷3《食货志·户口》载有“嘉庆元年后”的分县户口数。其中平武、石泉和彰明三县皆与嘉庆《四川通志》同。江油县有 34964 户, 其中男姓 117617, 女性 101694, 合计 219311 口。这一组数据其实与嘉庆《四川通志》同属一个系统, 只不过女口数更为合理, 性别比降至 116, 户均口数也降至 6.2。就是女性口数合理化的同时, 总口数却变得更不合理了。

道光《江油县志》卷9《户口志》所载嘉庆元年至嘉庆十六年户口数与道光《龙安府志》相同。所载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二十年户数为 50695, 共 498114 丁口, 道光二十一至光绪二十九年, 丁口数竟高达 911924, 远远超过 1953 年龙安府全府的总人口。如此编造已无任何道理可言。

数据编造的痕迹过于明显。

在地方志中, 江油县的户口编造是从乾隆以后开始的。据光绪《江油县志》卷 9 称“乾隆元年起至六十年止, 历年递增新旧花户”13817, 其中男 40109, 妇 36616, 合计共 76725 口, 与《乾隆民数册》属于同一系列。以此口数为基数, 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 江油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7%。

道光《石泉县志》卷3《食货·户口》称“自雍正六年奉文清丈至乾隆六十年征输止, 新旧报部承粮花户汉番民”共 7483 户, 男妇共 43176; 新收 546 户, 男妇共 1345 丁口, 实在男妇共 44521 丁口。《乾隆民数册》载 11253 户, 56621 口, 与《石泉县志》所载属一个系统, 但数量相差较多。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 石泉县口数是增长的, 年平均增长率为 2% 或 3.8%。至嘉庆十七年“报部实在承粮花户汉民”19530 户, 82786 丁, 户均 4.2 口。此外, 还有河

东、河西番民 1479 户,约 6000 口,合计约 8.8 万口,超过了 1953 年人口。道光《石泉县志》对石泉县的人口记载,是从乾隆以后夸大的。

同治《彰明志》卷 8《户口志》所载资料要好得多。详见表 7-15。

表 7-15 清代彰明县户口变动

年 代	户	口	户均口数	年平均增长率(‰)	
				户	口
乾隆四十九年	8857	46425	5.2		
乾隆六十年	10016	49775	5.0	11.2	6.4
嘉庆十七年	11081	69035	6.2	6.0	19.4
同治八年	15102	77209	5.1	5.4	1.9

资料来源:同治《彰明志》卷 8《户口志》。

县志中记载的嘉庆十七年的彰明县户口要比省志少得多,与《乾隆民数册》中所载 10342 户,59520 口属于同一个系统。

就龙安府而论,《乾隆民数册》中数据是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口数的 48.4%。这进一步证明嘉庆《四川通志》的编者有可能将原有的在册数据当作了部分人口,因为在川中和川东地区,县志系统和《乾隆民数册》所载确实都是部分人口。

合而计之,乾隆六十年龙安府共有 47806 户,280453 丁口,户均 5.9 口。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3‰。据表 7-15,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彰明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以此速度推测,乾隆四十一年龙安府人口约 25.1 万,嘉庆二十五年有 32.6 万。

5. 眉州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眉州各县户口数的变动可见表 7-16。

嘉庆十七年眉州各县户均口数为 5.2,性别比为 111。然而,光凭这两个指标,并不能完全说明这组数据是可靠的。从与 1953 年户口数的比较中可知,各县人口变动的趋势之间的差距甚大,眉州高达 7‰,青神几乎为 0,丹棱为 -2.2‰,几无道理可言。

《四川通志》编造眉州户口数据。

表 7-16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眉州分县户口

州 县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眉 州	31263	164827	5.3	111	440138	7.0
丹 棱	25469	130575	5.1	111	95231	-2.2
彭 山	22936	126327	5.5	111	188572	2.9
青 神	26836	129425	4.8	109	131307	0
合 计	106504	551154	5.2	111	855248	3.1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民国《丹棱县志》称嘉庆四年有 4780 户,43551 丁口。以此为基点,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1‰,而不是负增长。《乾隆民数册》中的记载更为合理,户数为 15081,口数为 65147,户均 4.3 口;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4‰。

光绪《青神县志》卷 7《田赋·户口》记嘉庆四年有 16098 户,男妇 69974 丁口;嘉庆十六年,有 17001 户,72607 口,其中男性 37989,女性 34618,性别比为 110。这一数据比表 7-16 所载要少得多。以此为基数,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2‰,而不是零增长。《乾隆民数册》载 15420 户,65324 口,户均 4.2 口。《青神县志》与此同属一个系统。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六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6‰。

民国《彭山县志》卷 3《食货志·户口》称嘉庆四年有 16765 户,77366 丁口,户均 4.6 口。嘉庆十六年,户数升至 30142,口数升至 154391,户均 5.1 口,大大超过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以嘉庆四年口数为基数,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8‰。彭山县的人口浮夸是从嘉庆四年以后开始的。

《乾隆民数册》载彭山县有 13885 户,59984 口,虽说与《彭山县志》同属一个系统,却较《彭山县志》所载嘉庆四年口数要低得多。民国《彭山县志》所载乾隆六十年户数为 11386,丁口数为 43194,较《乾隆民数册》所载更少。据《乾隆民数册》,从乾隆六十

彭山县有两个不同的乾隆六十年户口数。

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3‰,还算不太离谱,据《彭山县志》,同期年平均增长率则为9.4‰,已属明显高估。乾隆六十年彭山县不同的户口数据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时期户口数的内涵保持应有的警惕。

嘉庆五年《眉州志》卷6《户口》记载嘉庆四年眉州本州的户数为29432,男妇为108988,户均口数只有3.7口,偏低。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相比,户数稍少,口数相差很多。如以此一口数为基数,至1953年,眉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1‰。《乾隆民数册》载27888户,98514口,户均3.5口。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5‰,均不太可信。

用嘉庆《四川通志》中的眉州口数代替《乾隆民数册》中眉州口数,再对彭山县口数的低估略加修正,乾隆六十年眉州人口共约36万,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5‰。依上述青神县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七年6.6‰的年平均增长率,可推测乾隆四十一年眉州口数为31.8万,嘉庆二十五年有42.4万。

二、川西南部

1. 嘉定府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嘉定府分县户口数见表7-17。

嘉庆十七年嘉定府各县的户均口数和性别比均相当合理,然口数的变动却有四县显得异常。峨眉、洪雅、夹江三县口数均超过1953年,荣县的口数在141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2‰。其余各县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7‰。

嘉庆《峨眉志·食货志·户口》载:“嘉庆十四年将县我边一甲及太平堡二处拨出归峨边厅管辖,造报除去花户五千八百四十六户,人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六丁。”又载:“嘉庆十七年报部实在花户二万六千三百七十四,人丁五万七千八百九十。”每户丁数不足3丁,此处的“人丁”数肯定不是人口数。

民国《夹江县志》卷4《户口》称嘉庆十七年有29048户,人丁77840丁。无论户数还是口数,都远远低于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由于户均口数太低,此处“人丁”不是人口。

表 7-17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嘉定府分县户口

县 厅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乐 山	49701	247764	5.0	108	433069	4.0
峨 眉	38977	196148	5.0	107	164380	-1.2
洪 雅	49049	250747	5.1	123	208655	-1.3
夹 江	35351	199172	5.6	118	184787	-0.5
犍 为	40138	243660	6.1	107	534383	5.6
荣 县	38255	185619	4.9	114	781620	10.2
威 远	46036	160956	3.5	112	416279	6.8
峨边厅	5020	21121	4.2	101		6.1
峨边营	4236	20000			97195	6.1
合 计	306763	1525187	5.0	112	2810368	4.3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说明：嘉庆十七年峨边营人口数为根据该地户数所得估计值。该地居民为“夷人”。1953 年犍为县人口中包括五通桥市人口；荣县人口中包括自贡市二分之一人口。

《乾隆民数册》记载峨眉、洪雅、夹江三县的口数分别为 106093、140937 和 102713，三县的户均口数分别为 4.7、4.3 和 4.4，性别比分别为 109、104 和 107。至 1953 年，三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8‰、2.5‰ 和 3.7‰。很显然，这一组数据要比省志及县志所载合理得多。将《乾隆民数册》所载此三县的户口数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是后者数的半数略多。就全府而言，《乾隆民数册》载 81.8 万口，也是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口数的 53%。

然而，还有另一套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嘉庆《峨眉志·食货志》记载乾隆六十年有 32270 户，人丁 70455，户均 2.2 丁。民国《夹江县志》卷 4《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承粮户 21782，人丁 45732，户均 2.1 丁。与《乾隆民数册》比较，户数或多或少，口数相差甚多。乾隆六十年的户口数存在多个不同的版本，研究者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鉴于县志中所载乾隆六十年的户均丁数太低，可能只载有部分男性人口，不予采信。

乾隆数据是嘉庆数据的半数左右。

乾隆六十年户口数据的不同版本。

从峨眉等三县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一些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即使《四川通志》的编者将乾隆六十年或嘉庆十七年真实的人口数增加了一倍,与1953年比较,口数仍可能呈增长状,研究者不易发现其中的错误;而在一些人口增长较低的地区,这类增加就可能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嘉庆十七年口数超过了1953年,数字的虚假也就昭然若揭。

在表7-17中,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犍为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户口》称嘉庆十八年有28250户,86019丁口。由于户均口数太低,兹采用户均5口的规模加以修正,得141250口,仅及表7-17中的半数稍多。《乾隆民数册》载犍为县有25074户,146641口,户均5.8口。民国《犍为县志》所载与《乾隆民数册》属于同一系统。依此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犍为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5%。民国《犍为县志》卷3《居民志·户口》记载乾隆六十一年有11892户,23679口,与《乾隆民数册》比较,相差甚远,不予采信。

威远县和荣县的数据使我们对嘉庆《四川通志》的户口编造有了与以前不同的新的认识。光绪《威远县志》卷2《食货志·户口》称嘉庆二十五年有36375户,男妇154014丁口,户均4.2口。《威远县志》中的户数较《四川通志》要少得多,但口数大体相同。《乾隆民数册》中威远户数为16270,丁口数为76283,仅为嘉庆十年及嘉庆十七年的半数左右。如果采用《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威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8%。《乾隆民数册》的这一数据令人怀疑,还因为在光绪《威远县志》卷2中,我们读到另一组乾隆六十年的户口记载,户数为14292,丁数为56065,虽较《乾隆民数册》所载还要少,但仍属一个系列。乾隆六十年威远县的户口数存在很大的问题。

据表7-17,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荣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2%,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与这一区域井盐业的发展有关。1939年划荣县贡井和富顺县自流井合置自贡市,就是井盐业及区域城市发展的结果。然而,《乾隆民数册》载荣县户数为22689,口数为103445,仅为表7-17中的55.7%。也就是说,如

果按照《乾隆民数册》的记载,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荣县的人口增长速度高达 12.9‰。在 158 年的时间里,荣县人口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令人难以置信。比较而言,对于威远县和荣县的数据来说,我更愿意接受嘉庆《四川通志》所载。

从上述峨眉、夹江、犍为三县例子看,由于乾隆六十年的人口数存在不同的版本,不可完全相信。威远、荣县的例子证明,即使是《乾隆民数册》所载,也有可能登录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另外,按照上文对川中地区“承粮”及“花户”的分析,我以为《乾隆民数册》所载某些县份的人口也有可能仅包括人口的一部分,即承担赋役的部分人口。

《乾隆民数册》载乾隆六十年嘉定府有 81.8 万口,如果不采纳其中的威远县和荣县口数,而代之以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则有口数 95.6 万,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8‰。依此速度推测,乾隆四十一年嘉定府人口为 84 万,嘉庆二十五年为 113.2 万。《乾隆民数册》中未记载峨边厅户口,但这一区域户口极少,不影响分析。

2. 叙州府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叙州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7-18。

表 7-18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叙州府分县户口

县名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宜宾	50845	182927	3.6	108	883823	11.2
庆符	24315	95648	3.9	113	159260	3.6
富顺	51221	215562	4.2	109	1093047	11.6
南溪	41936	136755	3.3	105	286078	5.2
长宁	26970	95624	3.5	114	228319	6.2
高县	23594	109802	4.7	125	110064	0
筠连	22041	97038	4.4	93	165111	3.8
珙县	19831	53079	2.7	74	155585	7.7
兴文	26534	78706	3.0	110	80189	0
隆昌	31809	108154	3.4	118	432041	9.9

续表

县名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屏山	23193	72985	3.1	112	158768	5.5
马边	18010	51699	2.9	114	86589	3.7
雷波	29721	102221	3.4	123	81551	
普安营	4174	15000	3.6			
合计	394194	1415200	3.6	109	3920424	7.3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说明：1953年宜宾县人口中包括宜宾市人口，富顺县人口中包括自贡市三分之一人口。普安营口数据户均3.6口推得。据光绪《雷波厅志》卷12，嘉庆十七年雷波厅户口中包括黄螂所。

从表7-18看，各县户均口数偏低。雷波厅、高县性别比偏高，珙县偏低，其他各县性别比大体围绕110波动。

雷波厅在籍人口的变化，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变动，因数量不大，兹不讨论。高县和兴文两地出现的人口零增长，则有讨论的必要。民国《兴文县志》卷13《户口》记载，雍正七年花户943户，“自雍正八年起到嘉庆十七年陆续加增册载花户”1232户，31365口，其中男16932，女14433，口数仅及表7-18所记的39.9%；“嘉庆十八年起至光绪十三年又陆续加增册载花户”共1768户，“又烟户”11478户，男25342，女23623，共48965。“烟户”与“花户”是不同的概念。按照上文所引光绪《永川县志》卷4的记载，“烟户”指的是保甲系统的人口，包括土著和移民。从光绪十三年至1953年，兴文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5‰，而以嘉庆十七年的“花户”31365口为基数，至1953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亦为6.7‰。在兴文县，“烟户”与“花户”实质上是等同的。

光绪《庆符志》卷7《户口志》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征输查出土著自首开垦报部户口”2331户，男妇18490丁口；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六年为3226户，20491丁口；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七年，“报部承粮花户”15192，共男妇66059。庆符县的“承粮花户”与

“花户”与“烟户”。

“土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承粮花户”应包括全体人口，只是其数量仅及《四川通志》所载的 69.1%。《乾隆民数册》载庆符县户数为 11251，丁口数为 55514，较县志所载稍少。依县志数，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庆符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3‰。依《乾隆民数册》数，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则为 6.7‰。县志及《乾隆民数册》中的数据较嘉庆《四川通志》所载显然要合理一些。

乾隆《屏山县志》卷 2《赋役志·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实在新旧户 7483，共男妇 34946 丁口，较《乾隆民数册》所载乾隆六十年的 12675 户、48142 口要少许多，原因不明。

如果说嘉庆《四川通志》对兴文、高县及庆符等县户口的记载存在不合理的高估的话，那么，对于宜宾、富顺和隆昌等县户口则存在低估。据表 7-18，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的 141 年间，叙州府在籍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宜宾、富顺和隆昌，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1.2‰、11.6‰和 9.9‰。虽然近代以来宜宾的城市化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且富顺、隆昌的人口高增长与自贡盐业及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要在一个如此长的时段里，保持这样一个高速度是相当困难的。不仅如此，在《乾隆民数册》的记载中，大多数县的口数只有嘉庆《四川通志》口数的半数左右。如果采用《乾隆民数册》口数进行计算，从乾隆六十年至 1953 年，叙州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9.5‰。其中富顺县将高达 12.2‰，隆昌县高达 12.1‰，宜宾县为 11.7‰，长宁县为 9.0‰。在叙州府，我们遇到了与嘉定府相同的问题。

在《乾隆民数册》中，南溪县有 23532 户，80639 口，口数只及嘉庆《四川通志》的 59%，而在民国《南溪县志》卷 2《食货·户口》中，乾隆六十年只有 14545 户，62073 口；嘉庆十五年有 34714 户，109573 口；嘉庆十七年有 35170 户，111593 口。乾隆、嘉庆时期的南溪户口也存在不同的版本，县志中的记载少于《乾隆民数册》和《四川通志》。

民国《富顺县志》卷 5《食货·户口》称：“自明末兵燹之后，土著稀少，异省流移来兹随地占籍者，孳息养恬，有加无已。而乾隆四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旧府志、省志所载人数仅由十三万以至

十七万、二十一万、二十三万有奇,宣统元年调查,户口达八十余万。”字里行间透漏出对册载户口数的不满。兹将清代富顺县历年户口数列如表 7-19。

表 7-19 清代富顺县户口变动

年 代	户	口	户均口数	年平均增长率(%)
雍正六年(1728年)	15732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22365	123172	5.5	9.1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25402	133466	5.3	8.9
嘉庆十五年(1810年)	40609	178027	4.4	8.5
嘉庆二十年(1815年)	51221	215562	4.2	39.0

资料来源:民国《富顺县志》卷5《食货·户口》。

说明:雍正六年至乾隆三十二年为户的年平均增长率,其余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粮民”和“土著”。

在民国《富顺县志》的记载中,雍正六年的户称为“粮民”,乾隆三十二年称为“土著自首开垦报部”。从雍正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富顺县户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9.1% 依次下降,如果插入《乾隆民数册》所载乾隆六十年 34919 户,159923 口,各段户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为 9% 左右。这一事实说明,民国《富顺县志》及《乾隆民数册》所载之户口属于同一系统。而在本人的研究中,与雍正年间的户口数属于同一系列者,必不包括全体人口。乾隆三十二年专以“土著”称之,即是此理。

所以,到嘉庆二十年,富顺县户口数突然发生较大的增长。从年平均增长率上分析,已属不可能。细加分析,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富顺县户口,实为嘉庆二十年数。嘉庆《四川通志》修于嘉庆二十一年,正好来得及将嘉庆二十年数据收入。《四川通志》的编者不收入嘉庆十五年的户口数而收入嘉庆二十年的户口数,可能已经意识到嘉庆二十年以前数据未包括全体人口。然而,正由于“异省流移来兹者”不少,所以,嘉庆二十年的户口数据也只开始著录移民,但却未来得及著录所有的移民。嘉庆二十年的富顺县口数仍然是偏低的。

该如何确定叙州府真实的人口增长率呢? 光绪二十一年《叙

州府志》卷8《户口》记载叙州府共 489608 户,男女口 2738484,户均 5.6 口,宣统二年叙州府有 304.9 万人口,1953 年有 392 万人口。假定光绪年间的叙州府户口是光绪十九年数,即光绪二十一年《叙州府志》编修前两年的数据,则从光绪十九年至宣统二年,叙州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3‰,从宣统二年至 1953 年为 5.9‰,从光绪十九年至 1953 年为 6‰。清代后期至 1953 年,叙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体稳定地保持在 6‰左右。

以 6‰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叙州府人口数为 176.9 万。以嘉庆二十五年数为基点,比照嘉定府的情况,以 7‰的速度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则有人口 130.1 万。

第五节 川西边区

川西边区包括四川西部的雅州府、宁远府、茂州、懋功厅、理番厅和松潘厅。这一区域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是四川少数民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

一、雅州府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雅州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7-20。

雅州府各县户均口数大约为 5,性别比约为 114,与标准基本吻合。然而,从人口增长的角度看,却还存在许多问题。

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雅安县人口几无变动。民国《雅安县志》卷2《户口》记载的嘉庆二十年户口数与表 7-20 中的完全相同。又记光绪二十年户数达到 33460,口数达到 170183,大大超过 1953 年的人口数。现有的雅安县人口数据是无法利用的。

民国《荣经县志》卷6《户口》没有记载民国以前的户口数,只记 21380 户,106496 丁口。这一人口数超过了 1953 年,令人无法相信。

民国《名山县志》卷5《户口》记道光二十四年 43920 口,咸丰四年 73179 口,同治四年 103418 口,与表 7-20 中口数接近,却较嘉庆十七年整整晚了 50 余年。民国《名山县志》所记三个年份的

口数也不合理,从道光二十四年至同治四年的 22 年间,口数年平均增长率达 39.7‰,毫无可能。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县志系统中的嘉庆十七年户口数远远低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也就是说,从嘉庆十七年至 1953 年,名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肯定超过了 2.5‰。

表 7-20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雅州府分县户口

县 厅	嘉庆十七年(1812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雅 安	21593	115405	5.3	111	119835	0.3
名 山	21064	100122	4.8	108	141432	2.5
荣 经	18245	97988	5.4	115	93521	-0.3
芦 山	19122	101443	5.3	116	64015	-3.3
天 全	18023	96246	5.3	120	124744	1.8
清 溪	16663	88350	5.3	116	181787	5.1
打箭炉	43289	229432	5.3		538692	6.1
合 计	157999	828986	5.2	114	1264026	3.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7-1。

说明:

[1] 嘉庆十七年打箭炉厅只有户数记载,口数据户均 5.3 口比例推算。打箭炉厅辖地实为 1953 年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另外,县治设于懋功厅境内的丹巴县的大约四分之三属于打箭炉厅辖境,故其四分之三的人口亦属于打箭炉厅。

[2] 1953 年天全县人口中包括宝兴县人口。

咸丰《天全州志》卷 2《户口》称嘉庆十六年有 13615 户,68039 丁口,较表 7-20 所载大为减少。若此数为真,142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3‰。1928 年因废天全县穆坪土司设宝兴县,1932 年析宝兴县置金汤设置局。1951 年金汤设置局改隶康定县(打箭炉厅),因此,142 年间天全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还要高一些,而打箭炉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要低一些,两县合计,141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6‰。这一速度与川西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体相同。

嘉庆四年《清溪县志》卷 2《人民类·户口》记载的嘉庆四年清

溪县(即今汉源县)户数为 9056,口数为 40159,此外,还记松坪等地户数约近万户,口数不详,如以每户 5 口计,合计约有 5 万人口,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基本相同。松坪等地居民当为“番民”。嘉庆《四川通志》在“打箭炉厅”条下记载了汉民为 2014 户,番民 41275 户,且有分土司之记载。可见这一区域的番民是列入户籍的。这一时期清溪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1‰,与天全、打箭炉两地相近。

咸丰《天全州志》卷2《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户数为 7867,口数为 32258,仅及《乾隆民数册》的 72%~73%。依前例,当县志系统中的乾隆六十年数据低于《乾隆民数册》时,且《乾隆民数册》所载并非无理,弃县志而采《乾隆民数册》。

《乾隆民数册》载雅州府六州县共 69190 户,314682 丁口,打箭炉之户口数缺载。据表 7-20,排除打箭炉之后,嘉庆十七年有 114710 户,599554 口。《乾隆民数册》所载户口分别是《四川通志》户口数的 60.3%、52.3%。《四川通志》对口数的编造依然如上文所述,没有变化。

依天全、清溪及名山县之例,按 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进行回溯,嘉庆二十五年雅州府人口约为 62.6 万。设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5‰,乾隆四十一年雅州府有人口约 49.2 万。

二、宁远府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宁远府户口数,见表 7-21。

表 7-21 嘉庆十七年和 1953 年宁远府分县户口

州县所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西昌县	29361	166247	5.7	111	831361	11.5
德昌所	19641	95477	4.9	124	83408	-1.0
冕宁县	16550	89631	5.4	110	157313	4.0
盐源县	17419	93202	5.4	125	159085	3.8

续表

州县所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盐中所	16695	90920	5.4	108	92758	0
会理州	20178	144832	7.2	152	410416	7.4
迷易所	11916	66985	5.6	132	99602	2.8
越嶲厅	13737	88264	6.4	119	235596	7.0
建昌镇辖 各土司	90443	452215	5.0			
合计	235940	1287773	5.5	122	2069539	3.4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说明：

[1] 1953年与清代盐中所对应的是盐边县。

[2] 建昌镇所辖土司皆为夷民或番民，其口数据户均5口比例推得。查咸丰《邛崃野录》卷9《赋役类·户口》引《宁远府志》共92861户，456038丁口。

[3] 1953年冕宁县人口中包括金矿县人口，盐源县人口中包括木里区人口，因1952年析会理县东部及云南巧家县合置会东县，故会理县人口中包括会东县二分之一人口和宁南县人口，西昌县包括昭觉、美姑、金阳、布拖、普格县人口和普雄县二分之一人口，越嶲厅包括喜德县人口和普雄县二分之一人口。

县界变动太大，使得我们无法进行以县为单位的人口增长速度研究。

20世纪以来，宁远府境设置了一大批新县，由于建昌镇辖土司地与原有的县境犬牙交错，改设为县后，已无法进行前后对比，因此，本节不可能以县为单位进行人口增长速度的研究。合而计之，141年间宁远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

表7-21中的数据是否可靠，可以通过清代中期的县级资料来进行验证。咸丰《冕宁县志》卷3《食货·户口》称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十五年，新增17110户，男36573丁，妇31787口，共男妇68360丁口，户均4口。与表7-21相比，户数多而口数少。道光初年该县户增至19832，口增至114322，增长的速度令人瞠目。该志还注明，“并无安插拨归，亦无夷人户口在内”。人口的增长是在相同的口径下进行的，就更令人不可接受。《乾隆民数册》记载9294户，44028口，只有《四川通志》数据的49.1%。《四川通志》编造数据的方法与其他地区别无二致。咸丰《冕宁县志》中嘉庆十

五年的数据已经在胡编乱造了,与《四川通志》比较,单个县份的数据编造是不需要确定编造原则的。

单个县份的户口数据编造是相当随意的。

同治《会理州志》卷9《户口》记载的嘉庆元年会理州及迷易所的户口数与表7-21中的相同。在嘉庆十九年条下,迷易所汉民户25393,男69912,妇52492,合计122404丁口;口数几乎为表7-21中的2倍。道光七年,户数略有减少,但人口增至145812丁口;同治年间增至217439丁口。户口数的编造毫无道理可言。

表7-21中“建昌镇辖各土司”条下是否包括了所有的“番民”和“夷人”?光绪《盐源县志》卷3《食货志·户口》称:“嘉庆十九年建昌道查夷地,户四万一千一百五户,口十八万四千一百二十二。”而在嘉庆《四川通志》中,嘉庆十九年查出汉户及归流夷人近81681户,397747口,较《盐源县志》的记载多出许多。各县清查的汉户、夷户数量,见表7-22。

表7-22 嘉庆十九年宁远府夷地汉人户口及归流夷人户口

县	厅	汉户	男	女	合计	夷户	男	女	合计
西	昌	21432	62700	47840	110540	754	2952	2011	4963
冕	宁	1987	5230	3739	8969				
盐	源	25637	73897	52807	126704				
会	理	25393	69612	52492	122104	726	1618	1095	2713
越	嵩	5518	12146	8637	20783				
迷	易					234	560	411	971
合	计	79967	223585	165515	389100	1714	5130	3517	8647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光绪《盐源县志》记载的户口数与表7-22中完全相同,说明此一组数据是夷地清查后的结果。与表7-22比较,夷地清查中的盐源县户口较《四川通志》所载为多,这一结果与这次清理的目的和范围不符。

对夷地汉人的清理,是在嘉庆十九年之前展开的。嘉庆《四川

通志》卷65《食货·户口》引嘉庆十九年四川总督常明有关宁远府户口清查的一份奏疏,议及户口清理的目的和范围:

窃照川省宁远府地界北自大渡河起,南抵金沙江止,绵亘千里而遥,东为大小凉山,系生保熟夷巢穴,西为旄牛大山,系西番各种夷类住牧之所。重岩叠嶂,不下数千余里。夷巢环布于外,汉地穿插其中。康熙、雍正年间,各土司投诚以后,虽设府安营,仍准土司袭职管事……时汉界夷疆,本有定址,自百数十年来,夷地招佃,汉民开垦,遂致汉夷杂处,疆界混淆。若不及早清厘,恐汉民逞诈,私侵夷人,恃强称衅,难免钩连争竞,酿成事端。

关于清理的原则和困难,常明称:

清查之法,只须将汉人所种夷地逐段清出,则界址自可判然。惟住耕夷地之汉民,原佃既有荒地、熟地之别,开垦成熟后又有辗转顶佃、或当或卖之不同。蛮荒夷俗,不能如内地之交易分明,且日久年深,屡易其主,逐加清一,如治乱丝……既编保甲一节,有汉夷共居一处者,有汉夷间杂零星散处者,有汉民自成村落者,与内地情形迥异,亦须毫无惊扰,群情方可贴然。

关于清理过程,常明说:

凡汉种夷地,无论佃当顶买,俱令呈验纸或木刻,划清界址,载入册内,并给门牌,编连填写,俾得互相稽覆。一载有余,如将夷界户口地土编查清楚,现据禀报,一律完竣,统计招有汉佃之土司土目五十四处,夷地内有汉民八万七千六百八十九户,男女四十二万五千二百四十七丁口,其姓名籍贯并地亩四至至银租各数均于册内详载。

夷地汉人、归流夷人和夷人。

为了有效地实施管理,常明禁止以后汉民再行迁入。如有汉民外迁,且夷人无力购回土地,则由册内汉人承顶接管。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这一调查,应当是严密的。

很显然,嘉庆年间对夷地的户口清查,主要是清查夷地中的汉

人,也登记愿意归流的夷人。对一般县而言,在汉人和归流夷人之外,还存在一大批其他人口。如西昌县,汉人与归流夷人合计有115503口,而表7-22中却有166247口,其余的5万余口差额应是明代以来的卫所军人及其家属,以及带管的土人。如会理,夷地中的汉人多达12万余,而全体人口有14万余。再如冕宁,夷地中的汉人不足9000,而全体人口则有近9万人。越嶲、盐源等地的情形大体如此。

从西昌、会理等县的实例看,夷地汉人及归流夷人的数量太大,此外的人口很少。如果没有进行常明所奏称的夷地汉人清理,宁远府难道无民可牧?实际上,嘉庆年间一般的户口调查与夷地的汉民清理是同时进行的。从逻辑上说,表7-21数据是包含表7-22的。只是表7-22的分县数据被夸大了。所以,夷地汉人数量不应该是表7-22中的39.8万,而是光绪《盐源县志》所称18.4万。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表7-22中建昌镇所辖各土司的户口数。在各土司中,夷人的数量为45.2万,汉人数量为18.4万,合计为63.6万,其中夷人占71.1%。这一比例与今天凉山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大体相同。

《乾隆民数册》记载宁远府西昌县、会理州、盐源县、冕宁县和越嶲厅共有74937户,380001丁口。德昌所、盐中所、迷易所和建昌镇辖各土同丁口未包括其中。据表7-22,嘉庆十七年德昌等三所共有253382口,依据我的理解,此数据大致是乾隆六十年三所口数的50%强,因此,推测乾隆六十年德昌等三所约有12万丁口。嘉庆十七年建昌镇属汉民已散见于德昌等三所或其他政区之中,45.2万口“夷民”则不见记载。“夷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可能太高,以4‰计,乾隆六十年应有42万。合计乾隆六十年宁远府境各类人口有92万。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宁远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1‰。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83.5万,嘉庆二十五年有104.5万。

三、茂州、理番厅、懋功厅、松潘厅

茂州、理番厅、懋功厅和松潘厅位于川西北地区,是藏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清史稿》卷70《地理志》称理番直隶厅,“嘉庆六年以茂州属之,保县入之”。保县方位不详,估计地处原茂州辖境。但茂州似乎并未编入理番厅,在嘉庆《四川通志》中,茂州单列,辖茂州和汶川两县。理番厅即《嘉庆一统志》中的杂谷厅。

因政区变化太大,不可能做到以县为单位的分析,故以州或厅为单位。各州、厅户口数详见表7-23。

表7-23 嘉庆十七年和1953年茂州、理番、懋功、松潘户口

州 厅	嘉庆十七年(1812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茂 州	39565	259479	6.6	108	68534	-9.5
理 番	41444	202696	4.9	113	24028	-15.2
懋 功	7527	37635	5.0		83221	5.6
松 潘	29977	149885	5.0		152161	0
合 计	118513	649695	5.5		327944	-4.9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7-1。

说明:嘉庆十七年懋功厅、松潘厅的口数据户均5口推得。

在《嘉庆一统志》中,懋功为7282户,与表7-23所列基本相同,口数不详;折算成口数后计算,从嘉庆十七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5.6‰,大致合理。《乾隆民数册》无懋功厅户口记载,故不作讨论。《嘉庆一统志》中茂州、理番(杂谷)两地的口数分别为396999、261437,大大多于表7-23,更远远超过1953年,也不可相信。

道光《茂州志》卷3《食货志·户口》载,旧管户16408,男49657丁,妇49363口,加上新收男妇及番民,共男妇111416丁口。此不及《四川通志》所载的一半,却正与《乾隆民数册》所载

24211户、113808口的口数相当。该口数大大超过1953年数,可见茂州户口的浮夸早在嘉庆以前就开始了^①。

茂州户口的浮夸早在嘉庆以前就开始了。

同治《理番厅志》卷1《舆地·赋役》记载,保县归并内民数现存9908户,男女25359口,威州4573户,20004口,合计为4.5万余人,仍多于1953年。该书又称同治四年查有20400户,61633丁口,户数和口数均较前一数据大大增加,更超出1953年。无论是《嘉庆一统志》、《四川通志》还是《理番厅志》,有关清代理番厅的户口数都是不可信的。《乾隆民数册》载理番厅7942户,24429口,与1953年人口数相近。

只有《嘉庆一统志》所载松潘厅户口要比《四川通志》少得多。《嘉庆一统志》载79058口,民国《松潘县志》卷2《户口》称,嘉庆元年以后,松潘直厅报部户10554,男27230,女24772,共52002丁口。然而,在嘉庆《四川通志》中,除了相同的记载外,还另列19423户“番民”,合计为71425口。以此数据为基数,至1953年,松潘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4‰。《乾隆民数册》只载有4625户,19367丁口,数量少得惊人,不予采信。

在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乾隆民数册》的记载都是偏少,甚至是空缺的。综合分析,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十七年再至1953年,假定茂州及理番厅人口为2‰的低增长,人口数比1953年略少。懋功及松潘两地则依5.6‰及5.4‰的年平均增长率进行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懋功厅有人口3.9万,松潘厅有7.5万;乾隆四十一年懋功厅有人口3.1万,松潘厅有5.9万。

第六节 结 语

至此,我们将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四川分府人口列如表7-24。

^① 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小区域人口在其他各种条件影响下,容易发生数量上的较大波动。这一判断对其他厅级政区人口的分析同样有用,不另说明。

表 7-24 乾隆四十一年至 1953 年四川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 万

地 区	乾隆六十年 (1795 年)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	宣统二年 (1910 年)	1953 年
川中地区					
重庆府	133.3	274.4	364.9	692.7	1060.6
泸 州	30.7	49.6	73.5	162.1	236.5
叙永厅	11.7	19.9	28.3	65.6	71.6
顺庆府	102.2	121.0	171.8	316.4	485.3
潼川府	70.5	116.3	180.2	452.6	676.9
资 州	37.5	61.9	95.9	266.7	360.3
保宁府	53.4	77.3	119.7	293.1	449.6
小 计	439.3	720.4	1034.3	2249.2	3340.8
百分比(%)	39.5	42.9	43.9	49.7	51.2
川东地区					
西阳州	25.7	44.8	62.2	102.8	146.0
绥定府	31.0	69.9	108.3	262.3	329.4
太平厅		9.6	14.0		41.6
夔州府	42.9	91.8	130.3	215.8	373.4
忠 州	30.9	47.3	69.8	139.3	213.8
石碛厅	6.6	7.5	10.8	3.3	32.2
小 计	137.1	270.9	395.4	723.5	1136.4
百分比(%)	12.3	16.1	16.8	16.0	17.4
川西地区					
绵 州	34.7	63.3	80.6	133.5	167.3
成都府	162.4	180.6	256.5	412.1	590.2
邛 州	27.9	26.6	39.0	70.7	86.2
龙安府	28.0	25.1	32.6	57.6	65.1
眉 州	28.9	31.8	42.4	69.1	85.5
嘉定府	81.8	84.0	113.2	219.6	281.0
叙州府	88.1	130.1	176.9	304.9	392.0
小 计	451.8	541.5	741.2	1267.5	1667.8
百分比(%)	40.6	32.2	31.5	28.0	25.6

续表

地 区	乾隆六十年 (1795年)	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宣统二年 (1910年)	1953年
川西边区					
雅州府	31.5	49.2	62.6	100.7	126.4
宁远府	38.0	83.5	104.5	164.9	207.0
茂 州	11.4	4.9	5.3	6.3	6.9
理番厅	2.4	1.7	1.8	3.3	2.4
懋功厅		3.1	3.9	3.5	8.3
松潘厅	1.9	5.9	7.5	6.4	15.2
小 计	85.2	148.3	185.6	285.1	366.2
百分比(%)	7.7	8.8	7.9	6.3	5.6
合 计	1113.4	1681.1	2356.5	4525.3	6510.8
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乾隆六十年以外的各数据见正文。乾隆六十年数转引自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

说明：王笛引用的宣统元年六直隶厅人口数未作细分，查王士达引户部清册，知此六直隶厅为懋功厅、石砭厅、打箭厅、松潘厅、叙永厅。太平厅口数未见记载。兹根据各厅户数乘以5.2口，即得各厅口数。打箭厅与松潘厅合并计算。另有数万“55属船户”忽略不计。

在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间，川中地区和川东地区人口比重不断呈上升趋势。川西地区及川西边区的人口比重在从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的177年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比较而言，川东地区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比川中地区还要大一些，川西边区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比川西地区还要大。各个时期各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见表7-25。

分时期论，唯有未经修正的乾隆六十年人口数显得与众不同。从乾隆六十年到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2.8‰，肯定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我曾指出清代的移民四川，至乾隆中期已经结束。乾隆中期以后的移民，已是零散的，非规模性的了。按照清代的法令，迁入四川的外省移民可以分得土地，编入户籍，所以也不存在入籍的障碍。乾隆六十年

人口偏少的原因在于当时四川的保甲体系尚不足以控制全部的人口。

表 7-25 清代至 1953 年四川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地 区	1795— 1820 年	1776— 1820 年	1821— 1910 年	1911— 1953 年	1820— 1953 年
川 中	34.8	8.2	8.7	9.3	8.9
川 东	43.3	8.6	6.6	10.7	8.0
川 西	20.0	7.2	6.0	6.4	6.1
川西边	31.6	5.1	4.8	5.9	5.1
合 计	32.8	7.7	7.3	8.5	7.7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 7-24 计算。

在修正过的数据中,从 1776 年至 1820 年,从 1820 年至 1910 年,再从 1910 年至 1953 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体不变,人口增长有规律可循。表 16-1 据此估测咸丰元年(1851 年)和光绪六年(1880 年)的分府人口数。

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嘉庆十七年四川口数为 2165.8 万,《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为 2802 万,本章推测同年口数为 2356.5 万,与嘉庆《四川通志》所载相近,而与《嘉庆一统志》相差甚远。然而,这一结果并不证明嘉庆《四川通志》的户口资料是可靠的。该志若干府的人口数存在严重的浮夸,若干府的人口数存在严重的漏载。宣统年间分府人口数基本可靠,只有川西边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一些问题,修正后的结果稍多于册载户口数^①。同年川东保宁府的户口略有高估,此不作修正。

^①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 95 页,我采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递减法对清代四川省级人口数进行修正;所得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为 1000 万,宣统二年人口数为 4800 万。与本研究相比,以前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糙,所得结论也不正确。

第八章 清代中期北方分府人口

——直隶、河南和山东

《嘉庆一统志》所载直隶分府户口存在相当严重的低估或高估,利用地方志中的记载认真地对其进行整理是本章采用的主要方法。《嘉庆一统志》所载河南中部及北部各府口数大体准确,豫南三府、州的统计口径与豫中和豫北地区的不同,即册载口数仅仅是人口的一部分(男性人口),据此而对其漏记的女性人口进行补充修正。山东户口数据的主要问题出在登州和沂州两府,登州人口存在严重的漏载,沂州人口似乎仅记男性而忽视女性,对此两府口数进行修正后,人口变动便有规律可循。

华北三省人口数据中存在的问题各不一致。

第一节 直 隶

一、顺天府

1. 清代中期户口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及1953年顺天府分县口(人口)数,列如表8-1。

由于在窦光鼎《日下旧闻考》中北京市的人口缺载,故表8-1不讨论北京城市人口问题。韩光辉在其著作《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中对清代的北京城市人口多有讨论,论证详实。笔者只在必要时加以引述或讨论。又因1952年宛平县并入北京市,故将清代人口

与 1953 年人口进行对比时,必须将该县人口排除。

表 8-1 乾隆四十六年和 1953 年顺天府分县人口

州 县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口	1953 年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通 州	261421	438303	3.0
涿 州	174482	282927	2.8
大 兴	153450	201410	1.6
良 乡	33796	137568	8.2
房 山	64189	150361	5.0
昌 平	100433	275381	5.9
顺 义	81113	323630	8.1
怀 柔	82914	134762	2.8
密 云	72221	223210	6.6
平 谷	29441	203898	11.3
蓟 州	239063	361678	2.4
三 河	134882	274392	4.1
香 河	118413	191926	2.8
文 安	14502	215810	16.1
保 定	14502		
霸 县	191501	269748	2.0
永 清	240745	182641	-1.6
东 安	208243	282578	1.8
武 清	461058	493912	0.4
宝 坻	485993	337219	-2.1
宁 河	179441	265296	2.3
固 安	175901	220780	1.3
大 城	237242	206559	-0.8
宛 平	159856		
合 计	3754946	5673989	2.4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六年数据引自窦光鼎《日下旧闻考》卷 145《户版》。

将乾隆四十六年数据与 1953 年的对比,可以发现数据之异常。

在《日下旧闻考》中,文安县和保定县(1949 年并入文安县)的口数完全相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文安县数字有误,而保定县则大体是允当的。如果按照保定县的人口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六

年文安县人口至少在 11.9 万人左右, 册载人口较实际人口要少 10 万余人。

与 1953 年人口对照, 在乾隆四十六年的口数中, 至少还有良乡、顺义和平谷三县是偏低的, 导致从乾隆四十六年至 1953 年, 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显得过高。如果认为这 172 年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 则乾隆四十六年实际口数增加 25 万余。与文安县合计, 乾隆四十六年户籍册少记了大约 35 万余人口。

然而, 在乾隆四十六年顺天府各县中, 至少有永清、宝坻、大城三县口数多于 1953 年, 这是不正常的, 也是不可能的。同样按照 3‰ 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回溯, 乾隆四十六年, 永清等三县的人口总数只有 43.4 万人, 户籍册多载了 53 万人口。

还有一些县的乾隆四十六年口数令人生疑。除大兴县外, 这些县主要集中在顺天府的南部, 如东安、武清、固安三县即是。大兴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较低, 原因不详, 由于邻近北京城, 因城区调整, 可能导致大兴县人口的减少。如果按照 3‰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 东安、武清、固安三县乾隆四十六年只有人口 59.7 万, 册载人口较实际人口多出 24.8 万。

合而计之, 此十县的错误导致乾隆四十六年的册载人口较实际人口多出 41 万余人。即乾隆四十六年顺天府(不包括北京城)人口只有 334 万。以此为基数, 再扣除乾隆四十六年宛平县口数, 至 1953 年, 顺天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4‰。如果将上述十县及大兴、宛平、保定三县人口排除不计, 同时期顺天府其他 12 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3‰。这一增长速度, 与华北其他地区相近。

然而, 《嘉庆一统志》载顺天府只有 530336 户, 2934449 口。口数少于乾隆四十六年, 可见嘉庆二十五年顺天府的口数是低估的。迄今未查获嘉庆二十五年顺天府分县的户口资料, 因此也就无从判断错误是怎样发生的。只有一条记载可供参考: 咸丰《固安县志》卷 3《赋役·户口》记载, 咸丰四年“据固邑民数户口册”, 户数为 21817, 男丁 62752, 女口 39955, 共男妇 102707。从户均口

《嘉庆一统志》
中顺天府口数少
于乾隆四十六
年, 很不正常。

数上看是合理的,但性别比却高达 157.1。如果认为嘉庆二十五年顺天府各县的人口性别比大体如此,并按照 110 的性别比进行修正,嘉庆二十五年顺天府人口可达 326 万。然而,遗憾的是,此数据仍未超过乾隆四十六年的实际口数。假定上文测定的 3.3‰ 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合理的,嘉庆二十五年顺天府人口总数约为 386 万。

光绪八年、九年顺天府的口数更不可信。

光绪《顺天府志》卷 49 记载了光绪八年、九年顺天府分县的户口数。从全府加总的户均口数看,光绪八九年顺天府户均 5 口,极为合理。但县际差异极大,有的县户均接近 10 口,有的县户均不足 3 口。最关键的问题尚不在于此,而在于光绪八年、九年的怀柔、香河、霸县、永清、东安、武清、宝坻、固安、大城等县口数竟然少于乾隆四十六年口数。由于乾隆四十六年数据中,永清、宝坻、大城三县口数多于 1953 年,此可不论,但怀柔等六县人口较一个世纪以前为少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就总数而言,光绪八年、九年顺天府合计有 3385660 口,少于乾隆四十六年口数,让人无法接受。另外,从光绪八年、九年至 1953 年,香河、平谷、顺义、良乡、涿州等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 20‰ 左右,怀柔、昌平、东安、固安等县超过 10‰,大兴、文安、宝坻不足 2‰。民国《文安县志》卷 10《恩恤志》评价说:“按文邑户口向无确数,前清时代各村年造户口清册一次,乡民虚应故事,官府含混呈报,照例文章,究与实数不相符合。民国以来警、政、学各尤以清查户口为入手之端,而人多疑虑,互相隐匿,虽经三令五申,亦难得其真相,盖户籍之法不明,则迁徙无从稽查,生死未入登记,所谓若干户,若干口者,概系约略之词。”由此而言,乾隆以后顺天府的户口数大都是有问题的,是不可信的。

北京城市人口。

韩光辉计算得出乾隆四十六年北京城市(含内城、外城及城属四郊)人口共 98.7 万^①。至宣统二年,京师内外城、京城 24 旗、内

^①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8 页。有的学者将历史时期城市郊区人口当作农村人口,这是不合适的。按照本卷第十七章涉及的城市定义,近郊人口算作城市人口。

务府、京营四郊合计 336116 户^①，依王士达、陈长蘅所定户均口数，约有人口 175 万~182 万，人口增加近 1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4.7‰。宣统二年的北京城市人口调查有着非常详细的分区分类资料，大致可信。韩光辉的研究表明，1948 年，按照旧北京市公安局调查，北京城市人口为 200.6 万。宣统二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8‰~2.9‰。从清代中期至宣统二年北京城市人口的增长情况看，乾隆四十六年的北京城市人口数可能偏低，因为，早在明代末年，北京城市人口的数量就已达到 120 余万。依宣统二年至 1948 年北京城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六年北京城应有人口 124 万，正好达到明代末年北京城人口鼎盛时的规模。1949 年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以后，城市人口迅速发展，1953 年，北京市人口为 276.8 万。统一到标准时点，乾隆四十一年北京城市约 122 万，嘉庆二十五年约为 138 万。

2. 清代后期户口

在上述各省户口数据的讨论中，笔者未对宣统年间的数据做过多的纠缠，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未获足够数量的宣统二年县级数据，以至于无法就这一系统的数据作进一步的分析。就顺天府情况而言，王士达估计顺天府有 692696 户，3734716 口，户均 5.4 口；陈长蘅估计为 700281 户，3654210 口，户均 5.2 口^②。王士达及陈长蘅所估计的宣统二年顺天府口数与本节中估计所得嘉庆二十五年口数相近。如果王、陈两人的估计为真，则意味着从嘉庆二十五年至宣统二年的 90 年间，顺天府的人口停滞不动。从宣统二年至 1953 年，顺天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9.7‰。

韩光辉引用一份名为《顺天府宣统二年统计表》的资料，列出顺天府部分县的宣统二年户数，兹转列于表 8-2，为便于分析，兹将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口数和光绪八年、九年（1882 年、1883 年）的户数及 1953 年人口数一并列入。

利用新的资料
检验宣统二年数
据的真伪。

① 王士达《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附录》，《社会科学杂志》（抽印合订本），1932—1933 年。未加说明的宣统年间新政调查数据，均引自此，不一一注明。

② 有关宣统年间的户口数的讨论，可参见本书第六卷的有关章节。

表 8-2 清代至 1953 年顺天府部分州县户口

州 县	1781 年 口	1882 年、1883 年			1910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通 州	261421	47559	270895	5.7	58923	318184	438303
大 兴	153450	19625	180184	9.2	27196	146858	201410
良 乡	33796	7306	35233	4.8	10974	59260	137568
房 山	64189	11601	79356	6.8	23621	127553	150361
昌 平	100433	21248	120713	5.7	53194	287248	275381
顺 义	81113	19056	84077	4.4	28146	151988	323630
怀 柔	82914	5177	50263	9.7	8632	46613	134762
密 云	72221	16207	116651	7.2	17978	97081	223210
平 谷	29441	7098	39973	5.6	9970	53838	203898
合 计	878978	154877	977345	6.3	238634	1288624	2088523

资料来源：1781 年数据及 1953 年数据据表 8-2；1882 年、1883 年数据据光绪《顺天府志》卷 49；1910 年户数转引自韩光辉《北京城市人口地理》第 118 页，口数据户均 5.4 口估算。

新政调查是一个专门名词。

《顺天府宣统二年统计表》属于什么性质的资料，韩光辉未加说明，外人不得其详。但从资料本身看，应是宣统二年为实施新政而进行的户口调查数，我们将其称为新政调查数。宣统二年的户口调查，除四川等个别省份外，都是户数、口数分开调查的，所以才会出现只有户数不见口数的特殊情况。其他性质的资料中，没有这种情况。1953 年通州等 9 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 35.6%，依此比例，宣统二年应有 67.1 万户，此与宣统年间第二次清查所得 69.3 万户接近。

《顺天府宣统二年统计表》载有顺天府宣统二年府属各县的户数，然韩光辉的讨论局限于今北京市人口，不涉及顺天府属其他州县。韩氏将蓟州、三河、东安、固安等县属于北京市的部分加以讨论，但所列户口数据非完整数据，本文无法引用并加以讨论，只能割舍，此 9 州县户口数是日前笔者所见唯一成片的宣统二年北方地区县级户数，弥足珍贵。兹将各时段的户口增长速度列如表 8-3。

表 8-3 清代至 1953 年顺天府部分州县户口年平均增长率(‰)

州 县	1781—1882 年 口	1883—1910 年 户	1911—1953 年 人口	1781—1953 年 口
通 州	0.3	8.0	7.5	3.0
大 兴	1.6	12.2	7.4	1.6
良 乡	0.4	15.2	19.8	8.2
房 山	2.1	26.7	3.8	5.0
昌 平	1.8	34.6	-1.0	5.9
顺 义	0.4	14.6	17.7	8.1
怀 柔	-4.9	19.1	25.0	2.8
密 云	4.7	3.8	19.6	6.6
平 谷	3.0	12.7	31.5	11.3
合 计	1.0	16.1	11.3	5.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 8-2 统计。

表 8-2 所载 9 县户口数据中,最离奇的可能属于平谷县,宣统二年仅 5 万余人,1953 年增加至 20 万以上,人口增加近 3 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31.5‰。这一数据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光绪年间平谷县口数可能偏低,乾隆四十六年口数也是低估的。由此可见,历史时期平谷县对人口的调查统计,远称不上准确。

光绪年间怀柔县的口数大大少于乾隆四十六年,有作假嫌疑。宣统年间的数字已较光绪年间为合理,但 43 年间,人口增加一倍有余,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5‰,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真实的。

通州、良乡、顺义三县口数较乾隆四十六年虽有增加,但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0.3‰~0.4‰,极低。相反,从光绪三年至宣统二年,三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8‰~15‰,就难以让人相信了。不仅如此,这一增长势头一直保持至 1953 年,良乡、顺义两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 20‰。如果册载数据为真,那么,光绪年间开始的人口增长,动力何在? 光绪年间的数字即为不真,宣统年间的数字又何以为不假?

宣统二年的户口数据存在严重低估。

总之,在顺天府属北京周围的9县中,至少有5县宣统二年的户口数据存在低估,甚至是很严重的低估。作为京畿重地的北京郊区如此,对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户口调查,千万不能作出过高的评价。

二、永平府和遵化州

1. 永平府

兹将乾隆三十八年和1953年永平府分县户口数,列如表8-4。

表8-4 乾隆三十八年和1953年永平府分县户口

州 县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卢 龙	18106	158792	8.8	248492	2.5
迁 安	30887	157634	5.1	499522	6.4
抚 宁	22582	134950	6.0	222973	2.8
青 龙				371378	
昌 黎	34616	189162	5.5	350984	3.4
滦 州	53792	264816	4.9	674480	5.2
乐 亭	32251	169597	5.3	346705	3.9
临 榆	64315	357071	5.6	295584	-1.0
合 计	256549	1432022	5.6	3010118	4.1

资料来源:光绪《永平府志》卷45《赋役志·户口》。

说明:乾隆四十六年昌黎、乐亭和临榆三县灶户、旗户缺载。20世纪30年代划迁安、抚宁二县之长城以北地区设青龙县。

在永平府,乾隆年间的数据质量高于光绪年间。

光绪《永平府志》卷45在记载了乾隆三十八年的分县户口数后,还记载了光绪二年(1876年)的分县户口数据。比较而言,光绪二年分县户口数据的质量远较乾隆三十八年为差。如卢龙县,光绪二年口数少于乾隆三十八年。迁安、临榆两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抚宁、滦州的情况则相反,光绪二年的口数过高,以至于前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过高,而后一阶段的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过低。比较而言,乾隆三十八年的数据要合理得多。

从户均口数这一指标看,在乾隆三十八年的永平府分县户口中,卢龙县的户均口数太高。如以户均5口计,该县从乾隆三十八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6‰。同一时期,迁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4‰。20世纪30年代,划迁安和抚宁二县之长城以北地区设青龙县。如果加上这批人口,迁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应当更高。由于同一时期抚宁县的人口增长速度较低,我猜测青龙县辖境原属抚宁县的要多于迁安县。至于180年来临榆县人口为何不增反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清代中期以前,作为军事的交通重镇的山海关聚集有大量的人口,而近代以来,山海关的军事与交通地位大不如前,其人口的四散自在情理之中。总之,由于缺少充分的理由,无法对乾隆三十八年永平府的口数进行修正。乾隆四十一年,永平府的人口总数约为145万。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永平府户数为111504户,670849口,不及乾隆三十八年永平府口数的一半,完全是错误的。按照4.1‰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永平府约有173.6万。

《嘉庆一统志》所载永平府口数不及乾隆三十八年数的一半。

2. 遵化州

光绪《直隶遵化州志》卷21《经政·户口》称:

乾隆三十七年停止编审之后,每年增除民数于岁底汇总奏报,迨至乾隆五十七年岁底,实在民户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户,男女大小共十三万二千二百九十五丁口(傅志)。同治十一年岁底实存民户二万三千三百七十六户,共男女大小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七名口(州册)。

依此资料,乾隆五十七年遵化州的户均口数为4.9,符合标准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数据是真实的。据《嘉庆一统志》,嘉庆二十五年遵化州户数为109701,口数为702316,户均6.4口。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遵化州人口年平均

户均口数合理也不能证明数据正确。

增长率高达 61.4‰。乾隆五十七年遵化州户口数实为作为纳税单位的“丁”。同治十一年遵化州的户口数竟然与乾隆五十七年大致相同,可见所谓的户口登记或户口调查,在遵化不过是一句空话。

宣统二年遵化州有 166547 户,以户均 5.4 口计,约有 89.9 万。若此数据为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此,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7‰;1953 年遵化府人口多达 230.9 万,从宣统二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2.2‰。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是超乎寻常的。如果扣除唐山市人口,从宣统二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为 13.7‰,可能太高了一点。

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唐山城市的兴起。1953 年,唐山市人口多达 69.3 万,已是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扣除唐山市的人口不计,遵化人口仅有 161.6 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遵化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3‰。扣除唐山市后的遵化州人口增长速度较永平、顺天等府为高,如果不是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低估的话,则可归结为当地工业发展所致。唐山市形成以后,肯定给其郊区及周边农村带来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人口的增加应当高于一般地区。

即使按照 7‰ 的年平均增长率,乾隆四十一年遵化州的口数应达 54 万。

三、宣化府与口北三厅

宣化府和口北三厅皆为明代的军卫驻地,民籍人口甚少,且由军卫带管。清代改卫所为州县,这一区域成为纯粹的民居之地。兹分别叙述如下。

1. 宣化府

乾隆《宣化府志》记载了乾隆年间宣化府分县户数、丁数和口数。兹列如表 8-5。

乾隆年间宣化府的分县户口资料见于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志》,户口资料的实际年份理应早一些。由于记载不详,姑以乾隆二十二年作为标准年份。

宣化府和口北三厅在明代为军卫驻地。

表 8-5 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分县户口

州 县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宣 化	18897	73899	3.9	113.3	333119	7.7
赤 城	6176	22301	3.6	180.6	134116	9.2
万 全	10192	34189	3.4	132.6	364531	12.1
龙 门	3962	15892	4.0	118.6	71691	7.7
怀 来	11007	54883	5.0	128.9	193822	6.5
蔚 州	17544	80663	4.6	117.7	342394	4.9
蔚 县	11291	50315	4.5	118.9		
西 宁	12061	57701	4.8	126.6	168847	5.5
怀 安	9181	44183	4.8	128.4	178558	7.2
延 庆	5421	17110	3.2	128.1	143789	10.9
保 安	6269	24174	3.9	145.4	188570	10.5
合 计	112001	475310	4.2	125.6	2119437	7.7

资料来源：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志》卷10《乡都户口志》。

说明：1953年宣化县户口中包括宣化市，万全县中包括张家口市，蔚县包括蔚州。1953年龙门县称龙关县，延庆州为延庆县，西宁县为阳原县，保安州为涿鹿县。

在乾隆二十二年的宣化府各县中，除怀来、西宁、怀安及蔚州、蔚县外，其余各县的户均口数都显得过低。除宣化县外，其余各县的性别比都显得过高，女性人口均被严重漏记。户均口数和性别比两个指标均严重偏离正常状态，说明这一时期的户口质量不高。与其他地区一样，乾隆中期以前户口数的主要问题是记载偏低，漏载较多。

女性人口严重
漏记。

《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嘉庆二十五年宣化府户数为 162467 户，838537 口，户均 5.2 口。户均口数的正常说明《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与乾隆二十二年数据不是一个系统。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宣化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9.1‰。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宣化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7‰。前一个时期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偏高，如将户均口数调整至 5.1 口，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有 57.1 万口，至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1‰，

至1953年为6.7‰。在无法对乾隆二十二年数据进行全面整理的情况下,姑且认定该年口数为57.1万,按照6.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推测,乾隆四十一年为74.6万。

还可与永乐年间隆庆州、保安州的数字进行比较。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在旧隆庆地视察后,重新建立隆庆州,治今延庆县。朱棣将各地的罪囚约1600余户迁入,大约合5000口。两年以后,又命设保安州,治今怀来县。迁罪囚770户,约合2000余人。不久,政府又组织一批来自山东、山西、湖广的民籍人口迁入保安州,约2300余户,12000人^①。两地迁入的人口共达2万人。明代初年的移民活动只是给人口迁入地提供一个基本的人口,移民之后的隆庆、保安两州人口仍是不多的。在永乐移民迁入后不久,甚至有大量的移民逃回原籍。这一区域的人口发展是不快的。明代末年,有证据表明这一区域遭到鼠疫的袭击,人口大量死亡,因此,清代初年这一区域的人口未必能超过永乐年间。明清时代延庆州、保安州的辖境基本未变,乾隆二十二年两州人口合计只有4.1万人,如以6.1‰回溯至明末清初,仅有人口2万余人。

2. 口北三厅

乾隆《口北三厅志》卷5《村窑户口》共记载了张家口同知、独石口同知和多伦诺尔同知的户数和丁数。记载的格式如下:

张家口同知属共一百二十五村。以上村窑系正黄旗游牧境内,旗户一十九,民户二千三百五十四,铺户二百六十三,通共户二千六百三十六,丁口数阙。

各地户数详见表8-6。

千家店属延庆州巡检管下,共有47村窑,户数缺载。如以村窑数推测,千家店可能有1000户左右,与以上五地合计大约为9000户。从独石口、东卯镇及丁庄子湾等地的“人丁”记载看,其数量大多与户数相当,故可判定此“人丁”为纳税单位,而非人口。根据户均5口的比例推测,张家口及独石口两厅大约有45000人。

^① 详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第339~340页。

表 8-6 乾隆二十三年张家口厅、独石口厅等地户数

地 名	户	地 名	户
张家口同知	2636	东卯镇把总	676
太平庄把总	3436	丁庄子湾把总	328
独石口同知	1075	千家店	

资料来源：乾隆二十三年《口北三厅志》卷5《村窑户口》。

多伦诺尔同知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同一记载称：“多伦若尔同知所管四境系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四旗游牧处所，地界坝外，未经招民垦种，并无村窑聚落，亦无设兵防汛之处。”但这并不是说多伦诺尔没有旗民以外的人口。该志记载“兴化镇”：“康熙四十九年建，又名买卖营，在喇嘛庙南，周围计一十二里，编十三甲。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二里。”街道有新盛街等 13 条。兴化镇实际上已经是颇具规模的市镇，但其人口，并不见册载。又如新盛营，乾隆六年建，又名新营。“在旧营东北里许，同知公署东，乾隆六年因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移回喀尔喀，所遗库伦相随贸易商民移建于此，周围计三里，分编五里。南北长一里，东西广半里。”街道有柔远街等 5 条。新盛营的规模较兴化镇为小，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商民聚集。只是镇中商民也不见于户口册的记载。

从镇的规模来看，兴化镇和新盛营合计有万人左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加上牧民，乾隆二十三年口北三厅的人口可能达到 8 万人左右。1953 年，口北三厅人口合计为 25.3 万，近 200 年间这一区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5.9‰。

这一区域的移民人口主要集中在张家口厅和独石口厅境内，是因为张家口和独石口处于农区北沿，农耕活动有可能获得规模性的发展。多伦诺尔厅辖境是牧区，缺乏大规模发展农耕的可能。从这一角度看，张家口厅和独石口厅的人口增长速度稍高于多伦诺尔又是可能的。以 6‰ 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乾隆四十一年口北三厅大约有 9 万人口，嘉庆二十五年大约有 11.7 万人口。《嘉庆一统志》未有口北三厅户口记载。

《嘉庆一统志》
缺口北三厅的户
口记载。

四、承德府

康熙年间因建避暑山庄于热河,此地开始成为清代重要的政治及文化中心。雍正元年(1723年)于此置厅,后改为直隶州,乾隆七年(1742年)升为府。光绪末年,从承德府中析出朝阳府和赤峰直隶州。光绪十三年《承德府志》卷23《田赋·户口》记载了朝阳府和赤峰州析出前承德府的分县户口数,列如表8-7。

表8-7 乾隆四十七年和道光七年承德府分县户口

县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道光七年(1827年)			年平均增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府直辖	8979	41496	4.6	16339	110171	6.7	21.9
滦平	5230	106630	20.4	6914	45769	6.6	-18.6
平泉	29315	154308	5.3	20449	158055	7.7	0.5
丰宁	20871	72079	3.5	22198	115973	5.2	10.6
建昌	23730	99293	4.2	31996	163875	5.1	11.2
赤峰	6324	22378	3.5	14999	112604	7.5	36.6
朝阳	15356	61220	4.0	31751	77432	2.4	5.2
合计	109805	557404	5.1	144646	783879	5.4	7.6

资料来源:光绪《承德府志》卷23《田赋·户口》。

光绪《承德府志》所载道光七年户口数实为嘉庆二十五年数。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承德府户数为144646,口数为783867。户数与口数几乎完全与表8-7所载道光七年数据相同。由此可见,光绪《承德府志》所载道光七年的承德府分县户口应为嘉庆二十五年数,分县户口的加总即全府户口数。

在乾隆四十七年的数据中,滦平县的户均口数最令人生疑。该县户数仅有数千,而口数则达10万。嘉庆二十五年滦平县的户数升至6914,口数却降为45769,出现负增长。1953年滦平县人口为159409,乾隆四十七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如果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为真,从嘉庆二十五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4‰。乾隆年间滦平县的口数可能太高,嘉庆年间的口数又可能太低。

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赤峰县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当高,可能是大量移民入迁所造成。如果说至乾隆四十七年,承德一带的人口迁入已经大体完成的话,嘉庆年间,则是赤峰一带移民入迁的主要时期。1953年,赤峰县人口约达30万,嘉庆二十五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4‰,比同时期宣化一带的人口增长速度略高。这一增长速度是可信的。

朝阳区也是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地区,然而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增长率却不高。究其原因,在于嘉庆二十五年口数偏低,以至于户均只有2.4口,以户数计,38年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9.3‰。如果将嘉庆二十五年户均口数调整为5,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5.4‰。1953年,清代朝阳区辖境人口多达924560(含朝阳区和北票县),嘉庆二十五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3‰。朝阳区人口的高速增长是大量移民迁入的结果。正是由于人口持续地增长,才使得近代以来这一区域不断增设新县,光绪末年设朝阳府,以便政府更有效地进行管理。

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承德府府辖地的人口增长也可能是真实的。承德设府之后,作为巡幸之地的承德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进而成为北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之一。在38年时间里,这里的人口获得成倍的增长,并不是不可能的。

同一时期丰宁县和建昌县人口的高速增长也是大量移民迁入所致。1953年,清代的丰宁和建昌已经析成丰宁、隆化、凌源、建昌和建平县的一部分,合计人口为114万人左右。从嘉庆二十五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6‰。

相比而言,从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平泉县的户数减少,口数略有增加。这一数据是有问题的。1953年,清代的平泉县分为平泉县、宁城县和建平县的一部分,从乾隆四十七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6‰。依此速度,嘉庆二十五年平泉县人口至少应达21.4万。

对滦平、平泉、朝阳三县口数进行修正以后,嘉庆二十五年承德府的口数可以增加20万左右。同年承德府总人口可能达到98万。至1953年,承德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7‰。外来移

移民迁入导致人口增长,清代中期以后承德府的人口数据是可信的。

民在承德府人口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乾隆四十七年滦平县的口数进行修正后,承德府的总口数略有减少。乾隆年间正值承德府移民迁入的主要时期,故以 10‰ 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50 万人。

五、保定府、天津府与河间府

1. 保定府

乾隆二十七年《束鹿县志》卷4《田赋·赋役》中记载全县户数为 39470,口数分为男女,其中男 101768 丁,女 75846 口,共 177614 丁。女性人口的漏记是显然的。如果性别比大致平衡的话,束鹿县大约有 20 万人口,约户均 5 口。

嘉庆《束鹿县志》卷4《田赋》记载嘉庆元年(1796 年)束鹿县共实在牌民 50471 户,共计男妇大小 240280 口。同治《束鹿县志》卷3《田赋类·户口》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 年)有 332840 名口。又称:“咸丰年间增减之数所差无几,及至同治七年,捻逆之乱,死绝逃亡,不可胜计。乱定后编查户口,有二十九万四千一百八十五名口。近数年来休养生息,又渐繁盛。十年编查共有三十一万五千五百三十四名口。”光绪《束鹿县志》卷5《户口》所记光绪初年口数与同治十年相同,光绪十年至三十一年口数降至 26 万左右。束鹿县的政区未变,1953 年全县人口为 362213。

如果嘉庆元年束鹿县人口的性别比是正常的话,从乾隆二十七年至嘉庆元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5.5‰。这一人口增长速度大体是正常的。及至道光三十年,束鹿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增至 5.9‰,令人怀疑道光三十年的人口数可能高估。如以同治十年的编查数为准,从嘉庆元年至同治十年,束鹿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3.6‰。这一增长率与华北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速基本相同。光绪年间束鹿县的人口下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往东北的移民可能导致人口的外迁,但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则是不可想象的。排除光绪年间的数字不计,从同治十年至 1953 年,束鹿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7‰。

如果不考虑咸丰、同治及光绪年间的人口波动,从嘉庆元年至

1953年,束鹿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一个半世纪中,束鹿县人口的增长是相当缓慢的,其原因既与捻军战争有关,也可能与人口外迁有关。于此同时,直隶口外人口及东北人口在外来移民的刺激下,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光绪《定兴县志》卷3《赋税·户口》称乾隆四十三年“民丁”和“卫丁”共有21505户,男女共94127口。道光年间,男妇大小口已达166499口。由于原书漫漶,字迹不清,故究竟为道光何年,并不清楚。如果为道光三十年数据的话,从乾隆四十三年至此,定兴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9%。如果此数据为道光中期的话,此期间的人口增长速度更高。

同书记载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册载民户24177户,人丁122758口,较道光年间大幅减少。光绪九年布政司册人丁也只有123940口,与同治十二年的数据属于同一系统。1953年定兴县人口数为306371,同治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5%,可见同治、光绪年间数据的不确。从道光三十年至1953年,定兴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9%,如果将道光年间的数据定为道光中期,至1953年定兴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还要低一些。这一增长速度,虽较束鹿县为高,但大体上仍是可信的。

民国《望都县志》卷3《建置志·户口》载乾隆二十年有男20752名,女子16792口,合计为37544口。光绪五年15175户,男妇共64754口。1953年望都县人口有165410。从乾隆二十年至光绪五年,望都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6%,而从光绪六年至1953年则为12.7%。正如我在本卷中不断强调并为各地数据不断证实的,一般说来,乾隆二十年的户口数据都是偏低的。光绪年间的数字也是如此。望都县的情况不会例外。尽管从乾隆二十年至光绪五年望都县的人口增长速度符合我对这一时期人口增长规律的认识,但却不能作为本文观点的可靠证明。

对于保定府所属16县来说,只有两县的数据可供讨论实在是太少了一点。这两县数据表明从清代中期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左右。而根据《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有170.5万。至1953年,保定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6.3%。

向口外及东北地区的移民,对于华北平原的人口变动产生深刻影响。

《嘉庆一统志》所载保定府口数偏低。

根据保定周边的情况判断,我更相信根据此两县数据作出的推测是正确的。也就是说,1953年保定府人口为391.8万,嘉庆二十五年可能为230.4万,根据同一增长率回测,乾隆四十一年保定府有人口193.2万。

2. 天津府

《嘉庆一统志》载天津府户数为370152,口数为1600822,户均4.3口。1953年天津府人口达474.5万,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2‰。天津府人口的高增长实由天津城市的发展所引起,如果扣除天津城市人口,1953年天津府只有205.1万人口,嘉庆二十五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这一数值似乎略嫌偏低。

天津府的人口
高增长与天津城
市发展有关。

民国《青县志》卷6《经制志·赋役篇》称嘉庆七年编审民户60062户,男女大小合计260017,户均4.3口,性别比106。与《嘉庆一统志》所载全府的户均口数比较,青县户口数据与《嘉庆一统志》属同一系列。问题并不在此,1953年青县人口数为206403,大大少于嘉庆七年数。从这个角度讲,嘉庆二十五年天津府的户口数似乎有高估之嫌。

咸丰《庆云县志》卷2《赋役·户口》称嘉庆十三年庆云县有民户12968,丁口65141,户均5口,也是合乎标准形态的。然而,1953年庆云县人口多达179704,将近一个半世纪中,庆云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庆云县的人口增长与青县的人口减少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没有得到更多资料的情况下,暂不对嘉庆二十五年天津府的户口数进行修正。

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来源主要为河北省,并以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居多。考虑到这一因素,天津府的人口增长速度还可以估计得更高一些。从这一思路出发,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天津府的人口数约为134.3万。

3. 河间府

在河间府属县中,唯有景州的数据可资分析。民国《景县志》卷3《户口》记载乾隆七年十二月,知州屈成霖按户清查,共户40160,男口93842。如果加上女口,在籍口数可能达到17万。光

绪初年,景县户数为 38174,口数为 206154。1953 年景县人口数为 330428。乾隆七年至光绪初年景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4‰,光绪初年至 1953 年则达 6.1‰。光绪年间的统计多不可靠,可忽略不计。从乾隆七年(1742 年)至 1953 年,景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2‰,与华北地区一般状态下的人口增长水平相似。

乾隆七年景州知州即按照中央政府关于户口调查的精神,对辖区内的全体人口进行调查,是很少见的。景州知州屈成霖虽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对全体男性人口进行了调查统计,以至使我们能够据此推算当时的全体人口。从这个角度看,乾隆七年景州的户口调查虽然是不完全的,但确又是最好的。

乾隆七年景州的户及男口数据是可靠的,这是不可多见的例外。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河间府有 315143 户,1615955 口,户均 5.1 口。1953 年河间人口为 3091163 人。133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9‰。这一数值虽较景州为高,但仍属合理的范围。依此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河间府人口数约为 130.3 万。

六、冀州、赵州和大名府

1. 冀州

乾隆十二年《冀州志》卷 4《赋役》记载所属各县乾隆十年(1745 年)的户口数,详见表 8-8。

表 8-8 乾隆十年和 1953 年冀州分县户口

县名	乾隆十年(1745 年)			1953 年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冀州	63416	112525	1.8	260455	4.0
新河	3742	26764	7.2	99912	6.4
枣强	30950	155869	5.0	261648	2.5
武邑	35220	90304	2.6	201768	3.9
衡水	18782	62005	3.3	161717	4.6
南宫	63416	112525	1.8	282186	4.4
合计	215526	559992	2.6	1267686	3.9

资料来源:乾隆十年户口数来自乾隆《冀州志》卷 4《赋役上》。南宫县数据引自民国《南宫县志》卷 7《法制志·赋役篇·户口类》。

州志与县志记载的数据不一致。

在乾隆十年的数据中,冀州本州的户均口数不足 2 人,如果按户均 5 口处理,则大大超过 1953 年。据此,我以为乾隆十年冀州本州户口数错在户数而非口数。民国《冀县志》卷 2 称乾隆十年编户 48373,口 128910。同为乾隆十年,户数大大降低,人口却有所增加。如果按这一口数计算,至 1953 年,冀州本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4‰。

新河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户数的低估造成了户均口数的高估。然而,乾隆十年新河县的口数也未必准确。民国《新河县志》下编《社会经济》中记载乾隆五十五年户数为 31353,人口为 69234。道光年间户数下降至 13460,口数增加至 73999。乾隆五十五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3‰。若道光数据为道光中期,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 2.8‰。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大致相当。所以,我以为乾隆十年新河县数据偏低。

枣强县口数的高估导致《嘉庆一统志》中数据严重高估。

武邑及衡水两县的户数都有可能高估,只有枣强的户均 5 口最符合标准形态。然而,枣强的正确并未维持多久,在光绪《枣强县志》补正卷 1《户口》的记载中,嘉庆八年及以后,枣强的男妇大小一直维持在 35 万左右,大大超过 1953 年的枣强人口。枣强县或其他县人口的高估,造成《嘉庆一统志》中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冀州人口的严重高估。具体数据详见表 8-9。

南宫县的数据来自县志。民国《南宫县志》卷 7 记载了乾隆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和六十年及以后各朝代若干年份的户口数。乾隆十年数见表 8-8,乾隆二十年户数无甚变动,但口数增加至 144330。最让人惊讶的是乾隆四十年,户数减少至 46444,口数却增至 271250,与 1953 年人口数接近,是不可信的。嘉庆及嘉庆以后,南宫县口数长期维持在 22 万~23 万之间,明显是伪造的。相对而言,倒是乾隆十年或二十年的口数可信,户数却无法利用。

综合计之,从乾隆十年至 1953 年,冀州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9‰,与华北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相似。这也就是说,乾隆十年冀州的分县户口,并不如其他地区那般存在低估,可以看作真实人口的反映。这一现象是罕见的,却也是可能的。在景州,我们曾见到过相似的情景。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冀州口数为 1289218, 超过 1953 年, 显然是错误的。即使不对新河县低估的口数进行修正, 仍按照 3.9‰ 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 乾隆四十一年冀州口数约为 63.2 万, 嘉庆二十五年约为 75 万。

2. 赵州

在赵州, 隆平县的数据表明, 乾隆中期以前的户口数是偏低的。乾隆二十八年《隆平县志》卷 3《田赋志·户口》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 年)有 12573 户, 男妇大小 56989 名。1953 年隆尧县(即隆平县)人口数为 235246, 乾隆二十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7.2‰。《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赵州人口数为 766999, 1953 年赵州人口为 1153053, 133 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1‰。如果同一时间隆平县的人口增长速度与此相同, 则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 15.6 万人, 乾隆二十年至此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5.6‰。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 乾隆二十年隆平县人口数是不确切的。

迄今未发现赵州其他属县的户口资料。就全州情况而言, 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赵州人口增长速度与华北大多数地区的情况类似, 据此设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赵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稍高一些, 为 3.5‰, 推得乾隆四十一年全州人口约为 65.8 万。

3. 大名府

嘉庆十五年《长垣县志》卷 7《田赋书·户口》记载乾隆三十六年有 205119 口, 四十一年有 258935 口, 以后又记乾隆六十年、嘉庆三年、嘉庆十三年等年的户口数, 嘉庆十三年口数为 317988。又查得同治《增续长垣县志》卷上《户口》, 共记载嘉庆十四年至同治十一年历年的户口数, 嘉庆十四年口数为 312312。在绝大多数年份中, 户数、口数变动的只有个位和十位数, 其他数据均不变。人工编造的痕迹极其明显。

嘉庆十四年以后的户口数为编造数, 我们可不加理会。就嘉庆十四年以前数据论, 各时段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6‰~7‰, 增长速度偏高, 令人怀疑其户口数的编造可能在嘉庆十四年以前

数据伪造的痕迹很容易发现。

就开始了。1953年长垣县人口为407688,乾隆四十一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大名府口数为1964872,1953年人口数为2663422,133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很明显,乾隆四十一年长垣县的户口数与《嘉庆一统志》所载属于同一系列。

东明县的例子有助于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民国《东明县志》卷7《丁户》记载,乾隆二十年有20867户,198887丁,其中男109896,女88991。光绪二十四年境内共820余村,4633牌,46339户,男女大小丁口286900有奇。乾隆二十年东明县男女性别比为123.5,女性人口有漏记。光绪二十四年每牌约为10户,每户6.2口。正因为每牌户数过于齐整,所以每户人口偏多也就可以理解了。户籍管理者可能会因为照顾到牌的完整性而使得户的规模扩大,即出现分家以后仍合于一“户”的情况。1953年东明县人口数为387761。从乾隆二十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乾隆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为2.6‰,此说明东明县的户口数据与《嘉庆一统志》所载属同一系列。光绪二十四年以牌为单位的户口登记大体是准确的。从光绪二十四年至1953年,东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5‰。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人口增长加速可能与黄河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系。

以《嘉庆一统志》所载为准,以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大名府有人口172.2万。

七、其他府州

在直隶各府、州中,尚有易州、定州、深州三州及正定、顺德和广平三府的情况不甚清楚。从表8-9中看,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易州、定州及深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在8‰左右,正定府也达7.3‰,顺德和广平两府分别只有2.3‰和4.7‰。

先谈易州。光绪《广昌县志》卷6《户政略·丁银》记载了乾隆三十七年以后历年的口数。正因为有每一年的口数,使人相信这些口数不是调查所得,而是胥吏们的纸上操作。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广昌县(今涞源县)口数均为三万七千余,乾隆四十年至

四十七年,皆为三万六千余,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一年,又恢复至三万七千余,以后历年有缓慢的增加。广昌县数据的作假是显而易见的。

1953年涞源县人口为145120,乾隆三十七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5‰。嘉庆二十五年易州口数为220952,1953年为656122,133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2‰。看来,光绪《广昌县志》中的数据与《嘉庆一统志》所载是一个系列。事实上,易州地域甚小,除本州外,只辖有广昌和涞水两县。广昌县人口的低估,势必会对全州的人口产生很大的影响。嘉庆二十五年易州人口的低估可以从广昌人口的低估中得到解释。另外,尽管我们没有得到广昌县乾隆三十七年以前的数据,但我推测广昌县口数的作伪可能早于乾隆三十七年。基于这一考虑,乾隆三十七年数据也是无法利用的。

按照3.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易州口数应为41.2万;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约为34.6万。

行文至此,我相信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定州、深州和正定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可能达到表8-9中所载之水平。本节按照易州的模式理解上述三地的户口,并依此模式对三地嘉庆二十五年口数进行修正,并对三地乾隆四十一年口数进行推测,结果亦见表8-9。

表8-9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1953年直隶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人 口	比例(%)	人 口	比例(%)	人 口	比例(%)
顺天府	198.7	11.5	386.0	17.6	823.6	19.6
宣化府	74.6	4.3	83.9	3.8	211.9	5.1
永平府	145.0	8.4	173.6	7.9	301.0	7.2
保定府	193.2	11.2	230.4	10.5	391.8	9.3
易 州	34.6	2.0	41.2	1.9	65.6	1.6

续表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人 口	比例(%)	人 口	比例(%)	人 口	比例(%)
遵化州	54.0	3.1	70.2	3.2	230.9	5.5
赵 州	65.8	3.8	76.7	3.5	115.3	2.8
定 州	53.2	3.1	63.4	2.9	100.8	2.4
深 州	44.7	2.6	53.3	2.4	84.8	2.0
冀 州	63.2	3.7	75.0	3.4	126.8	3.0
天津府	134.3	7.8	160.1	7.3	474.5	11.3
河间府	130.3	7.6	161.6	7.4	309.1	7.4
正定府	175.2	10.2	208.9	9.5	332.4	7.9
顺德府	83.5	4.9	95.2	4.3	129.0	3.1
广平府	98.4	5.7	122.5	5.6	227.5	5.4
大名府	172.2	10.0	196.5	8.9	266.3	6.4
合 计	1720.9	100.0	2198.5	100.0	4191.5	100.0
口北三厅	9.0		11.7		25.3	
承德府	50.0		98.0		597.0	

说明：顺天府人口包括北京市人口，天津府人口包括天津市人口。

《嘉庆一统志》所载各府口数，有的存在明显的大量的高估，有的则存在明显的大量的低估。对明显错讹的一批户口数修正之后，此133年间直隶各府人口的增长变得井然有序。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为承德府、遵化州、顺天府和天津府。承德府的人口高速增长，是因移民所致。遵化、顺天和天津三府州的人口较快增长，是近代城市化、工业化的结果。其他各府的人口增长，体现的是农业社会的特征，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2‰~4‰之间。

《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口数为2056.7万，明显高于表8-9所作估算。《户部清册》所载乾隆四十五及四十五年以后口数为2153万~2483万，与《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为一个系列。嘉庆十七年，《户部清册》口数高达2799万，嘉庆二十四年，突然降至2032万，然较《嘉庆一统志》所载仍多出123万。此后，直隶的口数在嘉庆二十四年数的基础上变化。由于存在较为严重

的胡编乱造,所以,上述各种文献所载直隶口数都是不准确的。

第二节 河 南

一、豫北地区

1. 卫辉府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卫辉府分县户口和1953年人口数,见表8-10。

表8-10 乾隆五十三年和1953年卫辉府分县人口

县 名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
	户	口	户均口数		
考 城	25501	89901	3.5	242592	6.0
新 乡	30085	150885	5.0	389981	5.8
辉 县	23749	135350	5.7	320226	5.2
汲 县	21410	108458	5.1	200399	3.7
延 津	28315	86447	3.1	251441	6.5
获 嘉	20568	104487	5.1	200112	3.9
浚 县	49030	217576	4.4	331773	2.6
淇 县	8614	53756	6.2	117637	4.8
滑 县	76144	673892	8.9	674076	0
封 邱	28048	111994	4.0	337617	6.7
合 计	311464	1732746	5.6	3065854	3.5

资料来源:乾隆五十三年数据引自乾隆《卫辉府志》卷18《户口》。

说明:1953年新乡县人口中含新乡市人口。

分县而论,乾隆五十三年考城县、延津县和封邱县的户均口数偏低,因此,从乾隆五十三年至1953年,此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显得偏高。乾隆五十三年滑县户均口数太高,竟达每户8.9口,以至于与1953年的人口数相同。按照户均5口的规模进行修正,乾隆五十三年滑县口数约38万,册载口数较实际口数多出

在与1953年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乾隆五十三年数据的真伪。

29.3万。由于考城等三县户均口数存在低估,就全府计,册载人口较实际人口之间的差距是不大的。

以每户平均5口计,乾隆五十三年卫辉府有人口约155.7万。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卫辉有350094户,1519765口,户均仅4.3口。如果以户的增长速度计,从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年平均增长率为3.7%。两个时段的户口增长速度大致是吻合的。如此看来,《嘉庆一统志》中卫辉府口数是低估的。嘉庆二十五年卫辉府的实际人口约为175万。以3.7%此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卫辉府人口约为148.8万。

2. 彰德府

彰德府乾隆五十二年户口及1953年人口数,见表8-11。

表8-11 乾隆五十二年 and 1953年彰德府分县户口

县名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安 阳	62439	249756	4.0	430132	3.3
汤 阴	18855	101075	5.4	279537	6.1
林 县	31200	43500	1.4	485256	14.6
内 黄	23022	92088	4.0	333739	7.8
武 安	37427	76432	2.0	364421	9.5
涉 县	4241	31512	7.4	193741	11.0
临 漳	38091	83108	2.2	267003	7.1
合 计	215275	677471	3.1	2353829	7.5

资料来源:乾隆五十二年数据引自乾隆《彰德府志》卷11《田赋·户口》。

从县志中发现
府志的错误。

从表8-11中所载分县户口来看,至少有林县、武安、临漳三县因户均口数过低而导致从乾隆五十二年至1953年人口增长速度过高。民国《林县志》卷1《地理志·户口》引乾隆《林县志》称,乾隆十六年编查共550村,户26841,男66442,女55945,合计人口122387,户均4.6口。按同一比例,乾隆五十二年林县人口约为14.4万,超出乾隆《彰德府志》所载人口10万有余。乾隆《彰德

府志》漏记了 10 万人口。涉县的户均口数虽然高达 7.4 口,但从乾隆五十二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11‰,由此可见,乾隆五十二年涉县的户数和口数都是偏低的。

将涉县以外六县户均口数定为 5,则有人口 105.5 万。按照 1953 年涉县在全府人口中所占比例,可推得乾隆五十二年涉县人口大约为 9.4 万,是年彰德府人口总数约为 114.9 万。从乾隆五十二年至 1953 年,彰德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3‰。《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彰德府户数为 285040,口数为 1367793,户均 4.8 口。从乾隆五十二年至此,彰德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3‰,据此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彰德府人口总数约为 108.6 万。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彰德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

3. 怀庆府

乾隆《怀庆府志》载有乾隆五十二年怀庆府分县户口数,兹与 1953 年数据并列于表 8-12。

表 8-12 乾隆五十二年 and 1953 年怀庆府分县户口

县名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1953年		年平均增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河内	70049	401573	5.7	25.5	392503	20.4	-0.1
修武	22482	147580	6.6	9.4	254161	13.2	3.1
原武	11988	74125	6.2	4.7	310100	16.1	3.9
阳武	16046	88271	5.5	5.6			
武陟	28927	276170	9.5	17.5	300396	15.6	0.5
温县	24244	195724	8.1	12.4	193174	10.1	-0.1
孟县	50514	210587	4.2	13.4	206689	10.8	-0.1
济源	35296	181393	5.1	11.5	263485	13.7	2.1
合计	259546	1575423	6.1	100.0	1920508	100.0	1.1

资料来源:乾隆五十二年数据引自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卷8《田赋·户口》。

说明:

[1] 1953年河内县即沁阳县,其中含有1927年分立之博爱县人口。

[2] 1953年修武县人口中含有焦作工矿区人口,焦作于1949年析修武县而设。

[3] 1949年原武县、阳武县合并为原阳县。

由于受到光绪三年大灾的影响,河内、武陟、温县、孟县四县1953年的人口均与乾隆五十二年相近。修武、原武、阳武及济源四县则不相同,166年间人口数表现出稳定的增长。从地理位置上看,修武、原武和阳武三县均地处怀庆府东部,与光绪大灾中心区相距遥远,光绪大灾对此三县影响不大,尤其对于原武和阳武两县,则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将原武、阳武两县此166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3.9‰视作光绪三年以前怀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怀庆府口数为1802761,乾隆五十二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两个数据是如此吻合,证明这一分析方法是可行的。据此,乾隆四十一年怀庆府人口约为150.8万。

二、豫中地区

1. 河南府

乾隆四十年河南府分县户口数和1953年人口数,列于表8-13。

仔细分析,乾隆四十年分县数据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据民国《巩县志》卷5《大事记》的记载,光绪三年的大灾对该巩县影响甚深,人口死亡甚众。然而,从乾隆四十年至1953年,巩县口年平均增长率竟高达7.2‰,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与1953年相比,巩县人口在全府人口中所占比例偏低。不仅如此,民国《巩县志》卷3《户口》记载乾隆五十三年版籍户为16847,口为73864。无论是户数还是口数,较乾隆四十年数都要低。这一数据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反过来却让人推测,乾隆四十年巩县户数、口数也有可能是低估的。正确的数据可能存在于乾隆四十年以前某个年份中,只是这一年份的数据已经佚失。

乾隆四十年永宁县的口数是不可靠的。是年永宁县口数超过了1953年,在河南府的所有各县中,这是唯一的。错误的原因在于户均口数的高估,如以每户5口计,乾隆四十年永宁县人口仅有15万余,较册载数减少9万左右。如此,从乾隆四十年至1953年,永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2.3‰。

户均口数过高
导致乾隆四十年
永宁县人口超过
1953年人口。

表 8-13 乾隆四十年和 1953 年河南府分县户口

县 名	乾隆四十年(1775 年)				1953 年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 口数	口比例 (%)	人口	比例(%)	
洛 阳	47753	246168	5.2	17.1	617615	18.7	5.2
登 封	32276	132154	4.1	9.2	274468	8.3	4.1
巩 县	21188	108591	5.1	7.5	390332	11.8	7.2
孟 津	9646	61254	6.4	4.3	141205	4.3	4.7
偃 师	22442	118077	5.3	8.2	285744	8.7	5.0
伊 川					318518	9.7	
嵩 县	42493	171138	4.0	11.9	342095	10.4	3.9
滎 池	19825	92168	4.6	6.4	173933	5.3	3.6
永 宁	31136	248645	8.0	17.2	234826	7.1	-0.3
宜 阳	39126	184471	4.7	12.8	278955	8.5	2.3
新 安	15176	77582	5.1	5.4	241228	7.3	6.4
合 计	281061	1440248	5.1	100.0	3298919	100.0	4.7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年户口数来自乾隆《河南府志》卷 25《户口志》。

说明：

[1] 1953 年洛阳县人口中包括洛阳市人口。

[2] 1947 年析嵩县、卢氏两县设栾川县，故将 1953 年栾川县人口的半数列入嵩县。

[3] 清代的永宁县即 1953 年的洛宁县。

乾隆四十年新安县户口数同样令人生疑。民国《新安县志》卷 3《财赋·户口》称：“丁丑奇荒，尸横遍野，或居家逃异地就食，或满门饿毙，户口已减去十分之六七。”这一说法来自同书同卷引《侯文梁公日记》，“光绪三年大灾，七月经江浙义赈局调查户口，除死之外，实在住户”8973 户，50894 口，较同治末年户少 41214，口少 168581。然而，与 1953 年人口数相比，光绪三年七月江浙义赈局调查户口数偏少。因为，从光绪三年至 1953 年的 76 年间，新安县人口不可能增加 3 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可能达到 20.6‰。据此资料，同治末年新安县户数应为 50187，口数应为 219475。与 1953 年数字相比，这一数据是大体可信的。与此前的数据相对

照,乾隆四十年新安县户口数则是太低了。如按4‰的年平均增长率调整,乾隆四十年新安县应有人口14.8万,较册载数增加7万左右。

其他各县乾隆四十年的人口数是否就是正确的呢?以孟津县为例,嘉庆《孟津县志》卷4《贡赋·户口》记载嘉庆二十年清查保甲,实编户11842,男妇大小74590名口。从乾隆四十年至此,孟津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9‰,与乾隆四十年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相似。由此可见,乾隆四十年孟津县的户口数据是正确的。

永宁县和新安县的低估人口与高估人口大致可以相互抵消,再加上巩县被低估的人口,乾隆四十年河南府的实际人口大约为147万。《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河南府人口数为171.1万,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河南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河南府的这一人口增长速度与豫北地区相似。

2. 开封府

乾隆《杞县志》卷7《田赋志·户口》所载乾隆年间历年的户口数,在很大程度上是胥吏们的笔下文章:每年的户数和口数只是在头一年的基础上略有增加。我注意到乾隆四十一年户数与前一年无甚变化,但口数却从278810猛增至307458,以后每年的口数又在这一基础上略有增加。据此,我相信乾隆四十一年杞县口数可能是正确的。1953年杞县人口为487128人,乾隆四十一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这是一个比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与上述诸府同期的人口增长水平差异不大。

民国《鄢陵县志》卷10《政治志·户口》记载乾隆三十六年烟户24342,男妇122236名口,乾隆四十一年户数为31205,口数为165254,嘉庆十二年户数为33505,口数为189071。乾隆四十一年户口数的突然增加,可以看作统计口径变化所引起的在籍人口增加。1953年鄢陵县人口为315794,从乾隆四十一年至1953年,鄢陵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与河南等府的水平相当。而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十二年,鄢陵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3‰。

禹县的情况可作为一个反例。在民国《禹县志》卷2《大事记》

乾隆四十一年户口数的突然增加,可以看作是统计口径的变化所引起。

的记载中,乾隆九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口数几乎年年均有。仔细读来,历年的户口数几乎都是在前一年数据基础上的些许增加,不像是真实的人口记载。作为证明,乾隆四十一年禹县口数为215852,1953年为651304,177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3%。乾隆四十一年禹县口数是低估的。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开封府口数为3427660,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从鄢陵县的情况也可看出,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开封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为4%左右。如此,乾隆四十一年开封府约有人口287.6万。

迄今未获乾隆年间归德府、陈州府、许州^①、汝州四地任何一县的户口资料。因此,类似的分析无从进行。从表8-15所揭资料来看,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四府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除汝州略高外,其他三地大体相同。按照4%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四地人口数分别见表8-15的有关栏目。

三、豫南地区

1. 南阳府

尽管迄今未获乾隆年间南阳府的分县数据,但是,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南阳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2%的事实暗示着南阳府的人口数据可能存在问题。乾隆《唐县志》卷4《赋役志·户口》称,乾隆三十七年奉上谕,“嗣后编审之例永行停止。自三十七年至五十一年每年造报民数,抚宪专折奏报开列于后”。其行文的格式是“乾隆三十七年阖县户口人丁”云云。

在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若干年份的“户口人丁”中,乾隆三十八年及乾隆四十一年的人丁数出现了“跳跃”,据此可知乾隆四十一年的人丁是某种统计口径改变的结果。这一年唐县(即唐河县)“丁”数为224716,假定此为全体人口,1953年唐河县人口

^① 道光《许州志》卷3《籍赋·户口》记载道光十六年各县的征赋人丁额,而非户口。何以道光年间仍有征赋人丁?笔者疑为乾隆初期“丁”额之照抄。该志又曰:“现在牌民多至十余万户”,远低于嘉庆二十五年27.4万户的水平,是为谬误。

数为 787491,乾隆四十一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7.1‰。《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南阳府口数为 2316877,至 1953 年南阳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8.2‰。由此可知,嘉庆二十五年南阳府的“口”实际上就是与唐县记载中相同的“丁”。鉴于南阳府“丁”的年平均增长率远远高于豫中区和豫北区,所以,我认为南阳府的“丁”其实是男性人口。乾隆三十七年以后,作为“户口”统计的“人丁”与作为纳税单位编审的“人丁”有了本质的区别。

《嘉庆一统志》中所载南阳府的口数实为男性人口。由此可见,对于《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不可不认真鉴别。

按照 110 的性别比进行调整,嘉庆二十五年南阳府的人口总数约为 421.3 万。至 1953 年,南阳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7‰,与上述各府的人口增长速度基本相同。以 4‰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南阳府人口约为 353.4 万。

2. 汝宁府

嘉庆《汝宁府志》载有乾隆六十年分县户口,兹将其与 1953 年分县人口列于表 8-14。

表 8-14 乾隆六十年和 1953 年汝宁府分县户口

县名	乾隆六十年(1795年)				1953年		年平均增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信阳	58377	294806	5.1	16.1	568889	12.9	4.3
确山	28840	137686	4.8	7.5	353057	8.0	6.1
遂平	27702	192161	6.9	10.5	352886	8.0	3.9
西平	23920	153439	6.4	8.4	457266	10.3	7.1
上蔡	49844	194425	3.9	10.6	635440	14.4	7.7
汝阳	58117	290571	5.0	15.8	900674	20.3	7.3
新蔡	24947	166198	6.7	9.1	490335	11.1	7.0
正阳	19980	106826	5.3	5.8	361473	8.2	7.9
罗山	59709	297906	5.0	16.2	306911	6.9	0.2
合计	351436	1834018	5.2	100.0	4426931	100.0	5.7

资料来源:嘉庆《汝宁府志》卷8《户田·户口》。

说明:1953年信阳县人口中含有信阳市人口,汝阳县(即汝南县)人口中含有平舆县人口,确山县人口中含有驻马店市人口。

在汝宁府各县乾隆六十年的人口中,唯有罗山县的数据令人怀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罗山县的数据都是高估的。如果将乾隆六十年罗山县数据加以修正,则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汝宁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将高于5.7‰的水平。事实上,在表8-15中,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汝宁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2‰,就包含了对罗山县人口的修正。

以此增长率回溯,乾隆六十年汝宁府人口总数约为165.8万,较嘉庆《汝宁府志》所载要少17.6万。或许可以说,乾隆六十年罗平县实际人口要比册载人口少17.6万,即仅有12.2万。以此数据为准,从乾隆六十年至1953年,罗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考虑到信阳、遂平两县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偏低,推测此两县乾隆六十年口数也存在高估的可能。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则此155年间汝宁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达到7‰,乾隆六十年汝宁府人口仅为150万人。

虽然嘉庆《汝宁府志》的记载中载明分县数据分别为“牌民”“户”和“男妇大小”,但可能仅指信阳、遂平等县情况而言。依南阳府之情形,我怀疑汝宁府的“男妇大小”仍有可能是“丁”。在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汝宁府人口不可能做到如此高速增长。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则乾隆六十年汝宁府人口约为273万,至1953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有3.2‰。以3.5‰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嘉庆二十五年汝宁府人口总数约为297.9万,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255.5万。

3. 光州

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1《地理志·户口志》记乾隆二十年户数为57075,口数为109522,户均1.9口;乾隆四十九年70716户,“大小丁共口”222496,户均3.1口。记载还注明其中大口若干,小口若干。同一资料记载“城内东西南北四街、城外南关”烟户937,男妇大小丁口4039,户均4.3口。城市人口的家庭规模一般要比乡村为小,但也有4.3人,可见全县户均3.1口是不可靠的,而乾隆二十年的户均1.9口更不可信。如果认为乾隆四十九年户数有误,按照户均4.3口的规模进行修正,乾隆四十九年光山县仅

漏记女口是最常见的现象。

有 51743 户,竟少于乾隆二十年数。如果认为乾隆四十九年口数有误,按照同样比例修正,是年光山县约有 304079 口。1953 年光山县有人口 464273 口,144 年间光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9‰。

光山的数据证明光州的数据中漏载了女性人口。

然而,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光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6.3‰,与光山县的情况不吻合。根据光山县的例子推断,嘉庆二十五年光州的“口”中漏记了部分女性人口。按照 3‰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嘉庆二十五年光州人口为 208.1 万。按照 3.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光州有人口 178.4 万。

由此看来,在《嘉庆一统志》中,豫南三府、州的统计口径与豫中和豫北地区是不同的。如本卷以前几章所揭示的,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几个地区也有发现。这是造成许多地区户口数据错误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因。

四、结语

綜上文所述,茲將河南省乾隆四十一年、嘉慶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分府人口,列如表 8-15。

表 8-15 乾隆四十一年、嘉慶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河南省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慶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 口	比例(%)	人 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彰德府	108.6	4.7	136.8	5.0	235.4	5.4
卫辉府	148.8	6.4	175.0	6.4	306.6	7.1
怀庆府	150.8	6.5	180.3	6.6	192.1	4.4
开封府	287.6	12.4	342.8	12.5	535.3	12.4
河南府	147.0	6.3	171.1	6.2	329.9	7.6
归德府	275.8	11.9	328.8	12.0	515.1	11.9
陈州府	185.4	8.0	221.0	8.0	319.3	7.4
许 州	108.9	4.7	129.9	4.7	203.4	4.7
汝 州	69.7	3.0	83.1	3.0	160.4	3.7
陕 州	45.1	1.9	53.7	2.0	81.4	1.9

续表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汝宁府	255.5	11.0	297.9	10.8	450.6	10.4
光州	178.4	7.7	208.1	7.6	309.9	7.2
南阳府	353.4	15.3	421.3	15.3	684.6	15.8
合计	2315.0	100.0	2749.7	100.0	4324.0	100.0

《清朝文献通考》载乾隆四十一年河南口数为 1985.8 万,《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河南省口数为 2359.8 万。与表 8-15 比较,《清朝文献通考》与《嘉庆一统志》所载数据皆有低估。

根据修正后的数据,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河南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5‰,从乾隆四十一年至 1953 年为 3.4‰。区域之间并无大的差别。

第三节 山 东

与山西和河南相比,我们对于山东各府的分县户口,了解得更少。因此,对于清代山东人口的把握程度,相对要差许多。本节仅就 1820 年至 1953 年山东各府的人口增长速度作一评述,并据此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山东人口。

一、鲁西地区

1. 东昌府和临清州

临清直隶州原属东昌府辖,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割武城、夏津和丘县属之。嘉庆《东昌府志》卷 8《户口》称乾隆三十六年编审东昌府统属户 387061,口 2909923,户均 7.5 口,性别比 110。乾隆五十七年,东昌府统属户 270518,口 1556372,户均 5.8 口,性别比 112。如果从乾隆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东昌府人口以 3‰的速度增长,以乾隆三十六年数为基数,乾隆五十七年应有 310 万,而事

实上的册载数据只有 155.6 万,其中的差额应看作乾隆四十一年临清州从东昌府分出后临清州的口数,即乾隆五十二年临清州有口 154.4 万。

性别比的大致平衡,证明数据基本可靠。

同书同卷又载乾隆六十年东昌府有 316168 户,1645642 口,户均 5.2 口,性别比 111。嘉庆十三年有户 323928,有口 1704747,户均 5.3 口,性别比 111。两个年份的户均口数和性别比均合乎标准。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十三年,东昌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7‰。《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东昌府户数为 334386。口数为 1696656,户均 5.1 口。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东昌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1‰。嘉庆十三年数据竟多于嘉庆二十五年数据,故有必要对嘉庆十三年户口数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表 8-16 乾隆五十七年、嘉庆十三年和 1953 年东昌府分县户口

县 卫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			嘉庆十三年(1808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聊城	35590	206242	5.8	45437	255918	5.6	289972
堂邑	23279	130646	5.6	23517	132994	5.7	220619
博平	15533	80134	5.2	15769	84397	5.4	202663
茌平	25130	130950	5.2	26384	130486	4.9	222753
清平	25940	135715	5.2	25828	143892	5.6	210750
莘县	16324	88902	5.4	18927	96818	5.1	223071
冠县	24966	135715	5.4	25099	209003	8.3	191772
馆陶	28432	143435	5.0	36615	160917	4.4	266655
高唐	22663	138289	6.1	30593	194793	6.4	245845
恩县	23024	142077	6.2	48970	154814	3.2	301608
东昌卫	15402	75055	4.9	17134	83434	4.9	
临清卫	14235	82679	5.8	16125	93544	5.8	
合 计	270518	1489839	5.5	330398	1741010	5.3	2375708

资料来源:嘉庆《东昌府志》卷8《户口》。

乾隆六十年分县户口数与乾隆五十七年大体相同,但较乾隆

五十七年数据为差。从乾隆五十七年至六十年,恩县口数的变化合理,户数增加1倍有余,有误。冠县户数无甚变化,口数却猛增。因表幅限制,乾隆六十年数不列入表8-16。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临清州户数为206022,口数为1083743,户均5.3口。看似合理,但其口数远远少于乾隆五十二年,当然是不正常的。为此,对嘉庆《东昌府志》所载乾隆三十六年东昌府的总人口数需加以细致的检核并修正。

乾隆五十二年临清州的口数显然被夸大了,其根源在于乾隆三十六年东昌府册载口数中的户均口数过多。如果采用乾隆五十七年东昌府户均5.8口的比例进行推测,乾隆三十六年东昌府的总人口只有224.5万。依3.1‰的速度回溯,排除了临清州后的东昌府口数只有145.8万,以后划出的临清直隶州人口数则为78.7万。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临清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5‰。

临清州的城市发展在乾隆中期以前即已大体定型。乾隆中期以后不太可能以如此高的速度增殖人口。我注意到嘉庆《东昌府志》在乾隆五十七年户口数条下注明“此系十州县两卫总数”,分县数据中也列有东昌、临清两卫人口。清代前期已将明代的卫所尽行撤除,但他们的户口管理往往自成体系,有的并不在州县户口体系中。看来,东昌府境内的卫所人口是在乾隆五十七年才与州县人口并计的。从这一角度考虑,乾隆三十六年临清州地区所驻卫所人口可能未被计入。另外,在乾隆四十一年临清州升为直隶州时,有可能对临清州城人口进行过登记或清理,这也是导致临清州人口大幅增加的原因。因此,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临清州实际的人口增长速度理应更低。

据表8-19,1953年临清州人口竟然少于《嘉庆一统志》所载1820年的口数。清代后期漕运改道以后,大运河在连接南北经济中的作用大大降低,沿线城市荒颓,城市人口减少。在本卷有关城市人口的论述中,笔者推测乾隆年间临清城市人口至少在20万人,而事实上,1953年临清市人口只有43999。另外,运河运输带来的繁荣不仅仅是临清等大中城市的繁荣,而是整个沿运城市和

运河运输业的衰退,对临清人口影响甚大。

乡村的繁荣。与城市、运输、商业有关的许多农业和副业，都因运河运输的衰落而衰落了。临清州属武城县也是一个沿运的县城。道光二十年有 32910 户，158260 口^①；1953 年，武城县政区未变，人口也只有 162281 口，百余年间人口几无增长。而作为农业县的夏津县则有所不同，民国《夏津县志续编》卷4《食货志·户口》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全县共有 155698“丁”。这时的“丁”其实就是人口。至 1953 年，夏津县政区未变，人口为 247048，道光二十六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3%。沿运城市和沿运县的衰退，证明了漕运改道对运河经济及人口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非沿运县的人口则并不受漕运改道的影响，仍然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增殖。

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东昌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有 2.1%。清代后期漕运改道后，东昌府——特别是府治城市聊城——也经历了与临清州同样的衰败与萧条。因为，在东昌府各县中，作为附郭的聊城人口增长甚微，这实际上是作为运河中心城市之一的聊城衰落的表现。其次则是冠县，乾隆年间冠县的口数是不正确的，如果按照 3% 的速度测算，嘉庆十三年冠县仅有人口 14.2 万，至 1953 年，冠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1%。至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博平、莘县、恩县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其他县，我以为可能与军卫的分布有关。

以乾隆五十七年口数为基点，按照 3%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东昌府口数为 141.8 万。以嘉庆二十五年临清州口数为基点，并以同样的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临清州口数为 94.6 万。

2. 济宁州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济宁州有 88.9 万口。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5%，相当正常。在本卷有关城市人口的研究中，我证明乾隆年间济宁城市人口可能达到 16 万人，1953 年，济宁市人口为 86206，虽较乾隆盛时为少，但

^① 民国《武城志》卷3《田赋》。

却几乎是临清城市人口的1倍。这是因为,进入近代以后,济宁始终是鲁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商埠,而临清则只不过是鲁西地区一个稍具规模的普通市镇。由此可见,运河的衰落对于济宁城市的影响要比对临清小得多。

运河的衰落对
济宁城市的影响
不大。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5《舆地·丁口》记载乾隆三十一年报册凡户50251,口177438,乾隆四十二年济宁州有67197户,377293口。又载乾隆三十三年金乡、嘉祥、鱼台三县的户口数,合计户数为75809,口数为502480。由此可知所谓的济宁州户口为济宁本州户口。乾隆三十一年济宁州本州户口数与乾隆四十二年相差颇大,不知孰是孰非。以金乡县的数据来进行测算,1953年金乡县人口占济宁州辖县人口的23%,按此比例,乾隆三十三年济宁州人口总数可达76.6万左右,大致等于金乡、鱼台、嘉祥三县口数加上乾隆三十一年济宁本州的口数——根据户均5口的规模所得口数。从乾隆三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济宁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9‰。另外,专以金乡县计,1953年金乡县人口为328377,从乾隆三十三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另外,同治《金乡县志》卷3还记载了道光十九年口数为201027,道光二十年口数为221057,两上相邻年份的口数变动太大,而户数则几乎不动。从乾隆三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年,金乡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3.4‰,则不可视为巧合。据此判断,《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济宁州的口数是成立的。以3.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推测,乾隆四十一年济宁州有76.3万。

二、胶东半岛

1. 莱州府

同治《即墨县志》卷5《赋役·户口》引“旧志”称乾隆二十八年“阖县及收并鳌山、大嵩、雄崖、浮山四卫所”共104268户,174374口,户均只有1.7口,可能是将成年男子误作全部人口了。类似现象在乾隆中期是经常出现的。按照户均5口的规模,乾隆二十八年即墨县实有521340人。1953年即墨县和即东县(1945年从即墨县东部析出)人口合计为886675,从乾隆二十八年至1953年的

将成年男子误
作全部人口。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5‰。

民国《高密志》卷5《民社·户口》记载了自乾隆十四年及此后嘉庆初年至宣统初年每一个年号初年的户口数,由于每个年号的户均口数不同,导致每一时期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忽高忽低,以户计算,则要好得多。总起来说,乾隆十四年高密县户数为 43715,宣统初年户数为 82194,160 年间高密县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4‰。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莱州府有 337.4 万口,至 1953 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4.3‰。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偏高,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以来青岛、潍坊两城市的兴起有关。1953 年,青岛市人口多达 91.7 万,潍坊市人口多达 14.9 万。青岛市的兴起使得莱州府南部成为人口密集之区。扣除青岛市人口不计,133 年间莱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3‰。

2. 登州府

总起来说,莱州府的分县户口数据支持《嘉庆一统志》中的莱州府户口数,登州府情况则不相同。从表 8-19 看,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登州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7.9‰。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似乎偏低。道光《荣成县志》卷 3《食货·户口》引乾隆庚午(乾隆十五年,即 1750 年)志称,男女大小 120680,成山卫、靖海、宁津等处男女大小 10645,合计为 131325。道光二十年男女大小共 104905 名口,其中大男与大女、小男与小女的数量大体均衡。道光二十年的口数少于乾隆十五前以前的口数,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由此看来,道光年间荣成县户口存在严重的漏载。荣成县的例子或许可以证明,乾隆以后登州府的户口编造,存在太多的缺漏。

直到清代后期这一状况仍未有所改变。光绪十年《登州府志》卷 18 载荣成县同治五年有 29843 户,141305 名口。1953 年荣成县及从荣成分立的石岛县合计有人口 456975,以乾隆十五年口数为基准计,203 年间荣成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6.2‰。以同治五年为基准,87 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3.6‰。两个时期的人口速度均过快,说明乾隆十五年的口数和同治五年的口数都是

偏低的。

光绪《登州府志》记载了咸丰、同治及光绪年间的分县户口,大多数县的口数偏低,故不作进一步的分析。比照莱州府及其他府的例子,设1820年至1953年登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5‰,1820年登州府人口数约为341.5万。仍依此速度,乾隆四十一年莱州府和登州府的口数分别为289.3万和292.8万。

三、鲁中地区

1. 沂州府

清代的沂州府划明代青州府南境而设。此两府与莱州府、登州府合计,即是明代的东三府。1820年至1953年沂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2‰,是不正常的。用郯城县的数据可作检验:嘉庆《郯城县志》卷2《田赋·户口》记载了乾隆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八年和五十五年的户口数。乾隆二十八年口数多于三十八年,三十八年口数多于四十八年。直到乾隆四十八年以后,口数才呈增长状。乾隆四十八年户数为56469,口数为273427,户均4.8口,性别比为110.7,由此看来,乾隆四十八年的数据才是正常的。嘉庆十四年,户数增至60803,口数增至290619,户均仍是4.8口,性别比为111.4。从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十四年,郯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1953年郯城县人口为338770。1947年析临沂、郯城和费县置苍山县,假定1953年苍山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析自郯城,则与清代郯城相比,1953年的郯城人口应达53万,从乾隆四十八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9‰。1953年的临沂、郯城和费县三县人口中,郯城只占23%,如按比例计算,苍山县所含郯城县的人口应不足三分之一。如是,则乾隆以来郯城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还要低一些。从郯城的例子中,我相信乾隆后期至1953年沂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5‰左右。如是,嘉庆二十五年沂州府人口总数应为407.4万,乾隆四十一年应为349.3万。

《嘉庆一统志》对沂州府的人口统计只是实际人口的半数左右,可能是漏记女性人口所造成。将嘉庆二十五年沂州府的性别

据性别比判断
户口数据的可靠
性。

《嘉庆一统志》
所载沂州口数中
漏载了女性人
口。

比定为 107,并将《嘉庆一统志》载口数当作全部男性人口,是年全府人口总数即为 407 万,与根据郟城数据推算的完全一致。

2. 青州府

咸丰《青州府志》卷 31《赋役考·户口》载有“道光二十五年州属申报户口清册”时的分县户口数。兹列于表 8-17。

表 8-17 道光二十五年和 1953 年青州府分县户口

县 卫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				1953 年		年平均增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乐安	45950	352440	7.7	11.1	355332	7.7	0
博兴	43396	162444	3.7	5.1	255049	5.5	4.2
高苑	52282	139438	2.7	4.4	128347	2.8	-0.8
临淄	24400	129309	5.3	4.1	216451	4.7	4.8
博山	25952	164318	6.3	5.2	222453	4.8	2.8
安丘	55980	562453	10.0	17.7	669549	14.6	1.6
临朐	37989	299718	7.9	9.4	397996	8.7	2.6
昌乐	48289	286543	5.9	9.0	330567	7.2	1.3
益都	84933	404237	4.8	12.7	476080	10.4	1.5
寿光	162667	1000849	6.2	3.2	608808	13.2	-4.6
诸城	90929	564906	6.2	17.7	935174	20.3	4.7
灵山 安东卫	2726	18531	6.8	0.6			
合 计	675493	4085186	6.0	100	4595806	100	1.1

资料来源:道光二十五年数据据咸丰《青州府志》卷31《赋役考·户口》。

说明:1953年寿光县人口中包括羊角沟县,诸城县人口包括藏马县,博山县人口包括淄博县二分之一人口,高苑县人口中包括高青县二分之一人口。

从表 8-17 中的数据看,道光二十五年青州府户口的最大的问题出在寿光县,其人口数大大超过 1953 年。道光二十五年的口数记载还分别记有男大、女大、男小和女小,故不存在误记的可能。这一错误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并不知详。另外,1948 年高苑和青城县合并为高青县,在 1953 年的户口中,我将高青县的一半划归

高苑,可能偏少,以致从道光二十五年至此的人口出现负增长。在扣除了寿光县和高苑县的数据后,从道光二十五年至1953年,青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

《嘉庆一统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青州府口数为3318763,至1953年,青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2.5‰。这也就是说,修正后的道光二十五年青州府口数与嘉庆二十五年口数是匹配的。依2.5‰的年平均增长率,乾隆四十一年青州府口数约为297.3万。

3. 济南府

道光《济南府志》卷15《户口》载有分县及卫的户口数,其中分“男大口”、“男小口”、“女大口”、“女小口”。济南卫分别隶于历城、章邱、济阳、长清四县地,分别并入四县计算。德州卫所隶地域不明,不作归并。详见表8-18。

表8-18 道光十七年和1953年济南府分县户口

县	卫	道光十七年(1837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历	城	159894	730894	4.6	108	1020474	2.9
章	邱	69509	480243	6.9	125	730636	3.6
邹	平	25358	322156	12.7	102	153888	-6.3
淄	川	16540	132216	8.0	103	572630	12.7
长	山	29829	191517	6.4	119	303961	4.0
新	城	29374	164553	5.6	108	353393	6.6
齐	河	76728	422111	5.5	108	326384	-2.2
齐	东	30024	130472	4.3	138	147253	1.0
济	阳	43832	203445	4.6	114	358664	4.9
禹	城	30183	232072	7.7	111	327115	3.0
临	邑	17134	115278	6.7	107	242509	6.4
长	清	71486	319619	4.5	111	517725	4.2
陵	县	17170	126010	7.3	113	407496	10.7
德	州	22010	118063	5.4	111		
德	平	34192	209889	6.1	97	265903	2.0
平	原	33947	187937	5.5	107	292194	3.8

续表

县 卫	道光十七年(1837年)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德州卫	36221	115999	3.2	106		
合 计	743431	4202474	5.7	111	6120198	3.2

资料来源：道光《济南府志》卷15《户口》。

说明：1953年历城县人口中包括济南市人口，长山县人口中包括张周市人口，德州人口中包括德州市、德县及陵县人口；淄川县包括1953年淄博市人口的二分之一。清代新城县1953年改名为桓台县。

卫的户口数据
质量要比县的户
口数据质量为差。

道光《济南府志》卷15《户口》记载有道光十七年济南府的分县(卫)户口数，合计全府户数为743431，口数为4202474，户均5.7口，性别比为111。比较而言，县的户均口数较为合理，而卫的户均口数则显得荒诞。卫的人口较少，并入县后，可忽略不作户均口数的讨论或修正。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济南府有401.5万口，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十七年，济南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从道光十七年至1953年，济南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由此可见，道光年间济南府的户口数与《嘉庆一统志》属同一来源。

虽然如此，与乾隆年间的数据进行比较，道光年间的分县数显得并不正确。以德县为例。民国《德县志》卷5《政治志·户口》引“旧志”记载，乾隆五十二年全县民户有35550户，160700口；二卫军户有35306户，111031口；民户、军户合计共有271731口。在表8-18中，道光十七年德州户数仅为22010，口数仅为118063，竟然大大少于乾隆五十二年数。德州卫户数为36221，口数为115999，50年间德州卫的户口数几乎没有变化。

再如长山县^①，嘉庆六年《长山县志》卷3《食货·户口》称乾

^① 1956年裁入邹平县。

隆五十一年人丁 136429;在表 8-18 中,道光十七年长山县户数为 26829,口数为 191517;1953 年长山县有 303961 人;从道光十七年至 1953 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4‰,而从乾隆五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却高达 6.7‰。道光十七年长山县的户均口数高达 6.4,这一年人口数的高估,与户均口数过高有关。若户均口数接近标准值,两个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更为一致。

平原县的人口增长率很低。乾隆《平原志·食货》记载乾隆十一年共有人口 222207,性别比为 107.9,合乎标准形态。表 8-18 记载道光十七年平原县户数为 33947,口数为 118063,少于乾隆十一年口数。1953 年平原县人口为 292194,乾隆十一年至 1953 年,平原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有 1.3‰,道光十七年至 1953 年,平原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 5.7‰。乾隆十一年数据偏高,道光十七年数据偏低。

淄川县人口增长速度最快。1945 年与青州府的博山县设置淄博市,1953 年淄博市多达 18.4 万人,扣除属于淄川县的二分之一淄博市人口不计,从道光十七年至 1953 年,淄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11‰。与道光十七年相比,与淄川相邻的邹平县人口不增反减,我怀疑邹平、淄川两县政区有所变动。合而计之,这一期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较全府同期人口增长速度略高。

在没有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姑且接受道光《济南府志》所载全府户口数。依 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济南府口数为 351.9 万。

四、结语

行文至此,仍有泰安府、兖州府、曹州府和武定府四地因缺少资料,无从得出其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只是因其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体合理,故不作修正。以 3.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分别得出乾隆四十一年四府的人口数。详见表 8-19。

表 8-19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山东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济南府	351.9	12.6	401.5	12.4	612.0	12.4
青州府	297.3	10.7	331.9	10.3	459.6	9.3
登州府	289.3	10.4	341.5	10.6	543.5	11.0
东昌府	141.8	5.1	169.7	5.2	237.6	4.8
莱州府	292.8	10.5	337.4	10.4	596.7	12.1
沂州府	349.3	12.5	407.4	12.6	648.3	13.2
临清州	94.6	3.4	108.4	3.4	80.3	1.6
济宁州	76.3	2.7	88.9	2.8	142.5	2.9
兖州府	224.5	8.0	261.8	8.1	505.3	10.3
曹州府	272.4	9.8	317.7	9.8	470.2	9.5
武定府	187.9	6.8	219.1	6.8	283.1	5.7
泰安府	212.1	7.6	247.3	7.7	347.5	7.1
合 计	2790.2	100.0	3232.6	100.0	4926.6	100.0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山东省分府口数总和为2893.1万,较表8-19略少。在对嘉庆二十五年沂州府和登州府的口数进行修正以后,山东省人口的增长显得合理得多。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山东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

《清朝文献通考》载乾隆四十一年山东人口为2149.7万,较本节估计要少许多。在不经修正的数据中,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山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为4‰。《清朝文献通考》中的数据与《嘉庆一统志》大致匹配,说明《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也可能存在对沂州、登州人口的低估。

第九章 清代中期北方分府人口

——山西和陕西

虽然就全国情况而言,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关于“丁”的统计才全面转为人口的统计,但是在山西,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户口调查与统计就是按照新的口径进行的。光绪初年,山西中南部地区遭受了特大旱灾的袭击,人口大量死亡。至1953年,晋西南区人口大大少于清代中期,晋中地区与清代中期基本持平,晋东南区较清代中期略多,而晋北地区人口则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晋北地区与光绪大灾无关,且因清代中期以后至民国年间长城口内人口的大量迁入,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长。在这一背景下,府级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一府所属各县人口数据而言,区域人口比例分析法仍是适用的。清代陕西的户口数据比较丰富,各种文献所载数据质量较好。

第一节 山西^①

与明代相比,清代山西政区变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府级政区大量增加。在大同以南地区,这一变动只发生在明代的太原府境和平阳府境。在明代的大同地区,不仅府级政区增加,且辖境超出明辖境的范围。明清时期山西政区的这一变化,使我们可能从更

明初分府户口数可用来校正清代中期分府户口数。

^① 本节与刘仁团合作完成。

为长久的时段中,把握山西人口的变动。本节将山西分为晋西南、晋东南、晋中和晋北四大区域,分别论述如下。

一、晋西南区

1. 解州

除解州本州没有乾隆二十九年的户口数之外,其余四县均有该年户口数据,详见表 9-1。

表 9-1 洪武二十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和 1953 年解州分县户口

县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嘉庆十三年(1808年)			1953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平陆	3987	48324	12.1	5697	33525	5.8	112066
芮城	4387	40138	9.1	20395	90689	4.4	91963
安邑	18033	62381	3.5	28916	165975	5.7	109657
夏县	9190	64890	7.1	32569	173894	5.3	153501
解州	2532	23530	9.3				67434
合计	38129	239263	6.3	87577	464083	5.3	534621

资料来源:洪武二十四年户口数来自万历《山西通志》卷9《户口》,乾隆年间数据来自乾隆《平陆县志》卷4《户口》,民国《芮城县志》卷2《户口》,乾隆《安邑县志》卷4《户口》,光绪《夏县志》卷4《赋役志·户口》。

据表 9-1 得表 9-2。

表 9-2 洪武二十四年、乾隆二十九年和 1953 年解州分县户口比例(%)

县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1953年 人口
	户	口	户	口	
平陆	10.5	20.2	6.5	7.2	21.0
芮城	11.5	16.8	23.3	19.5	17.2
安邑	47.3	26.1	33.0	35.8	20.5
夏县	24.1	27.1	37.2	37.5	28.7
解州	6.6	9.8			12.6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 9-1 统计。

据表 9-1 和表 9-2, 洪武二十四年, 解州各县口数在全府人口中的比例与 1953 年大体相同, 户的比例则不吻合。从这个意义上讲, 洪武二十四年的口数是大体合理的, 而户数则是不合理的。

在乾隆二十九年户口数据中, 如果加上解州本州所缺之记载, 平陆等四县口在全府总口数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下降, 芮城、安邑、夏县的比例会接近 1953 年, 而平陆县人口比例与 1953 年比例的差距还会增加。1953 年, 平陆县以外的其余三县口数都比 1764 年为少, 是光绪初年的大旱灾所导致。然而, 受灾程度相同的平陆县 1953 年的口数比乾隆年间多了大约 8 万, 而 1953 年又没有大的政区变动, 所以, 平陆县乾隆年间的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另外, 乾隆二十九年平陆县的口数竟然低于洪武二十四年, 令人怀疑此数据仍是明代后期的“丁”额, 而非人口。

通过与 1953 年和 1391 年数据的比较, 可以判定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年) 平陆县数据仍是明代后期的“丁额”, 而非人口。

乾隆二十九年安邑的户均口数远高于芮城和夏县。如果按照户均 5 口的比例进行调整, 是年口数约为 144580。安邑、芮城、夏县合计口数约为 40.9 万。1953 芮城、夏县、安邑三县人口占解州人口比例的 66.4%。设乾隆二十九年此三县口数在解州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与此相同, 则乾隆二十九年解州人口则应为 61.6 万。嘉庆二十五年解州总口数为 799521, 从乾隆二十九年到嘉庆二十五年, 解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4.7%。这一合适的增长率可以证明《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是大体可靠的。以乾隆二十九年的口数为基数, 以 4.7% 的年平均增长率推至乾隆四十一年, 该州共有人口 65.1 万。

2. 绛州

乾隆《闻喜县志》卷 3《户口》载“乾隆二十八年分编查得本城”以及四乡共 21903 户, 131885 名口, 户均 6 口。同治《稷山县志》卷 2《田赋·户口》载“乾隆三十一年分知县韦之瑗编查”本城及四路共 26401 户, 157673 口, 户均 6 口。两县的户均口数相同, 二县的户口统计亦具有“人口普查”的迹象。

乾隆三十一年稷山县的人口普查。

洪武二十四年和 1953 年各县的人口数见表 9-3。

表 9-3 洪武二十四年和 1953 年绛州分县户口

县 名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					1953 年	
	户	比例(%)	口	比例(%)	户均口数	人口	比例(%)
绛 州	6380	20.0	90260	28.1	14.1	133310	21.9
闻 喜	8511	26.7	94667	29.5	11.1	168564	27.6
绛 县	5340	16.8	38963	12.2	7.3	79741	13.1
垣 曲	3385	16.9	32388	10.1	9.6	85460	14.0
稷 山	8235	25.9	64371	20.1	7.8	142652	23.4
合 计	31851	100.0	320649	100.0	10.1	609727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9-1。

说明：由于河津县无洪武年间数据，故将该县剔除。

从表 9-3 中可以看出，以口数计，除绛州本州外，各县在两个年份的比例均相差不大。绛州本州与闻喜县户的比例较口数的比例更接近于 1953 年。这一误差或许是由于这两州县户均口数过高所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三县的户均口数过低所造成的。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洪武年间绛州的“户”数与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户是不同的。

与 1953 年人口数比较，洪武年间闻喜、稷山两县口的比例虽略有出入，但是两县口的比例之和却相差无几。在加上河津县之后，1953 年闻喜、稷山两县口数占全府总人口数的 41.3%。如上述，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间两县共有 289558 口，设是年两县人口在绛州总人口中的比例与 1953 年相同，则该州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共有人口 70.1 万。嘉庆二十五年绛州总人口为 1017312，从乾隆三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8‰。以乾隆三十年的口数为基数，以 6.5‰ 的增长推算至乾隆四十一年，则该州共有 75.3 万。

3. 蒲州府

民国《虞乡县志》卷 3《丁赋略》称，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奉旨编审停止”的是历年的“人丁”数，“兹据审定现在实数”的是“男妇大小丁口”。这年审定“本城四坊户口数”和“三乡户口数”共计

乾隆三十七年，虞乡县的人口统计完成了从“丁”到“口”的转变。

18721户,105655口。民国《临晋县志》卷1《区村考》记载的乾隆三十八年户口数为略数,计户2.7万,口约15万,户均口数为5.6,与虞乡县相同。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县的数据是同一年份的调查结果,只是各县在修志造册之时记录有所不同而已。同时我们还可以确定,蒲州府各县在乾隆三十七年左右均进行过户口调查,只是有的记录已经丢失。用分县户口累加重建乾隆年间该府的户口数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仍用洪武二十四年和1953年的数据做参考,运用区域人口比例分析法恢复乾隆三十七年该府的户口数。洪武二十四年和1953年蒲州府分县户口数见表9-4。

区域人口比例
分析法的运用。

表9-4 洪武二十四年和1953年蒲州府分县人口

县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1953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万泉	1113	39772	35.7	13.8	92698	14.8
荣河	5063	37696	7.4	13.0	94064	15.0
猗氏	6425	41244	6.4	14.3	103934	16.6
临晋	7871	59979	7.6	20.8	114207	18.2
永济					152824	24.4
虞乡	10685	110248	10.3	38.2	69868	11.1
合计	31157	288939	9.3	100.0	627595	100.0

说明:清代及1953年的虞乡、永济两县在洪武二十四年为蒲州。

从表9-11中可以看出,洪武年间的户均口数参差不齐,低的有6口左右,高的竟达36口。然而,由于1391年各县的口数比例接近1953年,所以我们只认为1391年的“户”是有问题的。将两个年份口或人口所占百分比加以比较,万泉、荣河两县1953年的比例比1391年各高出大约1到2个百分点,而猗氏1953年比1391年高出2个百分点,临晋则少了2个百分点,永济、虞乡二县1953年的比例之和较1391年低了将近3个百分

点。其中的猗氏和临晋两县是相邻的,他们在两个年份的比例之和是相等的。

1953年临晋、虞乡两县人口占全府总口数的29.3%。乾隆三十七年两县口数为255655,假定乾隆三十七年临晋、虞乡两县口数占全府总口数的比例与1953年相同,则是年蒲州府的总口数为87.3万。

光绪《荣河县志》卷3《田赋·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九年该县共有17639户,130516名口。由于其户均人口高达7.4,与上面两个县户均5.6口相比高出许多,所以我们不能肯定,户数与口数究竟哪一个更准确。同样,假设该县在1953年占全府总口数的比例与乾隆二十九年的比例相同,即大约为15%,则可以推算出是年蒲州府的总人口数为87.0万。

尽管乾隆三十七年和二十九年之间相差八年,但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该府的户口数不致有太大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用荣河县的口数推得的全府口数与用临晋、虞乡两县推得的全府总数基本吻合,这至少说明各县乾隆间的口数是比较可信的。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蒲州府的总口数为1398811,从乾隆三十七年至此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8‰。与相邻的解州和绛州两州相比,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显然是太高了。

虽然蒲州府也经历过光绪初年的大旱灾,但是以年平均速度计,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解州、绛州人口年平均递减率分别为2.6‰和2.3‰,蒲州则高达6‰。本卷第十五章的研究表明,解州、绛州和蒲州三地在光绪年间所经历的灾情是大体相同的,灾害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比例也大体是相同的。显然,嘉庆二十五年蒲州府的人口数存在高估。参照解州、绛州的人口增长情况,设从乾隆三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蒲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致为5‰,乾隆四十一年蒲州府人口约为88.8万,嘉庆二十五年蒲州府人口约为110.9万,较《嘉庆一统志》要少29万左右。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蒲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3‰。

过高的人口增长速度令人怀疑。

4. 平阳府

民国《乡宁县志》卷4《户口谱》中载有该县乾隆四十六年的户口,但书中只写是“男大小”口数共 45516 口,其中男大 16706,男小 28810 口。在一般情况下,“男大”多于“男小”,此记载可能有误。如果这一数据真的为男性,加上女性人口后,全县口数约为 8.7 万。

“男小”超过“男大”,说明数字有伪。

民国《临汾县志》卷2《户口略》中记载,有乾隆四十三年户口,其中户 45804,口 166561,户均 3.6 口,户均口数过低,用平均 5 口加以修正,可得 229020 口。

光绪《太平县志》卷7《赋役·户口》中记载,该县乾隆四十年有 35986 户,男妇大小 153551 口,户均 4.3 口。道光五年该县“按保甲”有户 32613,男妇大小 175226 口,户均 5.4 口。从乾隆四十年到道光五年,口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6‰。

民国《曲沃县志》卷6《户口》中记载了该县乾隆四十年户数为 41498,口数为 284431,嘉庆、道光等年间的数字在此基础上略有增加,人工编造痕迹明显,不予讨论。

兹将此四县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乾隆四十年(1775 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及 1953 年户口数,列如表 9-5。

表 9-5 明清时期和 1953 年平阳府乡宁等四县户口

县名	1391 年			1775—1781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户	口	户均口数	人口
乡宁	2900	14533	5.0		87000		85334
临汾	19763	100813	5.1	45804	166561	3.6	229763
太平	6213	76906	12.4	35986	140000	4.0	102643
曲沃	7067	122242	17.3	42498	170000	4.0	133372
合计	35943	314494	8.7	124288	563561		551112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9-1。

说明:民国年间岳阳县改名为安泽县,太平县改名为汾城县。

据表 9-5,有表 9-6。

表 9-6 明清时期和 1953 年平阳府分县户口比例(%)

县 名	1391 年		1775—1781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	口	人口
乡 宁	8.1	4.6		15.4	15.5
临 汾	55.0	24.4	36.9	29.6	41.7
太 平	17.3	32.1	29.0	24.8	18.6
曲 沃	19.6	38.9	34.1	30.2	24.2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 9-5 统计。

据表 9-5 和表 9-6, 洪武年间乡宁县的户数和口数明显偏低, 并由此而导致其他三县口比例的偏高。如果洪武二十四年乡宁县的口数增加, 则其他三县口的比例则会下降, 临汾县人口的比例与乾隆年间的人口比例差距会加大, 而太平、曲沃两县与乾隆年间各县口的比例差距则会缩小。

从长时段的观点看, 几个世纪以来, 临汾县人口比例呈不断上升状, 可能与其紧邻晋南中心城市有关。另外, 在光绪初年的大灾中, 作为其府治所在地的临汾县可能得到了比其他地区多得多的赈济, 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人口死亡较少。对临汾县人口作了如此理解之后, 对于乾隆年间太平、曲沃两县人口比例较 1953 年为高就可以得到解释了。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乾隆年间乡宁县的口数是否偏低? 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 不再作进一步的修正。

1953 年乡宁等四县人口占全府总人口的 45.1%, 如果乾隆年间四县人口所占比例相同, 全府人口则有 124.8 万。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 平阳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6%。

5. 隰州

乾隆《隰州志》卷 3《赋役·户口》记载隰州本州乾隆十八年四乡共有 4967 户, “男妇大口” 15988, “男女小口” 4210 口。男妇大小共有 20198 口, 户均 4 口。这一数据极不可靠。因为, 洪武二十四年隰州本州的户数为 3764, 口数为 25962。乾隆十八年的口

数少于洪武年间,谁敢相信?

光绪《隰州志》卷2《户口》记载了自嘉庆元年(1896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若干年份的户口数,兹与1953年数据并列于表9-7。

乾隆十八年口
数少于洪武二十
四年口数,谁敢
相信?

表9-7 清代至1953年隰州本州户口

年代	户	大口	小口	合计	户均口数	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嘉庆元年	15136	34895	21928	56823	3.8	
道光元年	20163	45053	25511	70564	3.5	8.7
咸丰元年	24082	58981	30124	89105	3.7	7.8
同治元年	26297	62015	33231	95246	3.6	6.1
光绪元年	29636	67095	36580	103675	3.5	6.5
光绪三年	10065	21133	12538	33671	3.3	
光绪四年	7149	15169	8184	23353	3.3	
光绪八年	10872	16189	9850	26039	2.4	27.6
光绪九年	11622	16356	10372	26728	2.3	26.5
光绪十年	12581	16512	10753	27265	2.2	20.1
1953年				57220		10.8

资料来源:嘉庆元年至光绪十年户口数据来自光绪《隰州志》卷2《户口》。

在表9-7中,光绪三年和四年的人口锐减是由当年的特大旱灾造成的。光绪八年至十年的户口增长,是人口的恢复性增长。除了人口的自然增殖以外,还可能包含外逃人口的返归家园和外来移民的迁入。从光绪十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8‰,对于遭受重大人口损失的区域来说,这一增长速度是合理的。

然而,从嘉庆元年至道光、咸丰乃至同治、光绪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却可能是不正常的。1953年,隰县占隰州总人口的39.1%,如果嘉庆元年的数据为真,全州人口则有14.5万,如果道光元年的数据为真,则为人口18万余。《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隰州人口总数仅为13.4万,道光元年隰州本州的口数已经明显夸大。也就是说,嘉庆以后隰州本州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夸大的,不真实的。

从表 9-13 中的数据来看,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晋西南地区隰州以外的各府、州人口均呈下降状,只有隰州例外,人口呈缓慢的增长。如果嘉庆二十五年隰州的口数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在光绪初年的大旱灾中,隰州所受损失要比晋东南其他地区轻得多。作为旁证,下文中我们可见汾州府临县、永宁和乡宁三地,光绪大灾中的损失要比汾州府的其他地区少得多。隰州地区与之毗邻,该地灾情可能与汾州西部地区类似。

鉴于乾嘉年间平阳府以南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左右,平阳府为 2.6‰。下文将证明平阳府以北汾州府、太原府同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3‰和 2.9‰。如此,我们可将隰州和霍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 3.5‰,如此,乾隆四十一年隰州和霍州人口分别为 11.5 万和 30.1 万。

二、晋东南区

晋东南区只有潞安府长子县的户口可供分析。光绪《长子县志》卷 5《赋役志·户口》记载该县乾隆四十一年“查实在土著民人”19311 户,“男妇大名口”57823,“男女小名口”33866,共有大小人口 91689 口,户均 4.7 口。嘉庆二十年“编查保甲实在土著民人”33435 人户,“大小男女”151970 名口,户均 4.5 口。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13‰。从以上各地的情况来看,乾隆四十一年长子县的口数可能偏低。

嘉庆二十五年潞安府有人口 940514,长子县人口占全府总人口的 16.2%。1953 年长子县有人口 186306 口,全府共有人口 1155510 口,长子县也占 16.1%。这一比例的相同当然不是巧合,除了证明区域内各部分的人口保持相同的数量结构外,还可证明嘉庆时期潞安府的人口数是人口普查的产物,是可靠的。

由于受到光绪初年大旱灾的影响,嘉庆年间至 1953 年的潞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偏低。然而,晋东南区的泽州府和沁州同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6‰和 1.8‰,均呈增长状。虽然不能根据这一时期的状况去推测乾隆至嘉庆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乾隆、嘉庆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

要高于 2.2‰。下文将证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平定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8‰,而乾隆至嘉庆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 4.4‰。据此估测,乾隆至嘉庆年间潞安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在 4‰左右。

以 4‰的年平均增长率进行推测,乾隆四十一年潞安府有人口 78.9 万,泽州和沁州^①两地人口分别为 75.5 万和 22.4 万。

三、晋中区

1. 太原府

同治《榆次县志》卷6《田赋·户口丁则》记载,乾隆十三年有户 49980,“男女大口”142956 口,“童小黄口”121845 口;男女大小共计 264801 口,户均 5.3 口;同治元年的户数为 42632,“男女大口”211628,“童小黄口”64607 口;男女大小共计 276235 口,户均 6.5 口。

从户均口数来看,乾隆十三年的人口数是比较可信的,另外志中还提到乾隆十三年“丁则”数为 63327,可见该县乾隆十三年的人口统计与“丁”数没有什么关系,具有“人口普查”的意义。至同治元年,榆次县口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0.3‰。同治元年的户口数可能有问题。我们将两个年份的数据再进一步对比,可以看出其中男女大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 3.4‰,主要的问题出在“童小黄口”的数字上,乾隆十三年幼年与成年之比为 1:1.2,而后者高达 1:3.3,与前者相比,后者的“童小黄口”可能存在严重缺漏。如果用前者之比数对后者的小口数加以修正则可得小口 180416,则同治元年的口数为 392044。

另外,道光二十三年《阳曲县志》卷7《户书》记载,乾隆四十六

即有“口”,又有“丁”,说明“口”非“丁”。

^① 本书第四卷第二章在讨论沁州户口数据时有误。万历《山西通志》卷9《户口》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沁州本州有户“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一”,口“三十万八千六百七十”。永乐十年有户“一万六千八百六十七”,口“九万四千二百六十三”。根据永乐十年的户口数据可以看出,洪武二十四年的口数可能为“十万八千六百七十”。“三十万”的“三”字为衍文。本书第四卷疑洪武二十四年沁州口数有误,却误将辽州本州户口抄为沁州本州。洪武二十四年沁州户数应为 27941,口数应为 183758,户均 6.6 口。第四卷第七章表 7-1 中沁州户籍人口应约为 20 万。

年户 61570,口 345088,户均 5.6 口。道光二十三年“编审实在民人户”61930,“计男妇大名口”210225,“男女小名口”144115,共计男女大小 354340 口,户均 5.7 口,幼成之比为 1:1.45。

从户均口数来看,阳曲县两个年份的数据都比较合理,但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在这 52 年间,该县的口数只增加了 9252,户数只增 360,两个年份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0.4‰。但这不能说明乾隆四十六年户口数有问题,而是道光年间的数据存在问题,同榆次县相比,该县道光年间的幼成比值过高,因此我们用 1:1.17 之比加以修正,道光年间的总口数约有 39 万,从乾隆四十六年至该年的口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2‰。仍低于榆次县相应年份的人口增长率。尽管我们对道光年间的数字加以修正,但很可能仍然偏低。

光绪《清源县志》卷 8《户口》载该县乾隆年间有户 15500,口 125000,户均 8.1 口。咸丰年间的户数为 32199,男口 131636,女口 83983,总计 215619 口,户均 6.7 口。由于志中没有记载确切的年代,所以不能确定该数字的具体含义。如果认为乾隆年间的户口数是乾隆十八年的,而咸丰年间的户口数又是咸丰十一年,108 年间清源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5‰。这是一个最小的估计值,如果乾隆年间为乾隆四十年以后,清源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高达 5.8‰。

道光《太原县志》卷 3《田赋·户口》载,乾隆年间户 40210,口 213434,户均 5.3 口;嘉庆年间户 40386,口 220928;道光年间户 40436,口 224253。由于志中没有给出标准的时间点,所以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上面三组数中根本看不出该县在这一时段内有正常的增长趋势,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嘉庆、道光年间的数字存在问题,而乾隆年间的数字很可能与前面几个县的数字一样,也是乾隆四十几年的。

按照清代的太原府疆域,洪武二十四年太原、榆次、阳曲三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10.85%、15.68% 和 17.06%。假定乾隆年间三县占全府人口数的比例不变,则可推得全府人口数分别为 196.7 万、168.9 万和 202.3 万。用太原县和阳曲县口数

推得的全府人口总数相差不多,用榆次县口数推得的全府人口数最少,是因为乾隆年间榆次县的口数是乾隆十三年数据,而其他则是或可能是乾隆四十六年的数据。用榆次县口数所推得的全府数据进行计算,从乾隆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太原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9‰;用其他两个数据测算所得结果则在 1‰左右。比较而言,我倾向于采用榆次县的人口数据作为推测的依据:乾隆十三年太原府人口为 170 万左右,乾隆四十一年约为 183 万。

在一个较为可靠的数据系列中,某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可以用来推测另一时期的全府人口。

在做完以上推测以后,我们又从乾隆《太原府志》中查到乾隆四十六年太原府分县户口。对这一系列数据的分析有助于检验上述推测。兹将乾隆四十六年、洪武二十四年及 1953 年分县户口数,列如表 9-8。

表 9-8 洪武二十四年、乾隆四十六年和 1953 年太原府分县户口

州 县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 口数	户	口	户均 口数	
阳 曲	15018	82888	5.5	61570	345088	5.6	111733
太 原	9053	52719	5.8	55789	341846	6.1	720725
太 谷	11755	47765	4.1	25336	235521	9.3	127506
祁 县	5446	44246	8.1	27336	40997	1.5	126029
徐 沟	2926	16145	5.5	31832	253604	8.0	130139
交 城	4967	27290	5.5	18619	90595	4.9	119151
文 水	8962	71510	8.0	46894	176944	3.8	171229
岢 岚	1400	11600	8.3	4942	23781	4.8	48511
岚 县	1500	12830	8.6	5241	55268	10.5	69934
兴 县	1593	12722	8.0	6685	34150	5.1	116807
榆 次	15684	76200	4.9	49980	264801	5.3	186255
合 计	78304	455915	5.8	334224	1862595	5.6	1928019

资料来源:洪武二十四年户口数据万历《山西通志》卷9《户口》;乾隆四十六年数据乾隆四十八年《太原府志》卷16《户口》,该志缺榆次县户口,兹据同治《榆次县志》卷6补入,是为乾隆十三年户口。

据表 9-8,可以列出三个年份各县户口在全府总数中的比

例,见表9-9。

表9-9 洪武二十四年、乾隆四十六年和1953年太原府分县户口比例(%)

州 县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1953年 人口
	户	口	户	口	
阳 曲	19.2	18.2	18.4	18.5	5.8
太 原	11.6	11.6	16.7	18.4	37.4
太 谷	15.0	10.5	7.6	12.6	6.6
祁 县	7.0	9.7	8.2	2.2	6.5
徐 沟	3.7	3.5	9.5	13.6	6.7
交 城	6.3	6.0	5.6	4.9	6.2
文 水	11.4	15.7	14.0	9.5	8.9
岢 岚	1.8	2.5	1.5	1.3	2.5
岚 县	1.9	2.8	1.6	3.0	3.6
兴 县	2.0	2.8	2.0	1.8	6.1
榆 次	20.0	16.7	15.0	14.2	9.7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	100.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9-8统计。

稍后发现的太原府分县户口可用来对以前的推测进行检验。

乾隆《太原府志》卷16《户口》称:“乾隆四十六年太原府共户三十二万四千四百九十六户,共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零七口。”分县数据中漏掉了榆次县。即使不包括榆次,其余10县口数相加的总和也达1597794,已超过乾隆《太原府志》所称之总数。乾隆《太原府志》的作者实在是太粗心了一点。

按照年平均增长2.9‰的速度,乾隆四十六年榆次县有人口29.1万。乾隆四十六年祁县的户均口数太低,按照户均5口的比例,应为13.7万人。乾隆四十六年兴县人口的比例偏低,实际口数也应增加。按照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是年人口应为7.5万。合而计之,三县应增加人口16.4万左右。

然而,乾隆四十六年户口中也存在夸大。无论从户均口数还是从其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看,徐沟县的口数至少多出10万。太谷县口数也有夸大的可能。岚县户均口数偏高,但其口数在全

府口数中的比例与洪武二十四年及 1953 年大体相同,户均口数太高是因其户数太低所造成。由此看来,在乾隆四十六年户口中,过高估计的县份与过低估计的县份相抵消,所得人口总数大约为 186 万左右。按照 2.9‰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太原府人口总数约为 183.6 万。与上述根据榆次县人口增长情况所得结果完全吻合。

2. 汾州府

乾隆《汾州府志》载有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分县户口数,与 1953 年数据并列于表 9-10。

表 9-10 乾隆三十四年和 1953 年汾州府分县户口

县名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口	比例(%)
汾阳	49956	435263	8.7	34.1	184780	13.4
平遥	33600	206970	6.2	16.2	250536	18.1
介休	68445	378565	5.5	29.6	151523	11.0
孝义	13048	99709	7.6	7.8	155573	11.3
临县	1710	31592	18.5	2.5	285632	20.7
石楼	5561	27610	5.0	2.2	39439	2.9
永宁	15607	74071	4.7	5.8	207552	15.0
宁乡	4149	24054	5.8	1.9	105519	7.6
合计	192076	1277834	6.7	100.0	1380564	100.0

资料来源:乾隆数据引自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卷7《户口》。

说明:民国时期永宁州改名离石县,宁乡县改名中阳县,1953 年此两县仍沿用民国所改之名。民国年间析离石县设方山县,1953 年方山县人口并入永宁州一并计算。

在乾隆三十四年的数据中,户均口数在 4~6 之间的有四个县,其余各县户均口数均高于 7,最高的临县竟达 18.5 口。与 1953 年各县人口占全府人口中的比例进行对照,除平遥、石楼二县接近外,其余六县皆相差甚多。

这是否意味着乾隆年间的的数据都是不可靠的。本卷的研究表明,乾隆年间户口浮夸的现象并不多见,低估则是最常见的错误。

户均口数过高
说明数据有问题。

临县、永宁及宁乡三地乾隆年间口的比例过低,与这三县口数的低估有关。甚至可以认为,在这三县中,乾隆三十六年仍存在登记“人丁”而非人口的现象。类似的情形在其他许多地方不只一次地出现过。

嘉庆《介休县志》卷4《田赋·户口》载,“乾隆三十一年实在土著民”68462户,男妇大小378828口,嘉庆十八年有户80887户,男妇大小595432口。两个年份的户均口数分别是5.5和7.4,从乾隆三十一年到嘉庆十八年,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6‰,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1‰。户的增长速度是合适的,口的增长速度偏高。

按每户5.5口的水平测算嘉庆十八年的介休县人口,可得人口44.5万,如果按照乾隆年间介休县的口数占全府口数的比例推测全府人口,得人口150.3万,少于《嘉庆一统志》所载。这实际上是由临县、永宁及宁乡三地的人口低估所造成的。

也就是说,根据嘉庆十八年介休县户口数推测,在嘉庆二十五年的汾州府的分县数据中,大约有30万口被漏记了。他们可视为临县、永宁及宁乡三州县少记的口数。根据3.6‰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三十四年,此三州县漏记的人口共有25万左右。乾隆三十四年,汾州府的总人口约为153万,临县、永宁及宁乡三州县人口占全府人口的25%。

在表9-10中,乾隆三十四年,临县、永宁和乡宁三地人口只占全府人口10.2%,1953年则占43.3%。笔者修正的结果,使乾隆三十四年三县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但远不及1953年的比例。如果按照1953年临县等三县的人口比例进行测算,乾隆三十四年汾州府人口可能超过200万人,这显然是不真实的。1953年临县等三县人口比例的上升,与光绪大灾的影响有关。我们注意到临县等三县位于汾州府的西北部,三县连成一片。在光绪大灾中,此三县所受影响可能较汾州府其他地区为小,才导致其人口比例的上升。

根据这一测算,从乾隆三十四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汾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乾隆四十一汾州府人口为156.7万。

光绪大灾的影响使我们不能够在研究中利用1953年的数据。

3. 平定州

该地区 1953 年的行政区划变动较大,平定州析分出阳泉市和昔阳县,而阳泉又是山西两个大的工矿区之一,其人口增长受到工业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分析时,前面所运用的区域人口比例分析法就失去了基础。

光绪《平定州志》卷 5《食货·户口》载,乾隆四十一年平定本州有户 27026,口 122262。嘉庆二十五年有户 27999,口 133082。道光三十年户 28687,口 135868。从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二十五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从乾隆四十一年到道光三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4‰。而嘉道间的增长率不及 0.7‰。乾隆四十一年以后,尤其是嘉庆年间的数字可能偏低。

在光绪年间,昔阳县为平定州之乐平乡。光绪《平定州志》卷 5《食货·户口》载,乾隆四十一年乐平乡有户 16678,口 71559;五十年有户 16887,口 73395。大约十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8‰。

光绪《寿阳县志》卷 3《赋役·户口》载有从雍正九年到乾隆五十年的户口数据。在乾隆三十六年以前,全县户数约 4000 余,口数约 40000 余。乾隆三十六年,户数猛增至 48126,口数猛增至 236549。很显然,乾隆三十六年以前的户口实际上是“丁”。乾隆五十年,口数增至 251699,14 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4‰。这一增长率较前两个县过高,可能是由该县乾隆三十六年的口数略低于实际所致。

综合三县情况,将平定州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定为 3‰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据此速度测算,乾隆四十一年平定州人口约为 56.1 万。

4. 辽州

光绪《榆社县志》卷 2《田赋·户口》载,“乾隆七年造报县属”所有厢里“土著民人”共 9813 户,“内男妇大名口”19606,“男妇小名口”29529,共 49135 口,户均 5 口。单从户均口数来看,该县的户口应是可信的。

洪武二十四年和 1953 年辽州分县户口数,见表 9-11。

表 9-11 洪武二十四年和 1953 年辽州分县户口

州 县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				1953 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口比例(%)	人 口	比例(%)
和 顺	2771	26377	9.5	31.8	80435	32.0
榆 社	5339	36685	6.9	44.3	71306	28.4
辽 州	3469	19756	5.7	23.9	99534	39.6
合 计	11579	82818	7.2	100.0	251275	100.0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9-1。

说明：辽州本州即今左权县。

从表 9-11 中可以看出,在两个年份中,只有和顺县的比例相当,其他两个县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无论是按照洪武二十四年的比例,还是按照 1953 年的比例,测出的乾隆七年的辽州口数共有 15.5 万,该州嘉庆二十五年有 212715 口,从乾隆七年至是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依此速度,乾隆四十一年辽州人口总数约为 17.8 万。

5. 代州

光绪六年《代州志》卷 4《赋役志·户口》载有光绪六年户口数,见表 9-12。

表 9-12 光绪六年和 1953 年代州分县户口

州 县	光绪六年(1880 年)				1953 年		年平均 增长率 (‰)
	户	口	户均 口数	口比例 (%)	人口	比例 (%)	
代 州	19629	108790	5.5	18.8	131331	17.5	2.6
五 台	17893	120905	6.8	20.9	205666	27.5	7.3
崞 县	30130	240112	8.0	41.4	274121	36.6	1.8
繁 峙	9384	109791	11.7	18.9	137332	18.3	3.1
合 计	77036	579598	7.5	100.0	748450	100.0	3.5

资料来源：光绪《代州志》卷 4《赋役志·户口》。

从表 9-12 中可见,光绪六年繁峙县的户均口数过高,笔者怀疑其户数当为“19384”之误,若此则该县户均口为 5.7,比较合理。将两个年份的比例做一比较可以看出,由于 1953 年五台县人口占全州比例升高,从而使其余三县的比例皆低于 1880 年。再看增长率,以五台县的最高,崞县的最低,而代州和繁峙两县则相差不大。如果将五台和崞县剔除,则代州和繁峙二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合计为 2.8‰。该州嘉庆二十五年共有 51.3 万口,从嘉庆二十五年到光绪六年的增长率为 2‰,从嘉庆二十五年到 1953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也是 2‰。尽管光绪大灾对该州的影响不大,但代州的人口还是损失了 4.4% 左右。如此,我们将嘉庆以前的增长率定在 3‰ 应当是合适的。

另外,由于忻州、保德州和宁武府没有相应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因此,参照代州将乾隆、嘉庆年间三府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亦定为 3‰。如此,乾隆四十一年四地人口数分别为 45 万、32 万、12.4 万和 21 万。

四、晋北区

从表 9-13 中的数据看,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归绥六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最高,是大量移民涌入清水河厅等地所致。乾隆四十一年《大同府志》卷 13《赋役·户口》称:“本府所属各州县并大同左等十四团操,现在土著民人共九万七千七百七十八户,内男大名妇大口共三十七万四千一十三名口,男小名女小口共三十二万八千三百八十八名口外,丰镇厅新设地方种地居民共计七千六百五十七户,并非土著。”合计共有丰镇厅以外的大同府共有人口 702401,如加上丰镇厅新近移入的移民人口(以每户 3 口计),大同府人口总数约为 72.5 万。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3‰。在这一推测中,假定嘉庆二十五年大同府户口包括了丰镇厅等地的移民。此后,从 1820 年至 1953 年大同府人口以较高速度增长,既与移民有关,又与城市的发展有关。

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朔平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2.7‰。该府虽然也受到清代后期以来移民迁入的影响,但移民迁入的规模不大,近代商业浪潮和城市化对该区的影响也不大。所以,朔平府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一个农业社会的人口自然增殖。

如此,我们可以按照 2‰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对乾隆、嘉庆年间的口外诸府人口进行估测,乾隆四十一年,归绥六厅和朔平府人口数分别为 11.1 万和 48.5 万。

五、结语

综合上文分析,可将山西各府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及 1953 年人口数,列如表 9-13。

表 9-13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山西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解 州	65.1	5.3	80.0	5.6	56.7	3.5
绛 州	75.3	6.1	101.7	7.1	75.3	4.6
蒲州府	88.8	7.2	110.9	7.7	62.8	3.9
平阳府	124.8	10.2	139.8	9.7	122.1	7.5
隰 州	11.5	0.9	13.4	0.9	14.6	0.9
霍 州	30.1	2.5	35.1	2.4	31.4	1.9
泽州府	75.5	6.2	90.0	6.3	111.0	6.8
潞安府	78.9	6.4	94.1	6.6	125.3	7.7
沁 州	22.4	1.8	26.7	1.9	34.1	2.1
辽 州	17.8	1.5	21.3	1.5	25.1	1.5
汾州府	156.7	12.8	180.7	12.6	138.1	8.5
太原府	183.0	14.9	208.7	14.6	192.8	11.9
平定州	56.1	4.6	64.0	4.5	92.4	5.7
忻 州	32.0	2.6	36.6	2.6	48.7	3.0
保德州	12.4	1.0	14.1	1.0	13.7	0.8
代 州	45.0	3.7	51.3	3.6	74.8	4.6
宁武府	21.0	1.7	23.9	1.7	24.5	1.5

续表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大同府	70.2	5.7	76.5	5.3	201.4	12.4
朔平府	48.5	4.0	53.0	3.7	75.5	4.7
归绥六厅	11.1	0.9	12.1	0.8	101.1	6.2
合 计	1226.2	100.0	1433.9	100.0	1621.4	100.0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山西口数为 1462.7 万,较表 9-13 稍多,这是由于本节对山西若干府的口数进行修正后所致。《清朝文献通考》载乾隆四十一年有 1250.3 万,亦较本节估计稍多,同样可理解为若干府的口数偏多所致。总的说来,与其他省份相比,无论是《嘉庆一统志》还是《清朝文献通考》,所载山西户口数都是相当准确的。

《清朝文献通史》和《嘉庆一统志》所载山西户口数相当准确。

从清代中期至 1953 年,府级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变动幅度很大。影响这种变动的因素,一是光绪年间的大旱灾,一是晋北口外地区的移民。光绪大灾对山西各府人口的影响,详见本卷第十五章的有关论述。

第二节 陕 西

道光《秦疆治略》记载了道光三年陕西的分县户口数。其行文方式为“道光三年查明共男女大小二十三万七千余名口”,千位数以下,皆略而不详。在有些地区,则将百位数以下数字省略。将各府分县累加的口数与《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口数对照,两个年份的数据差异甚小,或由于道光《秦疆治略》忽略千位或百位以下数字所造成,或由于《秦疆治略》本身的数据错误所造成。分府而论,在有些府,道光《秦疆治略》中的记载实际上就是《嘉庆一统志》的记载,只不过道光《秦疆治略》将各县口数皆登记在册,而《嘉庆一统志》只记载到府级而已。基于这一理由,当《秦疆治

道光《秦疆治略》所载与《嘉庆一统志》有许多相同之处。

略》所载府级口数与《嘉庆一统志》相同时,我将《秦疆治略》所载视作嘉庆二十五年数。当《秦疆治略》所载数据多于《嘉庆一统志》时,我则认为《秦疆治略》所载为道光三年数。

乾隆《西安府志》和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户口》记载有乾隆年间若干个年份的分县户口数,表9-14中列有乾隆《西安府志》中的数据。当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与乾隆《西安通志》所载有较大差异时,则用两个数据相互校勘。分府讨论如下。

一、关中地区

1. 西安府

乾隆四十三年、嘉庆二十五年和1953年西安府的分县人口数见于表9-14,乾隆四十三年男女口数不列入,读者可从性别比中加以判别。

表9-14 乾隆四十三年、嘉庆二十五年和1953年西安府分县人口

州县	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口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口	性别比			1778— 1820年	1821— 1953年
长安	147110	145.2	259000	689374	3.1	
咸宁	352327	156.6	310000	787259	3.1	7.2
咸阳	104580	156.5	114600	210404	2.2	4.7
鄠县	131225	139.6	134900	188680	0.7	2.5
同官	33663	162.0	43000	97785	5.8	6.2
渭南	277506	132.1	289000	333608	1.0	1.1
蓝田	88617	130.7	183000	349302	17.4	4.9
临潼	194263	138.0	234000	329759	4.4	2.6
富平	228081	136.5	228000	292422	0.0	1.9
耀州	58022	108.1	64000	98070	2.3	3.2
高陵	53288	137.6	61000	90189	3.2	2.9
三原	162405	128.5	163000	147601	0.1	-0.7
泾阳	91763	189.6	237000	194673	22.8	-1.5
孝义			44600	83093		4.7

续表

州县	乾隆四十三年 (1778年)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口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口	性别比			1778— 1820年	1821— 1953年
宁陕				44459		
醴泉	122447	130.7	114000	189491	-1.7	3.8
兴平	143740	164.6	133000	229090	-1.8	4.1
盩厔	234331	124.7	306000	282959	6.4	-0.6
合计	2423368	140.8	2918100	4638218	4.4	3.5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三年数据引自乾隆四十四年《西安府志》卷13《食货志·户口》。
嘉庆二十五年数据引自道光《秦疆治略》。

说明：1953年咸宁县人口中包括西安市人口。宁陕厅设于嘉庆五年，不知为何没有数据。孝义厅设于乾隆四十七年，析咸宁、蓝田、镇安三县地设。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西安府口数为2962547，较《秦疆治略》多出44447口。此为道光《秦疆治略》略写数据产生的误差，不加讨论。乾隆《西安府志》卷13所载男女口数，男性大大多于女性，性别比高达140，女性人口严重漏记。由于我们不知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性别比是否正常，因此，也就无从对乾隆四十三年女性人口进行修正。

西安府城的附郭县有二，一为长安县，一为咸宁县。1953年的西安市兼有此两县之地，因无法析分，故将两县合而计之。1953年西安市人口达到78.7万余人，而据本卷第十七章的论述，清代中期，西安城大约只有5.5万人口，130年间人口增加了近70万。扣除西安城市人口高速增长的因素，长安、咸宁两县自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足3‰，人口增速不快。

鄠县的数据存在一些问题。据表9-14，乾隆四十三年鄠县人口达13万余，至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几无增长。而据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户口》的记载，乾隆四十二年鄠县军民共18371户，男女大小112143口。此数据来自“县志”。以此为依据，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鄠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4‰。

乾隆、嘉庆年间渭南、富平、三原、醴泉、兴平等县人口的增速偏低甚至出现负增长,大多是不正常的。试就数县分析如下:

光绪《富平县志稿》卷3《风土民·户口》称:“乾隆初知县乔履倍编闾境为九十九联,每联选正长各一人领之。由官出示给割,奉行已久,四民相安,计闾境共一千八十七堡,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八户,丁男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八名,妇女八万六千三百一口。迨乾隆四十三年知县吴六鳌重修志录,编查户口,闾县共一千一百三十八村堡,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二户,丁男十三万六千七百六十八名,妇女九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口。”将乾隆四十三年与乾隆初年数据比,村堡略有增加。以“乾隆初”为乾隆七年计,富平县“户”和“丁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6‰和1.8‰,与乾隆以后富平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体相同。这一记载说明,乾隆年间西安府的户口调查,是自乾隆初年开始的。乾隆四十三年户口数较乾隆初年略有增加,户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太低。再查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与乾隆四十三年几乎相同,说明嘉庆以后富平县的口数只是抄袭以前,甚至我怀疑乾隆四十三年的人口数也可能不是调查所得,有拼凑的可能。

光绪《兴平县乡土志》卷3《户口》载,乾隆四十年户17899,口142465。乾隆四十三年口数增至143740,年平均增长率为3‰。嘉庆二十五年降至13余万人,颇不正常。我更相信3‰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正常的。

光绪《三原县志》卷3《田赋·户口》载,“咸丰十一年,保甲册户口男女大小十六万三千余名口”。这一数据与表9-14中的乾隆、嘉庆年间数据相同。从乾隆四十三年至咸丰十一年,三原县人口几成停滞,显然是不可能的,乾隆以后的数据均不可信。

从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蓝田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4‰,此与外地移民的迁入有关。《秦疆治略》“蓝田县”条下称:“东西北三原地本平原,民皆易治,惟南乡一带均系崇山峻岭,沟岔纷歧,与孝义、商州、镇安、雒南在在毗连,犬牙交错,且有远至二百里以外者。江楚客民殆居大半,虽无开设木厢铁厂处所,佃地佣工之辈,来去靡常,每易潜藏匪类。惟有设立保甲,发给

蓝田县人口的高速增长与移民的大量迁入有关。

门牌,慎选良民充当甲长,地方官随时稽查,不许容留匪徒,则民安耕凿矣。”在有关移民史的研究中,我已经证明,陕西南部地方的移民迁入,主要发生于乾隆、嘉庆年间。也就是说,蓝田县这一时期的人口激增,实与大批江楚客民的迁入有关。移民的入籍有一个过程,各县的情况有所不同,乾隆四十三年及以前的迁入者,未必都能够在乾隆四十三年入籍。上引在蓝田南乡设立保甲的决定,与移民的入籍工作是相互关联的。嘉庆以后,移民浪潮大致平息,人口的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口的自然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疆治略》所载蓝田县的口数,是包括了南乡客民的。

盩厔县的情况也是如此。从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盩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 6.4%,嘉庆以后,人口呈负增长。《秦疆治略》称:“(盩厔)县向来皆是老林,树木丛杂,人迹罕到。自招川楚客民开山种地,近年各省之人俱有。虽深山密箐,有土之处,皆开垦无余。道光三年查明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兼有大木厢三处,板厢十余处,铁厂数处,供厢之人甚多。其中良莠不齐,稽查匪易,惟有严行保甲,慎选乡正,时常抽查,方保无虞。”从这一记载看,嘉庆二十五年盩厔县的户口册包括了这 15 万客民。又因乾隆四十三年盩厔县有人口 23 万余,因此,我以为其中已包含一定数量的外省客民。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山区木资源的枯竭,在“木厢”或“板厢”中工作的客民大多四散。盩厔县的人口因而呈下降状。这一点,盩厔县与没有“木厢”的蓝田县是不同的。

泾阳县的情况需要加以特别的讨论。《秦疆治略》称泾阳县“地系平原,无木厢窑厂,亦乏深山老林,且附近省垣,人非山野愚顽可比”,并无移民迁入。然而,从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泾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2.8%,实在是太高了一点。究其原因,乾隆四十三年泾阳县的人口性别比高达 190,女性人口严重漏记。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 记载乾隆五年泾阳县户数为 16262,口数为 118398,如果以乾隆《西安府志》所载男性人口为确数,则性别比为 103,正合标准男女性比例。只是该志记载的时间为“乾隆五年”,乾隆初年少见非纳税单位的“人口”调查与统计,笔者疑此为乾隆四十五年之误。

盩厔县人口消
长与“木厢”兴衰
有关。

嘉庆二十五年泾阳县人口多达 23 万余,明显不正常。查宣统《泾阳县志》卷 2《地理下·祥异》,道光二十一年土著烟户 23717,客户 6073,口 160700,商民 32500,并说明此引自“胡志”,即道光《泾阳县志》。道光二十一年商民不计的在籍人口只有 16 万余人,在前后数据的对比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无疑是比较合理的。从乾隆四十五年道道光二十一年,泾阳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

泾阳县工商业
给人印象深刻。

泾阳县与咸阳、长安等县毗邻,在近代城市化浪潮中,其人口可能受到城市的吸引而迁入城市,构成人口的外迁。《秦疆治略》称泾阳:“惟商贾云集之区,四乡民情各别,其东乡一带皮毛工匠甚多……县城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藉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而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其中良莠不齐,时生事端。”在《秦疆治略》记载的陕西各县中,惟有泾阳县的工商业给人的印象最深。宣统《泾阳县志》所载 32500 名商民即为户籍不在泾阳的外来者。

经过上文讨论,我们大致可知乾隆、嘉庆年间,西安府一般县份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4‰,南部若干县因移民的大量迁入,人口有较快的增长。比较而言,在西安府,乾隆年间的人口数较嘉庆年间更为可靠。因此,在排除南部的蓝田、盩厔、同官、临潼四县后,合计有人口 187.2 万,按 3.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①,嘉庆二十五年西安府的其他 14 县合计有人口约为 217.8 万,加上蓝田和盩厔、同官、临潼四县人口,合计有人口 294.4 万。从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6‰。

清代中期至 1953 年,西安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4‰左右,与同时期北方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相似。在经历了同治

^① 当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 3‰~4‰之间时,我倾向于取 3.4‰作为计算值。因此,在许多地区,类似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常常为 3.4‰。3.4‰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经验数值。

年间的回民战争及光绪大灾以后,西安府人口的恢复速度相当快,几十年间,人口的巨大损失已为增长的人口所抵消。

2. 同州府

乾隆三十四年《郃阳县志》卷2《田赋志》记载,乾隆三十三年户 30016,口 617898。“视乾隆元年户增二十,口增四十有九;视顺治初户增二万三千三百一十有六,口增五十四万八千八百八十有三。”这就排除了乾隆三十三年口数抄错的可能。《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郃阳县男女大小共 266800 余名口,较乾隆三十三年数大大减少。《嘉庆一统志》所载同州府总口数为 1805219,由此可知,乾隆《郃阳县志》完全是错误的。

用多种文献比勘,可以发现某些文献记载中的错误。

再看蒲城县。光绪《蒲城县志》卷3《经政志·户口》称,乾隆四十八年户 52378,口 282673。道光三十年户数为 65040,口数为 302976,咸丰十年户数与口数略有增加。然而,《秦疆治略》记该县男女大小 303000 余名口。基于我们对《秦疆治略》所载数据的信任,推测光绪《蒲城县志》中的道光三十年及咸丰十年的户口数可能是编造的。

嘉庆《续潼关县志》卷2《田赋志·户口》记载嘉庆元年户 888,口 38590,“视乾隆三十年户多”109,口多 771。至嘉庆二十年,户 8750,口 43865。从乾隆三十年至嘉庆元年的三十年间,潼关县的户数与口数基本未变,只能说明嘉庆元年的数据有误。户数太少,不予讨论,据此可知乾隆三十年的口数为 37819。从乾隆三十年至嘉庆二十年,潼关县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

表 9-15 显示道光三年至 1953 年同州府各县的人口及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表 9-15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同州府分县人口

州 县	道光三年(1823 年)	1953 年	年平均增长率(‰)
白 水	188900	101851	-4.7
蒲 城	303000	278516	-0.6
澄 城	181000	144765	-1.7
韩 城	197000	137257	-2.8

续表

州 县	道光三年(1823年)	1953年	年平均增长率(‰)
郃 阳	266800	193204	-2.5
朝 邑	212000	181338	-1.2
大 荔	223500	147326	-3.2
华 州	153500	171972	0.9
华 阴	126000	137455	0.7
潼 关	46000	67968	3.0
合 计	1897700	1561652	-1.5

资料来源：道光三年数据来自《秦疆治略》。

由于同治年间的战争和光绪大灾的影响，清代后期同州府的人口大幅度减少，除了潼关、华阴和华州三地外，其他各县人口均有减少。就光绪大灾而言，潼关、华阴和华州均处于陕西往河南的大道两旁，交通便利，所能得到的赈济可能较他处为多。因此，在严重旱灾的袭击下，此三地所受损失最小，130年间人口仍呈增长状。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记载嘉庆二十年潼关厅有8750户，43865口。道光三年口数与表9-15同。道光三十年户为9415，男女大小为49036口。嘉庆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与道光三年至1953年人口增长速度相似。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记载朝邑县乾隆五十八年有35997户，男女大小209674口。从乾隆五十八年至道光三年，朝邑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4‰，几至于无增长。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记载郃阳县乾隆三十三年有30016户，617898口。此处的口数明显有误。如果认为乾隆三十三年的人口数为167898，庶几合理，但与道光三年的人口数不能对应。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记载澄城县乾隆四十八年户数为29705，口数为158310。从乾隆四十八年到道光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与潼关的情况相似。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记载华州“乾隆时”军民户共

27790,口共 131627。如果此“乾隆时”为乾隆四十八年,到道光三年,华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9%。华州人口增长速度较高,可能与“乾隆时”的时间确定偏晚有关。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 记载华阴县道光三十年户数为 22949,男女大小为 141808。由于户均口数多达 6.2,所以,尽管从道光三年到三十年华阴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5.9%,但却是不可信的。如果以户均 5 口计,道光三十年华阴县仅有 114745 口,少于道光三年口数。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 记载蒲城县乾隆四十八年有 52378 户,282673 口。然而,所谓乾隆四十八年户口数在乾隆四十七年《蒲城县志》中即已出现,此数据可能是乾隆四十一年调查数。从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年,蒲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5%。此人口增长速度低于潼关等县。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此 130 多年间潼关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接近无战争又无灾害状态下同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以《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 1805219 口为基准,以 3% 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乾隆四十一年同州府人口数约为 158.2 万。

3. 鄜州直隶州

鄜州位于陕西中部地区的北部,与陕北的延安府毗邻。《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鄜州的口数为 272400,《嘉庆一统志》的记载却是 313840 口。在其他地区,《秦疆治略》所载口数大多与《嘉庆一统志》相近或稍多。相近者,可能是后者抄录前者;稍多者,可能是前者数据的时代晚于后者。鄜州府的情况相反,道光三年的数据竟然大大少于嘉庆二十五年。

可用县级户口数据来验证府级数据的可靠性。民国《洛川县志》卷 6《人口志》记载乾隆元年全县男性 17657,女性 13435,合计 31092 口。乾隆十六年、十九年和二十一年三年口数均为 33000 余人。很明显,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的洛川县口数都是从乾隆元年的数据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而乾隆元年的数据根本不具有人口统计的意义。

无战争、无灾害状态下,人口呈低增长。

用县级户口数据来验证府级数据的可靠性,是本卷常用的方法。

据同一志记载,乾隆五十一年,洛川县有户 18605,有口 90293,户均 4.9 口,符合标准形态。口数的猛增说明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然而,该志在这一记载下又云:“此据保甲册,流寓客商、兵丁、军流、雇工、僧道等,一例编入。实在土著、寄籍为八万七千五百一十口,往来无常者二千七百八十三口,较上届户减二户,添男妇大小四口。”也就是说,乾隆五十一年并不是统计口径变化的起始年份,在乾隆五十一年之前,至少还有一次户口调查。乾隆五十一年的人口调查,已经不是调查,而是编造,即在原有数据基础上的编造。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拥有近 10 万人口的县份,“一届”(一年或数年)的户口变动只有 2 户和 4 口。

按照我们对乾隆年间户口调查的一般知识,人口普查意义上的户口调查,大约自乾隆四十一年始。如果洛川的情况也是如此,乾隆四十一年左右有 18603 户,90289 口。乾隆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嘉庆元年、二年和七年的户数和口数均年有增加,此不引述。嘉庆七年,户数为 18667,男女大小合计为 94498,分类口数不引。该志说明:“口数据黄册。但保甲册,流寓客商一例编入,实计土著八万七千八百一十三口,往来无常者三千五十七口,共计九万八百七十口,少于黄册之数。”这一说明也与乾隆五十一年数据之下的说明大体相同。至道光三年,《秦疆治略》记载洛川县口数为 98400。依上引资料,可知这一数据包括土著、寄籍和往来不常的人口。从洛川县的例子看,《秦疆治略》所载道光三年的数据与乾隆四十一年以后的数据是能够吻合的。

由于缺乏的更多的县级资料,所以,对于《秦疆治略》中的口数竟然大大少于《嘉庆一统志》所载口数一事找不到合适的解释。表 9-16 显示道光三年和 1953 年鄜州直隶州的人口变化。

从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年,洛川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1‰,从道光四年至 1953 年,仅为 0.9‰。道光三年至 1953 年,鄜州所属其他三县人口均只减不增,是同治年间的战乱和光绪大灾影响所致。洛川县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代表这一时期鄜州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是,《嘉庆一统志》所载口数偏高,《秦疆治略》的记载应是正确的。

表 9-16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鄜州分县人口

州 县	道光三年(1823 年)	1953 年
洛 川	98400	111303
宜 君	63900	52528
中 部	37500	35648
鄜 州	72600	48782
合 计	272400	248261

资料来源：道光三年数来自《秦疆治略》。

说明：1941 年析洛川县置黄龙县，1953 年洛川县人口中包括黄龙县人口。

以 2.1‰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三年中鄜州所增人口仅为 1000 余人。又因《秦疆治略》所载是一个略数，实际人口略高于 272400。据此判定，嘉庆二十五年鄜州口数约为 27.2 万，乾隆四十一年鄜州人口约为 24.8 万。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 记载嘉庆十一年中部县有 5977 户，男女大小 31212 口。若此数据为真，则从嘉庆十一年到道光三年，中部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0.9‰。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中部县，究竟是嘉庆十一年还是道光三年的数据有误，则不知晓。

二、陕南地区

1. 兴安府

乾隆四十七年兴安州升为府，嘉庆《续兴安府志》卷 2 记载有嘉庆十七年兴安府分县户口数。道光《石泉县志》卷 5《户口志》记载全县城乡通计 11657 户，74103 口；并称：“视乾隆五十二年户增六千三百五十二户，口增四万四千三百九口。”即乾隆五十二年石泉县有 5305 户，29749 口。嘉庆《续兴安府志》卷 2 记载嘉庆十七年石泉县有 5305 户，29947 口，户数完全相同，口数稍有差异，看来也只是数字次序的颠倒而已。由此可以判断，所谓“嘉庆十七年”户口数，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数。另外，道光二年析出的砖坪厅，在《秦疆治略》中并无户口数的记载，《嘉庆一统志》载嘉庆

《秦疆治略》抄
《嘉庆一统志》。

二十五年兴安府 1214239 口,与《秦疆治略》中的数据极接近。这说明《秦疆治略》所载是道光二年以前的数据,即《秦疆治略》照抄了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

乾隆、嘉庆和 1953 年兴安府户口数,详见表 9-17。

表 9-17 乾隆五十二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兴安府分县户口

县 厅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口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安 康	25066	153884	6.1	389300	437861
洵 阳	18174	83972	4.6	243500	272442
白 河	10320	51111	5.0	90400	130175
平 利	28154	148099	5.3	178600	162414
紫 阳	15717	59819	3.8	126700	227328
汉 阴	14081	83841	6.0	123300	163523
石 泉	5305	29947	5.6	87900	103125
镇 坪					32558
砖 坪					119382
合 计	116817	610673	5.2	1239700	1648808

资料来源:乾隆数据引自嘉庆十七年《续兴安府志》卷2《食货志·户口》;嘉庆数据引自《秦疆治略》。镇坪县 1920 年由平利县析置。砖坪厅 1822 年由安康县析置。

根据表 9-17,可以得出表 9-18。

表 9-18 清代至 1953 年兴安各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县 名	1787—1820 年	1821—1953 年	1787—1953 年
安 康	28.5	0.9	6.3
洵 阳	32.8	0.8	7.1
白 河	17.4	2.7	5.6
平 利	5.7	-0.7	0.6
紫 阳	23.0	4.4	8.1
汉 阴	11.8	2.1	4.0
石 泉	33.2	1.2	7.5

续表

县名	1787—1820年	1821—1953年	1787—1953年
镇坪			
砖坪			
合计	21.7	2.1	6.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9-17计算。

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兴安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7%,短短的33年间人口增加1倍有余。《秦疆治略》称安康县：“北乡皆崇山峻岭，土地瘠薄，土著流寓参半，较东、西、南三乡辽阔数倍。风俗亦甚浇薄，鲜知礼让，斗狠轻生，繁兴讼狱。又有纸厂六十三座，工匠众多。自道光二年(1822)将西南一带砖坪地方改设抚民通判，划疆分治，现今户口尚甲他邑。”此记载称北乡“土著流寓参半”，未提及南乡之流寓。实际上，砖坪厅的析出，就是安置流民的结果。同书在“砖坪厅”条下记载：“所管地界，均系安康、平利两县分拨，土著民少，客户民多。”也就是说，安康县的外来移民不仅分布在北乡，也同样分布在南乡。

逐县列举兴安府属县的移民状况并不是本书的任务。仍以安康县为例，时人称安康：“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1772—1773)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倚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①石泉县也有同样的记载，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石泉县”条下称：“(乾隆)三十七八年(1772—1773)间，川、楚歉收穷民就食来陕，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安徽、江西等自贫民亦复携家室源源而来，于是户口聚增数倍，迄今安居乐业，悉为土著。”嘉庆年间因白莲教起义，又有一次新的移民浪潮。《秦疆治略》在“石泉县”条下称：“嘉庆初年(1796)以前，民间富厚淳朴，讼狱亦简，且畏见官，

兴安府人口高速增长与移民大量迁入有关。

^① 嘉庆《安康县志》卷17《文征》。

号称易治。自白莲教乱,富者去而之他,贫者流而为匪。川楚无业之徒纷纷而来,开山种地。”此资料未提及嘉庆以前的移民迁入,是为错。

如果依上引嘉庆《安康县志》的记载,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前,安康县荒山僻壤,“土著无多”,那么,乾隆五十二年安康县的15.4万在册人口中,一定含有外来的移民。然而,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记载嘉庆十七年安康县户口数与表9-17中乾隆五十二年户口数相同,又记“客籍户一万六千七百有九,男女大小四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口,只身客籍三千七百一十七口,僧道籍三千七百一十七口”,并称此引自《府志》。很明显,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的作者将嘉庆十七年《续兴安府志》中的户口数当作修志当年的数据了。户口数之外的“客籍”、“只身客籍”应当是新入籍的移民人口。乾隆五十二年的人口,一定有相当比例的早已入籍的移民人口。

紫阳县的情况需详加讨论。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在引述嘉庆十七年《续兴安府志》中的户口数据后接着指出:“案县志乾隆四十年男女大小二万五千六百九十口。”较乾隆五十二年减少34129口。如果县志中所载乾隆四十年的人口数没有错误的话,则乾隆四十年至五十二年之间紫阳县有大批人口入籍并引起人口的迅速增长。紫阳县的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三十七八年开始迁入的,因此,乾隆四十年该县人口中可能已经包括移民。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平利县”条下的行文格式是:“嘉庆十七年府志户二万八千一百五十四,男女大小八万三千九百七十二口。”户数与乾隆《续兴安府志》同,口数只有《续兴安府志》记载的一半略多,可能是将男性人口记入而将女性人口遗忘了。平利县是个移民人口迁入较多的地区,乾隆五十二年人口已占嘉庆二十五年人口的82.9%,似乎移民人口已经基本入籍了。类似的县份还有白河和汉阴。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四章中,我根据商州的资料,推测移民占嘉庆二十五年总人口的83%。由于移民的迁入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庆年间一直在进行,因此,时间愈早,土著人口的比例

愈大,移民的比例愈小。设乾隆五十二年兴安府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为外来移民,则土著人口只有 20 万左右。粗略估计,乾隆四十一年兴安府人口大约只有 10 万。

嘉庆以后兴安府人口的低增长,一是因为区域内部容纳的移民人口有限,道光以后,外来的移民不再作规模性迁入;二是因为森林资源的枯竭和山地玉米的种植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清代后期大批山区流民下山四散,人口大量减少,这以移民为主的平利县最为典型。然而,从总体上看,嘉庆以后兴安府的人口仍是增长的,只是增速较慢而已。

2. 商州

目前只查得商州四县乾隆七年(1742年)的口数。山阳县为 11794 口^①,镇安县为 3810 口^②,雒南县为 30714 口^③,商南县为 5852 口^④。一般说来,在其他省,尤其在南方,乾隆初期的户口调查大都是偏低的,大多数地区还没有从此前的“丁”的统计中解脱出来。从上引西安府富平县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乾隆初年西安府的户口调查,已经不再以“丁”作为单位了。商州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商州五县中,已查获四县口数证明这一年各县的户口调查是在统一的指令下进行的,且调查的是人口而不是“丁”。根据道光三年商州本州人口与雒南县人口的比例,推得乾隆七年商州本州的口数为 4.2 万人,合计商州总口数为 94670。

乾隆初年商州的户口调查,不以“丁”为单位。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由于当时未查获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我根据若干种县志得到除商州以外各县的户口数。对于商州本州的人口数则是根据 1953 年的商县人口在全州人口中的比例推测得出,共 42500 口。即使根据道光三年的各县人口比例,商州本州的人口也只比其他县稍多,可是,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中,乾隆七年商州本州的口数占全州人口的 77%。这当然是不可

① 嘉庆《山阳县志》卷 6《户口》。

② 民国《镇安县志》卷 3《户口》。

③ 乾隆《雒南县志》卷 4《食货·户口》。这一年雒南县编审户数为 5691,丁口为 30714,户均 5.4 丁口,可见此时的“丁口”已是人口。

④ 乾隆《商南县志》卷 3《户口》。

能的。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的记载是错误的,造成错误的原因不明。仍按照《中国移民史》中的研究,乾隆七年商州人口总数应为 94670。

表 9-19 乾隆七年、道光三年和 1953 年商州分县人口

县 名	乾隆七年(1742 年)			道光三年 (1823 年)口	1953 年 人口
	户	口	户均口数		
本 州	19190	174531	9.1	239000	297757
雒 南	5691	30714	5.4	172700	252668
山 阳	1851	11794	6.4	177700	234674
丹 凤					168181
商 南	1446	5852	4.0	91700	118515
镇 安	739	3810	5.2	159800	217237
合 计	28917	226701	7.8	840900	1289032

资料来源:乾隆七年户口数来自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道光三年口数来自《秦疆治略》。

说明:1949 年析商州(县)、雒南和山阳县设丹凤县。

康熙三十三年
山阳县以“户”为
单位的统计。

康熙《山阳县志》卷 2 记载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该县 1443 户居民的居住点。显然,这一数据是户而不是“丁”。至乾隆七年,山阳县户数为 1851,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2‰。这一增长速度可视为大移民迁入前土著人口的增长速度。据此估计,乾隆四十一年商州总口数约为 11.3 万。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商州口数为 75.2 万,《秦疆治略》所载口数为 77.1 万,这证明后者所载为道光三年数。乾隆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7.3‰,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三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4‰。外来移民的迁入时间主要是在乾隆后期至嘉庆时期。

规模性的移民迁入商州,大致是在乾隆四十一年之后。光绪《雒南县乡土志》卷 3《人类》称雒南县:“乾隆初,中干山南老林未开,土地荒芜。及四十三四等年,安徽、两湖数省屡被灾侵,小民流徙,络绎前来,多散布于山谷间,渐次开垦,安然乐业,遂成土著,迄

今传四五世……较之各乡土著,诸旧族约计不过十分之二。”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镇安县”条下称:“县属土客杂居,有本地、下河之分。下河者,皖、湖、湘、赣诸省之人,为多自乾、嘉之际迁来,虽与土著通庆吊,缔婚姻,而俗尚不同,口音亦历传不改,然土著籍贯不过十之一,客籍已十之八九矣。”结合兴安府的情况,可将标准时点定于乾隆四十一年,所得多为大移民之前的土著人口。而至嘉庆二十五年,按 5.2‰的年平均增长率,商州土著人口可增至 14 万左右,占是时全体人口的 18.5%。此与“旧族约计不过十分之二”或“客籍已十之八九”大体吻合。

3. 汉中府

汉中府的情形与兴安府相似,但却没有兴安府那般可供研究的详实的资料。因此,将汉中府与兴安府及商州进行类比,或许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另外,由于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中记载了光绪二十三年汉中府分县(除褒城县外)户口数,因此还可对清代后期汉中府的分县在册人口变化进行一些分析,并据此对清代前期的人口增长进行推测。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汉中府分县人口数,详见表 9-20。

区域类比的方法。

表 9-20 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汉中府分县人口

州 县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年)口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
南 郑	262000	390877	3.0
褒 城	156900	186712	1.3
宁 羌	46600	207325	11.3
黎 坪		31124	
略 阳	69400	121733	4.2
沔 县	134700	160292	1.3
凤 县	173400	53926	-8.7
留 坝	94300	27465	-9.2
佛 坪		25496	0.6
洋 县	239800	260932	
城 固	210500	289679	2.4

续表

州 县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口	1953年 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
西 乡	52300	243710	11.6
定 远	134800	185280	2.4
合 计	1574700	2184551	2.5

资料来源：《秦疆治略》，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

说明：1953年汉中市人口记入南郑县。佛坪厅于道光五年从洋县、盩厔县析出；黎平县于1953年从宁强(羌)、褒城、南郑三县析出。

在西乡县和宁羌州，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以上，而同期的凤县和留坝厅，人口大幅减少，年平均减少9‰左右。

嘉庆二十五年西乡县的数据是严重低估的。严如煜说：“嘉庆年间巴山增设定远一厅，流民垦荒开山附籍者增至十余万户。”^①在《秦疆治略》中，嘉庆二十五年定远厅人口为134800，可见严氏所称之“户”实为“口”之误。定远厅是嘉庆七年析西乡县设立的，《秦疆治略》中西乡县口数仅52300，大大少于析出的定远厅，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按照一般的规律，母县人口的数量总是多于子县的。依同一时期定远厅的人口增长速度，嘉庆二十五年西乡县约有人口17.7万。

行文至此，查得道光八年《西乡县志·户口》载土著老民24114户，共男女大小95792丁口；新民14614户，82661丁口；总共38728户，178453丁口。这一数据与笔者上述根据人口增长速度所作推测是完全一致的。文献中漏载了12万左右的人口。宁羌州的情况也可能如此，依定远厅的人口增长速度，嘉庆二十五年有人口约15.1万。文献漏载人口也达10万左右。

或有人问，1953年留坝厅的人口之所以少于嘉庆二十五年，除了人口本身的减少外，是否与政区的调整有关？1953年析宝

《秦疆治略》中
西乡县人口严重
漏记。

留坝厅的人口
减少与生态环境
的恶化有关。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4。

鸡、眉县、洋县、岐山、留坝、佛坪和凤县设太白区(即今太白县),太白区的人口数只有 24445,平均每县划出人口仅为 3000 余人。加上这批人口,1953 年留坝厅的总人口也不过为 3 万人。而据道光二十二年《留坝厅志》卷 4《土地志·户口》的记载,留坝厅人口的确经历了一个从增加到减少的过程。乾隆三十八年留坝厅有 7851 户,乾隆五十七年增 1321 户,嘉庆十五年增 2564 户,嘉庆二十一年增 2835 户。合而计之,从乾隆三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一年,留坝厅在册户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4.5‰。这反映了移民大量迁入后,留坝厅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形。从道光元年开始,留坝厅在册户数开始减少。道光元年减 1189 户,道光十一年减 418 户,道光二十一年减 285 户。虽然减少的幅度远不如增加的幅度,但从道光末年至 1953 年的一个世纪中,持续不断的人口减少所带来的结果是惊人的。1953 年留坝厅人口只有嘉庆二十五年的三分之一弱,反映了清代中期对秦岭南麓掠夺式的经营结束以后,流民四散,地方经济一蹶不振的事实。

与留坝处于同一地理环境中的凤县,其人口的变动与留坝相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光绪十八年《凤县志》卷 3《赋役·户口》的记载,光绪年间凤县户止 10073,男女大小共 42087 口。据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这是光绪初年凤县的户口数。这一户口数与 1953 年人口可以对应。由此可知,凤县人口的减少,是在光绪以前发生的事。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佛坪厅”条下记载:“案厅志光绪八年户八千一百三十三,男女大小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口。户有土著,有客民。土著户四千二百二十八,口凡二万五千九百七十三,视道光五年设厅时户增三百七十一,口增四千一百四十三。”从光绪八年至二十三年,佛坪厅的户口大幅减少。详细的讨论见本卷第十三章。将光绪二十三年的佛坪厅户口与 1953 年对照,光绪二十三年的数据大致是合理的。同样的情况可见于略阳和留坝。

合而计之,嘉庆二十五年汉中府的人口总数约 179.5 万。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参照留坝厅及商州的例子,以

20‰年平均增长率作为标准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汉中府人口约为75.1万。

三、陕北地区

1. 绥德州

光绪《绥德州志》卷3《田赋志·户口》称乾隆四十九年绥德州民户、屯户合计14586户,101173口。《秦疆治略》载道光三年绥德州本州人口为113300。由此可见,光绪《绥德州志》所载乾隆四十九年数实为本州之户口数。《秦疆治略》记绥德四县合计口数为331300。《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绥德州口数为283712。《秦疆治略》所记应为道光三年数。道光三年和1953年绥德州分县人口数,见表9-21。

表9-21 道光三年和1953年绥德州分县人口

县名	道光三年(1823年)	1953年	年平均增长率(‰)
绥德	113300	164469	2.9
米脂	100900	98996	-0.1
吴堡	26400	43894	3.9
清涧	90700	94811	0.3
子洲		117167	
合计	331300	519337	3.5

资料来源:道光三年数据来自《秦疆治略》。

说明:1944年析绥德、米脂、清涧、横山、子长等县设子洲县。

道光三年的县级政区较1953年有很大的不同。1944年析绥德、米脂、清涧、怀远、子长五县置子洲县,绥德、米脂和清涧三县属清代的绥德府,怀远县(今怀远县)属清代的榆林府,子长县(即清代的安定县)属清代的延安府。米脂、清涧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过低,可能与政区调整有关。如果认为1953年子洲县人口的五分之二来自于清代的榆林府和延安府,1953年清代绥德府境的实际人口为472470人。道光三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7‰。

绥德本州人口
之低增长。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 记载乾隆四十九年绥德本州民屯共 14586 户,101173 口。从乾隆四十九年到道光三年,绥德本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9‰。从道光三年至 1953 年,绥德本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 2.9‰。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还记载:“同治六七八年兵乱,死亡约近万口,逃户亦多。”死亡人口不足 10%。从一个较长时期看,这次灾难尚不足以遏制绥德州人口增长的势头。

道光《清涧县志》卷 4《田赋·户口》记载乾隆间有 11638 户,58676 口。如果清涧县的这一户口数据与绥德州相同,也是乾隆四十九年,则从乾隆四十九年到道光三年,清涧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1.2‰。同一志还载道光七年“清厘保甲烟户册”,共户 15247,计民 92906。如以此数作为期末数,清涧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当会更高,这是不可能达到的高速度,不予采信。

以《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绥德府口数为基点,以 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 24.9 万。

2. 榆林府

《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榆林府口数为 531100,《嘉庆一统志》所载为 515264。据此可知,《秦疆治略》所载确为道光三年数。

道光《榆林府志》卷 22 记载了乾隆四十年(1775 年)、嘉庆十年(1805 年)、道光三年(1823 年)及道光十九年的户口数,其中道光三年口数与《秦疆治略》所载相差 7759 口。《秦疆治略》所载榆林府各县口数有所省略,但省略的仅仅是百位数以下的数据。因此,上述差额并非统计误差。只是由于误差不大,姑且不计。乾隆至道光年间及 1953 年榆林府分县户口数,见表 9-22。

表 9-22 清代至 1953 年榆林府分县户口

年 份	榆 林	神 木	府 谷	怀 远	葭 州	合 计
1775 年						
户	13235	12000	15984	12973	18421	72613
口	85679	75691	71283	83640	92127	408420
户均口数	6.5	6.3	4.5	6.4	5.0	5.6

续表

年 份	榆 林	神 木	府 谷	怀 远	葭 州	合 计
1805 年						
户	14989	15454	20276	14266	19041	84026
口	96512	109277	85414	92212	96754	480169
户均口数	6.4	7.1	4.2	6.5	5.1	5.7
1823 年						
户	16540	15742	26071	13434	17410	89197
口	101283	109908	140036	97653	89979	538859
户均口数	6.1	7.0	5.4	7.3	5.2	6.0
1839 年						
户	20575	16050	26234	13711	17403	93973
口	103140	113717	204357	89031	89988	600233
户均口数	5.0	7.1	7.8	6.5	5.2	6.4
1953 年	165082	158844	112162	113547	119754	669389

资料来源：清代户口数据引自道光《榆林府志》卷22《食货·户口》。

从户均口数看,表9-22的数据表明榆林府各分县除葭州外,其他各县户口数均存在一些问题。然从人口增长速度看,葭州户口数据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兹将各时段的分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列如表9-23。

表9-23 清代至1953年榆林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年 代	榆 林	神 木	府 谷	怀 远	葭 州	合 计
1775—1805	4.0	12.3	6.0	3.3	1.6	5.4
1806—1823	2.8	0.3	29.5	3.4	-4.3	6.8
1824—1839	1.2	2.3	25.5	-6.1	0.0	7.2
1840—1953	4.2	3.0	-5.3	2.2	2.5	1.0
1775—1823	3.5	7.8	14.2	3.2	-0.5	5.8
1775—1953	3.7	4.2	2.5	1.7	1.5	2.8
1806—1953	3.7	2.5	1.9	1.4	1.5	2.3
1824—1953	3.8	2.8	1.7	1.2	2.2	1.7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9-22计算。

从 1775 年至 1805 年,神木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2.3‰,再从 1806 至 1823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猛降至 0.3‰。即使从 1775 年至 1823 年,神木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7.8‰,此后,又恢复到正常的水平。毫无疑问,乾隆四十年神木县的口数有所低估。以道光三年口数为基点,以 3‰的年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年的人口数应为 9.5 万。

从 1775 年至 1805 年,府谷县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偏高,再至 1823 年及 1839 年,府谷县的数据几至荒唐,各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得出奇。道光十九年,其人口已经大大超过 1953 年。按照 3‰的年平均增长率,以乾隆四十年口数为基点推测,道光三年仅有人口 8.2 万。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 在“府谷县”条下称自同治初回民起义至光绪初年的大荒及以后数次大疫,“约计县城川死者十之四五,四乡五口外死者亦十之二三”,人口死亡的比例大于绥德县。即使按照这一记载,道光十九年府谷县人口要超过 20 万仍是不可能的。因为,1953 年府谷县人口只有 11 万余人。

道光十九年府谷县人口过高。

怀远县的数据也存在问题。从 1824 至 1839 年,口数大幅度减少。《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怀远县的口数为 87600,较表 9-23 所载为低。从前后数据的比较看,《秦疆治略》所载似乎是正确的。道光《榆林府志》所载嘉庆十年及道光三年口数分别多了 1 万。

道光三年的葭州数据少于嘉庆十年,已属不合理,而道光十九年数据与道光三年数相同,更不合情理。按照 2‰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道光三年葭州人口应为 10 万。

合而计之,乾隆四十年榆林府口数约为 41.8 万,道光三年约为 48.1 万。以 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到嘉庆二十五年,约有人口 47.7 万。据此数,从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榆林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5‰。

3. 延安府

《秦疆治略》所载道光三年延安府口数为 629700,《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口数为 638352。道光三年的人口数要比嘉庆二

十五年少 8652,平均每县少 862 人。显然,《秦疆治略》对十位数字上口数的忽略,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误差。只是因差额不大,不作进一步的修正。

延安府道光三年和 1953 年人口数,见表 9-24。

表 9-24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延安府分县人口

县名	道光三年(1823年)	1953年	年平均增长率(‰)
肤施	61200	93905	3.3
延长	86100	58579	-3.0
甘泉	24100	19036	-1.8
宜川	79100	51172	-3.3
延川	49100	58866	1.4
安定	85600	84743	-0.1
安塞	36900	59809	3.7
保安	51500	41296	1.8
靖边	74800	86489	
定边	81300	101230	
吴旗 3/4		34396	
合计	629700	655125	0.3

资料来源:道光三年数据来自《秦疆治略》。

说明:1942年析志丹(即保安)、靖边、定边三县及甘肃省庆阳县置吴旗县。此处的吴旗县人口为1953年人口的四分之三。

1953年有若干县的人口少于道光三年,是同治年间的战争和光绪大灾的影响所致。民国《甘泉县乡土志·户口》称:“本境户口经同治六年先以兵荒,继以疾疫,终以野狼伤人,于是逃之者过半,后复经光绪三年奇旱、二十六年饥馑,而逃散死亡伤者又去十之七八。”其他人口减少的县份情况也当如此。

同一时期,肤施、安塞等县的人口呈增长状,其中肤施、安塞人口增长速度最高,分别为3.3‰和3.7‰。如果此两县未遭受同治战乱和光绪大灾的影响,它们的人口增长率就可作为正常状态下延安府的人口增长率看待。这一人口的增长速度与绥德州大体相似。如此,也就可以将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延安府的人

延安府正常的人口增长速度较低。

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 3‰。以《嘉庆一统志》中数据为基点,乾隆四十一年,延安府口数约为 56 万。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31 记载延长县乾隆二十六年户数为 5336,男女大小 21044。与道光三年数据比较,乾隆二十六年数太低,可能是“丁”数而非人口。

四、关中西部地区

1. 凤翔府

《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凤翔府口数为 1349800,《嘉庆一统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凤翔府口数为 1348428。《秦疆治略》所载确为道光三年数据。分县数据详见表 9-25。

表 9-25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凤翔府分县人口

州 县	道光三年(1823 年)	1953 年	年平均增长率(‰)
陇 州	251000	147892	-4.1
汧 阳	67000	65821	-0.1
凤 翔	207000	244548	1.3
麟 游	45000	47351	0.4
扶 风	158800	193041	1.5
岐 山	183000	211317	1.1
宝 鸡	323000	460041	2.7
郿 县	115000	124301	0.6
太白区		24445	
合 计	1349800	1518757	0.9

资料来源:道光三年数据来自《秦疆治略》。

说明:

[1] 1953 年宝鸡县人口中包含宝鸡市人口。

[2] 1953 年析宝鸡、郿县、洋县、岐山、留坝、佛坪、凤县七县置太白区。留坝、佛坪、凤县属汉中府。因太白区人口太少,本表不作析分。

宣统《岐山县乡土志》卷 3《户口》记载,乾隆四十八年以前,有口而无户。乾隆五十年户 20085,口 113461,户均 5.6 口。道光三年,岐山县口数为 183000,乾隆五十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人口增长的高速度可能与移民有关。

为 12.7‰。

《秦疆治略》在“岐山县”条下记载：“地近南山，土著与寄居习气不同，山壤与平原民风稍异。编户二十九里。道光三年查明土著、客户共一十八万三千余名口，西北二乡民情淳厚，乡居子弟或公起朋馆，或自延师课读，均各安业。东乡风气斗狠好讼，南乡有纸厂七座，厂主、雇工均系湖广、四川人，往往藏匿匪徒，且路通南山，稽查尤宜严密。”从这一记载中可知，岐山县南部的地区居住有一定数量的客民。乾隆五十年至道光三年人口增长的高速度可能与移民的迁入有关。

宣统《郿县志》卷3《政录·户口保甲》称，乾隆四十三年编查户 15791，口 77277，户均 4.9 口。《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男女大小共 115000 余名。乾隆四十三年至此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8.9‰。郿县地处凤翔府之东南部，如《秦疆治略》所称，该县南部山区“当太白老山，地俱苦寒，人烟稀少，编户十八里。道光三年查明男女大小共一十一万五千余名口，而山内仅六千余口，且住址俱近山口，半多邻境居民，川湖客民十只一二，稽查甚易。”扣除此 6000 山区居民的绝大部分，从乾隆四十三年至道光三年，郿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7.8‰。作为土著人口的增长，这一速度仍是过高的。郿县位于岐山之南，既然岐山已有如此众多的客户，何况郿县。因此，我推测郿县北部平原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客民迁入，这才是导致乾隆四十三年至道光三年郿县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

嘉庆二十三年《扶风县志》卷4《赋役》的记载更可说明清代中期的人口增长，实为移民迁入的结果。“嘉庆二十二年奉文编查保甲”，分县城及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五个单位清查户口，结果如表 9-26。

表 9-26 嘉庆二十二年扶风县分区户口

户类	县城	东乡	西乡	南乡	北乡	合计
土著						
户	405	4055	3018	6217	7306	21001
口	1747	32623	25544	42392	49838	152144

续表

户类	县城	东乡	西乡	南乡	北乡	合计
户均口数	4.3	8.0	8.5	6.8	6.8	7.2
客户						
户	82	35		90	21354	
口	308	102		274	153399	
户均口数	3.8	2.9		3.0	7.2	
客户(修正)						
户	82	35		90	146	353
口	308	102		274	571	1255
户均口数	3.8	2.9		3.0	3.9	3.6

资料来源：嘉庆《扶风县志》卷4《赋役》。

在嘉庆《扶风县志》的记载中，北乡客户的户数和口数都超过了土著。然而，仔细分析，这一数据是不正确的。县志作者将土著、客户的总数当作北乡客户的户数和口数，以至全县人口超过30万，大大高于道光三年的户口数。将北乡客户的户数和口数当作全县总户数和总口数，即可求得真实的客户户数和口数，即北乡客户为146户，男妇大小571口；合计县城及东乡、南乡、北乡客户总户数为353户，1255口。从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三年，扶风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8‰。

从岐山、郿县和扶风的地理位置上看，岐山和郿县南部均位于秦岭西麓，嘉庆以后成为川楚等地移民的麇集之所。1953年太白区所析七县中，就包括岐山和郿县。因此，清代中期岐山与郿县的人口增长较快，实与此有关。扶风地处凤翔府东部，移民数量较少，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较低。

同理，在凤翔府各县中，至少还有宝鸡县有可能接受较多的移民，清代中期的人口增长也可能与岐山、郿县相当。其他四县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太高。

因此，将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岐山、郿县、宝鸡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9‰，扶风定为6‰，参照邠州、乾州的情况，将凤翔府其他四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4‰可能是合适

嘉庆《扶风县志》中的户口记载存在错误。

的。如此,乾隆四十一年凤翔府有人口约为 100 万。

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凤翔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8‰。

2. 邠州和乾州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邠州、乾州人口数,见表 9-27。

表 9-27 道光三年和 1953 年邠州、乾州人口

州 县	道光三年(1823 年)	1953 年	年平均增长率(‰)
邠 州			
长 武	51900	78941	3.2
邠 州	110400	134099	1.5
三 水	43200	118896	7.8
淳 化	48700	78495	3.7
合 计	254200	410431	3.7
乾 州			
永 寿	57000	75829	2.2
乾 州	156000	228313	2.9
武 功	134000	186697	2.6
合 计	347000	490839	2.7

资料来源:道光三年数据来自《秦疆治略》。

乾隆十六年户数正确而口数错误。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邠州口数为 257719,多于道光三年数,颇不正常。逐县分析,道光三年三水县的口数可能偏低。乾隆五十年《三水县志》卷6《地丁钱粮·户口》称,康熙八年编审共 1842 户,男妇大小 31382 口,乾隆十六年奉文清查实在烟户 9336 户,男妇大小 38955 口。很显然,乾隆十六年的户数是正确的,男妇大小数则与康熙八年数属同一系统,不是真正的人口数。按照户均 5 口的比例,乾隆十六年也应有口数 46680 人。从乾隆十六年至道光三年,若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3‰,则道光三年有 59200 人,《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口数为 43200,比可能达到的口数少 16000 人。如果道光三年的邠州口数增加 16000 人,与《嘉庆一统志》所载相比较,就要合理得多。从道光四年至 1953 年,三

水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为 5.4‰,同期邠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为 3.2‰。以 3.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邠州口数为 22.1 万。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乾州口数为 342642,较《秦疆治略》所载稍少。从分县数据看,从道光三年至 1953 年,乾州三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体相同,合计只有 2.7‰。乾州人口的低增长可能与同治年间的战乱有关。以 3‰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乾州口数约为 30 万。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将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陕西各府、州人口,列于表 9-28。

表 9-28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陕西分府、州人口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西安府	242.3	30.4	294.4	24.3	463.8	29.3
同州府	158.2	19.9	180.5	14.9	156.2	9.9
邠 州	24.8	3.1	27.2	2.2	24.8	1.6
兴安府	10.0	1.3	121.4	10.0	164.9	10.4
商 州	11.3	1.4	75.2	6.2	128.9	8.1
汉中府	75.1	9.4	179.5	14.8	218.5	13.8
绥德州	24.9	3.1	28.4	2.3	51.9	3.3
榆林府	41.8	5.2	47.7	3.9	66.9	4.2
延安府	56.0	7.0	63.8	5.3	65.5	4.1
凤翔府	100.0	12.6	134.8	11.1	151.9	9.6
邠 州	22.1	2.8	25.8	2.1	41.0	2.6
乾 州	30.0	3.8	34.3	2.8	49.1	3.1
合 计	796.5	100.0	1213.4	100.0	1583.4	100.0

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陕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9.6‰。然而,究其因,实为兴安府、商州和汉中府三地在这一

时期大规模接纳移民所致。扣除移民的因素,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只有 3‰~4‰。

清代中期以后,陕南山区不仅无力接纳新的移民人口,相反,随着山区垦伐的过度,山地的流民多有外迁。从清代中期至 1953 年,陕南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降低至全省的平均水平。

在经历了同治战乱和光绪大灾之后,陕南以外的地区人口大受损失。以至于在鄜州和同州府,嘉庆二十五年至 1953 年的 133 年间,人口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其他府州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不高。全省合计,133 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0‰。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陕西口数为 1197.6 万,本节估测数较之多出 16 万。《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四十一年有 819.3 万口,较本节估计仅多 20 余万。由此可见,《嘉庆一统志》及《清朝文献通考》对于陕西户口的记载,大体是可靠的。

《清朝文献通考》和《嘉庆一统志》对陕西户口的记载,大体是可靠的。

第十章 清代中期北方边区人口

北方边区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在许多地区,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并未列入政府册籍之中,因此有关文献关于北方边区户口的记载,往往指以汉人为主的部分人口,不包括或只包括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区别文献所载户口的内涵,是本章研究最重要的一步。

本章讨论甘肃、新疆、青海、西藏、蒙古及东北各地的人口。除西藏外,其他五个区域分别位于祖国的西北、北方和东北各地,姑以“北方”笼统称之。这些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即使少数民族人口不占多数,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故称之为边区。东北的情况有些特殊,在法律上,清代中期及其以前,山海关外属于清政府封禁地区,关内人口不得自由进入。所以,与内地相比,东北地区也具有边区的性质。

“北方”和“边区”的定义。

第一节 甘 肃

甘肃明代分属陕西布政使司和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顺治初因明制,设甘肃巡抚,驻宁夏,顺治五年徙甘肃巡抚驻兰州。康熙三年分陕西为左右布政司,以右布政司驻巩昌。康熙七年改称甘肃布政使司,徙治兰州。雍正三年,裁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及各卫所,甘肃布政司辖境得以扩大并基本确定。乾隆二十九年,虽然裁甘肃巡抚以陕甘督治兰州行巡抚事,但甘肃作为一级行政区却不再

改变。

一、西宁府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16《田赋》载,乾隆十一年察审户 18925,口 70470,户均 3.7 口。以西宁一府之大,不可能只有如此少的一点人口。此为“丁”,而非“口”。确切一点说,这里的“丁”主要是纳税的汉族“丁”额。同一志记载,“雍正元年新归投诚纳粮番民二万二百七户,男妇子女八万六千一百六十六名口”。新收附的番民是按照真实的户口数列入册籍的。这批新归附的番民户均 4.3 口。一次归附的番民是不可能多于原有户口的,说明原有户口不是真实的户口数。

新收附的“番民”是按照真实的户口数列入册籍的。

民国《西宁府续志》卷 4 记载了咸丰三年(1853 年)西宁府的分县户口数,详见表 10-1。

表 10-1 咸丰三年西宁府分县户口

县 厅	民屯男女	男大	男小	女大	女小	性别比
西 宁	328250	96403	82004	83294	66549	119.1
碾 伯	228370	78762	39896	76154	33557	108.2
大 通	73667	24511	12889	23138	13129	103.1
贵 德	19769	6340	3738	5933	3794	103.6
巴 燕	27565	9108	5772	8003	4682	117.3
循 化	177729	65599	33942	50671	27517	127.3
丹噶尔	19068	6396	4132	5471	3061	123.4
合 计	874418	287119	182373	252664	152289	115.9

资料来源:民国《西宁府续志》卷4《田赋志·户口》。

同一志还记载咸丰三年循化厅户数为 14020,其他县、厅则不见有户数记载。不仅如此,在各县数据中,循化厅的数据最为复杂。民国《西宁府续志》卷 4 的记载如下:

口内十二族,二千六百九十一户,撒喇回民八工,二千七百八十户。口外西番四十九寨,南番二十一寨,八千五百四十

九户,共男女大小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九丁口……

这一记载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其一,关于“口内”、“口外”和“工”。乾隆五十七年《循化厅志》卷1《建置沿革》记载河州的西、南和东南七八十里处,分别有24座关。关内即称“口内”,关外即称“口外”。这是明代河州卫军人为防少数民族的侵扰而设置的,其性质颇类似于甘肃北部的长城。“工”可能是一个聚落单位,类似于“寨”。直至今日,在这一地区仍有许多带“工”的地名。

“口内”、“口外”与城墙有关。“工”是聚落单位。

其二,关于循化厅所辖各部户口。乾隆《循化厅志》卷1记载:“其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计一万四千余户,散处河州边外之循化、保安、起台地方。”此三地相距河州城“往返三四百里,远者七八百里不等”。为了便于管理,乾隆二十七年将河州同知移治循化营,改循化营为循化厅。将表10-1中的循化厅三类户数相加,所得为14020户。乾隆《循化厅志》卷4还称:“乾隆二十九年册撒喇族,共二千七百九户,大口三千四百九十七口,小口三千五百八十八口。四十六年新教诛夷者将及十户。而今册八工之数核之,亦不少差。知保甲册之非实矣。”表10-1载咸丰三年撒喇八工的户数为2780,与乾隆年间的户数基本相同。这说明咸丰三年循化三地的户数实抄自乾隆数。乾隆《循化厅志》卷4的解释是,“至户口之数,厅属各番例不编查保甲,故西南两番,按户纳粮,数十年从无增减。而撒喇即口内诸族,每岁造册,具文而已。皆据其自开者录之,亦不足为据也”。该志作者不曾想到,直到咸丰三年,撒喇八工的户数竟然还与乾隆年间相同。

然而,从口数看,与乾隆年间相比,咸丰年间已有变化。上引资料记载了乾隆二十九年撒喇族的“大口”和“小口”,户均口数为2.6。而在其他各县中,其记载方式则是“男丁”、“男口”、“女丁”、“女口”。成年为“丁”,未成年为“口”。有关撒喇族的口的记载,似乎只记载了一半人口,缺载的是“丁”。如果加上“丁”,以户均5.4口计,约有人口14600。

有关撒喇族的记载,只记载了一半人口。

至咸丰年间,循化厅的户均口数达到了12.7。虽然户数不变,但就户均口数而言,已较乾隆时期大有增加。在咸丰三年的人

口中,男女人口的性别比大致合理。尤其是碾伯、大通、贵德三地,其人口的性别比达到了标准配置。从这一指标看,咸丰三年的西宁府口数是比较可靠的。

清代后期的回民起义和镇压发生于同治年间,咸丰年间的人口调查与此次战乱无涉。《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西宁府户数为92857,口数为708829。从嘉庆二十五年至咸丰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6.4‰。这一过高的人口增长速度引起笔者的怀疑。从相邻省份陕西的情况看,在清代中后期的西北地区,在一府的范围内,人口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笔者由此怀疑这是政区变动所产生的错误。

政区变动可能导致人口异动。

其三,关于循化厅的从属和辖境。《清史稿》卷64《地理志》在“西宁府”条下称:“(乾隆)五十七年置贵德、丹噶尔两厅,割兰州之循化来属。”在“循化厅”条下称:“府东南,旧属兰州,为河州同知驻所。乾隆末移隶西宁。”似乎乾隆末年循化已归属西宁府了。民国《西宁府续志》卷4在“循化厅”条下称:“道光三年,循化全境由河州改隶西宁府,接管保安四屯。”这里的“循化全境”一词颇耐人寻味,它意味着乾隆末年割循化厅入西宁府,并不完整。直到道光三年,循化府全境才改隶西宁府了。乾隆《循化厅志》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即割兰州之循化入西宁的同一年,所以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在一般的县份,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可以是里甲,可以是乡都。河州的人口实际上分为“口内”和“口外”部分。从字面上看,“口内”是循化厅的核心部分,“口外”则是边缘部分。河州同知移往循化营后,居住于“口外”的撒喇族与口内十二族合称为十三族。乾隆《循化厅志》卷1称:“至口内所管,惟十一族;并迭速古无粮一族,为十二族;合口外之撒喇族,为十三族。”撒喇虽然只是一族,但从表10-1中的数据看,撒喇一户的户数竟与“口内”12族的总户数相等。1929年析循化为循化和同仁两县,1952年同仁县曾一度改名同仁县藏族自治区。藏族即上引文中“西番”和“南番”。循化至今仍名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即清代的撒喇族。由此可见,“口内”十二族和“口外”的撒喇族构成了今天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的人口基础。在民族成分上,循化厅可以分为撒喇族和番族两大部分。

可以想象的是,乾隆末年西宁府“割兰州之循化来属”,割的可能只是循化的口内 12 族和口外的撒喇族,即后来成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区域。乾隆《循化厅志》卷 1 称:“再查河州撒喇地方,亦在口外,俱系回民居住,约六千余户,与西宁所属巴暖营汛界相连,系土司韩炳、韩大用所辖地。”这一资料表明,“口内”十二族和“口外”的撒喇族实际上往往被人看作是一个单位或一个民族。道光三年,循化全境归于西宁府,后来析为同仁县、夏河县(部分)^①的番族居住区也一并归入。在一般地区,将一个厅分为两个部分分属两个不同的府是不可想象的。循化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撒拉族和藏族分地而居,才有数十年间如此奇怪的分治现象。

这样,我们将西宁府嘉庆年间的口数与咸丰三年的口数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这一政区变动的因素,即必须从咸丰三年的口数中排除循化厅中的番族人口数。按照乾隆年间的数字,撒喇族户数占循化厅总户数的 39%,按照 1953 年的人口计算,循化县有 42050 人,同仁县有 33624 人。夏河县由三县分设,其总人口为 68135 人,三分之一人口为 22711 人。撒喇人占总人口的 42.7%。据此,将循化厅的撒喇人定为全厅人口的 40%是合适的。如此,在咸丰三年的循化厅人口中,撒喇人约有 7.1 万人,番族约有 10.7 万人。

从咸丰三年的循化厅口数减去番族人口,西宁府的总口数为 767807。嘉庆二十五年全府口数为 708829 人。33 年中,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2.4%。西宁府人口的增长速度,与陕西西部非移民地区相似。以此速度回溯,乾隆四十一年,西宁府人口数约为 63.8 万。

二、兰州府

道光《兰州府志》卷 5 记载了道光十年府属六县的“册报”户口

^① 1926 年析循化、导河、临潭三县设拉卜楞设治局,1928 年改夏河县,1953 年设甘南藏族自治州,区治设于夏河县拉卜楞。由此可见夏河县的相当一批人口属于藏族。结合历史文献看,夏河属于“口外”南番的居住地。

数,列如表 10-2。

表 10-2 道光十年和 1953 年兰州府分县户口

州 县	道光十年(1830 年)			1953 年 人口	年平均增 长率(‰)
	户	口	户均口数		
皋 兰	73170	467816	6.4	684614	3.1
狄 道	71432	516876	7.2	308462	-4.2
渭 源	22039	173416	7.9	109429	-3.7
金 县	38564	320986	8.3	165756	-5.4
河 州	85526	698196	8.2	787541	1.0
靖 远	36395	248203	6.8	167078	-3.2
合 计	327126	2425493	7.4	2219880	-0.7

资料来源:道光《兰州府志》卷5《田赋志·户口》。皋兰县 1953 年为兰州市、皋兰县和景泰县,狄道州为夏河县和临洮县,金县为榆中县,河州为临夏市、临夏县、永靖县、和政县、康乐县、东乡自治区和广通回族自治区。

在《嘉庆一统志》的记载中,嘉庆二十五年兰州府有 429973 户,2694991 口,户均 6.3 口。道光《兰州府志》所载仅有 2425493 口。人口不增反减,户均口数越来越多。从户均口数这一指标看,道光十年的户口数据质量要差于嘉庆二十五年。

在讨论户口数据之前,先得排除因政区变化而造成的错误。道光三年,今循化厅的“番民”居住地,即今同仁县和夏河县的一部分,从兰州府划入西宁府。以同一政区进行对比,道光十年的兰州府人口中,应当加上这批人口。咸丰三年,循化厅的“番民”人口为 10.7 万,以 2.4‰ 的速度回溯,道光十年应有 10.1 万口。也就是说,在与嘉庆二十五年政区相同的前提下,道光十年兰州府的口数应为 252.6 万。虽较嘉庆二十五年兰州府口数为少,但差距已大大缩小。

道光《兰州府志》卷 5 对数据还有以下说明:“按自以粮载丁后,不复编审,每年仅据吏胥册报,虚实无从查核。”如果此语当真,则从乾隆后期的编审户口开始,兰州府就未进行过认真的户口编审了。道光十三年《靖远县志》卷5《田赋·户口》载道光十一年的

户口数与表 10-2 所记同,道光十三年户增加为 40150,男女大小则减为 214666 口,户均 5.3 口。道光十三年的人口趋于合理,却较两年前减少了 3 万余人。对于靖远县而言,道光十年的户口数据可能存在浮夸。

光绪《皋兰县志》卷 13 对皋兰县清代四个年份的户口数有以下记载,详见表 10-3。

表 10-3 清代皋兰县户口变动

年 代	户	口	户均口数	年平均增长率(‰)	原书所引资料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	60276	400546	6.6		旧县志
道光十年(1830 年)	73170	467816	6.4	2.7	府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	75390	478671	6.3	1.9	续志
光绪十三年(1887 年)	92162	503157	5.5	1.1	保甲局册

资料来源:光绪《皋兰县志》卷13《经政下·户口》。

从乾隆三十七年至道光十年,皋兰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7‰,道光十年至二十二年,降为 1.9‰,再后一个时段,降为 1.1‰。与此同时,户均口数也在降低。如果不考虑户均口数的因素,从乾隆三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皋兰县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仍保持 2.5‰ 的速度,比稍后一个时期西宁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稍高。清代中期以降,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渐降低。皋兰县的例子证明,清代四个时点的户口数据大体是可靠的。所以,尽管光绪《皋兰县志》的作者道光二十二年户口数据后加按语称:“按府志自以粮载丁后,不复编审,每年仅据吏胥册报,虚实无从查核。”但此语抄自道光《兰州府志》卷 5,不能证明皋兰县的数据都是据吏胥册报且为不实的。

依 2.5‰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兰州府的总口数约为 241.5 万。

三、宁夏府

乾隆四十五年《宁夏府志》卷 7 记载的分县户口数,如表 10-4。

皋兰县的例子说明,从数字本身判断数据的真伪,有时比其他定性的说明更可靠。

表 10-4 乾隆四十一年宁夏府分县户口

州 县	户	口	户均口数
宁 夏	61228	300351	4.9
宁 朔	34200	322244	9.4
平 罗	16490	158360	9.6
灵 州	45885	284776	6.2
中 卫	41980	286794	6.8
合 计	199783	1352525	6.8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五年《宁夏府志》卷7《田赋·丁税》。

此数据来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前，推测为乾隆四十一年左右的编审户口数。就户均口数而言，只有宁夏县的数据最符合标准。宁朔、平罗两县户均口数实在太多，究竟是户数错还是口数错，尚不清楚。《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宁夏府户数为 214992，口数为 1392815，户均 6.5 口，比乾隆年间的户均口数略低。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0.7‰，几无增长。问题是，数十年间宁夏府的人口真的没有增长？

后《志》抄前
《志》。

嘉庆三年《宁夏府志》卷7《田赋·丁税》记载的府属各县户口数，完全照抄乾隆《宁夏府志》的数据。在这个系统中，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三年，宁夏府的人口是没有变动的。尽管《嘉庆一统志》的口数较此多出 4 万余口，但人为编造的痕迹已经非常明显。从这个角度看，《嘉庆一统志》有关宁夏府的人口记载是不可信的。

按照 2.5‰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嘉庆二十五年，宁夏府的口数为 151 万。

四、甘州府

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卷6《食货·户口》称乾隆四十三年有民户、屯户 809540 口。《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甘州府户数为 79841，口数为 813615，户均 10.2 口。若此两个年份的数据均为真，从乾隆四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甘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

率仅为 0.1‰。

依据上文所述,在乾隆四十三年与嘉庆二十五年数据之间,我更愿意相信乾隆四十三年数据是真实的,嘉庆二十五年数据可能是在乾隆数据的基础上稍做加法形成的。依 2.5‰的年平均增长率,嘉庆二十五年甘州府口数约为 90.4 万。

五、平凉府

民国《甘肃通志稿·民族五·户口》记载乾隆时平凉府共 2284631 户,2321156 口。户数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口数与《嘉庆一统志》所载 2340323 口十分接近。民国《甘肃通志稿》称此数据来自《乾隆一统志》,又指出:“以上八府五直隶州除平凉、泾州为户口实数,余为科征丁银之丁数,盖初行以粮载丁,尚未普遍编查实数也。”除平凉、泾州户口数据为实数外,其余各府州的户口数均为纳税丁额。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乾隆《大清一统志》成书于乾隆八年和四十九年。从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平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0.2‰。《嘉庆一统志》中的平凉府数据大体是照抄《乾隆一统志》的。按照 2.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嘉庆二十五年实有人口 253.9 万。

六、泾州

民国《甘肃通志稿·民族五·户口》记载乾隆时泾州直隶州共 114657 户,804184 口。按照上文分析,这一数据应当是乾隆四十九年的。《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泾州人口 837730,乾隆四十九年至此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1‰。如以 2.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嘉庆二十五年应有人口 89.8 万。

七、其他

在清代甘肃 13 个府、州中,仅有上述 6 府有可供分析的资料。其余 7 府、州则无资料可进行类似的分析。因此,笔者只能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数据为基础,根据 2.5‰的速度回溯,所得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各府人口数见表 10-5。

表 10-5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甘肃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府 州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兰州府	241.5	269.5	225.4
巩昌府	340.1	379.5	225.1
平凉府	230.0	253.9	133.0
庆阳府	114.1	127.3	70.6
宁夏府	135.3	151.0	89.0
甘州府	81.0	90.4	51.5
凉州府	134.8	150.4	135.9
西宁府	63.8	70.9	125.3
泾 州	80.0	89.8	61.3
秦 州	77.9	86.9	160.1
阶 州	34.0	37.9	84.1
肃 州	40.5	45.2	36.6
安西州	6.9	7.8	13.1
乌鲁木齐	11.9	21.1	53.2
合 计	1591.8	1781.6	1464.2

说明：为了和嘉庆二十五年兰州府的政区对应，1953 年兰州府人口中包括同仁县人口。

由于同治年间的战乱，对于甘肃省的大多数地区而言，直到 1953 年，其人口都少于嘉庆二十五年数。只有秦州、阶州和西宁府三地的人口仍有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关于同治年间的战争所造成的甘肃人口损失，容在本卷第十四章再作详细的讨论。

《嘉庆一统志》载甘肃 1727.8 万，较本节所作估计要少。这是因为，在甘肃的一些地区，嘉庆二十五年数据是抄袭乾隆年间的。《清朝文献通考》记载 1506.8 万口，较本节估计要少 80 余万。《嘉庆一统志》将安西州和新疆列入甘肃境内，表 10-5 也将两地列入。有关清代乌鲁木齐人口数的分析详见下节。

第二节 新疆

除哈密、吐鲁番等地外,清代初年的新疆大部控制在准噶尔部蒙古人手中。在清朝前期清军对准噶尔部的战争中,新疆大部分地区长期饱受战争之苦,人口死亡甚多。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清军大举进攻,乾隆二十四年统一天山南北。新疆的人口重建就是在这—背景下进行的。

《清史稿》卷76《地理志》载:“乾隆二十年平准噶尔始内属,改名乌鲁木齐,筑土城。二十五年设同知,二十八年筑新城于其北,名迪化……三十八年升直隶州,隶甘肃布政司。光绪九年建行省,十二年升府来隶。”据此,乌鲁木齐才是州名,迪化为城名,《嘉庆一统志》以迪化州称之,并不妥当。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乌鲁木齐理应归入甘肃。乌鲁木齐长期不属甘肃统辖,光绪九年(1883年)建省时重新划入新疆,归属甘肃统辖的时间不长。基于这一事实,仍将其划入新疆论述。

乌鲁木齐政区
归属的特殊性。

在本节所依据的文献中,即使是对一个相同或两个相近年份的户口数,各种资料所载都有不同,有时存在很大的不同。乾隆四十七年《西域图志》卷33《户口附》对册载人口与实际人口的关系作了以下说明:

前者准夷底定,扫穴犁庭,逆者剿之,顺者抚之。袤延万里,疆宇廓清,爰为屯兵驻守,招集回部及甘州民户,分地而居。而于乌鲁木齐、昌吉、罗克伦、伊犁诸处,计亩耕作。盖屯垦之丁男,即西域之户籍也。回部虽村城络绎,棋布星罗,几于烟火相望,然辟展左右,其居民先经避患,空城内徙。全部归诚后,于辟展、哈喇、和卓、托克三、喀喇沙尔诸外,亦如准噶尔部之移民开屯,渐归殷庶。从此天山南北,一体涵濡,休养生息,日以繁滋。计口宜十倍于此,而目前固未定额也。

此语即是说,尽管移入的垦民都可算作西域人民,载入西域户籍,但因此书编辑之时,移民仍在进行,实际人口“十倍”于册载人

口,只是“目前固未定额也”。将各地的实际人口视作册载人口的十倍,可能是一个夸大。但对笔者来说,对于诸种文献中的数据,一般取其大者,却是有道理的。

一、北疆地区

1. 乌鲁木齐

嘉庆《三州辑略》卷3《户口门》载:“我朝定制,凡天下民数,岁终大司徒汇黄册以闻,而乌鲁木齐所属州县户口,岁附于陕甘总督办理。尝询嘉峪关吏,内地民人出关者岁以万计,而入关者不过十之一二。今考乾隆四十八年乌鲁木齐所属民数共男妇大小一十二万二千有余,兹二十余年又将倍蓰矣。不宁惟是,南路回部十三城暨土尔扈特、和硕特、布鲁特等游牧,其户口至不可思议。”

此记载所称乌鲁木齐和新疆南路人口均有很大的增长。《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迪化州”有12028户,103052口,竟然与乾隆四十八年数大致相同,却与“兹二十余年又将倍蓰矣”的估计相差太远。《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总口数即乾隆四十八年数。

乾隆《西域图志》卷33和嘉庆《三州辑略》卷3还记载有乌鲁木齐分县(地方)人口数,详见表10-6。

表 10-6 乾隆四十二年、嘉庆十一年乌鲁木齐分县(地方)人口

地 区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嘉庆十一年(1806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男	女	小计	性别比
迪化州	3496	16631	4.8	20454	16516	36970	123.8
昌吉县	4332	19734	4.6	10309	8476	18785	121.6
绥来县	2252	7624	3.4	7532	5253	12785	143.4
阜康县	4350	18405	4.2	6493	5025	11518	129.2
呼图壁				6715	4460	11175	150.6
济木萨				10123	7902	18025	128.1
喀喇巴				945	715	1660	132.2
尔葛逊							
精 河				56	31	87	180.6

续表

地 区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嘉庆十一年(1806年)			
	户	口	户均口数	男	女	小计	性别比
库尔喀						113	
喇乌苏							
塔西河				852	253	1105	336.8
庐草沟				543	320	863	169.7
头屯所				377	400	777	94.3
宜禾县	697	2596	3.7	5158	2906	8064	177.5
奇台县	1994	6824	3.4	18436	12639	31075	145.9
合 计	17121	71814	4.2	87993	64896	153002	135.6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七年《西域图志》卷33；嘉庆《三州辑略》卷3《户口门》。

乾隆四十二年政区与以后有很大差别。所以，根据表 10-6 中的数据讨论逐县人口的增长是不合适的。从乾隆四十二年至乾隆四十八年，再至嘉庆十一年，乌鲁木齐人口从 7.2 万增加至 10.3 万，再增加至 15.3 万。此外，还有一批绿营人口不在其中。同书记载：“以上户口按每年查报之数，汇册咨送陕甘总督核办。其绿营眷兵家口不在其内。各属绿营眷兵一万一千五百余名，其口数约四万数千余口。”合而计之，嘉庆十一年迪化州人口大约为 20 万人。同理推，在乾隆年间的人口中，也没有包括绿营眷兵。两个时段中，乌鲁木齐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1.5‰ 和 18.1‰。

绿营兵未计入
户口数中。

乌鲁木齐人口的高速增长，实与这一时期大批移民的迁入有关。嘉庆《三州辑略》卷4《田赋门》中有大量移民记载，如迪化州：“乾隆二十七年至四十一年止，由内地携眷移来民人并本地招募户商共一千三百一十一户……内除拨归喀喇巴尔噶逊安插户民一百四户……实在共户民一千二百七户。”合而计之，从乾隆二十七年至嘉庆五年，迁入移民共 3000 户，分拨他处的移民不包括在内。由于不知迪化本州的户均口数，故不能得知移民在迪化州总人口中的比例。

张丕远根据档案资料，发现汉族移民最主要的定居区是乌鲁

木齐和巴里坤。对照地名,可以发现,嘉庆十年的乌鲁木齐已经包括了巴里坤。乾隆三十一年至四十年,每年平均移民约 4500 人,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年,每年平均移民约 3400 人,乾隆五十一年至乾隆六十年,每年平均移民约 1800 人,嘉庆元年至嘉庆十七年,每年平均移民约 1700 人^①。如是,在嘉庆十一年的乌鲁木齐人口中,应该减去大约 7.8 万人。扣除人口的自然增长(若以年平均增长率为 2‰ 计),剩余 7 万左右即为乾隆四十一年乌鲁木齐民户人口。有意思的是,这一数据恰好与表 10-6 中乾隆四十二年所载相近。在 7 万左右的人口,还有大约 5 万为新移入的人口。加上绿营眷属,合计人口约为 11.5 万。

牧民未计入户
口册中。

然而,这批人口仍是不完全的。乾隆《西域图志》卷 33 记载了乾隆三十七年土尔扈特人的游牧地点和人口。与乌鲁木齐有关的是古尔班济尔噶朗,其地即库尔喀喇乌苏,共有人口 2863 人。另一地名为古尔班库色木什克,有人口 1359,估计也在库尔喀喇乌苏境内。由此合计乾隆四十二年乌鲁木齐人口约为 11.9 万。表 10-6 中没有包括这批人口,设从嘉庆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如果没有新的移民迁入,且乌鲁木齐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 2.5‰,嘉庆二十五年约有人口 21.1 万。

2. 吐鲁番和哈密

从表 10-8 中可以看出,《嘉庆一统志》所载新疆各地户口,户均口数大致都在 5 人左右。户均口数高达 8 口以上者有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吐鲁番等地,其中吐鲁番的户均口数高达 11.5 口。低于 3 口以下只有哈密一地,户均仅 1.7 口。吐鲁番、哈密的户均口数存在较大问题,说明两地的户口数是不可靠的。

雍正年间,驻守吐鲁番的清军因无力抵抗准噶尔部的进攻,决计放弃吐鲁番,并将当地居民东迁内徙。雍正十年(1732 年)十月,吐鲁番十六城 1 万余人启程东行,经哈密于次年八月抵达安西瓜州。战争结束后,如上引《西域图志》的记载所说,政府于此地立

^① 张丕远《乾隆在新疆施行移民实边政策的探讨》,《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屯开垦,人口得以恢复和发展。

乾隆四十二年《新疆輿图风土考》卷1在议及吐鲁番的人口时说:“土尔番回城……人户惟土尔番最多,然合而计之,亦不过三千余户耳。更多贫苦不能自贍。”乾隆《西域图志》卷33称:辟展,回民2937户,10373名口。又称:“按辟展诸城,内地行商各户,非土著,不备登。”辟展城即为今吐鲁番之鄯善城,“辟展诸城”,当然是指吐鲁番地区的各城。《西域图志》所载不包括“内地行商各户”,而《新疆輿图风土考》所记户数多于《西域图志》,则可能包括了这批行商。吴丰沛在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的《新疆回部志》卷3中指出,辟展所属回民计3283户,15263口。此记载与《新疆輿图风土考》的记载基本相同,可见也是包括全体人口的。

《嘉庆一统志》载嘉庆二十五年吐鲁番只有8709口,肯定有漏载。设从乾隆三十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以年平均增长率为2.5%计,嘉庆二十五年吐鲁番有人口约1.7万。

同样,《嘉庆一统志》所载哈密户口,也载明为回民户口。其户数为1950户,口数为3293口。乾隆《西域图志》卷33记载的哈密户数也是1950户,但口数却达12163,是嘉庆口数的近4倍。《西域图志》的说明是,“按哈密人民,由内地来此贸易,无土著,不备载”,应包括所有的人口。相反,《嘉庆一统志》所载仅为部分人口。

道光二十六年《哈密志》卷22《食货志·户口》的记载是,哈密协营并沁蔡屯兵丁眷口数不详,实在营兵男妇老幼等2851名口,东关乡、西关乡、北关乡实在乡民男妇老幼等1951名口,各庄男妇丁口1006名口。除屯兵丁口不详外,其他人口合计5808口。“实在营兵男妇老幼”除外,民户人口为2957口,虽然少于《嘉庆一统志》所载之3293口,但相差不多。基于这一考虑,我以为《嘉庆一统志》所载为民户人口。以吐鲁番相似的增长速度估计,嘉庆二十五年哈密人口约有1.3万。

3. 伊犁

乾隆《西域图志》卷33所载伊犁各部口数非常详细,户数则有所缺。乾隆四十二年伊犁口数约为4.8万,其中不包括军事人口。也就在这一年,伊犁的额鲁特、土尔扈特及土部属下鄂拓克共

15757口全部迁往塔尔巴噶台,形成以后塔尔巴噶台地区人口的一部分。

表 10-7 乾隆四十一年伊犁地区户口

部 类	户	口	户均口数
额鲁特	3516	11737	3.3
土尔扈特	104	447	4.3
土部属下鄂拓克	838	3573	4.3
土部属下喇嘛	1080	4853	4.5
土部种地额鲁特		6514	
回 户	6406	20356	3.2
民 户	71	209	2.9
遣犯为民		244	
合 计	12015	47933	4.0

资料来源:乾隆《西域图志》卷 33。

伊犁的回民人口,是清政府从天山南路各地迁入的。民户从内地召募而来,主要分布于伊犁惠宁城及其周围地区。乾隆《西域图志》卷 33 称:“驻防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诸兵,虽携眷居住,未可与彼中户口同记,不备登。”可见上述各类人口中是不包括军事人口的。

各种记载中的
同一类数据并不
一致。

关于伊犁的军事人口,各种记载有所出入。咯琿额《伊江汇览·户籍》和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 4《伊犁舆图》分别记载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嘉庆末年伊犁惠远城和惠宁城的户口数。乾隆四十五年,伊犁惠远城中仅满洲蒙古兵就有 4368 户,18369 人。嘉庆后期,这些满营人口增至 22600 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 4.7‰。乾隆四十五年惠宁城的满洲蒙古兵、锡伯营官兵、索伦营官兵、察哈尔、厄鲁特官兵共 9604 户,33715 口,维吾尔人及招募民户 6477 户,20765 口,总户数达 16081 户,总人口达 54480 人,到嘉庆末年则增至 109340 人。惠宁城的这些人口数并不全是城市人口数,其中有大量的屯垦、采矿之人。

这一事实说明,如果说乾隆中期开始的移民新疆是以乌鲁木齐

齐为中心的话,到了嘉庆年间,伊犁则成为外省移民的一个重要集聚地。《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伊犁人口仅为 38365 口,是为标准的土著人口,即土尔扈特人口外迁后的土著人口。即使其中包括军人,也仅仅是军人本身,而未包括他们的眷属。

伊犁人口中包括了军人,但未包括他们的眷属。

将表 10-7 未外迁的人口加上惠远和惠宁两城的军事人口,合计乾隆四十二年伊犁人口约有 10.5 万。当乾隆四十二年土尔扈特人口迁往塔尔巴噶台地区以后,伊犁人口一度有所减少,但是,大量的移民涌入使伊犁的人口不减反增。嘉庆末年,伊犁人口总数至少在 13 万人以上。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户籍制度,仍可能有一大批移民人口未入当地户籍。他们的人口尚无从估计。按 13 万人计,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伊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9‰。

4. 塔尔巴噶台

在乾隆四十二年伊犁的土尔扈特人迁入塔尔巴噶台之前,这里也有土尔扈特人游牧。按照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的安排,旧土尔扈特北路三旗游牧于塔尔巴噶台地区的和博克萨里,即今新疆塔城专区所属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一带。但是,据乾隆《西域图志》卷 33 的记载,和博克萨里的土尔扈特人只有 2863 人。如果加上乾隆四十二年从伊犁迁来的 15757 口,仍不足 2 万人。

嘉庆十年《塔尔巴哈台事宜·户口》记载的事项截止于嘉庆六年。有关户口的年代可能是乾隆四十二年左右。该志称:“兵俱系换防,亦未安插民户。皆属游民商贾往来,行止莫定。惟所属之巴尔鲁克齐尔等处,察哈尔额鲁特、投诚哈萨克以及霍伯克赛里之土尔扈特各游牧人丁户口,各该管衙门现在档案内。”分计则有察哈尔一佐领,丁 242 名,户 156,大小口 906;额鲁特六佐领,丁 3892,户 1222,大小口 9810,投诚哈萨克一佐领,丁 532,户 94,大小口 1055;土尔扈特十四个半佐领,丁 3554,户 1899,大小口 11079。合计共 8220 丁,3371 户,大小口 22850。其中有关土尔扈特人口的记载,远比《西域图志》所载为少。究其原因,可能因土部蒙古人在迁入塔尔巴噶台地区以后,又转入其他地区游牧所至。然而,从《塔尔巴哈台事宜》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在土部迁入之前,塔尔巴噶

台地区已有其他的人口游牧。如察哈尔部是乾隆三十年由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连眷移驻,乾隆二十九年初设雅尔时,额鲁特编为一佐领,三十七年因人口增长而增设一佐领,四十二年又由乌鲁木齐拨来四个佐领的额鲁特,再加上投诚的哈萨克人口,乾隆四十二年左右塔尔巴噶台的人口总数合计为 29485 人。乾隆四十四年以后,“投诚者概不收纳”,以后不再有迁入的人口。

《嘉庆一统志》载塔尔巴噶台地区的人口有 35211 人,从乾隆四十二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而换防的 2000 名官兵,并不在册籍之中。

二、南疆地区

1. 喀喇沙尔

《西域图志》卷 33 所载喀喇沙尔的回民有 1130 户,5390 名口。但喀喇沙尔的居民不止是回民,还有其他人口。《嘉庆一统志》载喀喇沙尔有 7147 户,28011 口。其中包括蒙古人 5770 户,16099 口;回人 1377 户,11912 口。仅就回民人口计,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回民人口的增长相当快。究其原因,可能有移民迁入所致。乾隆三十七年,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所率四旗被指定在塔尔巴噶台地区放牧,不久转牧于喀喇沙尔以北的裕勒都斯山一带,随渥巴锡来归的和硕特部项格等,后设为巴图色特启勒图盟,游牧地随渥巴锡。在《西域图志》中,裕勒都斯的土尔扈特人多达 11219 人,博罗塔拉(今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的土部人口仅有 827 人。这两部人口合计为 12046 人,较《嘉庆一统志》所载蒙古人口还要少一些。两个数据之间的差额并不一定是蒙古人口的增长所致,而可能是统计口径或其他别的原因。总之,喀喇沙尔的蒙古人即土尔扈特蒙古人是没有疑问的,他们是在乾隆三十七年以后迁入的。

按照 2.5% 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乾隆四十一年喀喇沙尔的人口约 2.5 万。

2. 喀什噶尔、叶尔羌与和阗

《嘉庆一统志》所载三地的户口数,与《西域图志》所载完全相

同。《嘉庆一统志》的数据显然是不能利用的。

《新疆回部志》卷3记载喀什噶尔十六处村庄的回民共计15180余户,50199口。叶尔羌城村三十六处,共计回民15180余户,54340余口。和阗城村六处,共计回民13800余户,43500余口。这一户口数是乾隆三十七年或三十七年以前的数据。与《西域图志》或《嘉庆一统志》比较,《新疆回部志》所载户数或多于或稍多于后两书中所载数据,口数则均较后两书所载为少。从这一角度看,《西域图志》对喀什等三地的户口记载,也是在以前基础上略加修改形成的。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兆惠率领的清军进军喀什噶尔。行至伊克斯哈喇时,遇有投诚的回民,兆惠询问:“叶尔羌、喀什噶尔从贼逃去者,系何等人户,现余户口若干,其喀什噶尔村庄种植若何?据称,不知叶尔羌逃去人数,其喀什噶尔之人,波罗泥都带去一百五十户,又亲信之乌沙克等男丁千余口,家口亦多。我等百余户内有带去者,此时亦多逃回。计本城所属共一万六千余户,人五万余口。”^①这一说法与《新疆回部志》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新疆回部志》记载的喀什噶尔的户口数至少在乾隆二十四年及其以前即已形成。

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后,兆惠奏报:“喀什噶尔地居西北……其城周围十余里。城内回人二千五百余户。东界乌什、阿克苏,有牌租阿巴特、赫色勒布依、伊克阿喇图什三城;伯什克勒木、阿尔巴特两大村,共六千余户。西界安集延布鲁特,内有巴哈阿喇图什、鄂坡勒、塔什巴里克三城,塞尔们、托克库尔萨克二大村,共二千二百余户。南界叶尔羌,内有英噶萨尔、汗阿里克两城,提斯究、哈喇刻尔二大村,共四千四百余户。北界布鲁特,内有阿喇古城、霍尔干村,共八百余户,总计一万六千余户,数十万余口。”^②户数依旧,但口数却称为“数十万余口”,我将兆惠此次所报当作真实的人口数来理解。而所谓的“五万余口”仅仅是册籍中的“人口”,即某种我

清军收复喀什
后,曾进行人口
清查。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74卷。兆惠等疏奏波罗泥都逃窜,喀什噶尔回众迎降。

② 同上书,第75卷。兆惠等疏奏办理喀什噶尔等城事宜。

们可以称为赋税单位的额。

这份报告是进行过某种人口清查的产物。同一报告还称：“兆惠等奏言，臣等抚定喀什噶尔等二城，宣布皇恩，凡弃贼来投者，俱行免罪。又查出各城迁来回众二千五百余户，一万二千二百余人，俱送往阿克苏，以备屯田。”对外来回民的清查与当地回民的清查应是同时进行的。

在八月底的一份奏报中，定边将军兆惠奏称，“前因堵截逆贼等逃路，遣二等待卫达克塔纳等传檄霍罕额尔德尼伯克、玛尔噶朗、安集延、那木干等城，并布鲁特之额德格纳、伊什里克等部落”。六月十八日由喀什噶尔起程，二十九日至安集延。叛军回复：“今将军自喀什噶尔遣人传谕我等，所给印文，谨已奉到，不胜欢喜踊跃，适合我等心愿。布哈尔以东，我等二十一万人，皆为臣仆。”^①安集延等地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其以东地区也可能包括喀什噶尔的一部分。大、小和卓木的军队已经大部被歼，“我等二十一万人”所指当为和卓控制区域中的居民。所以，兆惠称喀什噶尔地区的居民有数十万是有根据的。

1876年10月，俄国军官库罗帕特金进入南疆搜集情报，写成《喀什噶尔》一书。他认为：“喀什本地区只有一万六千户，计十万人，而整个喀什噶尔的人口是三十七万五千人。喀什城周长十里稍多，该城非常贫穷、荒凉。城里总共二千五百户居民。”接着，库氏又列举了一些其他的喀什噶尔所属城村人口，且引兆惠的奏稿加以说明^②。尽管他的引文有些混乱，但关于人口的叙述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兆惠奏报中所提到的。全部的叙述中，只有“整个喀什噶尔的人口是三十七万五千人”一句不知所本。在此段叙述之前，库氏还提到“据中国官员统计，喀什噶尔有五万到六万户居民（同和卓一起逃走的不算在内），另外还有一万二千五百名政治犯人，他们被流放到伊犁屯垦”。所谓的“一万二千五百名政治犯人”，即上引兆惠奏报中提及的从外地迁入喀什噶尔的回民，他们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78卷。兆惠等疏奏安集延部长阿济比等归诚。

②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6页。

拟被送往阿克苏而不是伊犁屯田。但这五六万户的记载却不知源于何处。

再读库氏的论述,发现他将叶尔羌、喀什、英吉沙尔、阿克苏、乌什和库车统统算作喀什噶尔了。而在本节的叙述中,只有喀什和英吉沙尔算作一个区域,而其他则为别的地方。按照《西域图志》卷 33 的记载,以上六地共有 40806 户,169193 口,口数远不及库氏所提数目。然而,如果将和卓木部投诚人口 21 万加了进来,口数则为 37 万余。因此,在库氏看来,和卓木归诚的 21 万人口应该属于喀什噶尔的居民。喀什噶尔人口至少应在 26 万以上。

从乾隆二十四年至四十一年,喀什噶尔的人口仍在增长。但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有部分喀什噶尔居民外迁至伊犁、乌什等地。人口的增长可能为人口的外迁所抵消。但是,准噶尔部叛乱平定以后,作为南疆商业中心的喀什噶尔也可能成为移民迁入的中心。外来的移民并不是指定期换防的军队,而是指来自中亚的商人。乾隆时期,喀什噶尔的人口增长可能是高速度的。以 4‰ 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嘉庆二十五年应为人口约 31 万。

乾隆二十四年,上谕参赞大臣舒赫德等酌办和阗户口事宜时指出:“福祿等奏,详查和阗六城回人共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三户,四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口,较齐凌札卜等原查数目缺五千四百五十七户,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口等语。齐凌札卜等原查数目本来确实,而后来被围数月,或不免伤损,抑系回人等图贡赋轻减,隐匿脱漏,亦未可定。”^①和阗六城的户口数比《西域图志》所载略少,但属同一体系。而在此体系之外,还存在另一系统的数据,即齐凌札卜等原查数目。齐氏所查户数为 18600,口数为 72543,均大大超过《西域图志》所载。可见,乾隆皇帝本人也认为除战争中损失人口外,因逃税而隐匿人口也可能是册载人口少于实际人口的原因。

关于叶尔羌的人口。乾隆二十四年富德在一份奏疏中称:“复周行城垣十余里,皆以土筑,房屋较各城为密,村庄亦多。查询从前户口,二万三千有奇,现存仍二万户。”这一数据多于《西域图志》

确定政区范围
对于人口估计是
重要的。

在新疆,五口
之家仍是常见的
家庭规模。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 79 卷。谕参赞大臣舒赫德等酌办和阗户口事宜。

所载。所谓“从前户口”是真实的户口数还是册载户口呢？我们并不清楚。只是按照户均5口的比例，仍有人口10万左右。之所以将户均口数定在5人左右，是因为上引资料中提及兆惠将喀什噶尔查出的回众2500余户，12200余人送往阿克苏，以备屯田，户均4.9口。这种清查是严格的人口清查。

在没有任何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俄国军官库罗帕特金的估计可能是相对合理的。库氏估计1760年喀什地区人口大约10万人，是他读兆惠的报告“数十万余口”产生了误解所致。库氏认为叶尔羌有20万人，和阗有10万人。按照1953年的人口数推测，叶尔羌的人口与和阗人口是相差不多的。因此，我更相信叶尔羌的人口只有10万左右。按照4‰的年平均增长率，嘉庆二十五年叶尔羌、和阗各有人口约11.9万。

3. 库车、阿克苏和乌什

库车地区由库车和沙雅尔两城组成。据《西域图志》的记载，两地回民有1785户，6158口，户均3.4口。而在《嘉庆一统志》的记载中，回民户数为1976，口数为12148，户均6.1口。户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却高达15‰以上。

相对而言，户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正确的。但是，究竟哪一个口数是正确的呢？用1953年人口数与相邻地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即使是嘉庆二十五年的口数，也只可能偏低，不会偏高，而乾隆四十二年库车的口数更是大大低估了的。

在《西域图志》卷33中，赛喇木、拜城和阿克苏三城共有回民8569户，27969口。此三地构成了以后的阿克苏地区。《嘉庆一统志》载其户数为8424，口数为34607。与乾隆四十二年相比，户数稍少一些，口数则多得多。据时人观察，在阿克苏的人口中，只有约84%的人口登记为中国人^①。这可能是造成不同年份户口数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同一现象在其他地区也能发现，所谓非土著的“行商”即是。

行商的数量导致不同年份户口数的变动较大。

^① [美] 约瑟夫·弗莱彻：《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在 1953 年的人口中,库车和阿克苏的人口大体是相等的。各自仅相当于和阗、叶尔羌人口的一半左右。以此为标准,乾隆四十二年两地人口应分别为 5 万左右。库罗帕特金认为 1760 年的阿克苏有 15 万人口,而库车只有 2.5 万人口。我以为对阿克苏的人口有高估之嫌。而对库车人口则有可能低估。折中地估计,乾隆四十二年库车人口至少有 4 万,而阿克苏人口不会低于 6 万。以 4‰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推测,嘉庆二十五年,两地人口分别为 4.7 万和 7.1 万。

在乌什地区,《新疆回部志》卷 3 载:“乌什城并各村庄原住回民以乾隆三十年逆回叛乱,俱经剿灭。经参赞大臣永保奏明,从喀什噶尔、叶尔羌各城移住回民七百八户,二千三百六十七口。”《西域图志》卷 33 记载有 822 户,3158 名口。《嘉庆一统志》中户数增加为 856,口数增加为 5083。口数的增长快于户数。人口的快速增长是移民的结果。

三、结语

根据上文所述,本节所述标准年代大都为乾隆四十二年。然而,在有关塔尔巴噶台地区的人口叙述中,由于涉及到乾隆四十二年由伊犁迁来的土尔扈特人口,故将分析的标准时点定为乾隆四十一年。这一年份也是本卷各章的标准年份。按照本卷的体例,因所有人口数均为估计,故标准时点略有偏差,并不影响分析。兹将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新疆分区人口,列如表 10-8。

表 10-8 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 1953 年新疆分区人口
人口单位:万

地 区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	1953 年
乌鲁木齐	11.9	21.1	53.2
伊 犁	10.0	13.0	49.5
塔尔巴噶	2.9	3.5	14.4
哈 密	1.2	1.3	5.7
吐鲁番	1.5	1.7	15.5

续表

地 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1953年
喀喇沙尔	2.5	2.8	13.8
库 车	4.0	4.7	30.5
阿克苏	6.0	7.1	33.8
乌 什	0.2	0.5	9.8
喀什噶尔	26.0	31.0	105.8
叶尔羌	10.0	11.9	67.1
和 阗	10.0	11.9	77.1
合 计	86.2	110.5	476.2

说明：[1] 伊犁的大部分地区划入俄国，今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2] 库尔喀喇乌苏口数并入乌鲁木齐。

经表 10-8 的计算，乾隆四十一年新疆人口总数大约 86.2 万，至嘉庆二十五年增至 110.5 万。44 年间，新疆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6.5‰。

《嘉庆一统志》所载新疆(包括乌鲁木齐)口数共 44.5 万，离真实人口相距甚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统计口径并不在全体人口，或为土著人口的一部分，或为原有的赋税单位。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中，我将《嘉庆一统志》所载户口当作真实的户口数进行分析。现在看来，这一分析当然是不妥当的。

姜涛的估计要慎重得多，他指出：“据《嘉庆一统志》的统计，新疆各属民户计 75189 户，334893 名口，另有伊犁驻军 17267 人。如再加上隶属甘肃省的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人口 17410 户，138811 名口，民户可达 92599 户，473704 名口。这一统计很不完全。另据记载，19 世纪之初，仅由伊犁将军直接统辖的兵员，包括附属人员在内，已达 9.8 万余人，而其他地区驻军约 1.2 万人。有的地区，中外各族人口混居。如阿克苏的居民中，只有约 84% 登记为中国人。据此，如加上驻军及其眷属，以及其他未经统计的人口，在 1800 年前后，新疆人口可能已达 100 万人，即赶上或超过准部极盛时期该地区的人口规模。而到 1820 年时，该地区的总人口

只会超过 100 万。”^①简言之,姜涛认为未经统计的人口与在册人口可能是同样的多。这一结论与本节分析是吻合的。稍有不同的是,姜涛对于《嘉庆一统志》数据的性质并未作出具体的分析。这一点是本节分析与已有研究的最大不同处。

余太山指出:“清政府统一新疆的初期,天山南路的维吾尔人约有 25 万左右,加北路的额鲁特蒙古人口,总计不会超过 30 万人。至乾隆四十二年,北路人口已有 27 万左右,南路也已增加到 32 万人左右,总人口将近 60 万。道光六年(1826 年)前后,北路人口增至 43 万左右,南路增至 65 万左右,加上各地游牧的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人口,总人口不低于 110 万。”^②这一结论引自刘清顺若干年前的一项研究^③,刘氏的分析方法与本节稍有差异。然而,就总数而论,则与本节所得结果相同。特此说明。

不同的分析导致相近或相同的结论,并不能说明多种分析的尝试没有价值。

第三节 青海、西藏、蒙古和东北

一、青海

清代的青海主要是藏族、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据《清史稿》卷 79《地理志》,康熙年间编其部落为四,旗二十九,后又增置土司四十,设西宁办事大臣以统辖之。很明显,在历史时期,对于这样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言,任何现代意义的人口调查是不可能进行的。

黄奋生将土司制度与人口数量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雍正年间,在甘肃的藏族地区,设置指挥使 8 人,指挥同知 7 人,指挥僉事 8 人,土千户 9 人,正千户 1 人,副千户 2 人,土百户 9 人。在青海玉树区,设千户 1 人,百户 24 人,百长 26 人。按照制度,在居民 1000 户以上的部族设千户 1 人,100 户以上的设百户 1 人,不及

土司制度与户口制度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①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9 页。

②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5~156 页。

③ 刘清顺《清代新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88 年第 2 期。

100 户的设百长 1 人,均由兵部发给号纸,准其世袭。千百户之下设散百长数名,由西宁办事大臣发给委牌。这一联想存在技术上的难题:1000 户以上的部族设千户 1 人,我们到底按 1000 户计算?还是按 10000 户计算?抑或更多?根据土司制度进行人口推测也是不可取的。

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笔者只能根据大致的人口增长速度进行推测。在清代中期,甘肃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5‰,青海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理应更低。1953 年,(清代的)青海地区人口为 366687 人,设从嘉庆二十五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5‰,则有人口 30 万。乾隆四十一年,估计人口为 28 万。

二、西藏

黄奋生对西藏人口有如下分析:

西藏的人口,公元 1737 年(清乾隆二年)理藩院册籍载称:“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三千一百五十余所,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余;百姓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若每户以五口计算,共有百姓六十万七千一百九十人,加上喇嘛人数,共有九十万九千六百九十人。“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万三千七百;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若每户以五口计算,共有百姓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人,加上喇嘛人数,共有四万七千四百六十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所管辖的喇嘛百姓人数,共有九十五万七千一百五十人,其中喇嘛人数三十一万六千多,百姓人数六十四万多。喇嘛人数相当百姓人数的二分之一。^①

黄奋生所称理藩院册籍实际来自魏源《西藏后记》,按照我们对乾隆初年人口统计制度的理解,这一时期不可能有真实的人口数。西藏地域辽阔,要在这样一个广阔而气候恶劣的区域中进行

^① 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4 页。

人口调查是相当困难的。西藏的情况也有某种特殊性,即众多的寺院可能构成一种特殊的人口控制,此类西方社会按教区控制人口。若此资料记载为真,再加上黄氏所称一批因无力承担差役的户口,乾隆二年西藏总人口可能超过 100 万人。

黄奋生根据 1945 年西康德格的调查,即僧侣人口与非僧侣人口之比例,在农区为 1 : 3.28,在牧区为 1 : 3.23,认为僧侣人口仍占全人数三分之一左右^①。黄氏没有介绍资料的具体来源,无法校核。但就他计算结果来看,西康德格的僧侣人口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弱,而不是三分之一左右,黄氏的计算出现了错误。西康德格并非西藏本地,其僧侣的比例可能较西藏本地为低,而 1945 年的调查,极可能对总人口有所低估。另外,由于乾隆二年西藏的人口中,可能有相当数量的非差役人口未被计入,也可能导致僧侣人口比例的高估。从僧侣比例这一角度考虑,乾隆二年西藏人口总数可能有所偏低。若总人口为 110 万人,则僧侣人口占总人口的 27.5%。这一比例可能是合适的。

用僧侣与非僧侣人口的比例推算人口。

1954 年 11 月国家统计局关于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称: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区的人口为 1373669。从乾隆二年至此,西藏和昌都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乾隆四十一年西藏和昌都人口合计为 114 万左右,嘉庆二十五年约为 119 万左右。

根据西藏的例子,我相信对清代中期青海人口的估算不会有太大的误差。

三、蒙古

1. 内蒙古

黄奋生根据清代蒙古各佐领所拥有的佐领数,进行过蒙古地区人口的推算。其结果是,清代初年,内蒙古地区各盟旗约有 110 余万口。姜涛评论道:“由于他是严格地按每佐领 150 丁,每丁折为 5 口进行计算的,与实际人口当会有一些偏差。”^②张永江根据

^① 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385~386 页。

^②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 140 页。

佐领的数目推测蒙古族人口,采用清代末年漠南蒙古地区的调查,户均口数定为4.57人,依此比例,清代初年内蒙古各盟旗的人口约为100万^①。

张永江认为清末由理藩部组织的两次蒙古地区人口调查,尽管许多地区缺漏,但大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是翔实的。根据《清朝文献通考》卷25《户口一》的记载,漠南地区人口合计为127万。只不过这一统计中的人口数全为略数,精确度稍差。王士达根据民政部户口统计得出内蒙古各盟旗的人口总数为1108832,再加上呼伦贝尔、黑龙江、吉林、奉天的蒙古族人口以及五路驿站兵丁家口,中央政府直辖的各地牧群(牧场)所属人口,漠南地区蒙古人口可以估计在125万~130万之间^②。从清代初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8‰。如果扣除清代初年也未计入的呼伦贝尔等地蒙古族人口,漠南地区蒙古人口的增长速度还要稍低一些。

清代的内蒙古地区至1953年有人口约425万,但这是包括各民族人口的。据1953年人口普查,蒙古族人口共有1462956人,外蒙古因独立其人口已不列入,扣除新疆、青海地区大约20万左右的蒙古族人口,余126万左右蒙古人口属清代内蒙所辖。从清代末年以来,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口几无变动。清初以来的300年间,蒙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7‰。

从清初至1953年的300年间,内蒙古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4.8‰,反映了清代移民对内蒙古地区人口带来的深刻影响。以此增长率推测,乾隆四十一年和嘉庆二十五年内蒙古人口分别为185.5万和229万。

2. 外蒙古

黄奋生根据清代蒙古各盟的佐领数,推测外蒙古人口(包括喀尔喀四部、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约20余万。《乌里雅苏台志略·辖属部落》记载的外蒙古各部佐领数和户口数如下。

① 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本部分内容由张永江撰稿。

② 同上书,第328~329页。

喀尔喀图谢图罕,共 20 旗,52 佐领,户 7800,口 40000 有奇。

车臣罕部落,共 23 旗,45 佐领,户 6000,口 30000 有奇。

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户 16600 有奇,班第格尼音,20700 余名,共口 83600 有奇。

札萨克图罕,25 佐领,户 3000,口 15000 有奇。

三音诺尔部落,30.5 佐领,户 4700 有奇,口 20000 有奇。

唐努乌梁海,26 佐领,户 786,口 10000 有奇。

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的户数如果达到 16600,以每户 5 口计,其口数就大致有 83000。班第格尼音的 20700 并未被计入总数。如此,该志所载外蒙古的人口合计应为 22 万左右。此外,《乌里雅苏台志略》还遗漏了科布多地区蒙古人口,按照《大清会典》卷 67 所载佐领数推算,该区域大约有 55 个佐领,约有 41250 口。如此,外蒙古各部人口合计达到 26 万余口。问题是,《乌里雅苏台志略》所记是否为清代初年的佐领或户口?

《乌里雅苏台志略》成书年代不详,书中所载年代最晚者为嘉庆九年。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该志所载户口为嘉庆或乾隆年间的数字,而是清代初年的数字。这是因为,将《乌里雅苏台志略》所载佐领数与《大清会典》相对照,两书记载大体是相当的。《大清会典》记图什业(谢)图汗有 57 个佐领,三音诺彦(尔)有 40 个佐领,车臣汗部有 49 个佐领,札萨克图汗有 23.5 个佐领。前三地较《乌里雅苏台志略》分别多出 7 个佐领、9.5 个佐领、4 个佐领;札萨克图汗较《乌里雅苏台志略》少 1.5 个佐领。两书的误差大约为 11%。根据制度,蒙古佐领数每三年依据人口进行一次调整,不同记载中佐领数完全相同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两种记载差异不大,可以将它们视作相近年份的记载。《大清会典》所载较《乌里雅苏台志略》为多,并不能说明其所载人口为多,因为后者所载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并未编成佐领,故仅仅根据佐领数进行户口的推测是不够的。

作为对照,张永江引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存档案,称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所属的大沙毕纳尔 1788 年人口达 77654

《乌里雅苏台志略》所记为清代初年的户口数据。

外蒙古的户口数据,以蒙古国家档案为准。

人,1825年达83687人,1852年为76041人。又引蒙古国国家档案馆的车臣汗部人口、牲畜统计汇编,喀尔喀车臣汗部人口,1828年为103119人,1835年为129871人^①。在《乌里雅苏台志略》的记载中,喀尔喀车臣汗部清初仅有人口30000有奇,相差实在太多。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的大沙毕纳尔的数据可与清初该图的户口数对应,而车臣汗部的数据则无法让人理解。若此记载为真,1828年至1835年的7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3%以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宣统年间的户口调查中,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参赞大臣分别上报数合计为32万余。数字的具体分类详见本书第六卷中的有关论述。在各地户口中,库伦所属各地男性只有71100,女性则有114943,性别比仅为61.9。男性人口严重低估,可能是忽略喇嘛所致。科布多地区男性人口48236,女性人口34498,性别比高达139.8,女性人口有所低估。按照乌里雅苏台所属105的性比例进行修正,两地人口分别为235633和94175,与乌里雅苏台所属人口相加,外蒙古人口合计为385800人。迈斯基引述1918年外蒙人口调查数字为379592人(其中喇嘛105557人),这个数字包括科布多地区人口在内,但不包括唐努乌梁海人口^②。在清代末年的数据中,唐努乌梁海户数仅为3932,人口约16000人。由此可见,经过修正的宣统年间外蒙古人口数是合理的。清代初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按照1.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外蒙古地区乾隆四十一年和嘉庆二十五年分别为32万和34万。

四、东北地区

1. 辽宁

顺治十年,辽阳设府,下设辽阳、海城两县,这是东北地区设置州县的开始。据康熙《辽阳州志》卷15的记载,辽阳设县时的人

^① 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第258~259页。

^② 迈斯基《外蒙古共和国》,第978页。转引自《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第330页。

民,“俱系招徕”,似乎明代残存的土著已不存在。但从该志及康熙《铁岭县志》卷下记载的里社名称来看,可以推测其中仍有相当数量的土著人口。

乾隆《盛京通志》记载了奉天、锦州若干年份的人丁数,列如表 10-9。

表 10-9 清代前期奉天、锦州两府人丁的增长

年 代	奉天府		锦州府		合 计	
	人丁	年平均增长率(‰)	人丁	年平均增长率(‰)	人丁	年平均增长率(‰)
康熙七年(1668年)	7953		8690		16643	
雍正十二年(1734年)	23796	16.7	23680	15.3	47476	16.0
乾隆六年(1741年)	28258	25.4	25156	8.7	53514	17.2
1668年—1741年		17.8		14.9		16.4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三年《盛京通志》卷 35 至卷 36《户口志》。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我认为,由于奉天、锦州两府人口的绝大部分由移民构成,所以这里的“人丁”就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与人口脱节的纳税单位,而是成年男子。现在看来,将奉天府和锦州府的“人丁”称作“户”可能更准确一些。只不过与同时代其他地区“户”并不一样。在同时代的其他地区,“户”仅仅是一个自明代以来就大致不变的纳税单位,而在奉天和锦州,“丁”随着落籍的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由于并非所有的移民都已入籍,故不可将这里的“人丁”完全视作当地所有的“户”。从增长的速度看,从 1668 年至 1741 年,两府人丁的增长可能与人口的增长类似。

《嘉庆一统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奉天府口数为 131.5 万,设乾隆六年奉天府每丁为 1 户,每户有 5 口,合计则有 14 万余口。从乾隆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奉天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 28.6‰。由此可见,乾隆六年以后,奉天府人口的迁入还在加速。嘉庆二十五年锦州府的口数为 43.4 万。同理测得乾隆六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5.8‰。从这一数据,可以判定乾隆六年锦州府的口数略有偏低。实际情况应是,从雍正十二年开始,奉天

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5‰~29‰,锦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5‰~16‰。锦州府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奉天府,是因锦州府与直隶接壤,锦州成为接纳关内移民的第一站。比较而言,锦州地狭,接纳移民的能力不及奉天,奉天府的人口增速因此也快。按照两府不同的人口增长速度,乾隆四十一年,奉天府口数约为 39 万,锦州府约为 22 万^①。

2. 吉林和黑龙江

柳条边外的吉林地区,即当时的吉林将军辖区,是清政府封禁的重点。但长期以来,流民的迁入始终没有停止过。《嘉庆一统志》载吉林口数为 56.7 万,依锦州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 15‰,乾隆四十一年人口约为 29.4 万。

《嘉庆一统志》载黑龙江口数为 16.8 万。黑龙江地区地处严寒,大规模的移民尚未展开,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定为 10‰,乾隆四十一年有人口约 10.8 万。

^①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中,我根据户部清册中咸丰元年辽宁人口数,计算从嘉庆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3.1‰。据此认为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二十五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稍高,为 14‰,并据此估测得出乾隆四十一年辽宁人口为 96 万。这一估计的不妥之处在于对户部清册中辽宁数字的过于信任,导致对嘉庆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估计过低。

第十六章 人口增长、分布与迁移

第一节 清代中期至 1953 年的人口增长

第三章至第十五章的有关分析建立了这样一些标准时点的分府人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咸丰元年(1851年)、同治四年(1865年)、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六年(1880年)、宣统二年(1910年)和 1953 年。各省清代中期的标准时点只有两个:一是乾隆四十一年,一是嘉庆二十五年。清代后期的情况相当复杂,影响各省人口的重大事件各不相同,发生和结束的时间也不一致,因而所选择的标准时点也不尽一致。本章选择咸丰元年和光绪六年作为清代后期社会动乱之前和之后的两个标准时点,列出各省分府、州人口。各章分析中未涉及的时点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推测,如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只列有同治四年太平天国战区分府人口,表 16-1 中光绪六年有关各省分府人口依同治四年至宣统二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推出。作为比较,表 16-1 将《嘉庆一统志》中和新政调查所得宣统二年分府人口数用斜体字列出,以供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1910 年辽宁人口数据宣统三年新政调查数补入。同一年吉林人口只有 373.5 万,少于宣统二年数,不采纳。1910 年黑龙江的人口数,转引自许淑明的有关论文^①。根据所缺

^① 许淑明《清末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新兴城市和工商业》,《清史研究集》第八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表 16-1 清代中期至 1953 年各省分府人口

人口单位：万

地 区	1776 年《一统志》	1820 年	1851 年	1880 年	新政数	1910 年	1953 年	
江 苏								
江宁府	394.1	187.4	525.2	622.5	165.9	169.7	204.5	304.5
扬州府	515.7	326.8	666.3	798.1	599.6	338.3	567.3	631.6
通 州	245.5	98.3	280.1	303.8	329.1	250.8	367.7	436.5
海门厅	57.0	24.0	72.0	79.1	92.4	29.4	112.3	136.7
海 州	103.3	58.5	122.6	137.2	152.3	149.8	170.0	260.6
徐州府	295.4	184.0	337.0	369.8	400.9	313.0	434.1	554.3
淮安府	263.0	163.8	300.0	329.2	357.5	292.2	387.9	539.6
苏州府	511.1	547.6	590.8	654.3	236.7	252.8	252.8	313.2
松江府	227.7	264.6	263.2	291.5	255.2	240.5	240.5	202.7
上海市								620.4
镇江府	177.0	223.5	219.5	248.4	72.9	192.4	142.3	187.9
常州府	311.5	389.6	389.6	440.9	149.1	231.8	231.8	442.3
太仓州	142.3	177.8	177.2	197.1	137.5	124.3	124.3	119.4
合 计	3243.6	2645.9	3943.5	4471.9	2949.1	2585.0	3235.5	4749.7
安 徽								
广德州	43.1	55.1	55.1	64.3	7.9	25.5	27.9	40.5
宁国府	265.6	343.3	343.3	400.0	85.3	75.8	105.2	142.0
池州府	214.5	275.5	275.5	322.0	50.5	61.7	72.9	97.2
太平州	118.1	147.9	147.9	173.0	54.2	49.4	86.0	115.9
徽州府	216.9	247.5	247.5	271.5	68.4	101.5	82.3	94.9
安庆府	445.8	176.0	546.3	640.0	281.7	181.6	284.9	311.8
庐州府	284.9	354.8	354.8	416.5	347.2	188.3	362.2	439.3
颍州府	319.4	396.8	397.8	467.0	531.0	428.1	607.5	736.9
凤阳府	349.8	435.6	435.6	511.3	384.1	237.4	477.9	579.7
泗 州	130.7	156.9	156.9	184.2	131.7	91.7	173.9	210.9
滁 州	48.1	59.9	60.0	70.4	30.8	24.7	48.6	62.8
和 州	33.7	42.8	42.8	50.2	55.1	36.9	60.7	69.6
六安州	115.1	143.3	143.3	168.2	111.3	71.2	129.7	157.3
合 计	2585.7	2835.4	3206.8	3738.6	2139.2	1573.8	2519.7	3058.8

续表

地 区	1776年《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浙 江								
杭州府	268.2	319.7	319.7	361.8	85.3	120.0	120.0	212.8
嘉兴府	235.3	280.5	280.5	309.0	113.6	122.9	122.9	155.0
湖州府	215.3	256.8	256.8	290.7	76.7	113.0	113.0	139.2
严州府	127.4	146.1	146.1	99.1	51.3	46.0	61.4	87.3
绍兴府	426.5	539.2	539.2	636.2	267.1	281.4	281.4	326.0
宁波府	186.1	235.6	235.6	264.1	183.6	204.4	204.4	226.4
处州府	86.2	115.1	107.4	125.3	92.2	87.1	105.0	133.9
衢州府	102.0	15.2	114.1	120.4	70.3	69.0	93.4	115.8
金华府	204.8	255.0	255.0	297.6	200.3	128.5	235.0	295.0
温州府	162.0	201.7	201.7	223.3	250.6	180.5	280.4	327.3
台州府	222.7	277.4	277.4	300.1	211.9	260.8	232.1	263.8
合 计	2236.5	2642.3	2733.5	3027.6	1602.9	1613.6	1849.0	2282.5
江 西								
南昌府	313.6	467.6	375.5	385.7	196.3	287.2	216.4	268.3
南康府	73.2	129.2	96.7	110.0	49.9	68.3	54.6	62.1
九江府	99.9	123.5	129.9	131.0	53.2	89.0	60.0	71.2
瑞州府	87.9	103.1	103.0	113.4	40.5	64.9	46.4	57.8
饶州府	143.1	183.2	183.1	206.4	132.6	152.2	152.2	177.5
广信府	114.1	145.8	148.5	174.6	125.2	141.0	141.0	153.7
袁州府	58.2	78.5	72.2	81.6	70.4	122.7	81.7	132.7
临江府	110.8	127.9	120.2	132.6	54.5	58.9	58.9	65.9
吉安府	268.4	306.7	310.4	347.5	154.8	205.1	185.2	186.0
建昌府	115.7	147.4	131.4	142.7	49.3	82.0	53.9	45.3
抚州府	147.6	155.4	157.3	162.8	106.9	136.3	119.2	107.7
南安府	56.9	62.1	67.3	78.4	60.7	53.5	66.3	70.0
宁都州	81.8	83.5	87.8	91.1	65.0	67.1	71.1	61.6
赣州府	207.1	251.3	251.3	270.8	172.3	171.1	189.2	201.6
合 计	1878.3	2365.2	2234.6	2428.6	1331.6	1699.3	1496.1	1661.4
湖 南								

续表

地 区	1776年《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长沙府	341.9	429.0	445.3	532.4	633.2	614.8	757.7	994.6
衡州府	183.7	232.1	228.8	275.4	237.3	269.9	269.9	324.1
宝庆府	140.3	162.4	182.5	204.9	229.0	184.4	299.7	440.5
岳州府	122.6	177.8	159.6	195.3	123.6	171.0	147.9	191.3
常德府	106.6	122.0	127.0	131.9	151.5	163.4	179.8	222.8
澧州	84.5	103.4	109.0	132.7	160.6	148.5	196.1	251.9
永州府	140.4	163.0	171.0	195.7	222.9	218.0	255.1	311.2
郴州	78.1	99.7	94.6	108.8	90.0	100.5	100.5	116.7
桂阳州	72.2	77.3	79.4	84.3	69.7	74.0	74.0	79.5
永顺府	49.8	64.3	71.6	71.1	75.9	81.3	81.3	89.0
湘西四厅	19.0	19.3	24.7	19.9	35.7	54.0	42.8	55.6
靖州	50.5	60.8	53.7	65.1	50.8	52.3	52.3	54.1
辰州府	80.6	89.9	90.9	101.0	106.5	108.6	108.6	118.9
沅州府	55.0	53.7	60.0	62.4	64.5	66.3	66.3	72.4
合 计	1525.2	1854.7	1898.1	2180.9	2251.2	2307.0	2632.0	3322.6
湖 北								
汉阳府	309.0	368.3	368.3	409.8	297.7	399.4	354.4	454.5
黄州府	303.8	362.1	362.1	416.8	293.0	319.1	341.1	422.7
武昌府	255.4	687.3	304.4	344.5	224.4	342.5	264.6	335.0
德安府	112.4	224.2	134.0	151.6	140.0	230.4	158.3	188.7
荆州府	157.1	415.6	191.4	220.0	216.4	256.4	251.3	311.4
安陆府	91.4	332.5	108.9	121.1	136.6	316.1	155.3	186.8
荆门州	37.8	80.8	45.8	52.5	59.6	203.1	68.0	82.1
宜昌府	66.6	73.4	83.0	96.9	112.0	152.8	130.0	161.1
施南府	77.9	92.0	92.0	104.0	116.1	105.6	130.1	153.2
襄阳府	134.3	212.2	167.2	195.2	181.2	302.8	217.9	270.0
郢阳府	71.6	58.7	91.1	106.3	119.6	137.5	136.7	179.8
合 计	1617.3	2907.1	1948.2	2218.7	1896.6	2765.7	2207.7	2745.3
福 建								
福宁府	63.2	76.3	76.3	86.8	96.0	77.3	102.0	111.1

续 表

地 区	1776年	《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福州府	237.2	259.0	258.9	274.9	239.3	214.1	254.0	276.8
建宁府	112.5	322.8	122.8	130.4	66.7	106.0	70.8	77.2
邵武府	60.3	63.8	63.8	66.3	23.5	36.9	25.0	27.2
汀州府	126.5	149.5	149.4	167.4	104.3	109.9	109.9	121.1
延平府	78.1	85.4	85.3	90.6	56.5	96.1	60.0	65.4
龙岩州	28.3	33.2	33.2	37.0	22.4	22.8	22.8	26.5
永春州	40.5	48.3	48.3	54.4	38.1	23.6	40.5	44.1
兴化府	44.5	53.1	53.1	59.9	100.2	65.2	106.4	115.9
泉州府	211.8	244.9	244.9	270.3	238.4	254.3	254.3	275.2
漳州府	285.0	339.8	339.8	383.0	164.9	176.1	176.1	173.9
台湾府	90.0	178.7	178.7	219.7	266.4		325.3	759.1
合 计	1377.9	1854.8	1654.5	1840.7	1416.7	1182.4	1547.1	2073.5
广 东								
广州府	529.3	587.9	587.9	636.1	684.7	1078.1	739.0	824.3
肇庆府	169.1	255	202.2	230.3	260.1	313.1	295.0	353.4
罗定州	49.1	68.2	57.1	63.9	71.1	60.3	79.3	92.7
佛冈厅	5.5	5.2	6.5	7.3	8.2	4.2	9.3	11.0
惠州府	150.3	226.4	183.0	211.6	242.5	263.7	279.1	341.5
潮州府	215.8	221.1	266.1	311.0	359.9	358.4	418.5	519.6
嘉应州	121.5	133.3	133.3	139.3	145.1	133.4	151.4	160.9
韶州府	96.3	102.8	102.8	105.8	108.8	78.0	111.9	116.5
南雄州	17.6	34.1	20.5	23.0	25.5	39.1	28.5	33.4
连 州	27.2	30.2	30.2	33.6	37.1	32.7	41.1	47.7
连山厅	5.0	5.5	5.9	6.7	7.5	5.6	8.4	9.9
高州府	204.3	235.1	235.1	257.4	280.1	149.0	305.8	346.7
雷州府	58.5	68.2	68.2	78.0	88.5	88.3	100.8	121.5
廉州府	83.0	44.5	103.4	120.7	139.5	107.9	162.0	200.7
琼州府	112.0	138.3	138.3	161.2	186.1	110.6	216.0	267.2
合 计	1844.5	2155.8	2140.5	2385.9	2644.7	2822.3	2946.1	3447.0
广 西								

续 表

地 区	1776年《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桂林府	85.4	104.1	104.1	118.0	132.8	116.8	149.9	178.5
柳州府	72.4	93.9	93.9	112.8	133.9	84.9	159.9	206.2
庆远府	64.9	48.1	77.4	87.7	98.5	53.2	111.1	132.0
思恩府	90.5	49.7	109.8	125.9	143.2	57.1	163.5	197.7
泗城府	29.9	32.7	32.7	34.8	36.8	21.8	39.0	42.5
平乐府	68.9	85.8	85.8	99.7	114.7	88.7	132.6	163.3
梧州府	69.1	68.7	87.9	104.2	122.2	48.5	144.0	182.3
浔州府	65.8	64.1	83.8	99.3	116.4	63.5	137.2	173.7
南宁府	78.9	79.5	97.4	112.8	129.5	42.9	149.2	183.0
太平府	42.9	30.2	50.5	56.6	63.0	10.9	70.3	82.4
镇安府	28.1	28.7	34.4	39.6	45.3	20.9	51.9	63.2
郁林州	69.4	56.1	88.4	104.8	122.9	47.3	144.9	183.4
合 计	766.2	741.6	946.1	1096.2	1259.2	656.6	1453.5	1788.4
云 南								
云南府	101.1	133.4	133.4	171.8	85.8	60.5	112.9	151.9
潞江府	43.0	56.5	56.5	68.5	31.4	28.6	35.4	50.2
楚雄府	48.5	51.4	66.9	83.8	67.1	44.0	75.6	97.4
武定州	20.2	11.9	28.7	36.8	27.9	19.8	31.4	40.5
曲靖府	39.0	58.2	60.8	81.4	101.9	85.9	128.7	179.7
广西州	13.5	98.5	19.1	24.9	32.1	18.7	41.7	60.8
顺宁府	29.4	11.4	41.7	53.4	67.3	49.9	85.5	120.4
永昌府	39.0	25.2	55.3	67.9	79.6	35.8	93.8	118.8
腾越厅	30.6	26.8	40.9	44.7	49.6		55.3	64.5
普洱府	48.7		63.3	79.0	46.7	14.6	52.6	62.4
元江州	15.0		19.3	21.4	22.6	10.9	22.6	28.4
镇沅州	4.5		6.0	6.8	5.9	1.6	6.9	8.5
景东厅	12.0	6.3	12.6	15.2	15.8	5.9	17.8	22.9
开化府	22.9	25.9	29.8	36.9	45.1	32.9	57.0	78.2
广南府	25.8		32.7	36.7	40.3	27.9	44.5	51.3
临安府	86.8	53.2	112.9	134.5	139.9	67.0	121.8	150.9
昭通府	46.0		63.1	79.6	98.1	89.9	121.6	165.5

续表

地 区	1776年	《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东川府	18.6		28.8	38.8	48.5	32.4	61.3	85.6
大理府	74.6	74.8	74.8	92.9	64.6	42.8	72.9	93.7
蒙化厅	18.3	15.5	22.2	23.2	16.3	10.0	18.9	23.4
丽江府	40.9	35.1	47.5	52.3	57.0	22.7	62.4	71.8
永北厅	10.0	8.3	13.6	17.0	21.0	12.6	26.2	36.0
其 他						26.5		
合 计	788.4	692.4	1029.9	1267.5	1164.5	740.7	1346.8	1762.8
贵 州								
贵阳府	71.3	74.1	92.0	103.8	116.3	80.5	130.8	154.7
安顺府	60.6	77.0	78.8	89.1	99.9	66.9	112.5	133.4
平越州	28.7	36.8	37.3	42.2	47.4	35.2	53.4	63.4
都匀府	38.4	24.3	50.0	59.4	69.7	62.4	82.3	104.4
遵义府	81.8	59.2	106.4	127.3	150.4	146.5	178.9	229.3
仁怀厅	7.0	3.4	9.1	10.9	12.9		15.3	19.7
思南府	49.1	33.6	63.9	76.1	89.6	95.8	106.1	135.1
石阡府	12.2	9.5	15.9	19.5	23.7	24.0	28.9	38.4
松桃厅	9.2	11.5	12.0	14.5	17.3	21.9	20.8	27.0
铜仁府	10.1	13.1	13.1	15.3	17.7	18.6	20.5	25.4
思州府	10.6	12.6	12.6	13.5	14.4	11.2	15.4	17.0
镇远府	48.9	57.3	58.3	63.5	68.7	51.9	74.6	83.9
黎平府	28.2	28.6	33.6	36.9	40.2	41.5	44.0	50.1
大定府	72.2	55.4	107.1	135.5	168.9	127.0	212.0	293.8
兴义府	29.5	30.9	43.7	54.4	66.8	86.4	82.5	111.8
普安厅	9.4	7.4	14.0	17.5	21.5		26.7	36.3
合 计	567.2	534.7	747.8	879.4	1025.4	869.8	1204.7	1523.7
四 川								
重庆府	274.4	301.8	364.9	455.0	559.4	692.7	692.7	1060.6
泸 州	49.6	44.6	73.5	96.5	124.5	162.1	162.1	236.5
叙永厅	19.9	20.3	28.3	37.8	49.6	65.6	65.6	71.6
顺庆府	121.0	205.5	171.8	212.0	258.1	316.4	316.4	485.3

续表

地 区	1776年	《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潼川府	116.3	180.1	180.2	247.5	333.0	452.6	452.6	676.9
资 州	61.9	95.4	95.9	136.4	189.7	266.7	266.7	360.3
保宁府	77.3	96.2	119.7	163.0	217.5	293.1	293.1	449.6
酉阳州	44.8	46.1	62.2	74.0	86.9	102.8	102.8	146.0
绥定府	69.9	112.5	108.3	146.9	195.3	262.3	262.3	329.4
太平厅	9.6	8.2	14.0	18.0	22.9		29.3	41.6
夔州府	91.8	86.1	130.3	155.0	182.4	215.8	215.8	373.4
忠 州	47.3	49.7	69.8	88.6	110.6	139.3	139.3	213.8
石碛厅	7.5	9.4	10.8	7.2	4.9	3.3	3.3	32.2
绵 州	63.3	110.4	80.6	95.9	112.8	133.5	133.5	167.3
成都府	180.6	548.4	256.5	302.0	351.9	412.1	412.1	590.2
邛 州	26.6	61.2	39.0	47.9	58.0	70.7	70.7	86.2
龙安府	25.1	83.3	32.6	39.7	47.6	57.6	57.6	65.1
眉 州	31.8	76.4	42.4	50.2	58.7	69.1	69.1	85.5
嘉定府	84.0	206.5	113.2	142.2	176.1	219.6	219.6	281.0
叙州府	130.1	173.6	176.9	213.4	254.3	304.9	304.9	392.0
雅州府	49.2	85.7	62.6	73.7	85.9	100.7	100.7	126.4
宁远府	83.5	126.7	104.5	122.3	141.6	164.9	164.9	207.0
茂 州	4.9	39.7	5.3	5.6	5.9	6.3	6.3	6.9
理番厅	1.7	26.1	1.8	2.2	2.7	3.3	3.3	2.4
懋功厅	3.1		3.9	4.7	5.5	3.5	6.5	8.3
松潘厅	5.9	7.9	7.5	8.8	10.3	6.4	12.1	15.2
合 计	1681.1	2801.8	2356.5	2946.5	3646.1	4525.3	4563.3	6510.8
直 隶								
顺天府	198.7	293.4	386.0	460.6	543.3	534.0	644.6	823.6
宣化府	74.6	83.9	83.9	104.1	127.4	149.7	157.1	211.9
永平府	145.0	67.1	173.6	197.4	222.5	19.8	251.9	301.0
保定府	193.2	170.5	230.4	260.8	292.8	239.2	330.0	391.8
易 州	34.6	22.1	41.2	45.9	50.8	38.3	56.4	65.6
遵化州	54.0	70.2	70.2	92.7	120.1	85.8	157.1	230.9
赵 州	65.8	76.7	76.7	84.3	92.2	89.0	101.1	115.3

续表

地 区	1776年	《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定 州	53.2	37.1	63.4	70.6	78.8	50.7	86.8	100.8
深 州	44.7	26.6	53.3	59.4	65.7	73.5	73.0	84.8
冀 州	63.2	128.9	75.0	84.8	95.0	138.2	107.0	126.8
天津府	134.3	160.1	160.1	206.2	261.4	210.7	334.0	474.5
河间府	130.3	161.6	161.6	188.0	216.5	224.7	250.6	309.1
正定府	175.2	125.6	208.9	232.8	257.6	209.8	286.1	332.4
顺德府	83.5	95.2	95.2	102.2	109.2	122.1	116.9	129.0
广平府	98.4	122.5	122.5	141.5	162.0	131.8	186.2	227.5
大名府	172.2	196.5	196.5	210.9	225.4	145.5	241.4	266.3
承德府	50.0	78.4	98.0	149.3	221.4	295.8	332.9	597.0
口北三厅	9.0		11.7	14.0	16.6	32.0	19.7	25.3
合 计	1779.9	1916.4	2308.2	2705.5	3158.7	2771.2	3732.8	4813.6
河 南								
彰德府	108.6	136.8	136.8	159.7	117.6	149.4	149.4	235.4
卫辉府	148.8	152.0	175.0	196.2	135.2	171.7	171.7	306.6
怀庆府	150.8	180.3	180.3	204.7	152.5	167.7	167.7	192.1
开封府	287.6	342.8	342.8	388.0	265.6	337.3	337.3	535.3
河南府	147.0	171.1	171.1	190.1	165.9	210.7	210.7	329.9
归德府	275.8	328.8	328.8	366.4	271.8	265.2	345.2	515.1
陈州府	185.4	221.0	221.0	246.3	168.4	208.4	213.9	319.3
许 州	108.9	129.9	129.9	144.8	110.6	112.0	142.0	203.4
汝 州	69.7	83.1	83.1	92.6	77.6	98.6	98.6	160.4
陕 州	45.1	53.7	53.7	59.8	38.4	48.8	48.8	81.4
汝宁府	255.5	193.5	297.9	327.8	354.0	288.8	387.4	450.6
光 州	178.4	135.2	208.1	228.3	246.1	156.4	269.2	309.9
南阳府	353.4	231.7	421.3	472.4	518.1	395.5	566.8	684.6
驻防满营						0.5		
合 计	2315.0	2359.9	2749.7	3077.1	2621.8	2611.0	3108.7	4324.0
山 东								
济南府	351.9	401.5	401.5	443.0	485.6	422.0	534.0	612.0

续表

地 区	1776年《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青州府	297.3	331.9	331.9	358.1	384.4	333.4	413.7	459.6
登州府	289.3	191.3	341.5	380.6	421.1	305.7	467.7	543.5
东昌府	141.8	169.7	169.7	183.5	197.5	162.6	313.1	237.6
莱州府	292.8	337.4	337.4	385.4	436.4	332.4	496.3	596.7
沂州府	349.3	218.1	407.4	454.0	502.4	304.7	557.9	648.3
临清州	94.6	108.4	108.4	101.1	94.7	61.9	88.5	80.3
济宁州	76.3	88.9	88.9	99.2	110.0	84.5	122.3	142.5
兖州府	224.5	261.8	261.8	305.2	352.2	240.5	408.5	505.3
曹州府	272.4	317.7	317.7	348.1	379.2	289.8	414.2	470.2
武定府	187.9	219.1	219.1	232.6	246.0	208.6	260.6	283.1
泰安府	212.1	247.3	247.3	267.7	288.3	207.8	311.3	347.5
合 计	2790.2	2893.1	3232.6	3558.5	3897.8	2953.8	4388.1	4926.6
山 西								
解 州	65.1	80.0	80.0	83.0	30.0	31.3	39.0	56.7
绛 州	75.3	101.7	101.7	115.1	44.5	42.1	55.2	75.3
蒲州府	88.8	139.9	110.9	125.5	34.7	41.5	41.5	62.8
平阳府	124.8	139.8	139.8	151.6	56.6	72.4	72.4	122.1
隰 州	11.5	13.4	13.4	14.9	5.3	8.1	8.1	14.6
霍 州	30.1	35.1	35.1	39.1	14.5	23.5	23.5	31.4
泽州府	75.5	90.0	90.0	101.8	78.7	58.0	90.6	111.0
潞安府	78.9	94.1	94.1	106.5	82.3	72.0	97.7	125.3
沁 州	22.4	26.7	26.7	30.2	23.4	18.0	27.3	34.1
辽 州	17.8	21.3	21.3	24.1	8.0	12.4	12.4	25.1
汾州府	156.7	180.7	180.7	200.1	86.9	84.5	105.1	138.1
太原府	183.0	208.7	208.7	232.9	110.4	104.5	138.8	192.8
平定州	56.1	64.0	64.0	70.2	60.6	61.0	72.0	92.4
忻 州	32.0	36.6	36.6	40.1	30.2	27.9	36.8	48.7
保德州	12.4	14.1	14.1	15.5	8.3	10.3	10.3	13.7
代 州	45.0	51.3	51.3	56.3	58.0	46.1	64.4	74.8
宁武府	21.0	23.9	23.9	26.2	14.7	11.1	18.2	24.5
大同府	70.2	76.5	76.5	81.4	73.2	106.9	106.9	201.4

续表

地 区	1776年	《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朔平府	48.5	53.0	53.0	56.4	50.8	28.2	67.3	75.5
归绥六厅	11.1	12.1	12.1	12.9	11.6	99.2	99.2	101.1
合 计	1226.2	1462.9	1433.9	1583.8	882.7	959.2	1186.7	1621.4
陕 西								
西安府	242.3	296.2	294.4	325.1	103.9	206.2	206.2	463.8
同州府	158.2	180.5	180.5	198.1	90.0	94.1	112.9	156.2
鄜 州	24.8	31.4	27.2	30.8	14.1	10.4	17.8	24.8
兴安府	10.0	121.4	121.4	131.3	67.3	95.3	95.3	164.9
商 州	11.3	75.2	75.2	89.8	57.1	60.1	82.3	128.9
汉中府	75.1	154.1	179.5	183.0	138.9	128.1	167.5	218.5
绥德州	24.9	28.4	28.4	33.8	25.9	23.4	34.5	51.9
榆林府	41.8	51.5	47.7	58.3	41.7	38.2	50.6	66.9
延安府	56.0	63.8	63.8	68.9	30.0	15.3	15.3	65.5
凤翔府	100.0	134.8	134.8	142.9	106.7	93.1	123.3	151.9
邠 州	22.1	25.8	25.8	28.3	13.4	15.7	21.2	41.0
乾 州	30.0	34.3	34.3	36.6	18.5	27.6	27.6	49.1
合 计	796.5	1197.4	1213.4	1326.9	707.5	807.5	954.5	1583.4
甘 肃								
兰州府	241.5	269.5	269.5	291.2	88.1	62.8	129.8	225.4
巩昌府	340.1	379.5	379.5	410.0	75.9	60.7	118.6	225.1
平凉府	230.0	234.0	253.9	274.3	32.1	37.6	57.6	133.0
庆阳府	114.1	127.3	127.3	137.5	12.3	14.3	17.0	70.6
宁夏府	135.3	139.3	151.0	162.9	17.0	28.9	22.4	89.0
甘州府	81.0	81.4	90.4	97.6	18.8	24.5	28.5	51.5
凉州府	134.8	150.4	150.4	162.5	45.8	41.0	71.6	135.9
西宁府	63.8	70.9	70.9	78.8	26.4	41.3	41.3	125.3
泾 州	80.0	83.8	89.8	92.1	23.5	18.3	24.5	61.3
秦 州	77.9	86.9	86.9	93.9	93.3	83.7	116.4	160.1
阶 州	34.0	37.9	37.9	41.0	47.1	36.4	64.9	84.1
肃 州	40.5	45.2	45.2	48.8	11.6	16.8	19.0	36.6

续 表

地 区	1776年《一统志》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新政数	1910年	1953年	
安西州	6.9	7.8	7.8	8.4	3.6	4.0	4.5	13.1
合 计	1579.9	1713.9	1760.5	1899.0	495.5	470.4	716.1	1411.0
新 疆								
乌鲁木齐	11.9	10.3	21.1	22.8	6.0	10.7	13.8	53.2
伊 犁	10.0	3.8	13.0	15.1	6.0	10.4	10.4	49.5
塔尔巴 噶台	2.9	3.5	3.5	4.0	0.5	2.2	0.9	14.4
哈 密	1.2	0.3	1.3	1.4	0.1	0.6	0.5	5.7
吐鲁番	1.5	0.9	1.7	1.8	0.2	7.0	6.8	15.5
喀喇沙尔	2.5	2.8	2.8	3.4	4.0	3.8	4.8	13.8
库 车	4.0	1.2	4.7	6.5	8.8	10.6	12.1	30.5
阿克苏	6.0	3.5	7.1	10.4	14.9	21.7	21.7	33.8
乌 什	0.2	0.5	0.5	1.4	2.8	3.8	4.7	9.8
喀什噶尔	26.0	6.6	31.0	35.1	44.4	64.6	60.0	105.8
叶尔羌	10.0	6.5	11.9	16.6	25.7	40.3	43.1	67.1
和 阗	10.0	4.5	11.9	17.8	25.8	37.2	38.1	77.1
合 计	86.2	44.4	110.5	136.3	139.2	212.9	216.9	476.2
辽 宁								
兴 京		0.8	0.8					
奉天府	39.0	131.5	131.5					
锦州府	22.0	43.4	43.4					
合 计	61.0	175.7	175.7	258.2	409.0	515.9	1069.6	1854.5
吉 林								
吉林	29.4	56.7	56.7	123.8	256.9	547.7	547.7	1129.0
黑龙江	10.8	16.8	16.8	37.0	77.5	166.3	198.1	1189.7
青 海	28.0		30.0	31.4	32.9		34.4	36.7
西 藏	114.0		119.0	123.1	127.0		131.2	137.4
内蒙古	185.5		229.0	265.6	305.2		349.7	425.0
外蒙古	32.0		34.0					

年份前后两个年份的人口数,用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出所缺年份的人口数。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西藏和内蒙古等六地 1851 年、1880 年及 1910 年人口数就是这样得来的。

我国台湾的情况要复杂一点。195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台湾人口数据为 759.1 万。1905 年台湾人口为 304 万,1915 年为 348 万^①,测得 1910 年为 325.3 万,再根据嘉庆二十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推算 1851 年和 1880 年的人口。

根据表 16-1,有表 16-2。

有关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宣统元年三个年份的分省人口数据,本卷各章修正所得与《清朝文献通考》、《嘉庆一统志》和内政部公布的调查资料存在很大的差异。文献所载或存在低估,或存在浮夸,其中也有部分数据是可靠的。如在《清朝文献通考》中,至少有陕西、山西二省的口数与实际人口数相当接近,此二省的户口调查卓有成效。辽宁的乾隆四十一年口数可能以《清朝文献通考》所载为准,因绝对数的差异不大,故不作修正。

在《嘉庆一统志》中,则有湖南、广东、山西、陕西、甘肃等省数据与实际人口数相当接近。表 16-2 对于辽宁、吉林等地口数未加修正,并不说明《嘉庆一统志》所载正确,而是由于缺乏资料,无法进行真伪之判别,数据修正亦无法进行。嘉庆二十五年口数存在较大浮夸的省份有四川、湖北、福建、江西等省。对于四川口数的浮夸,施坚雅早有论述,本卷第七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是年湖北、江西口数的浮夸是全局性的,福建口数的浮夸则主要出在建阳县。嘉庆二十五年广西、云南、贵州口数的低估是由于漏登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内地的省份如直隶、浙江、江苏、河南等省人口的漏登原因则十分复杂,如浙江衢州的口数的漏登,江苏江宁布政司诸府登载的是男性而不是全体人口,河南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直隶口数漏载的原因不明。安徽的情况有些特殊,分府累计的口数少于总数,一大批屯丁人口未计入嘉庆二十五年的分府人口数中。如有可能复原这批屯丁人口,对于安徽分府人口的估计将会更加准确。

^① 陈绍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年版,第 180 页。

对《清朝文献通考》和《嘉庆一统志》数据的总体评价。

表 16-2 清代中期至 1953 年中国分省人口

省 区	1776 年		1820 年		1851 年		1880 年		1910 年		1953 年
	《通考》	修正后	《一统志》	修正后	清册数	修正后	修正后	修正后	新政数	修正后	修正后
江 苏	2880.8	3243.6	2645.9	3943.5	4430.2	4471.9	2949.1	2585.0	3235.5	4749.7	
安 徽	2756.7	2585.7	2835.4	3206.8	3763.1	3738.6	2139.2	1573.8	2519.7	3058.8	
浙 江	1936.5	2236.5	2642.3	2733.5	3010.7	3027.6	1602.9	1613.6	1849.0	2282.5	
江 西	1684.9	1878.3	2365.2	2234.6	2451.6	2428.6	1331.6	1699.3	1496.1	1661.4	
湖 南	1499.0	1525.2	1854.7	1898.1	2064.8	2180.9	2251.2	2307.0	2632.0	3322.6	
湖 北	1481.5	1617.3	2907.1	1948.2	3381.0	2218.7	1896.6	2765.7	2207.7	2745.3	
福 建	1122.0	1377.9	1854.8	1654.5	2009.9	1840.7	1416.7	1182.4	1547.1	2073.5	
广 东	1482.1	1844.5	2155.8	2140.5	2838.9	2385.9	2644.7	2822.3	2946.1	3447.0	
广 西	538.2	766.2	741.6	946.1	782.3	1096.2	1259.2	656.6	1453.5	1788.4	
云 南	310.3	788.4	692.4	1029.9	740.3	1267.5	1164.5	740.7	1346.8	1762.8	
贵 州	500.3	567.2	534.7	747.8	543.6	879.4	1025.4	869.8	1204.7	1523.7	
四 川	779.0	1681.1	2801.8	2356.5	4475.2	2946.5	3646.1	4525.3	4563.3	6510.8	
直 隶	2056.7	1779.9	1916.4	2308.2	2345.5	2705.5	3158.7	2771.2	3732.8	4813.6	
河 南	1985.8	2315.0	2359.9	2749.7	2392.8	3077.1	2621.8	2611.0	3108.7	4324.0	
山 东	2149.7	2790.2	2893.1	3232.6	3326.6	3558.5	3897.8	2953.8	4388.1	4926.6	

人口单位：万

续表

省区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通考》	修正后	《一统志》	修正后	清册数	修正后	新政数	修正后	新政数	修正后	
山西	1250.3	1226.2	1462.9	1433.9	1569.3	1583.8	882.7	959.2	1186.7	1621.4	
陕西	819.3	796.5	1197.4	1213.4	1201.0	1326.9	707.5	807.5	954.5	1583.4	
甘肃	1506.8	1579.9	1713.9	1760.5	1544.0	1899.0	495.5	470.4	716.1	1411.0	
新疆		86.2	44.4	110.5		136.3	139.2	212.9	216.9	476.2	
辽宁	76.4	61.0	175.7	175.7	258.2	258.2	409.0	515.9	1069.6	1854.5	
吉林	7.5	29.4	56.7	56.7	32.7	123.8	256.9	547.7	547.7	1129.0	
黑龙江		10.8	16.8	16.8		37.0	77.5	166.3	166.3	1189.7	
青海		28.0		30.0		31.4	32.9		34.4	36.7	
西藏		114.0		119.0		123.1	127.0		131.2	137.4	
内蒙古		185.5		229.0		265.6	305.2		349.7	425.0	
外蒙古		32.0		34.0							
合计	26823.8	31146.5	35868.9	38310.0	43161.7	43608.7	36438.9	35357.4	43604.2	58855.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16-1。1776年资料据《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1851年《户部清册》资料据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附录《1749-1898年分省人口统计》。

内政部公布的宣统二年户口调查数据,分省论之,在四川,除了个别边远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外,各府的人口数据都显得相当可靠。在河南,其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数据质量很高,南部各府的数据质量相当差,漏登大批人口。在山西,则有晋西南的蒲州等府、辽州、保德、大同及归绥六厅等地人口数显得相当可靠,其他府、州亦差。在江苏和浙江,苏南地区及杭、嘉、湖、宁、绍等地的人口数是准确的。这暗示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呈现某种相关性,即经济发达区域的户口调查所遇障碍小,进展较顺利,反之则障碍大,推进艰难,所以,在广西和云南等地,几乎很难发现可靠的调查数据。然而,这一解释并不是绝对的。同样处于边远地区的湘东南和湘西诸府,人口调查的质量相当高。地方官员对于户口调查政策的理解,资源动员的能力和组织能力等等,都是影响一个区域调查工作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

对宣统二年新政数据的总体评价。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当1910年人口修正数与文献所载数相差甚微时,并不说明修正是精确的,而是说明修正数和文献所载大致吻合。在四川、云南和新疆三省以外的地区,我们至今未获宣统二年户口调查的人口数,表16-1中所列人口数是根据户数推测的,推测过程见正文中的说明。

从全国数据而论,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明显是低估的,低估的幅度大致在14%左右。从省级数据看,数据高估和低估抵消了相当一部分错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乾隆四十一年数据的误差幅度只有14%。从全国口数看,嘉庆二十五年数也是低估的。在《嘉庆一统志》中,云南的广南、昭通、东川、普洱、元江、镇沅,四川的懋功,直隶的口北三厅及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口数缺载,加上这批人口,可能增加500万左右的人口数,合计约有口数3.63亿,仍较实际人口约少2000万。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分省分府而论,许多省的嘉庆二十五年户口数是不堪使用的。

乾隆四十一年数据低估的幅度与何炳棣当年的推测接近。

同样的结论可用于《清册》所载咸丰元年数据:尽管《清册》所载是年中国人口达到4.31亿,如加上缺载的新疆、黑龙江、青海、西藏、蒙古,口数可达4.36亿甚至更多,与本卷各章所得估计数基本相同。然而,分省而论,《清册》中的咸丰元年口数仍存在相当大

对《清册》数据的评价。

的问题。如四川,咸丰元年的数据是大浮夸的结果,其中也包括统计汇总过程中的误差。如湖北,嘉庆年间的浮夸至此得到进一步发展,户口数据荒唐已完全不可相信。江西、福建亦然。在有些省,嘉庆年间的低估至咸丰元年依然存在,如直隶、河南、山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即是。有意思的是,嘉庆年间江苏江宁布政司登载男性人口造成的人口漏登,在咸丰元年的《清册》数据中得到了纠正,《清册》所载咸丰元年江苏口数与本卷估计基本吻合。安徽的情况也是如此,《清册》的咸丰元年安徽人口已经包括屯丁。在浙江,《清册》所载与本卷估计基本相同,这说明嘉庆二十五年衢州府人口的错漏在咸丰《清册》中已经得到了纠正。或者可以这样说,《嘉庆一统志》抄录《清册》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在《清册》本身是不存在的。

光绪年间的《清册》存在大量的漏报,已成世人皆知的事实,故不列出,也不与本卷分析所得各省口数进行比较。宣统二年新政调查所得人口数只有 3.54 亿,加上漏载的地区,大约为 3.6 亿。本卷分析所得实际人口约为 4.36 亿,达到了咸丰元年的水平。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历时 30 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以后,再经过 30 年的休生养息,人口恢复到了战争发生前的水平。战争、灾荒与瘟疫使中国人口的增长停滞了 60 年。

本卷第二章估测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中国人口大约有 1.6 亿。从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82‰。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嘉庆二十四年为 4.72‰,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三十年为 4.19‰,从咸丰元年至光绪五年为 -6.16‰,从光绪六年至宣统元年为 6.01‰,从宣统二年至 1953 年为 6.98‰。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灾荒和瘟疫的破坏之后,人口的增速加快,是为补偿性的人口增长。其后人口增速减缓,直至新的战乱、灾荒和瘟疫的破坏再一次大规模地消灭中国人口。如果说,从光绪六年至宣统二年的人口增长为大战或大灾之后的人口补偿性增长,那么,从宣统二年开始的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同样的性质。表 16-3 显示的陕西、甘肃、新疆人口的高速增长,就是对战后及灾后人口损失的补充。此外,东北的移民开垦也使得这一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加

快。上海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提升了区域人口的增长速度。台湾人口的高速增长由特殊原因引起,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表 16-3 1776 年至 1953 年分省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省 区	1776— 1819 年	1820— 1850 年	1851— 1879 年	1880— 1909 年	1910— 1953 年
江 苏	4.45	4.06	-14.25	3.09	8.97
安 徽	4.90	4.96	-19.07	5.47	4.52
浙 江	4.57	3.30	-21.69	4.77	4.91
江 西	3.96	2.69	-20.51	3.89	2.44
湖 南	4.98	4.49	1.09	5.22	5.43
湖 北	4.24	4.20	-5.39	5.08	5.08
福 建	4.17	3.45	-8.99	2.94	6.83
广 东	3.39	3.51	3.56	3.60	3.66
广 西	4.80	4.76	4.79	4.79	4.83
云 南	6.09	6.72	-2.92	4.86	6.28
贵 州	6.30	5.24	5.31	5.39	5.48
四 川	7.71	7.23	7.37	7.51	8.30
直 隶	5.92	5.14	5.35	5.58	5.93
河 南	3.92	3.64	-5.51	5.69	7.70
山 东	3.35	3.10	3.15	3.96	2.70
山 西	3.56	3.21	-19.96	9.91	7.28
陕 西	9.61	2.89	-21.45	10.03	11.84
甘 肃	2.46	2.45	-45.27	12.35	15.90
新 疆	5.66	6.79	0.73	14.89	18.46
辽 东	24.33	12.50	15.99	32.56	12.88
吉 林	15.04	25.51	25.49	25.56	16.96
黑 龙 江	10.09	25.80	25.82	25.78	46.82
青 海	1.57	1.47	1.61	1.49	1.51
西 藏	0.98	1.09	1.08	1.09	1.07
内 蒙 古	4.80	4.79	4.80	4.55	4.55
外 蒙 古	1.38				
合 计	4.72	4.19	-6.17	6.00	7.00

资料来源:据本卷表 16-2 计算。

第二节 人口分布

兹根据表 16-1 中的内容,将 1776 年至 1953 年各个标准时点中各省分府人口密度,列如表 16-4。

表 16-4 1776 年至 1953 年中国十八省分府人口密度

单位:人/平方公里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 年	1820 年	1851 年	1880 年	1910 年	1953 年
江 苏							
江宁府	7781	506.5	675.0	800.0	213.2	262.8	391.3
扬州府	15620	330.2	426.6	510.9	383.9	363.2	404.4
通 州	6863	357.7	408.1	442.7	479.5	535.8	636.0
海门厅	1270	448.8	566.9	622.8	727.6	884.3	1076.4
海 州	10440	98.9	117.4	131.4	145.9	162.8	249.6
徐州府	16690	177.0	201.9	221.6	240.2	260.1	332.1
淮安府	19060	138.0	157.4	172.7	187.6	203.5	283.1
苏州府	6762	755.8	873.7	967.6	350.0	373.9	463.2
松江府	4157	547.8	633.1	701.2	613.9	578.5	487.6
上 海							
镇江府	4619	383.2	475.2	537.8	157.8	308.1	406.8
常州府	7328	425.1	531.7	601.7	203.5	316.3	603.6
太仓州	2317	614.2	764.8	850.7	593.4	536.5	515.3
合 计	102907	315.2	383.2	434.6	286.6	314.4	461.6
安 徽							
广德州	3239	133.1	170.1	198.5	24.4	86.1	125.0
宁国府	11490	231.2	298.8	348.1	74.2	91.6	123.6
池州府	9767	219.6	282.1	329.7	51.7	74.6	99.5
太平州	3188	370.5	463.9	542.7	170.0	269.8	363.6
徽州府	11560	187.6	214.1	234.9	59.2	71.2	82.1
安庆府	14800	301.2	369.1	432.4	190.3	192.5	210.7
庐州府	14990	190.1	236.7	277.9	231.6	241.6	293.1

续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颍州府	22550	141.6	176.4	207.1	235.5	269.4	326.8
凤阳府	23760	147.2	183.3	215.2	161.7	201.1	244.0
泗州	11090	117.9	141.5	166.1	118.8	156.8	190.2
滁州	4899	98.2	122.5	143.7	62.9	99.2	128.2
和州	2663	126.5	160.7	188.5	206.9	227.9	261.4
六安州	9479	121.4	151.2	177.4	117.4	136.8	165.9
合 计	143475	180.2	223.5	260.6	149.1	175.6	213.2
浙 江							
杭州府	7318	366.5	436.9	494.4	116.6	164.0	290.8
嘉兴府	3209	733.3	874.1	962.9	354.0	383.0	483.0
湖州府	6194	347.6	414.6	469.3	123.8	182.4	224.7
严州府	8435	151.0	173.2	117.5	60.8	72.8	103.5
绍兴府	9544	446.9	565.0	666.6	279.9	294.8	341.6
宁波府	5937	313.5	396.8	444.8	309.2	344.3	381.3
处州府	18360	46.9	58.5	68.2	50.2	57.2	72.9
衢州府	9138	111.6	124.9	131.8	76.9	102.2	126.7
金华府	9934	206.2	256.7	299.6	201.6	236.6	297.0
温州府	11245	144.1	179.4	198.6	222.9	249.4	291.1
台州府	11160	199.6	248.6	268.9	189.9	208.0	236.4
合 计	100474	222.6	272.1	301.3	159.5	184.0	227.2
江 西							
南昌府	21770	144.1	172.5	177.2	90.2	99.4	123.2
南康府	5246	139.5	184.3	209.7	95.1	104.1	118.4
九江府	6575	151.9	197.6	199.2	80.9	91.3	108.3
瑞州府	5712	153.9	180.3	198.5	70.9	81.2	101.2
饶州府	15660	91.4	116.9	131.8	84.7	97.2	113.3
广信府	14040	81.3	105.8	124.4	89.2	100.4	109.5
袁州府	8806	66.1	82.0	92.7	79.9	92.8	150.7
临江府	5380	205.9	223.4	246.5	101.3	109.5	122.5
吉安府	24550	109.3	126.4	141.5	63.1	75.4	75.8

续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建昌府	8187	141.3	160.5	174.3	60.2	65.8	55.3
抚州府	10650	138.6	147.7	152.9	100.4	111.9	101.1
南安府	6907	82.4	97.4	113.5	87.9	96.0	101.3
宁都州	8692	94.1	101.0	104.8	74.8	81.8	70.9
赣州府	23190	89.3	108.4	116.8	74.3	81.6	86.9
合 计	165365	113.6	135.1	146.9	80.5	90.5	100.5
湖 南							
长沙府	41740	81.9	106.7	127.6	151.7	181.5	238.3
衡州府	17430	105.4	131.3	158.0	136.1	154.8	185.9
宝庆府	21460	65.4	85.0	95.5	106.7	139.7	205.3
岳州府	11820	103.7	135.0	165.2	104.6	125.1	161.8
常德府	11930	89.4	106.5	110.6	127.0	150.7	186.8
澧 州	14520	58.2	75.1	91.4	110.6	135.1	173.5
永州府	22600	62.1	75.7	86.6	98.6	112.9	137.7
郴 州	12730	61.4	74.3	85.5	70.7	78.9	91.7
桂阳州	6746	107.0	117.7	125.0	103.3	109.7	117.8
永顺府	12920	38.5	55.4	55.0	58.7	62.9	68.9
湘西四厅	5623	33.8	43.9	35.4	63.5	76.1	98.9
靖 州	9429	53.6	57.0	69.0	53.9	55.5	57.4
辰州府	13250	60.8	68.6	76.2	80.4	82.0	89.7
沅州府	7906	69.6	75.9	78.9	81.6	83.9	91.6
合 计	210104	72.6	90.3	103.8	107.1	125.3	158.1
湖 北							
汉阳府	14610	211.5	252.1	280.5	203.8	242.6	311.1
黄州府	17370	174.9	208.5	240.0	168.7	196.4	243.4
武昌府	18520	137.9	164.4	186.0	121.2	142.9	180.9
德安府	12960	86.7	103.4	117.0	108.0	122.1	145.6
荆州府	15160	103.6	126.3	145.1	142.7	165.8	205.4
安陆府	12270	74.5	88.8	98.7	111.3	126.6	152.2
荆门州	7509	50.3	61.0	69.9	79.4	90.6	109.3

续 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宜昌府	21360	31.2	38.9	45.4	52.4	60.9	75.4
施南府	18110	43.0	50.8	57.4	64.1	71.8	84.6
襄阳府	19550	68.7	85.5	99.8	92.7	111.5	138.1
郧阳府	26040	27.5	35.0	40.8	45.9	52.5	69.0
合 计	183459	88.2	106.2	120.9	103.4	120.3	149.6
福 建							
福宁府	9110	69.4	83.8	95.3	105.4	112.0	122.0
福州府	14824	160.0	174.6	185.4	161.4	171.3	186.7
建宁府	17100	65.8	71.8	76.3	39.0	41.4	45.1
邵武府	8157	73.9	78.2	81.3	28.8	30.6	33.3
汀州府	19980	63.3	74.8	83.8	52.2	55.0	60.6
延平府	15840	49.3	53.9	57.2	35.7	37.9	41.3
龙岩州	5794	48.8	57.3	63.9	38.7	39.4	45.7
永春州	6080	66.6	79.4	89.5	62.7	66.6	72.5
兴化府	4006	111.1	132.6	149.5	250.1	265.6	289.3
泉州府	8232	257.3	297.5	328.4	289.6	308.9	334.3
漳州府	13173	216.4	258.0	290.7	125.2	133.7	132.0
台湾府	36720	24.5	48.7	59.8	72.5	88.6	206.7
合 计	159016	86.7	104.0	115.8	89.1	97.3	130.4
广 东							
广州府	27794	190.4	211.5	228.9	246.3	265.9	296.6
肇庆府	24186	69.9	83.6	95.2	107.5	122.0	146.1
罗定州	7425	66.1	76.9	86.1	95.8	106.8	124.8
佛冈厅	1337	41.1	48.6	54.6	61.3	69.6	82.3
惠州府	31500	47.7	58.1	67.2	77.0	88.6	108.4
潮州府	15140	142.5	175.8	205.4	237.7	276.4	343.2
嘉应州	10940	111.1	121.8	127.3	132.6	138.4	147.1
韶州府	18150	53.1	56.6	58.3	59.9	61.7	64.2
南雄州	4458	39.5	46.0	51.6	57.2	63.9	74.9
连 州	6806	40.0	44.4	49.4	54.5	60.4	70.1

续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连山厅	1418	35.3	41.6	47.2	52.9	59.2	69.8
高州府	15565	131.3	151.0	165.4	180.0	196.5	222.7
雷州府	8208	71.3	83.1	95.0	107.8	122.8	148.0
廉州府	17600	47.2	58.8	68.6	79.3	92.0	114.0
琼州府	34650	32.3	39.9	46.5	53.7	62.3	77.1
合 计	225177	81.9	95.1	106.0	117.4	130.8	153.1
广 西							
桂林府	24100	35.4	43.2	49.0	55.1	62.2	74.1
柳州府	21030	34.4	44.7	53.6	63.7	76.0	98.1
庆远府	24950	26.0	31.0	35.2	39.5	44.5	52.9
思恩府	26190	34.6	41.9	48.1	54.7	62.4	75.5
泗城府	19340	15.5	16.9	18.0	19.0	20.2	22.0
平乐府	21030	32.8	40.8	47.4	54.5	63.1	77.7
梧州府	16980	40.7	51.8	61.4	72.0	84.8	107.4
浔州府	13300	49.5	63.0	74.7	87.5	103.2	130.6
南宁府	17010	46.4	57.3	66.3	76.1	87.7	107.6
太平府	15060	28.5	33.5	37.6	41.8	46.7	54.7
镇安府	11160	25.2	30.8	35.5	40.6	46.5	56.6
郁林州	10800	64.3	81.9	97.0	113.8	134.2	169.8
合 计	220950	34.7	42.8	49.6	57.0	65.8	80.9
云 南							
云南府	10580	95.6	126.1	162.4	81.1	106.7	143.6
澂江府	5263	81.7	107.4	130.2	59.7	67.3	95.4
楚雄府	23630	20.5	28.3	35.5	28.4	32.0	41.2
武定州	8364	24.2	34.3	44.0	33.4	37.5	48.4
曲靖府	25590	15.2	23.8	31.8	39.8	50.3	70.2
广西州	13950	9.7	13.7	17.8	23.0	29.9	43.6
顺宁府	32850	8.9	12.7	16.3	20.5	26.0	36.7
永昌府	29740	13.1	18.6	22.8	26.8	31.5	39.9
腾越厅	23790	12.9	17.2	18.8	20.8	23.2	27.1

续 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普洱府	41030	11.9	15.4	19.3	11.4	12.8	15.2
元江州	12180	12.3	15.8	17.6	18.6	18.6	23.3
镇沅州	3911	11.5	15.3	17.4	15.1	17.6	21.7
景东厅	7580	15.8	16.6	20.1	20.8	23.5	30.2
开化府	14640	15.6	20.4	25.2	30.8	38.9	53.4
广南府	14180	18.2	23.1	25.9	28.4	31.4	36.2
临安府	30840	28.1	36.6	43.6	45.4	39.5	48.9
昭通府	18760	24.5	33.6	42.4	52.3	64.8	88.2
东川府	13450	13.8	21.4	28.8	36.1	45.6	63.6
大理府	15670	47.6	47.7	59.3	41.2	46.5	59.8
蒙化厅	4776	38.3	46.5	48.6	34.1	39.6	49.0
丽江府	45890	8.9	10.4	11.4	12.4	13.6	15.6
永北厅	13460	7.4	10.1	12.6	15.6	19.5	26.7
其 他							
合 计	410124	19.2	25.1	30.9	28.4	32.8	43.0
贵 州							
贵阳府	19640	36.3	46.8	52.9	59.2	66.6	78.8
安顺府	11850	51.1	66.5	75.2	84.3	94.9	112.6
平越州	7744	37.1	48.2	54.5	61.2	69.0	81.9
都匀府	16100	23.9	31.1	36.9	43.3	51.1	64.8
遵义府	23750	34.4	44.8	53.6	63.3	75.3	96.5
仁怀厅	1286	54.4	70.8	84.8	100.3	119.0	153.2
思南府	9928	49.5	64.4	76.7	90.2	106.9	136.1
石阡府	4459	27.4	35.7	43.7	53.2	64.8	86.1
松桃厅	2351	39.1	51.0	61.7	73.6	88.5	114.8
铜仁府	3981	25.4	32.9	38.4	44.5	51.5	63.8
思州府	2741	38.7	46.0	49.3	52.5	56.2	62.0
镇远府	12050	40.6	48.4	52.7	57.0	61.9	69.6
黎平府	11920	23.7	28.2	31.0	33.7	36.9	42.0
大定府	28710	25.1	37.3	47.2	58.8	73.8	102.3
兴义府	16790	17.6	26.0	32.4	39.8	49.1	66.6

续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普安厅	3783	24.8	37.0	46.3	56.8	70.6	96.0
合 计	177083	32.0	42.2	49.7	57.9	68.0	86.0
四 川							
重庆府	32030	85.7	113.9	142.1	174.6	216.3	331.1
泸 州	6858	72.3	107.2	140.7	18.2	236.4	344.9
叙永厅	7208	27.6	39.3	52.4	68.8	91.0	99.3
顺庆府	13540	89.4	126.9	156.6	190.6	233.7	358.4
潼川府	16060	72.4	112.2	154.1	207.3	281.8	421.5
资 州	9288	66.6	103.3	146.9	204.2	287.1	387.9
保宁府	32760	23.6	36.5	49.8	66.4	89.5	137.2
酉阳州	14150	31.7	44.0	52.3	61.4	72.7	103.2
绥定府	11710	59.7	92.5	125.4	166.8	224.0	281.3
太平厅	7540	12.7	18.6	23.9	30.4	38.9	55.2
夔州府	22460	40.9	58.0	69.0	81.2	96.1	166.3
忠 州	7469	63.3	93.5	118.6	148.1	186.5	286.2
石碛厅	4217	17.8	25.6	17.1	11.6	7.8	76.4
绵 州	6315	100.2	127.6	151.9	178.6	211.4	264.9
成都府	12040	150.0	213.0	250.8	292.3	342.3	490.2
邛 州	3345	79.5	116.6	143.2	173.4	211.4	257.7
龙安府	12850	19.5	25.4	30.9	37.0	44.8	50.7
眉 州	3014	105.5	140.7	166.6	194.8	229.3	283.7
嘉定府	12100	69.4	93.6	117.5	145.5	181.5	232.2
叙州府	23300	55.8	75.9	91.6	109.1	130.9	168.2
雅州府	192200	2.6	3.3	3.8	4.5	5.2	6.6
宁远府	51490	16.2	20.3	23.8	27.5	32.0	40.2
茂 州	10350	4.7	5.1	5.4	5.7	6.1	6.7
理番厅	7720	2.2	2.3	2.8	3.5	4.3	3.1
懋功厅	16370	1.9	2.4	2.9	3.4	4.0	5.1
松潘厅	75120	0.8	1.0	1.2	1.4	1.6	2.0
合 计	611504	27.5	38.5	48.2	57.8	74.6	106.5

续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直 隶							
顺天府	25970	76.5	148.6	177.4	209.2	248.2	317.1
宣化府	19650	38.0	42.7	53.0	64.8	79.9	107.8
永平府	16970	85.4	102.3	116.3	131.1	148.4	177.4
保定府	10321	187.2	223.2	252.7	283.7	319.7	379.6
易 州	7544	45.9	54.6	60.8	67.3	74.8	87.0
遵化州	6403	84.3	109.6	144.8	187.6	245.4	360.6
赵 州	3474	189.4	220.8	242.7	265.4	291.0	331.9
定 州	2426	219.3	261.3	291.0	324.8	357.8	415.5
深 州	2722	164.2	195.8	218.2	241.4	268.2	311.5
冀 州	3996	158.2	187.7	212.2	237.7	267.8	317.3
天津府	12380	108.5	129.3	166.6	211.1	269.8	383.3
河间府	10240	127.2	157.8	183.6	211.4	244.7	301.9
正定府	14640	119.7	142.7	159.0	176.0	195.4	227.0
顺德府	6820	122.4	139.6	149.9	160.1	171.4	189.1
广平府	6654	147.9	184.1	212.7	243.5	279.8	341.9
大名府	7466	230.6	263.2	282.5	301.9	323.3	356.7
承德府	136330	3.7	7.2	11.0	16.2	24.4	43.8
口北三厅	57170	1.6	2.0	2.4	2.9	3.4	4.4
合 计	351176	50.7	65.7	77.0	89.9	106.3	137.1
河 南							
彰德府	9714	111.8	140.8	164.4	121.1	153.8	242.3
卫辉府	10792	137.9	162.2	181.8	125.3	159.1	284.1
怀庆府	7318	206.1	246.4	279.7	208.4	229.2	262.5
开封府	14270	201.5	240.2	271.9	186.1	236.4	375.1
河南府	16590	88.6	103.1	114.6	100.0	127.0	198.9
归德府	12570	219.4	261.6	291.5	216.2	274.6	409.8
陈州府	9267	200.1	238.5	265.8	181.7	230.8	344.6
许 州	4481	243.0	289.9	323.1	246.8	316.9	453.9
汝 州	7275	95.8	114.2	127.3	106.7	135.5	220.5
陕 州	9554	47.2	56.2	62.6	40.2	51.1	85.2

续 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汝宁府	18320	139.5	162.6	178.9	193.2	211.5	246.0
光 州	15000	118.9	138.7	152.2	164.1	179.5	206.6
南阳府	32610	108.4	129.2	144.9	158.9	173.8	209.9
合 计	167761	138.0	163.9	183.4	156.3	185.3	257.7
山 东							
济南府	14960	235.2	268.4	296.1	324.6	357.0	409.1
青州府	16710	177.9	198.6	214.3	230.0	247.6	275.0
登州府	18550	156.0	184.1	205.2	227.0	252.1	293.0
东昌府	7176	197.6	236.5	255.7	275.2	436.3	331.1
莱州府	15910	184.0	212.1	242.2	274.3	311.9	375.0
沂州府	23660	147.6	172.2	191.9	212.3	235.8	274.0
临清州	2404	393.5	450.9	420.5	393.9	368.1	334.0
济宁州	3637	209.8	244.4	272.8	302.4	336.3	391.8
兖州府	14350	156.4	182.4	212.7	245.4	284.7	352.1
曹州府	12230	222.7	259.8	284.6	310.1	338.7	384.5
武定府	11240	167.2	194.9	206.9	218.9	231.9	251.9
泰安府	10720	197.9	230.7	249.7	268.9	290.4	324.2
合 计	151547	184.1	213.3	234.8	257.2	289.6	325.1
山 西							
解 州	4417	147.4	181.1	187.9	67.9	88.3	128.4
绛 州	5322	141.5	191.1	216.3	83.6	103.7	141.5
蒲州府	3784	234.7	293.1	331.7	91.7	109.7	166.0
平阳府	13880	89.9	100.7	109.2	40.8	52.2	88.0
隰 州	5842	19.7	22.9	25.5	9.1	13.9	25.0
霍 州	2696	111.6	130.2	145.0	53.8	87.2	116.5
泽州府	9309	81.1	96.7	109.4	84.5	97.3	119.2
潞安府	8478	93.1	111.0	125.6	97.1	115.2	147.8
沁 州	5454	41.1	49.0	55.4	42.9	50.1	62.5
辽 州	6219	28.6	34.2	38.8	12.9	19.9	40.4
汾州府	14920	105.0	121.1	134.1	58.2	70.4	92.6

续表

地 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太原府	17690	103.4	118.0	131.7	62.4	78.5	109.0
平定州	8542	65.7	74.9	82.2	70.9	84.3	108.2
忻 州	6247	51.2	58.6	64.2	48.3	58.9	78.0
保德州	2786	44.5	50.6	55.6	29.8	37.0	49.2
代 州	9623	46.8	53.3	58.5	60.3	66.9	77.7
宁武府	5896	35.6	40.5	44.4	24.9	30.9	41.6
大同府	29260	24.0	26.1	27.8	25.0	36.5	68.8
朔平府	15070	32.2	35.2	37.4	33.7	44.7	50.1
归绥六厅	21540	5.2	5.6	6.0	5.4	46.1	46.9
合 计	196975	62.3	72.8	80.4	44.8	60.2	82.3
陕 西							
西安府	23320	103.9	126.2	139.4	44.6	88.4	198.9
同州府	11360	139.3	158.9	174.4	79.2	99.4	137.5
郿 州	10700	23.2	25.4	28.8	13.2	16.6	23.2
兴安府	19510	5.1	62.2	67.3	34.5	48.8	84.5
商 州	18370	6.2	40.9	48.9	31.1	44.8	70.2
汉中府	28930	26.0	62.0	63.3	48.0	57.9	75.5
绥德州	8730	28.5	32.5	38.7	29.7	39.5	59.5
榆林府	12440	33.6	38.3	46.9	33.5	40.7	53.8
延安府	32980	17.0	19.3	20.9	9.1	4.6	19.9
凤翔府	15100	66.2	89.3	94.6	70.7	81.7	100.6
邠 州	4138	53.4	62.3	68.4	32.4	51.2	99.1
乾 州	2511	119.5	136.6	145.8	73.7	109.9	195.5
合 计	188089	42.3	64.5	70.5	37.6	50.7	84.2
甘 肃							
兰州府	45910	52.6	58.7	63.4	19.2	28.3	49.1
巩昌府	50973	66.7	74.5	80.4	14.9	23.3	44.2
平凉府	28180	81.6	90.1	97.3	11.4	20.4	47.2
庆阳府	22330	51.1	57.0	61.6	5.5	7.6	31.6
宁夏府	32820	41.2	46.0	49.6	5.2	6.8	27.1

续表

地区	面积 (平方公里)	1776年	1820年	1851年	1880年	1910年	1953年
甘州府	21660	37.4	41.7	45.1	8.7	13.2	23.8
凉州府	44260	30.5	34.0	36.7	10.3	16.2	30.7
西宁府	34790	18.3	20.4	22.7	7.6	11.9	36.0
泾州	8271	96.7	108.6	111.4	28.4	29.6	74.1
秦州	17650	44.1	49.2	53.2	52.9	65.9	90.7
阶州	18090	18.8	21.0	22.7	26.0	35.9	46.5
肃州	32260	12.6	14.0	15.1	3.6	5.9	11.3
安西州	173100	0.4	0.5	0.5	0.2	0.3	0.8
合计	530294	29.8	33.2	35.8	9.3	13.5	26.6

资料来源：面积系满志敏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各分省地图用电脑测绘得出。各时期各省分府人口密度据本卷表 16-1 中数据计算得出。

说明：清代后期至 1953 年，江苏苏北沿海诸府、厅的面积有所增加，本表不一一列出。

中国人口的最
密集区。

在乾隆四十一年，每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700 人的只有苏州府和嘉兴府。超过 400 人的有太仓、松江、江宁、海门、绍兴和常州等六府、州、厅。超过 300 人的有临清、扬州、通州、镇江、太平、安庆、杭州、湖州和宁波等九府、州，这 17 个府、州、厅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下游两岸，是清代前期中国人口分布的最密集区。与明代初年相比，中国人口的最密集区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不仅长江北岸出现了一批人口密集的区域，如扬州、通州和海门，甚至皖中地区的安庆府人口也相当密集。临清州是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运河沿岸最重要的城市，该州人口密集是商业发展的结果。而在明代初年，每平方公里超过 200 人的中国人口的最密集区仅为嘉兴府、松江府、苏州府和应天府。

中国人口的密
集区。

如果我们将乾隆四十一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在 200~299 人之间的地区称为中国人口的密集区，那么，这一区域范围包括安徽的宁国、池州，浙江的金华，江西的临江、湖北的汉阳、福建的泉州和漳州，直隶的定州、大名，河南的怀庆、开封、归德、陈州、许州，山东的济南、济宁、曹州和山西的蒲州。在地图上进行标识，属于人口

密集区的鲁西、冀南、豫中、豫东地区连成一片,构成华北平原人口分布的高地。

乾隆四十一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在 100~199 人之间的区域可以称为中国人口的次密集区。这一区域范围广阔,包括江苏的淮安府和徐州府,安徽除滁州以外的全部地区,浙江除处州府以外的全部地区,江西除饶州、广信、袁州及赣南三府州以外的全部地区,湖南的衡州、岳州和桂阳州,湖北的黄州、武昌和荆州,福建的福州和兴化,广东的广州、潮州、高州和嘉应州,四川的成都、绵州和眉州,直隶除易州、遵化以外长城南部地区,河南除河南府、汝州和陕州以外的全部地区,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山西解州、绛州、霍州、汾州和太原,陕西西安、同州和乾州。从大的区域上说,除了个别的地区外,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平原大部分都达到了人口次密集区的水平。明代人口相对密集的赣东北地区,乾隆四十一年人口稀少。湖北的人口次密集区集中于鄂东和鄂中地区,湖南的人口次密集区未连成一片,福建、广东的情况也是如此。四川的成都平原,陕西的关中平原都是当地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当时的中国属于人口次密集区。

中国人口的次
密集区。

乾隆四十一年每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100 人的区域可以称为中国人口稀疏区。浙南山区、福建的部分地区、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广西全省、湖南和湖北两省的部分地区、云南和贵州、四川和陕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山西部分地区、甘肃全省以及其他边区,都属于这类人口稀疏区。其中一批每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30 人的可以称为人口的极稀疏区。

中国人口的稀
疏区。

随着人口的增长,各地的人口密度发生着变化,但是,中国人口分布的这一级差格局,一直延续到太平天国战争发生之前。

太平天国战争使得江苏的扬州、江宁、常州、镇江、苏州、太仓等府州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未遭战争侵扰的苏北通州、淮安等府人口密度上升。然而,战争也使得上海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因此,苏南地区(以松江府为中心)的人口密度仍居全国前列。遭受战争破坏的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地人口大减,原有的人口最密集区和密集区大部分不复存在。在 1880 年,虽然

嘉兴府人口密度仍高达每平方公里 354 人,但较其最高峰时的人口已减少近三分之二。与未遭受战争及灾荒破坏的直隶、山东一些地方的人口密度接近。从宣统元年至 1953 年,由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南京、无锡、南通等城市获得较大的发展,江苏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而提高,其中苏南人口的增长速度尤为快速。1953 年江苏省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重新构成中国人口的最密集区。

西部回民战争使得云南和西北地区的人口锐减,这一区域原本就不密集的人口变得更为稀少,以前的人口次密集区变成了人口稀疏区。光绪大灾对于山西、河南两省的影响最大,人口大幅减少。灾前已经形成的大面积的华北平原人口密集区范围大大缩小。与此同时,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及皖北、苏北、直隶、山东的部分地区人口处于稳定的增长状态。人口密度处于不断增加之中。

第三节 人口迁移

从表 16-4 中还可以读出以下两点事实。其一,在南方,直到乾隆四十一年,广东、广西的人口分布仍然是相当稀疏的。如广州府,地处平坦的珠江三角洲平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 200 人,惠州府不足 50 人,肇庆府只有 70 人,雷州、廉州的人口密度均相当低。广西除郁林州外,其他各府、州人口密度没有超过 50 人的。除了云南府、潯江府外,云南其他各府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超过 50 人,其中大理府、蒙化厅人口密度稍高,分别为 48 人和 38 人,其余各府人口密度不超过 30 人。贵州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少于每平方公里 50 人,可算是人口的极稀疏区。四川的情况略有不同,成都平原已经跻身于中国人口次密集区之列,而成都平原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口则要稀少得多。其二,在北方,直隶的口北三厅和承德府每平方公里不足 4 人,山西晋中北部和晋北地区的人口密度亦低,每平方公里不足 50 人。陕西南部的汉中府为 26 人,兴安府和商州不超过 7 人。陕北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大都不超过

30人。在甘肃,宁夏、甘州、凉州、西宁、秦州、阶州、肃州和安西等府、州,人口密度都相当低。东北地区的情况亦大体如是。这样,直到乾隆四十一年,在中国内地核心区之外的边缘区,出现了一个人口密度极为稀疏的地带,这一地带不仅是清代初年开始的移民迁入区域,也是乾隆四十一年以后移民继续迁入的区域。

并不是所有的人口稀疏区都有能力接纳移民。例如南方山区,大片土地是不可耕作的,无法容纳过多的人口。例如陕北和陇西,由于降水、积温、无霜期等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土地的经济产出较低,所以也无法接纳更多的人口。清代初年开始移民大潮,主要流向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可耕地较多的人口稀疏区。大体是说,清代的中国移民潮,仍主要表现为由内地核心区向四周边缘区的流动。

具体地说,在清代前期的南方诸省,来自湖南南部、湖北东部、江西中部及广东东部山区的人口大规模迁入四川。湖南、湖北及江西移民迁入湘西、鄂西南及云南和贵州。闽西、粤东山区的移民迁入赣南、赣西北、湘东和赣东北丘陵山区。闽西移民迁入浙南山区。粤东移民迁入广州、肇庆、惠州等府的沿海平原,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迁入广西。福建、广东移民大规模渡海迁台,构成台湾史上最大的移民浪潮。在北方,来自山东、直隶等地的移民迁入辽东。山西、直隶内地的移民迁入土默特、察哈尔。来自关内的移民迁入乌鲁木齐和巴里坤等地。

乾隆、嘉庆年间,来自湖南南部、安徽西部及四川的移民大批迁入陕西南部,形成了对清代前期开始的“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延续。来自安徽西部安庆地区的移民也迁入皖南山区。清代中期至清代后期,山西、直隶及山东等处人口对长城以北地区的移民继续进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

清代后期的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这不仅指本卷所详细讨论的太平天国战区人口以及西部回民战争战区内的死亡,还包括广东沿海地区土客械斗引起的人口死亡。在广东沿海,客家移民在大械斗结束后开始了新的迁移,他们大部分迁入粤西及广西。广西地区原有的客家移民的一部分则随太平天国转战长

清代前期移民
的流向。

江中下游及其他地区。江苏、浙江等地的移民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大量迁入上海,带来了上海的繁荣。在太平天国战争和西部回民战争结束以后,来自苏北、皖北、湖北、河南等地的移民迁入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来自河南、山西的移民迁入陕西关中平原以及甘肃其他地区。在光绪大灾结束以后,来自河南、湖北等地的人口迁入山西灾区。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口死亡地区都得到了移民的补充,在那些人口本来相当密集,经过大战及大灾后人口仍有较高密度的区域,则不需要移民的补充,如安徽的安庆、徽州,江苏的苏州,湖北的黄州、武昌和汉阳,江西的大多数地区均无规模性的移民迁入。

关于移民过程的详细描述,可见《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所述,本节不再一一叙述。在移民史的研究中,笔者曾对各地的移民数量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然而,这一研究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在从事移民史的研究前,尚未来得及对各地人口数据进行全面的清理。根据不确切的人口数据进行的移民数量估计,必然存在许多问题。以四川为例,以前的研究对清代前期四川移民估计数的最大错误在于对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总数的估计错误。关于这一错误的由来,本卷第七章已作详细说明。笔者以前估计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总数大约为1000万,本卷证明是年四川人口总数已达1681万。以移民人口及其后裔占总人口的60%计,乾隆四十一年四川的外省移民及其后裔人口约有1000万,较以前的估计要多出近340万。又如对于赣南地区移民的估计,涉及到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中是否包括移民这一制度性问题,本卷第四章已作详细说明。类似的情况不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阅读。

第十七章 清代中期城市^①人口

第一节 资料和方法

有关清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以施坚雅的成果最为著名。然而,施氏研究所及主要是清代末年的中国城市,如向前追溯,则以1843年为限,未涉及此前的任何时期。按照本卷的体例,求证乾隆时期的各省分府人口是本书的重点。因此,对这一时期城市人口进行细致的研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

本卷对于中国城市人口的研究,以乾隆四十一年和光绪十九年作为标准时点。

在本卷第十八章中,我将指出,施坚雅对于清代城市的研究不具备实证的性质。所以,许多学者在进行实证性的城市研究时,都不以施氏的研究作为基础,而只将他的研究作为一种参照。例如,台湾“中研院”出版的几种有关区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著作,即是如此。一般说来,历史学家研究城市历史,大都以个案为基础,以区域为范围,以实证为特色。舍此之外,实在找不出,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别的方法。

除了在本书第四卷《明时期》中涉及的韩大成、傅崇文、韩光辉等人对于城市史的研究外,以一省为区域范围研究城市历史的,当首推许檀近年来的工作。许檀将山东城市分为“最大的城市”、“一般府、州、县城”、“较大的商业城镇”和“中小商业城镇”四个等级,

① 本卷有关城市的定义,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5年公布的标准,即常住人口2000人以上、居民50%以上为非农业人口的居民区。非农业人口不包括军人,即军队驻地不列入城市进行讨论。

在各类城市中,分别寻找有详细记载的个案,以个别推及整体^①。这一研究方法,虽然不具备类似施坚雅创立理论或模式上的意义,但却是可信的和实用的。

施坚雅的研究
没有实证资料作
为支撑。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家无法从事施坚雅所作涉及全国范围的城市史的研究工作?又为何历史学家并不以施坚雅的理论或数据为基础,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开展各自的研究?这是因为,施氏的研究是一项缺乏实证材料支撑的理论研究。他关于所用资料的说明,仅限于一些十分空疏的原则,而无实际的内容,甚至是很少的例证。概括地说,施坚雅根据他所收集的那些秘不示人的卡片和资料,运用西方的经验模式和原则,虚构出中华帝国晚期中国城市的体系和各地区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历史学家如严格地按照历史学的规范从事研究,断不敢轻易地构造涉及全国城市人口的模型。他们知道,在缺乏实证研究的背景下,奢谈中国城市人口是不明智的。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学者对施氏的研究奉若经典,各种颂扬性的文字不断见诸出版物,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是听施氏自陈,却没有证据,证明施氏的理论模式确实是建立在对每一个清代末年的城市人口及其功能进行详尽考察基础之上的。鉴于此,姜涛在他的新著《人口与历史》一书中对施坚雅的模式进行反思。他指出:“施氏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过分迁就了理论而忽略了历史,为了将各区域中的城市纳入其既定的比例模式,他对若干城市功能级别及其人口数量的认定是有违历史事实的。”^②姜涛批评施氏对“若干城市”的功能及其人口数量的认定有违历史事实,只是未举出具体的例子来。事实上,施坚雅几乎不讨论任何具体的城市人口数据问题,其他的研究者根本无法对其成果进行检验。我之所以对施氏的城市人口判定的全部工作持否定态度,是因为在

① 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44页。

② 姜涛《人口与历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最近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合作者在查阅历史文献中发现,采用施坚雅的方法不可能复原中国城市人口。由于施氏的工作具有不可复原性暨不可检验性,所以,施氏的工作违背了一般科学研究的规范。

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我指出:“从逻辑上说,既然施坚雅能够对民国以前的中国城市人口作出估测,我们就有可能对民国年间的中国城市作出同样的估测。”当我们发现施坚雅对民国以前中国城市人口的估测存在问题,那么,对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估计也就需要采用其他的方法予以重做。

需要略作交待的是,在本书第四卷中,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进行明代城市人口的估算。对于明代城市来说,除了少部分有具体资料记载的城市外,绝大部分普通府、县治城市是没有人口记载的。笔者根据明代中后期各地地方志所载的城坊和乡里数进行人口推测。虽然明代中后期的坊里数已不具备人口编查的意义,但笔者假定从明代初年至明代中后期,各地的城坊和厢里大致是按相近的比例增加或归并的。因此,明代中后期各地城坊和乡里的比例,可以大体反映出明代初年城市与乡村人口的比例。以府为单位,根据同时期的分府人口,就可以求出该府府、县治城市的城市人口。

清代的里甲大体沿袭明代的制度,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人口编查的意义。因此,这一系列的数据是不可能用于推测人口的。因此,最实用的方法还是向许檀学习,在各类城市中寻找尽可能多的样本,以个别推求整体。本研究 and 许檀的研究稍有不同的是,我更愿意将一般的府治、县治城市分为不同的两类。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府治城市人口要比县治城市为多,它们之间的人口差距反映了不同级别的行政性城市对于周边地区影响力的大小以及相应的经济能力的强弱,不加区别地混为一类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另外,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将市镇分为不同的级别,然后根据人口数,将不同的市镇与不同的府、县治城市并成一类,从而构建完整和统一的区域城市人口的等级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就可以进行区域城市人口的推测了。

用实证的方法建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并用于推论,是本章及下一章所用的基本方法。

既限于资料也限于篇幅,本章不可能对乾隆时期各省城市人口都进行详细的求证。而是力图从已有的研究和已掌握的资料中,概括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然后用于同类地区的城市人口之推测。本研究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地方志的记载,而对每一个县至少查找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地方志,就成为本研究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

第二节 乾隆时期北方城市人口

一、华北地区

1. 山东

有关清代城市人口的记载是如此之少,以至于研究中常有无米之炊之叹。许檀在从事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史的研究时,致力于发掘有关资料,成就斐然。兹将许檀有关山东城市人口的研究转述如下并略加讨论。

政治与商业中心城市

山东的政治中心是济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成书的《历城县志》卷3《里社》详细记载了济南城乡的户口数字。济南城内分为八约,共计57甲600牌,6117户,25946口;近城计有东关、南保泉一等14里,68甲612牌,6394户,23178口;乡村则分为西北、正北、东北、正东、东南、正南、西南、正西8个乡,共计57里535甲,5729牌,60113户,229129口。上述户口数字中除城内8约和8个乡分属济南城、乡之外,近城部分则为“城四门外街巷及近城之村”的户口数,既包括居住于济南城关各街巷人口,也包括近城各村的乡村人口。如西关南保三,领街庄七:曰小仓街、捍石桥街、灵官庙街、姚家巷、陈家庄、王家庄、良家庄,共52牌,539户,1780口;北保二领街庄十,共60牌,627户,2071口;许檀将其中名称中有“街”、“巷”者当作城关街巷,而称“庄”、“沟”、“营”者则作“近城之村”处理了,不计作城市人口。于是,她认定乾隆年间济南城市人口约在1万余户,4万口上下,占历城全县人口总数的

济南市的户口
记载相当详细。

14%。我以为纳入城关的村庄已经属于城市人口的一部分^①，此即现代城市的近郊人口。如此，济南城市人口接近5万。

济宁。济宁是明清时期山东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据乾隆《济宁州志》卷2《里社》的记载，乾隆中叶济宁城市居民为20895户；乾隆四十二年济宁州有67197户，377293口，每户平均5.6口。许檀认为济宁城市人口可达近12万人。从济南的例子中可知，城市居民的户均口数较低，平均不足5口。如此，济宁城市的在册居民最多只有10万人。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4记载：“其居民之鳞而托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由于绝大多数商人不在当地入籍，故商贾之家可能并没有包括在上述户口数字当中，居民之数万家与商贾之数万家合而计之，该城常住人口的户数至少在4万户以上，而其人数则可能达到16万人。

清代的临清人口不见记载。许檀认为万历《东昌府志》卷12《赋役》记载的临清有30823户，66745口，并不是真正的人口数，故舍弃不用。明代末年的记载称，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所谓“近百万口”只是一个虚数。从商业规模上看，临清的地位远远超过济宁，它不仅是山东最大的商业城市，在华北乃至全国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推论，临清城市人口当超过济宁。按照我在本书第四卷中的研究，明代末年的临清人口可能达到20万人。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临清城市遭到破坏，人口损失惨重。光绪《馆陶县志》卷6《赋役志·户口》中一份馆陶县为申请均盐引之事的申文涉及临清州的城市人口：“至于临清州两河交会，五方杂处，在城有十万人户，在册止有一万五千六百余丁。”细读该文，知此事起于“本县贡生邹鲁”的一份呈文，查该志卷10《人物》，邹鲁为康熙五年（1666年）贡生，由此可知此事发生于康熙初年。所谓在册之丁，即纳税单位，而在城“十万人户”即10万人口。康熙初年的临清尚未恢复，

对临清人口的
推测。

^① 即便根据现代城市人口统计原则，城市居民中也可以含有部分农业人口。只是非农人口的数量应多于农业人口。

至乾隆初年,虽然临清店铺的规模大约只有明代后期的一半,但参照济宁的人口数,可以将乾隆后期临清城市人口估为20万左右,与明代末年的临清城市人口大体相同。这样,山东的三大城市合计人口约为40万。

府、州治所城市

泰安府城,城周七里,为明嘉靖时所建。清代乾隆年间,城外四关厢成为繁荣的商业区,西隅岳安门外“自旧校场抵社首,烟火数千家,大街百货杂陈,循河一带粟、蔬、鱼、果、薪炭、器物无不具备”;北隅仰圣门外,“西通新街,东连铜器行,市肆鳞次”;东隅迎喧门外,“士农与逐末者半”;南隅泰安门外“为京省东西通衢,冠盖往来,废著繁集”^①。许檀认为,仅西关之外居民就达“数千家”,全城合计当更属可观。因此,她将泰安府城人口定为四五千户,约2万~3万人口。

在东昌府治聊城,许檀根据两份嘉庆和道光年间存于当地山陕会馆中的碑刻,发现嘉庆年间聊城共有363家山陕商号,并分别有抽厘数和经营额。道光年间山陕商号增至366家。根据记载,西商占该城商号的十之七八,推论全城商业店铺至少可达五六百家。在一个商业店铺多达五六百家,且其中又以外来的山西和陕西商人为主的城市中,居民达到数千户当不会是一个过高的估计^②。由此可见,东昌府城的人口也可能达到2万~3万人的规模。

许檀的这些考证无疑是正确的。上引康熙初年馆陶县有关盐引的申文称:“如东昌属,聊城居首,名为附郭县,实是东昌府。”

许檀对聊城人口的推测得到其他资料的证明。

① 乾隆《泰安县志》卷2《里社》。

② 包伟民根据一份1933年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刊行的《芜乍铁道沿线经济调查》中“市镇经济调查”提供的数据,发现这一时期江南市镇的每一店铺对应的市镇人口大约为26人。详见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年)》,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他提出的这一比例不能不加区别地加以推广。其一,研究者必须考虑店铺的大小。在清代中期,当一些交通枢纽上的市镇聚集了大批外来的商人时,其每个店铺的规模和营业额当非由本地人所开店铺所能比拟。其二,笔者所研究的城市人口,实际上是包括城郊人口的。因此,以每个店铺对应50~60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在城与东关,居民不下数万,而上册人丁仅有一万五千八百九十六丁,岂有一郡城也,不及馆陶下县人丁之一少半者。”所谓的“上册人丁”指的是纳税单位,而“居民”才是指真实的人口。此文所指“居民不下数万”,虽非严格的户口调查,但却是邻县一地方官目击所得。许檀的估计,与此大体符合。

此外,我想说明的是,泰安府城和东昌府城的人口规模较大,有着特殊的原因。如泰安府城因地近泰山,“泰山香火岁动数十万人,富者居坊肆之奇,贫者有香楮服劳之益,不耕不织待以举火者不下数千百人”^①,泰安府城实在是一个因旅游业而繁荣的都市。东昌府城则因地处大运河之滨,四方货物往来,商贾辐辏,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发展。

兖州府城因远离交通要道,其人口数量明显少于泰安和聊城。日本学者根据一份清代后期同治、光绪之际滋阳县的一份《户册》研究兖州府城的人口。该户册是一份不完全的记载,共保存了滋阳 17 条街巷居民的家庭人口和职业状况,共计 688 户。这 688 户家庭可能是全城居民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滋阳全城人口约为 3000 户,合计约有 15000 人。如果回溯至乾隆年间,滋阳县城中的人口可能只有 12000 人左右。

根据对明代山东府城研究的结果,我相信清代乾隆年间的青州府城人口可以达到泰安府城的规模。而根据滋阳城的例子,则可推知曹州、沂州、登州、莱州四府和武定州的府、州治所城市人口平均约为 1.2 万人。府、州治城市人口合计为 13 万左右。

县治城市

道光年间,泰安府东阿县城城内街巷共有 20 余条,其中以大隅首商业最盛,“街衢四达,阊阖分列”。县城关厢也是商贾辐辏,居民稠密之所:南关,通旧县大路,“街道约长半里许,居民可数百家”;东南关,“人烟稠密较盛面关”;北关为“通京大道,邮亭所在,商贾辐辏”;东关“少岱山下居民可百余家”;唯西关外因“逼近山路

^① 乾隆《泰安县志》卷 2《风俗》。

民居稀少”^①。由此可知,居于东阿县城关的居民至少有五六百户,或七八百户,与城内居民合计至少当达到1500户,合计东阿县城城市人口可达7000人左右,回溯至乾隆年间,可能约有6000人。

道光年间武定府商河县城的人口要少得多。该县城内及四关厢共有685户,3321口。该县县城居民人口较少与其经济不够发达有关。在商河全县40余两商税中,县城所征仅有2.35两,而该县商税超过县城的集镇即有四五个^②。回溯至乾隆年间,商河县城的人口可能仅有3000人。

同治《即墨县志》卷5《户口》记载县城及关厢合计有2078户,人口应超过1万人。如果按照3‰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即墨县城约为8000人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县治城市。类似的城市可能还有德州、黄县、潍县、博山、胶州等^③:德州以其地处运河之滨,扼鲁、冀两省交界处,为北方一大水陆码头;黄县仅西关之外各类店铺就有“数百家”之多;博山城即明代的颜神镇,清代升县,其县城西关、北关外均发展为商贾、居民的聚集区。如西关外的大街,“长三四里,民居稠密,商贾往来多由于此”;西冶街,“民多业玻璃”;北关之外,东为北岭街,“民多业瓷窑”;河滩以西,居民多以“贩瓷器”为业^④。县城人口可能达到数千户的规模。随着商业的发展,胶州城市化的速度相当快,崇祯年间环城而居者已达数千家^⑤,清代则有进一步的发展。

大县城等同小
府府城。

如果将山东大县城的规模视与小府府城相同,大约为1.2万人的话,山东的普通县城的人口平均规模大约为5000人。乾隆年间山东共辖有107个县城,扣除12个与府城、直隶州城同治的县城,尚余县城95个,其中即墨等大县城约有6个,普通县城为89个。

① 道光《东阿县志》卷2《方域志》。

② 道光《商河县志》卷3《课税》。

③ 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研究》第四章《商业城镇的发展》。

④ 乾隆《博山县志》卷2《街衢》。

⑤ 道光《胶州志》卷22《明官师志》。

大市镇

安平镇又名张秋镇,位于兖州府寿张县东部运河边,为东阿、阳谷、寿张三县交界处的重镇,是这一区域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章潢《图书编》卷37称:“四民辐辏,不止万家”,若此语无大的夸张,则明代后期此镇人口可达5万左右。即使有所夸张,其人口总数大概也能达到2万~3万人的规模。若设乾隆年间依然如是,其人口规模与聊城、泰安二城相同。

青州府安丘县之景芝镇也是一个著名商镇,明代后期,该镇“居民杂三县,盖商藪也”^①;“居民四五千家,壮哉,雄镇也”^②,估计居民为2万余人。清代的规模如果保持不变,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著名的商镇了。类似的市镇可能还有周村镇。

中等市镇

许檀还列举了鱼台县谷亭镇,“条河两岸千有余家”^③;阳谷县阿城镇,“夹岸而居者千余家”^④;济宁州鲁桥镇,“居民稠密,商贾辐辏”,乾隆年间该镇居民至少有600~800户,如果认为外来商贾未计入本地籍,其常住人口可能超过千户。平均每镇约5000人。

从翰香的研究^⑤给我们以启发。在《嘉庆一统志》的“关隘”中,有关于镇的记载。在冀、鲁、豫三省的记载中,有些市镇有商况繁荣的说明,如“居民繁盛,商贾辐辏”,“水陆要冲,货物云集”,“往来贸易之处”,“邑民走集处”,“居民以陶冶为业”等。从氏认为,此类镇才是“商业性集镇”。如在山东,属于此类镇的有历城盘水镇、冠县清水镇、恩县四女树镇、鱼台县南阳镇和谷亭镇、牟平县汤泉镇。这类镇可以称为中等市镇。《嘉庆一统志》所列与地方志的记载不能完全吻合。从翰香又指出,山东东阿县的安平镇和馆陶县的南馆陶镇很早以来就是山东境内重要水路要冲和漕粮兑运处,《大清一统志》没有记载。已如上述,安平镇为大镇,加上阿城镇和

从翰香以商况记载作为城市等级的判断依据。

① 万历《安丘县志》卷5《建置考》。

② 万历《诸城县志》卷3《要隘》。

③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4册,第307页。

④ 谢肇淛《北河余纪》卷2。

⑤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208页。

鲁桥镇,山东的中等市镇至少有9个,合计应有4.5万人口。

小市镇

许檀认为山东各州县这种较小商业市镇数目不一,多者七八个,十余个,少则一两个。这给计算带来困难。《嘉庆一统志》记载的无商况说明的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小市镇。山东的小市镇共有96个,每县不足1个。这一估计较许檀估计为少,但由于定位于乾隆年间,且其每镇平均必须达到500户,每镇平均人口2000人,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要满足这一人口规模,且其人口的半数从事非农产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此,山东小市镇人口约19.2万。

至此,我们可以对乾隆年间的山东城市人口作一小结,并拟出山东城市的不同级别与人口之间的关系,如表17-1。

表 17-1 乾隆后期山东城市的不同级别与人口的关系

人口单位:万

行政等级	城市	平均人口	总人口	商业等级	城市	平均人口	总人口
省会	1	5.0	5.0	中心城市	2	18.0	36.0
大府	3	2.5	7.5	大市镇	3	2.5	7.5
小府大县	11	1.2	13.2	中等市镇	9	0.5	4.5
普通县	89	0.5	44.5	小市镇	96	0.2	19.2

合而计之,乾隆年间山东城市可以按人口分为6个等级,即2000人口的小市镇、5000人口的普通县城和中等市镇、12000人口的小府城和大县城、25000人口的大府城和中等市镇、50000人口的省会。在省会之上,还有属于全国商业中心的商业城镇。我把这一城市人口的等级序列称为清代中期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乾隆后期山东城市人口合计约为137万。

需要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山东的小府中有曹州府、沂州府和武定州系清代新设之府州,其府治人口当然只相当于一个大县的规模。兖州府虽说是一个大府,但其府治人口不多,故推测莱州、登州两府的情况大体如是。虽然并非每一个省区都有大府、小府之分,但许多省区有直隶州,直隶州的地位类似山东的小府或大县。

清代中期山东
城市人口等级
模式。

由于不是每个省区都有属于全国商业中心范畴的大的商业城镇。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省区的城市按人口规模至少可以分为四级或五级。

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往往就是全国性的工商业中心,如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即是。所以,在这些地区,省会城市与普通的省会城市形成很大的差异,省会城市兼为全国工商业城市的,其人口数量更多,远远超过临清、济宁等府州级工商业城市。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山东人口总数大约 2790.2 万。由本节的讨论可知,乾隆后期山东城市人口大约 138 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4.9%。

2. 直隶

在直隶各府中,宣化府的资料最为详细。宣化府为明代军卫驻地,其居民大多数为卫所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清代卫所改县,设宣化府。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志》卷 10《乡都户口》对于所属各县户口记载甚详,其行文格式为:“宣化县,本城并关厢编户七千七百三十五,内丁九千七百六十九,口一万二千一百三十。”这里的“丁”究竟是作为纳税单位的“丁”,还是人口?语焉不详。府志作者在“蔚县”条下按曰:“二蔚各路村庄多有州县两属者,无从分析,各村互见。其户口则以州县保甲册为据。”所谓“二蔚”指的是蔚州和蔚县。据此可知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志》中的户口记载源于改制以后的保甲调查。在保甲系统的户口调查中,保留作为纳税单位的“丁”已无必要。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此处的“丁”为男子,而“口”则为女子。各县情况详见表 17-2。

“丁”为男子,
“口”为女子。

表 17-2 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府、县治城市丁口

州县	城 市				城市和乡村			
	户	丁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户	丁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宣化	7735	21899	2.8	80.5	18897	73899	3.9	113.3
赤城	783	3447	4.4	170.1	6176	22301	3.6	180.6
万全	989	3656	3.7	175.9	10192	34189	3.4	132.6
龙门	624	2140	3.4	143.7	3962	15892	4.0	118.6

续表

州县	城 市				城市和乡村			
	户	丁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户	丁口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怀来	810	3912	4.8	173.9	11007	54883	5.0	128.9
蔚州	1557	6242	4.0	112.7	17544	80663	4.6	117.7
蔚县	997	4314	4.3	150.1	11291	50315	4.5	118.9
西宁	2499	14342	5.7	148.4	12061	57701	4.8	126.6
怀安	1319	6181	4.7	154.6	9181	44183	4.8	128.4
延庆	615	1973	3.2	119.7	5421	17110	3.2	128.1
保安	2223	7669	3.4	164.7	6269	24174	3.9	145.4
合计	20151	75775	3.8	124.9	112001	475310	4.2	125.6

资料来源:乾隆二十二年《宣化府志》卷10《乡都户口志》。

无论从户均口数,还是从性别比上看,乾隆二十二年数据的质量都是不高的。本卷第九章指出:嘉庆二十五年宣化府户数为16.2万户,83.9万口,户均5.2口。户均口数的正常说明《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与乾隆二十二年数据不是一个系统。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宣化府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1%,明显偏高,如将户均口数调整至5.1口,乾隆二十二年有57.1万口,至嘉庆二十五年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1%。

城市人口的家庭结构与乡村不同。

分县而论,宣化府城女多于男,且因该城人口众多,使得其他县治城市男女性别的严重失调,难以从人口数据的总数中反映出来。事实上,宣化府城中女性人口大大多于男性,也是令人怀疑的。如果将性别比调整为110,则“口”数可达38255人,男女性合计为8万余口,每户平均约4口。这一比例与山东济南城的情形相似。

宣化府乡村、城市总人口的性别比也是125,与城市人口的性别比完全相同。如果将性别比调整为110,男女性人口合计为50.4万,户均可达4.5口。城市居民户均口数少于乡村,于此可得明证。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和年轻化是其户均口数较少的根本原因。

由于册载城市人口仅为册载总人口的16%,故城市户均口数的偏低仍不能成为在补充了女性人口之后宣化府户均口数仍然偏

低的理由。也就是说,由于户口调查制度的不完善,仍有 10%左右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乡村人口——被漏载了。

暂不考虑漏载的人口,仅据表 17-2,城市级别与人口的关系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作为府城即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宣化府城人口最多,达到 3.8 万余。明代的宣化镇是军事重镇,聚集着大量的军卫人口和外地来的商人。入清以后,宣府镇的军事地位已经削减,但该地聚集的人口却并未散去。在北方蒙汉地区的贸易中,宣府镇的地位仍然是重要的。这就是宣府城的人口多于一般府城的缘故。至乾隆四十一年,如以 3‰的年平均增长率计,宣府镇的人口可能达到 4 万。

在宣化府,大的县城如蔚州(与蔚县同治)、西宁和保安,其人口规模在 1 万人左右,至乾隆四十一年,约在 1 万~1.5 万,均值为 1.25 万,与山东省的小府、大县城的规模相当;小的县城约有 3000 左右的人口。合而计之,宣化府辖十州县治所城市平均户数为 1242 户,平均每户 4 人,合计人口约 5000 人,至乾隆四十一年可能更多一些,但总体仍与山东普通县城的平均人口数相当。在《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有关明代城市人口的研究中,我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乡村人口,清代的情况也应如是。也就是说,清代后期的宣化府城市人口数量不会按照该府人口增长的速度而增长。

尽管宣化府的府、县治城市人口符合清代前期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但宣化府城市人口占修正过的全府人口总数的 14%。远远高于同期山东 5%的城市化水平。这一事实令人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即一个地区人口有多有少,但一个区域内的县治城市的平均人口大体是相同的。人口较多的区域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人口较少的区域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关清代前期直隶中南部地区县治城市人口的记载。关于直隶首府保定的城市人口,民国《清苑县志》卷 2《赋税·户口》有如下记载:

清同治十二年清查本邑城内及四关共一万一百户有奇,男女人数六万五千七百有奇,四乡共一千五百户有奇,男女人

城市行政级别
与城市人口之间
存在正比例
关系。

区域城市化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区域人口
总数的多少。

数一十九万四千有奇。迄今民国二十有一年,清查城关男女人数四万二千余,四乡男女人数三十八万零八千三百余,其在四乡则增十万有余,而城关减少二万三千余。

清苑是保定府的附郭县,同治年间城内及四关每户平均 6.5 口,与山东、宣化相比有很大不同。同治年间的“四乡”户数记载有误。至民国二十一年,城关人口大幅减少,四乡人口大幅增加。乡村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1.8%,在扣除城市人口的减少之后,全县人口仍有 9.5% 的年平均增长率。关于保定城市人口减少的原因,该志有记载:

盖彼时督军驻节保定,布按以次,各廨林立,而客游于斯者,就食于斯者,亦肩摩而趾错,且维时商贾以无所扰,获利较丰,又辐辏而云集也。自政变以来,省署移津,布按各署,一切罢废,仅设保定道尹一署,旋亦废之,仅留县署及公安局,几与外县等,夷或尚不及繁盛一镇,而商贾亦固之凋弊。此所以城关户口如斯衰耗也。然则户口之盛衰,随时势为转移,其故可深思也。

保定城市人口
与济南相同。

辛亥革命以后,河北省会移驻天津,仅设保定道署,不久保定道署也遭废弃,仅留清苑县署及公安局。保定城的行政等级连降两级,“几与外县等”。行政级别降低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行政机构的减少和行政人员的减少,区域之间的人员往来、商品往来也随之减少,从而导致整个城市人口的锐减和经济的衰退。据此推测,乾隆年间的保定城市人口可能也在 5 万人左右。符合山东模式中省会城市人口的标准形态。

作为全国性工商业中心城市,天津城的人口与临清、济宁大体相同。道光《津门保甲图说》记载的天津城厢共有居民近 20 万人。只是不知这 20 万人口是否包括不在册者。回溯至乾隆年间,在册的天津城市人口至少应有 15 万人。而据韩光辉研究,乾隆四十六年北京城市人口已达 98.7 万^①。

①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8 页。

康熙、雍正年间将遵化、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和定州升为直隶州。按照山东的情况类比,这些直隶州治的人口应当多于一般的县,即相当山东之小府、大县这一等级。另外,乾隆四十三年设承德府,设府时间仅比乾隆四十一年晚两年,其人口总数已达50万。作为府治的承德城市已经形成,且因为清室避暑之地,承德的经营已有数十年的时间,该城的规模相当于一个普通府城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乾隆四十三年《畿辅通志》卷40《关津》中记载了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天津五府的“镇”,而同书卷41《险隘》则记载了正定、顺德、广平、大名、宣化五府及冀州、易州等地的“镇”。一般的记载格式如:“(顺天府)倍安镇,在永清县东南五十里。”也有另一类记载:“胜芳镇,在文安县东北七十里,有居民万余家,贸易时,舳舻千计。又县东北有柳河镇,西北二十里有狼虎庙镇。”胜芳镇可以视作山东的大镇,但比山东的大镇还要大。将此类单列或附录的镇统统合并处理,得顺天府14镇,永平府3镇,保定府10镇,河间府21镇,天津府14镇,正定府6镇,顺德府5镇,广平府13镇,大名府11镇,宣化府3镇,易州等地合计6镇,总计106镇,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大约114个县级政区,平均每县不足1个镇。

乾隆四十三年《畿辅通志》有关镇的记载,与《嘉庆一统志》所载相同。这从一个方面证实《嘉庆一统志》记载的绝大部分镇可以看作乾隆后期的镇。在直隶各府中,河间、天津两府平均每县辖镇达到2个。大运河贯穿全境,带来了境内的商业繁荣,市镇数量亦多。运河也经过顺天府,该府每县平均约有1.7个镇。大名府因卫河与运河相通,沿卫河市镇较多,也与运河经济有关,其每县平均有1.6个镇。其他与运河无关的府平均每县仅有0.5~0.7个镇。宣化府每县平均拥有的镇不足0.3个,说明该地除府、县治城市外,其他的商业中心要比内地少得多。

按照从翰香确定的分析框架,《嘉庆一统志》所载柳河镇、苏桥镇等18个镇属于中等镇范畴。以每镇5000人计,合计人口9万。余87个小镇合计人口约17.4万。

3. 山西和河南

关于府城,道光《大同县志》卷9《赋役·户口》的有关记载如下:

通县现在土著民人二万九千四百七十五户,新滋生在外。男妇大名口九万三千五百四十八名口,男女小名口六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名口。县城四角四关实在土著民人七千五十四户,男妇大名口二万一千一百五名口,男女小名口一万四千二百四十名口。

大同城市人口规模与山东府治城市人口相同。

全县户均口数为5.4,县城户均口数略低,正好户均5口。这一合乎正常家庭人口状态的比例暗示着道光年间的户口调查是认真且卓有成效的。事实上,据本卷第十六章表16-1,嘉庆二十五年大同府的户口数据已是可靠的^①。大同县为大同府附郭县,大同县城的人口实际上也就是大同城的城市人口。道光年间大同城市人口达到3.5万人,相信乾隆年间城市人口还要少一些,可能在3万人左右。这一人口规模,也符合山东模式中府治城市人口标准形态。

关于县城人口,在绛州闻喜县,乾隆三十年《闻喜县志》卷3《户口》记曰:

定例五年编查一次,乾隆二十八年分编查得本城共一千五百一十三户,共七千三十五名口。

本卷第九章证明乾隆二十八年闻喜县的户口数据是比较可靠的。按此记载,县城人口超过7000人,应包括关厢人口在内。闻喜县城中的户均4.6口,而是年全县共21903户,131885名口,户均6口。城市户均口数也少于乡村。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的5%。

绛州稷山县的情况与闻喜县类似。同治《稷山县志》卷2《田赋·户口》记载乾隆三十一年稷山县“本城”共1542户,7387口,

^① 根据本卷以前各章所作研究,如果所分析的城市人口中涉及的该地人口总数是准确的,笔者不再专门指出。

户均 4.8 口。是年全县户数为 26401, 人口为 157673, 户均 6 口。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的 4.7%。

再看平阳府的乡宁县, 民国《乡宁县志》卷 4《户口谱》记该县乾隆四十年“城厢”户共 819 户, “男大”2917 人, “男小”4882 人, 合计 7799 人, 在人口中尚未包括女口的情况下, 户均人口达到 9.5 人, 实不可信。但无论如何, 乾隆四十年乡宁县城人口超过 5000 人的标准规模则是肯定的。

蒲州府虞乡县的县城人口较少。民国《虞乡县志》卷 3《丁赋略》记载:

乾隆三十七年, 奉旨编审停止。兹据审定, 现在实数条分合计如左:

本城四坊户口数: 东长善坊, 九十八户, 共四百四十五名口, 西和义坊八十二户, 共四百零四名口, 南平会坊, 一百二十五户, 共四百九十九名口, 北贞周坊, 一百一十四户, 共四百八十六名口……

合计县城四坊共 419 户, 1834 口, 每户 4.4 人。是年全县共计 18721 户, 105655 名口, 每户平均人口 5.6 人。城市户均口数少于乡村, 于此又得到证明。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统计中的虞乡县城没有包括关厢, 若加上近郊的关厢人口, 虞乡县城人口应当达到 3000 人以上的规模。若以 3000 人口计, 其城市人口的比例也不足 3%。

在解州的平陆县, 民国《平陆县志》卷 4《户口》记载乾隆二十九年“本城”共 623 户, 4169 名口。全县户数为 5697 户, 33525 口。无论是县城还是乡村, 户口之比值都是不合理的。与周边其他县相比, 平陆县人口明显低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是年户口编审并未完全走上正轨。本卷第九章指出, 乾隆二十九年的平陆县口数更像是“丁”而非人口。即便如此, 平陆县的“本城”口数已达 4169 名。可以推测, 平陆人口的漏载主要在于乡村而不在城市。

北部的县城可以清水河厅为例。光绪《清水河厅志》卷 14《户

口》称：“乾隆间，本街分为两甲二十五牌，约计二百五十零户，男一千五百余丁，女一千五百余口。”事实上，处于移民迁入区的清水河厅人口清查不易，光绪志的作者是按照牌甲数来进行推测的。县城人口大约为 3000 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山西城市人口等级规模与山东同，属于山东模式。

在上述六县中，有五县为明代平阳府之属县。合而计之，乾隆年间平阳地区五县县治城市的平均人口约为 5800 人。与清水河厅合而计之，六县（厅）治城市平均人口约为 5400 人。虽然可供分析的样本不多，难以对全省的情况作出可靠的结论，但是，从以上的例子中，尚未发现山西城市与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存在较大的偏离。也就是说，根据现有资料，尚不能对清代中期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进行证伪。由于山西平阳地区的人口相对密集，该地城市人口也相对较多。所以，将山西县城平均人口定为 5000 人应当是合适的。

山西既无全国中心城市，也无大镇。《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山西大县有解州的运城镇，辽州的云簇镇，太原的源涡、东阳、永康、王胡镇，平阳的龙化镇，汾州的钜钩镇和泽州的米山镇，共 9 镇。如云簇镇，“在榆社县西三十五里，市集胜城邑”。如米山镇，“在高平县东十里，有堡，当泽潞之冲，居民稠密，商贾辏集”。属于山东模式中的中等镇，以每镇 5000 人计，合计 4.5 万人。山西各府小镇多达 234 个，远远超出山东和直隶小镇的数量。是时山西共有 110 个县级政区，平均每县 2 镇。这些小镇大部分集中于太原及其以南地区，也就是说，山西中南部地区的每县小镇数量超过 2 镇。以每镇 2000 人计，约有人口 46.8 万。为数众多的小市镇与北方最大的商人群体——山西商人——的活动有关。

河南省唯一一个有记载的县城人口符合山东模式。

就乾隆时期城市人口的等级而言，直隶、山西二省均属于山东模式，河南可能也不例外。目前所得仅有光山县城的人口数。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 1《地理志·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九年城内东、西、南、北四街及城外南关烟户 937 户，男妇大小丁口 4039，正落在山东模式的数据区间内。《嘉庆一统志》记载的河南中等镇有 11 个，小镇 141 个。据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对乾隆时期直隶、山西、河南三省城市人口进行推测，具体数据见表 17-3。

表 17-3 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山西、河南三省城市人口估测

人口单位:万

行政和商业等级	平均人口	直隶		山西		河南	
		个数	人口	个数	人口	个数	人口
全国中心城市		2	113.7				
省会	5.0	1	5.0	1	5.0	1	5.0
大府城和大镇	2.5	9	22.5	5	12.5	7	17.5
小府、直隶州城	1.2	6	7.2	13	15.6	6	7.2
厅、县城和中等镇	0.5	114	57.0	93	46.5	98	49.0
小市镇	0.2	87	17.4	234	46.8	141	28.2
合计		219	222.8	346	126.4	253	106.9

根据本卷第八、第九章的有关论述,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山西、河南三省的人口总数分别为 1779.9 万、1226.2 万和 2315.0 万。三省城市人口比率分别为 12.5%、10.3%和 4.6%。

直隶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北方各省,是因其境内有北京、天津两大全国性中心城市。境内城市人口的半数属于这两大都会。其次由于商业的缘故,在沿运城市及口外府县治城市里,聚集起较多的人口。山西省的城市人口较多,得益于其小城镇的众多,但其城市人口总数并不超过河南太多。由于山西人口总数较少,故城市人口比例较高。河南城市人口少于山东,但其全省人口总数亦少于山东,故城市化水平大体相当。山西、河南的例子再次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是行政单位的设置和人口总数的多少。

二、西北地区

1. 陕西

陕西省城西安的两个附郭县分别为长安和咸宁。嘉庆《咸宁县志》卷 10《地理志》记其总坊厢户 5512,口 34002。长安县的情况不详。据乾隆《西安府志》卷 13《食货志·户口》的记载,乾隆四

十三年咸宁县有 352327 口,长安县有 147110 口。长安县人口是咸宁县人口的 41.8%,依此比例推测,长安县人口中,居住于西安府城者大约为 14000 余人,西安城市人口合计为 48000 余人。由于乾隆四十三年咸宁、长安两县人口性别比高达 153.1,女性人口明显低估。按 110 性别比修正,西安城的实际人口应为 5.5 万。此数正合山东模式中省会人口的标准规模。

在陕西,迄今未查获普通府城的户口数据。直隶州的数据见于乾州。乾州从县升为直隶州,始于雍正年间。雍正五年《乾州新志》卷 3《户口》记载康熙六十年(1721 年)“在城东西街”共计 1085 户,3255 口;又记东乡、南乡、西乡、北乡的总户数为 9101 户,27241 口。这一系列数据有两点需要加以讨论:其一,康熙六十年“户口”数的真实含义可能为“纳税单位”,而不是真正的“户”和“口”,否则很难解释全州仅有万户;其二,户均 3 口,并非真实的户口。

《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乾州本州的口数为 156000。据第八章的论述,知道这一数据是可靠的。以 3‰ 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乾隆四十一年口数约为 13.5 万。如果康熙六十年乾州户数为 1 万人,其口数为 5 万人,从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四十一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7.2‰。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按照康熙六十年数据,乾州在城东西街户数与口数均占本州人口总数的 10.7%。依此,乾隆四十一年乾州城市人口可达 14000 余人,与山东模式中的小府、大县城市人口数接近。事实上,直隶州的行政等级虽与府相同,但所辖较府要小得多,作为“小府”是最合适不过的。乾州城的人口数与其行政等级是匹配的。

县治城市的人口可以耀州为例。乾隆二十七年《续耀州志》卷 4《田赋志·编户》记载全县共 8039 户,其中“城中四街”共 1685 户。城市户占全县户的 21%。乾隆《西安府志》卷 13 记载乾隆四十三年耀州共有 58022 口。据本卷第九章分析,耀州口数是准确的。然而,折算成人口计算,从乾隆二十七年至四十三年,耀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0% 以上。据此知乾隆二十七年数据是不可信的。以乾隆四十三年数据为准,若其中城市人口占 20%,则

直隶州即山东的小府。

有人口 11000 余人。正合山东模式中的大县人口标准。

据表 9-14,在乾隆四十三年西安府属 16 个州县中,耀州人口仅多于高陵和同官两县。也就是说,耀州在人口数量上绝对不是一个大县,相反,却是一个小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县,雍正三年(1725 年)曾升为直隶州,直至十年以后,才降为州。雍正三年耀州行政等级的提高,与州城人口的众多大有关系。因为,耀州不是战略要地,非兵家所争,民事简净。在《清史稿》卷 63《地理志》的记载中,列为“简”。人口既少,民事又简,其在十年间升为直隶州的理由只有解释为城市规模较大,城市人口较多了。

蓝田县是西安府的普通县。据光绪《蓝田县志》卷 6《田赋·民数》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 年)城内土著只有 427 户,男妇大小 2651 名口,客民 386 户,男妇大小 1305 名口,雇工 39 名,合计为 3995 人。陕南的移民大都是在乾隆末年及嘉庆、道光年间迁入的,蓝田县地处关中平原之南界,陕南山区之北界,移民迁入的时间不会更早。扣除客民不计,乾隆四十一年蓝田县城人口大约为 2000 人。

在凤翔府,嘉庆《扶风县志》卷 4《赋役》记载嘉庆二十二年扶风县奉文编查保甲,查明县城一保五甲,四十九牌,共土著 405 户,男妇大小 1747 口,客户 82 户,男妇大小 308 口。扶风县城人口刚刚达到城市人口数的最低限。相信在乾隆年间,扶风县城的人口可能还会更少一些,却不可能比嘉庆年间更多。

在延安府,道光《安定县志》卷 4《田赋志·户口》称县城共“土著烟户”631 户,“男妇大小”2706 口;“客户”23 户,“男妇大小”200 口。如第九章所述,陕西南部客户的迁入大多在乾隆四十三年以后,北部情况不详。如与南部相同,则乾隆四十一年安定县城的人口不会超过 2700 人。大大少于本文定义的县治城市的最小级别。

安定全县土著并寄籍共 17085 户,男女大小 85662 口,户均人口约为 5 人。道光年间县城人口仅占全县人口的 2.9%。《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安定县口数为 85600。由此可见,道光《安定

县志》所载户口的年代即为道光三年。这一年的户口数据是大体可靠的。

在兴安府,道光《石泉县志》卷5《户口志》称,在城户1155,男3872名,女1943口。通计11657户,74103口。《秦疆治略》所载名义上为道光三年,实际上为嘉庆二十五年,石泉县口数为87900,多于道光《石泉县志》所载。按照一般的规律,道光《石泉县志》所载可能是嘉庆二十五年前的口数。然而,如本卷第九章所称,嘉庆中期以后,因山区垦伐过度,陕南山区人口急剧减少。如是,道光《石泉县志》所载实为道光中期或后期的在册人口。从乾隆五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由于移民迁入,兴安府的人口增长非常快。石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3.2%。客民移入城市虽不如移民山区为多,但迁入城市的也有相当数量。即使在扶风县,城市中客民的比例也占全城户数的16.8%。在石泉县,客民占城市人口的半数是没有问题的。若如此,则乾隆四十一年,石泉县城的人口仅有2000~3000人。

陕西普通县城的人口规模小于山东。

总之,如果说,在清代中期的陕西,省会和府一级城市人口还符合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话,普通县城的人口规模则要比山东少得多,其每个普通县城的平均人口约为3000人。

《嘉庆一统志》载有商况说明的中等镇有秦渡、陂西等11镇。另外,同州府华阴县“县境有四镇,皆有集,敷水、华岳最大”。另两个较小的镇不计入中等镇之列。有商况说明的镇一般较大,而较大的镇也只是达到“有集”的水平,对这类镇的商业化程度不必估计过高。陕西所谓的小镇共有220个,似乎不可能达到本文设定的城市人口的最低标准。

乾隆《凤翔府志》卷2《市镇》对于这类“镇”有较详细的记载。如记“凤翔”县之南街、东关,“俱每日市”,可见县城所在之镇已是完全的商业市镇了,而该县下辖的四个镇则分别为双日市和单日市,仍处于南方“市”的层面,即农村集市,不能算作真正的镇。又如岐山县的南门县治、东关、东街、东十字街、西十字街、西街、西关,“十日一递,俱每日市”。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即以十日为一轮换,轮值的县城各街,在此十日中每日有市,可见该县县城商

业的功能已经很强,只是县城街道很多,每天的交易场所不需占用每条街道,故采用街道轮值制。岐山县下所辖六镇,则分别为单日市或双日市。在宝鸡县,东街和西关“半月一递”,辖镇与其他镇同。扶凤县城的西街、北街和东街,也是“每十日一递”,但却是“俱单日市”。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较大的县城都保证每天有“市”,而扶风这类人口在 2000 左右甚至更少一些小县城只能是单日市,其商业形态类似其他非县治“镇”,与农村集市同。

雍正《乾州志》卷 3《镇堡》称:“通衢集会,百货骈臻,毂击肩摩,日中为市。其熙熙攘攘,每盛于州城,自昔犹然,今犹如故。”虽说一般的商业市镇很繁荣,但“日中为市”一句仍透露出这类“镇”的农村集市的性质。至于其他“镇”,如陆陌镇,“在州东十五里,东通醴泉,北通三边,官商军旅必经之地”;“杨家庄,在州治东北三十里,北通三边,东通二原,商旅住宿于此”;“阳汉村,在州南十五里,东通醴泉,西通临、巩、凤、汉,商旅住宿于此”。这类称作“镇”或不称作“镇”的地方,因地处交通要道,成为来往商旅驻足投宿之处。关于这类“镇”的其他商业功能,则不见提及。由此可认定,陕西、甘肃两省大部分的“镇”均为农村市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凤翔府也有与乾州相仿的稍大的“镇”。如凤翔府之麟游县,“城内间日一市”,不成规模。而其唯一的一个镇,名催木镇,按乾隆《凤翔府志》卷 2 所记,该镇位于“县东北四十里,四、八日市。按催木一镇,北接灵台,东连永寿,商民辐辏,货物殷繁,非复昔日之凋残矣,亦近来司牧者培养之力也”。即便如此,该镇也不过是一个稍为繁荣一点的集市而已,尽管其繁荣的程度超过了县城。

如此,将《嘉庆一统志》中的 11 个有商况说明的镇当作山东模式中的小镇来对待,应当是合适的。

2. 甘肃

甘肃原本是陕西省的一部分。清代初年析陕西、陕西行都司地设甘肃省,兰州府城升级成为省会。据此可知,兰州城的人口不可能达到 5 万人的规模,其人口应属于府城范畴,即 2 万~3 万人。

武威县是甘肃凉州府的附郭县,县城即是府城。乾隆十四年《武威县志》卷1《户口》称:“我朝于今在城居民户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七,口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七。在野居民户三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三。”武威县的城乡户口比颇令人不可思议:在城户均口数太少,而在野户均口数太多。综合计之,全县共49865户,263350口,户均5.3口,正合户均人口的标准值。因此,我以为这一记载中的错误实为分城、野统计时,将各自户数弄错了,总数却是正确的。至乾隆四十一年,凉州府城人口可达3万,符合山东模式中府城的人口规模。

甘肃平凉府的静宁州也是一个规模可观的城市。乾隆十一年《静宁州志》卷3《赋役·户口》记载“三街”共户1666户,共13366口。静宁州城的户口比例过高,很不正常。它可能沿袭清代前期的“丁”,并未随着户口调查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而“口”则已是真实的人口数了。静宁州相当于山东的大县等级,按2.5‰年平均增长率,乾隆四十一年其人口可能增至1.4万,符合山东小府、大县级人口规模。

甘肃庆阳府的合水县在乾隆二十六年或稍前,“本城东西街、东西关”282户,口数未见记载。这一年全县共有9976户,54861口^①,户口比大体正常。县城的户确实是民户,如此,县城居民仅有千余人。

安定县地处陕北,自然条件恶劣。《秦疆治略》称:“唯环县皆山地,鲜平原。土著民多,客居民少。人处窑洞,地皆沙土。风烈霜早,气候苦寒。所种二麦,只十分之一二;秋禾以菜谷为主,其余均系杂粮。丰收之岁,仅能糊口,荒歉之年,民不聊生。山陡泉下,地高河低,溉灌不能接引,水利无由而兴。舟车不通,商贾裹足。县民除力农外,牧羊挖炭为生,别无营运。”因县小而后并入延长县。合水县属甘肃省的小县,两县县城人口之少,在情理之中。然而,扶风地处关中平原的西部,人口不少,但城市人口之少,令人惊讶。地处西北的陕西、甘肃县治城市人口等级可能与东部地区

^① 乾隆《合水县志》卷2《赋役·户口》。

有异。

虽然西北地区的府城、州城与东部接近,那是因为除了行政性城市以外,西北没有纯商业性城市。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商业的功能越强,城市人口也就越多。有意思的是,不仅这一区域商业城市的功能几乎全由行政性城市来承担,而且其商业功能的大小几乎全按城市的行政等级来确定。西北地区的商业网络形成于明清以前的中古时代,明清时代无新的因素的介入,所以没有大的改变,城市的行政等级与商业等级一直是大体吻合的。县级城市在西北地区商业中的地位极低,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西北地区城市的行政等级与商业等级大体吻合。

造成陕甘地区县级城市人口规模较小的另一原因,可能在于一些大的州(县级州)级城市行政级别的提高。雍正年间西安府的商州、同州、华州、耀州、乾州、邠州升为直隶州,同州继而升为府;延安府则有鄜州、绥德和葭州升为直隶州;甘肃则有肃州、秦州和阶州升为直隶州。至乾隆四十三年,又分汉中府地设兴安府。如上述,乾隆年间的乾州州城人口并不少,数量达到1.4万左右。静宁州城的情况也是如此。将所有的直隶州城和州城的人口定为1.2万,而将县治城市平均人口定为2000人,可能是合适的。

大县升州后,县城人口规模显得较小。

《嘉庆一统志》所载甘肃的镇共有76个,有商况说明的只有庆阳府之董志镇,“四达通衢,贸易辐辏之地”。余皆为市集,而不是城镇。

清代中期陕甘地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如此,西北地区的城市依然可划作四级,县城及镇为2000人,州城和直隶州城为12000人,府城为25000人,省城为55000人。这一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与可以命名为陕甘地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推测乾隆时期陕西、甘肃两省的城市人口总数如表17-4。

陕西、甘肃两省的城市人口,大致相同。然而,乾隆四十一年陕西人口为796.5万,甘肃人口为1579.9万,两省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和2.7%。大致相同的城市人口代表相差甚大的城市化水平,再次证明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决定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是行政单位的设置和区域人口总数的多少。

决定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是行政单位的设置和区域人口总数的多少。

表 17-4 乾隆四十一年陕西、甘肃城市人口估测

行政和商业等级	人口单位:万					
	陕 西			甘 肃		
	数量	平均人口	总人口	数量	平均人口	总人口
省会	1.0	5.5	5.5	1.0	2.5	2.5
府城	4.0	2.5	10.0	7.0	2.5	17.5
直隶州、州城	9.0	1.2	10.8	12.0	1.2	14.4
厅、县城、小镇	80.0	0.2	16.0	40.0	0.2	8.0
合计	94.0		42.3	60.0		43.4

3. 新疆

张建军撰文研究过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问题^①。关于乾隆年间的城市人口,他引《西域地理图说》所载,南疆八城中,叶尔羌人口为 11730,喀什噶尔为 9330,英吉沙尔为 7589,和阗为 4308,阿克苏为 3261,余不足 2000 人口。即使将南疆八城人口全部统计在内,合计城市人口为 40270 人。如果这一记载是真实的话,乾隆四十一年,南疆八城城市人口可能增加至 42000 人。占是年南疆 59 万人口的 7.1%。是年新疆人口约为 86 万,以此比例计,城市人口约为 6 万。在这一口径中,北疆城市中大批的军籍人口并不完全包括在内^②。

第二节 乾隆时期的南方城市人口

一、江苏

江苏的城市大致可分为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府城及大工商业市镇、县城及中等工商业市镇、小市镇等五级。与山东相比,

① 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4 期。

② 张建军将嘉庆《三州辑略》卷 3《户口门》所载乌鲁木齐男妇大小“共一十万人二千有余”误为二十万人二千有余。特此说明。

作为省会城市的南京本身即是全国工商业中心城市,不另列。另外,清代从徐州府、淮安府中分设出海州直隶州,从扬州府中分设通州直隶州,从苏州府中分设太仓直隶州,此即山东的小府等级。因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江苏的小城镇可以为分大市镇、中等市镇和小市镇三级,兹分别论述如下。

1. 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

南京既是省会城市,又是南方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其人口众多,在南方各大城市中,首屈一指。如笔者在本书第四卷中所述,明代后期,南京城市可能达到40万~50万人的规模。明代末年的战乱,并未对南京城市造成大的影响,因此,其人口仍可能保持稳定或增长。乾隆《江宁县志》卷8《民赋志》的记载,江宁县城厢民户达到4.1万户。上元县辖城厢民户数不详。但可以根据一些其他的资料来进行推测。

万历年间两县编审在城坊厢“户”数,上元县坊厢“户”为6129户,江宁县坊厢“户”为3219户,江宁坊厢“户”占全城“户”数的34.4%^①。虽说万历年间的“户”不具备户口普查的意义,但却说明在南京城中,上元县承担的“丁税”远远多于江宁县。这或许可以反映上元县所辖城市人口也远远多于江宁县。依此比例推测,乾隆年间南京城中的坊厢户数可能达到近12万户,以户均4口计,约为48万口。然而,这仅仅指南京城的土著,上引《江宁县志》同卷称:“江宁寄户多于土著”。按照我在本卷第三章中的论述,乾隆年间南京城市人口可能达到85万。至咸丰三年,南京城中的在籍人口“几九十万”^②,加上不在籍者,人口当超过100万。

苏州城市人口在明代后期即已达到50万人左右的规模。然而,在明代末年,苏州城却遭受到一次肺鼠疫的侵袭。详细过程见本卷第二章的论证。按照我对明代末年华北地区鼠疫疫情的分析,苏州城内至少有40%的人口死于是疫。加上清初战争对苏州

南京城市人口
多达85万。

苏州人口可能
达到50万。

①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户口》。

② 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18《咸丰三年以来兵事》。

城的影响,苏州城市人口可能仅存 20 万左右。随着清代丝织业、印染业等手工业的发展,苏州很快恢复了它作为中国手工业中心城市地位。至清代中期,各家估计苏州城市人口可能达到 50 万人。

“扬州十日”大屠杀后,扬州城市人口锐减,几不成市。经康熙、雍正年间,随着盐业的发展,扬州重新聚集大批人口,复成为中国盐业经济的中心。乾嘉年间,城中商民杂处,其人口一度多达数十万家^①。如以常态下扬州城内有 10 万户计,其城市人口也可能达到 40 万~50 万人的规模。

淮安府城地处南北要冲,是河、漕、盐、关重地。在本书第四卷,我估计淮安城市人口可能达到 10 万人以上的规模,只是其中含有大批军卫人口。从文献记载来看,淮安在清初的动乱中,并无大的损失,其人口总数不致发生大的变动。军卫被撤以后,军卫人口转为民籍,淮安府城的军事色彩消失,商业色彩愈发鲜明。与明代的城市相比,淮安关厢商人聚集区——西湖嘴——变得越来越繁盛。

王振忠引资料说明这一新的城区的形成。“自府城至西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屯集之地。任鹺商者,皆徽(州)、扬(州)启赀巨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夏秋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②;“城西北关厢之盛,独为一邑冠”^③;“万商之渊,尤为繁盛”;“富有无堤,甲于诸镇”^④。与明代情况比较,淮安城市人口达到 20 万人的规模是可能的。

明代中叶黄河夺淮,清江浦、徐州间黄河干流及其以北的山东南运河、北运河均感水量不足,为了保证漕运,明代政府禁止官商民船在这些河道中航行,南来北往的官、商、客旅均在清江浦及其

①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36《职官五·名宦》。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78 页。

② 光绪《淮安府志》卷 1《疆域》。

③ 同治《山阳县志》卷 1《疆域》。

④ 吴锡麒《还京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

对岸的王营镇换乘车船,清江浦成为南船北马的交通要冲。“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栉比数十里不绝”。从城市规模来看,其常住人口可能达到10万人以上。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迁清河县治于此。清江浦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仪征与淮安府城一样,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其人口也得以保全。王振忠指出清代前期,仪征作为淮南盐运中枢,仍保持明代的繁盛。时人形容说:“转运半天下焉,唯仪征缩其口,列檣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廓。”^①作为淮南盐运码头,“仪征捆工人等,不下数万余人”^②。道光《仪征县志》卷15《食货志·盐法》对当时的仪征人口有如下说明:

仪征户口人丁三十七万四百有余,其山圩民田计仅二千三百四十顷九十余亩,无论年岁尚有丰凶,户口各分贫富,即以仪征之田食仪征之人,曾不及十之三四,此外皆恃掣捆引盐为生计。

以这一比例计算,仪征之民服务盐业者达到22万~26万人之多。我相信如此众多的盐业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市周围的农村,但城区常住人口超过20万则是毫无疑问的。回溯到乾隆年间,仪征城区常住人口可能在15万人左右。

镇江地处江南运河的北端,为南北往来之要冲。有报告称咸丰八年(1858年)镇江人口约有33万,太平天国战争后,只有10余万人,以后再逐年增加^③。王树槐评价这一数据颇有问题,“但可推测乱前人口之多”。很显然,镇江城的人口多于一般府城。推测乾隆年间可能达到15万人左右。

可见,天津、临清、济宁、清江浦、淮安、仪征和镇江等为大致相同的规模,即15万~20万人。而在这类城市之上的扬州,其人口是此五城的2至2.5倍。

① 汪中《哀盐船赋》,载《江都汪氏丛书》。

② 惕斋主人《真州竹枝词》吴培楚题词。

③ 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 pp. 304. 转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493页。

江苏府城人口的
平均规模超过
山东。

2. 府城和大市镇^①

淮安、仪征两城人口数与天津、临清、济宁等沿运商业市镇人口相同的事实暗示江苏也存在一个类似山东城市人口的等级模式。只是,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淮安和仪征并不是江苏城市人口的最高量级,扬州、苏州和南京三城的人口远远超过了淮安和仪征。因此,我推测江苏府城的平均规模可能超过山东,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人口数量等级体系。

至今未获府治城市的人口数据,只见道光《泰州志》卷9《赋役·人丁》称:

乾隆三十七年奉旨停止五年编审虚文,嗣后止逐年清查数目,据实造具四柱清册送转,至四十年核实人丁共六十二万六千二百九十丁(编户十三万七千九百六十五,内本城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户……)

乾隆四十年的“人丁”仍沿用传统的说法,但从户“丁”之比中可以看出,此处的“丁”已是人口了。泰州隶属于扬州,类似于山东的小府城或大县城。但正如我在本书第四卷中所说,从明代初年开始,兴化就因盐业而聚集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该城人口较一般大的县城人口为多。泰州情况与兴化相似,换言之,泰州城的人口可能达到了江苏普通府城的人口规模。这也就意味着,江苏的普通府城要比山东普通(大)府城的人口多出一倍。

据此,推测高邮州城和兴化县城的人口也可能达到同一规模。兴化的理由如上述,高邮城则因其为州城之故,与泰州处同一等级。

这虽然是一个暂时得不到证明的假设,但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证明。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江苏商业市镇的人口规模与之相同,也应有同样多的人口。在江南诸镇中,吴江县的盛泽镇首屈一指,乾隆《盛湖志》卷上《沿革》称:“今则万家烟火,百倍

^① 此处分析中涉及的江南市镇,皆采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下卷《江南市镇的典型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列入的市镇。

于昔，其热闹与郡闾门埒。”朱泾镇的情况大体如是，明代中期，该镇号称“居民数千家”^①；清代初年，朱泾镇已是“人烟万井”^②；到乾隆年间，朱泾镇“烟火稠密，商贾辐辏，有城市气象”^③。为此，樊树志先生评论道：“乾隆二十五年移金山县治于此，并非偶然，乃是朱泾镇逐步发展、繁荣的结果。它有城市气象在先，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县城，足以表明朱泾镇已具备充当县城所必备的各种功能了。”^④其实，朱泾的人口规模应当大于一般的县城，才可能取代旧金山县治而被立为新县城。再如法华镇，乾嘉时达到极盛，“桑麻接壤，烟户万家”，唯亭镇在清代初年，“比屋万家”^⑤。这些万户左右的大镇，实际上已达到了普通府城的规模。

普通府城约有万户。

同样规模的市镇还有浙江湖州的南浔等镇，道光《南浔镇志》卷首载范来庚叙：“阡圃云屯，烟火万家”。范氏在该志《凡例》中还说：“数百年来，人文蔚起，阡圃纷屯，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郁为巨镇矣。”乌青镇的规模亦与此同，乾隆《乌程县志》卷11《乡镇》云：“户口日繁，十里之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二镇联而为一，中以市河、道为界，因合呼乌青镇。”

正因为此，明时人就将乌青镇比作府城了，嘉靖十七年，地方官鉴于乌青镇之繁荣，请求于此分立县治，一份《请分立县治疏》称：“本镇地厚土沃，风气凝结，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丛塔宫观周布森列，桥梁阡圃……宛然府城气象。”^⑥在本书第四卷中，我论证洪武时期京师地区普通府城的人口规模大约为1万余人，最多可达1.5万人。湖州府为江南大府，其商业之发达，远非他府可相比拟，因此，湖州府治城市人口可能超过1万。即使按3.4‰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至嘉靖年间，湖州府城人口可能达到2万人，即居

① 嘉庆《朱泾志》卷1《疆域志·桥梁》。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3《建设》。

③ 乾隆《金山县志》卷1《疆域·镇市》。

④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370页。

⑤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1《津梁》。

⑥ 《乌青文献》卷1《建置》。

民“四五千家”的规模。明代嘉万年间即有人将乌青镇人口称为“万家”的,则多少有些夸张了。

从上述泰州城的人口规模来看,通州城市人口可能达到相同的规模,即5万人左右。从本书第四卷中可知,明代初年太仓城人口约5万人左右。乾隆年间太仓城可能仍有此规模。相对而言,海州城市人口要少一些,可能不足5万。

3. 县城及中等市镇

在盛泽等府城一级的市镇之下,还存在一批1万或1万以上人口的中等市镇。如黎里镇,嘉靖年间“居民二千余家”^①;至乾隆年间,“居民更二三倍焉”^②,居民达到五六千家,人口可达2万~3万人。如章练塘镇,“去县治东九十里,与长洲、青浦合辖,民居稠密,百货具备,其居吴江者今几千家”^③;如果辖于吴江者接近千家的话,那么与辖于长洲、青浦者合计当有三千家,近1.5万人。乾隆《震泽县志》卷4《疆土·镇市村》称震泽镇,“居民且二三千家”^④,而据光绪《震泽县志》卷4《人丁》,乾隆九年,“在城附郭典史所辖”户数为3432户,男5553,女6910,合计人口为12463,户均人口仅3.6人,可能偏低。按正常的户口比,震泽县城人口可能达到1.5万左右^⑤。如璜泾镇,乾隆间“镇民烟火数千家”^⑥。如枫泾镇,康熙时即已“商贾骈集,增厦数千间”^⑦,人口也

① 嘉靖《吴江县志》卷1《疆域》。

② 嘉靖《黎里志》卷4《风俗》。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

④ 乾隆《震泽县志》卷4《疆土·镇市村》。

⑤ 包伟民在他的近著《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七章中指出:“自宋代以来,江南市镇经济虽有长足发展,国家在行政管理上却一直将其类同于乡区,以致极少有辨明乡镇、专指市镇镇区人口的统计资料存世。而要想鉴别现存市镇人户数据中的城乡比例则极为困难。以往研究多有忽视传世记载这一特性,从而夸大市镇人口数据的情况。”然而,震泽镇的资料却说明时人对于镇中居民二三千户的估计,为官方统计所证明。对于时人的估计,不必一概斥为荒诞或夸大。当然,还需要说明的是,震泽镇的居民数可能包括了部分镇郊的居民,他们也可能是农业而非工商业人口。

⑥ 道光《璜泾志稿》卷1《乡域志·形势》。

⑦ 康熙《松江府志》卷17《市镇》。

当数千户。又如朱家角镇，“聚居人数千家”^①。再如南翔^②、平望^③、同里^④、黄溪^⑤、八斥^⑥等镇、市，居民都在数千家。如唐市，清代初年居民达到千户左右，乾隆年间可能还有增加，时人称赈灾之事时说：“故唐市虽仅一镇，然饥民就食之数约与城相半”^⑦。这些市镇的规模，不会小于一般的县治城市。然而，从震泽镇为江南大镇这一事实推测，乾隆时期苏南普通县治城市人口可能在10000人左右。

4. 小市镇

小市镇中大者仅有千户左右的居民。如周庄，清代中叶极盛时，镇上居民将近5000人^⑧。如外冈、诸翟等镇皆是。有些名为市者，均在1000户左右，乾隆《吴江县志》卷4所载，其县市、江南、新杭等市即是。这类市镇因其规模相对较小，故留下的记载相对较少。一般说来，苏南市镇中的大多数属于这类市镇，其中那些名气较大、经济活动相对较强的“镇”可能达到千户左右的规模，那些名气较小、经济活动较弱的“镇”或“市”只有居民数百家，人口大约为2000人左右。没有准确记载的这类市镇人口一律统计为2000人。

江苏城镇体系
远比山东完整。

毫无疑问，江苏地区的城镇体系远比山东的完整，主要体现在市镇的种类繁多，等级复杂。江苏地区城镇发育程度远比山东为高，除了市镇的经济功能的多样化外，还体现在市镇人口的众多。苏南的大市镇和中等市镇之多，远非山东所能比拟。

5. 江苏城市人口推测

综上所述，我们可将清代前期江苏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作如下表述：小市镇约2000人，县城及中等市镇约1.2万~1.5万人（县

① 王原《清华阁记》，乾隆《青浦县志》卷16《寺观》。
 ② 南翔镇的人口并无记载，但从该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的规模推测，该镇规模可能有数千户。如黎里镇南北相距四里，东西相距三里半，人口达五六千户。
 ③ 据道光《平望志》卷1，康熙、雍正年间，“居民数千家”。
 ④ 据嘉靖《吴江县志》卷1，明代中期，同里镇居民有二千余家。又据嘉庆《同里志》卷1，入清以后，“居民日增，市镇日扩”。
 ⑤ 据乾隆《吴江县志》卷4，康熙年间该镇居民至二千余家，乾隆年间当更多。
 ⑥ 乾隆《吴江县志》卷4。
 ⑦ 乾隆《唐市志》卷下《集文》。
 ⑧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310页。

城计作 1.2 万人,中等市镇计作 1.5 万人)、府城及大市镇约 5 万人,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从 15 万至 85 万不等。苏南三级市镇之间的人口级差,大约为 5 倍。

在小市镇之下,江南地区还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个“市”,有些“市”因人口众多,已经达到了镇的标准,甚至达到了中等市镇的标准。但绝大多数“市”则人口不多。按照樊树志先生的研究,市的居民大多在 100 户至 300 户之间,500 户至 1000 户的为数较少。本文的标准,2000 人口且其中大部分为非农人口组成的聚落才可称作城市,这些“市”可能是达不到这一要求的,因此,本文不将这些“市”的居民作为城市人口加以统计。

在苏州、松江、太仓等地以外,地方志中记载的“镇”含义较为复杂。这是因为修志者取舍标准不一,按照王树槐先生的说法,往往前志所列者多,而后只列其重要者。如淮安府山阳县,乾隆十三年修的府志列有 58 镇,同治十三年亦列有 50 镇,光绪十二年列有 52 镇,光绪二十一年的《江苏全省舆图》仅列有 11 镇。淮安府之清河县亦如是。在扬州府仪征县,嘉庆时列有 9 镇,道光三十年列有 7 镇^①。沭阳县康熙十三年列有 36 镇,嘉庆时只列 26 镇,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全省舆图》仅列其 7。王树槐认为,由以上例子看来,仅凭镇数之减少,似难断言苏北贸易的发展萎缩。由此亦可证明,镇数之多寡,牵涉到标准问题。如嘉庆《海州志》列有 51 镇,光绪《海门县志》列有 86 镇,光绪《崇明县志》列有 115 镇等,都说明不同标准导致的统计数是不同的。对于清代前期苏州、松江、太仓三地的“镇”数,笔者采用樊树志先生的统计,而对于江苏其他府,则采用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全省舆图》中的统计。由于分辨不清市镇规模,统统作为小市镇处理。

然而,按照王树槐的观点,江南之镇,已达到纯以商业为主,而江北之镇的半数尚停留在戍卫阶段,或者已停止发展成市了,另外一半的镇设有“市”,即具备商业市镇的意义。王树槐根据乾隆、嘉庆年间的地方志,发现扬州府各县计有 65 个镇,其中设有“市”的

^① 嘉庆《扬州府志》卷 16,道光《仪征县志》卷 3。

仅有 33 个,占 50%强。清代后期赣榆和盐城设“市”的镇也只有全部镇的一半。乾隆年间通州三县共计 13 镇,各镇皆设“市”。据此,可知在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全省舆图》中记载的淮安府、海州两地的所有镇中,只有半数属于商业市镇;徐州府只有 8 镇,应全是商业市镇。统计结果详见表 17-5。《嘉庆一统志》所载江苏市镇存在太多的缺漏,故不采用。

表 17-5 乾隆年间江苏分府城市人口

城 镇	江 宁	镇 江	常 州	苏 州	太 仓	松 江	扬 州	通 州	淮 安	徐 州	海 州	合 计
中心城市												
数量(个)	1	1		1			2		2			7
人口(万)	85	15		50			55		30			235
府城及大镇												
数量(个)			1	2	1	3	3	1		1		12
人口(万)			5	10	5	15	15	5		5		60
县城及中镇												
数量(个)	5	3	6	11	3	3	3	2	4	6	3	49
人口(万)	6	4	7	15	4	4	4	2	5	7	4	62
小市镇												
数量(个)	61	30	50	44	23	46	33	13	28	8	9	345
人口(万)	12	6	10	8	4	23	7	3	6	2	2	83
合 计												
数量(个)	67	34	57	58	27	52	41	16	34	15	12	413
人口(万)	103	25	22	83	13	42	81	10	41	14	6	440

资料来源:据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附表二《清代前期苏松杭嘉湖市镇分布表》(第 502~510 页)和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第 479 页)修正。修正内容见正文。

乾隆四十一年江苏人口多达 3243.6 万,其中城市人口为 440 万,占总人口的 13.6%,比直隶的城市化水平略高。

二、浙江

将浙江与江苏相比,两地的城市结构颇有相似之处:浙江北部

与苏南毗邻处,也分布着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工商业市镇。只是除杭州外,浙江再也找不到可称为全国性工商业中心城市。在排除了这类城市之后,浙江的城市人口等级可能与江苏相同。

1. 资料的评价

在讨论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讨论研究资料的问题。有关清代前期浙江城市人口的记载虽有一些,但却不可靠。关于这类资料,姜涛在其新著《历史与人口》中评价说:

清代前中期,浙江省的一些地方将编审人丁分为市民人丁和乡民人丁两部分。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人口城乡结构提供了一个参照。但所谓的编审人丁是为征收赋税服务的,本身并不是人口统计,后来更蜕变为赋税计量的单位,因此并不能反映人口城乡结构的准确面貌。^①

接着,姜氏以杭州、湖州两府为例对此说加以证明。这一证明是正确的。就笔者所见资料来看,将编审人丁分为市民人丁和乡民人丁的做法,不仅见于浙江省的一些地方,而且见于浙江各地。至少在金华府、严州府和衢州的地方志中,就有同样的记载。由此可见,这是浙江省人丁编审的统一口径。清代的市民人丁或乡民人丁,是从明代继承下来的赋税额。如光绪《永康县志》卷3《田赋志》称:“国朝原额户口人丁共二万五千四百六十八丁口,内市民五百二十口。”光绪《兰溪县志》卷2《丁口》称:“原额市乡民成丁四千五百三十一丁,康熙六年清出五十二丁……”光绪《严州府志》卷9《户口》“建德县”条下:原额户口人丁一万九千二百十丁口,市民人丁二千二百七十九丁。民国《龙游县志》卷26《掌故》引同治四年《赋役全书》,“原额人丁二万二千八百四十五丁口,内市民七百二十五口”。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认为清代浙江的市民人丁,不是人口统计的单位,而是纳税单位。

也有例外。乾隆六十年《开化县志》卷4《户口》记载乾隆六十年“完赋实在户”共有25412,口36084,其中“市民人口”998口,人

^① 姜涛《人口与历史》,第163页。

丁 830 口,乡民人口 13292 口,人丁 4424 口,市乡食盐钞丁 16537 口。以 25412 户之多,仅有 36084 口,则可肯定这里的“口”不是人口。光绪《开化县志》卷5《食货》记载光绪十一年全县 29745 户,133519 口,户均 4.5 口,才是真正的“户”和“口”。与光绪户口的比较后可知,乾隆年间的“户”是可信的。如此,乾隆年间开化县城可能有近 3000 人口。光绪十一年,开化县城中的“城市民”共 582 户,“大小丁”2641 口,城市人口总数可能少于乾隆年间或持平,其原因可归结为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就乾隆年间城市人口的记载而言,这样的记载真是太少了。

2. 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

杭州城是浙江省会,也是浙江仅有的全国工商业中心城市。清朝初年的记载已不可觅,详实的记载见于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时人议及战争造成的残破时,曾涉及杭州城的人口损失。陈学绳在《两浙庚辛经略》中记载杭州的第一次破城:“其余官绅士女死者约六七万人”^①,许瑶光《谈浙》中记载杭州的第二次破城:“核保甲籍,居民计六十万,半已饿死;时严寒,被驱被掳死者复相继。”^②徐映璞《太平军在浙江》一文称:“杭城既陷,官吏五六百员,或死或擒,无一幸免。城中居民六十万,饿死者甚众。时值严寒,被驱出城,冻死江干及被屠杀者,尤不可胜计。”^③又云:“杭州自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李秀成攻占后,迄今二年又三月矣;兵火交加,粮食乏竭,饿死、疫死、锋刃死者,不知凡几。其盛时,居民为八十一万人,及至收复之后,兵民才七万余人而已。”^④推测乾隆年间杭州城市人口大约为 50 万以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杭州与苏州成为驰名的中国工商业中心城市,并不仅仅在于它们的工商业内容相似,而且人口规模也相似。

乾隆年间杭州
人口超过 50 万。

3. 府城

上文证明杭嘉湖地区一些大的商业市镇的人口数,可与府城

① 转引自《太平天国》第六册,第 620 页。

② 同上书,第 588 页。

③ 见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5 页。

④ 同上书,第 219 页。

相当,其人口多在万家左右,约合5万人口。如嘉兴府城,据陈学文的研究,明代万历年间,嘉兴府城居民户数可能达到了1万户的规模。他引万历四十七年《董氏家谱》的记载,南湖“濒湖万家,鳞次栉比,诚一方之大观也”^①。清代嘉兴府城的人口状况不明。根据日本人《支那省别全志》一书的记载,民国初年,嘉兴城区人口仅有4万人^②。王树槐认为《支那省别全志》对城市人口存在较严重的低估^③。因此,真实的嘉兴城市人口可能超过4万,达到5万~6万人的规模。这一人口数可能与乾隆年间相距不远。因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嘉兴城被害甚惨,“嘉兴自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六日为太平军占领后,迄今已三年又十月。太平军统治浙江府城,当以此为最久”^④,城市人口死亡甚多。民国元年的府城人口,只是对战前人口的恢复。1928年,嘉兴城市人口增至10万。这一时期人口的迅速增加,是在沪杭铁路通车后带来的工商业繁荣所致。民国初年的嘉兴城,尚处于传统经济时代,与太平天国战争前及乾隆时期不会有太多的差别。

据民国二十四年《鄞县志·舆地志》,1855年的鄞县人口为21.4万,1912年增至65万,57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作为一般的人口增长率而言,这一数值太高,是否因宁波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引起呢?同书记载1912年宁波城厢共有人口近14.7万人,即使将宁波城厢人口全部忽略不计,鄞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15‰,显然也太高。如果因外来移民而引起,移民如何会迁入鄞县农村?合理的解释可能是:1855年的鄞县人口数据存在错误,是一个偏低的人口数。

1928年,鄞县人口数增至73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城厢增至21.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3.5‰^⑤。扣除城厢

①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② 《支那省别全志》第13卷,浙江省,第86页。

③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第487页。

④ 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第218页。

⑤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440页。

人口不计,乡村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鄞县的人口增长,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长。

如果从1855年至1912年间宁波府城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912年至1928年同样的速度,则1855年的宁波府城人口约为4万人。然而,民国初期可能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应高于前一时期。我们将1855年至1912年的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得稍低些,如为15%~18%,1855年的宁波城市人口可能为5.3万~6.3万人。估计乾隆时期的宁波府城人口与此持平或稍少,约为5万人左右。

李国祁引光绪三十二年《中国坤舆详志》的记载,温州府城人口为8万人^①。乾隆时期的温州府城人口较此应少得多,但确数难以推算。总之,就以上几个府城人口看来,浙江的府级城市大抵没有偏离江苏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4. 县城

目前笔者所得浙江县治城市人口仅上述开化一县。这仅有的记录透露出有用的信息:浙江山区的县治城市人口稀少,大约仅有2000~3000人。其他地区的县治人口肯定多于开化,究竟为何规模,尚不清楚。查得民国《台州府志》卷4《户口志》引同治八年保甲册,同治八年(1869年)仙居县东五坊1032户,西五坊1313户,合计2345户,以每户5口计,约1.2万。同一书记载仙居遭受过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本卷第十一章估计台州府的人口损失程度大约为30%,即便仙居因僻处山区,所受影响较小,但战前人口肯定较此为多。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县城人口可能在8000人左右。在没有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姑且将每县县城平均人口定为8000人口,低于江苏。

5. 市镇

浙西地区万户以上大市镇的数目大体与苏南相等。就目前研究所知,除上述南浔、乌青两镇外,浙西地区至少有濮院镇、王江泾镇和菱湖镇的常住居民超过万户。按照清代中期江苏城市人口等

浙江府治城市人口的增长与江苏相同。

^① 宣统三年《中国年鉴》,第8页。

级模式,我们称此之大市镇。中等市镇大约为 10 个。

目前尚无人对清代前期浙江各地小城镇进行系统的研究,故无法进行稍为精确一点的研究。《嘉庆一统志》载有 93 个市镇,如扣除其中的若干大中市镇,每县平均只有 1 个小市镇。同样,在《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市镇达到 172 个,是浙江的 1.85 倍。依此比例,结合表 17-5 中的数据,可知浙江小市镇大约为 185 个,平均每县 2.4 个小市镇。这一推测应是合理的。

清代前期浙江城市人口等级与江苏相似。小县城和小市镇:2000 人;大县城和中等市镇:10000 人;府城和大市镇:50000 人;省城:500000 人。这一城市人口等级与江苏相类似,只是缺少一个南京城那样的大都市。如此,可大致估得乾隆年间浙江的城市人口数。详见表 17-6。

表 17-6 乾隆年间浙江城市人口估测

行政等级	平均人口	数量(个)	人口		人口单位:万		
			商业市镇	平均人口	数量(个)	人口	
省会	50	1	50	大市镇	5	5	25
府城	5	10	50	中等市镇	1	10	10
县城	0.8	65	52	小市镇	0.2	185	37
合计		76	152	合计		200	72

粗略估计的结果,乾隆后期浙江城市人口共计 224 万,大大少于江苏的城市人口数。由于浙江总人口远远少于江苏,故浙江城市化水平并不很低。乾隆四十一年浙江人口总数为 2236.5 万,浙江城市人口占 10%。

三、江西

1. 以广信府为例的讨论

府、县治城市。乾隆四十八年《广信府志》卷 2《乡都》相当完整地记载了广信府各县的城市“烟户”和乡村“烟户”。兹将各县城

户数列如表 17-7。

表 17-7 乾隆年间广信府各城市户与乡村户

县 治	总户数	县城户	比例(%)	乡户	比例(%)
上 饶	104163	11134	10.7	93029	89.3
玉 山	35889	3182	8.9	32707	81.1
广 丰	29129	1017	3.5	28112	96.5
铅 山	29175	1813	6.2	27362	93.8
弋 阳	23503	1327	5.6	22176	94.4
贵 溪	38348	1137	3.0	37211	97.0
兴 安	10390			10390	100.0
合 计	270597	19610	7.2	250987	92.8

资料来源:乾隆四十八年《广信府志》卷2《乡都》。

说明:原书中没有弋阳县城户数记载,此据全县户数总额减去各乡户数所得,其余各县县城人口据原书记载。兴安县无县城人口记载,且原书记全县户数为“九千九百四十”,各乡累加数则为10390。各县乡户为各县总户数减去县城户数所得,并非各乡户数累加。

上饶府城的户数达到了11134户,以每户5人计,府城人口达到了55000余人。即使每户人口不足5人,府城人口也接近5万。这一规模符合江苏和浙江的城市人口模式。从全省范围看,广信府辖县不多,人口也较少,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因此,上饶府城的人口规模可以大致视作全省府城人口的平均值。在除省会外的江西各府中,至少有吉安、抚州、饶州、九江、赣州、南安等府的府城人口多于广信,建昌、袁州二府府城人口可能与广信府城等,而临江、南康、瑞州三府府城人口则可能比广信府城少。总而言之,乾隆时期的江西府城平均人口不会少于5万。从这点看,江西府城人口与江苏、浙江府城人口大致相当。

再看县城。在广信府除附郭县以外的六县中,玉山县的县城人口最多。玉山县城分城都和市都二部分,城都在城内,“烟户七百八十有二”,市都辖五图,“烟户二千四百”。该志在“墟镇”部分提及一称作“三里街七里街”的地方,地处“县西门外水陆马头,行铺千余家,江浙闽粤商贩货物由玉过山,雇夫扛运,最为杂器”。由

江西府城人口
规模与江苏、浙
江相近。

于此“三里街七里街”就在县西门外,故可将其视作城市的一部分,即“市都”的一部分。据此也可知,玉山的繁荣是因货物转运而产生的。在五口通商之前,江浙一带的物资出口,大抵从浙江经玉山入赣,经信江—鄱阳湖—赣江越大庾岭入广东。江浙闽粤之间的物质交流,也大抵按照这一路线进行。作为江西边境的最后一座县城,玉山县城颇具赣南大庾县城的地位。因此,该县人口多于广信府其他各县,可从此得到解释。

铅山县因河口镇而著名。但铅山县城并非完全没有地位。相对而言,铅山县城人口多达 1800 余户,人口近万,较广信府其他县城而言,算得上大规模的了。广丰、弋阳和贵溪三县,户数约为 1000 至 1300 户,人口约为 5000 至 6500 余人。由于此三县均地处丘陵地区,与平原地区比较,其人口规模可能稍小。

嘉靖年间因镇抚“盗贼”,设兴安县。兴安县不仅是广信府的小县,而且还是江西省的小县。乾隆年间,兴安县仅万余人口。乾隆《广信府志》中无兴安县城人口的记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兴安县城真的没有城市居民。若以兴安县城居民为 2000 人口计,广信府除上饶以外的六县合计有 8876 户,每县城平均 1480 户,约合 7400 人。可视此为江西普通县治城市的人口数。江西县治城市的人口规模小于江苏而与浙江等。

市镇。乾隆《广信府志》卷 2《乡都》还详细记载了各县的市镇。如上饶县沙溪镇,“县东五十里,通玉山大路,客商取二百余家,东乡农民市易聚集之所”,另有应家口和上泸坂二镇(墟),分别只有“百余家”和“二百余家”。按照本章标准,均无法作城市人口处理。玉山县除了上述之“三里街七里街”作县治城市的一部分处理外,另有二墟,皆一六日为集期,不算镇,类江南地区的“市”。类似的墟,广丰县还有三个。

铅山县属河口镇为清代江西四大镇之一。但相对而言,作为江西四大镇之一的河口镇地位要低一些。从下文所引清末商部大员对嘉道时期江西商业的描述中看,景德镇、樟树和吴城往往并称,而河口则不提及。尽管对历史上河口镇的人口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但新编《铅山县志》估计全盛时代的河口镇大约有 5

万人口^①。这大概是当地人根据镇的面积、街道及当地的口碑所得出的判断,不一定考虑到除常住人口外,还有大批的流动人口。尽管如此,这一估计大体是准确的。

铅山县除河口外,还有石塘镇。石塘镇位于“县东南三十里,界近闽越,地居险僻。流民繁多,土著稀少,其地宜竹,水极清冽,纸货所出,曰毛六,曰黄表,名色不一,而殊无佳者”。外来流民大多来自福建和江西东乡等县,他们大多是纸业工人。另外,该县还有湖坊、紫溪两市,不予讨论。

弋阳在“墟镇”条下注:“弋无墟市,附其村庄之大者。”如大桥,“县西八十里,烟户丛聚,商民千余家,米谷互易”。商人在一个名为大桥的村庄中设市贸易,商民合计千余家。按照本文的标准,这也应该算作一个镇。另一村名为七公圳,“县北七十里,烟户稠密,商民三百余家,米谷互易”。人口不足 2000,不予讨论。

贵溪县的上清镇在县南七十里,“居间数千,横长五里许,山饶竹木之利,店铺数百家,商民贸易最称繁盛”。这一记载将一般居民与商人区别了开来。即使只计算商人的数量,上清镇也可能达到本文的城市标准。再如鹰潭镇,“在大河南岸,距县五十里,旧称鹰潭坊,桂氏徙居此,销盐引。乾隆三十年改神前司为鹰潭司,鹰潭于是称镇。商民三百余家,四境贸易喧盛之市”。人口尚不足 2000,虽然是一个建置镇,但不计作城市。

兴安县县城人口无载,也无墟市。关于其“村庄之大者”,有名“葛源街”者,位于“县北六十里,环源皆山,罗列如城。居民稠密二千余烟,店铺四百余家,产米谷、葛粉、桐油”,可视作标准镇。而另一名姜里村的,有店铺三百余家,亦为市镇。

在广信府辖七县中,只有河口、石塘、大桥、上清、葛源、姜里等六处可以“镇”称之。除河口镇外,其他四镇合计户数约为 3100 余户,每镇约合 500 余户。由于在许多记载中,只记载镇、墟、市之名,而不计其人口,所以,在研究中无法加以判别。如果将称为“镇”者统统统计在内,则可加上沙溪镇和鹰潭镇,平均每镇有 400

^① 新编《铅山县志》,南海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278 页。

余户,约 2000 人。

《嘉庆一统志》记载有大桥、漆工、雄石、江浒、紫溪、汭口、河口、醺口等 8 镇。其中“漆工”即府志中所载“七公”。《嘉庆一统志》和《广信府志》所载只有大桥和河口是相合的。有意思的是,就镇的总数而言,两种记载又是相合的。这说明,《嘉庆一统志》选择入志的标准与地方文献是有差异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广信府的城市人口等级呈如下格局:小市镇为 2000 人,县城为 7400 人,府城及大市镇为 50000 人。这一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与浙江相同。

2. 其他城市

江西省会南昌城的人口不见记载。从商业规模而论,它的人口远不及南京、苏州、杭州等全国工商业中心城市。然在明代,南昌城常被列入全国主要城市之列。如本书第四卷第十一章中所述,清代初年的战争曾经造成南昌城市人口的大量死亡,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遂为吴城所取代。

吴城镇地处鄱阳湖畔的赣江与修水二河的人湖处。顺治年间,“吴城五方杂处,千家烟火,一巨镇也”^①。外省及江西各府县的客商纷纷在吴城设立会馆。乾隆三十一年,官府在吴城设同知署,标志着吴城作为重要商运口岸地位的最终确立。清末商部大员傅春官曾追述嘉道年间吴城的繁盛景象时称:

(江西)市镇除景德镇外,以临江府之樟树镇、南昌府之吴城镇为最盛……货之由广东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分销。四省通衢,两埠为之枢纽……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唯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②

从商业的繁荣程度而言,南昌城的地位远不如樟树和吴城,前者是江西货物的分销中心,后者是江西货物的进口和出口中心。

① 魏双凤《重修望湖亭记》,道光《新建县志》卷 79。

② 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

清代中期,南昌市的商业地位不及吴城镇。

有关研究显示,乾隆自咸丰的百余年间,镇内常住人口 7 万余,流动人口 3 万余^①。梁洪生引当地民谚:“嘉庆到道光,家家喝蜜糖。十八年水没上畷,狗都不吃红米饭”,证明嘉庆、道光年间吴城发展的鼎盛时期。1936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吴城人口在民国十九年时尚有七万余……居民多属纸厂及盐栈工人。”^②如果进入衰败时期的吴城仍保持有 7 万常住人口,那么,鼎盛时期的吴城拥有 10 万常住和流动人口不会是过高的估计。将乾隆四十一年吴城人口定为 7 万也是可以接受的。

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城市,明代初年的城市人口即达 4 万左右,明代末年城市人口还有增长。清初的战争对南昌城市人口的影响很大,但历数十年的和平生息,人口的恢复并不成问题。由于缺少乾隆年间的资料,仅以同治时一条城郊户数作为推测的依据。同治《江西忠义录》册一《济英传》称太平军围攻南昌市,济英称:“今日之战,城中人心稍定,然负城郭数万家无遗类矣。”战争影响的城郭人口决不是远郊的人口,而是依城墙而居的居民,按照本文的体例,他们本来就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以负郭居民 2 万户计,再加上至少同等数量的城内居民,南昌城市居民至少有 4 万户,约 20 万人。估计乾隆时,南昌城市人口可能在 15 万人左右。

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了解樟树镇的常住人口,但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其人口数可能达到吴城的水平。这是因为,樟树不仅是一个江西货物集散分销的中心,而且本身又是一个以中药加工和运销而著名的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这个城市居民的主体。傅春官将樟树、吴城和景德镇三城并称,可见樟树镇的人口不会太少。

景德镇在雍乾之际,已有“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③。清末日本人调查,“据景德镇地方上说法,在必要期其

① 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该文对此项数字来源并未作详细论证。

② 江西省农学院《江西米谷运销调查报告》,第 21 页。此材料据梁洪生函告,谨此致谢。

③ 乾隆《浮梁县志》卷 5《陶政》。

人口超过十万,开窑期间最多达三十万,虽然说是开窑期,恐怕也不过二十万而已”^①。梁森泰认为清代末年景德镇城市人口可以20万计,雍乾间不超过25万人(包括开窑期间的流动人口)。除去流动人口,乾隆年间景德镇的常住人口最多15万人左右。梁氏引《景德镇陶录》,认为至迟在嘉庆年间,景德镇街市的扩展,已“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②俨然一大都会。这也是景德镇能够和朱仙镇、佛山镇和汉口镇并称为四大镇的缘故。

江西的各级城市人口数普遍多于山东。

乾隆时代的江西城市人口等级是这样的:小市镇2000人,县城7000人,府城及大市镇50000~70000万人,省会及全国性工商业市镇100000~150000人。除小市镇外,江西的各级城市人口数普遍多于山东,这一人口等级差别可能更能体现南方和北方人口居住模式的差异。

《嘉庆一统志》记载江西各府共有58个镇,除去景德镇、河口、吴城、樟树四大镇及与湖口县城同治的湖口镇,尚有53镇。康熙《饶州府志》卷4《坊都》记载饶州府除景德镇外,所属7县共有6镇,《嘉庆一统志》记为8镇,相差1镇。乾隆《袁州府志》卷3《疆域·都鄙》记载袁州府属四县,仅萍乡县辖有2镇^③,其他县无。《嘉庆一统志》记载有5镇,萍乡3镇,分宜、万载各1镇。建昌府四县中,仅有新城和广昌分别辖有1镇^④。《嘉庆一统志》记有6镇。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市镇》记载府属八县中,仅有南昌县辖之市汉镇,新建县辖之松湖镇、生米镇、樵舍镇和吴城镇,丰城县曲江镇和奉新县罗坊镇共7镇,《嘉庆一统志》记南昌府亦为7镇。总体上说,《嘉庆一统志》所载与地方志所载相差不多,《嘉庆一统志》中镇人口的标准似乎更为松泛一些。一些市镇可能不足2000人。

① [日]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视察报告》。转引自梁森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② 梁森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第20页。

③ 乾隆《袁州府志》卷3《疆域·都鄙》。

④ 乾隆《建昌府志》卷3《疆里》。

除省会南昌外,全省共有十三府、直隶州,每府、州治城市人口以5万计,合计人口65万;全省共79县(厅),除去与府治合署的14个县,则有65个县城,每县城人口以7000计,则有人口共约45万。省城和江西四大镇的人口数合计约为38万;再加上53个小镇上居住的11万人口,乾隆四十一年江西城市人口总数约为159万。

乾隆四十一年江西人口总数约为1878.3万,江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8.5%。江西城市人口总数与山东接近,但城市化水平却高出许多,关键在于江西人口总数大大少于山东。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决定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是行政单位的设置和区域人口总数的多少。

江西城市人口总数与山东接近,但城市化水平却高出许多。

四、贵州和云南

关于贵州省城,道光二十年《贵阳府志》卷44《食货志略》引《贵阳府志稿》称,“贵筑县城内外保六、四乡里十六”。贵筑县为贵阳府的附郭县,即是省城。贵阳城市六保共计12546户,60576口,户均4.8口。《黔南识略》卷1称:“会城五方杂处,江右、楚南之人多。”《黔南职方纪略》卷1称明代以来,“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相因垒集,置产成家者今日皆成土著”。据本卷第八章,清代中期贵阳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8‰。如果将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4‰,则乾隆四十一年贵阳城人口大约为4.7万。如果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还要低一些,则乾隆四十一年贵阳城人口约为5万。

关于府城,遵义府无疑是贵州最大的府城。道光《遵义府志》卷12称:“按遵义户口,因田起丁,大概未经实算。《桐梓志》云:‘近来城厢内外,何止万家烟火’……今以遵义一县粗计之,府城内外居民户约万余,口几十万。”在本卷第六章中,我证明“口几十万”是不确切的。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大约4万人口。

道光《大定府志》卷40《经政志·户口丁银》称,四门汉民2485户,男妇大小12628口。按3.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至乾隆四十一年,大定府城人口大约只有1万。而据本卷第九章,清代中期

大定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达 9‰ 的高速度。

关于县城,道光《贵阳府志》卷 44《食货志略》记载大塘州判辖地城厢 441 户,2609 口;长寨厅城厢六甲,六十牌,743 户,4576 口;广顺州城厢汉户 1143 户,4631 口;龙里县城厢 1405 户,6812 口。四县合计 3732 户,18628 口,户均 5 口,正合标准。平均每县城 4657 口。乾隆四十一年大约平均每县城为 3700 人,甚至更少。道光《大定府志》卷 40 记载平远县城厢内外居民 775 户,男妇大小 3230 口。与贵阳府的县治人口数差不多。

道光《大定府志》卷 40 还记载毕节县城四门汉民 3225 户,17078 口,县城人口超过了府城。《黔南职方纪略》卷 3 记载,毕节“在前明为毕节卫,府属归流,唯县最久。地居滇蜀两省之间,东抵四川之永宁县,北抵云南之镇雄。威宁各厂运铅至永宁之局,背负肩承,经过县境。居民辐辏,汉多于夷,为郡属中声明文物之区”。明代为毕节卫之驻地,清代因地当矿产运输要冲,使得毕节县城人口远远多于其他县。明代卫的驻地清代多改为县治,但要达到毕节县治那样的人口规模,非要其他因素的介入不可。因此,毕节县的人口规模只有个案的意义。

贵州小县城甚至不能称为城市。

并不是所有的县治都能达到 3500 人左右的规模。《黔南职方纪略》卷 6 记载思州府,府辖四司,“附郭居民不满百家”,连城市都算不上。黔东地区的松桃、铜仁、石阡、黎平及黔西地区的仁怀、普安、兴义等地的情况可能与思州府相同。在计算城市人口时,将这些地区排除在外,只剩 39 个县级政区,6 个府级政区。

《嘉庆一统志》记载了贵阳府 1 镇,镇远府 2 镇,其他地区无镇。每镇平均人口仅以 2000 人计,合计仅 6000 人。

云南的情况总体上应与贵州相似。至今为止,仅获得清代中期 1 个县城的人口数据。道光《大姚县志》卷 3《户口志》称道光二十五年,大姚县附郭五街共有 2845 丁口。乾隆四十一年可能只有 2500 人左右。大姚县位于楚雄府,地处滇中最好的农业区,县城人口如此之少,可以推测偏远地区的县城几不成城市。为此,将腾越、永昌、顺宁、普洱、蒙化、景东、镇沅、元江、广南、永北诸府、州、厅当作一般县治城市,属县则排除不计,余 9 个府或直隶州,55 个

县级政区。加上此 10 个类县治城市,共 65 个县治城市。又设省会和府城的规模与贵州相同,大理府与遵义府的规模相同,就可求出云南的城市人口。根据《嘉庆一统志》,云南无镇。

表 17-8 清代中期贵州、云南城市人口估测

人口单位:万

行政和商业等级	贵 州		云 南			
	人口	数量(个)	人口	人口	数量(个)	人口
省 会	5.0	1	5.0	5.0	1	5.0
大府城	4.0	1	4.0	4.0	1	4.0
小府城	1.0	4	4.0	1.0	7	7.0
县 城	0.35	33	13.7	0.25	65	16.3
小 镇	0.2	3	0.6			
合 计			27.3			32.3

乾隆四十一年贵州、云南的人口分别为 567.2 万和 788.4 万,两省城市人口分别占两省人口总数的 4.8% 和 4.1%。

第三节 对其他省区城市人口的推算

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兹根据已经推算出来的若干省份的城市人口比例,来推算其他地区的城市人口。在推算的过程中,省区的总人口数、中心城市数量和规模、小城镇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我们加以考虑的四大基本要素。只是区域经济水平是无法定量的,只有根据笔者所知,进行综合评估。

例如广西,乾隆四十一年其人口总数为 766.2 万,介于贵州和云南之间,略少于云南。《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小镇数远远多于贵州和云南,达 53 个,接近江西的水平。由于无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故其区域经济水平较低,超过云南、贵州,但低于江西。因此,谨慎地将广西城市化水平定于 5%,可能是适当的。

例如安徽,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总数为 2585.7 万,略多于浙江,

而少于江苏。《嘉庆一统志》记载安徽全省镇数多达 125 个,介于浙江 93 镇和江苏 173 镇之间。上文指出,《嘉庆一统志》所载江苏和浙江的镇存在较大的低估,而安徽,则不存在类似现象,因此,就可以将此数当作安徽真实的镇数。其中有商况记载只有 2 镇,数量太少,不专门加以讨论。安徽缺乏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商品经济水平远远低于江苏和浙江,因此,安徽城市化水平只能定在 5% 左右。也就是说,将浙江的全国中心城市、大中市镇排除不计,且将府城的人口规模减少一半,所得比例与此相同。

乾隆四十一年湖北人口总数为 1617.3 万,略少于江西。《嘉庆一统志》载湖北镇数为 83 个,多于江西。实际上,湖北镇数要远远多于此数。在《嘉庆一统志》记载的巡检司中,有许多就是镇,甚至是著名的市镇。如武昌府的金口镇巡司、浒黄洲镇巡司、白湖镇巡司、簪州镇巡司等,还有汉阳府的汉阳镇巡检司、刘家隔镇巡司、荆州的沙市巡司等。不仅如此,皂角市应属镇的范畴,在《嘉庆一统志》中纳入“市”中。

乾隆年间湖北省会武昌城的人口数量不会少于南昌,且湖北也拥有一批相当著名的镇,虽然不能与景德镇相比,但人口也是相当可观的,即湖北中等镇的数量较多,小镇的数量亦多。所以,湖北的省城人口与镇人口合计与江西相差不多。

本卷第十八章证明清代末年湖北大府府城平均每城人口多达 5 万~6 万,小府府城平均每城只有 1 万余人。即使与乾隆年间的江西府城人口相比,这一规模也是较小的。清代末年湖北县城平均人口为 7000 人,与乾隆年间的江西县城规模相当。如果认为自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湖北的府、县治人口规模没有大的变化的话,那么,乾隆年间湖北城市人口的比例仍较江西为低。所以,设湖北城市化水平为 7%,可能是合适的。

据本卷第十八章,清代末年湖南的府、县治城市平均人口与湖北相当,估计乾隆年间的情况与清末相同。《嘉庆一统志》记载湖南全省有 58 个镇,又有 180 个市。如善化县白岳市,亦称南狱镇。益阳县岐头市,在县西 5 里,商贾辐辏。耒阳灶头市,在县南 8 里,地产煤炭,当往来通衢,多商贾贸易。上堡市,产铅锡,有锡坑 30

余所。常宁县梅埠桥市、衡头市,产锡。白头市,在东安东 20 里,舟车辐辏,为县巨镇。加上这些商业繁荣的“镇”,湖南共有 65 镇,稍多于江西,却大大少于湖北。湖南没有全国中心城市,故城市人口的水平当低于湖北。乾隆四十一年湖南人口总数只有 1525.2 万,较湖北人口略少,因总人口数的不同引起的城市化水平变动不大。就区域经济水平而言,乾隆四十一年,湖南、湖北的水平大体相当。因此,将湖南城市人口的比例定为 5%,庶几适当。如是,乾隆四十一年湖南城市人口约为 91.5 万,略少于清代末年的 104.4 万。

乾隆四十一年广东人口总数为 1844.5 万,与同期江西人口相当。毫无疑问,广州是一个全国性商业中心,佛山则是一个工业中心。广州的人口超过南昌,佛山的人口与景德镇相当,合计广东的全国中心城市及大镇人口可与江西持平。《嘉庆一统志》所载广东的镇只有 26 个,但广东的巡检司数量多达 143 个,许多巡检司驻地实际上就是镇。此与湖北的情况相同。府、县治城市人口数量不明。如果与江西相同或略低,以 8% 的城市人口计,乾隆四十一年广东城市人口约为 147.6 万。

福建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根据清代末年的情况不能推及乾隆年间。乾隆四十一年福建人口(包括台湾)总数为 1377.9 万,远远低于江西和广东。也就是说,即使其城市人口数量不多,但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会太低。《嘉庆一统志》载福建 46 镇,如上加上 4 个有商况记载的“街”和“堡”,镇的总数与江西相当。福建没有全国性中心城市,亦不见有大镇,海禁以来,该地缺乏对外贸易的港口,区域经济水平不高。综合分析,福建城市人口比例可能与湖南持平,约为 6%。

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总数为 1681.1 万,略多于湖北。与湖北比较,四川同样没有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嘉庆一统志》记载四川有 104 个镇,比湖北略多。区域经济水平,四川与湖北大体相当。因此,将四川城市人口定为 7%,有人口 117.7 万。

据此,可将乾隆四十一年全国各省区城市人口列如表 18-9 (见本卷第 828~829 页)。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资料缺乏,本

章关于云南、广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的城市人口估测是相当粗略的。欲对这几个地区的城市人口重新进行更为精确的估测,希望能够发现更多的资料,发明更好的方法。

辽东、吉林、黑龙江、西藏、青海、蒙古等地未计入统计。事实上,乾隆四十一年这些区域还少有城市,谈不上城市人口。如将这批人口全部计入,中国城市人口总数为 2273.4 万,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7.3%。明代初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9.7%。明代初年的城市人口比例较高,并不是说当时的城市人口数量多,而是全国人口总数少。

第十八章 清代末年城市人口

第一节 施坚雅研究评析

1977年,施坚雅发表《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①一文。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施氏提出了将19世纪中国划分成八大经济区域的理论,并对每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关于施氏的分区理论,学界讨论颇多,但对他所采用的历史学方法,则少有论者议及。本文就此详作评析如下。

施坚雅说:

为了分析1893年的中国城市,我准备了一个逾2500张资料卡片的综合材料档,其内容包括下列范围的每一个城镇:
1. 在1893年至1953年这60年间的任何时期曾起过县或较高级城市作用者或被定为自治市者;2. 在这60年间的任何时期发挥地方或更高一级城市的经济中心性功能者;3. 在清末20年间人口达到4000或4000以上者;4. 1953年时人口在50000以上者。

关于这一城市标准,我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已有详细讨论,认为这一标准与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划分城镇的标准在原则上吻合的。对于清代中后期的城市来讲,只有2000人以

读者有理由追问施坚雅2500多张资料卡片的具体内容。

^① 载于〔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4~91页。

下的小市集或小市镇才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施坚雅又说：

施坚雅对资料的说明，限于原则，而非实际。

有关本材料中城镇的人口估算及其他可反映中心性功能的数据都是从浩繁的资料中系统地搜集与整理出来的。每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所处类型及主要衙门的高级职位等，都按1893年为限加以收录。大多数首府性城市的城墙长度与形状也经过验证。每一个城镇的邮政级别则是按1915年为界加以收录的，其中包括邮局或邮政代理处的级别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情况。还有800个城镇的资料取自于岛本度开所编辑的分省地名词典，该词典是按1915年的情况收录的。对于反映某些城市规模和功能的资料，还核对了200多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府县地名索引^①，有关1840至1910年间的情况，则参照了较可靠的西方观察家的游记等；直至1920年的贸易统计资料也编辑整理，以备查用，同时也努力考证了较重要的商业市镇中商人会馆的数目。为了避免对人口和经济功能等数据分析时发生年代性错误。任何城镇，只要是1912年前曾通航或铺设铁路的，对此类情况的日期、地点都加以收录。

对于施坚雅上述观点，在《中国移民史》中，我曾评价道：“这一考虑周全的城市人口估测方法应当是无懈可击的，只是至今，我们无缘获读他有关所有城镇人口的考证，也不了解这数千个城镇的名称及资料由来。这就是说，在各种资料中，我们并不清楚究竟哪些聚落被他定为城市，又有哪些不认为是城市。当他的统计与其他学者的统计不一致时，我们很难作出清楚的判别。”由于施坚雅从未将他的“逾2500张资料卡片的综合材料档”公布于众，所以，尽管我在总体上对施氏的观点是肯定的，但仍有所保留。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对施坚雅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发现施氏对城市人口估测的方法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相反，却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思考的结果是，我对施氏所采用的资料产生了根本性的

^① 即地方志。

怀疑,由此也对他关于中国城市体系的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我的理由如下。

其一,关于城墙的长度和形状。在本书第四卷所进行的明代城市人口的研究时,笔者也曾考虑过以城墙的长度推测城市人口。这一做法的依据有二:其一,一定量的人口总是居住在一定长度的城墙里;其二,东南地区许多城市的城墙兴建(或重建)于明代初年,明代中期为防倭寇,大批未设防的城市纷纷兴建城墙。如果我们能在城墙的长度与城市人口之间找到一定的数量关系,就可以通过各地城市的城墙长度来测算城市人口。

以丹阳为例,“明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内犯,知县陈奎始筑内城,周回九百七十九丈,径三百三十三丈,高二丈二尺”;次年,倭寇又来犯,“突犯河庄城下,内城既筑,市民遗于外者十之七,居人患其隘”。于是政府于城外增修土城,“周回九里十三步”^①。这一叙述充分说明了城市居民与城墙的关系,但“周回九里十三步”却令人生疑。因为,有许多地方的城墙长度与此相同,或写作“九里三十步”、“九里一百三十步”^②。如在相邻的丹徒县治京口城(今镇江市),“正德志城周九里有十三步”,可是光绪年间的测量则有“十二里四十八步”^③。京口城最早筑于三国孙吴时代,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以元帅耿再成守镇江,依旧址重建,洪武元年砌以砖石。因其为砖墙,故至光绪年间,仍可觅其旧址。光绪年间的测量不会发生错误。问题在于,为何正德年间的地方志仍称该城为“九里十三步”?类似的记载令人怀疑丹阳县的城墙长度是否是真实的。如果有足够多的记载,并根据现代的测量,对明代城墙的长度进行分析、比较,或许能找到城墙与人口的关系。但是,这类记载实在是太少了。依据此类资料我们尚不能对城市人口进行有价值的研究。

对于清代城市而言,运用城墙长度进行城市人口的研究更是

城墙长度不可用来推测城市人口的规模。

① 光绪《丹阳县志》卷4《城郭》。

② 在南直隶江苏境内,据我所见,至少有仪征、宜兴、宝应、海州等县城就是同样的长度,浙江的嘉兴府城、平湖县的乍浦城、诸暨等城皆是。

③ 光绪《丹徒县志》卷3《城》。

不可能的。明代的城墙至清代并没有多大变化,但城市人口的居住范围早已越过城墙的约束,大部分居民不是居住于城墙之中,而是居住于城墙之外。在许多地区,居住在城墙外的城市居民可能是城墙内居民的数倍。因此,在这一时期,根据城墙长度已无从对城市人口进行任何有价值的推测了。另外,我们也看不出城墙的形状与城市人口的数量有什么联系。

何以证明日本人对城市人口的观察是可靠的?

其二,施坚雅没有交待“岛本度开所编辑的地名词典”是一本什么性质的著作,也没有说明这部词典所收中国城市人口的条目为什么说是可靠的^①。我猜测这是一部日本人编辑的中国地方志书,类似于广为学者引用的《支那省别全志》。在后一部著作中,我们知道,即使是对于民国初期的城市人口,日本人也只根据当时中国人的估计或日本人的估计数推测得出,有些推测大体符合事实,有些推测则与事实相距颇大,遑论对于光绪年间的城市人口的推测了。对于各种来源不同且相差甚大的数据,采用何种标准进行取舍,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风险的工作。规范的做法是,作者不仅要人口判定标准作原则性的说明,还要举例说明所定原则的具体运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根据同样的资料复原作者的工作,即有利于读者或其他研究者对作者的工作进行检验。可惜的是,对于2500个城市人口的证明,除了作者所作原则性说明(详下文)外,读者并不真正知情,遑论对这些资料进行检验了。

“游记”的可靠性亦成问题。

其三,施坚雅称:“有关1840至1910年间的情况,则参照了较可靠的西方观察家的游记等。”暂且不说这种“游记”会有多大的准确度,仅从数量而言,这些“西方观察家”在这一时期所能观察到的城市必定是少量的,记载下来的就更少。然而,在施坚雅的研究中,1843年的研究已经和1893年的研究构成完整的系列。我们有理由认为,依据不多的西人游记,不可能将光绪年间的城市人口,全面回溯到道光年间。按照我的研究经验,要完成这样一种难度极大的回溯,就要对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发展变化的规模有切实的了解。而就施坚雅的研究来看,很难说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① 笔者曾托日本学者在日本搜寻此书,未获。

或有人问,是否根据作者对城市人口判定的标准就可以复原各类城市的人口呢?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为此,我们不妨对作者的标准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

施坚雅接着说:

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每一个中心地都根据一些标准进行归类,其中有三个标准需要在此说明一下,即:人口级数、城市行政级别、城市的经济水平,所有的推算都以1893年为准。市镇的人口推算,除了那些最大的城市外,一般都是粗略估算,而不是特定数字。为了简化推算程序,便于计算,我确定的人口级别间隔的尺度是,每一等级的上限为其下限的两倍。同时,为了避免人口等级界限与人口推算时常遇到的整数相重合(10000、20000、25000、50000、100000等),我使用了下列数字系列:1000、2000、4000、8000、16000、32000……

施氏的这种“每一等级的上限为其下限的两倍”的“人口级别间隔的尺度”可能源自他引用的济弗的观点。“G·K·济弗(G. K. Zipf)曾注意到在城市规模分布中有一套统计规律:如果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城市按其规模大小排列,那么,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多半相当于第一大城市的一半,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可能相当于第一大城市的三分之一,余此类推。”细心的研究者可以发现,济弗的经验理论与施坚雅的两倍级差间隔理论不完全相同。按照施氏的观点,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应当为第一大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济弗认为是三分之一。按照正常的研究程序,在引出济弗的观点以后,研究者应该通过中国的实例来对济弗的理论进行证实或者证伪。然而,施坚雅却不是这样做的,他将他自己通过设定人口等级所推得的城市人口数——而不是实际的人口数——代入济弗的模型,然后对各区域的城市中心地级别——规模进行讨论和比较。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自我循环式论证。如果施氏采取的不是“人口级别间隔的尺度是每一等级的上限为其下限的两倍”,而是与济弗相同的标准,即“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多半相当于第一大城市的一半,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可能相当于第一大城市的三分之一”,则各

济弗的模式源于对西方城市的统计。

大区域的城市人口级别——规模则可与济弗的理论完全吻合。至于施氏为了避免整数相重合而使用了下列数字系列：1000、2000、4000、8000、16000、32000……以此作为各级城市人口规模的约数，这种推测人口的随意性令人觉得他不是在进行研究历史，而是在任意地编造历史了。

对于清代中国城市行政等级的问题，施坚雅说：

我在《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清代中国城市的行政地位，在这里使用一种较简明的三级分类就足够了，即：高水平城市、低水平城市、非行政性中心。第一类包括府和直隶州的治所，当然也包括帝国首府和省府，它们同时也是州府所在地。第二类包括县府、散州治所和次州府级有厅治所，普通型和自治型的都计算在内。

这一陈述容易误导读者，因为其分类的标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显得过于粗糙了。例如，将帝国首府、省府和府、直隶州的治所划为一类，其人口的规模可能在100万人至1万人之间。人口数量的跨度之大，令人瞪目。另外，将所有非行政性中心划为一类，也是极不妥当的。众所周知，清代的非行政性市镇中，有的市镇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如景德镇、佛山镇等，人口可以10万计，而大量的小市镇可能不足1000人。

实际上，在《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一文中，施坚雅将“在行政等级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所处不同等级的中心地”划分为中心性大都市、区域性大都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性城市、中心性集镇、中等性集镇和普通性集镇八类。城市的行政等级是比较容易确定的，而城市经济等级的确定却要复杂得多，从原则上说，经济发达城市的人口多，而经济不发达城市的人口少。对于如何确定一个城市的经济等级，施坚雅指出：

在经济等级中，中心地的水平（或级别）划分的依据是城市的功能强弱，诸如处一特定水平（或级别）的中心（即城市）向下一级较低水平的中心提供它们所不具备的货物和服务，同时也提供下一级城市能够得到的某些不太专业化的用品和

服务。每个水平上城市所能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笔者按)并非完全一致。

这一分析是相当精彩的。换言之,我们通过城市所设商店、手工业作坊的类别和服务业的类别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所处的经济等级。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为读者提供这一方面的任何实例。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作者是否真的进行过这一极其复杂的定位工作也持有怀疑的态度。

没有具体的实例,我们怀疑施坚雅是否从事过这一分析工作。

无论如何,施坚雅上述城市等级划分不可以用来作为人口等级划分的尺度。也就是说,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与人口等级吻合的城市行政或经济等级。所以,在本卷第十七章的研究中,笔者采用区域城市人口模式的构造方法,来估算乾隆时期各区域的城市人口。本章方法相同。为了便于比较,本研究的标准时间也定在施坚雅确定的 1893 年。

第二节 北方城市人口

在乾隆年间北方城市人口的研究中,我以许檀的研究为基础,构造了乾隆年间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并推广至华北各省。在研究清代末年的华北城市人口时,也应当以山东为例,构造清代末年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可遗憾的是,有关清代末年山东城市人口的记载甚少,这一构想得不到文献的支持。

一、直隶

直隶文献中的城市人口记载较多,兹分析如下。

1. 宣化府

乾隆《宣化府志》卷 10《乡都·户口》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各属州县治所城市及乡村的户数、丁数和口数,具体数字见本卷第十七章的有关分析。幸运的是,同治《西宁县新志》卷 4《赋役志》、光绪《保安州续志》卷 1《户口》和分别记载了清代后期两县分城乡户口数,使得我们能够明了了这一地区城市人口的变化,详细的比较见表

18-1。

表 18-1 清代直隶西宁县、保安州城乡人口的变化

地 点	乾 隆		同治和光绪	
	户	丁口	户	丁口
西宁县			13029	67792
本城并关厢	2499	14342	4810	25324
东路	2653	12644	4191	21912
南路	3877	17489	2185	11484
西路			1001	5002
北路	710	3302	842	4070
保安州	6069	24174	11446	58097
本城并关厢	2223	7669	2998	14063
东路	1281	5064	2724	15391
南路	2120	9512	3874	18987
西部	201	846	1209	6184
北路	244	1083	641	3472

资料来源:乾隆《宣化府志》卷10《乡都·户口》,同治《西宁县新志》卷4《赋役志》,光绪《保安州续志》卷1《户口》。

暂且不论因女性人口过少造成的数据错误,也不对这类错误进行修正,仅就两个年代的数据比较来说,西宁县城的户数增加了92.4%,人口增加了76.7%;保安州州城户数增加了34.9%,人口增加了83.4%。从两州县户口总数的比较来看,增加的比例大体与此相近。以年平均增长率计,约为6‰。

据表17-2,乾隆年间,蔚州城和蔚县城的户数合计为2554,丁口数为10556。据光绪《蔚州志》卷7《赋役志》,至光绪三年(1877年),蔚州“本城”及“关厢”户数合计为12148,口数为73749。户数增加约5倍,口数增加约7倍。乾隆年间,蔚州(含蔚县)的总户数为29126,总口数为131277,光绪三年,户数增至49839,人口数增至300080,户数增加不足1倍,人口增加不足3倍。蔚州城市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乡村人口的增长,其原因可能

在于清代后期对俄国的贸易,使蔚州城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此情形犹如张家口之崛起。所以,城市人口增长迅速的蔚州不能作为一般县治城市的代表。

康乾时期作为口北三厅之一的张家口厅,在对俄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至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商埠。只是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以恰克图(今在俄罗斯境内的街区仍称恰克图,在蒙古国境内者已改名阿尔布拉克)为边境口岸的中俄贸易一直开开停停,与此有关的城市发展也极有限。1792年中俄《恰克图互市》条约重新缔结以后,中俄恰克图贸易稳定了至少60年。张家口的商业也就在此时达到了它的顶点。可惜的是,至今尚未查获有关这一城市的人口记载,对于这一时期的城市规模不甚明了。目前所见,只有一条民国年间的记载,民国十二年,万全县人口123887人,张家口人口为127045人。民国二十二年,万全县人口为92908人,张家口人口为78036人,万全县及张家口之人口均呈大幅下降之势。县志作者称:“究其原因,皆生计困难之所致。生计困难,原因虽多,然不外灾害并至,商业不振。盖我县除张家口外,完全仰赖于农,五六年来,连年荒旱,农村破产,农民逃亡,络绎不绝。至张家口本为北方著名之商埠,自中俄失和,库伦不通以来,百业凋敝,相继倒闭,工人失业,商民他徙,以言农,则农村破产,人皆逃亡,以言工商,则失业流离,故人口骤减。”^①县志作者将张家口的衰落归结为中俄冲突引起的国际贸易危机。事实上,张家口的贸易危机起始于光绪九年(1883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全线通车。以前通过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恰克图——俄国的贸易路线,至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俄商通过天津转口,取水道至海参崴,再转火车运输。这一商路的运费低廉,远非陆路运输可比。此前中俄商人共同经营的局面,几为俄商所垄断^②。作为陆路运输重要枢纽的张家口不可避免地衰

中俄冲突导致
张家口衰落。

① 民国《万全县志》卷3《生计》。

② 关于中俄交涉及商战的内容,参见葛贤惠《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落了。

这样说来,张家口的衰落并非始于民国十二年以后。民国十二年至二十二年之前的城市人口锐减,是光绪九年以来张家口衰落过程的一部分。据此估计,1893年的张家口城市人口当远远超过民国十二年的人口,至少在20万人左右,1893年以前的张家口城市人口理应更多。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光绪三年蔚州城的人口达到7万余人的规模完全是可能的。

如果真如民国《万全县志》作者所称,万全县农村人口以农为生,张家口贸易的衰落并不会引发如此大的农村危机。真实的原因应该是,张家口城市的发展已经对周边农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量农村人口虽不居住于城市,却从事与城市有关的职业。城市衰落,与之相关的行业也必定衰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西宁、保安及蔚州的城市发展,都与张家口商业的发展有关。

如本卷第十七章所说,作为宣化府府城的宣化城,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城市居民多达4万口。当张家口及周边城市因国际贸易而获得大发展时,宣化府城的人口也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只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具体人口数不甚明了。1953年作为省辖市的宣化城,人口多达11.4万,人数仅次于张家口、保定和秦皇岛。据此可推测清代末年的宣化府城人口可能超过西宁,达到10万人的规模。从乾隆二十二年至清代末年,宣化府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5‰。

民国二十三年《怀安县志》卷2《自治·户口》记载治城镇(即县城)共有2722户,11885口,其中男性6127口,女性5758口。如果上述推理能够成立,则光绪年间及其以前的县城人口可能更多。从下文中可知,即使是这一数据,民国怀安县城的人口也已经远远多于河北中部其他地区的县城人口了。据本卷第十七章,乾隆二十二年,怀安县城口数为6181口,如清末怀安县城人口为1.3万,从乾隆二十二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5‰。

乾隆四十一年宣化府人口为74.6万,1953年为211.9万,177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9‰。从上述各城市的人口增长

宣化府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中国北方边贸发展的结果。

情况看,在宣化府,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北方边贸发展的结果,不代表直隶或中国北方城市人口发展的一般水平。

2. 承德府

宣统二年《承德县志》第三类《户口志》称:“县境居民籍贯有六,第一满洲籍,谓土著之人,自北满洲来者;第二为蒙古籍,谓自蒙古来者;第三为汉军籍,谓汉人之投充军籍者;第四为民籍,为人承德之户籍者;第五为回回籍,自西域来者;第六为客籍,谓官商之侨居于此者。”城关各处六类籍别户口数见表 18-2。

表 18-2 宣统二年承德城市分籍户口

籍 别	户	男	女	总人口
满 籍	1564	3449	3505	6954
蒙 籍	282	915	857	1772
汉 军	3568	7699	7750	15449
民 籍	7802	17943	17413	35356
回 籍	1013	3971	2662	6633
客 籍	7782	18695	13902	32597
合 计	22011	52672	46089	98761

资料来源:宣统《承德县志》第三类《户口》。

在承德县的六类人口中,只有回籍和客籍的男女性别比是失调的,其他如满、蒙、汉军及民籍四类人口则保持平衡。对于满籍和汉军来说,女性人口甚至多于男性。由此可知,客籍人口性别失衡的原因,在于旅居塞北的商人大多将眷属留在了家乡。据此,我推测所谓的回籍人口也主要是经商为业的。另外,县城居民的户均人口为 4.5,属于正常的范畴。

在承德城的近 10 万人口中,客籍和回籍人口总数为 39230 人,占全城人口的 40%。这批商人,可能是在乾隆以后的岁月里,随着中俄贸易的展开而迁入的。作为商业城市的承德,其崛起的原因与张家口相同。

3. 永平府

临榆县城人口较多,与地处交通要道有关。

光绪二年临榆县有 31576 户,156971 口,县城 3133 户,19410 口^①。全县户均口数大约为 5,表明户口调查的质量较高,县城户均口数超过了 6,可能高估。按标准的户均口数计,临榆县城户口约占全县户口的 10%,是一个较高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临榆地处山海关下,为华北进入东北的重要通道,无论从交通还是从商业方面考虑,临榆的地位都不是其他县治所能比拟的。临榆县城人口众多,实由于此。

民国十四年的清查结果是,全县 46928 户,男子 123523,女子 116835,合计 240358,户均口数为 5,性别比为 106,符合正常的户口比值和性别比值。县城内共 3354 户,男丁 9497,女口 7515,合计为 17012 人,户均口数为 5,性别比为 126。城市人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流动人口较多,性别比偏高亦在情理之中。从光绪二年到民国十四年的半个世纪内,临榆县城内的人口增长速度只有 1.6‰。这一结果可能暗示着在此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临榆县城内的人口已经不再增长了。然而,与此同时,临榆县的人口增长却保持着 8.7‰ 的高速度。这一数据或谓不可信,然据表 16-1,1910 年至 1953 年永平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4.1‰。无论如何,永平府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都不及同期人口的增长速度。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滦州清查户口,全州共计 75697 户,男女大小 561667 口^②。户均口数过多,不知问题何在。这次调查以村为单位进行,街关居民合计为 609 户,4168 口,所辖 13 个村庄合计 312 户,1917 口,街关人口与村庄户数合计为 921 户,口数合计为 6085 口,村庄户数约占城社总户数的 34%,口数约占 31%。这里的村社人口,大体可以看作城市的郊区(近郊)人口。滦州州城户口数约占全州户口数的 1%,是一个极低的比例。如果认为滦州的人口增长模式与临榆县相同,我们就可以说,在自乾隆以来的百余年间,在滦州人口增长的同时,州城人口的增长并未

① 民国《临榆县志》卷 14《赋役篇·户口》。

② 光绪《滦州志》卷 13《赋役·户口》。

与之同步。因此,到光绪年间,州城人口在全州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水平。

4. 保定府、正定府和河间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雄县全县共有 17936 户,92868 口,其中“城关六铺”有 837 户,4535 口^①,县城户口占全县户口的 4.6%~4.8%。雄县县城的人口数,与乾隆时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光绪七年(1881年)的调查表明,与雄县毗邻的新安县“城关共编户一千五百十八”^②,推测人口可能为 7500 人左右。

望都县的情况大体如是。光绪三十一年《望都县乡土图说》在“城垣图说”中称县城仅有“一百三十余家,六百余口”,是年全县户数“约计一万二千余家,男妇约六万余名口”。1953年望都县有 165410 人,光绪三十一年数据显然低估。按照 4‰ 的年平均增长率,光绪三十一年望都县人口约为 13.7 万。县城人口如果也是低估的话,按同一比例,人口亦不足 2000,尚不能称为城市,县城人口仅占全县人口的 1%,也是一个很低的比例。乡土志的作者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望城南行三十里为定州清风店,北行三十里为满城方顺桥,皆巨镇也。富商大贾,多所归往。邑城处两镇之间,地面瘠苦,生产稀少,货物之销路稽迟,故商务极为寥落。每逢四九集场,各乡农民,车载背负而来者,除粮食布匹果实外,别无他物。只以地当孔道,为商旅出入之途,故向年宿店一业,颇见兴盛,近遭庚子之变,加以铁道之通行,此业亦成弩末,空庭落寞,久作往来差役之传舍矣。城内巨商,向称盐当,庚子后,当商久歇业,屡经绅士议举,卒以无力而止,其可称者,独盐店耳。然领引者,系客籍,非土著也。

望都县地处保定以南大约 35 公里处。保定商业本不发达,但因地处交通孔道,南来北往的商旅驻足于此,旅店业尚有一定的规模。铁路的修建,使传统的交通路线发生了改变,望都县城

① 光绪《雄县乡土志》第六《户口》。

② 民国《新安乡土地理·户口》。

更趋衰落。不仅是望都,铁路的修建使得作为省会的保定也一蹶不振。

所以,在正定府之赞皇县,光绪二年《赞皇县志》卷7《户口》记载“在城四街”共431户,男1242丁,女1073口,“三关”165户,男482丁,女382口,合计城市人口为3179人。是年全县共10171户,男27956,女24378,县城户口约为全县户口数的6%。1953年赞皇县人口为97836,光绪二年至此年平均增长率为8.2%。光绪二年的口数略有低估。即使对光绪二年的口数进行修正,但无论县城人口的比例还是县城人口规模,较之乾隆时期,都没有明显的增加。

在原属正定府的冀州新河县,光绪元年共有11467户,61494口,城内并东关、西关和南关的户数合计为459,口数为2279^①。1953年新河县人口为99912,光绪元年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2%,即使光绪元年的数据有所低估,但低估的幅度不大。新河县城人口只达到作为一个城市人口的最低值。

光绪二十八年,介于保定、正定二府之间的定州城有“大街六,关三”,“户八百三十有奇,商民杂处,丁口五千三百三十有奇,流寓寄籍同编于册”。这是一次相当完全的人口调查,只是户均人口偏多,令人对其调查质量有所怀疑。然而,作为比普通县城略高一级的州城人口仅5330人,就可反证保定中部普通县治城市人口确实不多,总体水平甚至略低于乾隆时期。

河间府的县城人口可以盐山县为例。民国《盐山县新志》卷7引同治《盐山县志》,“在城区(铺)”共402户,“男女大小”2827口。户均7口,令人怀疑这一次调查的准确性。仅就此数字看,盐山县城的人口远未达到标准县城的规模。

总之,光绪年间保定、正定、定州、冀州共六个州、县级城市共有23000余人,平均每个县城的人口数不足4000。即使有所漏载,以每县平均人口5000人计,这一人口规模也只达到乾隆年间同等城市的水平。换言之,在未受到新的商业、工业或交通路线影

在未受新的商业、工业或交通路线影响的地区,城市人口几无增长。

^① 民国《新河县志》下编《社会经济》。

响的地区，城市人口并未随各地人口的增长而增长。

5. 其他地区：民国年间的资料

清代属于顺天府的固安县，民国三十一年《固安县志》卷1《地理志》称，“城内四镇”，共815户，4413口。所谓“城内四镇”，实指东街第一镇，南街第二镇，西街第三镇，北街第四镇。“镇”即街的别称。固安县城的这一人口规模，未超出乾隆年间的直隶县治城市的平均水平。

清代景县属于河间府。民国二十一年《景县志》卷1《疆域》分东门大街、西门大街、南门大街、北门大街、南关大街和北关等六处分别记载男女人口，合计877户，男性2361人，女性1907人，共计4268人。这一人口规模，尚未达到乾隆年间的水平。

再如河间府所辖之献县，民国十四年《献县志》卷3《舆地志》称“在城地方”包括一城两关二十七村，如27村不计，一城两关的户数为643户，大约为3200人。27村合计约有1500户，是县城户数的2倍有余。显然，将村庄户数全部计入是不妥当的。如果按照近郊人口等于城市人口30%的比例计入，则民国献县城市人口约为4000人，亦不足乾隆年间县城人口的平均水平。

再看通州，作为运河沿岸重要转运码头的通州城，明代就是一个著名的城市了。清代的人口不见记载，民国三十年《通县志要》卷5《赋役·户口》称，民国二十五年第一警区共辖8816户，男28606，女21256，合计49862，即约5万人。查该志卷1《疆域》，所谓的“第一警区”所辖除东关、南关、北关、西北城、东北城、新南街、东南城、西南城、西关等与城市有关的地名外，还辖有桥庄、复兴庄、小圣庙三处可能是村庄的地名。也就是说，“第一警区”所辖即为通州城。这一城市人口规模与乾隆时期的济宁等沿运城市大体相同。我怀疑乾隆年间通州城市人口可能即在5万左右。

总之，至清代末年甚至民国年间，除了宣化、承德等地外，直隶大多数县城人口数仅同于乾隆年间。百余年来，直隶的大多数府、县治城市人口几无增长。

6. 北京和天津

根据韩光辉的研究,宣统二年北京内外城与城属人口共112.9万人^①,乾隆四十六年至此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909年《天津志》记载的天津城市人口为42万。

7. 小结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业或商业的强有力的推动,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的一般府、县治城市人口未见增长,城市的规模未见扩大。对于市镇而言,如前所述,清代中期直隶的大镇均与运河运输有关。清代后期,运河运输业式微,与此有关的市镇,虽不说随之衰落,发展总是不可能的。

天津和张家口是直隶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两城人口增长合计多达40余万人,如加上宣化和西宁两城,此四城人口增长达到50余万。此外,宣化府属县及承德府城的人口增长也很可观,乾隆后期直隶城市人口约为223万,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可能使得至清末可能增加60万人,即为283万。

1910年直隶人口约为3732.8万,回溯至1893年,大约为3396万,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3%。这一比例已较乾隆年间大大降低。究其因,则在于直隶大多数地区的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山西

光绪三四年间发生的特大旱灾对山西影响极大,以至于清代末年,不少地区乃至不少城市的人口,大大少于清代中期。山西清代末年的户口数据,如本卷第十五章所说,大部分是可靠的。

在山西南部解州的平陆县,乾隆二十九年本城只有623户,共4169名口。光绪六年(1880年),查本城三坊里十四村计788户,共3357口^②。从这一组可资比较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以后,却因一场大灾,平陆县城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

从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直隶地区城市化水平降低。

光绪大灾中,山西城市人口锐减。

^①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第128页。

^② 民国《平陆县志》卷4《户口》。

反而减少了 20%。

在蒲州的虞乡县,乾隆三十七年“本城四坊”共 419 户,1834 口。“光绪三年大祲后,查明本城四坊户口数”共 141 户,469 口^①,与乾隆年间县城人口相比,减少了 75%。

蒲州荣河县的情况大体相似。光绪六年,全县总人口只有 11861 户,58299 口,口数较乾隆二十九年的 130516 口减少了 54%。考虑到乾隆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年间的人口增长,在光绪三四年大灾中,荣河县人口损失的比例肯定不止此。光绪六年,荣河本城只剩 538 户,2477 名口^②。

猗氏县(今临猗县)的记载最为详细。它不仅有灾后各坊的人口记载,而且还有灾前的分坊人数。详见表 18-3。

表 18-3 猗氏县光绪三年、光绪六年县城户口

坊名	光绪三年		光绪六年	
	户	口	户	口
贵戚	444	1886	270	984
崇道	142	539	68	251
三相	158	663	109	370
兴教	374	1607	229	839
合计	1118	4695	676	2444

资料来源:光绪六年《续猗氏县志》卷上《户口》。

城市户损失了 40%,人口损失了 48%。以全县计,光绪三年有 34630 户,127819 名口,光绪六年存 16250 户,60384 名口;户数损失了 53%,人口也损失了同样的比例。相对而言,城市人口损失的比例略小于乡村,城市中死绝户的比例更小于乡村。

在绛州,光绪《直隶绛州志》卷 4《户口》称:“今之户口较之道光、咸丰之间,不过十之一二。”卷 11《杂志》称:“村庄户绝半,人十

① 民国《虞乡县志》卷 3《丁赋略》。

② 光绪七年《荣河县志》卷 3《田赋·户口附》。

毙六七。”本州正平、孝义、安元、桂林四坊和北关、西关、南关共计 812 户, 3420 口。如以人口损失 60%~70% 计, 灾前绛州州城中的人口大约有 5000~6000 人。大灾过后的绛州垣曲县, “本城二坊共七百零一户, 共二千二百六十五名口”^①, 刚够得上城市。

平阳府襄陵县在“光绪三四五等年, 岁遭大祲, 人多户绝, 地多荒芜”, 人口从 15.5 万降至 9.7 万, 人口损失大约三分之一。这一年“城关十社”共 1611 户, 5125 口^②。相对而言, 襄陵的人口损失已较平陆、虞乡、荣河等县为轻, 县城人口仍有相当规模。吉县的“上坊”只有 353 户, 830 口, “下坊”仅存 96 户, 424 口^③。从户均口数上讲, “上坊”户均口数太少, 如达到“下坊”同样的水平, 则县城共有 449 户, 接近 2000 口。一首竹枝词这样形容道: “城小如龟市号蛇, 傍山临水数人家。东藏西住浑无定, 点缀疏林是散鸦。”^④ 相当生动地描绘了吉县县城城小如豆, 人口稀少的状况。

城小如豆, 人烟稀少。

光绪八年潞安府之长子县实在户为 36683, 口数为 140962, 本城户数为 1250, 口数为 8039^⑤。这一数据虽无以前时代的数据可资比较, 但与上述各县同时代的数据相比, 潞安府受光绪大灾影响较轻, 人口损失较少, 其城市人口仍有较大的规模。

合而计之, 光绪大灾之后山西南部九县县城的每县平均人口约为 3400 人, 至 1893 年, 此九县县城的平均人口可能会有所增加, 但增加的幅度不可能很大。如蒲州府之临晋县, 1923 年的县城户数仅为 406, 口数为 1580^⑥。再如平阳府之曲沃县, 1927 年也仅仅有 818 户, 3767 人。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能对晋西南地区县城人口做过高的估计。

从光绪三年猗氏县城的人口数中可以看出, 就是在大灾之前, 山西县城人口也是不多的。另外, 大灾前的绛州州城人口可能不

① 光绪《垣曲县志》卷 4《户口》。

② 民国《襄陵县志》卷 3《赋税丁役略·户口》。

③ 光绪《吉县志》卷 2《赋役·户口》。

④ 同上书卷 8《竹枝词》。

⑤ 光绪《长子县志》卷 5《赋役志·户口》。

⑥ 民国《临晋县志》卷 1《区村考》。

足 6000 人。吉县在光绪大灾中“十分几毙七分之数”^①，县城人口的损失若与乡村人口相同，则灾前县城人口可达 6600 人左右，若损失低于乡村人口，以 50% 计，灾前县城人口则约为 4000 人。这三县的数据都可以证明乾隆后期以来的百余年间，山西南部县治城市人口如果没有减少，至少也不会增加。晋东南地区和北部城市人口有所增长，因此，可以认为乾隆以后至光绪大灾发生前，山西城市人口的增速是缓慢的。清代中期山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4‰，设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1851 年山西城市人口约为 147 万。

1910 年山西人口数为 1186.7 万，估计 1893 年为 1003.5 万，较乾隆四十一年 1226.2 万有所减少。将 1893 年山西人口与灾前的 1851 年相比，人口仍减少 36.6%。如果城市人口等比减少，1893 年山西城市人口仅有 93.2 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的 9.3%。也就是说，光绪大灾中山西城市人口虽然大幅减少，但乡村人口也在大幅减少，故其城市人口的水平较之乾隆四十一年，并无太大的变动。这再一次证明，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城市人口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区域内的人口总数决定的。

山西城市、乡村人口如果同比减少的话，城市化水平不变。

三、陕西、甘肃和新疆

在清代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个别县城因各种契机而形成较大的商业中心，其人口也多。如泾阳县，“道光三年查明共男女大小二十三万七千余名口，地系平原，无木厢窑厂，亦乏深山老林，且附近省垣，人非山野愚顽可比，惟系商贾云集之区……县城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藉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而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人。各行店背厢负货闲人亦多至数千”^②。泾阳与西安相邻，在清代中期，泾阳县城不仅成

个别县城因各种契机形成较大的商业中心。

① 冯锡福《大荒碑》，光绪《吉县志》卷 8。

② 道光《秦疆治略》。

为皮货业的中心,而且成为茶叶转运的中心。与此两个行业有关的人口达到了3万人左右。只是在清代后期,泾阳有可能因战争而残破。

就目前所见资料看,陕西其他的县治城市并没有如此多的人口。陕南为例,汉中府定远厅,“光绪三年同知余修凤极力整理,其要以十家牌为重例量地……其在附城者曰固县坝,三保九甲一百三十八牌,见共男妇七千五百九十六丁口”^①。这一记载让人有点迷惑,“附城者曰固县坝”,究竟是指城市人口,还是县城附近人口,文献中没有确指。从其他的记载来看,陕西南部一般的县城人口并没有达到这一规模。

如商州所辖之镇安县,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该县“中区”亦即县城仅有547户,男大丁749,小丁527,女大口693,小口490。合计男性人口1276,女性人口1183^②。户均口数为4.5,性别比108。这一系列数据表明镇安县的人口调查是卓有成效的,其县城总人口只有2459人,仅达到城市人口的最低要求。

再如西安府之孝义厅,光绪九年该县县城的人口构成见表18-4。

表 18-4 光绪九年孝义厅城的人口构成

地 点	户	男大丁	男小丁	女大丁	女小丁	合 计
厅 城	128	176	24	190	9	518
关 厢	140	220	45	157	33	562
石嘴子街	124	247	84	183	109	638
合 计	392	643	153	530	151	1718

资料来源:光绪《孝义厅志》卷2《田赋·户口》。

2000人是本卷城市定义的最低标准。

在孝义厅,城市中的户均人口为3.8人,偏低。问题可能出在对男小丁和女小丁的低估上。性别比为117,似乎也存在对女性

① 光绪《定远厅志》卷7《赋役志》。

② 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5《户口》。

人口的低估。如果加上漏记的女性和未成年人,再将时间延至1893年,城市人口的数量当有所增加,可能达到作为城市基本标准的2000人口。

再如洵阳,道光《秦疆治略》说:“道光三年查明男女大小共二十四万三千五百余名口。地因山为城,前临汉江,后环洵河,惟西门外一线石径,城内居民稀少,东门外河街有小贸数十家,农民尽在南北山坡……惟距县一百四十里之蜀河系水陆货物交卸之所,客商辐辏,人烟稠密……”看来县城居民至多为2000人。

在上一章的分析中,通过扶风、安定等县的事例,我们估计陕西地区县城一级的城市人口数量很少,许多县城不能达到城市人口的基本标准。镇安、孝义、洵阳地处陕西南部最僻远的山区,此三县人口的数量证明,陕西县城人口有所增长,只是增幅甚微。

这一结论也可推广至陕西中部地区。再如扶风县,光绪三十二年《扶风乡土志》卷2《户口篇》记载“在城里户”977户,男大1603口,小755口,女大1412口,小532口。男性人口合计为2358,女性为1944,总人口为4302人。县城的户均人口为4.4人,性别比为121。如果将女性人口适当提高,县城人口的总数还可能有所增加。与嘉庆《扶风县志》卷4《赋役》中记载的487户、2055口相比,户数与口数均增加了1倍左右。按照本卷第十三章的论述,同治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对于凤翔府的影响都不很大,人口损失约30%。在此背景下,从乾隆后期至光绪年间,凤翔府的人口还略有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高于乡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陕北地区的县城人口类似陕南。如延安府靖边县,“县属向无里甲,旧分伍堡一镇,曰镇清,曰龙州,曰镇罗,曰新城,曰宁塞,曰宁条梁镇。旧治新城堡,今移镇清为县城,并无关厢。五堡均近边疆,蜿蜒一带,错互不齐,略分四乡,村少丁稀,相地联络,或三村编一牌,或五村编一牌,其相距每在十里八里或十余里之遥,每牌头管花户十名,散绅而外,另设帮查以代甲长,每帮一名,准管牌头十名,四乡各有散绅,以稽司之。城乡公举总绅一个,以提倡之”^①。

^①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户口志》。

靖边县城无关厢，是以前的一个堡。

甘肃许多府县治城市人口死于同治战争。

这是一个相当严密的保甲体系，调查所得全县烟户共 3171 户，男女大小丁口 18420 名。“镇清城总绅一名口，内外散绅五名，帮查十名，牌头七十六名，共管一百二十一村，计烟户七百七十六，男女大小丁口四千五百六十四。”平均 5 户一村的话，乡村人口也有 600 余户，县城人口仅为百余户，可能不足 1000 人。1953 年靖边县人口为 86489，光绪二十五年的记载明显偏低。然而，作为县城所在地的镇清镇“并无关厢”，即为以前的一个堡。因此，县城人口确实是不多的。

考虑到凤翔府所属县城人口较多，陕北县城人口较少，将全省县城平均人口定为 2500，应该是合适的。

地处沿边地带的甘肃海城（今海原县）县城本城堡镇，光绪三十三年只有汉民 92 户，回民 369 户，合计户数仅有 461 户^①，人口大约 2000。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造成甘肃人口的严重死亡。直至民国十八年，华亭县城城内及东关三民街人口合计只有 624 户，2527 口^②。在固原州，根据光绪二十四年调查，本城汉民仅有 785 户，南关汉回共 475 户^③，合计州城居民仅有 1260 户，大约 5000 人左右。固原州属于甘肃省的大县等级，清代中期的人口当在 1 万人以上。宣统《甘肃新通志》卷 47 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包括了来自乡间的避难者。然而，固原城本身一定具有较大的规模，否则一个蕞尔小城，不可能容纳如此多的人口。战后固原只存人口 5000，已是非常残破了。

在找不到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将光绪末年甘肃县治城市人口定为 2000，大县、州城定为 5000，在回民战争中，大多数府数均遭残破，人口大量损失，故府城人口也只能定在 5000 人左右。

据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175，同治初年，西安城“节署前后左右迤北一带，教门烟户数万家，几居城之半”。如“教门烟户”为 2 万家，则西安城总户数可能达到 6 万户，合计人口约 30 万。如

① 光绪《海城县志》卷 3《户口》。

② 民国《华亭县志》卷 2《区村》。

③ 宣统《固原州志》卷 2《舆地志·户口》。

果更多,则可能达到40万。同治战争中,西安城数次被围,却未破,其人口损失可以不计。然而,数万户被称为“教门烟户”的回民却可能因战争而逃散。因此,估计1893年的西安城市人口最多达到30万人。同样,甘肃省城兰州在战争中亦得以保全,估计1893年人口约为10万。清代后期陕甘地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人口增长,较之清代前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战争中,镇大都被毁,镇人口可以不计。参照表17-4的统计,估计1893年陕西、甘肃两省城市人口分别为53万和27万。根据本卷表16-1,可以求出同年陕西、甘肃两省人口分别为6.6%和4.6%。城市人口比例虽较清代前期有所提高,但在陕西,西安一城占全省城市人口一半以上,在甘肃,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已较清代前期大大减少。

宣统三年《新疆图志》卷40至卷47《民政志》记载的新疆城市人口多达172931人,1910年新疆人口约为216.9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98%。1893年新疆人口总数约为168.9万,城市人口应为13.5万。

四、山东与河南

在本卷第十七章中,我借用许檀的研究,证明道光年间山东泰安府东阿县城城市人口可达6000人以上,回溯至乾隆年间,可能只有5000人。民国二十三年,东阿县城的东城镇街衢,848户,4230口,西城镇街衢,449户,2220口^①,人口总数为6450。这一人口数与道光年间相比,并无明显增加,而时间却流逝已近百年。

临清、济宁的商业地位随着漕运路线的改变和津浦铁路的通车而迅速下降。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1953年山东省辖七个城市中,已经没有临清。是年临清县的人口总数仅为26万余人,比乾隆时期临清城的人口稍多。济宁市虽被列为省辖七市之一,但其人口仅有8.6万。估计清代末年的临清、济宁二城人口最多只有5万左右。

^① 民国《东阿县志》卷1《輿地志·户口》。

仅就上述三个城市的人口变化进行任何推论都是困难的。我只是猜测,清代末年山东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不会超过乾隆时期。即使某些城市人口有所增长,也仅仅能够抵消临清、济宁及一批沿运市镇的人口锐减。

非农化与城市化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即使清代末年山东城市人口仍为乾隆年间的 138 万,然据表 16-1 估测,1893 年山东人口已增至 4100 万左右,而乾隆四十一年只有人口 2790 万。因此,山东城市人口比例大幅下降,仅占总人口的 3.4%。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许檀认为,16 世纪至 19 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化趋势表现得相当明显^①。然而,非农化与城市化并不表现为一个同步的过程,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河南县城规模较大。

河南省县城人口数较北方各省为多。如滑县,咸丰年间县城内四坊共 2084 户,共“丁”9770 口。是年全县“烟户”91959 户,“人丁”共 475815 口^②。1953 年滑县人口为 674076,咸丰中期至此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8‰。县城内的户数占全县户数的 2.3%,口占 2.1%。尽管滑县县城的人口不算少,但与全县总人口相比,比例很低。民国十七年,滑县城有 1904 户,9677 口^③。这次调查极其详细,应当可信,只是与咸丰年间比较,数十年间县城人口没有增加。

禹县的情况也大体如是。光绪末年,全县人口男 151950,女口 110593,城关男 6784,女 2695^④。在这一调查中,全县人口的性别比为 137,存在对女性人口的明显低估,其中,对城关女性人口的低估更为严重。修正后的结果,全县人口可达 30 万人,县城人口可达 1 万以上。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的 4% 左右,此比例明显较滑县为高。1953 年禹县人口高达 651304,光绪末年的人口不可能低估,也不会高估。

同治十二年,灵宝县“在城在街三关厢”,牌民 2179 户,男妇大

① 许檀《16—19 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城市史研究》第 11~12 期。

② 民国《滑县志》卷 5《民政志第四》。

③ 同上书卷 6《民政志第五》。

④ 民国《禹县志》卷 6《赋役志·户口表》。

小 9500 名口^①。据本卷第十五章,在光绪初年的大灾中,灵宝县人口损失三分之二,县城人口当大幅减少。陕州的情况与此相同,光绪三年大灾之后曾进行过户口编查,州城的编查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北门、观下巷、柴市巷等七个单位来进行,共得 641 户,约合 3000 口。在光绪大灾中,陕州人口死亡了 50%,灾前的陕州城人口应较灾后多许多。

如果说,滑县县城的人口众多与滑县处于南北交通的大路有关的话,禹县远离交通干道,故其县城人口增长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上述河南四县中,县城人口的多少与其所处地位并无关系。总起来看,光绪末年,河南中部、北部县治城市平均人口大约为 8000 人。这一人口规模远远高于直隶、山西和陕甘等地。这一结论如能成立,实际就意味着,在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的百余年中,河南的人口与经济发展与上述北方各地的模式大不相同。

不仅如此,从清代末年至民国年间,河南县城人口的发展很快,如滑县,光绪三十三年不足 1 万人,1928 年城厢共 11973 户,67949 口,增加了 5 倍有余。再如禹县,光绪末年县城人口可达 1 万左右,1923 年城关户数多达 7276 户,男 22031,女 14880,合计 3.7 万人口,较光绪末年有大幅增长。

如此,在河南将近 100 个府、县治城市中,清代末年的人口较乾隆时期大约增加了 30 余万人。这可能是北方地区行政性城市人口唯一大幅增加的省份。市镇情况不明,不予讨论。

乾隆四十一年河南省城市人口合计为 107 万,清末河南人口可能增加至 140 万。乾隆四十一年河南人口总数约为 2315 万,据表 16-1,推测 1893 年河南人口为 2823 万。乾隆四十一年河南城市人口比例为 4.6%,1893 年为 5%,略有增加。

1904 年以后,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导致吉林、黑龙江两省人口激增,城市兴起,城市人口增加。只是,这一区域的城市化在本章设定的标准时点之后,故不予讨论。

清代至民国年间河南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模式,可能与北方各地不同。

^① 光绪二年《灵宝县志》卷 3《赋税·户口》。

第三节 东南地区城市人口

一、江苏

在本卷第十七章中,有关江苏城市人口的记载相当丰富,以至我们有可能构造江苏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根据清代末年的资料,则可使人观察乾隆年间的这一模式发生了何种变化,需要进行何种修正,并能够进行何种程度的推广。

据本卷第十一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苏南人口遭到严重损失,死亡人口近达 1500 多万。全省人口损失 1680 万。在这一广阔的区域里,田野荒芜,城市变成废墟。苏南的城市大多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和战后的恢复,而苏北的城市大都是自身发展的结果。

1. 政治与工商业中心城市

南京

太平天国战争使南京城市人口大减,海关报告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南京城市人口为 225000 人,以后逐年增加,1910 年为 23 万人,1911 年为 26 万余人^①。光绪二十七年南京人口的大多数已不是原有的土著,而是战后外地的迁入者。1893 年,南京城约有人口 20 万。

苏州

王树槐对苏州城市人口的数量有如下评论:“苏州人口昔称 50 万,至光绪二十七年海关报告尚作此说,实际上已无此数。太平天国之影响甚大,光绪三十二年调查,城内及附郭共计 32994 户。如以五口一家计之,则约有人口 17 万。此一数目,或许过低,因为各方面的估计,多超过此数。但各方面的估计亦嫌过高。”他根据《支那经济全书——江苏省》等资料估计宣统年间至 1932 年的苏州城市人口约为 25 万~26 万人。然而,他也引用 1953 年人

江苏的资料较多,有可能对各大城市进行细致的讨论。

^①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第 495 页。

口调查资料,苏州城市人口为 47 万余人^①。

在民国《吴县志》卷 49 的记载中,光绪三十二年的调查包括“警察局编定城内及附郭各路门牌”,所谓“城内及附郭各路门牌”指的是吴县所辖地区,而不包括其他二个附郭县——长洲和元和——所辖的城市人口。在苏州三县中,吴县可能是最大的一县,如果其所辖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三分之二,则苏州城市人口有 25 万~26 万。民国元年,长洲和元和两县并入吴县。

战争使城市人口锐减。

民国二十年《吴县城区附刊》刊载有《吴县户口统计表》,将苏州城厢分为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合计有 53305 户,男性人口 163262,女性人口 128085,合计共有 291347 人。由于人口的性别比高达 127,估计存在女性人口的漏记。如加上漏记的女性人口,苏州城市人口应当超过 30 万。1893 年苏州城市人口约为 25 万。

扬州

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主持盐政改革,裁撤根窝,使得原先据为世业的窝本变为废纸。政府抄没盐商家产以抵欠课,使得盐商纷纷破产。扬州城市进入了它的衰退期。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长江一线交通阻塞,淮盐引地尽失。加之太平军三次攻占扬州城,“商人之居镇、扬二郡者,十有八九亦遭荼毒”。侥幸脱身的商人,也是家资罄尽^②。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扬州便完全沦为苏北区域性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市。

运河沿岸城市衰退。

《支那省别全志》根据“华人云”,称 1916 年的扬州城市人口约为 15 万人。1953 年该市人口为 18 万,据此亦可知 1916 年的扬州人口大体可信。1893 年扬州城的人口可能只有 10 万左右。

仪征

据王振忠研究,道光晚期,因湖广口岸淮盐滞销,仪征“捆工数万人,饿死太半,环监号呼乞食,而无以应之”。太平天国战争中,富室迁徙一空,贫民坐以待毙。因避太平军攻击,淮盐转输改在泰兴口岸镇行掣,仪征更是一片荒凉。程畹在《嘯云轩文集》卷 5《乐

^①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第 496 页。

^②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 160 页。

仪书院落成》中写道：“县官初来我廛市，稽查户口甲令编。空城只余五百户，一半胥吏相蝉连。”商业城市面貌尽失。如果真的只有500户居民的话，该城只有人口2000余人了。这一估计偏低，1893年前后实际人口数可能尚存3万左右。因为，至民国二十四年，仪征城市人口有32000人^①。1953年仪征城人口数不明，省辖12市中不包括仪征。

淮安

道光中叶的盐政改革使河下繁荣尽失。“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游手骄民逃亡殆尽。”在李长傅所著《江苏省地志》所列全省各大城市中，已无淮安城名。1953年江苏的省辖市中，也没有淮安的地位。估计清代末年该城人口可能只有5万人左右。事实上，在《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中，日人根据“华人云”，将淮安城的人口定为40000，即与此估计相差不远。

《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据“华人云”，称民国初年的清江浦有人口约45000人。李长傅据民国十八年江苏省民政厅调查，清江浦人口为80346人，王树槐批评这一人口数过高。但是，1953年作为省辖单位的清江市是时人口77129人。以此可证清代末年的清江县城人口约为5万。

镇江

民国《续修丹徒县志》卷5《食货志·户口》记载宣统三年统计全县三市十五乡共92577户，522592口，其中“城厢市”共20372户，121633口。按照宣统年间的统计口径，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按照“镇”、“市”来统计户口的。有些地区的所谓“镇”或“市”并不完全指其城区部分，也包括农村。丹徒县的“城厢”市是否包括乡村呢？民国十八年江苏省民政厅调查，镇江城市人口为136807人，比宣统三年“城厢”户稍多。王树槐认为，1887年芜湖开港，对镇江贸易是一大打击。如光绪七年，镇江米麦出口为2773000担，至光绪十七年，则降为312000担，仅为原有的九分之一。而芜湖的米麦出口则从光绪七年的388000担，上升为光绪十七年的

^①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174~176页。

3500000担,几乎全部取代了镇江的出口量。至津浦铁路及宁沪铁路完成以后,铁路代替了运河的运输,对镇江又是一大打击。1911年以后,镇江的贸易一年一年减少,谋生不易,人口外迁^①。据此,民国十八年的镇江人口略多于宣统三年,是可以接受的。这反过来也证明,宣统三年户口调查中的“城厢”,实指镇江城市及郊区人口。

《支那省别全志》中关于1913年的镇江人口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据当地人士称,人口约为15万~16万至17万~18万;又据居住在镇江的日本人称,人口约12万~13万;日本人观察估计则为7万人。王树槐认为引当地日人估计之数比较合理,这一人口数与宣统三年的调查可以吻合。

无锡成为新兴的工业中心城市,珀金斯估计清末人口可达20万左右^②。《支那省别全志》及《支那经济全书》均估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无锡人口约为10万人。无锡地处沪宁铁路和江南运河的中心,无锡人口的增长,实赖于清代末年近代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传统县治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即使以1893年无锡10万人口计,也已是一个大型的工商业城市了。

1893年的上海城市人口估计为90余万。

合计江苏境内的全国性工商业中心城市人口约为190万,较乾隆四十一年还要少45万人口,尽管此时增加了无锡和上海两个新的工商业中心城市。

全国性工商业
中心城市人口
减少。

2. 府治城市

苏北地区府治城市可以南通为例。宣统元年,南通县城户口见表18-5。

仔细阅读各分项数据,可以发现所谓的“男子口数”并不包括“壮丁总数”。将“男子口数”与“壮丁总数”相加,得23257口,仍略少于“女子口数”。由于“学童总数”单列,而清代末年女性并无受教育权力,故这部分人口中不包括女性。因此,在男性人口中加上

①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第494页。

② 〔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8~392页。

表 18-5 宣统元年南通城市的人口构成

地 点	男子口	女子口	壮丁	学童	合 计
城 内	2157	4872	2206	998	10233
东 厢	5125	10984	5542	2337	23988
西 厢	3277	6826	3323	1522	14948
南 厢	837	1619	790	322	3568
合 计	11396	24301	11861	5179	52737

资料来源：民国《南通县志》卷1《地理志·户口》。

“学童总数”，则为 28436 人，男女性别比为 117。由于是城市人口，男女性比失衡是可以理解的。如此，南通城市人口为 5 万余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户无住所者均剔去”，因此，这一人口数据中不包括无住所的流动人口。“附城东北乡”和“附城西南乡”的 64101 人已排除在外，所以，这一人口数据中不包括附城的乡村人口。南通城市的这一人口规模，与乾隆年间江苏府城规模相等。百余年来的南通城市人口并无明显的增长。

苏南地区的府治城市可以太仓为例。一般论者均引用民国《镇洋县志·附录》^①中的记载，宣统二年，城厢共有 3445 户，18328 口；全县合计 20418 户，91171 口。镇洋县城厢的人口数远低于一般的府级城市人口，引起我的怀疑。查民国《太仓州志》卷 7《赋役》：“嘉庆八年至同治元年案牒悉毁于兵燹。同治二年收复州城，居民四散，无从编审，至是年始查有户口细数。”卷 4《营建》称“城厢”和“毛市”为州县共辖。至此可明白，上引镇洋县的城厢户口只是附郭镇洋县所辖部分的户口，而不是太仓州城户口的全部。同治八年太仓州的户数为 22172，口数为 131542。宣统二年户数为 27167，口数为 134886。将宣统二年的户口数与镇洋县比较，太仓州人口是镇洋县人口的 1.48 倍，若以此比例推测太仓州辖城厢人口，则约有 27000 人。合而计之，太仓州城人口约为

^①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第 488 页，误作《镇洋县志》。

45000人。

关于常州,日本人估计清代末年大约有5万~7万人,其中“华人云”5万人^①,李长傅引民国十八年江苏民政厅调查,常州城的人口数为79196人^②,1953年人口调查则为29万余人。民国十八年的数据明显偏低,但确切的数据则无人知晓。总之,清代末年常州府城的人口并未超出乾隆时的水平。

《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有关松江府城的人口估计,根据的是“华人”所说,约为3万人。若此数为真,则与乾隆相比,无明显增加。

3. 县治城市

高邮州城。民国《三续高邮州志》卷1《户口》称,宣统二年十二月筹备自治事务所,城内及南门外正户2624户,附户1136户,北门外正户2489户,附户1178户,合计城内及城关户数为7427户。我猜测所谓的“正户”为土著,而“附户”则为外来的商人。以每户5口计,则有37000人口。

《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依“华人云”,称1916年的宝应县人口约为30000人。这一数据也可能是清代末年宝应县城的人口数。

据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时报》,如皋县城人口多达到52097人^③。这已是一般府城的人口规模了。

日本东亚同文会学生调查报告,光绪三十四年,海门县城人口仅为7000人。是年该会学生调查报告称南通城的人口为4万,实际人口数则超过5万。据此判断同文会学生的调查数可能偏低,由此我以为海门县城的人口可能达到1万左右。

沭阳县城。民国《沭阳县志》卷3《户口》记曰:“(宣统)三年举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调查,全县十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五户,五十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五口。城关厢四千六百十八户,二万三千九十口。”

① 《支那经济全书》第5辑。转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第486页。

② 李长傅《江苏省地志》第一章《住民及文化》,1936年。

③ 转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第488页。

沭阳是一个大县,其全县总人口甚至多于高邮州,其城厢人口之众多实不足为奇。

泗阳县城。清末的资料难以寻觅。民国十三年(1924年),县城人口仅有1940户,其中男性4996人,女性4586人,人口总数9582人。

民国《盐城县志》卷3《民俗志·户口》列民国十七年各区户口总数表。是年城厢市共有20941户,97847口。然而,这并不完全指城厢人口。按照民国年间议会选举的条例,苏北地区不少县将人口总数达到一定指标的定为“市”,而将指标以下的定为“乡”。如在泗阳县,这一标准为5万人口。再查民国《盐城县志》,民国十七年的“城厢市”,即民国二十四年的第一区,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乡村人口。

民国八年赣榆县的“城内”只有450户,935口,“赣榆市”则有2515户,28220口^①。在这一记载中,“城内”的口数明显低估,至少应有2000人口。另外,将“城内”与“赣榆市”区别开来,反映了县志作者对于两种不同政区所作区别。

苏南的情况与苏北类似。如江阴,民国《江阴县续志》卷5《民赋·户口》称,宣统三年编查户口,城厢户数为8374户,49177口。县城人口远远超过乾隆时的水平。

又如宜兴县城,“(宣统二年)十二月,两县申送城厢户口一览表,计户二千二百,男九千八百九十,女六千四百九十八”^②。女性人口估计偏低,合计总人口至少应在18000人以上。我想指出的是,从以下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调查中未包括乡村人口:

是时各乡镇调查户口,从事者半系办学人员,颇欲实事求是。而乡民狃于保甲门牌,向来敷衍,不知调查户口为何事。于是谣诼纷起,莠民又从而煽惑之,遂于月之二十六七八数日以内,和桥、高塍、蜀山及各处小学堂同时酿成毁学之祸,一切调查表册悉付之破毁湮灭,自是乡镇筹备自治,乃不得不中途

① 民国《赣榆县续志》卷2《户口》。

② 清《光宣宜荆续志》卷5《议事会》。

停辍矣。

宜兴是小县，僻居常州府之南，交通不便，然县城之中也聚集着如此众多的人口，足可证明清代县城人口的增长。

丹阳县宣统二年举办的人口调查，也是将全县分为若干个“市”，其中“城厢市”居首，“现住户数”5252户，“现住人口”24710人。在各“市”中，“城厢市”的户口最少，其他各市人口大多为6万~10万^①。这表明所谓的“城厢市”即指“城厢”。另外，与宜兴县城比较，也可知丹阳县城的人口数是真实的，它不包括城厢以外的乡村人口。

民国《川沙县志》卷3记载，宣统二年，川沙市有932户，男性3015口，女性1553口。女性人口仅及男性人口的一半，显然是不正确的。真实的县城人口应为6000人左右。

民国《宝山县志》卷1称宣统二年县城人口为9515人，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查1905年崇明县城人口约为10000人^②。因受到上海这一超大型现代城市的影响，人口和物流向上海集中，邻近上海的县城反而难以得到正常的发展。

总之，清代末年，苏北高邮等6个州县治城市平均人口为2.7万左右。苏南6个县城的平均人口为2.2万左右。回溯至1893年，可能每个县城只有人口2万左右。苏北县治城市人口稍多于苏南。合而计之，1893年江苏县治城市人口较乾隆四十一年大约增加40万~50万人。

县城人口约
2万。

至此，可以将清代末年的江苏城市与乾隆时期的城市作一全面的对比。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争、政府盐业政策以及交通路线的影响，江苏境内原有全国工商业中心城市大都衰落了。作为普通县城的上海却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普通府治城市的人口无明显增长，县城人口大约达到乾隆时期县城人口的2~2.7倍。清代末年，现代工业向农村渗透，一批县治城市因此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① 民国《丹阳县续志》卷5《赋役·户口》。

② 转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江苏省》，第488页。

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一度繁盛的江南市镇受到破坏。根据刘石吉的研究,就在战争期间,也有一批市镇得到发展,形成为新的农村商业的中心。包伟民则认为,由于资料不足,研究者“哪怕想要粗略地估计一下近代江南各地区市镇人口增长的概率,也纯属梦想”。在进行了几个个案的研究后,他认为:

近代江南市镇人口变迁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工业都市吸引发展资源的巨大集聚力,也就是现代因素向都市集中……除少数因工业发展而得益的市镇外,近代江南多数市镇明显地感受到都市的竞争压力。因此,从总体看,近代江南农村城镇化的步伐,相比于它们在前近代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反倒显现了一种迟滞状态。^①

包伟民的这一研究,虽没有对市镇人口作出定量的分析,但他却从近代江南经济的发展与市镇与都市的关系中,概括出近代市镇发展迟滞的观点。这种迟滞,不仅指市镇经济发展的迟滞,也指市镇人口发展的迟滞。

如此,清代末年的江苏城市人口数量与乾隆年间基本持平。1893年江苏人口大约3100万,城市人口大约440万,城市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4.2%,较乾隆四十一年略有提高。清末江苏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在于全省总人口数较乾隆四十一年有所减少。

二、浙江和安徽

1. 省会

根据上一章的论述,可知在太平天国战前,杭州城的人口在60万人以上,最盛时的人口可能达到80万人。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城的人口蒙受很大的损失,战后人口仅存数万。李国祁根据民国《杭州府志》卷6所载1884年钱塘、仁和两县人口从253810人增加至1911年的680287人,认为所增加的42万余人口主要为

清末江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区域人口的大量减少有关。

^①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年)》,第285页。

杭州城市人口。他进而分析道：“就杭州本身各区而言，则钱塘县境人口增加尤为迅速。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该县仅有67630人，至宣统三年（1911年）时，已增为377559人……钱塘县辖有杭州城西南部，亦即濒临西湖及钱塘江之区，受太平天国之乱破坏较少，是杭州城的繁荣之区，其人口在清季的急速增加，正代表此时期内杭州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谋生较易，人口趋向都市而形成的都市化的象征。”^①1911年的杭州城市人口可能达到50万人左右。这一人口数仍少于太平天国战前，约与乾隆时期持平。在本章确定的1893年，杭州城市人口当不足50万。

2. 府城

宁波。民国元年（1912年）宁波城厢共有人口146617人^②，此较乾隆年间有较大的增加。宁波城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较小，又是浙江设立最早的通商口岸，战后获得迅速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温州。李国祁引光绪三十二年《中国坤舆志》的记载，温州城市人口为8万人。至民国初年，一般的说法为12万~13万人^③。《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的估测数为9万人。看来，宣统年间温州人口约为10万是适当的。此较乾隆年间有了成倍的增长。关于温州府城人口增长的原因，李国祁称：“至于1877年开为商埠对温州城市发展的影响，由于人口数字缺乏，实难明确加以说明，唯就常理而言，似应有助长的作用。”

一般的府城并没有获得与温州同样的发展机遇。如台州府城，民国《台州府志》卷4《户口表》记宣统元年，其附郭临海县城区共13074户，男24928丁，女26494口^④。人口总数为51422，与乾隆年间府城的标准人口相同。

嘉兴。太平天国战争中，嘉兴地区受到严重的破坏。战后

① 李国祁《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第438页。

② 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

③ 李国祁《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第441页。

④ 是年该县总人口中，男性为27.5万，女性为29万，女性人口多于男性，性别比为94.8，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不明。

人口的恢复也相当迅速。根据《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一书所载,民国初年时,嘉兴城区人口为4万人。一般说来,该书对于城市人口的估计往往偏低,此时的人口可能达到5万~6万人。李国祁将该书所载时间定为民国五年^①,若回溯至宣统年间,嘉兴府城的人口可能为4万~5万人,与乾隆时期的府城人口可能持平。

3. 县城

未遭受太平天国战争破坏的地区城市人口较多。据民国《台州府志》卷4《户口表》,宣统初年,天台县城户数5836户,男性人口12850,女性人口9151,性别比高达140,女性人口明显低估。按照正常的性别比,天台县城人口大约为2.4万人,如此,天台县城户均4口,符合正常的家庭户的规模。这一城市人口数已是乾隆时期县城人口标准形态的3倍。当然,由于没有资料证明乾隆四十一年天台县城的人口数为全省县治人口的平均值,正好8000左右,所以,有关增长倍数的说法纯属估计。

同书记载,同治八年,根据保甲册,仙居县城东五坊户数为1031户,西五坊为1313户,合计为2344户,口数不详。光绪七年,东五坊户数降为958户,西五坊户数升为1324户,合计为2282户,较同治年间略有减少。从同治八年到光绪七年,不仅县城人口减少,全县人口共减1900户,县志作者解释原因为“其时土寇未平,民多逃匿”。不知从光绪七年到宣统年间的几十年中,县城人口是否有所恢复?如以每户平均4~5口计,光绪七年仙居县城人口约为1万,与乾隆年间人口数持平。宣统年间天台县的户数多达7万以上,而仙居仅4万余,从县城人口的比例上看,天台县城市化水平并不高于仙居许多。

民国《定海县志》卷1《舆地·户口》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清查户口,在城3210户,14364口。这一人口规模较乾隆四十一年大有增加。定海未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其人口是增长的。

然而,对于浙江大多数县城而言,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影

^① 李国祁《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第441页。

响,其人口不可能比乾隆时期增加,如上一章称光绪十一年,开化县城中的“城市民”共 582 户,“大小丁”2641 口,城市人口总数可能少于乾隆年间或持平。又如宣平县,直到 1925 年,县城城区共 1484 户,男女 6251 口^①。人口很少。当然,开化和宣平都是山区小县,县城人口本来不多。例如大县萧山县,宣统二年调查,城区男 13590 丁,女 9082 口^②。对女性人口进行修正,萧山县城可达 2.5 万口。介于乾隆年间的府与普通县城之间,合乎当时大县的标准。至宣统年间,浙江县城人口可能已经恢复到乾隆年间的水平。浙江 5 县平均每县人口约 1.3 万。

按照前引包伟民的研究,近代的镇已不再发展,处于停滞的水平。我相信刚刚从战乱中恢复的浙江市镇,1893 年的人口水平不会高于乾隆时。

如此,与乾隆四十一年进行比较,除了县城人口有明显增长外,其余各类城市人口均大致与乾隆四十一年持平,或略少。市镇人口不计,行政性治所城市人口较乾隆四十一年增加 10 万左右。乾隆四十一年浙江人口为 2236.5 万,1910 年为 1849 万,1893 年仅有 1705 万,城市人口大约 234 万,占总人口的 13.7%,较乾隆四十一年有很大增长,接近江苏省的城市化水平。

关于安徽,至今未获任何一个府、县治城市人口之数据。仅知 1953 年,蚌埠、淮南、芜湖等新兴工商业城市人口多在 24 万~29 万之间,合肥只有 18.4 万。在这些城市中,芜湖的兴起可以追溯至清代末年。也就是说,除了芜湖的兴起是清代末年安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的话,其他则乏善可陈。因为,直到 1953 年,安庆市人口仅为 10.5 万。完全没有一个老省会城市所具的规模。合肥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其人口数量也是偏少的。

乾隆四十一年安徽人口约为 2585.7 万,1910 年约为 2519.7 万,估计 1893 年约有人口 2296.5 万。如果城市人口的比例仍为 5%,则有城市人口 114.8 万。

① 民国《宣平县志》卷 1《輿地志·乡村》。

② 民国《萧山县志》卷 5《田赋·户口》。

三、福建和江西

关于福建省会福州,乾隆年间的人口不详。李国祁引西人1847年的报告,说该城及近郊人口应不少于60万,为通商五口中之第二大城,仅次于广州。19世纪50年代以后,因茶对外贸易的兴起,福州港极为繁荣。以后,茶叶贸易衰落,福州地区的人口开始减少。据《侯官乡土志》和《闽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福州市的人口仍有35万余人。如果1893年福州城市人口亦如此数,则可能较乾隆时期多出15万左右。

福宁府城的人口很少。清宣统元年筹办城镇乡议事会,调查各自治区户口数,“城区”户2463,口10846^①。因“城区”之外又有“附城松山区”,所以,可以认为霞浦的“城区”仅指府城人口。福宁府未受太平天国战争之影响,其府城人口是人口自然变动之结果。

民国九年《龙岩县志》卷8《户口志》称当时的户口调查,“岩警制未备,户口增耗,难得确数。而乡民忧抽兵抽税之淫威,即欲派员挨查,而深闭固拒,报不以实。故遇编审则减,选举则增。今之所列,不过据坊建醮,领赈底册,及告乡长造报,较昔之编审,今之选举,略实而已。以去确数,非所敢知也。户未详。”城中六坊统计结果,合计共有21540人。尽管尚不知乾隆年间的龙岩人口,但其时人口不太可能少于民国初年。

李国祁引“宣统元年县府调查”,称南平县城,即延平府城人口为2.6万人。查民国《南平县志》无此记载。李氏又引警局调查漳州城共2.3万人,以每户6人计,合计为13.8万人。1953年漳州市只有81218人,可知民国年间的数据错误。以1953年的数据推测,1893年漳州府城人口约为5万~6万人。

总起来说,福建府城人口差别较大,小府只有1万余,中府则为2万余,大府则有5万人口,这一系列,都属于清代中期的小府、大府之范畴。清代末年的福建的府城人口没有超过清代中期。

按照民国《政和县志》卷8《户口》的记载,道光八年(1828

^① 民国《霞浦县志》卷9《户口》。

年),政和县计有 113270 人,内中流寓人口 18042 人,占全县人口的 15.9%。民国四年(1915 年),总人口为 105369 人,其中流寓为 31123 人,占总人口的 29.5%。虽然因为太平天国战乱的原因,全县人口减少,但移入的人口反而增加。《政和县志》卷 20 称:“昔时穷陬僻谷间,多豫鲁漳泉汀郡之民,今皆与我同化。”卷 8 列出民国四年“城坊”土著民户 1761 户,其中“丁”3604,口 2736,流寓民户 859 户,丁口 4326。按照流寓民户的户均口数进行推测,土著人口有所遗漏。所遗漏者可能包括小男和部分妇女。按照户数推测,政和县城的居民可能达到 1.2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外来的“客民”^①。同时,李国祁还指出建阳县因太平天国战乱导致人口损失近一半,至光绪五年,损失的人口大都恢复。“该县志明白记载,人口的急速增加是因海禁大开,茶业兴旺,江浙侨民辏集。及民国元年由于茶业日衰,侨民日绌,人口再减”。减少的幅度为 23.8%。依此例类推,清代末年政和县的县城人口可能会比民国五年为多。即便如此,我仍认为政和县城的常住人口大体与乾隆年间相同。宣统二年,在福州府之永泰县,“详报城厢”578 户,男妇大小 4525 名口^②。光绪三十二年,在延平府之沙县,“查实城市民户”共 2074,人口共 11000^③。三县平均每县人口约为 6000~7000 人。可能与乾隆年间的水平相当。

再谈谈厦门。福建厦门既非省会,也非府治,却因为通商港口而获得发展。道光十二年(1832 年),“查照门牌甲册,除僧、尼、道领牌照仍归县造并无屯丁灶丁外,核实土著居民大小男女”共 144893 人,其中男 83219 丁,女 61664 口。考虑到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其性别比出现失衡是可能的^④。然此时的厦门居民,大多数为农业人口。开港后,据西人估计,至道光二十六年,乡村人口约为 10 万,城区及港区居民约 25 万~30 万人。据海关报告,1892—1900 年间,厦门人口共约 60 万~70 万人。然此时的繁荣

①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第 453~454 页。

② 民国《永泰县志》卷 4《户口》。

③ 民国《沙县志》卷 5《户口》。

④ 道光《厦门志》卷 7《户口》。

可能因日占台湾后,台湾人大批内渡移民厦门所引起。20世纪初期的资料多称厦门人口为11万左右,也有称有21万的^①。1953年厦门市人口为22.4万,据此我相信20世纪初期厦门人口可能为20万左右。也就是说,在风云变幻的一个世纪中,厦门人口虽有起伏,但开港以后所形成的城市人口规模,仍是最稳定的值。

如果说清代末年福建的城市人口与清代中期相比有所变化的话,则首先应考虑厦门人口的增加。如是,1893年福建城市人口可达100万左右。同年福建人口总数可达1472万左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8%,较乾隆四十一年略有增长。

再谈谈江西。清代后期江西普通县城的户口,目前仅见弋阳这个唯一的数据。同治十年《弋阳县志》卷4《食货·户口》记载“城内”户数为902户,“男丁”3742,女口1782,“东关外”120户,“男丁”254,女口157,合计城厢户数为1022户,“男丁”3996,女口1939。这里的男丁已不是清代前期作为纳税单位的“丁”,而是男性人口,女性人口的偏低则不言而喻。对于女性人口加以修正后,县城总人口可达近8000人。同一记载称弋阳“东南西北四乡”共32081户,男共106769丁,女共55584口。对女性人口修正后的总人口实可达到20万人,户均口数约为6.2。由此可见,县城户数之偏低,正确的户数可能达到1300户。根据上一章所引乾隆《广信府志》的记载,乾隆年间弋阳县城总户数为1327户。从乾隆至同治,县城户数没有增长,也没有大的减少。也就在这一时期,弋阳县的总户数从23503增加至33381(对县城户数修正后),以至于同治十年的口数,大大超过1953年的12.2万。这令人联想到光绪《江西通志》卷47所载同治八年弋阳县户数为39365,口数为253752,与道光、咸丰年间相差不多。太平天国战争对当地人口的影响几乎看不出来。显然,这一数据是捏造的。

江西的中心城市大都衰落。

清代末年江西没有出现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原有的中心城市大都衰微。例如景德镇,1953年人口仅为92134,已不及乾隆年

^① 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第456~457页。

间。河口、吴城及樟树三镇,随着传统交通路线的更改和物流方向的变化,全部式微。1953年的省辖市中不包括三镇。

1953年吉安、上饶、九江等市人口约为5万~6万,这是九江作为通商口岸获得较大发展所致。上饶市人口仍多于乾隆年间,是因为浙赣铁路的通车,使得上饶取代鄱阳成为赣东北最重要的城市。所以,回到1893年,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将少于清代中期。

人口增加较多的是赣州市,1953年人口多达98625。南昌府1953年人口亦多达398233。回到1893年,南昌及赣州两城人口可能稍多于清代中期^①。

太平天国战争对于江西人口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除赣州、南昌两城始终未被太平军攻克外,其他府城或县城多被太平军攻克,有的府城、县城几经易手,人口死亡众多。也就是说,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城市的人口损失可能与乡村相同。中心城镇式微导致的城市人口减少使城市人口的比例下降。清代中期江西城市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5%,清代末年可能占7%。1910年江西人口约为1496.1万,1893年约为1400万,城市人口约为98万。

第四节 湖广城市人口

一、湖南

在一项有关湖南省现代化的研究中,张朋园主要根据日本人《支那省别全志——湖南省》一书中的资料,估计1914—1916年湖南人口^②。而据上文,王树槐在运用这类资料时,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发现与其他资料相对照,日人的观察数明显偏低。王树槐所依据的是江苏省的实例,关于湖南,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张朋园未加任何说明。本节依据长沙城和邵阳城的资料证明,日人

日本人对中国城市人口数的观察,明显偏低。

① 据林传甲《大中华江西省地理志》第四编,清末南昌市人口约二十五六万。

②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376~378页。

对湖南城市人口的估计,同样存在着低估。

张朋园说:“长沙的人口,民国初年时已经接近 18 万人,为全省人口最多的都市。据统计,民国五年的人口分布,城内 19233 人,城外 38650 人^①,此可看出人口膨胀已自城内发展到城外。”“长沙的市容原即相当美观,吸收人口,有相当条件,19 世纪末年已经超过 10 万余人^②。”在张朋园论文^③中,这一连串数据相差太大,令人无所适从,《支那省别全志》的估计明显偏低则是事实。

光绪三十三年《邵阳县乡土志》卷 2《人类·户口》称“邵阳旧志则云,嘉庆二十年城内四门共土客籍民三千三百四十一户。”以人口计,则有 16000 人左右。至光绪三十三年,“本岁城乡户口由总局江呈各局团烟户清册,城内十三保土著客籍”男性人口为 24050 名,女性人口为 18364 口,合计约为 42414 人。邵阳的女性人口偏低,修正后总人口接近 5 万。而在日人《支那省别全志——湖南省》的调查中,1916 年邵阳仅有 8000 人,令人不敢相信。作为对照,1931 年成书的傅角今著《湖南地理志》记邵阳城市人口为 71404 人,就要可靠的多。1953 年邵阳市人口达到 11.8 万人,与《湖南地理志》及《邵阳县乡土志》构成合理的系列。此两书均可证《支那省别全志——湖南省》数据之不可信。

《支那省别全志——湖南省》的城市人口数据多不可信。

同治《衡阳县志》卷 3《赋役·户口》称同治十年行保甲连结之法,通计全县有民户 44335 户,412004 口,户均口数太多,不明何因。关于城市户口,同一记载称,“凡府城内外衡阳地正业民户”为 3963 户,男女 16616 口。衡阳府城有二个附郭县,另一附郭县清泉县在同治三年时有 69845 户,472356 口^④。据此,推测同治十年衡阳府城人口可能达到 3.5 万人。

关于县城,光绪十四年《湘潭县志》卷 6《赋役》称:“以光绪十

① 《支那省别全志——湖南省》,第 25 页。

② Marshall Broomhall,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 (London, 1907) pp. 170.

③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第 385 页。

④ 同治《清泉县志》卷 4《贡赋·户口》。

三年保甲计”，全县人口多达 81.7 万，其中“城内户二千百七十一，男女万六千三百六十八口，总市户六千二百七十七，口五万二百一十六，附城总一厢为上、中、下三都，户二千五百四，口二万三十七”。在这一段文字中，“总市户”的含义不清楚，也不知其与“城内户”和附城关厢户的关系。合而计之，湘潭县城人口接近 9 万。《支那省别全志——湖南省》估计 1914 年湘潭县城人口为 10 万，可与此吻合。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日人对于湖南县城人口的估计都是正确的。

在郴州汝城县(今桂阳县)，民国《汝城县志》卷 13《户口》记载嘉庆二十一年和民国十八年全县五乡(区)的户口数，兹列如表 18-6。

表 18-6 汝城县嘉庆二十一年分乡户口与 1929 年分区户口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			1929 年		
乡 名	户	口	区 名	户	口
城 乡	3535	15379	中 区	4661	20871
东 乡	8385	35253	东一区	6034	26455
			东二区	2787	10875
南 乡	10152	44601	南一区	7402	33549
			南二区	949	4008
西 乡	9241	35642	西一区	3344	14308
			西二区	6141	27474
北 乡	3416	14748	北 区	3641	15498
合 计	34729	145623	合 计	34959	153038

资料来源：民国《汝城县志》卷 13《户口》。

将嘉庆二十一年汝城县的“乡”与民国十八年的“区”进行比较，可知后者除了将“乡”名改为“区”名外，还将嘉庆年间的东乡、南乡和西乡分别细分为民国年间的东一、东二、南一、南二和西一、西二。嘉庆年间的“城乡”与民国年间的“中区”是同一个地区，这是没有疑问的。嘉庆时称为“城乡”而不称为“城厢”，民国时又称为“中区”，都可说明这是一个以县城为中心的区域，而不专指城

市。张朋园估计 1916 年汝城县城人口为 10000 人,而不将“城乡”或“中区”人口当作县城人口,是正确的。

也在嘉庆二十一年,郴州兴宁县(今资兴县)“奉部文编造循环里甲烟民户册,分城厢及东、南、西、北四乡”,“城厢烟民四千七百七十一户,编成关厢一里,男妇共二万二千三百五十九丁口”^①。其他各乡的口数分别是,东乡 37166 丁口,南乡 39310 丁口,西乡 12972 丁口,北乡 23857 丁口。县城城内及关厢人口要超过西乡人口,并达到北乡人口同样的水平,确是不可想象的。我以为,此处的“城厢”也是和汝城一样的以县城为中心的“城乡”。光绪年间的修志者不明底里,将“城乡”误作“城厢”。张朋园估计 1916 年资兴县城人口为 2500 人,蕴含着对县城及县城所在区域的清晰划分。

民国十二年《慈利县志》卷首《都区》将全县划分为 25 个“都”,每个“都”下辖有几个“区”。慈利县城坐落于五都,民国十二年,五都共有 3105 户,15250 口。既包括县城,也包括县城周围五都的乡村。张朋园估计 1916 年慈利县城人口为 3000 人,并未将县城所在区域的人口当在县城人口。

清末湖南城市
人口等级模式。

据此,关于清代末年湖南城市人口的等级模式可以概括为,省会长沙人口大约为 10 万~18 万人,大的府治城市大约为 3.5 万~5 万人,如宝庆、邵阳、常德、岳阳和永州即是。辰州、沅州、靖州、郴州、澧州和永顺府的府、州城人口与大县县城人口相同。关于县城人口,张朋园根据田赋的数量和学额对全省所有州县进行人口等级划分,其人口等级详见表 18-7。需要说明的是,张氏的这一划分已经包括了民国年间的变动。

表 18-7 中平均人口是笔者根据张朋园所定等级标准酌定的。除去 50000 以上人口五个城市不计,全省 66 个府州县城市共有人口 644000 人,平均每县人口为 9300 人。如扣除芷江、零陵、岳阳、沅陵等四个大府不计,则平均每县人口为 9000 人。由于这一标准是根据民国年间的情况制定的,所以,回溯到 1893 年,州县

^① 光绪《兴宁县志》卷 6《赋役·户口》。

城平均人口还应降低,大约每州县城居住有 7000 人左右。与乾隆年间江西县城平均人口数相合,估计也与乾隆年间湖南县城的平均人口数相合。

表 18-7 清末和民国湖南城市等级与人口

人口等级	县 名	县数	平均人口	人口合计
少于 2500 人	安仁、酃县、辰溪、永顺、龙山、桑植、乾县、汝城、晃县、绥宁、会同、通道、临武、蓝山、嘉禾、桂东、桂阳、郴州	18	1500	27000
约 2500 人	东安、城步、保靖、永绥、溆浦、泸溪	6	3500	21000
约 5000 人	衡山、永明、江华、新田、新宁、临湘、沅江、麻阳、黔阳、永兴、资兴、靖县、慈利、华容、宜章、兴宁、澧县、临澧	18	7000	126000
约 10000 人	湘阴、浏阳、宁乡、攸县、祁阳、道州、常宁、平江、芷江、石门、大庸、茶陵、耒阳、汉寿、凤凰	15	13000	195000
约 20000 人	益阳、湘乡、安化、醴陵、零陵、宁远、新化、武冈、岳阳、桃源、沅陵	11	25000	275000
约 50000 人	常德、邵阳	2	50000	100000
约 100000 人	长沙、湘潭、衡阳	3	100000	300000
合 计		71	1044000	

资料来源: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第 379~383 页。

说明:原表中郴州遗漏,常宁县重复。

1910 年湖南人口总数约为 2632 万,估计 1893 年湖南人口总数约为 2409 万。城市人口约占湖南人口总数的 4.3%,较乾隆年间的水平下降。原因很简单,清代中期以后,湖南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未能跟上乡村人口增长速度。

城市人口的增长未能跟上乡村人口的增长。

二、湖北

1. 资料及方法

学者们对清末民初湖北城市人口的研究, 主要根据宣统三年《湖北武昌等 11 府属 68 州县城议事会议长议员姓名履历清册》。关于这本清册, 苏云峰评论道: “本清册于各州县城议员名单履历之后附列该州县城现住人口数字, 这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县城人口资料。”^① 为了便于对清册内容的理解, 兹将光绪三十三年各州县户口数一并列出, 详见表 18-8。

表 18-8 1909 年至 1911 年湖北各县户口及县城户口

县名	户	口	其中 县城人口	县城人口 比例(%)	备注
武昌府					
江夏	138251	594475	182345	31	省城附郭
武昌	107179	478942	13241	3	今鄂城
嘉鱼	37964	161714	19527	12	
蒲圻	42455	185004	35329	19	
咸宁	46208	181036	2068	1	
崇阳	45626	195561	18118	9	
通城	37583	183423	27976	15	
兴国	159184	590056	57329	10	
大冶	102775	427077	4951	1	
通山	33651	121786	4337	4	
汉阳府					
汉阳	87537	481917	60125	12	
汉口			590000		华界
汉川	75080	382657	12327	3	
孝感	151883	716988	9908	1	
黄陂	128207	694268	11117	2	

①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518页。

续表

县名	户	口	其中 县城人口	县城人口 比例(%)	备注
沔阳	156831	733330	44215	6	
黄州府					
黄冈	192046	960096	14205	1	
蕲水	93874	526248	8591	2	
麻城	131359	717890	45209	6	
罗田	41822	214436	3245	2	
黄安	84914	435789	46680	11	
蕲州	96369	534843	23750	4	
广济	64410	319371	7218	2	
黄梅	63738	301168	13698	5	
德安府					
安陆	60679	316821	14866	5	
云梦	41759	212225	51204	24	
应城	70146	302686	29632	10	
随州	167217	1100670	36590	3	
应山	74441	449710	29411	7	
安陆府					
钟祥	125172	532407	25082	5	
京山	127324	647725	102234	16	
潜江	80087	378475	6821	2	
天门	159723	849894	87307	10	

续表

县名	户	口	其中 县城人口	县城人口 比例(%)	备注
襄阳府					
襄 阳	141755	625747	47464	8	
宜 城	37134	193114	63580	33	
南 漳	87576	408906	17719	4	
枣 阳	79260	382884	56347	15	
谷 城	72668	340333	38560	11	
光 化	40282	190230	18068	9	
均 州	46250	221811	16139	7	
郢阳府					
郢 县	83042	411328	13002	3	
房 县	59416	299420	47796	16	
竹 山	44721	266737	36538	14	
竹 溪	37696	191004	10448	5	
郢 西	42704	229181	23498	10	
保 康	18243	81425	10954	13	
荆门州					
荆 门	121918	543116	51252	9	
当 阳	64642	312405	33974	11	
远 安	23539	105980	9020	9	
荆州府					
江 陵	145920	684720	47376	7	
公 安	52096	249363	1694	1	
石 首	37868	178441	51509	29	
监 利	102112	452532	12094	3	
枝 江	43693	271448	67716	25	
宜 都	47595	272883	5383	2	
宜昌府					

续表

县名	户	口	其中 县城人口	县城人口 比例(%)	备注
东湖	91090	444791	47969	11	
归州	40358	189461	32154	17	
长阳	45393	195180	53765	28	
兴山	21772	97727	22232	23	
巴东	44354	206284	6834	3	
长乐	16246	64466	26011	40	
鹤峰	14040	66010			
施南府					
恩施	57925	267546	10449	4	
宣恩	19734	99789	36764	37	
来凤	18358	93615	12025	13	
咸丰	28217	172275	2993	2	
利川	39026	217295	36450	17	
建始	43416	204606	56788	28	
合计	5007150	24526563	2717321	11	

资料来源:县级户口依据民国《湖北通志》卷43《经政志·户口》。县城人口依据《湖北武昌等11府属68州县城议事会议长议员姓名履历清册》(1911年)。汉口市的人口数字,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此处依据《夏口县志》。转引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第516~518页。苏云峰在同书第522页称:“1906年夏口县全县人口87万,汉口市估计约占52万,1911年初市区人口增至59万,旋因此年大水侵袭及革命战争,人口大量流出,故于民国元年(1912)初时只剩下约20万人……民国六年全县134万余人,汉口市占68%约70余万人。”根据这一表述,本表将1911年汉口市人口定为59万人而不是原书中的70万。

表18-8中有若干县城人口数存在明显的问题,如京山县城,其人口达到10万,天门县城,人口近9万,已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作为比较,1953年,除武汉市外,湖北省只有宜昌市、襄樊市和黄石市的人口在7万~9万之间。1911年京山县城和天门县城的人口数是错误的。

其他一些偏僻的小县的县城人口也令人怀疑。宜城县人口仅为19.3万,而县城人口达到6.4万,其城市人口比率高达33%。

清末湖北县城
人口数据不可
靠。

宜城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县城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宣恩、长乐两县的情况也令人吃惊,城市人口比例几达40%。然而,如本卷第四章所述,1909年长乐县(今五峰县)人口低估,修正后的总人口约为8万余人,其中居然有2万余人居于县城,占总人口的32%。1909年宣恩县人口亦有低估,修正后该县人口可能达14万,3万余人居于县城,县城人口比例约为26%;此两县僻处山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地,清代末年可能无城市可言,表18-8中的统计是完全错误的。

另有一些蕞尔小县也具有较高的城市比例,如石首、建始、长阳、枝江、云梦、兴山等县,其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的23%~29%。按照本卷第四章的论述,这些县份1909年的人口数或者低估,或者高估,故此所谓的比例并不一定正确。其他不论,仅就僻居山地的建始县和兴山县而言,何来如此大的城市?其他各县从未见有工商业繁荣的记载,数万人口集聚于县城,何以为生?

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15%~20%的县份有蒲圻、通城、京山、枣阳、房县、利川、归州和松滋,其中蒲圻、通城、归州人口均未超过20万,利川人口仅21万。此四县地处偏僻,城市化比率竟如此之高,令人怀疑。

因此,我们有必要检讨光绪三十三年湖北省所谓“城市人口”的实质。按照上文的叙述,我们知道,在清代末年的人口调查中,许多地方将县以下行政区划划分为乡镇,人口达到一定的数量,则名以“镇”。否则为“乡”。县城往往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而是一个以县城为中心的区域,所辖人口,既包括县城,也包括县城所在的行政区,我将此称之为“县城区”。上列湖北若干县城人口数字之高,实与研究者将“县城区”误为“县城”有莫大的关系。这一情形,在其他地区已多次出现。

在上文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将“县城”与县城周围的区域联系在一起,也有不少地方将县城独立出来,构成一个独立的政区,即本文讨论的“城市”。一般说来,大多数地方的县城人口占全县人口的5%以下,超过这一比例就有将“县城”当作“县城区”的危险。当然,省会、府城及新兴城市所在地则是例外。尽管

清末湖北的县城部分为“县城区”。

如本卷第四章中所指出的,1909年的许多县级政区人口存在高估或低估,但由于存在数据修正的困难,所以,我们还是根据这一标准,有选择地讨论清代末年湖北省的府、县治城市人口。

2. 府城

表18-8中襄阳县城人口近5万,如加上樊城人口4万^①,合计人口近9万人,1953年襄樊市人口仅为7.3万,可见1911年襄阳、樊城两城人口有误。如果日本人对樊城人口的调查是正确的,则襄阳城的人口与实际情况有较大误差。清代末年的襄阳城市发展并无特殊之处,如是,该城人口可能仅有1万多人,与樊城合计约为5万~6万人。

荆州府城本是江汉平原最大的城市。据本书第四卷,明初洪武年间,荆州城内的民籍与军籍人口合计可达2万余人,因此,清代末年,该城居有近5万人口是可能的。然而,荆州一带的城市发展并不表现为荆州城市人口的增加,而是沙市的兴起。据《支那开港场志》,民国初年沙市人口为7万人,1953年则有8.6万人。

宜昌因列为开埠而得到迅速发展。表18-8中其附郭东湖县城人口近5万,并不是一个过高的数字。因为,1953年,宜昌市人口为8.8万,可证明清末宜昌府城人口之合理。

湖北其他的府城人口,如黄州、德安、郢阳三府府城,人口多在1.3万~1.4万人,恩施府城人口稍少,仅为1万人。此外,荆门州城和安陆府城人口偏高,在没有获得有力的证据之前,我更相信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可能高估,即为“县城区”人口而非“县城”人口,其正确的人口数应当与黄州、德安、郢阳等府相同。

在本书第四卷中,我证明明代中期设县时的郢阳府城人口大约为1.4万人。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以后,郢阳府城的规模没有变化,这一事实暗示着对于湖北大多数未受到近代工业和商业拉动的地区来说,其行政性城市人口的变动是一个相对停滞的值。

行政性城市人口变动相对停滞。

3. 县城

在武昌府,县城人口比例在5%以下的共有四县。武昌县(今

^① 《支那开港场志》,第281~282页。转引自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第516~518页。

鄂城市)人口最多,达 13241,而其全县人口几近 50 万。武昌县城与黄州府城隔江相对,是长江南岸重要的港口和商埠。大冶和通山两县县城的人口均不足 5000,咸宁县城人口仅有 2000 零,刚达到城市人口的最低要求。

汉川县城人口如同武昌县,人口也在 1.2 万人。再如孝感和黄陂两县,人口在 1 万左右。沔阳州的州城人口远未达到 4.4 万人的规模,但在州城之东,仙桃镇者却发展很快,在《支那开港场志》中,仙桃镇已有 13000 人,以后代替州城成为新的治所。上述围绕着汉口的诸州、县城,人口规模相近,在 1 万~1.3 万人之间。

距离汉口更远一点的县城,如黄州府属的蕲水和广济只有 7000~8000 人,安陆府的潜江县城人口不足 7000 人。更偏远一点的罗田只有 3000 余人。随州州城人口多达 3.6 万,然我对该州人口数表示怀疑,因而也对其州城人口表示怀疑。在本卷第四章中,我指出:“1909 年的随县人口高达 110.1 万,较 1953 年随县人口多出 50 余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迄今为止,我们找不到资料证明,清代末年及民国年间,随县遭受过近半数人口死亡的大灾难。”对随州人口的夸大和对随州州城人口的夸大是联系在一起的。另外,襄阳府属之南漳县城人口多达 1.7 万,不合情理。民国《南漳县志》卷 7《食货志·户口》记载民国元年“城厢区户四千八百一十,丁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九千三百六十七”,合计 21264,比省志记载的城市人口还要多。然而,依我的观点,所谓的“城厢区”,可能指包括远郊在内的乡村人口。

监利县无疑是荆州府除附郭县外所属诸县中人口最多的县,1953 年的人口仅次于沔阳、随州和襄阳,多达近 65 万人口。所以,监利县城人口多达 1.2 万,可能与其人口总数众多有关。宜都僻居江南,县城人口仅有 5000 余人,而公安县人口最少,不足 2000,尚不足以称为城市。在宜昌府和施南府,可信的县城人口仅有巴东和咸丰,前者人口为 6000 余人,后者不足 3000。

据此,对于湖北州、县城人口可作如下描述:大县县城人口与小府城人口相等,大约为 12000 人左右,中等县城人口约为 7000,小县城人口在 2500 左右。在上述提及的且我认为可信的 16 个

州、县城，合计人口达 112822 人，每个州县城人口平均值为 7051 人，正巧达到中等县城的规模。

据表 18-8，省会武昌三镇人口约为 83 万，襄阳（含樊城）、荆州（含沙市）和宜昌三府府城人口约 22 万，小府府城平均以 13000 人计，则共有 8 万人，余不包括府城附郭县在内的 57 县平均每县县城人口为 7000 人，则有人口约 40 万。如再加上《支那开港场志》调查所得仙桃、蔡甸、新堤、武穴、老河口及沙洋镇等新兴市镇人口共约 9 万人，设小镇人口不变，仍为 10 万左右，湖北城市人口大约为 172 万，这一人口较乾隆四十一年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约 60 万，实际上只是省城人口的增加，其余各级城市人口并无大的增加。

1910 年湖北省人口总数约为 2207.7 万，1893 年约为 2025.6 万，城市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8.5%。这一比值较乾隆年间有所提高，是武汉市人口大幅增长所致。太平天国战争使湖北人口的发展遭受重挫，致使乾隆四十一年至 1893 年的湖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1.9‰。在此背景下，武汉市的人口高速增长，有效地提高了湖北的城市化水平。

第五节 对其他地区城市人口的估测

迄今为止，尚未查获清代末年任何一个广东、广西两省府、县治城市人口数。1953 年，广州市人口多达 159.9 万，较之乾隆年间已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广东地区未受战争的破坏，人口增长一直是低速，但却是稳定的。从乾隆四十一年至 1910 年，广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5‰。本卷第十七章估计乾隆四十一年广东城市人口约为 147.6 万，占广东人口的 8%。如果这一比例保持不变，1893 年广东人口约为 2771.3 万，城市人口约为 221.7 万。在城市人口的半数属于广州市的情况下，这一城市人口数据决不会是高估的。

清代末年，广西仍然没有属于全国工商业中心的大城市。直到 1953 年，桂林市、柳州市和南宁市人口均没有超过 20 万。广西

也是一个没有遭到太平天国战争大破坏的地区,清代中期以来,人口的增长是稳定的。从乾隆四十一年至1910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8‰。本卷第十七章估计乾隆四十一年广西城市人口为占总人口的5%,有38.3万。即使保持这一比例,1893年广西人口约为1340万,城市人口也只有67万。

1893年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人口数,分别为1240.3万、1099.6万和4018.4万,乾隆四十一年三省城市人口比例分别为4.1%、4.8%和7%。从1953年的省直辖市的规模中观察,云南、贵州两省的城市规模还很小。虽然昆明市人口多达近70万,但却是抗日战争中东部人口内迁导致的增长,与清代末年的发展无关。昆明市以下为麻栗坡市和个旧市,也是民国年间发展起来的新兴工商业城市。至于排名第四第五位的下关市和河口市,人口不超过3万。再如贵州,省辖只有贵阳一市,人口只有27万。由此可见该省城市化程度较低。四川的情况有所不同,1953年成都市人口多达85.7万,重庆有177.2万,与抗战时期的陪都地位有关。20万~30万人口的城市有自贡市、泸州市、五通桥市、内江市等,中等城市的规模超过浙江,更超过江西。其中有些城市是民国发展起来的,有些在清代末年则已繁盛。总之,至1893年,三省城市人口比例保持乾隆时期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如此,三省城市人口分别为50.9万、52.8万和281.3万。

兹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各省人口及城市人口,列如表18-9。

表 18-9 乾隆四十一年和光绪十九年分省城市人口

人口单位:万

省 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光绪十九年(1893年)		
	总人口	城市人口	比例(%)	总人口	城市人口	比例(%)
江 苏	3243.6	440.0	13.6	3100	440	14.2
浙 江	2236.5	224.0	10.0	1705	234	13.7
安 徽	2585.7	129.3	5.0	2297	115	5.0
江 西	1878.3	159.0	8.5	1400	98	7.0

续表

省 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光绪十九年(1893年)		
	总人口	城市人口	比例(%)	总人口	城市人口	比例(%)
广 东	1844.5	147.6	8.0	2771	222	8.0
湖 南	1525.2	76.3	5.0	2409	104	4.3
湖 北	1617.3	113.2	7.0	2026	172	8.5
福 建	1377.9	82.7	6.0	1472	100	6.8
广 西	766.2	38.3	5.0	1340	67	5.0
云 南	788.4	32.3	4.1	1240	51	4.1
贵 州	567.2	27.3	4.8	1100	53	4.8
四 川	1681.1	117.7	7.0	4018	281	7.0
直 隶	1779.9	222.8	12.5	3396	283	8.3
河 南	2315.0	106.9	4.6	2823	140	5.0
山 东	2790.2	137.0	4.9	4100	138	3.4
山 西	1226.2	126.4	10.3	1004	93	9.3
陕 西	796.5	42.3	5.3	806	53	6.6
甘 肃	1579.9	43.4	2.7	581	27	4.6
新 疆	86.2	6.0	7.0	169	14	8.3
合 计	30685.8	2272.4	7.4	37757	2685	7.1

乾隆四十一年中国城市人口达到了 2272 万,占当时人口总数的 7.4%;1893 年中国城市人口达到了 2685 万,较 1776 年增加了 413 万,然而,由于人口总数的增加,城市人口比例反而略有下降。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水平并不完全由城市人口的多少来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由全国人口总数来决定。这一事实从更深的层次上体现了中国社会某种难以变更的结构性停滞:没有现代工业和商业作为支撑的大多数行政性城市和市镇,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限的。

再来讨论施坚雅论文中的某些结论。施坚雅将中国分成八个大区,是按照地理的而非行政的区划进行划分的。这一划分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求出各个区域的人口,必须用府一级的人口数据进行加总。施坚雅的研究工作,显然缺乏这一必备的前提。尽

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是由城市人口的多少,而是由全国人口总数来决定。

管施坚雅引用的 1843 年的人口数为 4.05 亿(不包括东北、蒙古部分地区、青海、西藏、新疆和台湾),与本卷第十六章表 16-2 中揭示的 1851 年 4.36 亿基本吻合,但是,正如在本卷中笔者多次指出的,全国人口总数的近似与分省数据的重大差异并不矛盾。部分地区的人口高估和部分地区的人口低估正好抵消,并不能说明分区域的人口考证是没有意义的。施坚雅认定的 1893 年同一范围内的中国人口约为 3.94 亿,较表 16-2 揭示的数据略少,但是,这也不能证明他所运用的分区数据是正确的。

施坚雅认定的 1893 年中国城市人口数为 2351 万,较笔者估计的 2649 万要少。施氏估计的 1843 年城市人口比例为 5.1%,至 1893 年增至 6.0%。笔者的研究相反,从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不及乡村,是中国城市化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之一。

第十九章 清代人口与中国人口体系

第一节 “人口爆炸”的讨论

一、清代人口数据评析

要对清代人口历史作出全面的评价,就必须对此前此后的中国人口进行比较。根据《中国人口史》第一至第五卷的研究结果,1949年以前可以确定的较为可靠的中国人口数据共有24个,加上1949年及1949年以后的人口数据,可列出30个年份的数据如表19-1。

表 19-1 公元 2 年至 2000 年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动

年 代	人口(万)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西汉元始二年	2 年	6000	
西汉更始二年	24 年	3500	-24.2
东汉永和五年	140 年	6000	4.7
魏黄初元年	220 年	2300	-11.9
西晋永康元年	300 年	3500	3.8
隋大业五年	609 年	6000	1.7
唐武德五年	622 年	2500	-65.1
唐天宝十四年	755 年	7000	7.8
宋太平兴国五年	980 年	3540	-3.0

续表

年 代		人口(万)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宋大观四年	1110年	14000	10.6
宋建炎四年	1130年	9000	-21.8
宋嘉定三年	1210年	14500	6.0
元至元二十七年	1290年	7500	-8.2
元至顺元年	1330年	8500	3.1
元至正元年	1341年	9000	5.2
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年	7160	-4.6
明崇祯三年	1630年	19250	3.8
明崇祯十七年	1644年	15250	-16.8
清康熙十八年	1679年	16000	1.4
清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31150	6.9
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38310	4.7
清咸丰元年	1851年	43610	4.2
清光绪六年	1880年	36450	-6.2
清宣统二年	1910年	43600	6.0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	54170	5.6
	1953年	59020	21.7
	1964年	73900	20.7
	1982年	103190	18.7
	1990年	116000	14.7
	2000年	129500	11.0

资料来源：葛剑雄、冻国栋、吴松弟、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一至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2001年版。1949—1982年资料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1990年资料据查瑞传等主编《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分析》（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2000年资料系笔者假设1990—200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11‰的水平推测。此数据已为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所证实。所有资料中均包括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

据表19-1制成图19-1，以示2000年间中国人口发展的大致趋势。

中国人口的增长虽然经历过大起大落和停滞徘徊，但人口总量呈增长的趋势。以公元2年为起点，至755年的750余年中，中国人口总量始终未突破7000万。北宋人口峰值为14000万，南宋

2000年间中国
人口变动的大趋势。

人口(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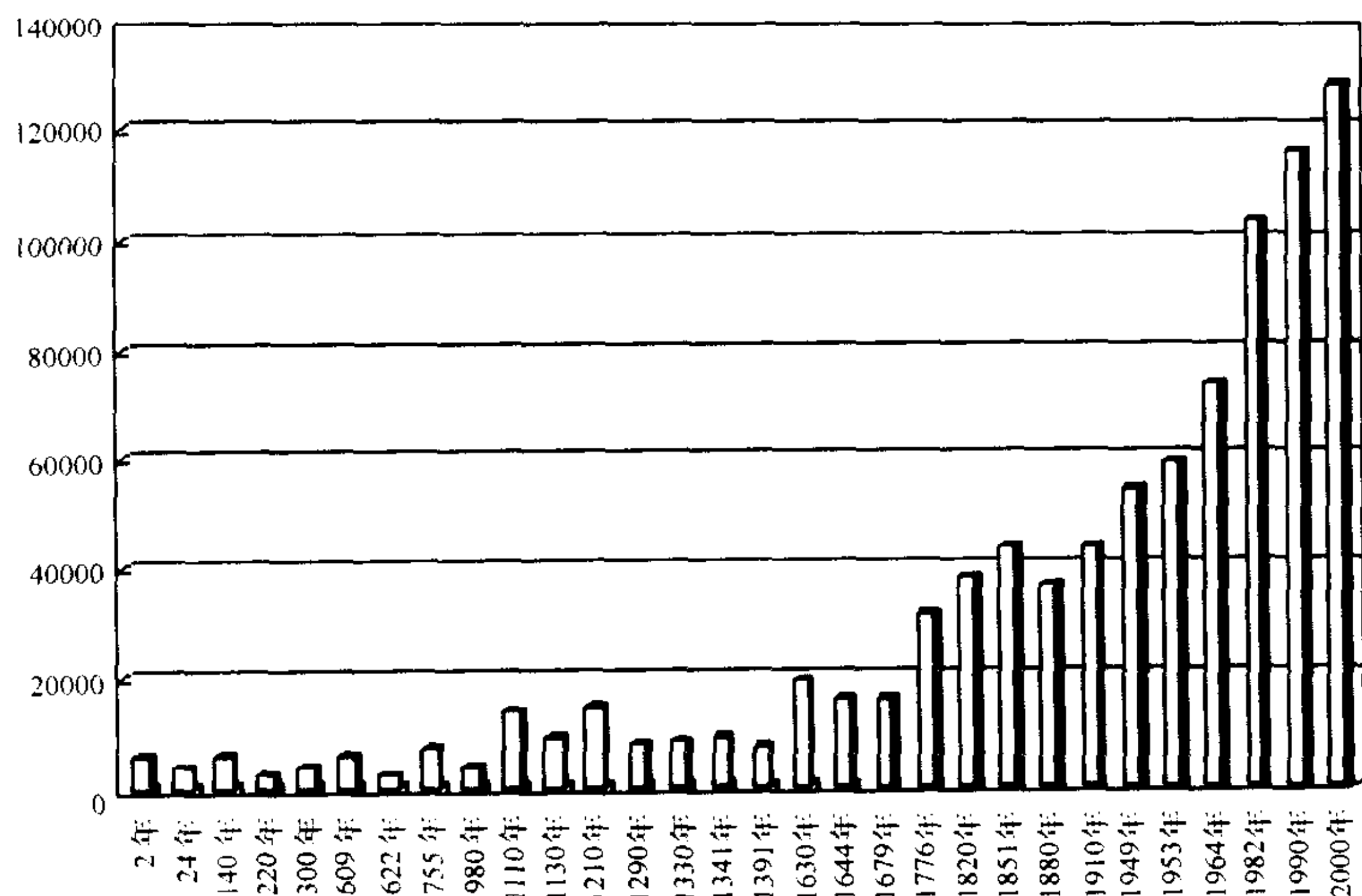


图 19-1 中国人口的数量增长

达到 14500 万,明代后期更达到 19250 万。从北宋至明末的 680 余年中,在人口峰值不断提高的同时,人口的低谷不再低于 7000 万人。清代前期长时期的和平使中国人口从明代末年的 15250 万增加至咸丰元年的 43610 万,人口增长即使出现回落,但总量不曾低于 36000 万。1949 年增加至 54170 万。1949 年以后,中国人口总量迅速增长,至今天可能达到 128000 万以上。

很显然,清代人口是在明代人口基础上的增长。明代中期中国人口突破了 1.5 亿宋代人口的峰值以后,至明代后期接近了 2 亿。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数。明代末年的中国人口在战争、瘟疫和灾荒的打击下锐减,但仍保持着 1.5 亿的高水平。清代人口总量的增加与明代末年的中国人口数有密切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明末清初的人口只有几千万,这一过低的估计,是对“丁”的性质认识错误所致。

由于资料缺乏,仅对历代人口的峰值及谷底进行估计。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年、隋唐之际、唐末五代、两宋之际的朝代鼎革中,

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相当严重,人口死亡的比例动辄为人口总数的半数左右。到元代末年和明代末年,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战争中的人口死亡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明显下降。元末战争、明末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约为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死亡的比例为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这并不是说,太平天国战争不如以前的战争那般残酷。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造成人口死亡最多的战争。然而,由于中国人口总量的增加,相对全国而言,这场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死亡比例相对较小。由于人口总量增加和人口密集区的扩大,一场战争已不可能波及全部的人口密集区。在部分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其他地区的人口仍在增长着。尤其在未受战争影响的人口密集地区,由于人口总量相当大,这些地区所增加的人口就会很多。战区人口死亡的很大部分为非战区的人口增长所抵消。

中国人口总量的增加与中国人口分布区的扩大密切相关。在宋代及宋代以前,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居住于长江以北的地区。在中国人口史中,长江是划分南方、北方最合适的天然界限。所以,中国人口的增长模式可以归纳为北方和南方两个不同的类型:在北方,人口为高增长—大死亡—高增长;在南方,人口为低增长—大死亡—低增长。历史时期,北方战争的次数大大多于南方,北方人口稍有积累,便为战争屠掠一空。战后人口以高增长来弥补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南方的情况不同,太平天国战争是历史时期南方地区遭受到的最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爆发之前,南方人口已积累起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尽管人口死亡很多,比例很大,但剩余人口的数量仍然很大。在没有大量外来移民迁入的地区,战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与战前大体相同。

总起来看,历史时期中国人口的增长模式是低增长—大死亡—低增长。尽管北方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南方,但北方人口增长速度仍是不快的。以高速增长明代为例,北方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8‰。南方的增速只有一半。而在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长时期达到20‰以上,至今仍保持在11‰的高速度。参见图19-2。

南北方人口变动的不同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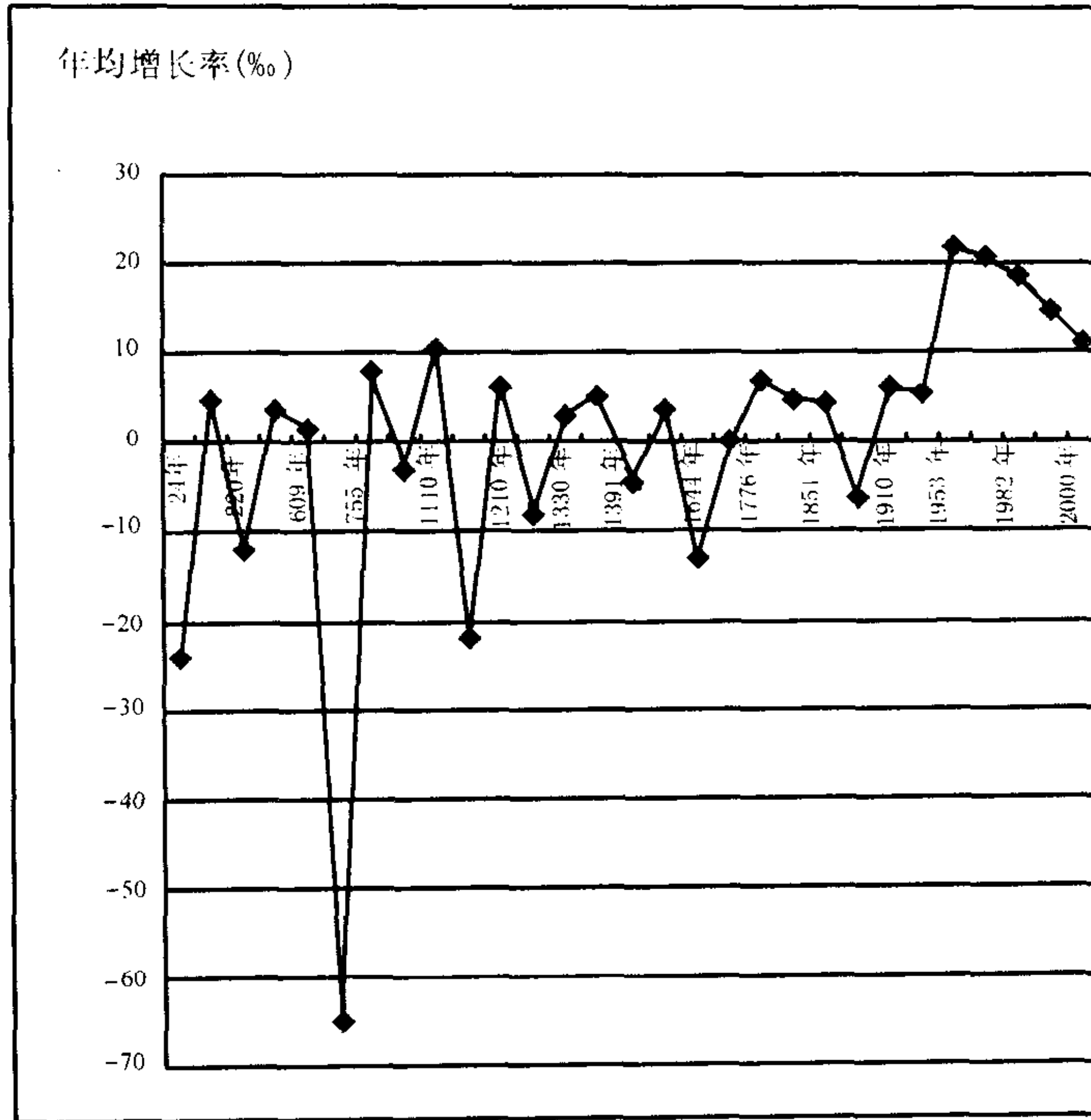


图 19-2 中国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

二、“人口爆炸”：内涵与定义

许多学者都认为清代前期中国出现了“人口爆炸”。这是一个未加定义的模糊观念。如果说“人口爆炸”指的是人口高速增长的话,从表 19-1 中可见,从 1644 年至 1851 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4.9‰。这一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唐代前期,更低于北宋前期,也低于南宋前期。虽然清代前期一个世纪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然其年平均增长率仍不足 7‰。以今天的观点看,仍是一个低速度。只要我们不再将文献所载“丁”看作人口,就不会对这一结论产生怀疑。“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

然而,从图 19-1 中可见,尽管清代人口增长的速度不快,但人口累积的数量已够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人口爆炸”来形

池塘中的水草翻番,可以用来说明人口的增长。

容清代前期的人口增长,又有其合理的成分。从数量累积的角度观察,指数增长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开始慢而结尾快。保罗·艾里奇(Paul R. Ehrlich)等指出:“用来说明这个特征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池塘表面水草每天翻一番,而且依据测算,能在30天内将整个池塘都盖满。现在的问题是水草在29天内将把池塘盖住多少?答案当然是水草在29天内恰好将池塘盖住一半。然后水草数量再翻一番,第二天盖满整个池塘。这个例子说明,指数的增长隐含着令人大吃一惊的东西。”^①按照我的理解,这个令人吃惊的东西便可用“爆炸”来概括。

按照这一规律,人口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就可以称为“爆炸”。即使这一增长的年平均速度并不快,但在长时期中,仍然可以积累起一个足够大的量,并形成对于区域人口生存的压力和人口的危机。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人口总量的积累是两个相关的概念,但又不完全一致。对于一个特定的区域而言,即使人们感觉不到速度,但却能感觉到总量。人口总量的多少对于一个特定的区域而言当然是最重要的。从这一角度出发,用“人口长时期的稳定增长”来作为对于“人口爆炸”的解释或定义,应当是合适的。“人口长时期的稳定增长”既包括人口的低增长,也包括人口的高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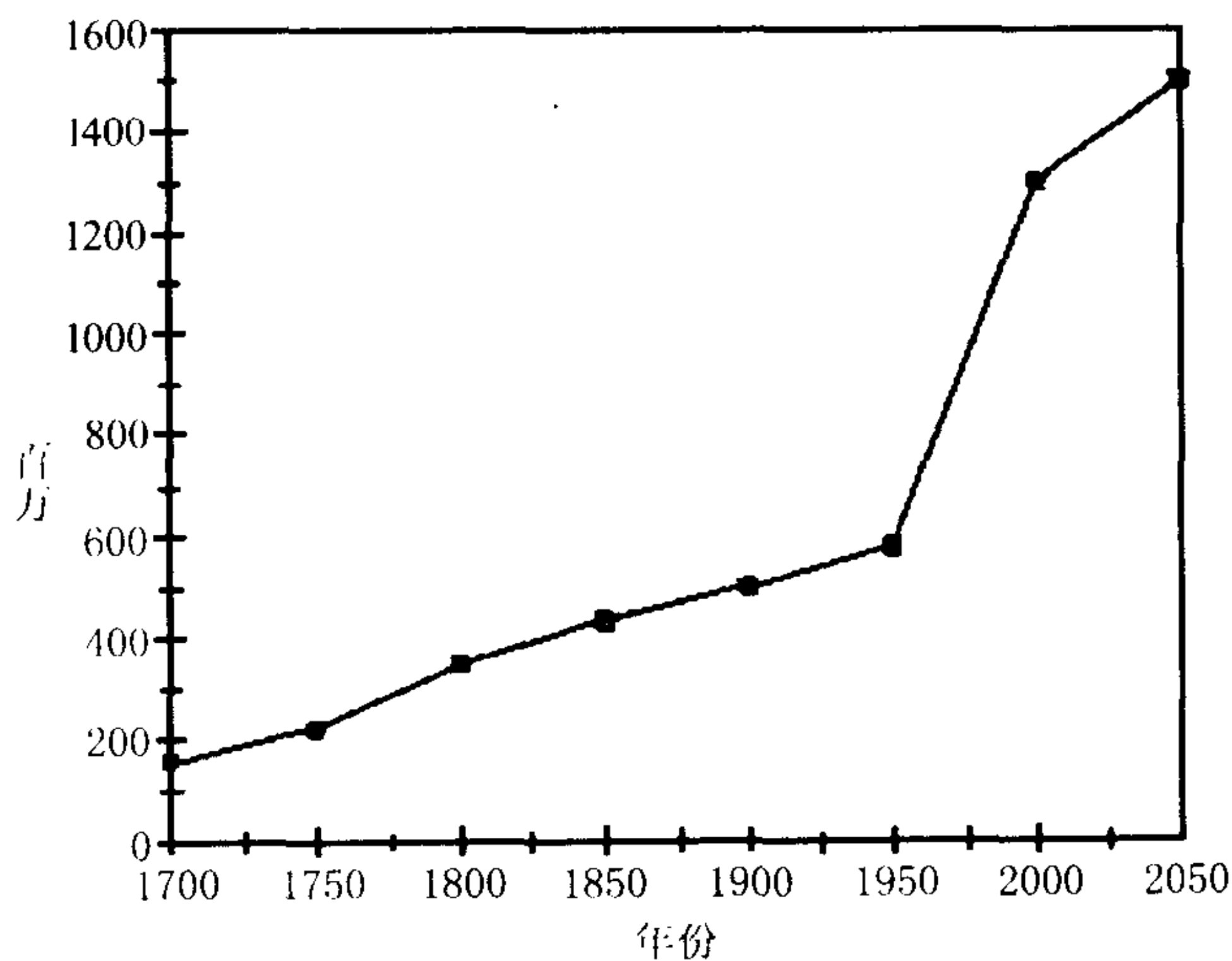
从表19-1中可以看出,唐代前期和北宋前期的人口增长使得中国人口在不长的120年和133年间分别增加了1.8倍和3倍。由于这两个时期的人口基数都很低,所以,尽管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当快,人口增加的倍数相当大,却让人感觉不到人口的压迫。如果稳定增长的时间再长一点,以清代初年至咸丰元年的207年计,唐代中期人口可达1.24亿,宋代人口高峰可达3.5亿,就完全符合本文所定义的“人口爆炸”。历史当然不可以假设,这一分析的目的只是强调时间因素在人口增长中的作用。同样,如果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当快,在不长的时间里,人口的数量也很容易实现倍增。1949年至今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自然包括在这一定义之中。

^① [美] 保罗·艾里奇、安妮·艾里奇《人口爆炸》,张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按照表 19-1 中的资料,如果从公元 2 年开始算起,中国人口在过去 1951 年的时间里积累起 5 亿多人口,而积累第二个 5 亿多人口的时间,只用了不到 40 年的时间。很显然,中国人口的增长自 1949 年以来,已经进入水草生长的第 29 天。也可以说,清代的人口增长表明中国人口增长处于水草生长的第 28 天。

三、李中清、王丰的不同表述

李中清、王丰根据 1997—1998 年之前学术界有关中国人口的研究成果,分别整理出 1700 年至 2050 年每隔 50 年的中国人口数据,制成折线图,列如图 19-3。



如果将图 19-3 中 1950 年以后的人口数排除不计,那么 1700—1950 年间的中国人口增长实为一条直线,即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呈现线性增长,而非指数增长。

图 19-3 1700 年至 2050 年中国的人口膨胀(李中清、王丰绘制)

资料来源: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 40 页。

目前西方新一代的人口史、经济史学者对于清代以来中国人口变动的论述,大都采取这一数据系统。虽然各家的数据有些差异,但是在以 50 年为一期的数据系列中,表现出来的人口变动趋势大体相同。只是对于 1900 年的人口,李中清、王丰采纳的数据显得特别高。他们对于这一选择没有作专门的说明。

李中清、王丰说：

尽管生活水平如此低下，中国的人口却从18世纪初开始了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图2(本卷图19-3)展示了这种增长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700年的1.6亿迅速增加到1800年的3.5亿，然后缓慢增加到1950年的近6亿，接着又是快速增长到今天的13亿。而且，尽管最近国家努力控制婚姻与生育，到下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口还会继续以较低的速率增长。到那时人口至少达到16亿。^①

“生活水平如此低下”，并不是李中清、王丰的观点，而是他俩引证的包括马尔萨斯在内的早期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人口生活状况的看法。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否定，李中清、王丰认为“中国的人口却从18世纪初开始了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即是指从1700年至1800年的人口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难道就是指年平均增长率为7.85‰的增长？我不明白，年平均增长率在什么水平上才不被称作“指数式的持续增长”呢？

李中清、王丰的上述描述并没有意义。据本书第四卷，如果我们将明代初年至明代末年200多年的人口增长也作如此描述，也同样是“近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从明初至明末，其间建立的标准时点越多，所绘得的指数曲线就越完美。就中国人口从增长至下跌的每一个时段而言(这一阶段在清代以前往往与每一朝代的始末相一致)，各个阶段或朝代的人口增长曲线都可以概括为指数曲线增长与断崖式直线下跌两种方式的组合。清代人口的持续增长在中国人口史上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件。

本卷将崇祯末年即1644年的中国人口数定为1.5亿，又认为从这一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乱”结束，中国人口稍有增长。也就是说，在清代初年的35年中，由于清兵的屠杀以及“三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40~41页。

藩之乱”引发的战争,人口的死亡与出生大致平衡,出生略多于死亡。因此,1679年的中国人口可以定为1.6亿左右。这与李中清、王丰归纳的1700年1.6亿人口的差距不大。按照表19-1中所列1776年至1820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1800年中国人口大约3.46亿,也与李中清、王丰归纳的3.5亿接近。然而,在50年为期的统计中,李氏、王氏漏掉了发生于1851—1877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北方大灾。加上李中清、王丰对于1900年数据的高估,使得此前历时27年且人口死亡达到1.18亿左右的人口大死亡,在图19-3中完全看不出来了。结果,1851—1900年间的人口减少或停滞,被李中清、王丰错误地描绘成“缓慢增加”。而这种人口的大死亡,在我看来,恰恰符合马尔萨斯的“现实性的人口抑制”。一个表面上看来无可厚非的人口数据的标准时点的选择,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却实实在在地使李中清、王丰避免了对他们的理论构成最大挑战的尴尬。

以50年为一期的人口数据的选择,使得造成1.18亿人口死亡的灾难消失了。

不仅如此,李中清、王丰无视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波动。在该书第七章,他们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动解释为:“一种以低女性成活率和低已婚生育率为主的人口机制,使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万分之五^①,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这些调整使一种内均衡的人口体系在中国几乎保持了2000年。在公元1世纪,中国人可能已经多达7500万。到1700年,尽管中国疆域扩大了2倍以上,但中国人口也只有原来的2倍。”这一叙述,将2000年的中国人口变动解释成平缓地增长,而且这种平缓的增长是他们俩人发明的中国人口机制调整的结果。一次一次的战争、瘟疫、灾荒造成的人口大死亡,在他们的解释体系中统统不见了。

李中清、王丰继续说:“18世纪初,这一切都变了。1750—1950年间,人口几乎增加了2倍,从2.25亿增至5.8亿,年平均增长率为5‰。”依据图19-3和作者的解释,1900年中国人口已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165页。

达 5 亿^①。以这一数据为基础,从 1900 年至 1953 年,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3.1‰。而从 1750 年至 1900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达到 5.3‰。回避了太平天国战争、西北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造成的人口死亡,1750 年至 1900 年的人口增长得到了他们理论的“合理”的解释。然而,同一体系中 1900—1953 年中国人口 3.1‰的低增长,又该如何解释呢?李中清、王丰在他们的著作中极力证明:自 20 世纪初期或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中国人口营养水平、卫生水平及整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男性不婚人口减少,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应使民国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②。然而,上述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竟然是较前一个时代更低的增长速度。关于这一增长速度,李中清、王丰没有进行解释。他们的整个论述陷入了自己构造的巨大悖论当中。

作为对照,王国斌在 1997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特别强调太平天国战争及光绪大灾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按照王国斌的解释,正因为有了太平天国战争,战后 100 年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压力是不存在的。王国斌对光绪大灾对人口造成的影响持谨慎的态度,他说:“尽管这些记述如此可怕,但我们仍不能肯定这一类危机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异。”^③王的这一评述基于他对光绪大灾尚无明确的认识,至少本卷出版之前,尚无人对这场大灾作过全面的定量分析。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构成李中清、王丰错误分析的借口。事实上,何炳棣早就强调 19 世纪的天灾人祸是影响中国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④,他认为中国到了 19 世纪中期已进入马尔萨斯陷阱。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 86 页。

② 或有人称,在中文本第 138 页,李中清、王丰用 1914—1930 年中国农村没有文化的 3 万妇女样本已说明 20 世纪初以来,已婚生育率的控制已深入到了农村地区。但是,如下文所述,这所谓的控制,在总和生育率上仍与 50 年代接近。这难道也能算作控制?在这一生育率下,如果死亡率水平不变,人口的增长速度当然会比清代更快。

③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22 页。

④ 何炳棣《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第六章、第十章。

珀金斯更把太平天国看成是中国人口压力的间接结果(人口压力—经济衰退—农民造反)。李中清、王丰把 19 世纪下半叶仍然画成缓慢增长的曲线,因此轻而易举地否认了何氏和珀氏的观点。李中清、王丰对中国人口的描述和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

李中清、王丰用一条错误的曲线,轻易否定了何炳棣、珀金斯的观点。

第二节 “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的讨论

决定清代人口增长乃至中国人口增长的机制是什么?目前最权威的基础性解释属于马尔萨斯。李中清、王丰的理论建设是从颠覆马尔萨斯理论开始的。他们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体系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资源的限制,因为人口增长以食物为基础。其次,马尔萨斯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两种抑制都限制着人口增长。西方社会以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为特征,非西方和非现代西方社会则以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①为主导。预防性抑制指通过限制婚姻来控制人口增长;现实性抑制指的是人口无节制地增长,直到不断增长的贫困导致死亡率上升。马尔萨斯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现实性抑制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毫无预防性抑制的社会的最好例子。李中清、王丰还援引另外一些西方人口学家的观点,即“如果西方的家庭体系在社会体系中处于一端的话,那么中国以及印度则处于另一端”^②。

为了摧毁马尔萨斯的理论体系,李中清、王丰从人口的生存、死亡、婚姻和生育四个方面来重建中国人口的现实,然后再对中国人口体系、人口行为的社会政治根源及意义进行讨论。本节循着大致相同的分析框架讨论马尔萨斯理论及李中清、王丰的新理论。通过这一讨论,我们有可能对清代人口史及与此相关的清代历史

本节循李中清、王丰著作的框架进行讨论。

① 此前学术界大都将此译为“积极抑制”或“积极制衡”,我以为译为“现实性抑制”较佳,是一个与预防性抑制对立的观念。

②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5~6页。

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加深我们对于相关理论问题的认识。

一、生存

李中清、王丰指出:“人均粮食产量是衡量农业社会里马尔萨斯压力的最重要指标。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在过去的300年里没有出现下降。相反,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耕地有所减少,人均粮食产量却保持稳定,在一些地区甚至有所增长,虽然从全国来看有时缓慢且不一致。在有较好的全国水平估计值的20世纪,人均产量表现出一种稳定增长的趋势。”虽然李中清、王丰是根据李伯重、珀金斯、赵冈等人的观点来进行这一论述的,但我们发现,其中所称人均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并没有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产生对应。他们在书中给出的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增加的示意图,时间断限为1930年至1990年,不能用来说明18世纪或19世纪的情况。

珀金斯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农业产量的估计,本身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中国的粮食产量养活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或者是中国人口活着,证明粮食并不短缺。这一假设并没有考虑中国人口的生活状况和营养水平,也没有考虑区域人口生存状况的差异。大概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李中清、王丰用16世纪至18世纪每个农民年均净产出和劳动力净产量增加的数据来作进一步的说明。李伯重证明,在这一时期,松江府每个农民的年均净产出增长了30%,从18.8石上升到24.5石。长江下游地区每亩地的平均产量增长了47%,每个劳动力年净产量增长了52%。这一系列数据表达的意思相当含混。“每个农民”的年均净产出是否指每个劳动力?如果是指每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与每个劳动力代表的人口又存在何种关系?只有“长江下游地区每亩地的平均产量增长了47%”一句,意义明确。我们知道,在长江下游,16世纪以来耕地数量不可能有大的增加,每亩土地平均产量的增加可以看作整个地区总产量的增加。如果用比较项目期末较期初增长的百分比来表示的话,就必须明确,在亩产量增加47%的同时,期末人口到底较期初人口增长了多少?我们可以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来

推算期末的人口,再根据期末人口推算较期初增加的百分比,计算的方法非常简单,但李中清、王丰两位先生没有这样做。

如果说从16世纪至18世纪是代表200年时间的話,亩产量在200年时间里增加了47%,实际意味着亩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3‰;如果代表的时间更长,年平均增加的幅度就更小;如果只代表150年时间的話,亩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2.6‰。如果说“每个劳动力年净产量增长了52%”可以作同样的比较,则200年中年净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也仅为2.1‰,150年中为2.8‰。如本卷所指出的,虽然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表现为低速度,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水平仍达到3‰~4‰。如果从16世纪开始算起,由于17世纪中叶江南地区的鼠疫流行导致600万人口的死亡,所以,实际上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足3‰,大致与亩产量增长速度相同。就是在这—比较中,我们看到的恰恰不是人口增长与产量增长的同步进行,而是明代末年由瘟疫引发的人口大量死亡为江南地区人均粮食拥有量的减少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缓冲时间,在没有理由相信粮食亩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能够达到3‰~4‰水平的前提下,如果没有这场大瘟疫,江南地区区域性的粮食进一步短缺会提前到来。

亩产量的增长速度不可能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最近的一项综合性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作为水稻主要产区的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平均亩产大约为2.6~2.7石,安徽、湖北、四川次之,其他省份更次之^①。总体上说,江南地区的亩产量超过其他地区,居于中国粮食亩产的最高水平。同样,已有的资料不可能证明,从16世纪至18世纪,江南以外的地区粮食亩产的增幅可能超过江南。然而,从16世纪至18世纪,江南地区亩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左右的低速度,其他地区亩产量的增长不可能较此速度为高。人口的增长速度,即使以水平最低的江南为例,也超过了2‰。所以,清代前期和中期亩产量的增

^①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346页。本节内容由郭松义执笔。我不同意郭松义关于人均占有粮食数量的讨论,这是因为:其一,他所依据的人口数据存在问题;其二,册载田亩不一定等于实际田亩,耕地的面积需要重新估算,这是一个亟待展开的工作。

长速度绝不可能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

如果采用期初、期末增长幅度来比较,从明代末年至19世纪初,中国人口增加了1倍有余。目前的研究表明,在同一时期内,任何区域的平均亩产量都不可能达到同样的增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李中清、王丰的这一研究未能构成对马尔萨斯的颠覆,相反却形成支撑。以北方为例,在上引有关粮食亩产的研究中,康熙年间至清代末年,山东小麦亩产通常在70~80斤,数百年间产量基本无变化。康熙、乾隆年间的资料来自孔府档案,清代后期至清代末年的资料来自地主账册及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两种资料都具相当大的可靠性。然而,在此同时,山东人口却在持续地增长着。

李中清、王丰指出,按欧洲人的标准来说,中国人一直较矮。这是饮食结构和卡路里摄入量所决定的。中国人一直以吃蔬菜和谷物为主,而不是肉和奶产品。至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人均营养获取量大幅度增加,中国人身高随之增加。对几千名北京宫廷侍卫的分析表明:在1900年左右,一般男性人口身高不超过163厘米,接近于20年代第一次全国范围身高调查所推断的城市人口身高。至80年代,男性身高增长到了171厘米。农村地区甚至可能比城市增长得更快。这一论述或许没有错误,但要将此推广到18世纪或19世纪,却是大可怀疑的。因为,清代末年的宫廷侍卫身高理应在同时代一般男子身高的平均水平以上,如果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身高已经在不断增长的话,我真的不知道18世纪或19世纪的中国男性人口平均身高会是多少?难道不足160厘米?从李中清、王丰提供的资料看,中国人口的身高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开始变化的。然而,在李氏、王氏著作的有关图中,中国男性身高从1900年至1920年间已经开始了增长。这一图示与他们用文字陈述的事实不符,有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使人认为这一男性人口身高增长的斜线可以延伸至1900年以前。我更相信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口的身高也随之增加。2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的营养水平相当低,所以身高也较矮。

李中清、王丰所作的男性身高增长图对读者产生误导。

李中清、王丰可能也发现这一陈述还不够,于是引证不少历史学家关于17世纪中国人——其中主要是长江下游人口——消费水平提高的事实:从16世纪至19世纪,江南地区农业短工吃肉的日子有了明显的增加,一般农民也是如此。暂不讨论这一事实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意义,仅就李中清、王丰的逻辑而言,如果19世纪的江南地区的农业短工农忙季节每月20天有肉吃的话,20世纪20年代之后,农忙季节的农业短工岂不天天有肉吃?李中清、王丰所称20世纪20年代营养水平的提高,究竟是在什么水平上提高的呢?按照曹幸穗的研究,“苏南的农业月工、日工的工钱较高一些,大抵与其他职业的报酬相等。但是这类季节性月工及日工的劳动最为辛苦,每年盛夏的农忙季节才有人雇佣短工,为了赶上农时,雇主总是最大限度地延长雇工的田间劳动及增加劳动强度。农业短工付出的劳动远远超出正常劳动所能完成的工作量”^①。所以,农业短工吃肉的天数根本不能代表江南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认为这一事实能够成立,接下来的问题是,按照我在本章第三节中的论述,江南属于清代中国的商业化区域,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江南获得了大量外地资源的补充,人民的生活水平较其他地区为高。用江南的例子证明全国,也是不合适的。

李中清、王丰还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中挑战马尔萨斯主义。他俩认为,按照马尔萨斯的预言,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本应该导致高死亡率和频繁的饥荒,然而这一阶段的死亡率并没有上升。作为证明,皇室成员——无疑是中国人口纪录最完整的人群——的平均寿命没有下降迹象,尽管其数量增长在19世纪逐步放慢,平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完全同意作者关于皇室成员的这一分析,只是在运用族谱资料进行一般民众预期寿命的分析时,我不太同意采用“人口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由于大量的刚出生即死亡的婴儿不被统计,对于族谱时代的资料而言,这一分析没有意义。基于此,我甚至不赞成采用“预

^①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期寿命”这一指标。在我的研究中,我采用“成年人口平均死亡年龄”这样一个中国式的指标进行分析,所得结果是,在从明代至清代的几个世纪中,中国成年人口的死亡年龄没有大的变化^①。有关预期寿命的讨论可能是一个假问题。

从理论上说,马尔萨斯实际上已经预言了 19 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及光绪大灾造成的死亡人口高达 1.18 亿的大悲剧。尽管李中清研究的皇室人口与这场战争无关,但并没有说明这场灾难不存在,或说明这场战争在人口史上不存在。作为反证,可以援引彭希哲、侯杨方对清代江南两个家族人口历史的研究。根据彭氏、侯氏的研究,居住于上海的曹氏家族免于这场灾难,是因战争对上海的影响较小。居住于常州的范氏家族在这场战争中大伤元气,家族人口总数在此期间出现巨大而迅速的跌落^②,是因常州为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区。

如果跳出谱牒纪录的人口数据,从一个更大的范围进行考察,对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损失我们会有更深的认识。本卷用四章的篇幅讨论这场灾难,并不在于重申马尔萨斯的理论,而是想说明,在 19 世纪,对于中国人口的增长构成最有力量的抑制的,仍是马尔萨斯所称“现实性抑制”:战争、瘟疫和灾荒。在经历了这一悲剧之后,灾区的生态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人多地少转而变为人少地多,这种近来被学者概括为“人地关系的恶性宽松”^③的景象使得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在 20 世纪初期免受其他类似的战争与饥荒。由于这场战争及其他一系列新的因素的影响,20 世纪初的原战区及灾区的人口增长面临几个世纪以来最为宽松的环境。

由此可见,19 世纪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也不能构成

作为整体的皇室人口,与 19 世纪后半叶的战争、瘟疫和饥荒无关。

① 关于这一分析,参见本书第四卷《明时期》第十二章和笔者未刊博士论文《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迁移》(下册)的有关内容(复旦大学,1989 年)。这一事实反映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口的营养水平和卫生水平,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② 彭希哲、侯杨方《明清江南两个家族的人口变动》,《中国人口科学》1996 年第 4 期。

③ 参见郑磊《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以民国时期关中地区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待刊稿)。

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挑战,反而构成支撑。因为,战区人口的寿命要比正常状态低得多。李中清、王丰所分析的人口群体具有太强的特殊性,且其覆盖面又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完全忽视了一次具有经典意义的人口的现实性抑制。

李中清、王丰在书中再次提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我重申上面提出的观点,尽管对于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我没有理由置疑,但如果将其与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并力图去证明“人口增长并未伴随消费和收入的长期下降”的话,就必须先去证明“人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没有下降,或证明亩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平衡。现有的资料尚不能证明这一点,就不用去谈什么消费或营养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的研究,除了李中清、王丰所引证的外,还有一些相当好的研究成果为他们所忽略。例如,关于20世纪30年代苏南地区的农村生活水平,曹幸穗就根据日本满铁调查做过详细的分析。曹氏的研究是基于满铁调查员所作经济人类学调查基础上的一个定量分析,他在结论中指出:在苏南农家生活费中,食品费占57.3%。根据恩格尔消费系数,这是一种贫困型的经济类型。生活费中显示生活质量的教育费和医药费所占的份额都很低,两项相加不足5%,它表明苏南农村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投医问药的能力^①。曹幸穗对苏南农家经济状况的分析相当扎实,比根据一些零星记载所得结论更加翔实可靠。比较而言,李中清、王丰举例子的研究方法实在不算高明。

江南以外的农民生活可以参照的研究论著更多。学者们研究这一问题根据的是民国年间学者所作大量调查以及冯和法、乔启明等人的研究。最近朱玉湘在一本有关中国近代农民问题和农村社会的专著中专辟《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一章讨论这一问题。他指出,20世纪20年代,农户年收入在150元以下者均为贫困户,而“中国农民大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150元的年

^①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221页。

用年均收入、恩格尔系数作为指标,可以证明当时中国农民的穷困。

收入,就“有足够的粮食维持健康,有相当的衣服保护身体,有适宜的住屋避风雨,这就是所谓温饱的水平,距小康水平还差相当远……而旧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达不到温饱的水平”^①。根据乔启明当年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我国农民消耗于衣、食、住和燃料四项的费用,全国平均占农民总收入的82%,华北占85.6%,华中和沿海占79%^②。结合上引曹幸穗的研究,比较而言,江南农民恩格尔系数最低,但也在贫困线以下,遑论其他地区了。

总之,无论用用户均年收入作为指标,还是用恩格尔系数作为指标,都证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很低,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所说的绝大多数并非指所有的人口,在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包括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然而,在统计的意义上,这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并不具有指代全体的意义,而个别记载中的吃肉天数无法否认中国农民的整体性贫困。中国农民的贫困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否认这一点,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解释,就会缠入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死结当中。

二、死亡

李中清、王丰的第一个论点是:“在中国,死亡对人口的特殊影响不是通过饥荒或流行病而是通过个人的积极干预实现的。饥荒当然发生过,流行病显然也是如此。但这些危机所带来的死亡率后果似乎没有像别处那么严重。”^③对于这一点,李氏、王氏在注释中作进一步的说明:“中国传染病的历史记录很少。部分是由于史料的性质,也可能反映传染病本身很少见。参见邓斯坦(Dunsttan, 1975)、本尼迪克特(Benedict, 1995)对具体传染病的研究。”在邓斯坦和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中国传染病少见

① 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281页。

②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86页。

③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7页。

的说法。邓斯坦的研究属于明代,暂且不谈。就本尼迪克特所研究的清代鼠疫流行的情况看,鼠疫是中国南方广泛流行的地方病。根据我们最近的研究,传染病,尤其是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对于中国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①。

在最近刚完成一项研究中,我和李玉尚专文提出了中国近代鼠疫流行的模式:战争时期,在战区与疫区重叠的地区,人口死亡的70%属于疫死人口。和平时期,鼠疫是中国许多地区的一种地方病,在一般农村,由于民间存在有效的避疫方式,故鼠疫流行造成的危害不大,死亡人口不多;在城市和交通要道,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要比一般农村多得多,已有的证据表明,一次鼠疫流行可能造成交通要道及城市10%~15%的人口死亡。

如果将时间稍作上推,还会发现一些更有意思的现象。例如,如本卷第二章所称,明代末年的鼠疫造成苏、松、杭、嘉、湖五府超过600万人口的死亡。据本书第五卷第七章,洪武二十四年此五府人口为762万,若以3.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崇祯十六年,五府人口接近1800万。崇祯十七年鼠疫中的人口死亡占五府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令我们想起14世纪中叶黑死病造成欧洲四分之一人口死亡的相似一幕。

也就是说,在人口密集城镇众多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地区,鼠疫流行的方式与14世纪中叶的欧洲是相同的。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其特征有二:鼠疫是外源性的,当地人民缺乏基本的避疫知识;人口密集,城镇众多,鼠疫传染的速度快,造成的危害大。

我们承认人工种痘对控制天花传播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一技术的推广,却持谨慎的态度。李中清、王丰根据皇族人口资料认为

^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曹树基《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年)》,《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待刊);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待刊);李玉尚《19—20世纪广东社会对鼠疫的应对》(未刊稿);曹树基、李玉尚《战争与和平:中国近代鼠疫流行模式》(未刊稿)。

传染病对中国人口影响很大。

种痘致使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只是针对皇族人口这一特殊人群而言,甚至没有区域的意义,更不能将这一结论推广到全国。赖惠敏对辽宁地区内务府皇庄人口的研究表明,即使在东北,天花仍是造成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①。19世纪初,霍乱——这一新的传染病的传入对中国人口形成更大的威胁。依据李玉尚目前的研究,自1817年至1821年,霍乱在长江下游的传播主要是沿水道进行的,是全局性的,19世纪至20世纪霍乱在江南不断流行,并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形成一个流行的高潮。霍乱的水性传播特点与长江下游的地理环境相合,也是导致其传染持续发生的重要原因。鼠疫、霍乱和天花同属国际重点检疫的三大烈性传染病,不治状态下的疫者死亡率超过95%。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进行疫死人口的估算,但可以推测,19世纪霍乱在江南地区的流行对于当地的人口增长有着重要的抑制作用。霍乱沿运河传至华北,在华北中南部地区,清代霍乱对人口的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由于以往对疫病历史研究的不足,致使学者们甚至产生“传染病本身很少见”这种现在让我们看来是相当不妥的推论。目前我们的研究只集中在作为事件史的烈性传染病的传播方面,本书第六卷第九章则较为详细地讨论了1910—1953年各种疾病对人口的影响,其中天花、霍乱、各种肠道传染病仍然是导致中国人口死亡的主要因素。

李中清、王丰对于饥荒抑制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论点也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都建立了一系列对付农业歉收的制度,包括18和19世纪一种全国范围内的仓储制度,将每年全国粮食供应量的5%用于重新分配。”关于这一点,他们引用的是李中清和王国斌等人的一项关于仓储制度的研究。中国地域辽阔,所跨自然地带的差异大,灾荒年景多。应当承认,对于一般的灾荒,运作良好的仓储制度可以解决部分灾民的不时之需。遇到灾荒较重的年景,如本卷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揭示的光绪

^① 赖惠敏《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载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

大灾对北方人口的影响,死亡人口多达 2000 余万,非仓储制度所能应付。关于这类特大灾难,李中清、王丰认为更多的情况下是人为的,而非天灾。在第一章中,他俩将光绪初年大旱灾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与大跃进引起的人口死亡进行类比,“信息不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导致错误决策,如在饥荒达到顶峰的 1960 年还要出口粮食。其他更早的饥荒似乎也同样是由于混乱与无知”^①。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所有导致人口死亡的灾荒、瘟疫和战争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的不清明和政府的无能。事实上,我们不能认为在哪个饥荒年代,中国粮食的短缺是绝对的。幅员的广大和地域的不平衡,一些区域的歉收和一些区域的丰收总能大致构成对应。进一步的推论是,从更大的范围看,根本就不存在饥荒,因为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短缺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尽管 1959—1960 年的人口死亡与基层政权的行政失误有很大关系,但将历史时期大的天灾统统归结为同一原因,却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从更大的范围看,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粮食短缺。

李中清、王丰引用沃特金斯和门肯(Watkins and Menken)的研究结果称:“除非饥荒发生非常频繁(每 50 或不到 50 年发生一次以上),即使是严重的饥荒也不是人口增长的原因。”^②沃特金斯和门肯论文涉及中国的部分,主要是依据何炳棣在《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一文中的一个有关湖北省灾害的附表作出的。这个统计表只用光绪《湖北通志》的记载作为依据,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粗糙了一点。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了一系列详细、完备的研究成果^③。这些成果皆未被李中清、王丰的著作所援引。在一个相当早期且相当粗糙的研究基础上,讨论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是不合适的。

再来讨论溺婴对人口的影响。李中清、王丰根据他们原有的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 49 页。

② 同上书,第 61 页。

③ 最典型的如《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 1981 年版。类似的分省分区灾害史研究成果还有许多,兹不一一列举。

研究,认为清朝皇室家族女婴与男婴死亡率之比值大大超过同时代瑞典、英国和法国。他们推算大约有十分之一皇室女孩死于溺婴。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为100的话,在不考虑溺杀男婴的前提下,溺杀女婴造成的男女性别比可能高达111。如果正常的男女性别比为103,同样的前提下,溺杀女婴造成的男女性别比则可能高达114。如果将部分男婴溺杀数加入的话,实际的男女性别比可能为110左右。在本书第四卷的研究中,我将110作为实际性别比的修正值,与此大致相合。的确,溺婴行为是中国人口实行自我控制的一种行为,李中清、王丰称:“这种积极运用死亡的方式意味着生存不仅由外部的‘不幸’,而且由内部的决策所决定。中国死亡率模式的高度差异性,不仅取决于生物学因素,也取决于人为的选择。”^①作为证明,李中清、王丰证明,随着皇室俸禄和津贴的减少,某些年代新生儿的死亡比例明显增加。很显然,溺婴行为是家族内部为应付生计作出的选择。马尔萨斯将此称为出自意愿性的罪恶,是一种处于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之间的一种中间抑制。关于这种抑制,马尔萨斯的观点十分明确,也十分妥当,并无修正的必要。

三、婚姻

在有能力养活一个家庭之前不结婚的个人决策称作“晚婚”,是马尔萨斯赞赏的预防性抑制人口的方式。这种在西方具有普遍意义的婚姻选择并未成为中国的现实。李中清、王丰转述马尔萨斯的观点:“中国人认为结婚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不断香火,第二是为了种族繁衍……如果父亲不能使所有的孩子都结婚,那么他会感到某种耻辱和不安……这些对婚姻超乎寻常的鼓励,使得这个国家巨大的产量被分成很小的份额,而结果导致中国的人口与生存资料相比,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对婚姻的鼓励不仅本身增添了原本众多的不幸,而且也完全损害了他人应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70页。

该享有的幸福。”

马尔萨斯关于中国婚姻的观点并无不当,李中清、王丰对马尔萨斯有关婚姻理论的批评由此变得十分暧昧。他俩一方面指责“很少有人对婚姻市场的性别差异及其对人口体系的意义给予关注”,一方面又称“在中国这个结婚被认为普遍而且较早的国家里,人口学家对婚姻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死亡率的研究”。如果当代学者对于中国的婚姻研究真有不足的话,为什么这是“对中国婚姻的马尔萨斯成见”呢?难道马尔萨斯及其他的支持者们认为的中国式的婚姻“长期以来是推动中国人口增长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有力的发动机”真是错误的?

实事求是地讲,李中清、王丰所讨论的中国婚姻制度的内涵要比马尔萨斯所述丰富得多。例如,在关于中国婚姻的“高攀性”和聘礼的意义方面,在关于中国的多种婚姻选择方式,包括收继婚、童养媳、入赘和一夫多妻等等方面,李中清、王丰揭示出许多马尔萨斯当年所未曾了解的中国习俗。但这一切,还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以详细的资料证明中国女性早婚的年龄较西方女性要早5~10年,且终身不婚几乎是不存在的。就男性而言,“虽然中国男性结婚略早,但在所有社会中,都有约20%的男性在30岁时仍然没有结婚。即使到40~45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仍有10%~15%的男性是单身汉。”由此李中清、王丰认为:“(中国)男性婚姻模式明显不符合马尔萨斯提出的中国婚姻模式。”^①只不过中国男性独身主要是由于女性缺乏,而欧洲男性不婚却是由于要逃避婚姻。

李中清、王丰的这一观点当然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只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男性独身的主要原因真的是由于女性缺乏还是由于贫穷?李中清、王丰的论证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这一点,但他在有关社会阶层与婚姻的分析中却以多种数据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能否进入婚姻取决于家庭资源的多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100~101页。

少,家庭资源则依家庭地位和职业而不同。”这一论述与他们关于中国男性独身主要是由于女性缺乏的观点明显相悖。

从方法论上说,根据族谱、户口册或墓志铭之类的资料进行人口性别比分析是很危险的。众所周知,族谱资料对于女性的漏载是相当严重的,以致于历史人口学家往往将研究的对象局限于男性人口。墓志铭资料也具同样的性质,在本书第四卷中,我曾根据明人文集中的墓志铭资料,进行男性人口各要素的分析。一般说来,墓主是社会上层,在记载的男性后代的同时,有的也记载女性后裔。然而,即使将不计女性人口的墓志铭排除不计,墓主后代人口的女性人口也是大大低估的。赖惠敏根据自己对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资料进行分析,认为户口册对儿童记载不完全,“尤其女孩出生的人数比男孩少得多,至19世纪中叶整个盖州户口册所记录的女孩人数竟然只有个位数”,“道义屯和盖州户口册都属于八旗佐领下人丁,八旗编审人丁,男丁自五岁入户口册,而女孩不挑差,所以多数户口册都没有女孩的资料。”据此她批评李中清的有关道义屯的研究:“李中清以为这是道义屯大量溺女婴的结果,我认为他太相信表面上的数据,没有检讨该资料的性质和可靠性。如果道义屯溺女婴行为那么普遍,为何他无法从史料上得到印证?”^①在同一篇文章中,赖氏指出辽宁农村小孩的存活率不高,溺婴似乎不太可能。造成儿童死亡率高的各种疾病中,天花是儿童生命最主要的杀手。“清代东北地区的百姓对于天花传染病也没有普遍种痘预防措施”。

事实上,即使存在性别比例的失衡,但如果真的如李中清、王丰所说,女婴溺杀的比例仅仅为女婴总数的十分之一,那么,这一比例的失衡完全可能由于男女配偶的年龄的差距而得以弥补。如果这一假设能够成立,我们实际上也就回到马尔萨斯的立场:婚姻造成了对财产的分割,使得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贫穷又使得相当数量的男性退出婚姻市场,从而现实性地抑制了人口的增长。

^① 赖惠敏《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

道义屯的溺女
婴,本身就值得
怀疑。

曹幸穗对 20 世纪上半叶苏南农村婚嫁丧葬费用进行过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家庭依靠借款或典地筹措银钱，能自备婚丧费用的农家甚为鲜见……一个在村中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至少要节衣缩食 10 年之久，才能办一次在当地认为比较‘体面’的婚事”。中等以下水平的家庭则难以为之，许多家庭的典地负债因此而引起。如遇灾荒变故，农民的破产则是必然的^①。江南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则更糟。这一分析表明，在中国人口的婚姻模式上，即使有一些新的发现，但还不足推翻马尔萨斯关于中国婚姻模式与人口增长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

四、生育

传统时代的中国存在婚内节育，是近些年来历史人口学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李中清、王丰转引马尔萨斯的有关观点：“在预防性抑制中，把那种对婚姻进行限制，而又不用不正当的手段满足情欲的方式，称之为道德抑制是适当的……性乱交、非自然的情欲、婚前性生活，以及用不恰当的方法来掩盖不正当性接触的后果等，都可归之为罪恶性的预防性抑制。”继而评论：“马尔萨斯认为道德抑制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而婚姻内^②抑制却不是。”

李中清、王丰首先指出 1800 年以前，欧洲人口的已婚生育率远远高于东亚——其中包括中国——的水平。低生育率是中国社会婚姻的特征，是晚生、早停以及生育间隔长这三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健康文化和生殖文化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各种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技术有助于已婚夫妇节制人口。如果各种措施都失败，才选择溺婴。

李中清、王丰还指出，溺婴在贵族和平民中都相当普遍。以辽宁农村为例，男性登记的出生数的升降与粮食价格呈反比例变化，

^①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 218~220 页。

^② 译者此处将 marital restraint 误译为“婚姻抑制”，见英文版第 83 页和中文版第 123 页。译者将英文版第 88 页出现的同一词译为婚姻内婚姻，是正确的，见中文版第 127 页。译为“婚姻内抑制”才不致于与马尔萨斯关于有经济能力才选择婚姻的“婚姻抑制”相混淆。

即粮价低的年份里出生人数多,而粮价高的年份里出生人数少。中国人不仅根据社会经济状况来控制其生育率,也根据现有孩子的数量和性别来计划他们的生育。

在这里,李中清、王丰着重对一种传统的观点进行批评。他俩指出:“由于中国人对于传宗接代的关注,学者们经常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婚姻唯一目的是生育。事实上,所有参与者首先关注的是如何使配偶融入家庭,从而有助于消费和生产,而非生育……生育必须根据集体的目标和限制与同住的亲属进行协商。”李中清、王丰继续推论:“在这一意义上,目前的计划生育项目仅仅是家庭生育方式向地方社区甚或更大范围的一种延伸。”^①这也就是李伯重在该书封底的评论中所称:“确实,要是中国真的没有人口控制的传统的话,现行的人口政策能如此有效地实行吗?”

18世纪中国妇女的总和已婚生育率尽管低于同期欧洲的水平,但按照作者提供的数据,仍然高达5至6个孩子。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所谓的低生育率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水平。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人口以20‰的年平均增长率高速增长。与欧洲比较而言的低生育率,在中国却仍然是高生育率,对于这一相互矛盾的事实,李中清、王丰并未作任何解释。本章第三节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对于解开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高速增长之谜,有着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一原因,片面地宣称中国人口的总和已婚生育率或总和生育率^②低于欧洲,是没有意义的。作为比较,王国斌采用了一个不同于李中清、王丰的表达:“20世纪的调查指出:中国妇女普遍结婚并且早婚,婚后生育率中等。过去几个世纪内中国许多地方的妇女婚育情况很可能也如此。”^③这一表达更多地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无疑要比李中清、王丰的表达合理一些。

李中清、王丰已经正确指出中国人口的生育有鲜明的性别选

18世纪中国妇女“低生育率”的真实涵义。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138~139页。

② 中国妇女不结婚的极少,故总和已婚生育率即可大致看作总和生育率。

③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39页。

择的倾向。例如,他们发现,“无论清朝贵族还是辽宁农民,没有儿子的父亲的生育间隔都比有儿子的父亲要短,而且,有一个儿子的辽宁农民完全停止生育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种性别选择性的停止生育导致了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高达 500 比 100”;“一个全国性的样本规模——包括近 3 万名出生于 1914—1930 年间,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农村妇女——也显示出这种有意识的已婚生育率控制模式,这些妇女的生育行为不受政府计划生育的影响,也不受现代避孕方法的影响。儿女双全的妇女与只有女儿或只有儿子的妇女相比,表现出持续一贯的控制模式”。李中清、王丰没有忽视这么一个事实:这一所谓的婚内节育,是以追求男孩为目的的。如果说有一种人口生殖传统的话,多育和育男才是最大的传统^①。正是由于这一传统因素的作用,才使得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才使得今天中国农村的计划生育困难重重。政府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许多地区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种马尔萨斯意义上的现实性抑制。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人口的生育传统做出缺乏理性的评价。

五、体系:家庭与国家

李中清、王丰在其书中将中国人口体系概括为:已婚生育率低,死亡率适中,溺杀女婴的比例却较高,并由此引起常见的男子独身现象。作为比较,在欧洲人口体系中,婚姻是对人口增长唯一有意识的抑制,中国人口体系中有多重有意识的抑制,因而远比马尔萨斯及其继承者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也更精于计算。其结果,即使中国女性在婚率高和早婚率高,人口也决不会将经济推到只能维生的水平。

如上所述,李中清、王丰关于中国人口的生存、死亡、婚姻和生育的论述,存在概念和逻辑方面双重的模糊和混乱。没有一项构成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颠覆,相反,在不少方面,若干论据却支持了

^①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近 10 余年来中国人口学界关于中国人口生育意愿的多项调查,以及各项胎次与性别关系的调查。

构成新理论的
一对对悖论。

马尔萨斯。对于李中清、王丰归纳的这一系列概念,完全可以用他俩提供的资料作下列相反的解读:中国总和生育率低——总和生育率高达5~6人(人口低增长时期的18世纪总和生育率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人口高速增长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相近);死亡率适中——人口年平均增长极低(甚至在1953年之前,时间越后人口增长速度越低);溺杀女婴的比例较高——只有10%;20世纪初男子未婚比例大幅下降,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增长速度随之大幅下降。说实话,我从未见过构成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的系列概念中存在如此多的悖论。

李中清、王丰在否定马尔萨斯主义有关中国与欧洲及现实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之间的对立的同时,也提出了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对立,即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①。意思是说,西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人口行为,包括现实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则是家庭和国家集体意志的产物。李中清、王丰强调指出:“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口行为主要是家庭体系的产物。”他们的理由是,对辽宁和台湾这两个省20世纪初之前中国家庭结构的实证性纵向研究显示,“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复杂的复合家庭之中。尽管这种模式在其他地方并不一定如此普遍,而且家庭户也相对简单,但家庭关系和家庭义务仍然很复杂”^②。所以,李中清、王丰认为,人口的生育是由家庭决定的。

辽宁和台湾的案例如果真的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也是某种特殊地域生态背景的产物。台湾是由移民构造的社会,区域人口相对稀少,土地较多,不存在人口过剩的危机。富裕的社会有利于大家庭的发展。在资源短缺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贫困往往是造成分家的原因之一。赖惠敏在上引文中转引日本学者广田豪佐研究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大家族,认为家族的形成与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212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地理环境、农耕技术、交通不便有关,但由于家族内的冲突或外在环境的改变,必须分家。赖惠敏在研究中发现,清代内务府官庄庄头及亲丁的家户通常包括兄弟、子侄或者堂兄弟的大家庭,人口众多,普通官庄壮丁家户人口不过五六人,多数为直系亲属的组合。李中清的观点来源于他对道义屯的研究。赖惠敏发现除了道义屯外,盖州户口册显示当地也有同样的情况。赖惠敏指出:“家庭组织和他们的经济来源有关,八旗人口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必须以少数兵丁的收入来养育多数人口,所以组合成复杂家庭。”内务府官庄不存在此类情况,故家庭结构与八旗不同。据此可见,某些特殊地区特殊人口的特殊家庭结构,甚至无法推广至同一地区其他类型的人口当中,更何况据此来讨论全国的情况。

道义屯的家庭组织是特殊社会背景的产物。

从汉代以降,在官方文献所记载的可靠的户口数据中,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户均口数都围绕5这个数波动,以至于这一数据成为我们检验一个地区户口数据是否真实的根据之一。本书各卷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清代的情况,只要认真阅读嘉庆《大清一统志》中的有关记载就会知道得很清楚。姜涛、李伯重、朱玉湘等人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①。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传统时代中国家庭的构成主要是核心家庭而不是复合家庭。关于这一点,已经不存在继续讨论或争辩的必要。

李中清、王丰在其虚构的中国大家庭的基础上展开后面的论述。他俩认为中国人口行为的基本决策单位是扩展的家庭和户,而不是个人或个别的夫妻。“婚姻、生育以至死亡都要通过个别的交谈和集体决策来决定”,“家长对所有家庭成员拥有绝对权威,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年少的亲戚(弟弟妹妹、表弟妹堂弟妹和侄子外甥)家庭”。如果这一表述超出了辽宁八旗人口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俩讲述的家庭已经不是家庭,而是家族。在许多地区,家族对家

^① 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301页。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419页。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第272~276页。

江南的人口控制，与家族或大家庭没有关系。

族成员的婚姻、生育、死亡有着极大的权力，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江南核心地区的家族并不发达，在19世纪以后更是如此，然而，这一地区的人口控制却又是最成功的，甚至从宋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着—个极低的增长率。可见，江南的人口控制与家族，更与家庭没有关系。在清代移民的迁入区，如四川等地，核心家庭仍是人口居住的主要形态。该地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高，其原因当然也不能归结为当地缺乏大家庭或大家族。我们承认在某些地区，家族对于家族内部人口有着极强的控制，但此类行为却没有普遍的意义。

尽管如此，李中清、王丰还是企图进一步从以下逻辑结构中展开自己的证明：“正如中国的父母对其孩子有财产权力一样，中国的国家也对个人拥有财产权力。”所以，他俩认为，对于人口的控制也是中国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传统。说实话，李中清、王丰对于这一过程的证明实在是太简单了一些。传统时代的中国政府是采取过诸如登记户口、控制迁移、禁止溺婴等诸种人口控制的措施，但从未对人口的生育有过法令上或实际上的限制。从个人主义立场上看，传统时代的中国政府对于人口的婚姻和生殖行为充满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同时代及现时代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几无二致。最典型的例子是，乾隆皇帝感觉到人口过多造成了人民的贫穷，他唯一能够采取的行动是调查人口，而不是禁止人民生育^①。将现在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说成是“最近半个世纪中的国家政策只是简单地继续和扩展了上述传统”，是非常不妥的。理由很简单，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口的生育从未成为国家法令关注的对象。至于婚姻，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权总是鼓励婚姻，而不是相反。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李中清、王丰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有限的资料进行错误的解读，最后构造出一个似乎颠覆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新理论。

^① 姜涛对这一过程讨论甚详，参见其《中国近代人口史》第三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节 中国人口体系的新构造

在本卷结束对清代人口历史的构建时,读者或许会问,既然李中清、王丰的体系不能成立,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口体系仍未跳出马尔萨斯的基本命题。李中清、王丰的著作促使我们从一个更为宏观层面来考虑中国人口体系的建设问题。在以上各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概念,作为这个体系构造的基础。本节还将讨论一些其他的概念,为中国人口的体系建设作准备。

一、人口过剩:定义和内涵

李中清、王丰在他们著作的第一章中宣称:“我们向‘中国人口过剩’的神话提出了挑战,并用一系列指标来显示:在马尔萨斯时代,中国的生活水准不仅能与西方相比,甚至在近几个世纪,而不只是近几十年,中国的生活水准提高了。虽然不一定是不断地和一致地提高。”如上节分析,他俩的分析指标,包括亩产量和身高等等,数据本身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与20世纪以前的人口数据结合进行分析时,则都是错误的^①。产生这类错误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作者分析时的粗枝大叶,部分是由于资料本身存在缺陷。

总的说来,李中清、王丰用来证明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剩的证据是一些过于个别的例子。例如,你可以证明某地的雇工吃肉,我也可以证明该地的佃农无肉可吃。这种举例子的证明方法,实在是不足取的。因为,在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可能存在相反的事实。

举例子的研究方法实不可取。

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人口生活水平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举例子的方法又不可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呢?我想从“人口过剩”这一概念的重新厘定和解释入手,寻找新的解决方法。

^① 唯一不产生错误的是关于1953年以后的数据。然而,关于1953年至今中国人口数据的各种分析,可见于大量当代人口学家的著作。

李中清、王丰在他们的书中没有对“人口过剩”进行定义。在该书第三章注6中,他们转引其他学者的研究,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人口过剩定义为“平均产量低于最低生存线,从而使得死亡率上升,或婚姻推迟,人口增长受到抑制的临界点”。在同一章注20中,李中清、王丰引用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1600卡路里为最低生存水平线,并引用卜凯在1929—1933年进行的调查,估计当时中国人每天获得的卡路里为2365。显然,他们认为此线之下,则为过剩。“平均产量低于生存线”是一个没法展开具体分析的概念。1600卡路里可以作为一个操作的标准,但是,过剩的标准难道仅仅是没法生存?按照“死亡即过剩”的标准,李中清、王丰认为,无论在马尔萨斯时代还是在今天的中国,都不存在人口过剩。“尽管中国人口从1750年的2.25亿持续增长到1950年的6亿和今天的12亿以上,但人口过剩的阴影似乎一直是一个神话。”^①“人口过剩导致贫困”或“贫困意味着人口过剩”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对于人口过剩涵义的基本理解,我们可以根据居民是否贫困来判断一个区域是否存在人口过剩。“死亡即过剩”是李中清、王丰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归纳,然未必符合马尔萨斯的原意。我理解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是:“人口过剩导致贫困,贫困导致人口死亡。”李中清、王丰理解的作为人口最低生存线的卡路里标准不能用来判别人口的生活水平,只能用来判别猪或其他动物营养水平的高低。李中清、王丰的表述构成了一个与著名的“荷兰谬论”^②相媲美的“中国谬论”。

卡路里标准只能用来判别家畜的营养水平。

现代生态学家关于人口过剩的概念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保罗·艾里奇和安妮·艾里奇正确地指出:

理解人口过剩的关键,不是人口的密度,而是一个地区内的人数和与此相对的资源以及承受人类活动的环境容量,也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50页。

② 几十年前《福布斯》杂志认为荷兰不会人口过剩,人们现在把它称作“荷兰谬论”。荷兰每平方英里之所以能够养活1031人,只是因为世界上其余地方养不活这么多人。

就是一个地区的人数和该地区供养能力之间的关系。一个地区在什么时候算得上人口过剩了呢,那是在这个地区不迅速耗尽不可更新的资源(或把可以更新的资源转换成不可更新的资源),不使环境供养人口的能力退化下去,便维持不了当地人口的时候。一句话,倘若一个地区的长期供养能力因为当前居住的人们而明显地下降时,这个地区就是人口过剩了^①。

现代生态学家有关“人口过剩”的定义。

按照这一标准,“整个地球,实际上是每个国家,现在都已出现了人口大量过剩的情况”。非洲的人口过剩,是因为土壤和森林资源的迅速枯竭使将来非洲供养人口的能力要比现在低。美国正在耗尽本国的水土资源,而且严重破坏全球环境体系。几乎所有一切富裕国家的人口都已过剩,因为他们都在迅速消耗全世界的资源库存。艾里奇夫妇的定义和解释给我们启发,至少让我们明白李中清、王丰“向中国人口过剩的神话提出挑战”,尤其是向今天中国人口过剩这一概念进行挑战的举动是多么的不合适。

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与今天已大不相同,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概念与今天生态学家的表述大不相同。现代生态学家不仅讨论现存的人口,还考虑未来的人口;不仅讨论抽象的全部人口,更强调区域人口和区域环境的意义。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与今天的人口过剩是两个既存在联系,又存在区别的概念。简单地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概念用于今天,是不妥当的。同样,用今天生态学的概念去批评马尔萨斯,也是不合适的。

今天的中国是否存在人口过剩,按照上引现代生态学的定义,这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工业化以前的社会是否存在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定义和现代生态学的定义都有合理的一面,但都不够完整。针对传统农业社会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我将“人口过剩”的定义转化为四个操作性原则,用于研究清代中国人口问题。这四个原则不能孤立地运用,需要整体性的综合运用,方不致于得出谬误的结论来。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概念与今天的同一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① [美]保罗·艾里奇、安妮·艾里奇《人口爆炸》,第28页。

判别“人口过剩”的四个原则。

其一,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生活水平降低。

其二,生活水平不变或提高,但不可再生之资源急剧减少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其三,某一区域的人口必须通过向外迁移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如果还存在人口外迁的区域,人口过剩便是区域性的。如果外迁的区域都不存在,人口过剩则为全局性的。

其四,为争夺资源发生大规模械斗或战争。

根据这四个原则,可以得知 18 世纪至 19 世纪中国的“人口过剩”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兹结合区域人口变动过程分别叙述如下。

二、区域人口过程

1. 清代前期的区域人口

区域人口过程是分析问题的新思路。

清代的大规模移民和新作物的传播支持了人口的增长。这虽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念,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对这一结论形成挑战。

按照我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中的估计,至 1776 年,四川、云南、贵州、陕南、湘西及鄂西南、江西、浙江等省接受的外省移民人口及其后裔多达 1129 万。本卷对四川及江西移民数有所修正,两省各增加 340 万和 30 万移民及其后裔。在北方地区的辽东、蒙古,即使在严格的封禁令下,大量人口的外迁仍然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整个北方地区移民人口及其后裔多达 233 万。在东南沿海,潮州、泉州及漳州的移民大量入迁台湾,另有粤北客家移民迁入广东沿海和广西,他们及其后裔的人口多达 205 万。

由于明代末年的战争和瘟疫,四川及陕南人口大量死亡,清代的移民因此而迁入。江西、浙江两省的丘陵山区,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部分由于其他别的原因,移民的迁入有恢复经济和开发山区的双重意义。至于云南、贵州和湘鄂西地区,改土归流之后,少数民族人口或被屠杀,或退缩至更为僻远的山区,汉族移民得以大规模迁入。台湾的原住土著民族人口稀少,汉族移民开发了这

孤立海中的宝岛。由于战争,清代初年的辽东人口稀少,故成为关内汉族移民入迁的乐土。尽管有清一代禁令严厉,但一遇灾荒,关内人口纷纷“走西口”,“闯关东”,清廷亦无法阻挡。长城以北有承德及更北边的蒙古草原因大量汉人入迁,牧区变成农地,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北移。

清代前期人口大量外迁的区域有闽西、闽南、粤北、赣中、赣南、湘南、鄂东、皖南、皖西、晋中、晋南、胶东等地,这些都是著名的人口迁出区。这些区域历史上就是人口的密集区,土地垦殖基本完毕。生活资料的增长除了依靠亩产量的提高外,玉米、番薯等新作物的传播有助于一些更为贫瘠的土地的利用,从而导致区域内作物总产量的提高。

清代前期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类不同的地带,人口外迁区可以称为人口过剩区,人口入迁区当然不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笼统地将 18 世纪的中国称作人口过剩是不妥当的,盲目地否定中国的人口过剩现象,并以此来挑战马尔萨斯主义,更是不合适的。

和平时期的
人口外迁区为人口
过剩区。

2. 清代中期的区域人口

由于缺乏 1679 年的分省人口数据,无法就 1679 年至 1776 年的各省人口增长速度进行比较。但一般说来,在四川、陕南、辽东、承德及蒙古草原,原有的人口相当少,其间存在大量的无人区,人口从无到有的增长,人口迁入不多,但速度仍是相当惊人的。如果将 1776 年视作清代中期与前期的分界点,那么仍可看出,从 1776 年至 1850 年,移民入迁区的大部分省份人口增长率仍高于移民迁出区或无移民地区。从 1776 年至 1819 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6‰ 的省份有辽东、吉林、黑龙江、陕西、四川、云南和贵州。1820 年至 1850 年,新疆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 6‰,贵州则低于 6‰,陕西则从上一阶段的 9.6‰ 降至 2.9‰,其他省大致不变。

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移民开垦是以农业为中心的。最初的移民集中于平原,以后向丘陵,再以后向山地发展。地域的广阔和潜在可耕土地的充裕,为清代中期这些区域的人口增长提供了资源上的保证。四川由于平原面积广大,潜在可耕地多,故人口增长速度就要快一些。直至 1953 年,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一直维持

在7‰以上。

就区域的整体性而言,陕南地区是清代前期西部移民大潮中的最后一块完整的蛋糕。因其移民的大规模迁入迟至乾隆、嘉庆年间才展开,所以短时期内人口的迁入量大,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从本卷表16-1中可见,1820年以后陕西人口增长速度的突然降低,是陕南山区人口增幅突然减少所致。陕南山区因原始森林大量被伐,林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加剧,山区马铃薯病害严重,导致移民四散,人口的增速趋缓。山区林业虽然可以归入手工业之中,但这种工业的内涵是以大量攫取千百年来地球表面形成的有机物为特征,相对于农业而言,其本质未变,但是更具掠夺性。随着资源的匮乏,山区林业无以为继,林业经济随之萧条了。陕南地区的人口变动,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

陕南地区的事例提示我们,在南方,随着清代前期移民大潮的结束,大量可耕地和潜在可耕地的开垦已经完成,传统条件下资源利用接近饱和。受到人口增长惯性的驱使和生育文化的影响,各地的人口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减缓,但不可能出现大的逆转,即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因此,即使各地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4‰左右,也可以肯定亩产量的增长不可能达到同一速度。清代中期南方地区人均占有资源的减少应是没有疑义的。

然而,四川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南方人口与资源的平衡创造了条件。长江上游的米粮对于长江下游的粮食供应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长江下游米粮的不足部分,大部分依靠长江上游来供应。因此,即使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但外来的粮食运销,仍可以使这一区域保持供给上的大致平衡。尽管如此,但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清代中期南方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

作为这种紧张关系的标志,我们看到南方山区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水土流失。大量的山地被垦为耕地,玉米在南方山地得到普遍的种植。有关记载,大量出现在各地的地方志中,已经构成严重的生态问题。也就是说,在已无空地可移的地区,生活水平的维持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毫无疑问,清代中期南方已经出现了大范

围的“人口过剩”。

由于北方存在大片潜在的移民区,使得北方人口的过剩情形不如南方严重。封禁令下的人口北迁虽然不容易,但毕竟为多余的人口提供了一条谋生之路。在一般的灾荒年份,华北地区的人口大量北迁至辽东、蒙古等地,对于灾情的缓解不无益处。如果不是封禁政策限制,北方人口的外迁规模会更大,外迁速度会更快,人口增长速度会更高。既然存在灾荒年景的人口北迁,也就意味着李中清、王丰极力夸赞的仓储制度并不能够有效地缓解天灾的压力。这一事实的含义在于,封禁条件下华北地区的资源限制使得清代这一区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低于明代,灾荒年景对于外迁的承认又使得这一区域的人口不致于因为食粮短缺而出现大的危机。总之,关外的大片荒地是华北地区潜在的资源供应地。清代中期以前华北地区的人口与资源在某种紧张状态下达到了大致的平衡。

3. 清代后期的区域人口

如本卷各有关章节所述,从 1851 年至 1877 年,波及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地区的太平天国战争及战争中的瘟疫导致了苏、皖、浙、赣、鄂、湘、闽七省 7330 万人口的死亡。西部回民战争引起的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四地人口死亡多达 2220 万。光绪大灾造成的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五省人口死亡达到 2290 万。合计死亡人口高达 11840 万。1851 年,中国人口为 4.36 亿,死亡人口占战前人口的 24.7%。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实际比例要低一些,因为导致人口死亡的灾难持续了 27 年,与之比较的战前人口却是一个年份的。由于部分地区人口死亡的同时,另一部分地区人口却在增长,所以,可供比较的战前人口实际上要多一些。无论如何,这两场战争和一场灾难所导致的人口死亡合计占全国总人口的 20%应该是有问题的。

1851 年 1 月广西客家人发动的太平天国战争,本身并非由土客之间对土地的争夺而引起。土客矛盾对于太平天国集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以广西当时的人口密度论,并没有发展到需要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地步。所以,在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中,既

太平天国战争
与粤东客家人的
外迁有关。

有无地的手工业者、挑夫和贫苦农民，也有家财万贯的地主。太平天国的起因，主要是由洪秀全创立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教义进行活动和鼓动的结果。当然，如果追溯得远一点，如果没有广东客家人入迁广西，可能就不会有这场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的起因，终究与战前粤东地区的人口过剩有关。

大理平原容纳的人口有限。战争起于此地与资源的紧张不无关系。

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在大理揭竿而起，西南边陲由此陷入一场时间长达16年的战争中。19世纪中叶，云南人口仍处于较快的发展过程中。从全省范围而言，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并不突出。地处苍山之下、洱海之滨的大理平原，容纳的人口是有限的。这一地区高海拔的山区几乎没有发展农业或牧业的可能。因此，以民族纠纷引发的战争，可以看作是大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争夺资源的结果。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中旬，渭南回汉两族人民因为砍伐竹林，纷争骤起。汉人团练借故大肆杀戮回民，回汉冲突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关中平原及关中平原以西这一陕西最富饶的农业区域，战前人口相当密集。民族纷争的后面也隐藏着争斗双方对资源的争夺。

广东沿海大械斗的本质为土客之间的资源争夺。

广东沿海的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引发土客之间的冲突。咸丰四年开始至同治六年结束共持续14年的土客械斗，导致大约50万人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械斗实际是一场规模不小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分新宁县设赤溪厅(今台山县)以集中安置客家人，安置不下的客家人则由政府组织迁往粤西地区和广西。这一事实暗示清代前期粤北地区的人口过剩，在清代中期以后已经扩散到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

清代前期台湾的分类械斗反映了移民社会的不稳定性。这类械斗当然不是移民迁入地的人口压力所致，而是移民迁出地人口过剩的另类反映。台湾械斗与广东沿海械斗的性质稍有差异。

清代后期历次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有人口过剩和资源争夺的因素，但对于战争波及的所有地区而言，则不能一概而论。太平天国战争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的大量死亡，本身与这一区域人口是否过剩没有关系。光绪初年的特大旱灾，由厄尔尼诺现象所引

起^①，非人力所造成，与北方人口的数量或性质无关。但是，由于灾区人口众多，政府的赈灾工作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当地的粮储面对如此巨量的人口，变成杯水车薪，外地运入赈灾粮食往往没有到达，就被沿途饥民抢劫一空^②。我们不能将这种灾难与人口的数量当作完全无关的东西。

对于上述经历过严重灾难的地区而言，无论灾前人口存在何种程度的过剩，灾后人口压力较战前得到缓解则是没有问题的。在苏南地区的西部诸府、安徽、浙江的许多地区，战后都有较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也有一些地区，既没有移民迁入，土著人口也未出现高增长，江苏的苏州府和浙江的嘉兴府就是如此。而在绍兴府，战争中人口死亡甚多，然战后仍有力量向外移民。在长江中游，鄂东地区人口仍然较多，但战后向长江下游地区的移民使人口压力得到继续缓解。迁入长江下游的移民中，最大量者来自河南南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一区域并未受到大的干扰，故在战后担当人口输出者的角色。在强大的湘勇保护下，湖南所受兵燹较轻，人口死亡不多，人口分布依旧密集。战后大批湘军将士的解甲归田，他们将从长江下游地区掠夺的财产带回家乡。外部资源的大量输入，使湖南经济和人口有可能维持发展的势头。广东沿海的人口过剩并未因 50 万人口的死亡和战后客家人口的外迁而有太多的缓解。因此，大量的海外移民便成为这一地区缓解人口压力最有效的途径。最典型的例子是，客家人聚集的赤溪厅，即今天的台山县，成为广东著名的侨县。客家人的外迁，当然是赤溪人口过剩的结果。

再来看看北方的情况。由于光绪大灾的影响较轻，直隶、山东和河南南部人口并未遭受大的损失，依然保持原有的发展势头。战后河南南部人口向长江下游地区的移民，部分地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对于直隶、山东人口而言，向东北及蒙边地区迁移几乎成为唯一的缓解压力的途径。

① 满志敏《光绪三年大旱灾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 年第 6 期。

② 参见刘仁团《光绪大灾对山西人口的影响》，《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东北的开垦有助于人口压力的缓解。

1860年,在地方官员和民间社会的压力下,清政府首先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第二年又向移民开放了吉林西北草原,大规模的东北移民垦殖因此而展开。光绪初年,热河、绥远、察哈尔地区相继开放,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全面开放东北各边荒地。直隶、山东以及山西人口大规模迁入。北方边地的开放有效地化解了华北地区的人口危机。直到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对东北地区的移民垦荒一直在进行。东北因此而成为中国最富饶的粮仓,对于20世纪中国人口压力的缓解,确是功莫大焉。

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口背景的差异、政府的政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都决定了18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口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变动模式中:区域性的人口过剩—移民或战争缓解过剩—新的人口过剩逐渐形成。这一模式可以简化为过剩—缓解—重新过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19世纪下半叶战争、瘟疫和灾荒造成的人地关系的宽松已经不复存在,区域性的人口过剩已经演化为全国性的人口过剩。毫不夸张地说,人口过剩的难题缠绕着中国人,成为威胁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梦魇。

4. 商业人口:不同的区域类型

传统农耕社会中的商业区域。

尽管从理论上说,18世纪、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但如果深入到区域的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农耕社会的大范围内,其实还存在多种多样的区域经济结构。如江南,这一时期手工业与商业已经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徽州,当地的商业或许并不发达,但经商的徽州人几乎遍及天下。同样的情况还可见于有关江西商人和山西商人的大量记载:江西和山西自身的商业并不十分发达,但江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却走遍天下。在这些区域中,区域内的人口可以利用的资源已经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有限的耕地上,有着广泛市场联系的商业、手工业成为当地主要的产业,行走天下以牟利的商人为家乡带回了利润,也扩大了资源的供给。

江南地区人口预防性抑制的技术细节已经从李伯重有关江南

人口节育、避孕的研究中得到证明^①。在本书中,我与吴松弟证明,至少从南宋开始,江南人口便表现出一种稳定的低增长,长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4‰。太平天国战争后,苏州府、嘉兴府接受的移民不多,人口增长可以大致看作人口的自然增长,从1800年至1910年,两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2‰和2.6‰,从1880年至1953年,两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有3.84‰和4.27‰。太平天国战争使苏州、嘉兴两府的人口损失达三分之二左右,但战后并没有出现人口的高增长来进行人口之补充。

又如徽州,大量商业人口的外出不仅减轻了徽州当地的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经商活动获得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流回家乡。实际上,就为家乡输入了外部的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徽州本地的资源短缺。太平天国战争使徽州人口损失了大约80%,战后人口生活的水平一下因人口减少而有很大的提高,胡适的父亲称同治五六年间皖南农民“家有余谷,厨有肉,瓮有酒,餐饌丰盛,时或畅饮至醉,无不尽情重享升平之乐”^②,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从战后至1953年,徽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5‰,也是一个较低的水平。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江西,明清时期于20世纪上半叶,江西商人以赣中地区的临江府为中心,大量非农人口世代从事中药及相关商品的贸易。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临江府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然而,根据本卷表16-1,从1880年至1910年,该府人口几无变动,从1880年至1953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6‰。临江府未受到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这一数据的变动不存在国内革命战争造成的新的人口死亡,因此,所得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由此可以说明,即使在传统时代,对于一个流动的商业性社会而言,人们对于生育的控制是具有相当理性的。对于这三个地区的居民而言,即使战争使得空闲的土地增加,但习惯以商业或手工

商业人口对于生育的控制较有理性。

①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节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 转引自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第273页。

业为生的居民,并不会因此而转向土地耕作,弃商从农。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区域预防性人口抑制的社会经济背景大体与现代西方相似。

在经历过光绪大灾的打击后,山西人口的损失比例接近一半。战后至1953年,山西人口出现补偿性增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而在灾前,只有3‰~4‰的低速度。太平天国以后,无论从事盐业还是票业,以地域为纽带的山西商人集团已经式微,山西人外出的冲动不复存在。人均耕地的增加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李中清、王丰可能会反驳我,从辽宁道义屯人口行为的分析结果看,农业区域也存在婚内节育,此即预防性抑制的方式之一。然而,农业区域的人口预防性控制,是应付人口过剩的压力所致,婴儿出生率会随着年成的丰歉和物价的涨落而波动。商业区域的人口变动相当稳定,并不因年成或粮价而波动。两类区域的人口预防性控制的方式可能是不同的。正如上文所指出,农业区域的此类预防性抑制,是以溺婴为主要方式的,在江南、徽州及赣中平原,溺婴的程度可能低得多。两类地区抑制人口的方法存在着差异。

李中清、王丰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意识的生育控制早已在‘有意识选择的计算’之内。中国非同寻常的快速生育率转变因而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不需要态度的转变,而只需要建立新的目标和制度,以及有效技术的传播。”^①这就忘记了一个他们在研究中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农民是根据收成和粮价来调节人口的,如果粮食充裕,就可以不断生育,直到粮食不足出现生存危机。当前中国计划生育的最大难点,在于教育农民将发展而不是将生存当作人生的目标。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教育农民明白,吃饱肚皮并不是人生的理想,也不是生育的理由。

^①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135页。

三、时间、空间的缠绕与对立

李中清、王丰的研究是建立在若干案例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在这类研究中,时点性的研究往往很难与长时间的变化结合起来,小区域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往往很难推广到一个更大的地区,遑论全国。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尺度,常常构成相互之间的绕缠与冲突,试举例分析如下。

1. 生育率与增长率

李中清、王丰援引若干区域性的微观研究证明,18世纪以来中国妇女的总和已婚生育率或总和生育率高达5~6人,1982年进行的千分之一人口(样本人口达到1017574人)生育率抽样调查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为5.44,50年代为5.87,60年代为5.68,70年代为4.01^①。40年代的人口生育水平已接近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口高速增长时的水平。如果细分,则知194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5.25,1943年为5.30,1946年为5.51,1949年为6.14。40年代的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在不考虑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及光绪大灾的情况下,18世纪以来清代人口增长的速度仍然相当低。从人口统计的观点看,排除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灾难不计,人口总和生育率高,人口增长的速度就快;对于一个特定时期而言,在此前一个时期没有出现大的人口增长的背景下,人口总和生育率低,人口的增长速度也低。现在的问题是,20世纪40年代或之前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真的可能与50、60年代相似?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数据进行正确的解读。在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调查之前同年举行的第三次中国人口普查中,已经进行过15岁至64岁妇女活产及存活子女状况的调查。所谓存活子女状况,指的是1982年仍然存活的子女数。将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调查数据全部列出来,过于冗

20世纪40年代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与50年代、60年代相近,但40年代的人口增长速度却大大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原因何在?

^① 引自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页。

长。除了两个直辖市外,兹根据东北、华北等大区的划分,每区各选择一省分别按相应的年龄组列如表 19-2 和表 19-3。华北地区省份较多,择河北及河南列入。

表 19-2 1982 年十一省市 55 岁至 59 岁组妇女
终身活产及存活子女状况

地区	妇女人数	活产子女数	存活子女数	存活比例 (%)	平均每一妇女活产子女数	平均每一妇女存活子女数
北京	173236	838787	695690	82.94	4.84	4.02
上海	313656	1461850	1209531	82.74	4.66	3.86
辽宁	571036	3414394	2778105	81.36	5.98	4.87
河北	949370	4758862	4043230	84.96	5.01	4.26
江苏	1147548	6226443	4693423	75.38	5.43	4.09
浙江	675995	3785227	2896463	76.52	5.60	4.28
河南	1312158	6670036	5424005	81.32	5.08	4.13
湖北	832300	4885326	3330573	68.18	5.87	4.00
广东	1012178	4979375	4238684	85.12	4.92	4.19
四川	1628338	9646030	6240840	64.70	5.92	3.83
陕西	426703	2415033	1816078	75.20	5.66	4.26
合计	9042518	49081363	37366622	76.13	5.43	4.13

资料来源:1987年《中国人口年鉴》,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510页。

表 19-3 1982 年十一省市 60 岁至 64 岁组妇女
终身活产及存活子女状况

地区	妇女人数	活产子女数	存活子女数	存活比例 (%)	平均每一妇女活产子女数	平均每一妇女存活子女数
北京	131880	636518	490353	77.04	4.83	3.72
上海	255001	1229306	934413	76.01	4.82	3.66
辽宁	428716	2526791	1927186	76.27	5.89	4.50
河北	711905	3308632	2694734	81.45	4.65	3.79
江苏	992073	5285451	3703975	70.08	5.33	3.73

续表

地区	妇女人数	活产子女数	存活子女数	存活比例 (%)	平均每— 妇女活产 子女数	平均每— 妇女存活 子女数
浙江	557634	2989228	2091785	69.98	5.36	3.75
河南	1136703	5141684	4011089	78.01	4.52	3.53
湖北	708865	3918510	2394624	61.11	5.53	3.38
广东	833252	3708178	2994644	80.76	4.45	3.59
四川	1347099	7801787	4662653	59.76	5.79	3.46
陕西	383704	2082730	1468702	70.52	5.43	3.83
合计	7486832	38628815	27374158	70.86	5.16	3.66

资料来源：同本卷表 19-2。

据上引 1982 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调查,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妇女生育峰值年龄,在 24.7 岁左右。1982 年年龄组为 55 岁至 59 岁的妇女出生于 1923—1927 年,她们在 1949—1953 年间进入生育峰值年龄。1982 年年龄组为 60 岁至 64 岁的妇女出生于 1918—1922 年,她们在 1944—1948 年间进入生育峰值年龄。十一省市 60 岁至 64 岁年龄组妇女活产子女数为 5.16,55 岁至 59 岁年龄组妇女活产子女数略高,为 5.43。所谓“活产”,是指排除“死产”在外的成功生育。对于 55 岁以上年龄组的妇女而言,这就是她们的终身生育率。这一结果较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调查结果略低,是因为表 19-2 和表 19-3 未包括所有的省市,且作为样本的十一个省市中,包括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大城市。

这批妇女的终身生育率能否代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则是另一个问题。仔细思考,1982 年的回顾性调查,其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出生于 1918—1927 年的调查对象,其年龄必须超过 55 岁,同一年代出生但死于 55 岁之前的女性人口的生育率不包括其中。寿命较短的妇女其所属社会阶层较低,因为贫困和疾病最易造成人口的早亡。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影响了西部

地区以外几乎所有的省份。战争中死亡的育龄妇女人口并不在少数,她们的生育情况根本不可能为1982年的调查所涵盖。所以,这一调查关于20世纪4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肯定是不准确的。由于存在对早夭孩子的禁忌和记忆方面的问题,妇女并不一定愿意告诉或记得已死去或溺去的孩子^①。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1949年以前,在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如此,随着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渐完善,早夭的婴儿越来越少。

由于缺乏确切的统计数,欲根据期望寿命或表中所列分年龄、分性别死亡人口来修正20世纪40年代的人口生育率,就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表19-2和19-3提供了另一组关于存活子女数的记载,使得我们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根据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调查,20世纪40年代中国妇女初婚年龄平均为18.4岁,50年代为19岁。这就意味着1918—1927年出生的妇女,他们与长子或长女的年龄差大约为19岁。1918—1922年年龄组出生的女性人口,生育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度过的。虽然两场战争波及地区并不一致,但对这一年龄组人口的影响却显而易见。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其遍及全国的公共卫生机构,如县级西医院、疫病防治所等,但对全国而言,公共卫生体系的全面建立以及这一体系从县城深入到乡村,却是在50年代发生的。所以,对于在1950年前后出生的婴儿来说,疾病对他们存活概率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1982年,60岁至64岁年龄组妇女的儿女们大约为30岁至40岁,55岁至59岁年龄组妇女的儿女们年龄更小,都未进入死亡的年龄。因此,她们的子女数不至于因死亡而被少记。表19-3中揭示,60岁至64岁年龄组平均每一妇女存活子女数只有

^① 曹锦清、张乐天等在1990年代初浙江海宁县的实地调查表明:“生后数月内死去的婴儿,有的甚至连父母自己都记不大清了。”引自曹锦清、张乐天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根据这两位调查者的叙述,我们相信生后数月内的婴儿死亡在几十年后是难以完全调查清楚的,尤其是通过人口普查员来进行此项调查更是如此。

3.66人,要明显少于下一个年龄组的4.13人,反映的是战争及疾病,其中主要是疾病对子女存活率的影响。

这样,我们只能将3.66当作20世纪40年代平均每一个中国妇女实际养育率的最高值。如果将战争及灾荒中过早死亡的成年女性以及50年代初期对生育的鼓励造成的人口多育考虑在内,40年代及此前中国妇女的实际养育率应该较此值为低,估计只有3个孩子的水平。至此,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有效养育率的偏低与人口增长速度的偏低是相互吻合的。50年代小孩存活比例的提高,实在是政府全面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结果。

作为证明,李中清、王丰还引用Telford对安徽族谱中1520—1660年11804个样本分析:已婚总和生育率(TMFR)为5.4。明代的人口增长与清代并不相同,区域之间的差异颇大,在此我们不加讨论。其他的分析所用样本规模较小,时间跨度又很长,很难对其可靠性作出判断。至于家族人口的结构与变动是否等同区域人口的结构与变动,则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问题。

2. 家族人口与区域人口

家族人口与区域人口的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与此相关的,还有个别村庄的人口与区域人口的关系,皇族人口与满族人口及全国人口的关系等等。如果要将部分代表全体,从统计学的观点看,只要样本的数量足够大,样本的分布足够均匀,抽样及分析的方法正确,样本就可能代表全体。

然而,在李中清、王丰的研究中,我们见到的只是一些零散的例子:不多的家族、零星的村庄、特殊的人口——皇族人口,这类人口的居住区域相当狭小,人口总量不多。作者对这类人口的研究又没有正确的全国性的人口数据作为背景,却希望借此建立全国性的人口体系,岂有成功之可能?

在我曾经研究过的湘、赣、浙三省,从总体上说,作为样本的家族人口的增长水平一般都高于区域人口增长的实际水平。我指的是区域,而不是全国。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利用不多的家族人口是无法对全国性的人口结构和变动趋势发表意见的。从下文的分析中可见,利用家族资料对区域人口结构及变动规律进行概括,也是

20世纪4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高,夭折子女数亦高,导致人口的高生育和低增长。

需要谨慎对待的。

图 19-4、图 19-5 显示出三省不同性质的家族人口变动的不同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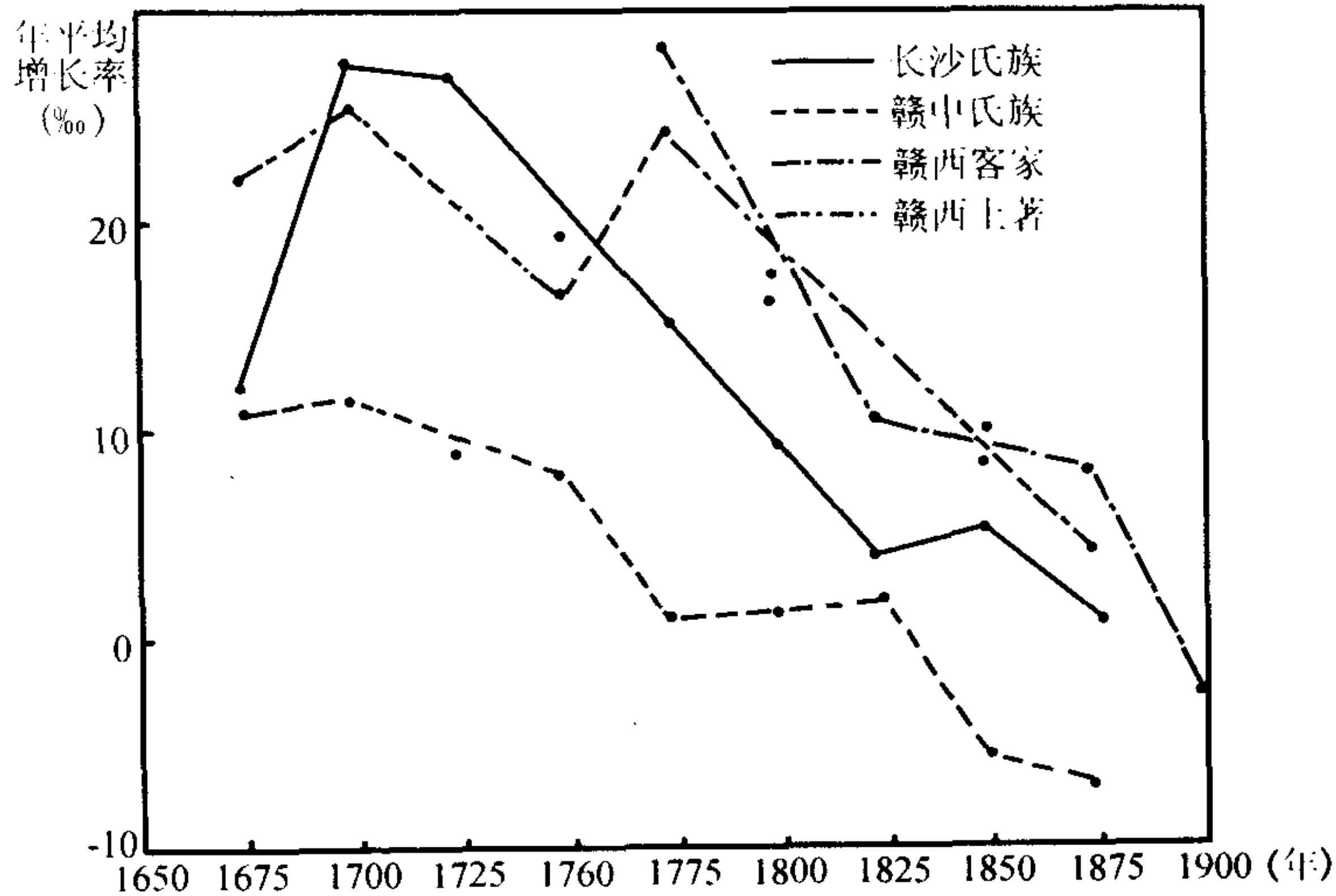


图 19-4 清代湘赣地区若干家族人口增长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 627 页。

家族人口的变动甚至不能反映区域人口的变动，遑论全国。

就人口增长速度的绝对值而言，从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赣中地区的三个家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从 11‰左右降至 7.3‰。与本卷第四章揭示的同一时期赣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相比，要高出许多。1776 年至 1820 年，临江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足 2‰。从 1820 至 1850 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稍高，也只有 3‰。很明显，如果将这三个家族的人口变动当作区域人口变动的代表，我们将无法解释清朝前期赣中地区的人口状况。同样，如果我们认为 1825—1850 年赣中三家族的人口锐减是赣中地区人口变化的缩影，我们也将面临无法解释的困境。在没有大的战争、瘟疫和灾荒的情况下，人口的大幅减少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图 19-4，如果认为 17 世纪末及 18 世纪初，长沙一带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 20‰，也是不可信的。造成这一错误的

原因,应该是族谱对人口登记的错误所导致。理论上 30 年重修一次的族谱,实际上往往相隔 6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时间相隔越久,人口丢失的比例越大。相对而言,距离修谱时间最近的年份的人口数据最为可靠。图 19-4 中所有族谱的修撰年代,除了赣中习氏修于 1875 年以外,其余各谱都是 1900—1910 年之前修撰的。

基于这一判断,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赣中三个土著家族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左右,就与本卷表 16-1 中所列数据计算所得同一时期区域人口的增长速度大致吻合。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在以 25 年为一期的数据中,长沙地区四个家族几十个支系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合计为 8.4‰、4.1‰和 5‰,据表 16-1,1776 年至 1819 年和 1820 年至 1851 年,长沙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6‰和 5.8‰,与家族人口变动大致相合。本卷第十四章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对长沙地区影响不大,战争期间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战前相同,图 19-4 中的长沙家族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不代表区域人口的变动情况。上述解释,对于图 19-4 中的赣西地区土著家族和客家氏族的解释都是同样有效的。

再来看看浙江的情形。浙江南部的家族都是移民家族,由于所处地形不同,人口发展的起点不同。山区空旷,人口发展迅速,然后逐渐与丘陵区的人口变动趋势趋同。与浙江北部相比,浙南人口的增长速度显然要快得多。正因为浙南山地存在大片的空地,才有可能接纳外来的移民。而移民人口实际的增长速度,是否如样本家族所显示的那么高,则是我至今不敢确定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搜集足够多的族谱,进行更大样本的分析。图 19-5 所示,只不过反映了不同地形人口变动的一种趋势罢了。

正因为如此,我从来不认为清代前期浙江北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高达 10‰左右,且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距离修谱时间越长,丢失的人口比例越大,这是唯一的解释。在一些地区,尤其在一些新移民地区,家族的规模小,或者说移民之初,家族根本不存在,绝嗣的家族、族支或家庭无法从族谱人口的统计中表现出来,即族谱可能漏记一批绝嗣的支系或家庭的人口,究其原因,也与修谱时间间隔太长有关。当然,也可能存在别的原因。距离

时间越近,样本越大,与真实的区域人口之间的误差就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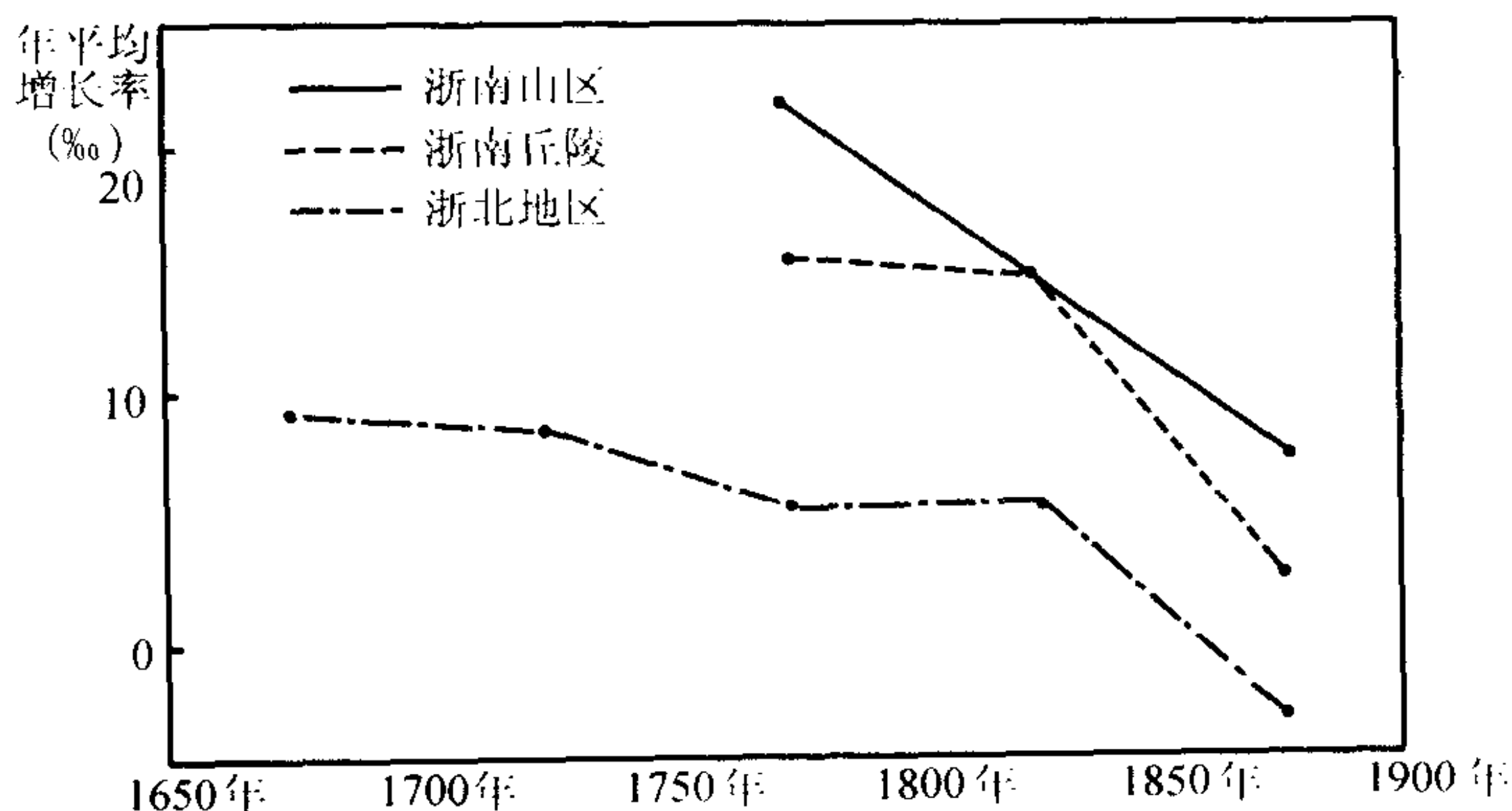


图 19-5 清代浙江各类地形区家族人口增长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第 629 页。

从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在以 50 年为一期的时段分析中,浙江北部三个家族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合计值均为 5.3‰,与本卷表 16-1 中显示的 1776 年至 1820 年绍兴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完全相同,应该不是巧合^①。

至 1875 年,浙江北部各家族所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大于浙南各家族。人口的增幅度跌落迅速。浙江北部的三个家族中,有两个上虞的家族,一个萧山的家族。如我在本卷第三章所指出的,绍兴府四县当中,东部四县所受影响较小,这里地处浙东丘陵山区,太平军在此未作过多的盘桓。尽管如此,人口的损失也是相当严重的,只不过与西部平原四县相比,损失稍轻一些而已。所以,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的影响虽然是全局性,但不能认为这一时期绍兴府三个家族的人口变动模式可以作更大范围的解释。

基于这一分析,我以为李中清、王丰将若干地域或特殊种类的人口结构与变动趋势来论证中国的人口体系,其实是很危险的。微观的人口结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已有理论的挑战和修

^① 可惜的是,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 631 页,我以该书估计的清代中期浙江人口 3.5‰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理由,错误地认为浙北此三个家族的人口增长速度偏高。

正,例如李中清、王丰根据辽宁村庄和皇族人口的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存在婚内节育,就是一例。然而,要将这些不多的例子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实在是有些草率或仓促。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之间,中观的研究也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了。

3. 短时间和长时间

微观研究不仅指小区域的研究和非大样本的研究,也指短时间研究。民国年间进行的许多人口调查,不仅区域狭小,而且时间跨度太短。所以,在民国年间的调查中,我们读到的人口报告往往只涉及小区域的一个时点。例如,关于人口增长速度,研究者依据的方法往往是这样的:用某一年份某一地区人口的出生率减去同一年份同一地区的人口死亡率,所得即为这一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就一年的数值来说,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调查数据在整个数据变动系列中所处的位置,差异很大,尤其是在一个灾荒频繁发生的地区,更是如此。

1959—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人口死亡最严重的省份为安徽、河南、四川及贵州,人口出现负增长。在其他饥荒较轻的省份,部分地区的人口死亡为另一部地区的人口增长所抵消,所以,从总体上看,人口还是增长的,尽管增长的幅度变慢。图19-6显示此次饥荒对于中国人口的影响。

不多的微观研究案例,不可用来建立中国人口的宏观体系。

民国年间的人口调查需认真鉴别。个别区域、个别年份的数据不可轻率地加以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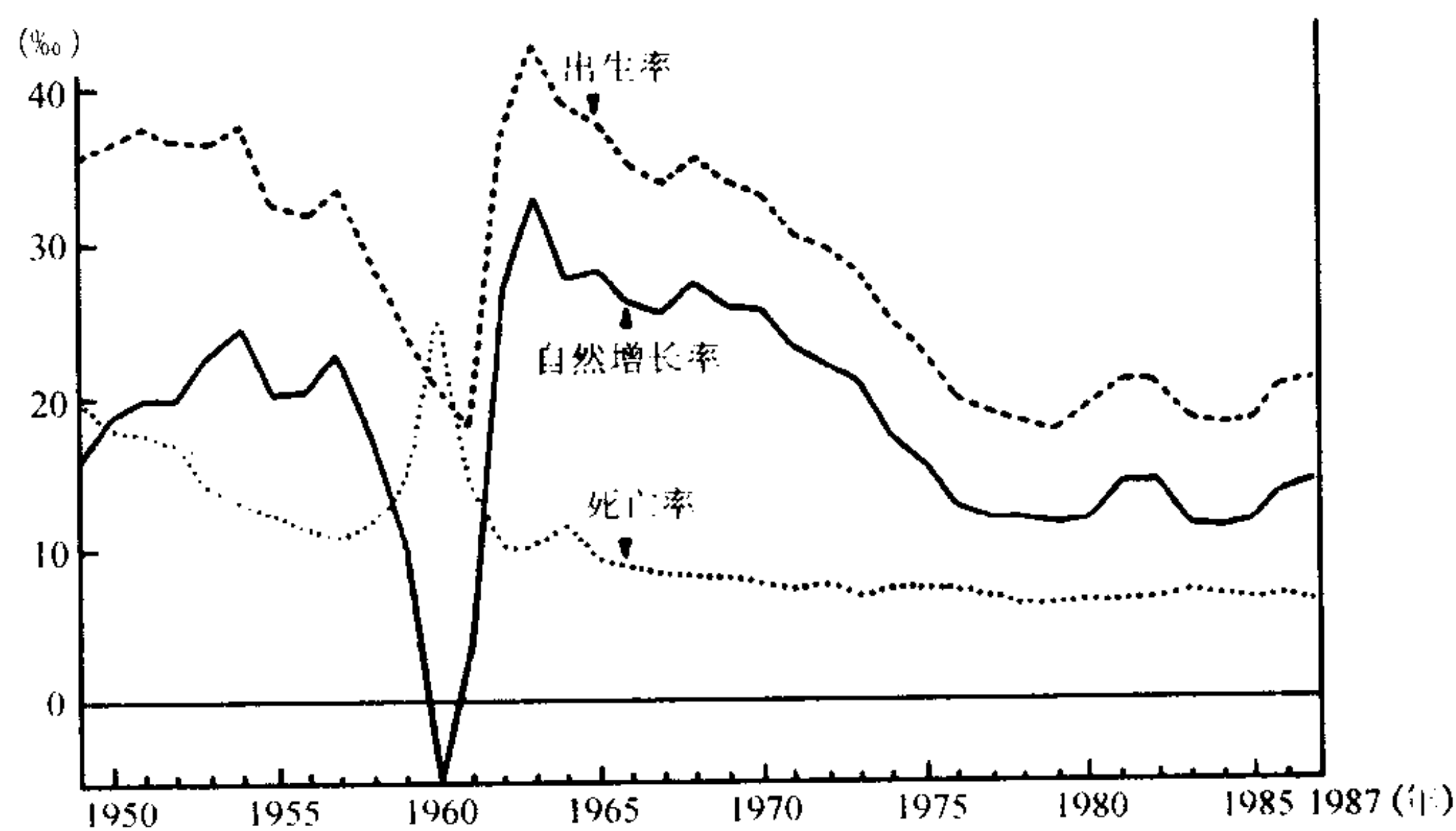


图 19-6 1949 年至 1987 年中国人口的变动

资料来源:〔日〕若林敬子《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 页。

灾后人口以更高的出生率对大灾中的人口损失进行弥补,很短的时间内,人口总量超过灾前,如果没有逐年的人口记载,在5年一期甚至在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这种人口损失完全可能为资料所掩盖。

由灾荒造成的人口死亡具有这样的特征:短时期,小区域,大数量。时期的长短、区域大小和数量的多少都是相对的概念。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例,这场战争经历的时期不可谓不长,前后经历14年,但在以50年甚至100年为一期的人口数据分析中,仍属短时期。战争波及的范围不可谓不大,但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区域只是鄂、皖、赣、苏、浙、闽六省,对于全国而言,亦属一个小范围。所以,对于某一区域、某一时点中的人口调查而言,选中受灾地区、受灾年份概率就要小得多。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不关注战争或灾荒造成的人口死亡,相反,民国年间有大量这方面的报道,但是这些报道很难与人口调查结合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1928—1930年的大旱灾造成陕西数百万人口的死亡,关中地区的人口损失占到灾前人口的半数左右。然而,有谁告诉过我们,这场大灾在陕西乃至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地位呢?

根据我们初步的研究,1928—1930年的大灾结束以后,陕西人口用高增长来弥补灾荒中的损失。可以设想图19-6中显示的情形在1928—1930年前后的陕西也同样发生过。问题是,如果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由低谷向高峰攀登的过程中选择一个时点进行调查,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就会得到不合适的夸大。反过来,我们却没有见过人口学家对灾荒地区的人口减少进行调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为数不少的人口调查,不会选择调查点的灾荒年份来进行,即不会选择人口增长率急剧跌落的时段。极端一点说,如果将所有的类似调查在时间和区域上进行放大,就都有夸大人口增长速度的可能。区域时点调查数据的局限性,于此可见。

四、结论

在“人口过剩”的内涵和定义被重新确定以后,可以看出,中国清代的人口过剩是一个区域过程。在农业区域,经历了过剩—缓

解—过剩的演变模式。缓解过剩的方式包括主动地向外移民和被动地承受战争、瘟疫、饥荒造成的人口死亡,最后形成所谓“人地关系的恶性宽松”。商业区域的人口增长表现为几乎是恒定的低增长。这类区域的人口变动不受区域内部资源的影响,由战争、瘟疫和饥荒构成的灾难对人口行为的作用并不明显。

在本书第三卷的最后一章中,吴松弟提及在宋辽金元时代,尤其在宋代,适度的人口压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适度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离开土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本书第四卷和本卷的研究则证明,区域性的经济结构形成以后,区域内的人口生育行为也就随之形成一种与土地、农业几乎无关的稳定的模式。

农业区域中的人口抑制即马尔萨斯所称“现实性抑制”:以溺婴为特征的人口控制被马尔萨斯称为出自意愿性的罪恶,是一种处于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之间的一种中间抑制。以今天我们对于生命的观点看,称作中间抑制也是不妥的,仍然属于严格的马尔萨斯意义上的现实性抑制。这种行为类似于灾荒年景中的家庭成员的互食行为,可能出于自愿,却仍是“罪恶”。商业区域的人口抑制是一种与西方预防性抑制不同的人口行为:它不是通过对于晚婚或不婚来抑制人口,而是更多的采用婚内节育的方式,如避孕、流产及其他措施来抑制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的中国人口抑制存在农业区域和商业区域两种不同的形式。由于中国农业区域的广大,马尔萨斯对于中国人口抑制方式的总体描述,是正确的。

家族对于人口的控制,可能具有个别的或小区域的意义,但就是这一点,还需要更多更为严谨的论证。农业区域集体性的人口行为,从大范围和长时段看,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状态,概括地说,在这类地区,人口的生存意义被定义为生存本身,区域人口行为的目标是“奔向过剩”,人地关系的宽松是恶性灾难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区域被消灭之后,中国区域人口的非理性就变为全国人口的非理性,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全国性的人口过剩危机就这样发生了。

《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从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入手,证明人口变迁受到自然资源和社会制度的制约。本卷则在此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与人口的两重属性相对应,还存在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所谓简单社会,大体是以农耕家庭为单位的区域人口组合。复杂社会指的是工商业经济成分占有较大比重的社会。在复杂社会中,社会分工进一步的分化,农耕不再是主要的经济形态,服务于工商业的各种社会组织得到较深程度的发展,构成社会的联系网络和基本单元。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口增长有着不同的模式,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清代乃至中国人口的变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口的变迁本身也是生态环境的变化。

总之,自然资源的分布有其区域性特征,社会经济结构也有其区域性特征,因此,中国人口的变迁过程首先是区域人口的变迁过程。概括地说,区域性的自然资源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结构共同制约着区域内的人口变迁,并借此制约着中国人口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变迁本身也就是生态环境的变迁。这一观点是马尔萨斯理论逻辑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对它的颠覆。

卷 后 记

—

2000年11月至12月,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该校中国文化中心一间虽然很小但却十分舒适、方便的办公室里,我写完了本卷的最后一章。城市大学是一所新办的大学,该校的藏书却已经初具规模。我一边读着大陆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李中清、王丰合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一边参照英文原版,顺利地完成了对于李中清、王丰著作中反马尔萨斯主义的一种新理论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我建立了自己有关中国人口体系的基本框架。一项进行了五年时间的研究至此告一段落。

然而,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工作却远没有结束。在进行最后一章写作的半个多月里,我几乎天天失眠。半醒半眠中,我的思绪总是围绕着那些让人困惑的话题,挥之不去。我感觉到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也暂时说不清楚。例如,尽管我指出了李中清、王丰著作中的不少问题,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还不能从更为精细的定量研究入手,得出一系列可靠的或较为可靠的数据,建立一套更严密或更完整的概念体系,准确地描述中国人口的变动过程和特点。对于这一时期经济过程与人口过程的关系,自然界各生态系统与相关人口数量及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实在太少。本卷最后一章所涉中国人口体系,只是一个研究的初步框架。在一个名为“近五百年来中国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项目中,我试

图从这两个关系入手,对中国人口体系作更加深入的探讨。

李中清、王丰的著作将我引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他们富有概括力的解释,体现了西方学者思辨的魅力。尽管我不同意他们几乎所有的观点或论证过程,但我欣赏他们严肃的思考态度及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我清楚他们的长处在于精细的微观研究,我也知道他们的短处在于驾驭宏观数据时的力不从心。他们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学术的规范:如何构造一个理论的框架。他们研究中的问题不是出在框架的不完整或不新颖,而是出在事实本身的缺陷,即他们所用的材料尚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更为大量的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我们才有可能在与他们的讨论中,建立新的体系和理论。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种学术范式值得我们用心学习。纵使失败,我们也不能原谅自己——只会从资料中发掘历史事实,而不去学会解释历史。历史学的任务并不仅仅局限于描述,而在于解释,在于你自己的——作为独立的历史学家或思想家的——解释。用今天的眼光看,从来就没有所谓纯粹客观的历史,只有某种解释框架中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从来就是思辨的过程和结果。

所有发掘事实的研究都构成历史解释的基础和前提。只不过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即使有所解释,也是老框框中的老话题,缺少对历史文献的严谨、深刻的分析,不能从文献记载的字里行间,理解深藏其中的历史内涵,所以也就不可能产生令人深思、令人激动的思辨,历史学才面临它的危机。严格地说,那不是历史学的危机,而是没有历史学的危机。

所有没有基础性研究支撑的理论大厦都是徒有其表的虚架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关于中国社会和历史,谁也数不清出现过多少种宏伟博大的解释体系。五花八门、热闹非凡的表象后面,是历史学者精力的浪费和才思的滥用。直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提那些当年喧闹一时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以当年的研究作为今天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本身没有超越,也就没有被超越。

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对于一个构造理论大厦的建筑师而言,我们不能要求他在设计大厦的同时,还要去制砖和烧瓦。同样,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一个制砖的或烧瓦的工匠同时又去担任建筑师的角色。历史研究的两种角色,简直就是不可共兼的,历史研究的困境,由此可知。现在的问题是,历史理论的构造,是否存在意义?

在承认我们需要进行历史的解释的同时,却又怀疑解释历史的意义,我自己似乎也陷入了一种不能自拔的矛盾当中。其实,历史的解释和解释历史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或者说是两个不同程序的工作。历史的解释,即是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中,抽象出合适的新概念,以后再用更加大量的实证研究去丰富这一个或这一些概念。当然,进一步研究的结果可能是对原有概念的证实,也可能是证伪。解释历史的工作,则是循着稍有些不同的路径展开的。研究者对于历史的解释,并不是来自历史的记载或历史的真实本身,而是来自某种思辨的体系或观念。建构这一体系的所有概念,并非全部出自构造者自己的研究。在有些特别善于思辨的学者那里,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源于他人的研究,而概念体系却是自己的。无论关于西方社会还是关于东方历史,西方思想家们都有堪称完整的体系和不同凡响的理论。他们的成果,大都是这样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学者也循着同样的路径,力图成为中国自己的思想家,可惜都未能成功。问题是,我们认真检讨一下,在关于中国社会或历史的解释中,西方的思想家中谁是成功者?于是,学者们企图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在一个与自己长期实证研究有关的领域内进行中国社会历史理论的构造。这一努力,显然要比前者明智得多。他们不满足与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概念之归纳,试图使理论的覆盖面尽可能地大一些、广一些,于是就有李中清、王丰以及与他们类似的工作。在这类研究工作中,作者不可避免地会遇上资料不足的问题,会遇上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理论的问题。如果通过自己的实证去弥补这些漏洞,将旷日持久。为了推出构想的理论,就不得不迁就一些。这样,论证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因而产生。我不讳言,这一现象也同样出现在我的

研究中,仔细阅读过本卷最后一章的读者都能发现这一点。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研究程序的先天缺陷与研究者的义无反顾的选择——虽然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却是真实的。

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我们不妨将研究者构造的理论永远当作一个尚未完成的假设,研究者则将构造这种理论的追求当作一种激励。他们心底里都明白,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和自我激励,也就不可能有历史学的进步。鉴于这一认识,无论是批评别人的理论,或别人批评自己的理论,都可以当作思想上的相互砥砺,当作来自另一个不同领域的专家给予对方或给予自己的善意的帮助。

在历史学的建筑工地上,我们都只是一名工匠,一名不满足于终身劳顿而永远是工匠的工匠,一名希望成为建筑师但又永远不能成为建筑师的工匠。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将要建造一幢什么样的大厦,虽然已经有设计好的蓝图,但我们总是抱怨设计中的缺陷,于是在烧砖制瓦的同时,也来涂抹自己的蓝图。这一永无休止、相互排斥的过程,或许正是历史学永恒的魅力所在。

二

在本项研究结束之际,回顾几年来的工作,既感辛苦,又觉自豪。最初的计划并没有今天读者看到的这样庞大。出于建立一个完整的清代人口体系的需要,我不断扩充计划,不仅讨论了清代中期的全国分府人口,而且讨论了清代后期大的战争、瘟疫和灾荒对各地人口的影响,最后形成一个包括六个标准时点在内的全国分府分地区的人口数据库,形成了一个与以往同类研究完全不同的新体系。当然,这一研究不是清代人口历史研究的终结,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本卷的工作恰似搭建一个平台,后来者可以以此为基础,以县级、府级政区为单位,发掘更多的资料,寻找更新的方法,改进我的工作,完善这一体系。这也就是说,以本卷的工作为基础,我们才可能告别此前单纯的制度史研究和以省级数据与全国性数据为对象的研究,让清代人口历史的研究进入区域的范围,

进入新的境界。我相信,本项研究可以改变前人对于清代人口的许多旧观念,并为相应的其他研究提供新的较为完整的参考数据。

在本项研究进行的几年当中,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为我提供过帮助。刘仁团在跟随我读硕士学位的几年间,事实上担任了研究助理的角色。他为我查阅了近 3000 种的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摘录出数千张卡片,与我合作撰写论文及本卷第十四章,并承担本卷第十五章的独立研究与撰写。另一名研究生李玉尚也承担了大量的资料工作,协助我完成本卷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的有关研究,并合作发表多篇论文。他个人则在中国传染病史的研究中取得优异成绩。研究生郑磊重点研究民国时期的灾荒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他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中归纳的新概念给我启发,在本卷最后一章,我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另外,他帮助我完成了本卷的参考文献和索引的整理工作。葛庆华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较之我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中的有关研究更上一层楼,承蒙允许,在该书尚未出版之前,本卷提前转引了他的部分成果。董龙凯博士在安徽省图书馆为本卷抄录的人口档案,对我帮助很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其他研究生们,在为本书核对资料和校对卷末的索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感谢本书第三卷的作者吴松弟教授,他对于辽宋金元时期人口史的出色研究,给予我许多启发。在讨论明清人口史的若干问题时,他总是给予我真诚的帮助,让我的视野能够进入明代以前更为久远的历史之中。感谢本书第六卷作者侯杨方副教授,他对于微观历史人口的精湛分析使我受益匪浅。尽管本卷与第六卷未能做到数据系列上的一致,但我们之间为此进行的长达数月的激烈争论帮助我完善了清代后期人口史的研究,也有助于我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人口体系的新解释。另外,他对本卷最后一章的技术指导,也给我很大帮助。本书主编葛剑雄教授,则在百忙之中,倾听我们的不同意见,参与我们的讨论。这一切,对于本

卷的定稿帮助尤大。

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满志敏教授、张伟然副教授、王建革副教授和张晓虹博士,他们经常倾听我对本卷有关内容的陈述,并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各抒己见,给我有益的启发。满志敏教授为我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底本的明清两代各省分府面积的电脑实测数据,使我从以前原始的手工测算数据中摆脱出来。我们也希望通过本书第四卷及本卷的工作,使这一数据系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研究员,他对于清代户口清册数据的整理,给予后来者许多的便利。这一切,都在书中作了必要的说明。此外,最需要感谢的是他在百忙之中帮助我查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这批档案,在本卷的相关分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台湾的刘铮云教授寄赠的乾隆六十年户部清册中四川户口数据,对于本卷第七章的写作帮助尤大。

感谢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的陈意新博士,他逐字逐句地审阅了本卷的最后一章,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接受了他的大部分意见,并作了相应的改正。我们计划合作撰文,对马尔萨斯体系以及反马尔萨斯的新体系进行更为全面的讨论,将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感谢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博士候选人熊彬彬女士,在关于18世纪至20世纪天灾人祸对江西人口影响的研究中,她以本卷相关的研究结果作为基本假设,采用更为复杂、更为精致的数学方法,建构起精彩的数学模型,求解没有数据记载的地区人口损失及相关问题。这一研究使我明白人口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有多么广阔。面对后来者的创新和挑战,我们应该加倍地努力。

感谢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他为我提供了几十天相当惬意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我能够在本卷最后一章的写作中,有一段没有丝毫杂务干扰的安静生活,这有助于本卷的最终完成。

最后,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吴仁杰先生,在从事本书第

四卷和第五卷编辑的两年多里,他的严谨、认真的作风深深影响了我。

曹树基

2000年12月于香港九龙塘